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前 言

本书旨在剖析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将军的“回家过圣诞节”的总攻势崩溃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原因。衡量失败的标准并不是中国的丧失。任何人都不会丧失他从未占有的东西。蒋介石委员长对中国发生的一切比任何人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责任与权力是成正比的，而蒋曾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然而，如果用美国的目的、意图、利益衡量其政策，那么美国的政策是失败的。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中国曾是美国的盟友；在朝鲜战场上，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美国军队，并且作为强国出现在世界上。

我们着手分析的途径之一就是视外交政策为假设、目的与手段的完整结构。然后从两个角度剖析这一结构：构成外交政策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及假设和现实的一致性的程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一种外交政策由于含有自相矛盾的因素，可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之间的合理次序被颠倒，如果基本的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正在出现的变化，那么即使是始终如一的外交政策仍然可能无助于国家的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例子，说明一种政策失败的原因所在。

显而易见，一种外交政策格局中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尽相同。我们的分析所强调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表现为有时是不愿意、有时是没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以达到政治目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平衡看来是不愿意又不能放弃无法达到的目标，从而在一件毫无成功希望的事情中陷入纠纷。不平衡的第一个方面在至1947年止的美国政策中极为清楚地显示出来，而第二个方面则于1947年至1950年6月这一时期赫然耸现。不愿诉诸武力和维护理想主义的目标是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两点使中国成为让美国陷入窘境的难题，迫使美国选择了在远东由进到退的道路；正是这两点使美国毫无争取不断胜利的机会，相反地却扩大了美国最终失败的结果。也正是这两点构成了美国幻想的根源，她曾相信，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将成为一个大国，国共两党将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我们这样简要的解释听起来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分析的严密性要求我们还要进一步澄清复杂事态的意义。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作者试图解释美国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有目的地诉诸武力或者干脆放弃无法实现的目标这一问题。这方面的剖析表明，美国的政策是对远东事务的总方针的必然结果——她的理论假设和政治及道义方面的考虑。本书明确探讨或含蓄提出了对行动步骤所作的各种假设。这些假设当然是事后聪明，它们在当时并不是可行的选择，因为它们与制定实际政策的既定假设和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况且，谁也不能证明，另一套行动步骤就会成功地推进美国的理想和利益，而不会给她造成更大的损害。探讨或提出这些可供选择的假设主要是为了强调一点：如果曾经有一套不同设想的话，那么就有可能采取一系列不同的行动步骤。

我们的分析暗示了一种信念，即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观点看待人类的行动。第一种观点是我们可以从演员的角度看待人类的行动。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我们看到这些行动不仅仅是偶然的事件，它们是人类的思想，即演员的

假设和思想所导致的事件。因此，集中研究制订政策的假设对主要以叙事形式写成的著作来说是颇为有用的补充。

第二种观点是，人类的行动及后果可以被理解为是复杂的“条件”的产物。演员的假设构成“条件”的一种类型，另外一种类型是“客观条件”。演员有可能完全了解这一条件，也可能完全不了解。有一些“条件”是完全不受演员控制的。在这一分析的水平上，社会科学家总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件，试图找出一种解释人类行动的模式。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看到，美国政策的模式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她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诉诸武力、或者放弃她雄心勃勃的目标，而不管演员本身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一决定胜负的因素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不愿诉诸武力和随时准备维护理想主义的原则在美国的态度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认为它是美国精神的精华，然而，它对美国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却构成了不可避免的和无处不在的限制。从第二种观点出发，人类的行动似乎经常遵循一条基本上由复杂的“条件”所决定的发展道路，而行动往往是在这些条件之下发生的。

关于第三种观点，人们可能会提出如下的问题：制订政策的假设和想法如果是由“客观”因素所决定，那么政策是否在实际上是超越于演员的控制的？人们是否可以合理地争辩：演员——个人、政府或国家——是可以采纳一系列不同的假设的，是可以注重研究另外一组想法的？如果一系列不同的假设和想法占了优势，那么过去事态的发展是否也会不同？演员被合理地认为享有选择的自由与他们并不享有这种自由之间的界限怎样划分？哪些是可供演员选择的可能的行动方针？哪些是被客观环境所排除的行动方针？可能发生的事件与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界限是什么？人类无法驾驭的事件与由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而导致的事件之间的界限又是什么？作者并未试图对这些问题作系统的回答，虽然这些问题与本书所涉及的行动和政策有关。但是，即使是含蓄地提出这些问题，从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强调了占优势的假设和想法的控制性的作用，强调了由于人类对自己和环境的了解而强加于行动的限制。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人们注意到通过对自己的了解而有意识地改变人类思想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而扩大人类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范围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注意到人类自觉地掌握自己的历史与命运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本书主要是以第二种观点加以阐述，但它必然是以第一种观点开始，以第三种观点提出建议的。对一个国家一种长时期的政策进行解释，正如本书在此所试图做到的那样，是担风险的工作，充其量作者只能做到洞察敏锐。而在一般情况下，他只能是貌似有理，因为他是从复杂的全局中选择一个因素作为分析的焦点的。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假设、政治倾向和感情色彩，而这些都是由他的整个社会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危险，即分析的严密性可能不符合历史的复杂性。探索历史事件的意义、试图将外交政策看作是由互相联系的因素组成的结构，可以赋予历史事件比其本身实际享有的更多的连贯性与逻辑性。我们现在的态度和思维习惯也可能会妨碍我们全面了解另一个时代的舆论。全神贯注地学习过去的经验可能妨碍我们全面地认识美国官员是在何等困难的环境下和目标的限制下不辞辛苦地工作的。所有这些内在的人类智力上的局限性对当前的这一工作来说，都有着特别的严重性。作者希望，通过对这些局限性进行全面的了解，能够避免一些易犯的错误。只要有必要，分析的严密性便让位于历史的

复杂性；分析贯穿整个对历史的叙述。因此，本著作既不完全属于政治科学的领域，也不完全属于历史的领域。它并不是一部严格地按年表的顺序而写的叙事历史著作，也不是一部仅仅由逻辑大纲主宰的纯分析性的著作。当论证一种分析需要叙述历史事件时，年代表便附在后面。当有必要进一步阐明某种观点时，作者采用了逻辑的顺序。因此，本著作处于政治科学和外交史重叠的边缘地区，分析和叙述是混为一体的。我们的希望是，如果它不能更多地增加我们对事实的了解的话，也能引起我们对政策的假设这一抽象领域的重视，使我们能更加敏锐地洞察我们的行动的明智或愚蠢，使我们汲取的教训系统化。我们的观察力，的确也是我们的偏见，也可能使我们注意到没有给予充分强调的全局的某个重要的方面。我们所做的这一努力是否有价值要由别人判断。

从珍珠港事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鸭绿江总攻势崩溃时期的中美关系的各个阶段的杰出著作极大地便利了对美国政策的研究工作。赫伯特·菲斯的《中国的纠葛》为我们提供了从珍珠港事件到马歇尔出使中国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权威性的报道。查尔斯·F·罗曼纳斯与赖利·森德兰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军事历史三卷本著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美国的远东战略，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活动的详情，并揭示了中国国内政治与抗日战争的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H·布雷德福·韦斯特菲尔德的《党派政治和外交政策》对国会的“中国帮”和杜鲁门政府在中国政策上的争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一争论曾经构成1946年至1950年的美国政策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在作者完成了本书的研究工作之后，约翰·W·斯帕尼尔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和朝鲜战争》出版了。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前六个月这一章的初稿完成之后，艾伦·S·惠廷的《中国跨过鸭绿江》出版了。斯帕尼尔的书对美国政策作了敏锐的分析。惠廷的书在已问世的有关共产党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书中首屈一指。我们的研究结果和结论经常与他们一致，但不总是这样。

作者仔细查阅了这一时期所有公开发行的文件及其他与中国政策有关的原始资料。这些材料的总数，加上无数篇文章和研究著作，是令人惊讶的。这种努力已被证实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对隐藏在政策和行动后面的假设和想法进行全面的讨论和论证。作者也利用了一些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政治现状和美国政策的中国资料来源。缺乏取得资料的途径严重地限制了作者的这一努力。但是即使是有限的努力也导致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引言是对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传统政策的一般性的阐述，它主要基于有关这一时期中各个阶段不计其数的研究著作。作者在脚注中对此表示了深厚的谢意。其中四部著作特别有帮助。它们是：赫伯特·菲斯的《通向珍珠港的道路》；书中详细地阐述了1937年到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的远东政策。保罗·W·施罗德的《轴心国和日美关系，1941年》；书中对美国的传统的对华政策作了有趣的阐述。威廉·L·纽曼的论文《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亚洲政策》及亚历山大·德康德主编的《孤立和安全》，对美国政策的基本假设进行了分析性的阐述。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看来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在学术、体裁和思想范围内，没有任何后来的著作可与之媲美。对于这样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由于客观原因，仅能查阅很少的原始资料。作者希望，对美国的传统对华政策作了路为不同的解释和评价的引言，将使我们在本书的分析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和历史的连贯性。

序

在生活中、每个民族都离不开神话。神话所描绘的过去总是适应现实的需要，但往往不顾历史事实。有些神话是有益的，它们加强了民族信念，使人们坚信他们在过去和现在都能够肩负时代的重任，诸如对丰功伟业、大难浩劫和重大成就夸张的回顾均属此类。

但另一些神话却是有害的。人们从被歪曲了的事实中了解过去，并以此筹划未来的行动。这样做虽然取悦了人们的集体情感，却使人们的判断和行动步入迷途。这类神话是过去对未来施展的魔法，是死人压制活人的咒符。

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属此类有害的神话。它把对现实的错误概念、把充满讹误的判断和行动印在法国人的头脑中。它不仅使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了灾难性的政策，而且给法国的国家肌体造成了似乎是不治的顽症。恢复现实的本来面貌需要有伟人的权威、勇气、能力和远见卓识。这位伟人（指戴高乐将军——译者）对法国的议会主义和大西洋联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他因此在法国作为伟大的“戳穿神话者”而受人欢呼，他使法国重新正视现实。

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我们同中国的关系的看法也颇具神话的性质，并且还是那种有害的神话。它适应我们的感情需要，却不符合正确判断和行动的要求。中国的共产化确是美国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但“我们丧失了中国”这种提法恰恰指明了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的神话成分，因为人们只能丧失属于自己的占有物，而且假如人们丧失了自己的珍贵占有物，那么这种损失或是出于疏忽大意，或是由于对方的卑鄙手段。

对我们集体的自我意识来说，“丧失中国”是真正的创伤体验。它造成了类似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并使人想起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神经病患者相信二加二等于五，而精神病患者则知道二加二等于四，但却对此闷闷不乐。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则患了精神病。只有为数极少的、其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少数人敢于以冷静的客观态度正视这个历史事实。这样做意味着正视我们自己，揭示我们判断的错误和行动的失误，因而发现，“丧失中国”的原因既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一伙可以指认的替罪羊的叛国行为，而是我们自己，是那些表达了政府意向和民众意愿的政策。

此书巨大的、独特的功绩，在于揭示了使中国共产化和使她作为一个大国出现的美国政策的本质。此书所揭示的并不是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中国政策，而是反映了我们外交政策的特点：在同一时期奉行自相矛盾的政策并且致力于无法实现的目标。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缺陷揭示了我们外交政策的一种风格，它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民族特征。

此书是在芝加哥大学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写成的。在书中，作者将他对美外交政策深邃的理论意义的理解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明智与公正的判断，它在中美关系史上可称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贡献。它既是一部体裁宏伟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科学著作。此书对广大读者也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在纯理论的基础上和从印象出发的证据上驳斥我们中国政策的神话，相反，它根据历史的本来面目重新描述了它，因而揭露了我们普遍信念中虚假的东西。它在学术领域里所作的贡献可与伟大的政治家在政治领域里所做的贡献相媲美：

它还真理以本来的面貌。

汉斯·J·摩根索

译者的话

本书的作者邹说 (TsouTang)，1918 年出生于中国广州，1951 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 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说先生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政治变化与改革：中间道路》、《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方向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和与过去的连续性——邓小平文选》、《中国的亚洲政策和美国的抉择》等。

邹说先生所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出版于 1963 年。当时，40 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档案尚未解密。邹说先生主要利用国会听证会和国会记录等文件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朝鲜战争这十年的中美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这部著作是 60 年代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

该书出版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有关部门的 40 年代的档案逐渐开放。同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卷入引起美国人民和学术界的广泛不满。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反对美国干涉第三世界事务的观点，并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对中美关系进行重新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专著和文章，例如已翻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自然，70 年代的这些著作比邹说的资料更为丰富些。

尽管如此，翻译并出版邹说先生的这部著作仍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作者的立论比较客观。在书中，他分析和批评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和缺乏远见，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和失去民心。作者虽然对共产主义持反对的立场，但他从事实出发仍然承认了共产党的胜利是因为她深得民心。其次，作者在书中论证严密，逻辑性强，引用材料极为丰富，对每个问题、每个论点的论证分析都是细致严谨的。以至美国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家摩根索教授在此书的前言中正确地指出：“作者将他对美外交政策深邃的理论意义的理解与具体的历史事实相结合，对中美关系做出了明智与公正的判断，它在中美关系史上可称为一个巨大的思想贡献。它既是一部体裁宏伟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政治科学著作。……它在学术领域里所作的贡献可与伟大的政治家在政治领域里所作的贡献相媲美：它还真理以本来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邹说先生是美国学者，他在本书中所持的政治立场归根到底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作者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存在着错误，但它的本意还是“真诚地想为中国带来和平统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书中论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时，作者的观点显然是有着偏见和敌意的。例如，作者在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看成是只要专政不要民主的极权主义政党，指责共产党对于抗战时期的两党摩擦和抗战结束后的内战负有责任，反诬新中国敌视美国等等。另外，在论述朝鲜战争时，作者也是明显地附和了美国政府的观点。作者的这些观点和提法与我们有着根本的分歧，书中引用的我国领导人的言论也有不实之处，但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西方学者的观点，我们在翻译此书时未作删改，请读者注意分析和鉴别。

自 80 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已基本形成。但历史仍然是当今解决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战争的一面明镜。译者相信，这本书所回顾的那段历史对于

我们认识和处理今天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是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借此机会，译者谨向为此译著问世而付出了艰辛劳动和鼎力支持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李卫先生表示最真诚的谢意。没有他的帮助，此书即无法付梓。同时，还要感谢周怡女士为此书所做的热心的联系工作。最后，我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合译者——我的父亲周先进，一位亲身经历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老翻译工作者：中国学术界的春天已经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王宁

1996.5.3. 于北京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引言追根寻源

第一章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与美国的中国政策的格局

1. 理想和利益的汇合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俄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1〕。声明要求各国正式保证对它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通商口岸、投资事业、通商关税不得加以干涉，在支付码头税和铁路运输费方面准予各国商人以均等的待遇。在1900年7月义和团运动期间，海约翰向各国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政策是为给中国带来长期的安全与和平，为维护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为保护一切由条约和国际法所授予友好各国的权利，为世界各国捍卫与整个中华帝国平等公正地通商的原则而寻求一种解决方法。”这样，在美国与中国缔结的第一个条约——1844年的望厦条约中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里所暗示的各国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以适用于当时局势的形式再次表现出来。第二次政策性的声明使美国迄今为止维护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不可捉摸的意图变成了指导性的原则。望厦条约与门户开放政策公开地正式解释了美国在以后的五十年中间断性地、并不是十分有效地遵循的两个目标。

随着时间的流逝，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事务，并使得这两个原则有了愈来愈多的具体含意。美国卷入中国的原因与门户开放政策具体化的原因并不难寻找。美国的理想、感情、利益在这两个原则上完美地汇合为一体。要求平等的贸易机会和反对垄断的传统早在美国革命以前就存在了。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原则表达了美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立场，和她同情受压迫人民的态度。正如泰勒·丹尼特所说：“（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古老。”或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缩写。”

美国生活方式输出的另一个内容是包含着人道理想主义的福音基督教。它的具体表现是在中国开展活跃的传教、慈善和教育活动。正如蒲安臣对传教士们所说的那样，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似乎是自异教徒的罗马以来，最有希望“将闪闪发光的十字架挂到每一座山谷”的国家。蒲安臣曾一度是美国驻华公使，他作为“掌管中国的外交关系”的特别使臣为清朝政府服务。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称他的传教活动获得了“私人传教的最大成就”。虽然当时从改教者的人数来看并非令人瞩目，到1927年，仅有五十万人受洗为新教徒。但是，这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的影响似乎是很大的，传教士的整个影响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变化似乎是深刻的。早在1913年，狂热的教徒、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想法：“新的中国文明是建筑在那里的基督教运动的基础上的。”长老会的长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曾说过：“我们在华利益的主要形式是传教活动，我们派往中国的使节应是福音基督教徒。”

美国生活方式的输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美国自然愿意看到共和、民主的政体在中国建立并繁荣。威尔逊总统在欢呼中国1911年至1912年的革命时宣告：“我们这一代最有意义的事件，如果说它不是最重大的事件的话，是正在觉醒的中国人民意识到他们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下所享有的各种可能。美国人民对此抱有深厚的同情心。”美国从未来的憧憬中得到极大的激励：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大国将变成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基督教的国家并

追随美国的领导。对美国的道德标准在中国产生影响所抱有的自豪感和对中国的进步所怀有的希望培养了一种对中国慈善的感情和同情的态度，一种深切地关心她的繁荣昌盛和与她的友谊的态度。在威尔逊总统代表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不久，在给一位美国驻华领事的信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将美国看作是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面临的伟大任务中以美国为他们的典范，这的确使我感到十分自豪。”他表示希望美国在未来将会有许多机会“表明她对中国的诚挚的友谊”。在满洲里事件（中东铁路事件——译者）之后，国务卿史汀生在阐述他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的原因时写道：“美国在发展与中国的友谊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当中国极需帮助时，如果我们对她置之不顾，那么这将是愚蠢的鼠目寸光。”门户开放政策看起来最有效地、最令人满意地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与感情和中国的富强与利益。正是这些崇高的想象力和感情变成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动力。

同时，这两项原则似乎也促进了美国实际的和想象中的利益。从 1784 年到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大繁荣起来，它成为吸引美国领土向西部发展和人口向西部流动的因素。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沉寂之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在十九世纪末再度繁荣起来。赋予各国均等贸易机会的门户开放政策有利于一个经济大国的贸易上的利益，而美国的商业团体在促使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的发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并不是很大，甚至在三十年代，它还不到美国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但是美国的商人和公众被一个由四亿人组成的未来的市场所强烈地吸引住了。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原则首先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以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标，或者说，只有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才能最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

以取得菲律宾为开端的美国对远东政治越来越多的卷入，使美国官员逐渐认识到尊重中国主权完整的原则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作为一种带有明显的政治含意的政策表明，它是有用的。因为，这两种政策无论是拆开来看，还是合起来看，都是既反对瓜分中国，又反对别国排除美国而对中国实行统治的政策的基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当第一种结局即将出现时，海约翰发出了 1900 年声明，扭转了这一局势。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出现了列强排除美国而对中国实行统治的可能性，塔夫脱总统的“美元外交”政策就是为防止这种情况而制订的。1915 年之后，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内，日本为单独控制中国而企图征服她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布赖恩—兰辛的警告、史汀生主义、国务卿赫尔对美国一贯坚持的原则所作的反复引证，都是排除这种危险的努力的一部分。

尽管许多美国官员直到三十年代后期所直接关注的仍然是一些具体的问题，例如美国的贸易利益和传教活动，但是已有一些人意识到美国在远东保持力量均势的政治利益，并对其他列强统治中国所导致的不利政治影响极其敏感。1909 年 9 月，国务院在说明美元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指出：“在中国保持力量均势对东方和平来说是关键性的，正如要使欧洲安静，就有必要在土耳其保持力量均势一样。我们在亚洲海域的利益要求我们防止其他列强在北京获得占统治地位的利益与影响，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不容降低。”但是，由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遥远，由于美国明显地缺乏对远东的商业和政治上的兴趣，由于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传统，所以她即使有可能采取一条占有领土的政策，即使有可能为保存她在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而参与争取特权的

混战的话，那么这种政策和作法也是无益的。况且，瓜分中国或者为争取统治中国而进行斗争都包含着大国开战和中国动乱的可能性，而这将不可避免地损害美国的贸易和她的传教活动及慈善工作，并且有可能使美国卷入一场她不愿意卷入的武装冲突。因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并不在于取得权力和领土上的特别待遇，而在于远东局势的普遍稳定。众所周知，最有效地实现这一全面目标的途径就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通过说明美国何以会反对列强的阴谋，会愿意为中国提供机会以发展她的内在力量，我们看到，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看来恰当地反映了美国本身在远东的利益。在这种利益的指导下，美国的远东政策是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而这与美国消极的和“孤立主义”的欧洲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 不诉诸武力的外交政策

尽管在这些原则上，美国的理想与自身利益融合为一体，但是她从未试图动用国家的军事力量来实现这些原则。她主要通过发送外交照会，发表正式声明，或要求各国签署书面协议的形式使这些原则被接受。美国赞同这些言过其实的原则实际上意味着她所追随的有限的直接目标，就是保存中国残缺不全的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时地给她一定的支持。即使是这种有限的直接目标也不能通过武力实现。在 1941 年以前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上，美国都制订了原则，但是她却没有使用必要的手段使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美国在远东所有重大的行动都反映了这一特征。如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和国务卿海约翰的通告开始，到西奥多·罗斯福极力保持满洲中立，国务卿菲兰德·C·诺克斯试图使满洲铁路中立，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所作的辩论，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还有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不计其数的声明、照会和备忘录，最后直到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莫不是如此。九国公约似乎是个例外，因为，用 A·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的话来说，这一条约“是美国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作的最有力、最全面的努力。美国认为，一切都将取决于这一点，她试图使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成为持久的国际法原则……”。但是，尽管如此，让我们再次引用格里斯沃尔德的话：这一条约“与其说它是一个集体安全条约，不如说它是自我克制的法令。条约的唯一的约束力是各签署国的诚意”。

我们无需走得很远就可以找到美国始终是用文字来实现有限的目标和公开的原则这一情形的原因。在海约翰发送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的四十年之后，美国逐渐摆脱了她相对而言在地理位置上的孤立，然而她并未彻底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当时外界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和间接的。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德国决定继续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而不是美国有意识地愿为维护欧洲的力量均势参战。恢复孤立主义和“正常”状态、希望削减海军军费开支、二十年代的和平运动、大萧条、专门致志地恢复经济的努力——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三十年代后期，来自纳粹德国的日益增长的危险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欧洲。但是直到 1940 年的 5 月和 6 月，当纳粹德国分别占领荷兰和法国，翌年 9 月，德国、意大利、日本又缔结了三方条约时，美国的孤立主义才遭到有效的反对。在这一时期内，美国高度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削弱了它意欲取得海外市场和经济特权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在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怎样热切地致力于推进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一反映了美国在华利益的原则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说仍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在远东保持力量均势并不是美国决策的首要考虑。如果说美国不愿干预欧洲事务的话，那么我们也无法指望她卷入远东的战争，因为欧洲对美国有着更为重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尽管美国的理想赋予她的远东政策以积极的和“干涉主义的”特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美国的官员认为在中国打一场战争以捍卫或推进美国的利益的作法是有道理的。让我们援引保罗·W·施罗德的简单明了的话：“与门户开放政策一样悠久，而且在实践上更加始终不渝地遵循的另一条美国的长期的政策是，美国不会为中国而战。”这也就是说，门户开放政策所体现的理想主义的目标从美国的自身利益来看是缺乏必要的支持的，因而它不可能成为一项强有力的政策。

1941年7月，当时德国的盟国日本占领了南印度支那，又准备向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起进攻。只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才不顾爆发战争的危险，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因为日本的行动计划将切断英国在南太平洋的贸易通道，并可能严重地影响到保卫英伦三岛的成功，它也将使西方各国无法取得东南亚的重要的原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但它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日本更深入地向东南亚推进。对日的石油禁运从实质上来说是直接地捍卫美国在东南亚的利益，间接地捍卫美国在欧洲的利益的措施。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并不是她决定参战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从1937年起，尽管日本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美国的确并未再次实行诸如此类的禁运。

然而，尽管美国不愿意并且无能力用武力实行这些原则，但是美国在华利益是相当令人垂涎的，在太平洋彼岸实现美国的理想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使美国无法放弃它——虽然当这种理想所代表的原则和直接目标被列强置于危险的境地时，美国会鸣金收兵。这样，为使她的观点公之于众，美国永远不会放弃实行这些原则和目标的权利。一旦国际形势对她有利，美国便在中国采取新的步骤，做出新的努力以推动各国对这些原则的承认。实际上，这些原则都是需要以外交的、和平的手段去寻求的长期目标。出于以上的原因，美国日益卷入了中国的事务，而这些原则则为她的政策规定了总的方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对这一长期目标的遵循必然地使美国的政策目标走向僵化。因为坚持不懈地执行门户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造成对这一政策的强烈的感情上的依恋，造成对中国在情绪上的关注和对日本的深恶痛绝。围绕美国政策所产生的一组组神话在官方声明的推波助澜之下促进了这种情况的发展。〔2〕有时，这些声明倾向于将挫折说成是成绩。有时，公开宣布的原则与实际的行动方向不相吻合。正如1900年，国务卿海约翰试图在福建省为美国取得一个海军基地那样。尽管罗脱—高平协定包括了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现状的声明，尽管兰辛—石井协定承认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但是诸如罗脱—高平协定与兰辛—石井协定这样的一些声明也被解释为是对门户开放政策原则的重申。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这些差距是不愿意放弃原则与无能力实行这些原则，或无能力实现以原则的名义所遵循的有限目标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其后果是人民的政治思想与声明后面的官方行动相脱节。普通老百姓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是言过其实的老一套，他们把未来的目标看作是能够立即实现的东西。

因此，在关键时刻，美国的原則影响了她的具体行动。在美国对日本实

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之后，日本转入守势。她模棱两可地表示，愿意松动她与轴心国的关系并停止向南推进。但是在谈判中，美国坚持实行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公众舆论当时对日本抱有强烈的敌意，对美国理想主义的老一套持热情的偏袒态度，猛烈地反对对日的绥靖主义。不愿为中国而战的美同人变得非常愿意与日本决一死战。这种舆论既妨碍放松禁运，又妨碍从原则上后退。正如施罗德所说：“公众舆论是解释美国坚持对日采取一种强硬的、进攻性的政策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这一点上，长期的目标变成了直接的目的，它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

这时候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传统模式的自然结局。事实上，在环境和公众舆论力量的驱使下，太平洋战争解决了赞成门户开放政策与拒绝为捍卫美国的在华利益和原则而战的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根本矛盾。与日本的冲突并不是美国通过诉诸武力以实行她的长期政策这一计划性纲领中破釜沉舟的最后一举。为了阐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看一下美国是怎样权衡她的在华利益及原则与战争的风险的；四十年来美国是怎样防止她政策中潜藏的矛盾成为现实的；美国的传统政策与她的军事能力是怎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事态的发展是怎样使矛盾明朗化的；又是在什么样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条件下，公众舆论的力量以有利于原则的形式去解决矛盾的。

3. 变化着的环境和不变的政策模式

当国务卿海约翰发送他的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及通告时，各主要列强对他们在华的势力范围已经划分完毕。实际上，主张商业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与势力范围的存在明显地不相符合。因为列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得到中国授予他们的某些特殊的、优惠的、在某些情况下是专有的权利，例如铁路和开矿的特许权以及为了多种目的向中国提供人力、资金和物资“援助”的优先提供权。海约翰自己认识到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局限性。因为他在照会中特别提出承认势力范围的存在，并且仅仅要求在消费商品方面得到均等的贸易机会。但是，即使这一严加限制的要求也遭到列强的含糊其词的搪塞或带有附加条件的回答。在保持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问题上，情况也大致如此。实事求是他说，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将要求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列强交出他们得到的所有租借地与特权，而从总体上说，美国也是不平等条约的缔约国之一。这样做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海约翰也未曾这样打算过。相反，国务卿希望以他的通告扭转中国“解体”的危险，制止列强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保存中国残缺不全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瓜分中国的危险不久就消失了，但这并不是海约翰道德规劝的结果，而是列强互相猜忌，导致了僵局的结果。事实上，海约翰与他的后任于1904年以前为制止俄国进一步的侵略和1905年之后为制止日本的推进所做的口头上的努力基本上全是无效的。

他们失败的理由并不难找到。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原则，甚至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所遵循的有限目标，都与列强的既得利益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成功地实行这些原则将要求美国使用武力或武力威慑。而美国认为只当她在华的利益对她来说是生命攸关的、或至少是必不可少的时候，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既不打算、也没有实力用强制性措施支持她的原则。1901年，日本政府询问美国是否愿意向俄国

施加压力使她撤出满洲，国务卿海约翰回答说，美国“当前并不准备单独地或与其他任何国家一道在东方使这种观点得以实施，正如在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问题上，她不准作出对其他国家带有敌对性质的表示一样”。俄国人先是许诺他们将撤出满洲，之后又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这时，海约翰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美国对此毫无办法。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我敢肯定，如果我们与英国和日本采取一种共同行动的计划，那么您会认为是荒谬的。我国的公众舆论将不会支持这样的行动，而我认为，它不会有助于我们的长远利益。”总统同意国务卿海约翰的这一观点，1904年2月，他在给一位英国外交官的信中写道：“当前，我们在华的利益也许还不足以使我们卷入与他们（俄国人）的战争。”海约翰国务卿和罗斯福总统对美国的利益与意图的这些判断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判断奠定了基调。

从结束日俄战争的塔夫脱—桂太郎“达成协议的备忘录”（秘密条约——译者）和美国朴茨茅斯会议开始（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罗斯福总统就遵循了一条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一条避免美国与日本在远东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政策。他实际上放弃了任何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尝试，尽管他仍然在口头上支持它。1910年，罗斯福给塔夫脱总统复信，应后者请求提供了自己的意见。这封信揭示了隐藏在这一政策转变后面的基本观点。在提及日本向美国移民的问题时，罗斯福写道：“我们生死攸关的利益是拒日本人于我们国门之外，同时保持与日本的友好亲善。”显然，他不认为支持中国及维护门户开放原则乃是在维护美国生死攸关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对他的后任忠告说，既然“日本的生死攸关的利益是在满洲和朝鲜，那么我们不在满洲问题上采取任何步骤是有利的。这样，我们就不会给日本人造成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感觉，不管这种感觉是否有道理，也不管这种感觉是多么微乎其微。”

然后，他针对美国的军事力量评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根本不相信讹诈政策，不管它是国内的、国际的，还是在私人事务中的讹诈；由于我主张不应违背古老的拓边旨的格言“不要虚张声势”，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起好的作用的话，那么就不应采取任何立场。如在满洲问题上，如果日本决定在一个对我们不利的方向上发展，那么除非我们作好参战的准备之外，是无法阻止日本的行动的。而要在满洲打一场胜利的战争，我们需要一支像英国那样的舰队加上像德国那样的步兵。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个极好的政策。而且我相信，只要我们能通过一般的外交上的努力来保持它，那么它在将来也会是个很好的政策。但是满洲的整个历史证明：无论是日本还是俄国，一旦一个强国为了控制满洲而决定无视门户开放政策，甘冒战争的风险，这个政策事实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了。”

塔夫脱总统和菲兰德·C·诺克斯国务卿忽视了罗斯福的忠告。诺克斯的“美元外交”，进一步强化了门户开放政策。但是，由于他没有对远东的国际力量的组合作出正确的判断，没有意识到经济力量的局限性，因此，诺克斯使用经济压力排斥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统治地位的尝试恰恰使这两国更加一致，它们缔结了两个新的公约，给各自的势力范围提供了更多的保障。然而，尽管美国的外交是无效的，但是中国并未解体，力量均势也未完全被打破。出现这种相对稳定的局势的原因是，虽然1904年以前俄国威胁发动攻势，1905年以后日本又准备取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在海约翰的照会发送后的

十四年中，列强的冲突已达到了一种平衡。这种僵持的平衡解释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门户开放政策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另一方面美国的利益并未因为这些挫折和失败而遭受严重的危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旧的政治均势开始崩溃，新的力量组合正在形成。由于欧洲各强国忙于本土上的战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撤离了远东。日本的欧洲盟友最初依靠日本消灭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以后又要求日本向地中海提供海军援助。日本迅速地抓住有利时机，占领了德国租借地胶州湾，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并从英国、法国和俄国那里得到私下的保证，即支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移交给日本。在这一时期内，美国的注意力也转向欧洲。她的政策继续反映出这样的观点是不足为奇的，即中国还不是如此重要以致能迫使美国为她冒险卷入与日本的纠纷中去。

战争一爆发，日本就向德国的租借地胶州湾发起进攻。中国对日本会将战争扩大到租借地之外十分恐惧，她转弯抹角地向美国表达了请美国代表中国出面干涉的愿望。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兰辛指示美国公使说服中国放弃她的如意算盘，他的指示是以这样的语言解释美国的政策的：

美国希望中国会感到美国的友谊是诚挚的，美国政府十分愿意通过她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和平的方式，促进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但是，国务院认为，如果中国的领土完整问题将使美国在国际上陷入困境，那么允许这类事情的发生将是极端的堂吉珂德式的作法。

如果中国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的话，中国就会成为日本的保护国。国务卿布赖恩当时所能做的，充其量只不过是向东京和北京发送了一个照会，通知它们美国“决不能承认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的或可能达成的协议与承诺，因为它危害了美国的条约权利，危害了美国在华的公民，危害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危害了众所周知的、与中国有关的门户开放这一国际性的政策。”布赖恩—兰辛的这一警告成为后来的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的雏型。1917年，国务卿兰辛在环境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规定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以换取日本的尊重门户开放政策和尊重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公开声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时就在发生着根本变化的远东的力量组合以清晰的格局明朗化了。这种新的力量结构的根本特点是美日对立作为远东的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取代了昔日列强在相互冲突的民族利益中形成的变化多端的平衡。战败的德国、暂时处于沉闷状态的俄国、被削弱的英国全都让位于一个强大的美国和太平洋彼岸她所面对的朝气蓬勃的日本。与列强以对抗主义保持平衡的作法相比，这种新的政治力量的聚集既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也给她带来新的危险。美国在远东再也不是面对一个世界大国集团了。过去，这些大国之间相互对抗，然而又都热衷于保护各自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与特权，而且，如果有必要，他们还准备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远东政策。美国随着权力的增长和声望的提高，处于比以前更有利的地位，她可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实行她的公开的远东政策，而反对这一政策的只有日本——尽管由于日本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原来由德国控制的岛屿，而使得它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地位得到很大的加强。

然而，新的政治均势同时又包含着新的危险因素。远东过去的权力组合使美国排除了实现她的公开目标的可能性，然而列强之间的对抗也制止了对

政治均势的严重破坏，不管美国是尊重还是忽视这种平衡。既然这种脆弱的政治均势已经崩溃，美国与日本的对立变成了主要的稳定因素，那么美国不愿意或无能力阻止日本在牺牲中国的情况下进行超越了某种界限的进一步扩张，将最终导致亚洲政治均势的崩溃。

但是，许多美国官员根据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门户开放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与日本作战是不值得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许士对出席华盛顿会议的美国代表说，美国“永远不会因为日本侵略中国而打仗”。回顾这一时期的早些时候，伊莱休·罗脱在三十年代写道，无论哪一位美国总统或国务卿都“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为保卫门户开放政策而向中国派遣军队。伊莱休·罗脱曾任罗斯福的国务卿，后来是美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之一。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裁减海军军备，用格里斯沃尔德的话来说：“远东政策的重要性”与此相比，“……仅仅是居第二位的”。

因此，华盛顿会议并未缩小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与保卫这一政策的有效实力之间的差距。不在太平洋修建新的海军基地和防御工事的协议，与英美日三国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吨位的5：5：3比率，使日本在西太平洋处于持久的优势地位，尽管她解除了与英国的联盟。在华盛顿会议的时候，日本的总吨位仅仅是美国的百分之五十。即使美国使她的海军力量发展到条约规定的限度，华盛顿会议的5：5：3比率也使日本海军又争取到百分之十的发展范围。况且，虽然在二十年代就存在一个简要的对日作战行动与目标方案，但是，这个计划性的方案“与其说是对可以采取的行动所作的现实主义的估价，还不如说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对希望的表白”。在胡佛政府执政期间，总统对武装力量的规模是否庞大所作的主要试验是看防卫力量是否强大，以求制止外国军队在美国大陆和西半球成功地登陆。

1931年，日本对满洲的占领和随后使华北脱离南京的尝试引起了美国官员的良心上的醒悟。国务卿史汀生认为中国是极为重要的。他看到，由于太平洋正在迅速地失去其天然屏障的特征而成为国家间交流的坦途，因此美国已成为中国的邻居。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这一地区的变动势必在美国引起直接的反响。因此，他清楚地看到“中国和日本的斗争有可能威胁到我们自己的人民及其领地”。更重要的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的未来将再次成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未来也将取决于作为“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而行动的一个强大的、然而热爱和平和友好的中国。胡佛总统是忠实地奉行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的，然而，他坚持认为“无论是我们对中国的义务，还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或是我们的尊严都不要求我们为这些问题（由于日本入侵满洲而引起的问题）而作战。”胡佛拒绝考虑使用武力以维护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九国公约，这也反映了他主张以世界舆论的道义上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军事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的观点。而且，大萧条限制了采取重大行动的一切想法。即使是史汀生也不主张使用武力，尽管他愿意走得远一些，即主张加强美国在上海的海军力量，并将美国舰队留在夏威夷以吓唬日本。

此外，美国也毫无力量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国务卿史汀生承认，华盛顿条约“使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实际上不可能成功地以军事力量对诸如满洲争端这样的事态进行干涉，即使这个国家希望这样做的话，而这也并不是条约的本来意图。”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海军当前的状况感到十分吃惊”，

他原以为可以“迎战日本”的海军，看来与他的设想“不尽相同”。胡佛总统的军事顾问告诉他，假如美国得到英国的全力合作，并将整个英国舰队置于联合司令部指挥下，那么她也要两年时间才能战胜日本。假如美国单独与日本作战，那么在她首先失去菲律宾之后，还要用四年至六年的时间才能取胜。根据胡佛的顾问的意见，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首先是大力扩充海军，取消为限制美国舰队在西太平洋的有效行动而规定的5:3比率。其次，还要建设一支庞大的军队，在中国或在日本登陆。

1931年至1937年期间，美国官员的对华政策始终未有改变。在这期间，日本占领了热河，几次试图使中国北部脱离南京，并向中国施加压力，强迫她接受日本的和解条件。早在1936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以同情中国而著称的纳尔逊·T·约翰逊在给国务卿赫尔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并不想使自己被看作是这样的一个人，即他相信在可能发生的日本占领中国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应竭力诉诸武力以拯救中国。”直到1936年，当华盛顿海军条约期满时，日本海军的总吨位已上升到相当于美国力量的百分之七十三。

1937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并未使美国对她在中国的利益的估价发生迅速的变化，也并未使她愿意采取有效的措施反对日本。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他的“隔离演说”中呼吁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隔离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以防止国际上违法行动的扩散。总统考虑最多的似乎是日本。

〔4〕但是由于国会和公众对政府在世界另一端采取任何有力行动的暗示都表示出强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总统不得不仓促收兵。第二天，在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极力圆滑地对他的讲演进行辩解，说它是对“中立条约”的“一种发挥”。10月7日，亨利·史汀生在致《纽约时报》的一封冗长的信中，呼吁对日本实行石油和废铁的禁运。但是，即使是他也明确声明，美国不应该有“任何向冲突中的亚洲派遣军队的想法”。

因而，当布鲁塞尔会议开会讨论远东危机时，罗斯福总统认为有必要指示美国代表诺曼·戴维斯：美国的目标是动员希望和平的各国的道义力量，他应密切注视美国公众舆论的倾向，以便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点。国务卿赫尔清楚地指出，大会不应讨论对日本的制裁问题。应当致力于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在日本轰炸了停泊在南京以北大约二十七英里处的美国炮舰帕内号之后，海军作战计划总指挥威廉·莱希提议对日本实行封锁。但是这一建议根本无人理睬，因为美国既不愿意打仗，也没有从军事上做好打仗的准备。

1937年之后，中国人为反抗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逐渐引起了美国人民的极大关注，一些官员对日本比对纳粹德国更加敌视。但是直到1940年，美日关系才发生了巨有深刻意义的变化。德国在荷兰和法国的胜利及英国险遭失败在美国制造了一种严重的危机感，它使美国极为震惊地从她传统的孤立主义中醒来，使她转向介入欧洲战争的道路。恰恰在这一关头，日本的注意力从中国转向东南亚。1940年9月，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了三方条约，为她南进铺平道路。显然，德意已战胜了亚洲的这一部分拥有殖民地的其它强国。日本同时也希望利用这一条约阻止美国干涉亚洲事务，防止西方列强援助中国，并帮助美国调停中日战争。恰恰在缔结三方条约的谈判期间，日本用发送一系列最后通牒的威胁手段强迫维希政府接受了允许日本在北印度支那驻军的协议。她加倍努力试图将荷属东印度群岛也纳入她的势力范围，但是没有成功。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

日本继续南进。1941年7月，日军进入南印度支那，取得了进一步进攻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集结基地。

日本在1940年9月的行动将欧洲的战争与亚洲的战争连结起来，并迅速地改变了美国对日本威胁的估计。1940年9月30日国务卿赫尔与他的工作班子谈话的备忘录对此做了部分的记载：“然而，赫尔自己十分明白，如果日本的确要在那一地区（东南亚）采取行动的活，那么美国不能坐观新加坡基地落入日本手中，那会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于危险之中。即使是劝告美国政府对日采取节制忍让态度的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也敦促政府对日本显示武力以阻止其南进。1940年9月12日，他在著名的“绿灯”通讯中说：

“今日的日本是个弱肉强食的强国……她向南扩张的政策无疑是对美国在太平洋利益的威胁，是强行侵入英帝国在东方的领地。众所周知，美国的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英国舰队，而英国舰队的存在一直是、也只能够是取决于英帝国的支持。在英帝国处境困难的时刻，如果我们认为支持她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话（而我特别强调我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欧洲战争胜败揭晓以前，维持太平洋的现状。我认为仅仅表示反对，因而保持住小心谨慎的记录是不行的。那样，我们的利益将无法得到进一步充分的和适当的保护……在我们对这个国家尚未形成完全成熟的政策之前，武力的显示和如有必要就使用它的决心既会帮助我们有效地取得这样的结果，又会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安全。”

但是，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显然她根本不愿意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线作战。1940年7月，在法国沦陷之后，国会批准了建立两大洋海军的计划。但是用平时期的建设方法要六年才能完成。若竭尽全力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罗斯福总统在当时给哈罗德·伊克斯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你所知，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我们对大西洋的控制是极为重要的。我的海军简直不够分配了。”1940年9月，作战计划司起草的备忘录警告说，美国在远东采取重大军事行动方面，“现在并未准备好，在今后的几年内也将不会准备好。”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月，武装部队恳求得到更多的时间以增强力量、巩固防线。作战部特别强烈地反对拖延时间的政策，要求尽快在菲律宾建立一支有效的空中堡垒式轰炸机力量，并完成对那里的增援方案。10月6日，史汀生告诉赫尔，美国需要三个月时间来确保她的安全。甚至迟至11月27日的联席会议，即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前身，还向白宫发送了备忘录，提醒它在日本采取行动时，美国有着仓促上阵的危险，并强调了这一时期现役部队的需要。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夕，日本现代化的、完整的舰队总吨位是美国海军的百分之八十一，而美国海军不仅要在大西洋承担义务，而且也要在太平洋承担义务。

因此，尽管美国重新估价了日本对其安全的威胁，但是当时的战略力量仍然要求美国在太平洋采取守势。这一时期美国的政策是，只要日本在远东的行动不会对欧洲的战争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么美国就避免对日作战。1940年10月，在一场最后决定不将美国海军部队作为威慑日本的因素派遣到新加坡的讨论中，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说：“只要我们每天都能够维持住和平，并继续支持英国，就是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欧洲对远东的优先地位的概念曾被正式纳入“ABC—1参谋部协议”，它记载了1941年1月至3月举行的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结论，这一协议曾得到总统的默许。

有关段落是这样写的：

自从德国成为轴心国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员国以来，大西洋和欧洲地区就被看作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战场。美国主要的军事行动将在这个战场上进行……美国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 1941 年 11 月 5 日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告诉总统，蒋介石委员长认为日本向昆明的推进将使中国崩溃的看法并不构成美国参战的理由。但是他们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不允许日本逾越这一界限。马歇尔和斯塔克消极地阐述了这一问题，建议只有当日本军队进犯了美国、英联邦国家的领土或他们的托管地，进犯了荷属东印度群岛、进入泰国并到达克拉地峡、进入葡属帝汶、新喀里多尼亚或忠诚群岛时，美国才应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日本没有进攻珍珠港，那么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所划定的界限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的界限。美国捍卫这一界限的决定实质上是为了保护东南亚的战略资源和重要的贸易通道，而英国对抗德国封锁与进攻的生死存亡的斗争的一部分就取决于这些战略资源与贸易通道。

1941 年 4 月，国务卿赫尔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开始谈判，谈判一直持续到日本进攻珍珠港。赫尔在谈判中的直接目标之一是争取时间，但是，美国的远东政策在似乎毫无变化的表面现象后面却发生了重大的扩展。赫尔国务卿使传统的对华政策扩大成为普遍的原则，这样，它们便能适用于应付日本在东南亚的行动。在与日本大使开始谈判时，赫尔提出四点建议，它们是：“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支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支持平等的原则，包括利益均沾的原则；维持太平洋的现状，除非这种现状以和平的方式得到改变。”在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之后，这些建议在实现和解的全面纲领中得以重申。1941 年 11 月 26 日，赫尔将这一方案交给日本大使，答复日本提出的妥协的最低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用施罗德的话来说，这些建议现在“已经不再仅仅是美国将要坚持的原则了，而是她最终将要实施的纲领。”它们形成了实现三项目标的纲领基础：停止日本继续南进，说服日本退出三方条约，促使日本从中国撤军。直到 1941 年 7 月，前两项目标还优先于后一项目标。为实施这一纲领，美国在日本向南印度支那推进时，于 1941 年 7 月冻结了日本资产，并随后对她实行了全面的石油禁运。

这一重大行动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日本进入防守状态，表示她愿意停止南进。尽管日本从不愿意作出明确和可信的许诺，保证战时不加入德国一方作战，但是她暗示愿意走一条与德国不同的道路。有争议的问题是，以接受日本的让步换取美国对日本继续占领中国的某些部分的默许是否就能避免战争？无论如何，1941 年之后的传统原则与公众舆论的力量都使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与跟随而来的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的目标摆到美国优先计划的首位。由于日本宁愿与美国作战而不愿从中国撤军，珍珠港事件发生了。美国被迫放弃了她避免战争的政策，而为捍卫她在中国的利益与原则作战。

4. 评价

直到 1941 年为止的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包含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支

持门户开放政策，然而拒绝为捍卫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与原则而战。这一作法背后的根本动机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但又是一种尽管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是重要的，却又不是必不可少的观点的产物。美国一方面不愿为推进她的理想和保卫她的利益而付出极高的代价，另一方面她也不愿意放弃她的原则和取得未来利益的希望。因此，美国使两种自相矛盾的因素包含在她的政策之中。在 1941 年以前，由于她追求一种严加限制的直接目标，因此潜在的矛盾未能显露出来。这些目标有时候充其量只不过是保存残缺的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及门户开放政策；有时候则只包括恢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的某些方面，以及对保护利益均沾的条款的略加改进。而且，无论在任何时候，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取得其他列强对这些原则的口头上的核准。这些直接的和有限的目标是以外交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的。显然，美国的政策事实上只是长期的目标，而且它们也只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得以实现。

1931 年 9 月之前，美国的影响与潜在力量的增长使她能够积极地追求更大的直接目标，确保她更好地奉行她的政策，更坚定地支持她的原则。从海约翰提出要求消费品贸易机会均等开始，美国在国务卿诺克斯时期，在 1917 年 11 月之后的威尔逊总统时期又向前走了一步，她要求在金融投资上也实行机会均等。国务卿许士通过九国公约使列强保证不在特定的中国领土上谋求势力范围或各自的特殊利益。这时，美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列强对海约翰的通告所作的含糊其词的答复与九国公约的第一条对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和门户开放政策所作的概括性的声明形成了对照。1927 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为实现政权统一而取得的缓慢的、曲折的，但仍然是看得见的进展使中国人利用了美国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成功地进行了恢复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尝试，例如在 1929 年至 1933 年期间恢复税收自治的尝试。

然而，美国的政策成功的可能性显然是有限的。虽然美国以和平的方式追求直接的有限目标并未给列强造成任何重大的麻烦，但是逐步实现门户开放政策却威胁到日本的重要利益。因为美国如要全面实现她的原则，就要根本改变远东的列强的结构，这样，日本在中国的特权与特殊地位就将被取消，中国本身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国。日本为了对蓬勃兴起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挑战作出反应，于 1931 年占领了满洲。她的这一行动破坏了华盛顿会议缔结的各项条约的结构。既然在华盛顿会议之后远东政治均势的唯一基础是美日对立，那么只有当美国愿意，并且能够使用武力反对日本时，才能保持住逐步实现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利条件。1931 年至珍珠港事件期间的事态发展使美国政策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太平洋战争的最终爆发意味着美国未能以传统的办法阻止潜在的矛盾成为现实。它说明，矛盾的解决是有益于原则的，但是它的解决更多地是由于环境和公众舆论所迫，而不是由于冷静地计算了战略上的利弊。美国对日本 1941 年的行动所作的反应在根本格局的中心问题上并无变化：她不愿意并无能力有目的地使用军事力量以保持或恢复远东的力量均势。而且，冲突发生后，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日趋削弱已经驳斥了门户开放政策的不言而喻的假设：一个强大和友好的中国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将作为一支稳定性的力量出现。同时，将会进行两大洋战争的紧迫压力，被认为也牵制了美国采取一种在某一时期可能扭转中国的政治潮流的战略。

传统的对华政策中的潜在矛盾能否通过在相互冲突的两个对立面中及早地、有意识地选择一个方面加以解决，从而避免对日作战呢？如果说对日战

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是否可能在更加适宜的时间爆发呢？〔5〕从美国的在华利益考虑，事实上，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放弃门户开放政策的作法是大大地值得称道的，尽管这种放弃并未体现在正式的声明之中。大战之前，列强之间均势的变动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西奥多·罗斯福使俄日平衡并相互制约的政策是符合明智稳妥的政策政策的两个基本标准的。它充分地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它并没有超越美国的能力。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的权力结构中，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实际上已无效了。美国通过保持日俄之间的均势以维护她在远东的政治均势的思想已没有现实的基础。那种如路易斯·哈利所说，认为美国不去“积极地劝阻”日本将她的注意力转向“与苏联发生冲突……”的“无边无际的东北亚大陆”，她亦能维护自己在远东的政治均势的观点，也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乔治·凯南毫无道理地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将门户开放的原则作为政策基础的话，如果美国“长期以来在对日本的态度上更加慎重，对日本的要求考虑得更加周到，更加愿意以他们的条件同他们讨论问题”的话，那么在日美关系的早期阶段就有希望制止渐趋迫近的战争形势。但事实是，在后一阶段，在某一时期的一刹那，“十足的悲剧征服了人类的软弱，决定了我们不幸的命运”。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如果美国宽宏大度地默认了日本对满洲的占领，那么日本就不会再进一步深入中国，并最后进入东南亚。相反，正如亨利·L·史汀生和麦乔治·邦迪在1947年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日本人会对占领满洲感到满足的话，那么他们在占领朝鲜之后就会与世界和平相处了，而‘不承认主义’也就没有意义了。”施罗德指出，截至1941年7月为止，不管美国的声明带有多么不必要的挑衅性，但是她的政策仍然是防守性的。

在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自己在日本是应该巩固她在满洲的地位，还是继续向中国推进这一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如何才能保卫她在满洲的利益。皇道派赞成第一种行动方案，而统制派倾向于第二种行动方案。最后统制派逐步取得了军权。在1936年2月26日的事件之后，皇道派作为一个组织事实上已经毁灭了。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中国步步深入。三十年代的事件表明，造成日军力量的日益兴起和文职官员的温和主义者影响减退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在中国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美国的挑衅。

从真正的现实意义上看，即使日本占领中国会被看作是准备与俄国决战的一个步骤，日本也还是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向中国和东南亚扩张的。首先，大多数帝国建设者受到一种继续前进以保卫胜利成果的总趋势的影响。统制派也不例外。第二，中国和东南亚对一个人口迅速增长但资源匮乏的国家来说是一块令人垂涎的肥肉。它们比西伯利亚更加诱人。第三，向南扩张的道路上并没有任何实际的阻碍。中国仍然是个弱国，她的军队装备恶劣，训练不足。欧洲各国在远东的影响与势力正在急骤下降。美国不愿意并且无能力以军事力量支持她的政策的状况使她不可能成为一般有效的抵抗力量。为了扭转日本向东北亚扩张的趋势，或仅仅为了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美国不对日本占领满洲加以谴责，不打击日本在东北亚的野心是不够的。美国有必要集结力量，并使用这种力量使日本不敢向满洲以外或中国的其他战线扩张。这就需要美国采取遏制日本的积极的政策，而它包含着极大的战争风险，不

管这种风险是以门户开放政策的名义出现，还是出于战略上的自身利益。

结果，日本向华北的扩张导致了 1937 年的中日战争。当中央军在上海、南京地区溃退之后，华南就向占领者敞开了大门。已经盘踞在华南和海南岛的日军，由于德国的胜利而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她利用这一条件，伺机进军东南亚。1941 年夏日本在南海对英、美军阵地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是远东力量均势被打破后出现的必然的结果。力量均势的破坏如果不是从 1931 年占领满洲开始的话，那么也是从 1937 年日本进攻中国开始的。

有趣的是，在 1931 年至 1941 年期间，美国所采取的唯一措施是对日本实行全面的石油禁运这一重大行动，它使日本认真严肃地表达了她愿意停止扩张的愿望。它使温和派暂时能在外交政策的实施中采取主动。只是在这一时刻，美国的传统原则阻止了与日本的妥协，使不为中国而打仗的政策失效，它对美国的行动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不使用武力捍卫美国在华利益的政策仅仅推迟了战争的爆发，但它并没有避免战争。我们没有必要对如果早日放弃这一政策将会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一问题进行推测。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论证，如果美国在 1937 年和 1938 年的前六个月，而不是在 1941 年就与日本作战的话，那么她的处境就会更加有利。但是，考虑到美国对她在华利益的认识，除非她传统的孤立主义遭到有效的反对，除非日本威胁到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通道，并将夺走那里重要的原材料，否则，美国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认为她在中国的赌注主要是押在她的物质利益与文化利益上，而不是押在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的政治利益上。这种概念是孤立主义思想的反映，它否认了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它将美国的海外利益视为主要是美国国内事务的延伸。以维护欧洲与亚洲的力量均势为美国首要的政治目标的外交传统是不存在的，致力于不断地评估权力的双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决定远东力量均势的崩溃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的外交传统也是不存在的。正如纽曼所说：“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位政府的负责官员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的优先权发表过公开的、明确的声明。这些利益与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亚洲，哪些至关重要的利益（如果存在这种利益的话）可以证明战争是正义的，这一问题从未得到澄清。”因此，为寻求保持远东的政治均势而接受战争的看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外交脱离了军事力量。美国对外交所采取的非军事的态度也反映在她的军事能力与她的直接目标和长期原则之间的差距上。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战争紧急状态的影响下，美国采取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但是回顾往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国家而出现的前景颇为暗淡。这种毫无希望的局势主要是因为日本向中国发动进攻而造成的——而本来仅仅美国一国就能够制止这场进攻。此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主要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继续参战。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一政策并未因为采取了军事措施而得到有效的实施。非军事观点的外交的新的表现形式无法经常调整政策和军事思想的变化和差距。由于美国在华的政治利益似乎不多，因而她为反对列强而规定了不干涉原则。但当她比历史上的任何列强都更深入地参与中国事务的时候，这一原则又阻止她积极地干预中国政治并追求积极的目标。战后的美国政策一直受到她不愿在大陆中国使用武力的态度的影响。因此，1949 年至 1950 年美国外交政策的大灾难的根源存在于自国务卿海约翰发送门户开放照会以来的美国政策

的传统之中。

第一部分使中国成为大国

第二章美国的观念与中国的现实

1. 纵横交错的美目标、政策与设想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在首先打败德国的全面战略中实现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遵循了一条拖住中国的政策，以便在共同作战的努力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和地理上的战略位置。与此政策有关的。经实践证明其后果具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条政策是：为了在远东建立战后的政治秩序，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给予她“四大国”之一的待遇。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中国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第二个目标是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作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6〕因而，美国不仅有要求德日无条件投降的军事目标和建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的全面的政治目标，她的确还有一条远东的政治方针，这与她在欧洲的战时活动不尽相同。〔7〕

美国为了扭转中国在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形势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极力阻止国民党政府向共产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共同对日作战时，充分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并最终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团结起来，建立联合政府。这种以和平的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政策也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中汲取了动力。因为，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如果中国“在无休止的内战和无政府状况中挣扎”而无人过问的话，那么她就无法完成美国交给她的任务。

美国试图使中国成为大国并使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实现政治解决的努力也是以她估计到俄国对中国怀有觊觎意图为前提的，是以她希望不仅在远东，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与苏联在战后继续保持合作为基础的。华盛顿认为，如果她赋予中国以大国的地位；如果她取得苏联遵守一定的国际行为准则的保证；如果她使中国和俄国达成某种正式的协定；如果她使中国的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共同组成联合政府，那么她就能够在战后的远东防止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使之善待中国，并保证美苏的继续合作。

战后美苏合作的宏伟计划和以和平方式建立团结与民主的中国的政策都是符合实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目标的。因为，如果我们考虑在远东美苏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与在中国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败敌人。因而，美国的军事目标、政治方针与有关战后世界的设想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整体，而重要的环节就是迅速战胜日本这一最高行动目标和使之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全面规划是以错误估计了苏联的意图，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做出错误的判断为基础的。当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像美国官员所期待的那样采取行动时，这一规划就破产了。而且，规划的一致性和合理性体现于它的军事目标，而不是它的政治目标。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政治方针只不过是实现军事目标的手段。颠倒政治目的与军事手段的合理次序是美国传统的外交与军事力量脱节的状况在战时的反映。由于军事目标至是无上的目标，因此美国军事行动中的政治含意便没有得到

充分的考虑。美国在部署军事战略时，也没有考虑到它对中国的国内稳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根据地的愿望是错误地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意图的原因之一。因此，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治方针仅仅是以外交行动来实现的。马歇尔以微妙而尖锐的语言描述了这种形势的实质。他说“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看成是个大国”。仅仅以外交行动实现政治方针导致了公开的政治目标与具体的军事方案之间的矛盾，它只能使整个政策结构的崩溃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2. 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设想与感情

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根据是一种盲目的设想，即认为太平洋战争之后，中国将作为对美国友好的大国而出现。这种政策体现了一种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它来源于美国与一个争取摆脱外国统治和剥削、摆脱落后与贫困的被压迫国家之间的百年来似乎从未间断过的友谊和感情。美国人民已争取到了自身的独立，并在新大陆建立起自由人民的繁荣社会。这种政策是符合他们慷慨大度的天性的。

对这种政策的根本设想并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中国的衰老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具有三千多年完整的、连贯的文化传统的民族或迟或早势必找到一条振兴国家的道路。中国漫长的历史是以王朝的兴衰为特征的，考虑到这一点，当前的混乱显然是处于过渡时期；在此之后，伟大、光荣的复兴时期必将来临。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可以被认为是新时代的黎明前的黑暗，中华帝国灿烂辉煌的传统将体现在现代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强大的中国之中。〔8〕

对中国的前景所持的这种长远观点看来已为中国最近的历史所证实。无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步伐是多么缓慢与踌躇不前，她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使西方列强震惊的漫长的抗日战争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力量恢复的标志。因此，中国在美国的保护下作为大国出现的前景似乎有可能使她恢复过去的伟大形象。它预告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各国的末日的即将来临，开辟了东、西方以平等、友谊为基础而共同生存的新时期。这的确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法。

当然，高级决策层的使中国成为大国并给予她“四大国”之一待遇的政策看来也是有很好的理由的。的确，这一政策在门户开放的两条原则中一直是含蓄的，在这个时刻阐明这一政策显然标志着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实现已迫在眉睫。泰勒·丹尼特将美国的中国政策作为对亚洲的门户开放总政策的分析中的特殊案例加以探讨。他早在二十年代就说：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使亚洲强大起来，并能够守住自己的大门。四十年代，T·A·比森在他的《美国的远东政策》一书中又详尽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部著作代表了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对远东问题的主要看法。他认为九国公约中最终体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则“实质上是种权宜之计”，不久中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足以对她的国家安全承担全部义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捍卫独立的“强大、统一的中国”，是“在远东建立更加稳定的和平基础的主要条件”。在这一条件实现之后，“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将成为时代的错误，并停止生存”。

即使美国没有有意地追究门户开放政策的含意，以这些原则和美国对战

争与和平问题的特定的观点为基础的美国政策所带来的事态发展的逻辑性，也使美国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只有使中国成为大国。因为日本拒绝放弃她对中国的军事占领和她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美国对危害传统原则的解决方法表示反对，那么她与日本的武装冲突就不可避免。1941 年下半年的谈判表明了这一点。〔9〕为了实现战时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目标和与此一致的战后惩罚侵略者的目标，所以美国明确地是要通过消灭日本帝国来防止日本军事威胁的再次出现。而维护为正义与和平秩序而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则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填补最终的权力真空。正如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

我们应该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使她强大和稳定，我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对我来说，十分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东方大国的日本将销声匿迹。因此，严格地讲，唯一重要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美国、英国、俄国也是太平洋的大国。

然而，她们的重大利益都在别处。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的话，那么在做任何安排时都要保证中国处于舞台的中心。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也来自对战后世界和美国的作用的某些设想。罗斯福总统深深地迷恋于以《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宣言》的崇高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和平、自由、正义的时代即将来临的前景。他预言：国际组织的建立将导致新时代的诞生，爱好和平的大国将捍卫它的存在。对他来说，美国与苏联之间或者美国与任何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因此，他预言：他今后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调整英、苏、中三国之间的分歧的仲裁者、调解者和教导者，即用新的国际行为准则来教导他们。这四个大国是新的“神圣同盟”的成员，它们保卫和实现着民主、自由的世界秩序。这样一种计划，就需要有强大的中国来充当可以胜任的伙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属欧洲地区。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这也就有利于美国的国内政治目的，因为它使那些更加关注远东问题，而不是欧洲问题的人保持中立。

罗斯福总统并未忘记美国与苏联或者美国与英国之间出现分歧的可能性。但是他似乎坚信，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比美国与它们之间的矛盾要深刻得多。他认为，在中国问题上尤其是这样。中国在历史上对俄国在东自满洲、西迄新疆的中国边境地区的意图一贯怀有戒心。国民党政府面对强大的共产主义对手，也意识到苏联站在它的政治敌人一边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罗斯福总统在坚持中国成为大国理事会的成员时对艾登说：“在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但是，罗斯福总统的战后政策也有赖于苏美继续合作，这一合作可能为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所破坏。国务院官员希望通过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使国民党政府将会在对苏关系和对中共关系方面有更多的安全感，并在对待苏联和中共政策方面，听从美国的劝告。正如赫尔所说：“如果中国处于大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中，而不是局外人的话，那么从国际和国内对中国的事态发展施加影响就会容易得多。”此外，美国希望以发表一项有关国际行为准则的联合声明来取得苏联的保证，限制苏联的对华野心，为中苏之间的直接和解铺平道路，而中国也将以新的大国地位签署这一声明。因此，在 1943 年 10 月 30 日签署的《莫斯科四国宣言》中，美、英、苏、中的政府联合声明说：“战争结束后，它

们将不在别国领土上诉诸军事力量，除非为实现本宣言所规定的目标和在联合协商之后。”《莫斯科宣言》生动地揭示了美国的一种信念，即以为用似是而非的语言所粉饰的普遍性原则能够解除各国之间的冲突，并遏制处于攻势的革命力量的锐气。

罗斯福总统认为：他可以肯定，一旦美国与大不列颠发生任何冲突，中国将全心全意支持美国。他熟知中国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他和许多美国人衷心地赞同这种态度。在战争初期，中国与英国在保卫缅甸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1942年，蒋夫人在访问华盛顿时告诉霍普金斯说她对英国不满。中国对英国的动机怀有的戒心得到了回报，它使英国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既有屈尊俯就（如果不是蔑视的话）又有害怕中国振兴的奇异心理。据霍普金斯报告，1943年艾登对赫尔说：他“不十分喜欢中国人在太平洋地区跑来跑去的想法。”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后，丘吉尔访问了华盛顿，他对罗斯福总统直言不讳他说：对中国人这样一个种族，他是钦佩的、喜爱的，并“对他们那种无穷尽的政治腐败感到可怜”。此外，总统知道，在他奉行消灭亚洲的殖民制度的政策中，在实现他建立托管制的政策中，中国将与他合作。1942年6月，罗斯福总统在与莫洛托夫的一次谈话中，将建立某种形式的临时国际托管制度以管理欧洲列强的殖民领地，并使它们实现独立的想法的来源归之于蒋介石委员长。他请求莫洛托夫先生与斯大林对这一制度进行商讨。

许多美国人也感觉到，中国是美国建立公正、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思想最可靠的追随者，这种国际秩序将通过成立世界组织的机构和扩大国际间的信任来实现。世界主义和建立国际秩序的思想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显著特点。1938年，国民党党代会上通过了有关战争政策的类似宪法式的宣言《抗战建国纲领》，在这一纲领中，中国庄严地宣布她“愿意保卫并加强和平的国际秩序……”在对国民参政会的一次讲话中，蒋委员长宣布：

对亚洲和对整个世界，我们只希望尽到我们的义务，即反对任何对霸权的欲望以及和仁爱道德信条不相符合的愿望。仁爱是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就中国本国的利益来说，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她原来的边界，就整个世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使所有的国家逐步从平等的阶段走向理想的统一。

当蒋委员长回答以三民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对成立世界联盟或世界联邦有何积极的建议这一问题时，他说：“世界主义与国际和平一样是三民主义的两个主要目标，为了人类的利益，中国自然倾向于参加以民族平等为原则基础的世界联盟或世界联邦。”这些有关战争目标和国际秩序的声明在威尔逊理想主义时代所培育起来的一代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当然引起了共鸣。

因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罗斯福总统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和平解决问题的政策上和在战后的世界中，美国将得到中国政治上的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增强他的这一信念。1942年至1943年冬，当蒋夫人访问美国时，她向霍普金斯保证：“在和平谈判桌上，中国将与美国站在一边。”她认为这种保证“是她愿意提前作出的一种承诺，因为中国信任总统”。因此，美国在建立并维护公正、和平与稳定的远东秩序的任务中，将中国视为感恩戴德的、友好的、合作的伙伴。

然而，感情的冲动、传统的原则与战后的计划仅仅构成了一般的设想。在这种设想中，军事上的考虑在迫使美国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增强了她对中国军事潜力的兴

趣。但这种军事上的考虑的表现形式，却是错误地低估中国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可能作出的贡献，过分恐惧中国与日本会单独媾和。国民党政府积极地培植并利用了这种希望与恐惧，将它作为使美国让步的杠杆。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华盛顿的高级官员一般都认为，中国将以多种方式迅速打败日本作出重大的贡献。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的战略计划中，中国的首要贡献就是提供空军基地来阻截并消灭日本的船队，并轰炸日本国土。这样，中国已存的空军基地需要得到防卫以对抗可能发生的日军的进攻。而其他的空军基地和军队运输基地也需要在华北建立起来，而那时这一地区仍被日军占领。为了执行这两项任务，美国希望利用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许多美国官员认为，这是中国可以作出的第二个贡献。远离中国舞台的许多人认为，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能使中国军队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1943年1月，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

在欧洲战场上，由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的条件。

她在对付德国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在太平洋，中国对日本的关系与此相似。我们的基本政策应是向俄国和中国的人力提供必要的装备，使他们能够战斗。

这种对中国可能作出的贡献所抱的希望与罗斯福总统闻名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亲华感情是一致的，总统衷心地赞同这种观点。正如丘吉尔所说：

在华盛顿时，我已经发现中国在美国人的心目中，甚至在上层人物的心目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大意义。我意识到有一种评价标准，把中国几乎当作一个可以同英帝国不相上下的战斗力量，把中国军队看作是一种可以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的因素。我向总统表示，我认为美国舆论对中国在这场全面战争中所能作出的贡献估价得过高了。他大不以为然。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象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候会怎样呢？我答道，我只是说当前的战争，目前要打下去已经是十分吃力的了。我说，我对中国人当然总是乐意帮助，而且也会以礼相待的……可是我又说，当我认为某一评价标准完全不切合实际的时候，千万不要指望我去采取这一态度。

建设一支在美国司令员指挥下，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经过改造和重新组织的中国军队的前景也使史汀生在振兴中国的许多尝试中受到鼓舞。对史汀生来说，美中友谊的伟大传统构成了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的基础，而战胜共同敌人的伟大的军事胜利将会进一步加强传统的友谊，导致战后更加密切的合作。国民党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加强美国的这种希望。早在1940年，蒋介石委员长在与英国大使的一次谈话中坚持说，如果中国的军队得到装备的话，那么它就能够采取决定性的主动权，英国和美国或迟或早总会需要中国的人力资源。这次谈话曾转达给美国大使纳尔逊·T·约翰逊，并报告华盛顿。战争期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博士对威廉·莱希海军上将直截了当他说，如果美国能向中国现存的人力提供武器和军需的话，那么日本军队就会被消灭。这种推理得到华盛顿许多人的赞同。甚至像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这些认识到重新组织和训练中国军队所面临的重重困难的人也认为有必要尽一切可能创建一支强大的、精锐的中国军队，这支军队将对打败日本作出重大的贡献。因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军事力量可言。因此，在战争初期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史迪威将军所担负的主要使命是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据美国军事计划专家们的估计，中国在协同作战中可作的第三个贡献是被动的。中国只要继续参战就会拖住相当多的日军，否则这些军队会被用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会对盟国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甚至那些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对攻占日本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同意，中国所处的地位是重要的。水陆作战进攻安达曼群岛是解中国之围的总战役的一部分，莱希海军上将将对英国不愿承担水陆作战任务的作法发表意见说：

如果我们不在战场上拖住蒋的装备不足、给养匮乏的军队的活，那么战胜日本就会损失更多的船只和生命，更不要说美元了。中国并没有在许多战场上取胜。除少数几个美国训练的师之外，他们也许打得并不漂亮，但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蒋使几百万人武装起来，迫使日本在中国保留一支庞大的常规军，并为这支军队提供给养。美国参谋长们相信，支持中国对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对盟国的事业都是至关紧要的。

美国的军事计划专家对中国在战争中被打败的可能性，对日本利用中国作为她的作战基地坚持反对盟国的可能性也感到不甚烦恼。正如马歇尔将军所说：

如果蒋介石委员长的军队和政府最终被打败的活，那么日本就会随心所欲地肆意掠夺中国的巨大资源。当美国 and 英国处理完欧洲的事务并向日本国土发起进攻时，日本政府还有可能逃往中国，在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继续作战。

中国可作的最后一个贡献是，美国使中国站在西方列强一边将抵制日本的“亚洲是亚洲人的”宣传，使人们在心理上对此产生消极的反映，而在争取亚洲对盟国事业的同情上产生积极的反映。1942年1月，丘吉尔在给韦维尔将军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华盛顿渲染中国的重要性的印象：“同时不要忘记，在这一切后面，亚洲人团结的阴影幽然出现……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单词来概括我在美国所获得的教训的话，那就是‘中国’”。

美国对中国在战胜日本中的贡献所抱有的这些乐观主义的希望使她格外地惧怕失去中国这一盟友。国民党政府积极地培养美国的这种惧怕心理，在关键时刻，它从未忘记提醒美国将会出现丧失士气、军事上的失败、与日本单独讲和或与美国断绝关系的种种可能性。由于打败德国为优先目标的正确的军事和政治方针严重地限制了对华的军援数量，因此，美国向中国提出赋予她大国的地位以及她对中国的辉煌的未来的展望就成了对缺乏直接的、有效的援助的补偿，这也会使中国继续参战。

这样，军事危机直接地促使美国心存侥幸地把战后的希望寄托于这一方针在远东的胜利上。其实，这一方针长期以来就包含在门户开放的政策之中了，而且它完全符合美国对中国关注的感情和她对战后世界的理想主义的规划。

对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想法的讨论，向美国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和美国在中国以及远东的利益的实质问题上，是否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概念？从珍珠港事件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毋庸置疑地采纳了中国作为战时的盟国这一意义重大的新概念。同样清楚的是，美国认识到有必要在远东保持某种形式的力量均势，并且她使中国在保持力量结构中的重要性具体化了。但是，中国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先决条件是：战后，中国将成为大国。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战后的最近几年成为大国才能对美

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历史，对美国的政策来说，这种概念的含意是明显的，即如果中国能成为大国，那么美国便没有必要在中国投入军事力量，以此来保持远东的力量均势。而如果中国未能实现美国多年来的希望，那么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就会像战前一样，变得相对来说无关紧要，而且美国同样没有必要从军事上卷入。这种无限循环的观点使美国无须考虑她在中国诉诸武力的问题，因为用国务卿赫尔的话来说，美国的“重大利益在别处”。

我们无论怎样解释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必须记住，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至少直到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并未打算或者认为有必要在战后的任何时间内在欧洲保留她的军队。1945年2月5日，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中对斯大林元帅和丘吉尔首相说：

我认为美国军队在欧洲的逗留不会超过两年……。我感到国会和整个国家都会支持我采取合理的措施，维护未来的和平，然而我认为，这并不会导致在欧洲保留相当数量的美国军队。

考虑到在盟国战略中欧洲的优先地位，考虑到美国与欧洲有着明显的更加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受到一种缄默的前提的影响，即，美国将不会在中国诉诸武力以维护美国战后的利益。因而，尽管罗斯福总统赋予中国以大国的地位，然而美国对她在远东和中国的战后利益的政治观点与指导传统政策的观点并无根本的差别。而且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将立即诉诸武力，以维护她在那里的地位。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马歇尔使华、马歇尔反对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的建议和美国最终撤离中国都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结果，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为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不能取代直接地诉诸美国的军事力量。这一政策本身从未有过成功的机会，而其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和依靠中国来保护美国在远东的利益都出自于一种盲目的设想：一个强大和友好的政府将出现在中国。然而，从1937年起与日本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到珍珠港事件时期已经严重地削弱了的国民党政府，妨碍了这一乐观的设想的实现。

第二，美国为战后的远东所制定的雄心勃勃的战时计划与她向中缅印战区提供的微不足道的物资援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重新打开滇缅公路的最初方案、在中国海岸登陆的战略思想、改造和重新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得到了有效的实行，那么在战争结束时出现一个强大和友好的中国的可能性是会更大一些的。然而，全球性的人力和物力的匮乏无法使这一战略得到尽早的实施。同时，美国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意图未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使她的官员们无法认真地权衡美国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及其国际地位所拟定的战略和活动的种种利弊。无论是外交与军事力量脱节的传统，还是对莫斯科和延安的意图作出错误的判断都可成为一种充足的理由，解释通过军事手段实行政治方针的失败的原因。所有这些因素使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到开罗会议期间，以跳岛进攻的战争胜利和无法实行中缅印战区的最初方案使美国确信，她从太平洋岛屿发动进攻可以打败日本，而无需在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陆战。在日军占领了美国在“华东”[10]的空军基地之后，美国放弃了美军在中国登陆的一切想法。因此，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针之间的脱节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体现得十分充分。

第三，大多数美国官员并不非常了解使中国成为强大、友好的国家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美国尽力影响中国的国内局势而面临的不可避免的障碍。因而，美国并未作出任何系统的、审慎的和认真的努力来有效地运用她的实力，以使一国的外交政策和活动能对另一国产生影响。相反，美国将优先权放在有希望带来明显的军事结果的纯军事计划上，而没有放在至少会对政治目的产生间接影响的军事计划上。美国为了迅速地战胜日本，实际上已忘记了她在中国的政治方针。

此外，美国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承诺削弱了她对国民党政府讨价还价的地位，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几次暗示和威胁说，中国有脱离美国的打算。这势必使美国难以将与国民党政府作等价交换的政策进行到底，难以对其采用压力战术以实现政府的彻底改革，而这种改革是使其免于毁灭的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仅使美国必须采取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以填补远东的政治真空，而且它还不得不优先考虑与政治目标毫无联系的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它决定了美国在政治上的软弱地位，确定了一种政策失败的命运，而事到如今，这一政策已经变得非常难于实行了。

在中国和在华盛顿的一些美国官员认识到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难处和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不少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不少人提倡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不少人满怀希望地期待与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友谊和合作关系。他们的努力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并且对美国极为不利。

显而易见，美国政策、战略、行动的结构中的这三个内在的弱点，是自海约翰的照会发送以来的美国政策在不同形势下的继续。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在整个战争中雄心勃勃的目标与向中国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援助之间的矛盾、开罗会议之后政治方针与军事战略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不能有效地使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方针协调一致，这些是美国以非军事观点对待外交政策传统所采取的新形式。同样，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传统使美国缺乏必要的经验，而不能正确地估价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对美国利益所产生的影响；而且国民党政府为取得胜利和生存而依赖美国支持的现状，虽使美国享有在中国实现根本改革所需要的权力，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传统却禁止美国采取有力行动。

3. 革命中的中国现实

导致使中国成为大国政策失败的中国政治和军事现实是什么呢？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这时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多了。使整个世界惊奇不已的是日本并未取得任何军事上的战果。美国对中国的抵抗所表示的钦佩和为争取时间而向日本出口重要的原料所感到的自咎使她的官员和公众忽视了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弱点，而在战争的艰苦时期这种弱点尤为显著。

国民党政府在它于1927年4月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一系列纲领与实践之间的基本矛盾。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26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一个纲要，把地租限制在交纳土地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但是国民党政府一直未能使这一纲要付诸实施。它未能改革土地所有权、减

租、制止高利贷，这就使它脱离了农民。在国民党的理论和纲领中，一党的“训政”是教育人民、使人民对建立宪法民主有思想准备的一种暂时的措施。然而国民党政府实际上的发展趋势却是巩固党的专政，使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在每次修订宪法草案时，国民党都执意将大部分权力交给执行机构，而只给国民代表大会少得可怜的权力，诸如“蓝衣社”一类的半秘密组织的出现和对法西斯国家的标识的模仿使在西方受过教育和面向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大为失望。个人独裁的运动背后的动力之一就是它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然而蒋介石从未能够建立一个团结的党和高效率的政府。

国民党是在中国人民的反帝浪潮中当政的。人民的支持首先来自于支持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的纲领。然而，在日本入侵满洲之后的年代里，国民党一直拒绝正视日本对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存亡所形成的严重的挑战局面。面对日本的侵略，政府所表现的胆怯和动摇与它对共产党人的残酷内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可作何种解释。正因如此，日本迅速地巩固了她对满洲和热河的控制，并进一步向内蒙古和华北渗透，这时，知识分子阶层对国民党的支持开始日趋削弱。

1937年以前，国民党取得了某些积极的成果。三十个比较现代化的师和一支现代化的空军诞生了。在行政、财政和交通领域中进行了改革。然而，最大的成就是中央政府能够稳健地对各边远省份半独立的军事、政治领导人行使权力。只要可行便巧妙地使用武力和策略，只要有必要便实行政治上的妥协，这一切导致了表面上的统一。如果日本1937年没有发动进攻，国民党政政府仅靠它的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也会继续巩固它的势力和权力的。[11]由于敌对力量的虚弱，所以尽管这样的政府是不得人心的，但它还是可能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下去。

中日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这种打击最终被认为是致命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摧毁了国民党的军队，将国民党政府驱出家园，使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达到新的高潮。第二，它使共产党人有机会在中国最重要的地区扩大他们的控制。第三，它极大地削弱了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坚定的和有利的支持者——上层阶级，为中产阶级脱离政府创造了条件。最后，艰苦的战争导致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士气低落。

在战争的第一年中，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给蒋介石委员长呕心沥血地组织和训练的现代化的中国军队以沉痛的打击。到1938年底，日本占领了沿海地区所有重要的城市和交通线，占领了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这一地区是中国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中国所有的重工业、绝大部分轻工业、大多数的铁路和可通航的河流都在这些省份之内。当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迫退到西南时，政府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的领土的丧失严重地削弱了它在许多省份的权力，因为中央军所遭受的失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当局的力量均势。中央对省政府在人力、物力和给养方面的依赖越来越多。正常工作的通讯网面临的干扰给中央控制增加了更多的困难。日军的存在和日本当局的诱惑使变节投敌的可能性成为现实。对许多地方军队的指挥官来说，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朝不保夕。维持这种权力和控制主要靠政府采取格外谨慎的行动，保持各地指挥官之间的力量均衡，给他们相当多的自治权，和采取预防措施反对公开的违令和叛乱。这些措施的结果是组成了一支三百个师的联合军队。蒋委员长直接指挥三十至四十个师。其他的师在各战区效忠于他

们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中央政府。谁也无法肯定地回答某支军队在某种情况下应服从谁的命令。

蒋介石处理这种局势的方法倾向于加剧现存的分裂状况，而不是改变它。因为他把部下对他个人的忠诚，而不是作战能力做为决定装备和给养的分配、提级和晋升的最重要的标准。不管指挥官在对日作战中的功绩有多大，只要他作为个人在对蒋介石的忠诚上引起疑问，那么他的功绩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承认。反之，不管指挥官怎样屡遭失败，只要他个人的忠诚不成问题，他就不会受罚或被降级。考虑到蒋政权的性质，他的政策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传统制度的破坏形成了机构上的真空，蒋对他的政敌的权威归根结底取决于他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取决于指挥官对他个人的忠诚。战区的地方指挥官看到，他们没有希望得到与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相等的装备和给养，因此，他们便通过施加政治压力和讨价还价的办法来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并要求他们自己的部下对他们表示个人的忠诚。政治上的必要性也迫使他们实行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统一的军事指挥是不可能的。1941年秋，约翰·马格鲁德准将率领的美国赴华军事使团就这个问题写了许多报告。

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的再现对美国来说，既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机会。一方面，美国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没有任何国民党领导人可以取代蒋，结果证明，由于中央政府的权力的丧失，美国的政策受到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并不是始终不渝地致力于支持蒋，那么她可以物色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取代蒋，而地区和省级领导人日益上升的权力也会给她提供一个组织新的政治力量的机会。无论怎样，美国面临的任务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没有必要认为新的形势纯粹是一场灾难。

对国民党政府当局所构成的更加严重的威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时显著的发展。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陕西北部干燥、贫穷的一小片区域。他们控制着面积大约为3万5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50万人口。1943年底，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的面积为15万5千平方英里，人口5千4百万。在6万7千平方英里和4千万人口的游击区内，共产党也成为一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到1945年，共产党人的控制发展到大约22万5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和6千5百万人口。共产党的正规军从1937年的10万人扩大到1944年10月的47万5千人。1945年初，共产党人声称，他们除了有200万人的地方民兵组织外，还有一支91万人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被日军击败的国民党军队所留下的政治和军事真空，日本军队向前推进时，它后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足够的防守部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组织者和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建立地方政府，组织人民参加民兵和群众组织。这些活动维护了这一地区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人民不受日军的掠夺。共产党人也利用有利时机开始执行减租减息的纲领，对那些为躲避日本人和共产党人而逃离这一地区或者为维护财产和地位而勾结日本人的地主，共产党人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农民“暂时”使用。

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使世代代的中国农民对一切政府的消极服从变成了对现政府的积极支持。争取农民的积极支持往往牺牲了绅士们的利益，他们在巨大压力下投靠了日本人，在民族救亡的战争中，他们成了共产党人轻易的、合法的打击目标。不与日本人勾结的唯一选择经常是与共产党人合作，

这样的绅士们有时能得到荣誉职位，但几乎没有实权。总之，占领区的人民欢迎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正如作战部的军事情报司报告所说：

华北的八路军（共产党军队）很快不仅被认为是反对日本的力量，而且是反对地主与原军阀的统治的华北人民的大恩人和大救星。正如在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中的一位美国官方的观察员最近所说，农民对交税不仅甘心情愿，而且甚至充满热情（原文如此）“因为农民是为保护他和他的财产的军队而这样做的，有史以来，农民第一次感到他从上缴的钱财中得到了一点好处。”感动人民的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实际效果。

共产党人逐步扩大了他们控制的地区，完善了游击战争和政治组织工作的技巧，并且得到人民愈来愈广泛的支持，这时，他们开始转入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及其控制区。因而，在中日战争的同时，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在沦陷区进行着权力的争夺。取得游击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群众的积极支持，而在这—“战争中的战争”中，共产党人轻易地占了上风。正如历史上的许多事件所证明的那样，战争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之母。

中日战争不仅削弱了沦陷区的绅士们的势力，而且它损伤了实业家、工业家和金融家的元气，使中产阶级脱离了国民党政府。日本对大城市的占领剥夺了具备现代化思想和面向西方的人们的活动基地，剥夺了他们的财富，这部分人的力量的削弱反映在“政学系”的相对衰退和在国民党与政府的最高机构中，极右翼的“CC派”的兴起。

战争的艰苦和日本的封锁造成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一系列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货膨胀对薪水阶层的打击最大，他们的储蓄被一扫而光，处于贫困的地位。中产阶级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和对政府的离心倾向通过小党派和政治组织反映出来，许多无党派的知识分子也表达了这种情绪。这些组织与个人重新恢复了活动和批评，而这时共产党的发展已经使国民党政府感到吃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就在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中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害怕反对者的批评会颠覆他们在自由中国的权利，而共产党人则威胁了他们在沦陷区的那部分控制权。为了自卫，他们采取了压制性的措施。压制导致了更多的批评，因而造成了恶性循环。1939年至1940年冬，当小党派组织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时，这种倾向变得更加明显了。共产党人明智地没有参加这一政治组织，但却助了它一臂之力。这样，国民党对这些非共产党的组织和个人所采取的不宽容和压制的政策便对共产党人有利，共产党人所遵循的政策是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孤立和推翻极少数反动派。

美国驻华的外交代表及时地向美国政府报告了共产党日益发展的势力和国民党政府的恐惧与焦急的心情。早在1940年，蒋介石就向美国大使纳尔逊·约翰逊表达过他的惧怕心情，他害怕“共产党人暗地里有组织的诽谤活动”可能导致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崩溃。据说，中国领导人更加认真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威胁，倒不是日本人的图谋。尽管约翰逊认为在当时公开的武装冲突中，国民党仍然可以战胜共产党，但是，他颇有预见地警告华盛顿，“美国 and 英国如不能及时地援助中国，最终便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驻华外交人员的报告反复指出共产党人的力量和国民党政府的弱点。

不利的政局和战时的艰难造成了官僚机构的混乱和军队的士气低落。当

政府的高级官员怀着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支撑着国家，当通货膨胀极大地降低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时，战时的环境却给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人提供了许多机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美国给中国的贷款。1943年12月，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告诉罗斯福总统，国民党政府使用美国贷款的计划“除了使知情人、投机商、囤积者获得更多利润之外，并未起到任何作用……。”

对大多数中下层的文职官员和军官来说，唯一能够使收支相抵的办法就是利用非正当渠道。民政和军政这种可悲的状况甚至严重地影响到了战争中最重要活动的进行。例如，1941年8月，戴维·G·阿恩斯但被派遣视察滇缅公路。视察后他向罗斯福总统和霍普金斯先生提交了一份令人沮丧的报告，指出在中国与西方的这一唯一的交通线上活动的机构效率极低，腐败成风。

由于文职官员和军官的玩忽职守，几年来中国军队也严重地衰退了。它从未形成有效的补充兵员制。征募制的特点是接受贿赂而免除某些人的兵役、以枪决相威胁强迫服役，对新兵的非人道待遇、军队没有适当的后勤制度为其服务。中国士兵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生病后无人照管。1938年至1939年战线稳定后，更多的中国士兵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战场，他们士气低落，丧失了作战意志。

这些情况表明在中国有可能随时爆发一场推翻政权的革命。而如果美国要想让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那么她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浏览中国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发生根本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中充满了反抗与革命，这是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导致了深刻的动荡和混乱的局势，它加剧了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打破了传统制度的平衡，表明了古老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无法解决现代问题的。国民党本身是个革命党。它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中掌权的。但是它未能给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这就使它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在国民党政权下，到处可以听见人民的怨声载道。由于西方的影响，逃亡地主的人数迅速增加，农村手工业遭到破坏，传统的土地所有制和农村赎购制的弊病日益严重。由于人口过多和可耕地面积太少，基本的贫困状态进一步恶化，农民变得日益不安。民族耻辱和未能抵抗日本侵略使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脱离了国民党政府。一些倾向西方的人极为吃惊地看到“训政”制度的加强和永久的延续以及效仿法西斯模式建立个人独裁的明显的发展趋向。

中日战争点燃了通向最终爆炸的长长的导火索。因为国民党政府战时的腐败和压制性的措施所激发的不满情绪加强了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压力。战争也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控制的地区内显示改革纲领的可行性和它深得民心的普遍性。他们的成绩使人们信任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在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中，这时又增添了一线成功的希望，出现了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的选择。国民党政府的逐步削弱，其军队和官僚机构的衰退为一场成功的革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维护现状的主要支持者是保守势力，而它的衰弱和心慌意乱使它逐步丧失维持政权的能力。更糟糕的是，反对国民党政府权力机构的革命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个在建党初期完全由苏联共产党控制、之后仍然在思想意识上忠诚于它的党。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要为美国自身的利益服务，那么就要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造，使它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和

社会改革的领域内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展开有效的竞争。显然，采取这样一条政策的根本的先决条件是正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力量，它固然扎根于中国，然而却始终不渝地追随着苏联的迂回曲折的外交政策。（在第二部分的第六章，我们将详细地审查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错误判断的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

显然，美国面临的任務最起码也是一个极端艰难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无论美国做什么，她都只能推迟最终的结局，而不能扭转这一结局。但是，如果美国有充分的人力、物力，并竭尽全力处理中国局势，如果美国使它的军事活动服从于政治方针，如果它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手腕更巧妙一些；那么使中国成为大国和友好国家的可能性会更大。不幸的是，上述这三个条件都没有实现，我们在后面的几章里将会看到这一点。

第三章外交行动和军事战略

1. 通过外交行动使中国成为大国的尝试

美国一参加太平洋战争，它的官员就开始反复提醒盟国把中国当作大国的重要性，并向中国保证归还它失去的领土。前面已经提到 1941 年至 1942 年冬丘吉尔是怎样看待华盛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的。在最后以《联合国宣言》问世的文件的初稿中，中国的名字与苏联的名字一道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被抽出来，在国家名单的最后与美国和联合王国列在一起。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说明了华盛顿的情绪。1942 年 2 月 9 日，史迪威将军使华以前到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他问总统是否要给蒋介石委员长带个口信，罗斯福对史迪威说，告诉这位国民党的领袖“我们会永远这样干下去的，我们将会坚持不懈，直至中国收复所有的失地。”虽然总统的非正式的口头保证是一时冲动而随便说的，但它完全符合总统坚定不移的信念，他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和《开罗宣言》的方案已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1943 年 1 月，美国与中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放弃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它还说服英国也采取类似的行动。这些条约的缔结明显地标志着门户开放政策的实现和美国传统政策的胜利。1943 年 3 月，在艾登访问华盛顿期间，赫尔在他面前批评了丘吉尔，说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是大国之一是个严重的错误。那时，在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与艾登讨论战后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当中，他们已经建议“（国际组织）的真正决策应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作出，”这几国才是共同管理世界的大国。

总统和国务卿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会议上都提出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1943 年 10 月，苏联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参加《四国宣言》，赫尔暗示苏联，如果排除中国参加《宣言》将导致中国的士气低落，那么美国政府为稳定太平洋日益恶化的政治、军事局势，将对《宣言》进行“各种各样”必要的“调整”。结果赫尔战胜了苏联人。作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的正式的最早签署国之一，作为保证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的组织”的四大国之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另一个进展，使它向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1943 年 12 月 1 日的《开罗宣言》重申了卡萨布兰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 1895 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12]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召开了德黑兰会议，在 11 月 29 日的一次私人会晤中，罗斯福总统对斯大林元帅谈起了维护未来的世界和平的计划。总统提出国际组织将包括三个机构：第一、由联合国各成员国组成的大会；第二、处理所有新的军事问题的执行委员会，它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组成，加上世界各地区成员国的代表；第三、总统称为“四警察”的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组成，他们的职责是充当国际警察，防止或遏制侵略行为。斯大林对中国在战争结束时能否成为大国，能否起到它应起的作用待怀疑态度。他还认为欧洲的小国不愿意使中国成为强制它们的权威。然而斯大林并未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以致使总统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苏联同意了他的建议。

中国参加了于 1944 年 8 月 21 日至 10 月 7 日召开的顿巴敦橡树园会议，“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的建议”使中国在安理会分到一个常驻代表的席

位。使中国获益的努力最终导致在旧金山会议上成立了国际组织，通过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宪章规定中国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在使中国成为大国的努力中战胜了英国的怀疑和苏联的反对。

但是，美国在执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时采取的重大措施仅仅是外交行动。这一政策既没有得到远东的盟国在战略上主动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的主动支持。因而，中国仅仅是取得了一种名义上的地位，而没有掌握实权。而当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之后，美国终于遭到了它最惨重的失败。

2. 远东战略的发展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

（1）把中国作为重要作战基地的设想，以及它的政治含义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远东战略包括了一系列出类拔萃的即兴杰作。各种战术和战略的机会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以能在首先打败希特勒的全球战略后迅速战胜日本。要打败日本并没有一成不变的长远计划。美国军队的指挥官都有各自的指导思想。把这些思想见诸于具体的计划取决于时机。在1942年的上半年，日本完成了对中国的封锁，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形成有力的攻势。为阻止日本继续南下，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了有限的军队。然后，5月，美国在珊瑚海一战击退了日本海军，6月，又在中途岛的重大战役中获胜，这时，美国在防御战略中采取了进攻战术：袭击瓜达卡纳尔岛。1942年底，美国在太平洋战区大约有35万人的军队，这个数字比在联合王国和北非的34万7千人稍高一些。比较而言，在中缅印战区或在这一地区通道上的美国军队是1万7千人，它主要是个空中和运输战区。太平洋战区和中缅印战区的对比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作为未来对日作战的基地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事实上，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重申了中国的重要性，正如莫里斯·马特洛夫所说：“就军事问题而言，美国参谋长们曾希望——他们在战争初期就希望——在与日本的斗争中，中国的人力和战略位置可以设法加以利用。如果这样，中国将可以为盟国的事业服务，它的处境将与同德国作战的苏联颇为相似。”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为卡萨布兰卡会议拟定纲领时，就计划于1943年在缅甸进行一次战役，重新打通通向中国的运输线，并使以后有可能取得“向日本国土发动最后进攻的重要基地”。华北的军队运输基地和机场都是战略目标。在此时及此后的几个月中，中国似乎比太平洋上的岛屿更有利于美国进攻日本战略。用罗曼纳斯和森德兰的话说，美国官员的分歧“在于对几种行动方案的时机和效果的争论，而不是关于是否从中国袭击日本的问题。”

在1943年5月的华盛顿会议上，把中国作为主要的作战基地的设想在“关于击败日本战略计划”中进一步得到核准。这一计划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拟定，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所接受，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持续的大规模的对日空袭，只能由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来执行。在他们的建议中，华北的空军基地起着关键的作用。为取得这些空军基地，预计将采取一系列行动：英国在中国和美国军队的帮助下试图收复缅甸，美国夺回菲律宾，英国夺取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盟军将在香港三路会师，中国军队由内地向东推进，美国的两栖部队则要通过苏拉威西海和南中国海向西，英国由马六甲海峡向东挺进夺取香港后，盟军随之会进入华北。直到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规划者仍然认为：

中国为轰炸日本、袭击日本到南海的交通线和进入日本提供了最好的潜在条件。……
击败日本的计划的重点……仍然是盟军在华北站住脚。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横扫太平洋中部的建议已得到批准，但这并没有使中国基地的重要性减弱，因为在对日本战略空袭中，太平洋上的岛屿可以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表现。

把中国作为空军主要基地的设想和用中国拖住日本军队的希望构成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基础。但是这个把中国作为主要基地的想法，倘能通过有效军事行动予以实施的话，那一定会具有明显的政治含意。实施这一想法需要尽早打破日本对缅甸的封锁，将充足的物资和装备送进中国。实施这一想法需要创建一支新的、强大的军队，这样才能巩固国民党政府以对付共产党人。实施这一想法要求国民党军队随着对日战争的发展重返中国沿海和华北战略地区。实施这一想法将在收复区重新牢固地树立起政府的权力，使这一政府在全国重新享有声望和影响。实施这一想法会使大量的美国地面部队在中国沿海登陆并使美军在中国的关键地区驻扎一段时期。这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就能够直接影响中国的局势。美国官员怎样看待这些政治含意并不清楚。他们决心开辟一条进入中国的陆地通道和重新组织中国军队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看，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是，不管潜在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使中国成为主要基地的战略设想得以实现，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的成功机会就会增加。

然而，这一战略设想本身的内在弱点使它过早地夭折了。中国军队的进攻能力与美国的希望相差很远。美国为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所作的努力，面临着出人意料的实际困难和各种政治上的障碍。英国人对缅甸战役几乎毫无兴趣，对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疑虑重重。除了联合作战在政治上错综复杂以外，打开中国的大陆运输线，为中国军队运输军需品的军事上的困难也是令人生畏的。另外，首先打败希特勒的毋庸置疑的战略，也严格地限制了美国为亚洲和太平洋提供的人力和物力的数量。即使在东方战场上，由于日本在战争早期向澳大利亚的猛烈推进，由于美国发动进攻的战术和战略上的考虑，和相对短的运输线——这一切都使太平洋成为美国的主要战区，而中缅印战区则仅仅是个辅助性的战场。分配给中缅印战区的有限人力和物资鲜明地揭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矛盾，即：使中国成为大国的雄心勃勃的政策与为执行这一政策而分配的微不足道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史迪威对收复缅甸打开中国的陆上通道这一计划的一拖再拖和削减计划的规模的作法，使之与把中国作为主要基地的想法之间的巨大鸿沟和其他内在的弱点暴露无遗。

（2）对史迪威收复缅甸的初步计划的一拖再拖和不断修改

日本在缅甸战胜盟军之后，1942年6月，史迪威制订了一个中英美协同作战，粉碎日本封锁的计划。他提议的作战计划是重新进入仰光港，重新打通仰光到昆明的运输线，使每月三万吨的军需品能够抵达中国。为实现这一军事目标，史迪威希望美国的作战部队能够发挥作用。同时要求英国在孟加拉湾投入足够的海军力量来控制它，并在仰光登陆。在印度的英军和在印度拉姆加尔的中国军队将从西翼进攻缅甸，而以云南省为基地的中国的二十个精锐师将从东翼进攻缅甸。这两支军队在曼德勒以北会师后，向缅甸南部推进。英军在仰光港登陆将切断日本通过孟加拉湾进行增援的部队。新登陆的英军向北挺进，从背后袭击日军。这一计划确保在缅甸打一场速决战，争取于1943年及早打通进入中国的这条较近并立即可用的公路。重开仰光—昆明

运输线将使源源不断地运进中国的军需品重新装备中国的军队，使它能够发动一次进攻，以在中国南部或印度支那开辟港口，进一步增加军需品的运输量。

如果这个目标得以实现，那么 1943 年就可以解除对中国的围困。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可能会出现，并参加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的战争。国民党中国日益恶化的经济与政治局势可能会被制止，国民党政权在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可能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如果说存在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机会的话，那么这种机会就取决于在缅甸有效地执行这一计划。

然而，执行史迪威收复整个缅甸的计划需要进行一场全球战争，严峻的现实是缺少物资、军舰、飞机和专职人员。美国 and 英国都认为无法向中缅印战区派遣和调拨执行这一计划所需的军队和设备。美国陆军部在计划中也并没有考虑大规模地使用其战斗部队。由于收复缅甸的任何努力都主要取决于英国及中国能否尽量提供帮助，因此及早解除对中国的围困也就主要取决于英国的同意与合作，取决于英国承担这一任务的能力。然而大不列颠所首先关注的自然是欧洲的战争和中东。它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保卫印度。虽然解放缅甸对英国来说也是需要的，但它并不是最优先的目标。英国认为对仰光发动两栖进攻而不分散欧洲战区的军事力量和设备是不可能的。英国的预见是如果不发动两栖战争夺取仰光，那么就要在缅甸北部疾病成灾的山林中打一场持久和艰难的战争。[13]直到 1944 年夏，英国的军事战略家还认为可以绕过缅甸，对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进行一场大包围。

英国对缅甸战役的缺乏热情，只不过是美国领导人需要克服而未能克服的障碍之一。中国不能作出更大的努力以自救是美国试图粉碎日本封锁的另一个障碍。蒋委员长对中国的弱点了如指掌，他不遗余力地保存力量，稳掌大权，他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缅甸战役，否则便一仗不打。因为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中，中国的无能将会被盟军强大的力量所掩盖。为达到这一目的，蒋委员长十分精明地对要求中国全面参与缅甸战役提出了几项附加条件。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英国在缅甸采取大规模的行动，特别是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作战。因为美国未能说服英国采取必要的行动，所以中国认为有理由拒绝执行这一计划。这样，缅甸战役被一拖再拖，它的规模也大为缩小了。

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合著的三卷本的中缅印战区的军事史详尽地阐述了缅甸战役的计划和过程，我无需在此赘述。简言之，史迪威夺回仰光、重开滇缅公路的最初计划制订于 1942 年 7 月，而 1943 年 5 月华盛顿会议修改了这个计划，使它变成一个重占缅甸北部，开辟雷多公路的小规模战役的计划。取代大规模的缅甸战役的雷多公路战略意味着在缅甸北部的险恶地带进行一场长期的、艰难的战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缩小设想中的缅甸战役的规模与通过宏伟的“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发生在同一时刻。把这个计划说成是以中国为主要基地的“战略计划”，真可谓是用词不当。“从严格的军事定义上讲，它不应称为一个计划，因为它既没有对敌军力量和部署作出估计，也没有提及需要盟军提供何种类型的以及多大规模的部队才能完成计划中的任务，它既没有提到指挥问题或者指挥官，也没有作出时间安排。”

相比之下，太平洋的战役进展迅速。对于中国的不祥之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决定，西进的主要力量将来自太平洋中部，辅助力量来自太平洋南部和西南部。隐藏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想法是，如果盟军舰队消灭或遏制了日军舰队，那么它们就可以从太平洋直接向日本本土发起进攻。它们可以被派

往“‘北部附近’，从第二条平行的通道进入东京”。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发动缅甸北部战役的预定日期从1943年11月推迟到1944年2月中旬。

（3）选择

简单地回顾一下计划缅甸战役的前前后后就会清楚地看到政治目的与军事手段之间的不平衡。考虑到这一点，美国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就非常明显了。一方面，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靠强大的中国作为稳定因素的想法，以及在战后的远东得到一个有能力的伙伴的打算首先取决于成功地及早解除对中国的围困。另一方面，美国分配给中缅印战区的微不足道的物资使早日粉碎日本的封锁成为不可能。

回顾过去，美国似乎有三种合理的选择。第一，给中缅印战区调拨充足的物资和人力以早日粉碎日本的封锁。盟军在这一战区作出更大的努力是否会严重地妨碍欧洲与大西洋的军事行动，即使在今天也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指出，根据他的估计，盟军对太平洋（包括印度洋和缅甸）的日本人仅仅投入总物资的15%。在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上，他又指出，在太平洋增加5%的盟军物资就会使这一地区的盟军力量增加33%，而在欧洲对抗轴心国的军队仅会因此而减少6%。其他盟国领导人则认为，欧洲和中国战区之间的人力物力分配是正确的，他们不仅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初两年，即当横跨海峡的行动前景引起人们不断的深切关注的时候这样认为，而且在1944年欧洲被成功地占领之后，他们仍然这样认为。史汀生对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是这样评论的，他写道：

今天马歇尔说，如果我们不得不撤换史迪威，那么他也不允许另一位美国将军担任中国军队的参谋长和总司令的职务，因为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会像史迪威那样得到如此忠诚的支持。我的意见倾向于再走得远一些。我们为开辟飞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所作的巨大努力使我们付出了鲜血的代价——这么多的运输机葬身壑谷。今天，由于缺少必要的运输机在荷兰和斯凯尔河口附近作新的空运飞行，我们成了四肢不全的残废人。在意大利北部，缺乏运输机使我们丧失了行动能力。在缅甸的行动可能要我们在主要战区再付出一个冬天的代价。而且，尽管如此，由于未能训练足够的中国陆军防守昆明并支持史迪威，我们不能拯救中国，使它不受日本目前的进攻。”

解决增加中缅印战区人力物力问题的办法，也许是从美国在太平洋对付日本的力量中抽调一部分力量，而不是从欧洲。当金海军上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同意为中缅印战区调拨一部分登陆舰时，当1943年2月，金海军上将向切斯特·W·尼米兹将军强调了在10月以前在太平洋作好一切准备的重要性时，这种可能性就出现了，因为届时美国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将被调去参加缅甸战役。但是在1943年3月，缅甸战役的规模被削减了，缅甸北部的有限战役被推迟到1943年8月，然后再次推迟到开罗会议之后。计划中的调拨从未实现。

考虑到开辟中国的大陆运输线所面临的军事上的困难，考虑到英国不愿在缅甸采取主动行动，考虑到国民党人无力自救的处境，即使美国为中缅印战区调拨了更多的人力物力，结果很可能不会有大的差异。这也就是说，把中国作为主要基地的想法以及伴随而来的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可能本来就是不明智的。然而，在即将抛弃把中国作为主要基地的想法时，却没有人想

到要为使中国成为大国和依靠中国保卫美国在远东的战后利益的政策，寻找一个替代办法。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妥协求和的方式使日本成为维护远东力量均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以及美国对中国收复日军占领区所作的口头与书面的承诺有力地排除了这种选择。

另一种选择是为稳定中国的国内局势、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而直接诉诸美国的实力。如果采取了这个政治方针，那么以跳岛进攻的战斗方式从太平洋袭击日本战略就是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最迅速的办法，它将使亚洲大陆处于岛屿的环形包围之中，并以此为出发点，尽早在中国建立起美国的势力。这样，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之间就会完全协调起来。然而采取这种选择的两个先决条件却是不存在的：愿意为维护远东的力量均势作出代价甚高的军事和政治承诺，坚定不移地承认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具有长远的重要性。此外，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所作的错误判断也使美国未能严肃地认识共产党的威胁。在缺乏危机感的时刻，任何国家都不会采取违反自己的传统和习惯的行动。

为了上述原因，美国并没有为达到政治方针与军事战略的一致而在这两种可能中作出选择。在可以用跳岛进攻的战术击败日本的局势逐渐明朗化之后，美国起初是把使中国变为主要基地的想法降到次要地位，然后就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美国在对击败日本的计划作逐步调整时，却没有同时采取一种新的政治方针，这就使政治方针与军事战略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显而易见，在美国对军政事务的处理中，其使战争走向胜利的战略机动性和军事灵活性，与对争取和平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和智慧之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4）开罗会议之后，政治方针与军事战略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大

尽管在 1943 年 8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击败日本的计划仍然强调在中国建立盟国势力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中国的明显倾向也即将出现。因为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设计家们的估计，如果随后执行夺取香港、进军华北的计划，那么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要到 1947 年才能发动。设计者担心，如果在争取对日的决定性胜利中有所拖延就会导致谈判媾和，他们敦促拟订一个在战败德国之后的十二个月内击败日本的计划。会议通过以马里安纳群岛作为太平洋舰队的目标之一、尽管这只是辅助战役的一部分。

为制订速胜的计划，作战部从 1943 年 10 月就开始考虑制定“主要强调从太平洋，而不是从亚洲大陆……打击日本的短期作战计划”。同时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也在拟定一个“击败日本的短期计划”，计划提出四种行动方案，它们都绕过大陆中国。陆军部的战略科批评对大陆中国的战略代价太高，并且没有与以太平洋中部为主的行动充分地配合。不久，联合战略观察委员会劝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在不削弱经中国的途径打击日本的重要性时，及早击败日本的关键仍在于通过太平洋中部发动全面的进攻……。”这样，到开罗会议时，美国所有重要的机构都对中国作为基地的未来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即将问世的航程达一千五百海里的 B-29 轰炸机使马里安纳群岛有了新的意义。夺取马里安纳群岛，尽早地在那里建立起重型轰炸机基地这时得到了强调。在中国成都也将建立一个 B-29 基地，但美国认识到使用中国的空军基地所面临的困难。

开罗会议是在正式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 1943 年 10 月的《莫斯科宣

言》签订之后一个月召开的。在开罗会议上，中国得到了归还所有日占区的保证。但也是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总统服从了丘吉尔一再坚持的意见，取消了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而蒋介石曾一再坚持两栖作战是计划中的缅甸战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开罗会议的军事决策中的潜在的意味是，中国作为主要的行动基地所具备的未来的重要性已不存在了。明确他说，击败日本的主要行动将在太平洋进行，中缅印战区的战役则是对这一主要行动的支持。事态的发展再次证实了战争初期对客观局势的战略考虑和优先计划是正确的。但是这一战略考虑的具体化却对中国未来的作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减少了在中国大陆上展开击败日本的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而且，我们即将看到，它排除了为史迪威改造军队的计划提供更多的物资与装备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在 1944 年 3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仍然认为福摩萨、吕宋以及中国沿海的几个地方是向日本发动总攻的预备基地。但是在 4 月份，日军发动了在华东的攻势，8 月份它就迫使美国空军撤离在中国的前方空军基地，并使在桂林的主要空军基地受到威胁。在此后的五个月内，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基地的价值逐渐化为乌有。1944 年 9 月的魁北克会议重申了在太平洋采取主要行动的总战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它的最后报告书中达成一致意见，即强调海军和空军的行动，而尽可能避免代价甚高的陆地作战，10 月 3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发了一条指令，内容是袭击莱特湾，解放吕宋，然后在小笠原群岛占领一至两个阵地并进攻琉球群岛，到 10 月初，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是没有必要的。史迪威将军从弗兰克 D. 梅里尔将军那里得知，尼米兹海军上将关于美国需要在中国沿海建立基地的反复声明纯粹是为美国计划在太平洋其他地区作战打掩护，而美国并不愿意参与任何涉及在中国大陆动用大量美军的战斗。史迪威在 10 月 4 日的日记中写道：“显然，陆军部是站在我一边的，但是这一战区被取消了，没有人再要求我们做什么了。也不会派（美国）军队来了。”莫里森在谈到 1943 年 5 月通过的“关于击败日本的战略计划”的销声匿迹时说：

英国陷入地中海、蒋介石政府的虚弱和不可靠、日本占领菲律宾时在南中国海使用一支海军的困难，以及美国两栖作战技术辉煌的成绩和快速的航空母舰部队等积极因素，这一切在 1944 年打破傅斯麦防线和取得马绍尔群岛之后就导致了计划的彻底改变。到达东京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马绍尔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硫磺岛，另一条是新几内亚—莱特湾—吕宋—冲绳，两条通道都不涉及中国。

1945 年 2 月 1 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召开会议，马歇尔将军和金海军上将在会上阐明，太平洋未来的作战计划旨在避免对日的大规模的陆战，因为它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并延缓战役的进行，拟订好的计划目标是 1945 年 9 月进攻九州，1945 年 12 月入侵东京平原。1945 年 2 月 2 日在马耳他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召开的一次盟军参谋部会议上，丘吉尔首相问道，美国为支持中国作出了巨大努力，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所取得的成果是否有些失望？罗斯福回答说：“中国要成为一种值得严肃对待的力量，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一份注明是 1945 年 2 月 27 日的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文件宣称，“现在”武装中国使它成为大国的作法似乎是不可行的。这样，到雅尔塔会议前夕，美国的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在战争结束时，

中国不会成为大国。但是促使美国官员积极寻求新的政策的危机感是不存在的。人们以为美国能够说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重新建立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对美国持不可缓和的敌对态度。人们还以为通过使苏联与国民党中国正式达成协议的办法可以阻止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人。这些设想都是罗斯福总统为实现战后美苏合作而制订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是他通过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实行理想主义的国际行动准则，从而保证和平的计划的一部分。正是出于以上的观念，为了支持美国进攻日本的计划，为了防止日本政府和军队在中国大陆延长决战的时间，美国求助于苏联的军事力量以补偿由于中国不能在美国战略中发挥作用所造成的损失。1945年2月在雅尔塔，美国得到了苏联关于在击败德国的三个月之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保证。

1945年2月中旬，魏德迈将军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在1946年初占领中国南部的两大海港——广州和香港。这场战役完全由中国军队来打，美国陆军根据计划是不参战的。5月间，日本军队为预防苏美的进攻，从中国的西南部撤入华中和华北，这使魏德迈能够提前执行他的进攻计划。6月间，他的计划得到修订，规定夺取雷州半岛上原属法租界的广州湾的小港贝阿德堡，把这个行动作为进占广州和香港的初步措施。8月3日，中国军队到了贝阿德堡以西约二十英里。但是，原子弹于8月14日结束了太平洋战争。[14]

在路易斯·莫顿和赫伯特·菲斯对使用原子弹的决策所作的权威性的研究中，他们的结论是，使用原子弹的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为了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确保日本早日投降。阻止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想法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尽管国务卿史汀生于1945年7月曾建议，如果俄国已经参战的话，以投放原子弹来警告日本投降应该在俄国人的进攻还没有走得太远时提出。似乎没有人考虑到使用原子弹的计划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在中国制定的政治和军事计划也没有与这种计划的即将实施协调起来。直到最后，追求速胜，而不是实现政治目标构成了美国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时期大多数重要的军事决策的最高指导思想。

这样，在开罗会议之后，美国就逐步放弃了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基地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确定了太平洋进行跳岛进攻战术以击败日本的战略。实际战略并没有迫切地要求建立一支重新组织和重新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它既没有促使国民党军队解放日占区，也没有在战争的进程中使他们能牢固控制华中和华北地区。实际战略没有考虑在中国大陆大量地使用美国陆军。政治方针和军事政策之间的鸿沟迅速加深，以至最终完全脱节。虽然在雅尔塔会议时期，美国官员就开始怀疑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概念是否有效，但是没有人去寻求另一条可以选择的政治方针。在太平洋战争结束时，训练三十九个国民党师的计划还远远没有完成。国民党军队被困在中国的西南角。美国的陆军部队也不在中国。把国民党军队空运和海运到华北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大城市及交通线上，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战略要点的仓促登陆暂时救了国民党政府的燃眉之急。然而这些行动丝毫没有能补救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根本弱点，以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在中国缺乏军事实力的状况。此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并不意味着背离了1944年制定的避免在中国大陆进行陆战的军事原则；[15]它并未导致美国的军事实力在那里出现和牢固的确立。

3. 中国的政治方针和军事行动

(1) 史迪威军队改革计划的政治含意

回顾历史，整个战争期间雄心勃勃的政治方针和给中国分配的物资不足之间的矛盾，和开罗会议之后政治方针与军事战略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还仅仅是美国的政策结构中的压力之一。另一方面的弱点与前面的问题同样重要，这就是关于实际上使用现有的有限物资的目的问题。尽管有日本的封锁和后勤上的困难，美国仍然在中缅印战区采取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军事行动。飞越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陈纳德空军力量的扩大、缅甸北部的战役、以成都为基地的 B—29 轰炸机群轰炸日本和日本商船的“麦特洪”计划、魏德迈对史迪威计划的继续——这一切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范围内体现了试图帮助中国的出色的记载。贯穿于这些许许多多的军事行动中的政治目标是支持蒋委员长，而这被认为是使中国参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致力于分析这两种目的对美国政府和蒋委员长之间的不平衡的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它曾破坏了美国使中国强大的努力。在这里，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审查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在中国的国内稳定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上的政治含意。它将表明，美国速胜的愿望和对伴随而来的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的爱好怎样转移了它对史迪威计划的注意力和物资供应。教训似乎是：如果美国集中现有的有限物资促进军队改革计划，它在加强国民党政府和使中国成为大国的努力中；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史迪威是作为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总长被派往中国的，他得到的指令是“增强美国对中国政府战时援助的有效性并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史迪威认为，这些指令和其他的指示意味着，他的主要使命就是提高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在 1942 年 4 月期间，即第一次缅甸战役的危险时刻，他提出了第一个建议：在印度训练一支精锐的中国军队，这支军队的编制是各用三个师组成两个军团。

1942 年 5 月 26 日，盟军在缅甸溃败之后，史迪威向蒋委员长递交了一份重新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他建议大量减少师的数量，彻底清除无能的高级将领。他的主要目的是保留和重新装备三十个精选的中国师，把它们当作建立一支新型的中国军队的核心。以后于 1942 年 10 月，他考虑重新装备整整六十个中国师。除了在拉姆加尔的中国师之外，他还计划以昆明为中心，在中国的云南省训练三十个师，在收复缅甸时，这些师可用来参加围攻。当训练第一批三十个师的计划开始实施后，再集合第二批的三十个师在以桂林为中心的“华东”进行训练。陆军部通知史迪威说：一般来说，六十个师的训练计划所要求的军需物资将在六个月之内解决。史迪威执行中国军队的改革计划的热情很自然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这种考虑又来自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基地的想法。但是他并没有忽略他的计划在国内和国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1942 年 12 月 27 日，史迪威在给宋子文的一份概括了面谈要点的备忘录中写道，他的计划的“长远目标”是：

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中国，它有一支现代化的、组织完善的军队，它能够支持一切合理的要求，它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友谊关系，有着共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的和平将得到保证，中国在由中国、印度支那、暹罗、缅甸、印度组成的亚洲同盟组织中将成为领袖。太平洋将由美国和中国共同管理，这与荷属东印度群岛、澳大利亚、菲律宾

并不发生利益的冲突。)

“直接目标”是“重新整编、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史迪威还认为，军队改革计划是扭转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威的一种手段。史迪威在1943年9月29日向蒋介石委员长递交的一份题为《中国的计划》的备忘录中写道：

一旦第一批和第二批各三十个（师）建立起来，各省军队忠于中央政府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两支军队将使中央政府的命令得到执行。……（通过彻底重新整编中国军队），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便可以确保它的国内局势稳定。

在194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史迪威怒气冲冲地、也是生动地描写道：

独裁者“花生米”（指蒋介石委员长）遇到了麻烦。（注：花生米为美国俚语，特指野心大但能力差的人——译者）。起初，这个花生米认为，军事和政治上的作用是不能分离的，因此他让军事指挥员掌握了实权。现在，他认为这些家伙权力太大了。他一年多来试图打散他们，但毫无成效……。事实很简单，他不敢采取有力的行动——他们肯定是满腹牢骚，他们可能会合伙抵抗。他的王牌是空军、炮兵和中央政府训练的十个军。这个小傀儡为什么认识不到他唯一的希望是三十个师的计划，是建立一支独立的、有效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呢？

尽管史迪威有如此的看法，但是蒋相信建立一支装备精良的强大的军队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整个生涯部反映了这种坚定的信念。特别是在二十年代，他致力于在广州建立黄埔军校；及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努力争取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使国民党军队现代化。事实上，1941年3月，蒋的私人代表宋子文先生曾向美国提交过索取武器的要求，这清楚地表明，他有重新装备三十个师的计划。那么，当史迪威努力训练和改造中国军队的时候，蒋委员长为什么非但不与他合作，反而以拖延和回避来破坏这个计划呢？谁也无法肯定蒋委员长的动机，但对他的行为却可以作一些解释。中国军队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力量。执行训练和改造军队的计划必然会改变中国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力量均势。十九世纪末训练“新军”的作法导致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出现，这个集团在清王朝灭亡之后的十五年中统治了华北的政治舞台。蒋个人的政治权力也归之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所统帅的军队，蒋曾在黄埔军校任督导师。因而，他必须弄清楚，训练军队的计划是否会增强他自己的权力，而不至于变成产生新的政治力量的根源。[16]至于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他需要确定史迪威清除无能将领的建议会不会导致忠于他的指挥员也被撤换掉，从而削弱了他的政治影响力。正如1942年春，蒋夫人对史迪威建议所评论的那样，有必要“现实一些”，“砍掉脑袋可就一无所有了”。况且蒋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正每况愈下，他遇到的困难越多，对控制军队的依赖性就越大。然而，即使自私的政治打算不成为蒋的拖延的主要原因，执行史迪威改革计划的政治困难也是难以克服的。因为史迪威的计划主张大量削减中国师，而执行计划时就会碰到失去军队的指挥员的各式各样的抵抗。

由于在蒋看来，执行大规模削减军队和严格清除无能将领的史迪威建议，所面临的政治上的困难和问题是巨大无比的，因此，他显然想慢慢来，

他把军队强大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取得美国的武器和装备。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将增加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吨位计划放在军队改革计划的前面。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是这样解释 1942 年 6 月蒋对史迪威所说的一段话的：“只有实现了可供中国五百架飞机使用的、每月运输军需品五千吨的计划，然后才能把注意力转到军队训练上。”蒋通过要求增加对华援助来抵制史迪威力图改造和重整军队的压力。蒋本人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史迪威计划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障碍。

（2）史迪威努力中的障碍：追求速胜

正如 1943 年 7 月史迪威对马歇尔所说的那样，他自己认识到：“蒋委员长不愿意他的政权有一支大规模的、有效的地面部队，因为他害怕这支军队的指挥员将不可避免地削弱他作为中国领袖的地位。”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史迪威为什么无法克服蒋对他的计划的抵制。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史迪威重新整编军队的计划不仅遭到中国的拖延；而且它与美国为了取得迅速的、决定性的胜利而倾向于采取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的想法，也是格格不入的。克莱尔·L·陈纳德将军就是美国这种态度的有才干和有说服力的发言人。陈纳德上尉于 1937 年夏到达中国，他因伤残而从美国（陆军航空兵团）退役，并接受了担任中华全国航空委员会文职顾问的职位。来华不久，他就改善了一种对付占极大优势的日本空军战斗机作战的战术，这个战术发挥了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的长处、利用了日本飞机的弱点和日本战术上的错误。早在 1940 年 12 月，他就开始制订把中国作为空袭日本的发射台的战略。他作为“飞虎队”的司令在中国和缅甸的空战中所取得的辉煌的战术上的成就，与太平洋战争开始几个月盟军遭受的令人羞辱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成就使他举世闻名。

1942 年 10 月，陈纳德再次服役，并被提升为准将。他声称，他只要“用 150 架有现代装备的战斗机、30 架中程轰炸机，并在几个月之后的最后阶段中加上 12 架重型轰炸机”，就可以完成摧毁日本的任务。他的计划是袭击在中国的日占区的军事目标。当日本的空军部队企图保护这些目标时即趁机消灭他们。消灭了日本的空军之后，最后再轰炸日本本土。他在给由温德尔·威尔基直接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中全面地阐述了这些设想。

陈纳德的计划使蒋委员长喜出望外。从政治上说，这使他找到了抵制史迪威坚持早日进行缅甸战役和重新整编及改造中国军队的借口。它使蒋委员长能够拉陈纳德反史迪威，以削弱史迪威的影响和权力，减轻他对蒋的压力。为使中国领导人的意见能占上风而促使美国内部发生分裂——蒋在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不时地运用这个政治策略，并使他在消灭对手的斗争中获利极多。从军事上看，陈纳德计划使蒋委员长能够在不作出重大牺牲和努力的情况下声称自己对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计划在为重庆和其他主要城市提供有效的防空手段方面也能偶有一定的帮助。因此，蒋委员长不遗余力地支持陈纳德计划。1942 年 11 月，蒋介石夫人在抵达美国后不久就清楚地表明。她不喜欢史迪威，但是她对“陈纳德怀有极为崇敬的心情”。1943 年 2 月，阿诺德—萨默维尔—迪尔访华团在重庆试图说服蒋委员长执行卡萨布兰卡计划中重新占领缅甸的任务，蒋介石却要求美国为中国建立一支由陈纳德领导的独立的空军。尽管马歇尔将军争辩说；缅甸战役的胜利和建设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是在中国扩大空战规模的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是罗斯福总统还是批准了蒋的要求。马歇尔颇有远见地指出：“一旦我们的空

战刺痛了日本人，他们就会对我们采取行动，他们不仅在空中，而且在陆地都会这样做。陈纳德可以用他的战斗机应付空中局势，但是针对我们基地的陆战一定要有地面部队来应付。”

罗斯福总统在给马歇尔的一封对自己的决定作出说明的信中清楚地显示了他对史迪威改造中国军队的计划缺乏兴趣，他把史迪威计划说成只不过是缅甸战役而作的地区性的准备。罗斯福关于建立以陈纳德为首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决定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史迪威重新训练中国部队的计划，因为它并没有改变为史迪威计划和陈纳德计划提供的越过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物资的优先分配权。但是有清楚的迹象表明，罗斯福总统更喜欢陈纳德的声势浩大的计划，而不喜欢史迪威缓慢的、令人厌倦的、煞费苦心的计划。由于反对史迪威计划，罗斯福便没有考虑军队改革计划的重大的政治含意。

在 1943 年 5 月“三叉戟”会议的前夕，总统将陈纳德和史迪威召回华盛顿，请他们各抒己见。虽然陈纳德是受蒋介石之托，而史迪威则在马歇尔的建议下，但两种计划显然是相互关联的。蒋委员长这时正式提出，改变喜马拉雅驼峰空运物资吨数的优先分配权，使它更加有利于陈纳德的空军部队。

在向总统说明各自的观点时，陈纳德关于取得直接的军事效果的言过其实的说法给总统印象根深，而史迪威对日本将夺取中国的空军基地所作的准确的预告却被置之度外。关于这次会议的主要观点，陈纳德回忆说：“我回答（总统）说，如果我们每月可以得到一万吨的军需品供应，我的飞机就能炸沉或者严重损伤一百多万吨的日本船队。罗斯福总统用拳头在桌上一击，高兴得哈哈大笑：‘如果你能炸沉一百万吨，我们就能要它的命。’”至于史迪威提出的没有一支重新整编和重新装备起来的中国军队，中国的空军基地将无法对付日本袭击的警告，史迪威后来回忆说，总统反驳道：“在政治斗争中，由于担心你的敌人会报复而限制自己的行动不是明智的战术。”蒋介石委员长当时向罗斯福总统保证，如果敌人试图从陆地向空军基地进攻从而干扰空战，现存的中国部队将会制止这场进攻。

结果是罗斯福总统命令急剧地改变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物资的优先分配权。自 1943 年 7 月 1 日起，每月首批运入中国的四千七百吨军需品将分配给陈纳德的空军部队。在充分满足了他的优先供应之后，余下的二千吨才被用于其它各种目的，包括陆军。[17]由于宋子文和副总参谋长约瑟夫·T·麦克纳尼将军之间的特别协定，在 1943 年 7 月至 10 月期间分配给陆军的空投物资是每月五百吨。陆军部 1943 年 7 月 8 日的对华租借法案为史迪威军队改革计划中第一批的三十个师分配了装备，但是第二批的三十个师仅给了所需要装备的百分之十，因而被认为是用作训练的象征性的物资。史迪威训练第二批的三十个师的计划受到挫折。

罗斯福倾向于陈纳德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阻碍了史迪威为进攻缅甸或者保卫“华东”机场而重新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努力。史迪威在一篇没有注明日期的日记中对总统的这个决定评论说：“除我之外，没有人对建设一支陆军这种单调无聊的工作感兴趣。陈纳德保证在六个月之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为什么不给他所需要的东西呢？这是走向胜利的捷径。”

值得注意的是，陈纳德和史迪威支持他们各自计划的论点都纯粹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但是当罗斯福总统决定支持陈纳德计。划时，他却不仅是从军事上的考虑出发，而且还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虑。从军事上看，他强烈地支持能够取得迅速而决定性胜利的空袭。从政治上看，他感到有义务无条件

地支持蒋委员长，即通过批准蒋介石—陈纳德的空袭计划来提高中国的士气。这种与蒋打交道的办法基本上来源于罗斯福使中国继续参战的焦虑心情，我们在下一章将尽力说明这一问题。可以指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官员强调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军队改革计划对中国的国内稳定有着重要的政治含意，他们热衷于直接的军事成绩和速胜的思想阻碍了史迪威计划的实行。

在华盛顿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前夕，罗斯福总统决定支持陈纳德计划。这再一次表明美国情愿支持可在战场上速胜的计划，而放弃对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促进中国国内稳定的计划。从中国成都起飞的B—29型轰炸机特种部队轰炸日本的麦特洪计划，无疑是包括在这样的美国军事战略范围内的。

麦特洪计划是由美国空军部队于1943年8月拟订的。在与中缅印战区的乔治·E.斯特拉特迈那少将商榷之后，他们修改了计划，把加尔各答地区作为B—29型轰炸机的基地，并途经中国空军基地去轰炸日本的炼焦设施。美国错误地认为，这些炼焦设施是日本钢铁工业的命脉。罗斯福总统满怀热情地批准了这个计划。B—29型轰炸机可以携带自己的军需品到中国，因此不会给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增加负担。尽管如此，在实际上，从1944年2月至10月期间，空运指挥部为支持这一计划经喜马拉雅驼峰向成都空运的物资达到一万七千九百三十一吨。说麦特洪计划比军队改革计划更重要，可用以下事实加以说明：这个吨数相当于1942年5月至1944年10月为中国军队空运物资的总吨数。事实上，在1943年11月之后，即使是陈纳德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在空中作战的优先权也降到了第二位。

罗斯福总统开始时赞成陈纳德从中国空袭日本并击败它的计划，并冷落了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但以后他又赞成使用B—29型轰炸机轰炸日本的麦特洪计划，又把陈纳德的计划搁置一旁。这时，罗斯福总统做出了两个军事决策，而这两个决策如果仅仅从军事上考虑，已被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三叉戟”会议前夕关于在驼峰空运的吨位中给陈纳德以最高优先的待遇的决定阻碍了建设一支新的中国军队的工作，而它却使陈纳德能够给日本以重创，以致引起日本从1944年4月至12月向“华东”空军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实现了史迪威关于日本将对“华东”空军基地作出反应的预言。

日本这次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从陆地上夺取并摧毁陈纳德的作战基地。军队改革计划的毫无进展和陆军军用物资的转移使中国军队对保卫空军基地的任务感到措手不及。日军不仅占领了“华东”所有的空军基地，而且一度似乎对国民党政府的生存构成威胁。这是持续了七年的中日战争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而蒋介石—陈纳德空袭计划的实施，无疑是导致“华东”空军基地的灾祸的主要原因。导致这场灾祸的另一个因素是蒋委员长拒绝为那些守卫“华东”的军队调运军需品，因为他怀疑这些军队的将领对他不忠，并在策划叛乱。

尽管陈纳德的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招致了日本对“华东”的进攻，占用了中国陆军的军用物资，但是，他的飞行员毕竟通过袭击日本的运输线和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而英勇地、虽然是不成功地阻挡着日本的强大攻势。相比之下，使用B—29型轰炸机的麦特洪计划不仅严重地损耗了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物资，而且它对守卫“华东”毫无贡献，对最后击败日本的贡献也不足挂齿。在日本刚刚开始发动进攻“华东”的战争的第一阶段，史迪威就提

出。陈纳德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成都的 B—29 型轰炸机的机场，“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袭击日本的船队和无法支持中国的地面部队。一切都将取决于日本对成都地区的战斗的反应。”

在整个 5 月和 6 月期间，蒋介石委员长一再要求把为 B—29 型轰炸机提供的军需品调拨一部分给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支持守卫河南和湖南的中国地面部队。6 月初，史迪威被蒋介石的恳切要求所打动，他甚至向陆军部提出，允许他们在局势恶化时，使用 B—29 型轰炸机的军需品贮备的要求。陆军部是这样答复史迪威的：

我们认为，早期的对日轰炸对中国的局势将产生更加有利的影响，因此把军需品贮备调拨给陈纳德而使这一行动长期延误是不可取的……况且，第二十轰炸机大队（B—29 型轰炸机）是一支强大的队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它趋于地方化，就像我们不得使太平洋舰队地方化一样。请切记这一点。

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对这个答复评论说：“无疑，这是声嘶力竭地推销战略轰炸的信念。”他们或许只需要再加一句话：无疑这最清楚地表明，美国急于速胜而完全不顾政治上的考虑。

几乎在同一时期，陈纳德提议动用 B—29 型轰炸机对日本进攻“华东”的主要军需品物资基地汉口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他坚信，在 B—29 型轰炸机的帮助下，他能够阻止日本的进攻。史迪威正式批准了他的方案。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阿诺德将军拒绝批准这个请求。于是，在“华东”局势处于日益危急的时刻，B—29 型轰炸机的首次飞行任务却是轰炸泰国曼谷的铁路工场。在中国湖南省的要塞长沙失守三天以前，B—29 型轰炸机在袭击九州岛的钢铁工业设施。在整个日本的“华东”攻势期间，以中国为基地的远程轰炸机屡次执行飞行任务，目标是轰炸日本本土、满洲、苏门答腊、福摩萨。

B—29 型轰炸机的作战不仅消耗了本可用于装备中国军队和陈纳德的空军的物资，以完成保卫“华东”的任务，而且这些轰炸对日本钢铁生产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们远远没有达到使日本钢铁生产削减一半的目的。《战略轰炸评论》就这种作战的有效性作出结论说：“除电炉钢外，钢锭供应的下降不超过百分之二，成品钢的下降不到百分之一。”

在接近年底时，艾伯特·魏德迈将军接替了史迪威，他最终获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可，动用一百架 B—29 型轰炸机向日本在中国的目标发起进攻。1944 年 12 月 18 日对汉口的大规模空袭极为成功。但是到那时为止，主要的“华东”空军基地已失守一个多月，国民党政权的权力和影响受到严重的破坏，日军不久便主动地从他们的前沿阵地撤下来。因而，姗姗来迟的成功已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赋予 B—29 型轰炸机计划以最高的优先权直接地表明了太平洋进行主要战役的战略思想，开罗会议的最高级会谈对此予以确认。这符合了从那时起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就是支持跳岛进攻作战这一军事概念。分配给 B—29 型轰炸机的物资不肯调作他用，与 B—29 型轰炸机本身未能被用于延缓日军的推进，再次反映了开罗会议之后军事战略和政治方针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这种情况的另一个表现是最终放弃了史迪威的第二批三十个师的训练计划，和作战部对史迪威军队改革计划的意义越来越不以为然。1943 年 11 月，史迪威在中国推进第二批三十个师的计划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训练第二批三

十个师的桂林中心即将建立，他请求陆军部对租借法案进行审查，希望得到对全面装备第二批三十个师的坚定承诺。陆军部拒绝了他的请求。拒绝史迪威的请求的作法也是符合美国的领导层长期存在的战略思想倾向的。如前所述，各军事规划机构在 1943 年 10 月考虑的问题是越过中国，通过太平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作战部的战略科建议，不再对中缅印战区作更多的承诺，受训和被装备的中国师不得多于三十个，此外，在“华东”开始训练第二批三十个师时，可增加装备三个师物资。作战部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显然没有认识到史迪威的六十个师计划的政治含意。美国把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忘得一干二净。

在开罗会议上，蒋委员长和史迪威从罗斯福总统那里得到了最终装备九十个师的口头保证。但是军方对装备九十个师的计划所持的冷漠态度在它对总统的保证所作的解释中暴露无遗。作战部对马歇尔将军说：“其实，总统只是说说而已，根据租借法案所作的装备中国师的承诺是不得而知的。总统对提供装备的物资的时间和数量并未作出任何承诺，我们是以这一设想为出发点的。”这种解释机械地看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它给史迪威重建中国军队的希望又设置了一道障碍。

开罗会议之后，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在美国的优先计划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不重要。1944 年 5 月 3 日，史迪威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要求中缅印战区执行一项新的任务：为即将开始的西太平洋作战提供空中支援。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地承认，为即将开始的空战而储备的后勤支援，需要大幅度地削减为中国地面部队提供的越过驼峰的空运物资。5 月 24 日，史迪威就他是否将继续执行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一主要任务提出质疑。5 月 27 日，马歇尔回答说，美国希望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史迪威在最近的将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太平洋的我军对敌进行主力决战时，给予最有效的支援”，即使这个任务干扰了他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的“主要任务”。颁发这些指示的时候，日军已经发动了占领“华东”空军基地的攻势。

尽管史迪威屡受打击，但他为重新建立一支中国新军所付出的坚持不懈、不畏艰难和呕心沥血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在印度拉姆加尔的训练后，三个精锐师出现了，1944 年 4 月，又有两个师被空运到缅甸，在史迪威的指挥下作战。部分受训和得到部分重新装备的驻云南军的十五个师，在卫立煌将军的指挥下，参加了萨尔温江战役。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追随了同样的目标。在史迪威的基础上，魏德迈重新整编和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努力取得一些成绩。美国官员或作为高级顾问，或作为一般观察员逐渐被安插进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门。魏德迈与史迪威一样劝告蒋介石把他的 327 个师压缩为 84 个师，他建议说，这样美国便可以训练和装备其中的 39 个师。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到 1945 年 2 月，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对中国作为大国的前景产生了重大的怀疑。从政治原因考虑，军队改革计划的急迫性也不复存在。

况且，时间匆匆流逝。代理副参谋长的一份备忘录表明，装备 90 个师的军队改革计划所必需的物资中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物资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前交付给中国政府。其它的用于中缅印战区的物资大约有三分之一还未转交给中国政府；大约五分之一的物资在来华途中；其余的尚在美国。[18]国民党政府就其本身来说未能迅速采取行动，训练军队。在建立有效的后勤支援

和兵员补充系统时行动缓慢。这样，在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既没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没有给作战部队提供给养的能力。

虽然史迪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军队改革计划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之间的关系，但值得怀疑的是，无论是他还是其他美国官员是否看到一支装备精良、受过彻底训练的地面部队作为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工具所具备的潜在价值。美国的政策是制止中国内战的爆发，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以达到有效地进行对日战争和维护战后和平之目的。然而，不管史迪威的意图如何，如果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采取了必要的改革措施，创造了最低限度的政治条件，那么史迪威计划的早日实现或许会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一个作战机会，使它在中国的某个部分得以生存下去。当美国一旦充分地认清苏联的侵略意图和正确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时，史迪威计划的早日实现或许会给美国提供一个在中国更加可靠的军事工具，以反抗共产主义集团的威胁。1945年，国民党军队的人数的确是以五比一超过共产党军队，它们的装备也比对手更加优越。同样真实的是，史迪威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本身不会使国民党政府免于毁灭。正如一位在共产党根据地的美国观察家所报道的那样，美国训练的部队在有效地对付共产党的游击战方面也许是能力有限的。但是，如果美国在战后采取了不同的对华政策，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在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时就会成为军事和政治解决方法的组合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无疑，中国的冷漠和抵制是史迪威失败的主要原因。然而史迪威的挫折也来自一种普遍的看法，即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从军事上击败敌人。这就使美国不能从战后的力量均势出发，坚定地掌握战争的政治目标，不能使军事活动与政治方针协调一致。对我们来说，史迪威军队改革计划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最清楚地表明：美国全神贯注地考虑的是战争中直接的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忽略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美国还不习惯以政治上的主次来思考问题，它总是让取得速胜的愿望主宰战争中的一切行动。结果是它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因为不播种便没有收获。

第四章压力策略与有限地、但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1. 外交政策的局限性和与蒋打交道的方法

回顾历史，无论美国怎样有效地使它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方针协调一致，显而易见，仅仅靠动用地面部队和提供大规模援助仍是不会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决定他们国家的命运。然而，美国向中国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的作法，却能够支持一党反对另一党，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在一定的范围内，美国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这主要由美国对待中国各政治力量的方法所决定。

美国处理中国国内局势的方法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冲突。我们将在第二部分探讨这个问题。第二是给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的方法和处理国民党中国的权力之争。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怎样对待蒋委员长本人。在分析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的态度时，对这两个问题加以区分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蒋委员长和他的美国朋友坚持认为，给蒋提供无条件的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战胜中国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这种观点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而这种混乱由于蒋往往对共产党人的阴谋草木皆兵，或又不顾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而姑息共产党人而变得更加复杂。为了使他的看法为人所知，他借助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美国官员和中国的政治家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事实上，蒋拒绝进行早该实行的改革恰恰为共产党上台制造了可乘之机。他对中国反共的政治家们的镇压，对那些对共产党人抱有不同程度幻想的人的镇压，使这些人认为，共产党是两害中的较轻者。于是，这些人被驱赶到共产党的怀抱之中。蒋成功地抵制了美国的劝告和改革的压力，在美国官员当中引起严重的灰心丧气和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在决定撤离中国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只要美国无法说服蒋或者强迫蒋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他的政府表现出生命力，只要美国在帮助组织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以取代蒋时未能使他下台，那么，有效地使用美援的必要条件就不存在。从共产党那里挽救蒋似乎并不是个有价值的、符合道义的事情——而这个看法直到四十年代中期还影响着美国在各种场合所作的重大政治和军事上的允诺。以抵制美国劝告的独裁统治者为首的，腐败、压制性的和垂死的政权的形象，是使美国不愿在战后的中国诉诸武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这个因素之外，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想主义的传统和美国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关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与力图支持、同时又加以改造的中国政府的关系当中，美国与蒋打交道的经验表明：出现了两种性质相反的问题。一方面，蒋政权和蒋委员长本人在抗日战争中完全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取得胜利；而在战后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他们又完全依靠美国的支持才得以生存。这种依赖性为美国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使它能够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最大阳疲地施加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美国要对付精通政治权术的蒋委员长，这个政治权术大师把他的政权的弱点恰恰变成了他在外交上的力量，而这种外交上的灵活性成了美国在中国的一切努力的障碍。蒋以中断联盟的威胁作为王牌来支持他提出的各种要求，并以此抵抗美国的压力。

考虑到这些性质相反的问题的同时存在，美国的政治技巧如何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限定了范围。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国既不能说服蒋为其

政权的生存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也不能促使产生新的政治力量以取代蒋。这种状况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出现的，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召回史迪威。

2. 罗斯福总统起初反对等价交换政策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许多美国官员在似乎是互相抵触的力量的推动下，寻找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寻找与他们的中国盟友共同工作的正确方法。美国深刻地感到，组成伟大联盟的各国的利益会自然地融合为一体，美国和中国尤其是这样。但它过高地估计了其他国家因战后需要经济援助而对美国的依赖性，忽略了国家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它自鸣得意地允许中国政府的政策占上风，而未用各种手段实现美国的目的。

当政策冲突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时，美国却在意志的较量中退缩了，它由于过分害怕失去一个盟国而放弃了积极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权力和影响并未完全用于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表面上看，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融合已再完美不过了。难道美国没有公开表明它遵循使中国成为大国和在战后使中国成为远东的稳定力量的政策吗？难道美国没有不顾英国和苏联的满腹狐疑，坚持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并在联合国理事会赋予它重要的职位吗？难道美国没有对日本采取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和使中国收复失地的政策吗？难道美国没有主动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并使英国也效仿了它的榜样吗？难道美国没有重新修订它的移民法，批准了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的名义定额，从而消除了仇视的根源吗？

然而，美国在中国所面对的这位政治领导人却把反对外来压迫的合理怨恨情绪和合法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仇外主义和沙文主义，只要环境允许，他就倾向于努力推进自己的利益。他的要求和愿望往往远远超过别人所愿意满足的范围。况且，这两个国家在文化传统、历史经验、民族特性、政治观点、制度和社会结构上有着巨大的差距。即使目标完全一致，办事的方法、程序和速度上的实际差别也是不可回避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了各种分歧。首先是中国提出的向中缅印战区提供更多装备和兵员的要求与美国在先欧后亚的全球总战略下无法给予满足的矛盾。其次是美国要求中国采取更多的行动而中国在急剧恶化的政治条件下却无法作出更多的贡献。第三是，中国的统治集团紧握特权的自然愿望与美国动机虽好、但却以错误的、试图说服他们进行改革的作法之间的矛盾。最后一点是，美国的急躁与中国的惰性、美国的简单和中国的复杂之间的矛盾。

这样，尽管美国有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但是在战争时期，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比与其他任何盟国的关系都紧张。由租借法案、蒋委员长的三项要求、史迪威和蒋委员长之间的争斗所引起的争论和关于汇率、军队改革计划、缅甸战役的争吵——双方的冲突就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反映了出来。当美国致力于消除或减少政策冲突，使各种利益趋于一致时，国民党政府却以少有的自以为是和有恃无恐的态度极力促使美国同意它的要求，它对联盟可能出现的破裂毫不介意，既然利益和政策上的冲突不会随主观愿望而消失，也不会被驱散，因此美国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当美国处于明显的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时，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往往还是会取得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熟悉中国事务的大多数在华美国官员和在华盛顿的许多

美国官员都不同意这样处理与蒋委员长的关系。相反，他们强烈敦促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采取被两位作家称为等价交换的方法，或者压力策略。他们离中国舞台之近，对计划和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的责任感之强，使他们无法忽略各种目的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他们熟知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策略和中国官员复杂微妙的回避拖延办法，因而，他们不相信忠告、说服、规劝以及随意赐以恩惠会使中国对美国的愿望作出让步。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确信，如果要在中缅印战区的军事活动作为迫使国民党政府转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的杠杆，以美国的援助来换取中国的行动，以中国完成任务的成绩来决定美国的活动。

1941年7月，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很久，马歇尔将军就建议美国在关于陈纳德的美国志愿队的指挥和参谋机构职能问题上，及在由美国驻华军事使团团团长马格鲁德将军控制美国志愿队的问题上，以租借法案中的训练中国空军的计划作为交换条件来取得中国的保证。1942年5月，美国和中国在租借法案中中国所得份额问题上发生争执，马格鲁德将军建议严格控制租借法案的使用，以租借法案为杠杆，换取蒋委员长同意在特定和有限的范围内重新组织地面和空中部队。

等价交换政策的主要的和最持久的倡导者无疑是史迪威将军。1942年7月，史迪威拟定了一个夺回缅甸的作战计划，并建议重建一部分中国师。他以如下的话向陆军部说明了他的态度：

为了履行增强中国军队战斗力的使命，我必须以讨价还价作为行动的基础。逻辑、推理、个人影响都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施加压力和讨价还价是必须使用的手段……尽管其他战区对我们的资源提出巨大的要求，但是只要陆军部认为有必要保持对日本的压力，那它就应知道中国愿意作出什么样的贡献。而确保中国作出贡献的唯一办法就是提出计划并使中国人对这个计划承担义务。

不久，他在给马歇尔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应该从为他（指蒋介石）做的每一件事中得到他的承诺。”

史迪威的助手弗兰克·多恩上校对这一点说得更为具体。1942年8月，他在将史迪威的一份军事计划递交给陆军部时对托马斯·T.哈迪少将说：

我们都认为必须“在最后通牒的基础上”与蒋委员长打交道，必须以直截了当的语言告诉他，他必须做什么，并且必须给他很短的决策和答复的时间。如果他威胁要与日本媾和，告诉他请便。极为可能的是他会被日本人所嘲笑。除此之外，由于中国的日占区和非日占区之间通讯和大量的贸易往来，秘密媾和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钨砂的装运量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的原因。日本人出的价高了一点。

这段话措词激烈外，还对许多在华的美国官员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媾和的可能性及后果的看法作了有趣的揭示。史迪威本人同意，蒋介石不会与日本单独媾和，但却会试图利用日本的和平花招“和我们再一次开玩笑”。史迪威是一位别具一格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以自己对美国的盟友所持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在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的强硬态度感到自豪。史迪威在一篇显然是开罗会议之后写的题为《笨拙外交》的未完稿中写道：

我们对这场（国际政治）角逐的根本概念是错误的。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的天性是光明正大的；我们愿意迎合别人，愿意交朋友。我们忘记了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对骗子来说有着永久的诱惑力。我们容易忘记过去的经验，却天真地希望将来会更好。在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所需要的良药就是一片现实主义态度，而且俄国问题就是个好例子。你注意到他们是怎样做的吗？他们是直言不讳的。为了使别人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不是说：“亲爱的大使先生，请接受我真诚的祝愿，愿我们这两个伟大的国家之间目前这种和睦相处的关系万古长青”等等。等等，而仅仅说：“如果你们现在不把那些军队赶出 Shinegaz-abo，我们就要赶走他们了。”也许这种粗暴的态度是令人遗憾的；但是它却格外地有效。你还记得解决日军侵犯西伯利亚这个棘手的小问题所使用的外交妙计吗？那份电文说，“如果你们日本人的猪嘴还在我们的菜园里乱拱，那可太糟糕了。”日本人不需要礼宾官对此做解释，就知道他们的处境如何。

我并不是建议我们采取一种粗暴和好战的态度；我仅仅是建议我们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思想态度，因为生活毕竟是现实的和严肃的……。

史迪威的现实主义是原始的和粗糙的；他的强硬态度是缺乏鉴别力的；他对外交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他固执己见和努力推行他意念中的美国利益的作法是过分的；他的语言是不严密的和不精确的；他的比喻是不贴切的；他对外交史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但是在上面所引的这段话中却包含着一点真理，它说明只要出现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某一时期必须通过运用实力加以实现。

史迪威的等价交换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之间展开一场意志的较量。不难想象，史迪威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中所存在的长期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由于缅甸战役风雨飘摇的命运、“华东”的军事上的失败，在任命指挥官、甚至在共产党问题上所发生的直接冲突，还不如说是由于史迪威的等价交换政策和压力策略。

如果史迪威的政策和策略与机智、礼遇和斯文结合起来，如果这种政策得到美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批准和坚定不移的支持，那么成功的可能性还会大一些。这些个人品质上的优点在史迪威与蒋委员长较量时将会使他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史迪威避免将感情和个人色彩注入现实，这将使争议各方对问题保持一种相对来说公正与合理的认识，并在冷静地估价各种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方案。然而“刻薄的乔”对蒋委员长和中国政府的尖刻和辱骂似的评论很快就在重庆不胫而走，并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感。在华盛顿这些评论也危害了史迪威的政策。罗斯福总统曾反复警告他不要对中国领导人表示出不尊重的态度。[19]更重要的是，史迪威缺乏智谋的作法往往与正确地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方法混杂在一起。因此，正确地对史迪威个人的缺点提出批评的人往往也不赞同史迪威所提倡的正确的政策。尽管这一政策得到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定不移的支持，但是它至少在一开始就被罗斯福总统、总统的亲信和他的驻华使者所全部否定了。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总统开始赞同史迪威的观点，并采纳了史迪威的方法，但他未能在最后的危机中坚持到底，以致终于召回史迪威。结果，美国未能在中国实现它的意图。而蒋在国民党中国与美国的并不相称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为达到他的目的却利用了罗斯福——事情本应颠倒过来才对。

乍一看，这种结局是十分令人吃惊的。因为罗斯福在美国政治中表明他

自己是“狐狸”、是干练的策略家和机智的操纵者。在利用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方面，他是计谋高超的，在不断地变换策略以避免对可疑的政治问题作出承诺方面，他是“狡猾的脱身者”。但是，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罗斯福诡计多端，但是他相信行善，并告诉别人怎样行善，他认为最终人们是都会行善的。”在国际事务领域和国内事务领域一样，他致力于维护他的精神领导。用乔纳森·丹尼尔的话来说，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坚信“美国对全人类有着道义上的义务这种美国式的天真想法”。然而在国际事务中，他在政治和组织机构方面的精神领导与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这种精神领导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此外，他的对华政策是在传统原则和现实考虑的范围内制定的，而这就严格地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1933年，罗斯福就职后在科德尔·赫尔和萨姆纳·韦尔斯的帮助下，制定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具体应急政策，这就是睦邻政策。睦邻政策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使它没有必要公开诉诸实力以保护它的根本利益时，这一政策消除了“帝国主义美国佬”的暴行和陋习。它逐渐被认为适用于西半球以外的任何地方。罗斯福开始把自己当作是世界的好邻邦。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助手们认为睦邻政策也适用于情况截然不同的中国。他们的决策和政策声明曾不止一次地以这一基础为出发点。国务卿赫尔认为美国于1937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行动“仅仅是适用于西半球的睦邻政策的一种继续”。1937年7月15日，他发表了“美国在中日战争中的立场”这一著名的声明。声明主要以193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提出的“八大和平支柱”的纲领为基础，实质上是重新闻述了睦邻政策的原则。1943年10月1日，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废除排华法的咨文，把需要采取的行动称为“实现我们把睦邻政策的原则应用于同其他人民的关系这一目标的保证”。

与中国成为和睦邻邦的愿望由于美国传统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得到极大的加强。这一政策包括领土完整和不干涉的原则，而赫尔认为，这些就是睦邻政策的实质。太平洋战争以前，不干涉原则是美国多次攻击日本的道义上的武器之一。民族自决权是《大西洋宪章》的奠基石。《莫斯科四国宣言》的第六段旨在保护中国不受外来的军事干涉，它也是基于不干涉原则的。

对这些原则的重申使任何干预中国内政的行动都面临着强大威慑力量。对中国内政的干预与采纳史迪威的压力策略以达到美国改革中国军队、并任命一位美国人来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目的之间的界限，似乎是十分细微的。因此，国民党政府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声疾呼总能在美国各界找到洗耳恭听的人。

在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美国官员总是极力主张保持一种所谓完美的记录，并希望保留与中国的传统友谊。宋子文的密友、陈纳德的崇拜者、史迪威的批评家哈里·霍普金斯写道：“美国由于主张门户开放政策，多年来在中国有着绝对清白的记录。我们必须把这种记录保持下去。”同样著名的是罗斯福总统极为重视美国与中国的长期友谊，他对“中国人的确喜欢我们”感到满意。这些感觉部分出自传统政策，部分由于个人观察上的误差，它们只会使总统对中国政策的看法误入歧途。因而，不干涉的传统政策与伴随而来的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事实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因为这一政策的另一面，是有必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迫切需要的行动。

这些来自传统和原则的考虑，出于截然对立的实际原因，否决了史迪威的压力策略。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成为世界的头号强国后，美国官

员强烈地意识到它的巨大威力以及其他国家在军事和经济资源上对它的依赖。有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性很强,因而没有必要使用压力。劳克林·柯里,罗斯福总统主管对华租借法案的行政助理和霍布金斯的助理,曾在1941年和1942年期间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41年秋,当马歇尔第一次提出试图以租借法案作为讨价还价的法码时,柯里否定了他的建议。他写道:“考虑到中国依靠我们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援助这一点,预计不合作的困境是不会出现的。”霍普金斯对与中国全心全意的合作是如此的确信无疑,以至于在史迪威将军为履行他布满恶运的使命而赴华之前,他对史迪威说:“我想你将指挥军队。其实,如果蒋介石请你指挥中国军队,我也不会为这件事感到吃惊。”而我们不久就要谈到的问题是,史迪威当时没有,以后也没有能够指挥中国军队,而且恰恰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指挥问题,蒋委员长在两年半之后要求召回史迪威,并达到了目的。

1942年9月,陆军部为罗斯福总统起草了一篇电文,要求蒋介石委员长以史迪威为顾问,执行三十二个师的改革计划和重新整编中国军队以取得租借法案的援助。但柯里再次否定了这一电文,而罗斯福总统准许了他的否定。柯里对陆军部电文的否定与他早先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建议是一脉相承的:“我认为,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援助规定任何附带条件。”

柯里在中国问题上与史迪威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自然也就成了史迪威的批评者。1942年底,他提出从中国战区召回史迪威的建议。虽然柯里召回史迪威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是罗斯福总统却沿用了他的总的看法,而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史迪威在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时的有利地位。柯里对待蒋介石的方法是符合罗斯福总统的性情的。史汀生和邦迪在评论罗斯福总统与俄国人打交道时说:仍心胸狭小和争吵不休不是罗斯福总统的天性,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是最幸运的,但对那些努力使合作成为双方的下级官员来说,又是极为不利的。”

罗斯福总统反对等价交换政策还有一个原因,它与刚才提到的原因是截然相反的。这就是他感到,强硬的政策是无效的,是与蒋介石委员长打交道的错误方法。1943年3月8日,罗斯福总统向马歇尔将军有力地表达了这一观点,那时他还否决了马歇尔和史迪威的意见,批准了蒋的由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和空战高于军队改革计划的要求。罗斯福总统给马歇尔的一封信说明问题的信值得我们加以大段引用:

……史迪威与蒋委员长打交道的办法恰恰是错误的,我们毕竟不能指望一位中国人使用和我们一样的方法。当史迪威谈到蒋委员长脾气暴躁、难以驾驭、得寸进尺等等时,无疑他是正确的;但是当他谈到要以更加严厉的语调同他说话时。他恰恰是采取了错误的方式。

我们大家一定还记得,蒋委员长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万万人民公认的领袖——要使各种各样的领导人达成任何形式的一致都是极为艰难的工作——这些领导人包括军人、教育家、科学家、公共卫生官员、技师,他们都在为地方和全国的权力和统治地位而争斗不休。我们要用几个世纪才能取得蒋委员长在中国仅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取得的一切。

此外,蒋委员长认为有必要维护他的最高统治地位。如果你和我身临其境也会这么做的。他既是总裁,又是总司令,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用严厉的语调说话,也不能以对付摩洛哥的苏丹的办法,强迫他作出承诺。

在这封信中，罗斯福总统对蒋委员长在中国的最高统治权表示关心，然而他对蒋介石政府在共产党的挑战面前是否能够维持最高统治权的问题，却没有给予同样的重视。他也没有看到，蒋的统治方式被允许继续下去，军队改革计划被置于次要地位，将会给美国的利益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罗斯福总统对蒋委员长的政治才能和过去的成就表示了赞赏。然而他并未完全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这些成就是不会长期保存下来的。他也没有看到，如果要实现美国的目的，就要对蒋委员长的外交和政治手法加以限制。

罗斯福总统对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表现得犹豫不决的背后是一种恐惧感，他害怕蒋介石在重压下会与日本单独媾和。对单独媾和的过分恐惧就是最初否决压力策略，此后虽采纳了这一策略却又未能付诸实施的主要原因。罗伯特·舍伍德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他在《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一书中谈到，1943年春罗斯福总统决定支持陈纳德而不是史迪威时写道：

……他（罗斯福总统）最主要关心的就是使中国继续参战并使美国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他在每个决策中都牢记着这些目标。他相信，只要俄国在与轴心国作战，中国共产党人就决不会向日本投降，而国民党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却总是存在的。无论如何，蒋介石是美国政府必须对付的政府首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史迪威的频繁干扰，保持友好关系也是困难重重的。因此，不管史迪威是否有理——而他肯定是理由充足的——毫无疑问，他是个最讨厌的家伙，罗斯福曾几次踌躇要召回史迪威。

国民党政府在关键时刻精明地利用了这种恐惧感。由于美国的政策是基于中美共同对日作战，基于依赖中国来保护战后美国的远东利益，因此这种恐惧感控制了美国的在华行动和对华行动。

罗斯福总统以他与俄国人打交道的办法对付国民党政府，他对这两者所作的努力都以惨败告终。他对国民党政府不是讨价还价，却愿意慷慨相待。从一开始，他就随意作了承诺而不要求回报。前面已经提到，罗斯福总统向蒋委员长作了战斗到底、收复失地的口头保证。早在1942年2月，他就向蒋委员长提供了没有附带条件、不要求报偿的5亿美元的贷款。人们的希望是：这笔贷款将加强中美关系，并使史迪威更加顺利地履行他的任务。当然，史迪威在华任务的成败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他是否能得到中国军队的指挥权和他是否有办法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合作。美国未能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有关史迪威的权限范围的明确答复，这便使它无法对1942年1月29日和30日宋（子文）—史汀生的含糊其词的交换信件提出增补。这些信件中国国民党政府仅仅保证，它将任命一位美国的军方代表担任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他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将指挥“指派给他的那些中国军队”。

大约在同一时期，跨越驼峰的空运服务系统建立了起来。10月，罗斯福总统允诺向中国战区提供500架飞机，1943年初，又通过喜马拉雅驼峰再增加100架。1943年3月，陈纳德指挥的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立，美国向中国保证每月通过驼峰空运1万吨军需品。在1943年5月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决定顺从蒋委员长的意图，把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排到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之前。会后，美国保证“除时间和环境的限制外，将不对上述战役（即夺回北缅甸的战役和把跨越驼峰的空运增至每月一万吨）施加任何限制，这些战役的目的就是解除对中国的围困。”1943年11月，B—29型轰炸机的计划在中国开始实行。在开罗会议上，中国正式得到了收复失

地的允诺。罗斯福总统对装备和训练 90 个中国师也作了口头保证。在美国本身作出这一切承诺之后，国民党政府却并未对美国作出任何具体的保证，表示它将采取美国所希望的行动和政策。

史迪威对采取这种办法与蒋介石打交道满腹牢骚。美国的信口许愿使他无法施加压力。当罗斯福总统与蒋谈起 B—29 型轰炸机方案时，史迪威写道：“FDR（罗斯福总统）又在挖我的墙脚。把《黎明》计划（B—29 型轰炸机方案）的一切都告诉了‘花生米’（蒋委员长），这样我就不能拿它讨价还价了。”不久，蒋夫人错误地告诉他，罗斯福总统已答应支付修建 B—29 型轰炸机机场的一切费用，当时史迪威满怀憎恶地写道：

又一个愚蠢的让步精神的例子向他们证明，我们是笨蛋。“我们将加上 VLK（极远程）轰炸机”（没有讨价还价）。接着“我们支付修建机场的费用”（没有讨价还价）。空运也是这样——没有讨价还价的允诺。为军队提供装备也是这样——光作允诺而没有讨价还价。第十四航空队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这样。

最糟的是美国的信口许愿使它无法按时实现这些诺言。过驼峰的吨位和在中国的飞机架数总是低于保证的数字。租借法案需要调整，已分配给中国的租借法案物资的那部分又重新为美国占用——这一部分是出于其他战区的要求，一部分是由于缅甸失守而无法向中国运送这些物资。罗斯福对不能实现诺言极为关注。仅举一例，蒋委员长曾向华盛顿递交一份措词强烈的抗议书，抱怨“三叉戟”会议关于建立第十四航空队的决定没有付诸实施。罗斯福把蒋的电报给马歇尔一阅时加了这样的批语：“我对印—中战区的事仍然感到非常厌恶……好像什么都出了差错。但最糟的是我们每次都失信，我们没有实现任何一个诺言。”甚至史迪威也不时抱怨违反诺言的行动。在一支重型轰炸机队从中缅印战区调往埃及时，他于 1942 年 6 月 5 日写道：“我们现在能对蒋委员长说什么呢？我们未能履行我们的任何承诺，却轻率地对他说，只管干下去，老兄。”

结果，美国忙于向蒋委员长解释违反诺言的原因和向他道歉，而与他讨价还价便无从谈起了。史迪威被置于极其困窘的处境。他在无法运送物资的情况下要敦促蒋委员长采取行动。蒋本可以指出美国违反诺言而拒绝美国的建议和要求，他的确这样做了。在丘吉尔首相的坚持下，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计划被取消，而罗斯福总统曾在开罗会议上向蒋委员长保证履行这一计划。事后，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作出任何允诺都是致命的。”

在这种情况下，无怪乎史迪威重新整编中国军队的计划没有取得与他的努力成正比的效果。史迪威自己认为，他未能施加压力是计划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之一。1944 年 5 月，他向马歇尔将军澄清了这一点：

在中国，我的使命是增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基本计划是装备和训练第一批 30 个师，以后是第二批的 30 个师。在执行这一任务时，我从未使用施加压力的方法。我像开始一样，以个人的交往和影响，以争论和示范开展工作，解决问题。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它是如此地缓慢，以至需要从可能利用的时间、可能取得的效果方面予以评估。

蒋委员长与美国打交道的方法与罗斯福总统对合作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他最大限度地利用罗斯福总统方法中的弱点。蒋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观

点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他在 1944 年 2 月 27 日的日记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

时间是历史的创造者。悲伤和快乐、成功和失败都是暂时的，都会消逝……外交关系中的友好和隔阂、收获和损失不是永久存在的，不会一成不变。今日的损失可能是明日收获的基础。无论热爱还是憎恶、隔阂还是一致都不取决于感情，而取决于实力。如果有较长的时间，如果掌握着实力，便可操纵国际舞台上的一切行动。快乐和悲伤、热爱和憎恶皆取决于我。[20]

此外，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土地上，蒋介石是个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献身于孙中山的第一条原则的强烈的思想感情与他在实际上取消了孙中山的其他两条原则，民权和民生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关于民族主义，他曾写道：“在所有人类共同的感情中，民族的感情是最有价值的。民族主义的原则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与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不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西方的。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他把当今中国的一切弊病都归罪于西方列强，此书是为训练国民党干部和教育中国人民而写的政治教科书。他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倾向与他把自己的实权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等同起来的神秘感融合为一体，这就使他尽最大的努力推进这种利益。

这样，他的外交天才和擅长纯粹的现实政治的才能使他大显身手。在第一次中苏协定中，他利用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为自己的国的服务。而当他终于走上了称霸全中国的道路之后，当他像“挤柠檬一样”“榨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之后，他就把他们“扔掉”。他所做到的这一切与斯大林所计划的完全相反。[21]在这一时期，他以智慧战胜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革命家迈克尔·鲍罗廷，有才干的军人、战略家、外交家加伦将军，他毫不费力地使仅仅抵华才两个月的苏联军事顾问安德雷·S.巴布诺夫被召回。

在此之后，他请德国国防军的出色将领豪斯·冯·泽克特将军和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担任他的顾问。1937 年中日战争开始后，苏联几次向中国提供贷款，总数达两亿五千万美元，苏联的军需品也运往中国。一些才华超众的军事将领被派驻中国。其中包括驻华大使、克列门特·伏罗希洛夫元帅领导的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委员 M·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大使的继任，职业军人亚历山大·S.潘友新；武官、后来成为二次世界大战著名的苏联军队英雄乔治·朱可夫；蒋的顾问之一、后来成为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瓦西里·I.崔可夫将军。蒋委员长不给他们制定战略的机会，对他们的影响和作用严加限制。1942 年，俄国从西线溃退，这时蒋在新疆省主席盛世才的帮助下使中央政府重新控制了新疆，盛世才从效忠莫斯科转为效忠重庆，蒋再次打败了斯大林。到这时为止，日本成为蒋既不能击败，又无法战胜的唯一敌人。然而即使是日本也将在中国的泥潭里失去它的帝国。蒋在中国共产党人手中决定性的失败还在后面。

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蒋出于他的观点、背景和经验，自然会为他眼中的中国利益而极力奋争。他坚定不移地、一如既往地要求中国在制定全球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多的装备，却从不保证为击败共同敌人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对美国提出的行动要求或建议，他不是充耳不闻，便是要求加上附带条件，或者提出反要求，即使要求他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贡献是解中国之围的计划的一部分，也不例外。在与史迪威将军打交道时，蒋很可能认为

史迪威在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上不如他过去的外国顾问。蒋根据他与中外对手较量的丰富经验和各种经历，毫不费力地使史迪威出师不利，失去立足之地，史迪威的日记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蒋在与美国或与史迪威发生冲突时从不在任何问题上让步，除非迫不得已。在这些外交斗争中，罗斯福总统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和他对等价交换政策的否决帮助蒋旗开得胜。但是，蒋的明显的成功也必须归功于他使政治和军事上的不利变为外交优势的政治手腕。

确实如柯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为生存、胜利和战后的荣誉而依赖美国。但是恰恰是这种依赖激起了蒋的不满和他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他的不满和决心在几年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清楚地反映出来。他在 1948 年 7 月 26 日写道：

只要我对别国或者对外国人提出几个要求，表现出一些依赖，那么我势必会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不管他们的民族的性格是多么的善良和友好。所谓的平等、自由、公正是不会存在的。一个国家只有在不寻求帮助、不依靠别人的情况下才能够独立和自强，才能在世界上生存下去。[22]

因此，蒋发挥了他的外交天才，利用美国在击败日本和战后世界中赋予中国的重要作用，恰恰把这种依赖变成了政治上的优势。他似乎充分认识到，美国越认为中国重要，它就越怕中国士气低落、越怕中国政府垮台、越怕中国与日本单独媾和。每当蒋委员长向美国提出要求，否决美国的建议，或提出反要求时，他都要指出中国军事、经济、政治上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政治、军事崩溃。他的恳求往往是为美国所重视的。只要他觉得遭到冷遇，或与美国在政策上发生重大的冲突，蒋委员长便以暗示或公开威胁与日本单独媾和，或者脱离美国的办法来支持他的要求或拒绝。他的暗示和威胁一般都会带来美国的让步。

而且，蒋是分而治之的权术大师。他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官员之间的矛盾。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他支持陈纳德反对史迪威。他通过劳克林·柯里和约瑟夫·艾尔索普、通过包括蒋夫人在内的他自己的私人密使，赢得了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持。他个人的呼吁使 1944 年夏以罗斯福总统的代表身份访华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相信，美国应该任命魏德迈将军接替史迪威在华的主要任务。因此，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经历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危机。虽然这种危机由于他对蒋委员长的一次谦卑的认错而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却最终导致了他的召回，这并不是出人意料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的外交手腕就暴露无遗了。1941 年 12 月 30 日，蒋介石要求美国政府提供 5 亿美元的贷款支持中国的货币，以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蒋利用盟军早期在太平洋的失败和美国依赖中国牵制在华的日军的想法，巧妙地破坏了美国为贷款增添附带条件或对此保留某种控制的努力。1 月 9 日，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在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说道：

然而，坦率地讲，我与您打交道的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性的；

引进这种性质的贷款比引进租借法案更为重要。在采取这一行动中，至关重要的是及时，这样，在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急时期的最关键的几个月中，便可以表明，中国对盟国的信任与盟国对中国的信任是相等的。

蒋委员长通过新任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表明，贷款“应被视为是向反对共同敌人而战的盟国提供的，因此，美国在贷款的使用和偿付方式上不应要求担保或者附加其他事先规定的条件。”[23]美国以最快的速度批准了贷款，没有加上附带条件，没有保留控制权。然而，美国官员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国民党政府滥用了这笔贷款。它既没有制止通货膨胀，也没有极大地推进美国在中国的目的，而只是安抚了从贷款中获利的控制国民党政府的少数人。它并未减少史迪威与蒋委员长打交道的障碍，它并未使蒋委员长更加愿意倾听美国的忠告。它未以慷慨提供的美援去解除中国某部分人的经济困境，从而提高美国在中国的声誉。这笔贷款成了一个盟国向另一个盟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极好的反面例子。

1942年6月，美国政府命令原驻扎在中缅印战区的一部分B—17型飞机和运输机调往埃及，命令即将飞往中国的A—29型飞机空军小队仍停留在埃及。把飞机转向中东是为了阻止向前推进的隆美尔将军的军队。这一行动发生在蒋未能成为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和美国减少了中国在租借法案中的份额之后。于是中美关系突然陷入了危机，国民党领导人暗示存在关系破裂的可能性。蒋委员长在与史迪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声明：“中国战区没有得到重视。我自然想知道美国 and 英国是否认为它是盟国的战区之一。”蒋夫人以下样的语调结束了会议：“蒋委员长务必在7月7日（中日战争）第五个年头结束时，发表讲话。那时他必须把实情告诉中国人民。亲日分子是非常活跃的。盟军是否认为这一战区有必要存在并支持它，蒋委员长对此想得到明确的回答。”两天后，6月28日，蒋委员长致函史迪威，向美国提出“保持中国战区的三点基本的最低要求。”这些要求是：秋季派遣3个美国师到印度参加开辟滇缅路的战役；在中国保留有50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越过驼峰的空运量增加到5000吨。在蒋委员长与史迪威次日举行的会议上，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清楚他说明，6月28日的信件是最后通牒。史迪威和高思认为，蒋与日单独媾和的说法只不过是外交花招。不久，蒋委员长把他的要求降低到1个美国师，500架飞机和5000吨空运物资。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之后，罗斯福总统最终批准了蒋委员长关于中国战区的飞机数量和越过驼峰的空运吨位的要求，但否决了派遣美国作战部队的要求，因而结束了第一次重大危机。

尽管蒋委员长暗示脱离美国的作法是个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有效，但它一定给罗斯福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罗斯福总统似乎就意识到蒋是个难对付的人，这个人的愿望是不可忽视的，否则就会出现中国脱离美国的危险。因此，当蒋委员长于1943年2月7日提出在陈纳德将军的指挥下成立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时，罗斯福总统否决了马歇尔和史迪威的反对意见，在前面所引的信中告诉他们，他们“等价交换”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不能以这种严厉的态度对待蒋。舍伍德认为美国害怕中国与日单独媾和是导致罗斯福总统支持陈纳德，反对史迪威建议的主要因素。

蒋夫人在“三点要求”的危机时期不祥地提起活跃的亲日分子的作法既不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暗示或公开威胁脱离美国的第一次尝试，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提出“三点要求”的一次辩论中，宋子文预见说，如果美国取消3500吨的应急空中运输计划，盟国之间在中国战区的合作就会停止。之后，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阿诺德—萨默维尔—迪尔使团访问了重庆，希望在重新开辟滇缅公路的未来战役中取得蒋的合作，而蒋却（于1943年2月7日）向阿诺德提出一个“三点要求”的新版本，并要求提请罗斯福总统

予以批准。这些要求是（a）为中国战区成立独立的空军部队。（b）跨越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每月达到1万吨。（c）1943年11月，中国要有500架飞机。伴随着这些要求的又是单独媾和的暗示。前面已指出，罗斯福总统命令陈纳德成立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他也批准了蒋的其他两个要求。

在1943年5月，华盛顿“三叉戟”会议前夕，蒋委员长提议把跨越驼峰的空运吨位的分配优先权给予陈纳德的空军部队。陈纳德和史迪威都被召回华盛顿，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如前所述，罗斯福总统决定支持陈纳德的空战计划。他对马歇尔说，他提出支持陈纳德的原因之一是“在政治上，他必须支持蒋介石，因为在中国目前士气低落的情况下，空战计划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然而罗斯福总统并没有立即将他的决定告诉国民党政府。5月17日，宋子文参加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并声明，如果美国不认真地开始采取行动，以达到给中国解围的目的，并履行卡萨布兰卡会议以来所作的承诺，中国便与日本单独媾和。第二天早晨，宋被召至白宫，并被通知陈纳德在越过驼峰的空运中将享有最高的优先权，而且从9月1日起，越过喜马拉雅驼峰的空运将达到每月一万吨。因此，蒋委员长的愿望又实现了，单独媾和的暗示和公开威胁取得了成效。正如史迪威所说：“不断的让步使蒋委员长相信，他只要坚持，我们就会让步。”

3. 罗斯福总统看法的改变与他在史迪威危机中未能坚持这些看法

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总统逐渐地，但是明显地转向史迪威—马歇尔的对华看法。这种转变的原因可能是这样的：第一，蒋委员长提出过分要求和反要求的方法造成了积累性的影响。蒋委员长对美国的建议提出破坏性的条件和索取很高的价格，暗示和威胁与日单独媾和最终使罗斯福总统有所察觉。在开罗，虽然盟国作出慷慨的政治让步，但是仍然难以使蒋同意它们夺回北缅的建议，这可能使罗斯福总统理解到他早期的作法是徒劳无益的。蒙巴顿海军上将写道：“他们（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统）已经完全被逼疯了，以后，我无疑会从前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

第二，在德黑兰，斯大林重申了他早期在莫斯科对赫尔所作的保证，即苏联在击败德国后便参加太平洋战争。在开罗会议之后，苏联战略思想中的突然转移逐步导致了从太平洋岛屿进攻日本的具体和坚定的计划。中国在击败日本的战争中的军事重要性急剧下降。中国的作用被降为支持太平洋战役的辅助作用，中国的军事价值变成了为防止苏联最终不履行诺言的一种保险性因素。

第三，陈纳德—蒋的空战计划远远没有实现它的目标，而史迪威的北缅战役却似乎是个策略上的胜利。因此，罗斯福总统对蒋委员长的要求日益冷淡和不予接受，而越来越倾向于向这位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这种态度的改变表现在：（a）拒绝了蒋于1944年1月提出的要求美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或以二十比一的官方汇率支付美国的军事活动费用；（b）4月份向蒋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在缅甸采取攻势；（c）1944年夏，为使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作了不成功的尝试。

菲斯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详尽地描述了罗斯福总统改变看法的前两种原因。我们在此只需说，第一个原因表明，尽管蒋委员长实际上发出了最后通

牒以支持他的要求，但是罗斯福总统的坚定态度使他在汇率和战争费用上作了勉强的妥协。第二个原因表明，罗斯福总统措词激烈的电报在马歇尔将军停止向发动缅甸攻势的中国军队提供租借法案物资的命令的支持下，迫使蒋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不管北缅战役是否明智，第一次有力地贯彻等价交换政策却成功地取得了说服、讲理、让步所没有取得的效果。这是美国达到其明确目标的绝无仅有的一次。如果在一开始就采取压力策略推行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如果中缅印战区所有的可用资源都集中于这一计划，那么，史迪威是否能够创建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以维护中国的内部稳定呢？这虽是不不得而知的，但却发人深省。

罗斯福总统采取等价交换政策和压力策略是以蒋委员长之道，还治蒋委员长之身，它必然意味着产生意志的较量和旗鼓相当的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这种较量包含着脱离美国的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蒋委员长早期关于与日本单独媾和的暗示和威胁。因此，美国为了成功地履行等价交换的政策或者使用压力策略，就要在蒋的要求没有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正确地估价他的暗示和威胁的严重性。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蒋怎样估计是与日本单独媾和或与美国关系破裂，还是根据美国的条件继续保持联盟的相对利弊。它也取决于蒋怎样正确估价中美关系的破裂对他的国内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当美国准备好应付一切可能预见的意外时，有力地实行压力策略才有意义。然而，显而易见，罗斯福总统采用了史迪威的观点，但他对可能发生的后果却毫无准备，他不同意史迪威把蒋的威胁估计为虚张声势，他不愿意扶植其他的国民党领导人取代蒋的位置。因而，当蒋委员长似乎采取了坚定立场时，罗斯福总统便犹豫不决，然后就改弦易辙了，围绕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总司令的建议所发生的危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授与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的无可非议的权力以解决中缅印战区的军事问题的计划，是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7月6日正式向蒋委员长提出的，那时日本的进攻威胁着“华东”的空军基地，大有在战争中击败中国之势。这时正确对待指挥问题的倡议并非来自史迪威本人，而是来自陆军部，尽管史迪威以前也提过类似的建议。

史迪威根据两次缅甸战役的痛苦经验知道蒋委员长会使用非正式的通讯渠道，限制战地指挥官的权力，便要求与蒋介石达成不容变更的协议以保证自己的权力完整和不受干涉。罗斯福总统7月6日的电文建议蒋委员长使史迪威“在您的直接领导之下，统帅所有的中、美部队”，包括共产党部队，“他对阻止敌人大规模推进的协调和作战指挥承担全部责任，享有完整的权力。”

这样一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矛盾显然是窄路相逢了。美国官员认为，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是扭转迫在眉睫的军事灾难的唯一办法。对蒋来说，美国的建议就是要他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的主要批评家和压力策略的主要提倡者。蒋接受这一建议的后果是清楚的。他保住大权的诀窍就是，不管部下的才能如何低，只要他们对他保持坚定不移的忠诚，便给予优惠待遇；也不管部下的战功有多大，只要他们曾一度是他的政敌和军事上的对手并在对他个人的忠诚问题上有疑问，便百般限制或釜底抽薪。如果蒋要在中国维护他的个人控制，那么除此以外他别无选择的策略。因为除了战争早期死守上海—南京地区的一仗之外，由黄埔军校毕业以及蒋委员长之后的主要军事将领所指挥的军队并未在沙场上显示战绩。相反，他们的军

事成就与李宗仁指挥的在台儿庄大获全胜的军队相比颇为逊色，甚至与 1944 年 6 月以前成功地抗击日本进攻，保卫湖南省的薛岳部队相比也是逊色的。黄埔系的高级将领胡宗南将军指挥的装备比较精良、给养比较充足的军队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忙于封锁共产党人而使部队丧失了机动性，对保卫中国并没有作出多少积极的贡献。另一位黄埔将领汤恩伯将军指挥的三十万大军在佃俊六将军的一个坦克师、三个步兵师、几个混合旅的进攻下，在 1944 年 4 月的三周内遭到决定性的打击而溃败。蒋把个人的权力得失与国家的利益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使他因怀疑将领对他不忠，竟拒绝为守卫“华东”机场的中国地面部队运送给养。

如果史迪威被任命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并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那么他就会以军事上的成败标准取代蒋的个人忠诚的标准。蒋的个人权力的整个基础就会被破坏。非黄埔系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和影响就会扩大。蒋和他的黄埔系信徒在中国虽仍会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但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势力。蒋可能暂时仍然是中国最有影响的领袖，但他的地位会不断地遭到那些屡建战功并得到史迪威支持的领袖们的挑战。

史迪威曾认为与国民党桂系的李宗仁共享领导权的白崇禧是蒋“最适合的接任者”。[24]蒋委员长不会不知道这种观点。因此，蒋不会泰然自若地接受任命史迪威一事可能出现的后果，他要尽一切可能避免事情的发生。8 月 6 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最近，国内、国外局势的压力与日俱增……只要我能稳掌军权、财权，不辜负官兵和百姓的信任……（民族）革命的基础就不会动摇，前途就是光明的……。”显然，当罗斯福总统敦促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全权总司令时，蒋却在重表他掌握军权和财权的决心。

追溯历史，我们姑且不谈武装共产党人的问题，似乎仅仅从美国这一建议对蒋的个人权力所构成的威胁，就足以导致任命史迪威的谈判破裂。这种解释可用菲斯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干练地提出的两个事实加以证实。第一，与赫尔利将军后来的叙述相反[25]，关于史迪威作为中国军队总司令的权力范围问题的谈判，自始至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事实上，四五天之后，谈判就陷入僵局，这是在赫尔利和史迪威向蒋委员长提交了任命条例的草案，蒋向史迪威提交了建议性的指示之后，而这些文件具体规定了史迪威未来的权力范围。一两天之后，9 月 16 日，赫尔利和史迪威与宋子文一起开会。会上，史迪威对上述两个文件中关于战地总司令的具体权力加以发挥。用史迪威自己的话说，他要求：

不折不扣的完整权力，包括奖惩（即刻处罚）权、任免权。他（蒋委员长）必须接受在某些职位中对外国人的任命。总司令不必获准便可从一个战区向另一个战区调遣军事单位、合并军事单位、解散军事单位、建立新的军事单位、从一个军事单位选派人员参加另一个军事单位。只要他认为有必要便可改变组织……蒋委员长对行动计划不得加以任何干涉。

史迪威还建议任命陈诚将军为作战部部长，任命白崇禧将军为参谋总长，由这两个人取代合两职为一身的何应钦将军，而何被普遍认为是蒋的黄埔系中的二号人物。

赫尔利—史迪威的草案和他们与宋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使目的上的根本分歧公诸于世，笼统的概念再也无法掩饰冲突。因为史迪威对他作为战地

总司令的权力的理解与蒋委员长的想法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宋子文说道：“我知道蒋委员长的想法”，接着他向史迪威谈起蒋委员长的概念。宋所转达的蒋的建议揭示了两大宿敌之间基本的政策冲突，这种冲突可见于史迪威对蒋的建议的义愤之中：“花生米想要的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史迪威在他的一份日期不明的文件中写道：“这个傀儡是美国强加于他的，再加上一位中国的副总司令！T.V.（指宋子文）泄漏了天机。”

中美的公开破裂为时不远了。9月19日，在与宋“开诚布公的谈话”的三天之后，史迪威根据刚建立的外交惯例，亲自递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一份有力的和谴责性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罗斯福敦促蒋委员长加强而不是撤回云南驻军，警告他说，如果北缅战役由于他的行动而在最后一刻失败，那么他必须“做好准备承担后果和个人责任”。罗斯福总统还责备蒋委员长拖延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责备他“失去‘华东’的关键地区”，指出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份谴责性的电报给蒋委员长以最适当的时机否定他早先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司令的诺言。而史迪威亲自递交这份电报力他提供了借口。他立即中止了会谈。不久就决定反对罗斯福总统的要求。9月24日，蒋委员长告诉赫尔利，他决定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开始时他的理由是毫无实质内容的，他说史迪威亲自递交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使他成为史迪威的部下。赫尔利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他对罗斯福总统说：“蒋委员长拒绝任命史迪威将军的决定是在9月18日蒋委员长的部下史迪威将军向他递交了您的电报之后作出的。”

然而在蒋委员长给赫尔利的备忘录中，他清楚地表明，在战地总司令的权力范围问题上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史迪威具体规定“蒋委员长对行动计划不得加以任何干涉”，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使用了诸如“承担全部责任、享有完整的权力”，“没有障碍的绝对指挥权”，“不受限制的指挥”一类的词句，而蒋委员长在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时，其根据却是他从来“指挥不动史迪威将军”，也从没有赖于史迪威遵从他的指挥。先前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说明，围绕对史迪威作为中国军队总司令的权力范围的解释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谈判破裂的原因。

相比而言，由菲斯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所揭示的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表明，如果蒋愿意妥协，那么在解决装备共产党人问题的分歧时将会使蒋满意。当史迪威知道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他曾两次提出在装备共产党人问题上作出让步。9月23日，他提出一个分配租借法案物资的计划，这个计划规定，物资将首先交给蒋委员长并根据如下规定分配：雷多公路和云南驻军享有最高优先权，然后是剩余的30个师、共产党军队的5个师，而在“华东”成立的第二批30个师也享有同样的优先权。这也就是说，史迪威提议装备60个国民党师和5个共产党师，参加北缅战役的20多个国民

党师享有最高优先权。作为进一步的妥协，他建议说，共产党的力量应被限制在黄河以北，他建议由他亲赴延安，要求共产党人正式承认蒋的政权。9月24日，赫尔利向蒋委员长送交了包括这些妥协建议的重新谈判的议事日程表。但无论是从罗曼纳斯和森德兰、或菲斯的论述中，或是从公开发表的记录中都无法肯定这个议事日程表曾提交给蒋，及蒋曾对此加以研究。无论怎样，如前所述，蒋是在他与赫尔利的这次谈话中告诉赫尔利，他决定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值得注意的是，蒋对赫尔利所谈的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的

原因之一，用史迪威的话来讲，就是“他（蒋）害怕我（史迪威）在军队中的影响”，“他会面临兵变！”

蒋在说这些话时，他不会是指共产党问题，这个问题从未被说成是“兵变”。更有可能的是，这暴露了他对史迪威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的担心。

9月28日，史迪威在共产党人的问题上作出第二个妥协。他对何应钦将军说，他不再坚持把利用共产党人作为达成协议的条件之一，他主动提出不谈利用共产党人一事，以便使“我们能够有利地继续进行我们其他的计划”。如果蒋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共产党势力的发展，那么他这时是可以与史迪威达成妥协的。然而，史迪威最后的提议对蒋的坚定立场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这时发生了一起戏剧性的事件，它对以后事态发展的影响现在仍然难以估计。10月1日，蒋委员长收到孔祥熙发自华盛顿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在一次晚宴上，哈里·霍普金斯告诉孔，如果蒋委员长坚持的话，罗斯福总统就撤换史迪威。蒋根据这一事关重大的情报，打出了他的王牌——威胁脱离美国。但是蒋不像1942年和1943年那样直接向美国官员表明这一点——那时中国在美国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占居着重要的地位。相反，他是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露自己的意图的。他知道，这一讲话总会到达美国官员那里。但这次他不是威胁与日本单独媾和，而是表明不论有没有美援，他决心与日本决一死战。他相信，日本注定灭亡。这位国民党的领袖对与会者说，他将坚持要求召回史迪威，他愿意任命另一位美国人担任计划中的战地司令员的职位，但是这位美国官员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仅仅有权指挥蒋委员长具体指派给他的那些中国部队。如果美国拒绝接受他的要求，他便孤注一掷，尽一切力量打这场战争。[26]如果在没有美援的情况下，他无法坚守住由他控制的那些省份，结果会怎样呢？蒋委员长使美国对此猜测不已。会出现单独媾和，全面崩溃，还是投降？蒋委员长再次利用了美国的恐惧感和同情心。

蒋委员长这神机妙算的一着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平衡，结束了华盛顿举棋不定的一周。因为，现在蒋委员长的确坚持自己的要求了。罗斯福总统不顾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对蒋否定他的应急建议作出让步，并愿意解除史迪威作为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的职务。但是他为了挽救史迪威，使他能够指挥缅甸战役而作了最后的努力，罗斯福要求蒋委员长允许史迪威继续指挥缅甸和云南的中国地面部队。这个恳求毫无作用。蒋委员长现在想要的是全面胜利，而且他看到这一胜利是唾手可得的。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要求任命一位特使，而赫尔利显然承担了蒋委员长希望他承担的任务。赫尔利对罗斯福总统说，蒋委员长是愿意接受劝告的，愿意考虑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当前的窘境是由史迪威试图征服蒋的拙劣的压力策略造成的。用他的话说：“您和蒋介石之间除了史迪威之外是没有任何分歧的……我认为，在这场辩论中，如果您保留史迪威，就会失去蒋介石，中国就可能和他一道失去。”

10月18日，罗斯福总统通知蒋委员长，史迪威将被召回，美国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指挥将不承担责任，他将指派魏德迈将军，蒋提名的三名美国军官之一，担任蒋委员长的总参谋长。而中缅印战区将一分为二：中国战区和印缅战区。史迪威离开了中国，他的使命被蒋的花招破坏了。他的怨恨在记录他的使命的笔记梗概中和他对被召回的看法中可见一斑：

我接受了使命，却没有完成使命的条件。“不可讨价还价”使我一筹莫展。三年的斗争。中国人、英国人和特使——柯里、威尔基、华莱士、纳尔逊、赫尔利的秘密报告。……英国强烈地反对我。中国人强烈地反对我。

尽管如此，正当形势有所发展时，我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正是那份 9 月 19 日的电报使蒋介石大作文章。他把一切归罪于我——pDR（罗斯福总统）是他的好朋友。FDR 不敢据理力争。蒋介石的一面之词和谎言使我被解职。

史迪威的评论家们总是把他们称之为史迪威徒劳无益的努力与魏德迈将军轻而易举的成功作比较。他们把这种效果上的差异归咎于史迪威的等价交换策略和缺乏机智，归咎于魏德迈使用的说服方式和他的灵活与抚慰的态度。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史迪威缺乏政治上温文尔雅的风度，那是对的。但用它来解释史迪威与蒋之间的激烈冲突就不够了。可能更重要的因素是众所周知的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情。然而即使是把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考虑也不能构成一个全面的解释，史迪威的失败与魏德迈的成功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于 1945 年中国的局势趋于缓和。跨越驼峰的军需品的运输量大大增加。史迪威多年来改革中国军队的努力也开花结果了，而魏德迈则坐享其成。美国不再依靠中国击败日本，因此它也不敦促中国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了。这时的美国已不需要对可能引起激烈冲突的问题作出重大的和困难的决策。就军事问题而言，当没有必要使用压力以贯彻一项政策时，自然就会用说服和规劝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史迪威的评论家们很少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即使是魏德迈将军也赞同史迪威的等价交换的做法。在这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1947 年，魏德迈在内战的关键时刻从中国返回华盛顿后，他在报告中建议美国采用等价交换的策略，以美援为条件换取中国的改革。他在一次对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的集会发表讲话时，认为有必要但直率他说话，结果在中国人中引起强烈的感情上的反响。同样，史迪威的严厉的批评家陈纳德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作为中国政府的文职顾问不时地要装出一副坚决要求辞职的面孔。

还有一件事清楚他说明了史迪威等价交换策略的正确性。194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人全面击败国民党政府似乎已迫在眉睫，美国驻广州的公使级参赞就他与陈立夫的一次谈话作了如下的汇报：陈公开表示，他认为国民党将紧密团结起来，并能够延长与共产党人的斗争，直到他们能够再次说服美国加以干预为止。“如果这一时机到来时”，美国公使级参赞报告说：“他（指陈）希望我们真诚地在桌上摊牌，并为我们所提供的一切提出明确的等价交换策略。他说，这是实现我们期望的结果的唯一办法。”陈立夫是国民党 CC 派的领袖，他在挫败美国的对华政策方面的所作所为不亚于任何国民党的领导人。

极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从陈先生这样的人那里得知等价交换策略是明智稳妥的，而这位陈先生在挫败美国的政策方面，特别是在马歇尔使华期间的活动中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史迪威的悲剧在于他针对国民党政府的“等价交换”方针与他的个性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策略问题往往与个性问题混为一谈。直到今天，美国人对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正确方法仍然在争论不休，然而在陈先生这种精明的中国政治家的心目中，美国应怎样做才能达到目的是断然无疑的。

美国起初未能采取压力策略，以后又未能实行这一策略，这无疑是由于过分恐惧中日单独媾和，或者与中国发生外交上的破裂。这种恐惧感有一部分是来自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的、在开罗会议上得到正式重申的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针。开罗会议还特别声明，盟国决心使中国收回被日本占领的所有领土，并把日本驱逐出它自 1895 年以来“通过暴力和贪婪所侵占的一切其他领土”。结果，尽管日本的投降并不是严格的无条件投降，但是毫无疑问，对美国官员来说，与敌人谈和简直就是向邪恶妥协。美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方针只有一个最高目标：尽量少作牺牲，取得军事胜利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在整个战争中，美国从未考虑与日本谈和的可能性，无论是把它作为抵抗盟国压力的策略上的花招，以应付无法预测的战时紧急事态，还是保护它战后在远东的利益。为此原故，美国从未试图与所谓的日本主和派建立联系。除了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外，美国没有为谋取私利而换取日本投降。相反，公开宣布的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和开罗宣言却成为日本主和派领导人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阻止了日本与美国的直接接触。[27]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竭力引诱重庆政府背叛盟国事业就极大地加强了蒋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地位。俄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散布的日本与国民党人秘密联系的流言蜚语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样，在中美关系中的关键时刻，关于日本和平倡议的谣言伴随着国民党人的暗示和脱离美国的威胁蜂涌而至。如上所述，在 1942 年 6 月和 7 月的“三大要求”的危机时期，蒋夫人亲自警告史迪威，国民党中国中的亲日分子是非常活跃的。7 月 10 日，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日本通过一个间谍和一个中国合谋者向重庆提出秘密的和平倡议的“腊斯基谣言”。在开罗会议期间，即 1943 年 11 月 29 日，赫尔在给出席开罗会议的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根据美国驻重庆使馆的报告来看，日本正在不断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要求，但一无所获。在 1944 年 9 月和 10 月的史迪威危机时期，中国间谍与近卫的胞弟忠丸宫田川男爵有着通讯联系，并寄给他所谓中国的解决条件。在魏德迈将军升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军队总司令以后不久，蒋介石就交给他一份所谓日本与中国和解的倡议书。因而，每当提议遭到美国的否定时，蒋似乎总是有另外的选择。

然而，在召回史迪威的特殊时期，与日本单独媾和或与美国决裂是蒋的真正选择吗？1944 年秋，日本的失败已属确定无疑，[28]唯一的问题是时间和击败日本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战后，美国看起来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国民党中国从与美国结盟的全面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将大大地多于与日本单独媾和的好处。因此，蒋委员长要实行他的威胁，似乎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决定采取这种作法，他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会遭到中国人民的谴责，会被其他的领导人取而代之。1937 年 11 月，蒋亲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当国际力量的结构对日本更加有利时，“只要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的状态，我就无法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他颇为机密地又说道：“如果我同意了这些要求，中国政府就会被公众舆论的潮流冲垮。中国就会爆发革命。”蒋对中国人的感情的评价与他的头号大敌中国共产党人的评价不谋而合。一位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一次会见中曾对保罗·M.A.莱因巴格说：“如果蒋与日本人谈和，或者如果他不抵抗日本、共产党人就没有必要与他打交道了，他也不需要与我们打交道了，因为他无论如何都会垮台。”1942 年 7 月，高斯大使确信，尽管有日本和平倡议的谣言，但蒋与日单独媾和是得不偿失的。史迪威同意这一判断。

同样，蒋表示，只要形势需要，即使没有美援，他也要继续战斗的决心是个骗局，蒋对美国军需品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他的权力不可能经受与美国的决裂。蒋要求召回史迪威的作法既没有激起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感情的大爆发，也没有得到他们热情的支持。[29]战时中国的亲美情绪是强烈的。除蒋委员长的亲信之外，史迪威得到许多中国人的敬佩。人们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史迪威的召回可能会导致美国减少它对中国的军事承诺。

如果蒋采取了他所威胁的重大步骤，美国仍然能够支持广西的白崇禧和张发奎、湖南的薛岳、鄂豫皖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第十二战区的傅作义、第十战区的李品仙、甚至支持李济深元帅的离心运动。这些军事和政治领袖对得到美援将是喜出望外的。在整个战争时期，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美援。蒋委员长绝不会愿意切断美国对他的援助，而坐视美国援助流向他的政敌。如果美国采取坚定立场，它本来完全可以逼蒋让步。美国在史迪威危机中失败的真正的悲剧所在是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蒋接受史迪威作为他的战地总司令，那么我们对政治和军事上的后果也只能加以推测。然而美国的目的似乎会更快地得以实现，美国对援助国民党中国将会作出更深的承诺，美国对处理中国的局势将承担更直接的责任。蒋的个人势力将被削弱，虽然他仍然是一位强大的政治领袖。受到蒋委员长的压迫和限制的、早就蠢蠢欲动的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将会发展。国民党可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根据战绩和政治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展开争夺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公正的竞赛。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力量可能会因更公平地分配美国军需品和更迅速地实现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而得到加强。同时，蒋和其他的政治领导人将会更加尊重美国目的的坚定性和严肃性。

最重要的是，召回史迪威意味着美国运用压力策略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它政治地位客观上的削弱，还不如说是由于判断失误。这一失败导致了两种深刻和持久的后果，从那时起，这两种后果就危害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蒋委员长坚信，美国为着捍卫自己的远东利益而对他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为实行它的政策是如此地缺乏目的上的坚定性，因此无论他做什么，或者拒绝做什么，美国终将会向他的一再要求作出让步，并接受他的观点。这样，他肆无忌惮地奋力追求他心目中的政府和党的利益。事实证明，这是个致命的估计错误，它将成为蒋垮台的原因之一。

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蒋委员长不能在他自己和其他人之间找到并促进共同的利益，也就是说，他对他的利益、他的政府的利益、中国的利益抱有一种狭隘的观念。他习惯于奋力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无论在任何形势下都强行取得一切好处的做法使别人难于与他共事。他过分相信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判断、坚信他不会犯错误、以及他就是国家的神秘感使他盛气凌人，不愿听取劝告和不同意见。

在国际上，他的态度和政策疏远了美国，而美国却能向他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中国国内，他排除了建立一个以中国各阶层和政治力量为广泛基础的政权的可能性，而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最初规定了由一个社会集团垄断权力的意识形态，却站在他的对立面，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这样，使蒋早期成功的令人吃惊的政治花招中也就隐藏着他垮台的种子。

更加不幸的是，召回史迪威不可避免地给美国官员带来深刻的挫折感和失败感，这种感觉可与蒋介石认为美国非他不行的感觉相匹配。从那时起，

只要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中国，他们就被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所折磨。他们感到，蒋并不想获得帮助。他听不进劝告，不愿意被人说服。向他施加压力是无效的。与蒋合作是否能实现美国的目的，成了很现实的疑问。伴随着召回史迪威而来的是罗斯福总统决定削减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承诺，再次确定了从太平洋击败日本的战略。如前所述，罗斯福不再希望中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大国了。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把远东战后的稳定放在与苏联的合作上。在雅尔塔会议上，他欣然同意支持斯大林对中国的要求。在他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他把中国缺乏解决办法的现状主要归咎于国民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这样，罗斯福在 1941 年至 1944 年期间，一方面试验了各种军事计划，另一方面，他也试验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 1941 年和 1942 年，他选择的办法是租借法案，他最有影响的顾问之一是租借法案问题的专家劳克林·柯里。1943 年，他的主要武器是陈纳德的空军。1944 年，他抛弃了陈纳德，以 B—29 型轰炸机的麦特洪计划和史迪威的方法做试验。在召回史迪威和在 1945 年 1 月，B—29 型轰炸机基地从中国转移到印度之后，他对中国的兴趣大大减少，他加强研究在远东与苏联进行战时和战后合作的问题。

罗斯福对中国成为大国的前景所作的评价的变化，重新强调了传统的观点，即不值得为美国在华的利益而战，中国无论作为盟友还是敌人，对美国都是无关紧要的。美国战时和战后的经历向自己表明，使蒋免于失败是超越它的能力的合理范围的。它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唯一合理和可行的政策就是从中国解脱出来，让蒋听天由命，同时利用有限的资源保卫它在欧洲的利益。后来，正是马歇尔将军采取措施使美国长期撤离中国，结束了当年友好的中美关系，这并非是偶然的。马歇尔将军是史迪威的直接上司和密友，他对史迪威与蒋打交道时碰到的困难和棘手之处是了如指掌的，他提出的支持史迪威的建议没有被罗斯福总统采纳。这样。美国失去中国的根源可追溯到以召回史迪威为象征的战时的挫折和失败。而蒋在表面上战胜了那位极为失望的美国将军后也播下了他在中国大陆垮台的种子。

第二部分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

第五章中国的权力之争和美国政策的影响

1. 统一战线的外表与现实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为了抵抗日本进攻，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双方正式发表了对等的声明。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共产党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就他们本身而言，他们宣布：

(1)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英译本中“彻底的”一词被删略——译者）实现而奋斗

(2) 取消一切推翻中国国民党政权（英译本中“政权”一词被删略——译音注）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3) 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4)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英译本将“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曲解为“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英译本将“受”曲解为“直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英译本将“担任”曲解为“协助”）抗日前线之职责。

第二天，蒋委员长发表声明，表示国民党政府赞成共产党人的决定并接受他们合作的建议。在这个声明中，蒋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中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宣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

在这些声明发表之前，红军的番号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命令被规定为八路军，后来又被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9月9日，共产党人自己把他们在西北的根据地重新命名为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分布在华中和华南的十三个共产党根据地中小规模的和孤立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这样，从表面上看，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接受了三民主义，放弃了以暴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并将红军皆于政府的管辖之下。

然而，在正式声明的面具后面，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政治现实。甚至在联合阵线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在1937年4月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5月的党的代表会议上、特别是在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联合阵线中，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在中央委员会公布了9月22日声明的三天之后，它就发表一个决议草案说，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原来的红军和所有的游击队中保持共产党的绝对独立领导权，共产党人不允许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表现出任何的动摇不定”。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积极分子的会议上说：“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阶级——作者加注）投

降主义”。毛泽东在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恢复了“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毛泽东还自豪地宣布：“（我们）提出了‘独立自主的（独立于国民党政府的——作者加注）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即共产党的根据地——作者加注），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

毛泽东指示共产党的领导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而坚持这一原则的目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 this 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毛泽东解释说：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主要目的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确保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不辞辛劳地亲自起草了发表于 1938 年 5 月的布告，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大意是：

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究。

毛运用这种战略和策略把可能严重限制共产党发展的统一战线变成了迫使国民党抗日的工具，一种防止国民党全面进攻的工具，一种保护全国共产党活动的屏障。因而，毛极高地评价坚持统一战线的意义。他写道：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

毛泽东对国民党提出了批评。他指责道，1937 年 7 月，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训练团（指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举办的国民党党政高中级人员的训练团——译者加注）提出“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他还对中国共产党人说，国民党对华南各孤立的共产党游击区的方针是一方面进行合编这些部队的局部的双边谈判，而另一方面却通过包围共产党军队并解除其武装来消灭这些游击部队。不管这些指控和反指控是否属实，毫无疑问，各自都以分析对方的动机为基础制订自己的方针和战略。

到 1938 年 8 月底，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恶化，这一点连局外人士也是有目共睹的。那时，汉口一武昌卫戍司令部宣布取缔共产党所发动的三个民众团体。在国民党采取这一行动的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布告，禁止那些未经共产党政府批准而进入边区境内的人进行活动。在国共两党发生了公开摩擦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第六次全会。在这个重要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1938 年 11 月 6 日，毛泽东在他的结束语中声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他告诉他的同志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他进一步评论说：“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

改造。”关于中国，他特别指出：“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关于直接的任务，他说，“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日本——作者）后。”毛泽东显然认识到在这些地区和在敌后，共产党人可利用政治和军事真空来加强他们的政治控制和武装力量。在这些地区中，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活动与在其他地区类似的活动不同，它们可较少地遭受国民党的有效反击。

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中央委员会也坚持毛泽东的观点。在结束语中，毛泽东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即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的观点。他再次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但是他还警告说“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即日本——作者加注）的总方针。”这样，他的政策实质上是在不促使与国民党发生公开决裂和不招致大规模的国民党进攻的情况下，更加有效地和尽快地发展他的党和军队。

毛泽东对几种可能采取的行动加以区别分类，他告诉共产党人应针对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策略。他告诉共产党人，如果他们估计国民党将同意他们的行动，那么便可以先奏后斩。如果他们估计国民党不愿意主动地批准他们的行动，那么可以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后再告诉它。如果他们估计国民党即使面对既成事实也不会同意他们的行动，那么便可以斩而不奏。如果他们采取的行动将“妨碍大局”，那么便可以“暂时不斩不奏”。最后一条原则的意思是“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他引用了孟子和列宁的话来支持这种自我限制。关于这些限制的性质，毛泽东写道：“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因此，1938年12月，毛泽东发表讲演的一个月之后，贺龙将军的共产党军队与张荫梧将军的河北国民党军队发生了冲突，这并非是偶然的事件。1939年春，共产党军队加紧向山东省推进。在1939年至1940年冬，他们打败、追击、消灭了河北的国民党军队。导致这些具体冲突的责任应由共产党人承担，还是由国民党人承担？这是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讲演清楚地表明，这些冲突是他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的组成部分，它们完全符合他在敌后发展党和军队的方针。国民党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以遏制共产党的发展。1939年期间，国民政府对共产党区域施行了严密的军事封锁，以防止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统治区域。毛泽东报告说，1939年3月，国民党采取了“限制异党活动”的办法；10月，它又采取了一套处理“异党问题”的办法。12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紧张局势达到高峰，共产党人指责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全面进攻，他们称之为“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样，到1940年春，有限的武装冲突和激烈的政治斗争形式反映了国共两党关系的特征。1940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修改了他的政治军事战略，全面地使他的军事行动与政治方针相结合。这个政治军事战略的考虑包括他的军事力量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军事力量相比所处的劣势和他的党以及运动所处的少数派地位。政治战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并强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30]无疑，“顽固派”这

这个词是毛泽东用来指蒋委员长以及他的追随者的。在这个战略的三个方面中，着重强调的最优先的方面是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然而，毛泽东的纲领的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是相得益彰的。毛泽东指出，如不反对“顽固势力”，“进步势力”就不能发展。只能将三个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完成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开展反对“顽固势力”的斗争与保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之间并不矛盾。相反，他表示相信必须开展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以）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在二个月之后的另一个指令中，毛泽东指示在长江下游和华东沿海地区作战的中共指挥员，只有采取坚定的态度，开展反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使他们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这也就是说，他依靠发展共产党的力量来阻止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内战或局部战争，而不是依靠合作、妥协来避免公开决裂。

他很可能认识到，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可能会增加爆发全面内战的机会，共产党可能还不够强大，不足以阻止国民党的进攻。但是他正确地估计到，只要抗日战争在继续，国民党就不可能发动反对共产党的全国性战争，而在当时，结束中日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国民党对日投降。因此，毛泽东向他的指挥员指出：

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国民党对日投降——作者加注）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原文如此——作者加注）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

而且，毛泽东从共产党人 1923 年至 1927 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和 1927 年死里逃生的经历中懂得，共产党无法以他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避免国民党大举进犯的危险。因此，他声明：“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 1927 年的错误。”

这样，毛泽东制订了一整套基本原则，在局部的军事冲突中指导着共产党的行动，它们使毛泽东能够推进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同时减少了全面内战的危险性，为他发展自己的政治军事权力赢得了时间。在意义重大的—段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

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而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毛泽东用简洁的语句，为总的军事力量低于对手的一方规定了有限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谨慎地控制武力的使用和可在可控范围内限制武装冲突，它们使共产党取得了不计其数的局部战争的胜利，而避免承担太大的引起大内战的风险。

毛泽东的“有理”和“自卫”原则并不排除放手地“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而“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这一原则与“建立根据地仍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的行动也将是一致的。共产党的势力、根据地、地方政府向一切日本占领区域发展，而采取这种行动必然会损害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因为毛泽东曾特别预见到，它会削弱“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规模”。

1940年5月，毛泽东命令新四军的指挥员尽快地发展力量，控制“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的区域”。他批评他们在执行党的扩大共产党武装至10万人的指示时不得力。这个指示使共产党军队的活动大为加强。根据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消息来源说，当时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现在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将军于1940年7月调其部队到苏北，与那里的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冲突。在1940年的下半年，长江下游发生了几场激战。到年底，新四军发展成一支10万人的大军，完成了毛交给它的任务。

共产党武装的扩大发生在中国的关键区域。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这一区域曾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在那里仍驻扎着数量可观的军队。国民党为排除未来的致命威胁采取了行动。7月16日，国民政府要求新四军与八路军撤至黄河以北。在发生局部冲突的同时而进行的最高级谈判中，共产党人否决了这个要求，但提出将新四军各部队撤至长江以北。这些磨擦最终导致了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在双方这场战时发生的最严峻的冲突中，国民党军队包围并消灭了直属于新四军司令部的9千人的共产党军队，俘虏了军长，杀害了副军长。1月17日，国民政府下令解散新四军。

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想重新描述这一事变，判断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这一事变的说法符合事实。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必须指出，毛泽东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内战一直保持着警惕性，而且尽管他的计划是有缺陷的，他还是决心实行这一计划。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公布了一个声明，我们现在知道，它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在这个声明中，他把“皖南事变”称为“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他谴责说，国民政府正在采取步骤消灭新四军的其他部队，正在准备向八路军进攻，侵犯陕甘宁边区，并大批逮捕共产党人。他宣布，国民党当局“必已具有全面破裂……的决心”。他敦促全国人

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他提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再不像1927年时期那样容易上当受骗，那样容易被摧毁了，它现在是一个根基牢固的大党。他向全国宣布，新四军剩余的9万人将受新军长的指挥，八路军“决不坐视它（新四军——作者加注）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

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这时都不愿全面决裂。毛泽东后来解释说，党中央委员会指示全体党员作好准备应付国民党可能制造的破裂，它是在为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作最坏的准备的必要性包含了避免全面内战的可能性。“我们的准备本身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用这种观点看问题，共产党发言人的谴责也许只是为了警告国民党，呼吁人民警惕国民党的进攻。虽然毛泽东可能对皖南事变之后的直接危险一时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但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看法是，全面内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尽管这种可能性不一定成为现实。因而，他认为把皖南事变看作是蒋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镇压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行动的再现是一种不正确的评价。他写道：“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就）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

蒋本人对最近的这个胜利显然颇为得意。但他也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时候，全面进攻敌后的共产党军队和根据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不可能的。1941年3月6日，蒋在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政府与全国国民只有一致对倭抗战与铲除民族叛徒的汉奸伪逆。决不忍再见到所谓“剿共”的军事。……政府对于此次事件，只要能达到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目的，一切问题皆愿听从我们国民参政会，依据公众民意来解决。

毛泽东认为，这个讲演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结束。但是两党之间无法达成协议，地区性的零星战斗仍在继续。这就是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时的中国现状。

因而，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在中国面临的局势与中国的政治一样错综复杂。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崛起了史无前例的组织——一个以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革命政党。它在精心制订的孤立和打击敌人的政治方针指引下，把军权作为主要的工具加以发展和利用。它的军权完全取决于以武装抗日和经济、社会、政治改革的纲领发展起来的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这一军权又反过来被用于保卫农民，反对日本侵略者，推进改革，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这个革命政党使中日战争和与它的敌人的统一战线变成了保护它自己不受国民党军队可能的进攻的屏障。在这个屏障后面，它迅速地、全面地发展军队并与它的敌人发生了一系列有限的局部冲突。

在政治领域内，它所遵循的策略是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中间集团，孤立势不两立的敌人。它利用统一战线推行这一策略。它在控制区实行“民主”，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争取中间集团。它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成为符合宪法的民主政权，并使这成为在国民党中国扩大影响和权力的途径之一，是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的一步。崇高的声明与诸如《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和《论联合政府》（1945年）之类的广泛传播的文章必须作为根本的策略来理解，党内指示、报告、讲演——有一些当时便为国民党人

所知，许多是后来发表的——是对这一根本策略的概括。我们必须本着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策略的这种理解才能评价美国为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所作的努力。我们必须考虑到八路军和新四军违抗国民政府的命令，采取独立行动的记录才能对国民党依靠统一军队来解决中国的共产党问题和防止苏联干涉中国内政的作法作出判断。美国官员不可能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计划这个事实不应妨碍我们承担这个分析的任务。我们的目的是阐明美国政策的失败，而不是从真空中找出值得称道的行动和并不值得称道的行动。

2. 美国关于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政策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最初的两年半时间里，美国阻止国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并致力于防止内战的爆发。史迪威危机期间罗斯福总统驻华私人代表和后来的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少将于1945年12月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经过明确的解释的，它大致有如下几点：（1）统一中国的一切抗日武装；（2）支持中国人民为自己建立一个自由、统一、民主政府的愿望。”这就是为应付由于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所造成的极其错综复杂的形势而制订的政策。

鉴于后来有人对“强迫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问题提出恶毒的指责，因此，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政策是在几乎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这一点并非是多此一举。无疑，赫尔利将军是这一政策最乐观和最不知疲倦的执行者。尽管大部分驻华外交官和国务院官员对赫尔利实行这一政策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评，但是在建立民主政府以结束中国的分裂局面这一点上，他们同意赫尔利的看法。一位被派往史迪威司令部的名叫约翰·S·谢伟思的外交官在一份极其重要的报告中建议：“（远东）稳定的关键必须是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它的实现只能是存在于（原文如此）民主的基础之上。”

即使是那些杜鲁门—马歇尔政策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种政策只不过是酝酿中的战时政策的一种延伸——这时似乎也赞同赫尔利的政策。克莱尔·L·陈纳德将军在一封时间为1944年9月21日的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建议说，美国应作出新的尝试，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携起手来。1945年7月9日，波茨坦会议前夕，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马歇尔将军请他提供建议时回答说：

如果食糖大叔（美国俚语，食糖用来形容可爱的人或富翁，此处指美国——译者）、俄国、英国坚定地团结起来，强制（国共）双方作出现实主义的妥协，实现两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那么将会避免战后的动乱，将有可能及时地、有效地使所有的中国人武装抗日。我之所以建议性地使用强制这个词是因为我坚信，以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向双方继续呼吁是不会实现统一的。“三大国”的态度必须强硬。

1945年12月7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雷蒙德·T·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一份联名电报中制订了运输另外六个携带必要给养的中国军队到华北和满洲的计划，但是计划建议，“如上所述，美国对华援助将成为美国大使为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而使两大敌对集团和解与妥协的谈判的基础”。不管这三位远东司令官的个人看法如何，[32]刚才

引证的这段极为仓促地制定的计划却表明使双方达成妥协的政策当时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以和平方式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总政策范围内，赫尔利将军与一些驻华外交官员之间产生了重大的政策分歧，这些人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务院许多官员和美国关注中国事务人士的赞同。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P·戴维斯和约翰·S·谢伟思，他们曾作为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被派往他的司令部。分歧首先出现在使双方和解的方法上。但是除了方法上的意见冲突外，更加带有根本性的分歧来自对中国政治可能的发展趋向和对国民党继续掌权的前景所作的千差万别的估计上。赫尔利将军认为，要建立统一、民主的中国，就要坚定地支持蒋委员长，劝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但是不为实现这一目标、不为进行必要的改革而对他施加压力。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和苏联对美国政策的默认之下，将能够置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于统一指挥之下，将能够以对国民党有利的方式使共产党参加政府。其结果是巩固仍由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势力，使政权能够维持下去。

与赫尔利的观点相反，外交官员们认为，美国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只能使蒋委员长更加不愿妥协，以致无法与共产党人达成和解方案。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他向共产党人提出合理的条件，才能实现统一、民主的中国的目标。产生这一政策的设想是：即使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的生命力也是不强的，而且他们认为美国的支持不应太多。因此，美国不应一成不变地致力于国民政府，相反，它应采取独立的立场以便能与双方合作。

这样，赫尔利的观点与外交官员们的建议可以比作两条相互交叉的直线。这两条直线的起点是相反的，他们在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对力量的估计上，在对实现统一和民主的中国的方法上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这两条直线在一个共同点相遇，这就是建立联合政府的中间目标。然后，他们又分别走向两个相反的目的地，赫尔利的目标是巩固国民政府，而两位外交官的目标则是寻求争取中国共产党人站到美国一边的途径，或者使他们遵循一种独立于苏联的方针。

高斯大使赞同外交官员们向蒋委员长施加必要的压力以建立联合最高统帅部或联合政府，并实现必要的改革的观点。但是在召回史迪威和高斯辞职之后，赫尔利将军成了美国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在与外交官员们的冲突中，赫尔利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在罗斯福不合时宜地逝世之后，他对美国方针的解释又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支持。1945年11月，赫尔利辞职。这时，他所解释和执行的美国方针未能使双方达成谅解，而由于这一方针的失败，正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赫尔利的辞职和马歇尔使华意味着那些认为有必要强迫蒋向共产党人提出更好的条件以便达成政治解决的人获胜。外交官员们对国民政府生命力不强的估计在马歇尔将军对与国民党合作而实现他的目标的失望情绪中，在他撤离中国的最后决定中找到了知音。他们对可能争取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的信念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即某些人在1948年底与1949年初对毛可能会成为中国的铁托所抱有的希望。

然而，尽管他们在方法上和可能的结果上存在对立的看法，但是，在促使两党达成和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的一致性，对和解所揭示的根本设想与和解所排除的其他选择却是至关重要的。赫尔利将军使双方和解的不知疲倦的努力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的政治活力充满信心，反映了他过低地估计了共产

党人的政治力量，反映了他对苏联能够控制毛的政策信念。某些职业外交家所提倡的相似的政策，表现出一种把巩固国民政府与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等同起来的倾向，或者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政治方向所抱有的不适当的乐观主义情绪。

回顾过去，事实变得更加清楚。在努力调解不可调解的双方和敦促国民政府做不可能去做的事情时，双方在和平统一的可行性上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防止了使美国影响过早消失的可能性成为现实，但更重要的是，一致意见是以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判断，以未能理解共产党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为基础的。结果，官方的意见排除了本来可以用更加有效的办法试行的另一种选择：使用巨大的美国影响和声望强迫国民政府实行早该实行的改革，把它重新纳入广泛的反共战线的核心之中。根据这种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的可能性恰恰可以被当做一种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最有效的杠杆，同时，美国在蒋与中国共产主义的战斗中向他提供积极援助的前景也可以被用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饵。一旦国民政府在一系列彻底的改革之后重建其社会和政治基础，那么美国积极支持政府的纲领便具备了取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积极的支持并不排除美国参加内战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统一的政策排除了这种行动路线，这样，在中间目标上达成的广泛一致的意见与经常强调的在手段和最终目的上的分歧一样，都显得至关重要了。

3. 达成一致意见的三种考虑

（1）传统的原则与感情

首先，以和平的政治方式实现统一、民主的中国的方针完美地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对华态度和政策。自 1900 年国务卿海约翰发送照会以来，美国一贯对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内乱哀叹不已，它的政策是通过支持中国的一派而反对另一派的办法阻止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争斗的中国各集团调解分歧。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利益是派系纷争、停止长期内战和在中国实现统一的混合物。1917 年 6 月，中国人自己在向同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奥土一方——译者）宣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威尔逊政府呼吁中国政府重新恢复安定和政治合作。它告诉中国：“美国对（原文如此）中国保持一个团结的、负责的中央政府深为关注。”同样，美国在 1925—1927 年的革命中严格遵循了对双方保持中立的政策。在南京事变之后，它采取有力措施成功地阻止了列强对国民党的报复行为。它很早便承认了国民政府并向它让步。《九国公约》第一款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美国政策的原则，我们在此部分引证这一公约：“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的坚定意志是……1. 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与领土及行政的完整。2. 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效能和权力巩固之政府。”

不干涉的传统、对内战的谴责、拥护中国的统一——所有这些都作为原则问题——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明显地影响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看法。1942 年 10 月，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指责国务院怂恿国民党以武力镇压共产党。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特意邀请白劳德会晤，他向这位美国共产党领袖递交了一个声明，重申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和各集团与组织内实现“完全的统一”的愿望。与此事有关的是，远东事务司司长向韦尔斯先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官员对中国的看法。针对

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备忘录声明：“美国政府反对中国内战，它建议中国的各集团、各党派采取调解的态度和措施。”它以如下的话阐明了这一政策的历史基础：

一百年来，美国政府遵循了一条维护中国独立与主权完整的政策。在遵循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政府始终认为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必要的，并希望这种团结继续下去。它使用本身的影响反对指向或者导致中国解体、被瓜分、被分裂、被奴役的事件、运动和倾向……政府的一贯作法是不干涉中国的内政。

美国许多坚持遵循公正和不干涉政策的远东事务问题专家对这一传统都怀有一种自豪感。中国境内的亚洲边界问题的卓越专家、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多产作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于1945年6月得出这样的结论：赫尔利大使领导下的美国政策是全面支持国民党。他谴责这种政策首先是背离传统原则的。他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建议彻底审查赫尔利所执行的美国政策，他在信中说：“在许多人看来，事态的这种发展（美国对一党的支持）将意味着一贯支持中国的政治和领土完整的美国开始实行一条旨在导致中国的政治和领土破裂的政策。”[33]这些传统的感情是采取积极干涉中国政治事务的政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从一开始，这种感情就阻止美国严肃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即在政治斗争中，美国的自身利益将要求它时一方予以积极的支持，甚至参加内战。这种感情使美国官员日益犹豫不决而无法采取坚定的行动。因为他们在仅有的两害之中很少选择的余地。

对实际上无法实现的使中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和对积极干涉的具体反对构成了美国的政策，而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对中国深怀同情，对中国的利益极为关注，这一直是美国远东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伯特·菲斯在评论国务院官员们和美国驻华代表们的态度时说，他们“被一种渴望所激励着，因为中国就是他们的事业。中国的确是他们的事业所在，这应该是个有价值的事业。他们并不像那些只想打赢战争而置中国人民的苦难于不顾的美国官员们。他们想使中国成为一个治国有方、繁荣昌盛的国家，也想使中国成为强大的盟国。”他们对中国在感情上的关注是由于他们对中国内战持一种天然的憎恶态度。1942至1943年间美国驻重庆使馆参赞、1944至1945年间中国事务司司长、1945至1947年间远东事务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在回顾那些年代的感情时说：“我们对……中国爆发全面内战的后果极为关注。特别是我。我曾经在中国，我曾目睹中国内战的后果。”

做一番有价值的事业的希望似乎导致了美国官员对国民政府所持的批评态度——即使姑且不谈这一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在中国保持控制的问题。因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已成为影响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1944年6月初，美国国务院在向美国驻重庆和莫斯科使馆发送的备忘录中说：“美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致力于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它并不关心中国争斗的各集团之间的理论问题；它只关心在中国实施一个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纲领。”据推测，美国对中国的仁慈变成了一种被夸大的中国对美国的友谊。美国在中国深得人心这一过头的看法影响了对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将对美国的远东利益产生何种后果的估计。1944年4月7日，约翰·S·谢伟思对他的上司是这样说的：

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中国并不是由国民

党当前的军事力量和威胁的政策所统一起来的。然而最可能的是：这样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自然会倾向于美国，而美国由于（原文如此）它的同情心、地位、经济力量将比其他列强在中国赢得更大的影响。

对中国人民利益的关切是美国对华政策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据此制定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改革的纲领才能避免出现被中国共产党人所利用的局势；才能创造必要的基础，制定有效的美国经济、军事援助计划，包括诉诸美国军事力量，以遏制共产主义。然而，美国并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它仅仅是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毫无根据的揣测，从而妨碍了美国在中国的军事行动。

（2）军事上的考虑

当以传统的原则和态度去为无法实现的统一而积极制造舆论的时候，以最小的牺牲而取得速胜的最高战时目标，又为这一努力增加了强大的动力。美国官员和军事领导人由于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价值，所以他们认为防止中国公开爆发内战，统一国共两党的军队不仅是极为必要的，而且是责无旁贷的。在双方之间进行政治调处，使他们组成“战时参议会”或联合政府的各种建议，首先是争取有效地使用巨大的中国的军事潜力的政治手段。甚至到了1945年初，这一军事目标还是国务院和在华的职业外交官提供建议的指南针，他们对美国军队放弃了在华北和华东沿海登陆的计划一无所知。战争的进程使局势明朗化，中国在击败日本的战斗中将不再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时政治上的考虑成为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动力，而两大政治集团的军队实现统一，则成为必要的第一步。

在军事上的深谋远虑中，一些美国人希望通过统一中国的军队以实现两个相互重叠的目的：排除阻碍中国对日作战的重大障碍，利用占有有利战略位置、纪律严明、领导有方的共产党军队。所有的观察家都明确地看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将使中国无法竭尽全力对日作战。早在1939年，国民政府就开始对共产党区实行严格的军事封锁，阻止共产党人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扩大地盘，和向国民党控制区渗透。1942年，胡宗南将军率领的十六个师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承担了在陕甘宁边区封锁共产党军队的任务，防止共产党向西安周围的地区发展和渗透。1943年，据美国驻华使馆代办乔治·艾奇逊报告，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可能达40万人。

国共两党之间的对抗和敌意，及他们全神贯注地在中国进行权力之争不仅箝制了相当数量的国民党军队，而且妨碍了有效地使用共产党军队反对日本。自1937年以来，共产党军队的规模迅速扩大，1942年美国驻华使馆的报告说，根据两名左翼情报员的估计，两支共产党军队中较大一些的、装备更好的第十八集团军已有50万至60万人。根据美国军队的情报报告，1945年，共产党人声称它拥有91万人的军队，此外还有200万人的地方民兵武装。而1944年10月，它估计共产党正规军的实际规模是47万5千人。比共产党军队号称或实际的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所占据的战略位置。随着中日战争的发展，共产党人极大地扩大了他们在华北和华东所控制的地区，而美国起初曾计划把这些地区作为进攻日本的机场和军队的集结基地。

在开罗会议确定了直接从太平洋诸岛进攻日本战略之后，在1944年放弃了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之后，美国仍然认为防止中国崩溃是至关重要的。寻求利用共产党军队、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最高统帅部或建立由共产党

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的美国政策在 1944 年的下半年中国面临着军事危机时得以具体化。而这并不是偶然的。赫尔利将军在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意下并不急于利用共产党军队，他赋予中国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极其重大的意义。1945 年 1 月 31 日，他对国务卿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说：“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统一将产生战斗力，这种战斗力至少相当于一支精锐的美国军队。中国武装力量统一的效果将表明，它值得美国以前所未有的态度重视它。”

在中国的许多其他美国官员和军人的思路与此大同小异。他们极为重视利用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位置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来取得宝贵的情报，或者付出很少的代价夺取华北重要的、但是防守不严的据点，及破坏日本的运输线。当美国向日本发动的进攻日益迫近时，他们清楚地了解共产党可能会为在中国登陆的美军提供援助。后来约翰·卡特·文森特在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麦卡伦委员会中作证说：

在 1944 年晚秋，或者可能是在冬季，12 月间，国务院的总的看法是——那时我在国务院工作——美国可能会在华北沿海登陆。那一地区主要被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所占据。我们——所谓“我们”，我包括了格鲁先生，他本人当时也是焦急不安的。——看得很清楚，任何能够援助我们对日作战的力量都应加以利用，这一力量将会得到利用。我们还设想，如果我们利用共产党人便会拯救美国人的生命。

一份注明日期为 1945 年 2 月 27 日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文件宣称：“如果美国将在中国沿海一带采取作战行动，美国指挥员们应该准备好武装共产党人”。这时，国务院的官员并没有认识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放弃了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

只有考虑到处理国家关系时军事的优先地位，才能懂得利用共产党军队的重要性。驻华的美国官员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上被直接的战争紧急状态所支配。约翰·S·谢伟思和雷蒙德·L·卢登从战略的考虑出发为武装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最令人信服的理由。他们在 1945 年 2 月 14 日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在远东政策只有一个直接的目标，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伤亡击败日本。为实现这一目标，一切其他的考虑都应该是第二位的。”1945 年 2 月 26 日，乔治·艾奇逊在提出反对赫尔利纲领，武装共产党人的建议的一份电报中敦促：“最高的军事必要性和直接的考虑应该成为美国政策向前迈进一步的基础。”这一看法得到参谋部全体政治官员的赞同。因而，军事的紧急状态迫使美国官员不得不强调利用共产党军队和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事态不久就清楚了，武装力量的统一只有作为国共两党达成的总协定的一部分才能实现。正如赫尔利所报告的那样：“我曾劝告蒋，为了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防止内战，他、国民党、国民政府有必要向共产党作出慷慨的政治妥协，让他们在国民政府有足够的代表”。或者，如谢伟思和卢登所理解的那样：“美国官方声明中所明确指出的美国政策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并把它作为中国有效的军事行动中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样，在中国两大政党之间进行政治调处的想法是扎根于有效地进行战争的愿望之中的。

（3）关于战后远东政治关系的考虑

从一开始，政治设想便强化着上述的军事上的考虑，引导美国官员遵循一条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的方针。这些政治上的考虑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战后的远东政治结构发生了联系。在深刻的政治动乱中变得四分五裂的中国显然不能完成美国所赋予它的任务。正如一份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未注明日期的《简况汇报文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动荡、分裂、反动的中国将使远东的安定和进步成为不可能，它将极大地增加在西太平洋保持和平这一任务的重重困难，而这个任务主要要由我们来完成。”在美国看来，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只有通过建立民主政府才能实现。这个想法在另一份未注明日期的《简况汇报文件》中讲得很清楚：

美国政府对华的长期政策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即中国必须成为远东主要的稳定因素，这是这一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要求。因而，我们的政策是针对如下目标的：1. 政治目标：建立一个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政府和强大、稳定、统一的中国：a，我们寻求以一切正当的途径促进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它将带来内部的统一，包括调处国共两党的分歧，并有效地履行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义务。

由于罗斯福总统在战后世界的宏伟计划中预见到他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因此他害怕国共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将可能导致内战，使美国卷入与俄国的纠纷。萨姆纳·韦尔斯回顾他于1943年9月与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时讲道，罗斯福对中国的政局表示担忧：

但是他（罗斯福总统）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强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内在的危险更严重。他认为，战后最有可能出现麻烦的地点就是中国……。

美国官员普遍带有罗斯福总统对苏、美在中国问题上陷入纠纷的恐惧感。约翰·S·谢伟思似乎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希望避免为了中国而得罪苏联。他在1944年4月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在决定我们在亚洲的对俄政策时，应避免受中国问题的影响。美国现在不希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希望使自己在亚洲与俄国直接对立起来。”他建议，当美国与中国打交道时，它“应避免卷入中苏关系问题，避免一切向中国（提供）无条件的外交上的支持的举动，特别是在俄国问题上；将美国的对华援助，限制在对日作战的范围内。但是即使是谢伟思的观点与当时《生活》杂志的立场也是颇为接近的，《生活》杂志代表了亨利·卢斯的观点，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之子对美国的政策有着绝对不可忽视的影响。《生活》杂志1944年5月1日的社论是这样说的：

美国没有权利告诉中国政府应怎样与共产党人打交道。俄国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这是个内政问题。然而，美国不能

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如果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法西斯政府、只知揽权的压制性的政府、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政府，那么它更有可能与俄国陷入纠纷，而主张自由、改革、国际合作的政府却不会这样。美国人民无论如何不愿意卷入一场他们认为是在政治上站错了

立场的与俄国的斗争中去。

对苏美在中国问题上陷入纠纷的恐惧感还以一种具体的忧虑反映出来，即俄国是否可能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或满洲建立独立政府。早在 1944 年 1 月 15 日，约翰·P·戴维斯就敦促美国向共产党中国派遣一个军事、政治观察组，它的任务之一是“估价华北和满洲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甚至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简况记录文件》表达了“俄国人可能会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或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和自治的地区”的恐惧感。这种忧虑因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前景而大大增强。另一份《简况汇报文件》指出：

无疑，在华北的军事行动中避免政治和军事上的窘迫和困境是极为必要的。明显和合理的解决就是在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达成可行的协议，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军事指挥部，并与俄国指挥部协同工作。

它敦促美国“不遗余力地实现一切中国军队和俄国军事指挥部之间的合作，以防止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之间军事状况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防止日益增长的中国分裂的可能性”。

以和平方式建立团结和民主的中国被认为是动员中国的军事力量、使中国强大、避免卷入与俄国的纠纷、防止出现另一个独立的中国政权的最好的办法。正如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一样，传统的原则、军事上的考虑、对战后世界的政治规划似乎完美地汇合到和平统一中国的纲领上。和平统一中国是整个美国政策结构中的关键。但它也是整个大厦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它无法理解使中国相互争斗的两方产生分裂的深刻的政治分歧，因为它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

4. 召回史迪威之前的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其后果

（1）1943 年国共关系紧张时期美国的政策

在召回史迪威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美国调处中国国内两党分歧的行动是在三个阶段展开的，即 1943 年夏，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化；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使华；日本的“华东”攻势和它所导致的史迪威危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国民党人以武力镇压共产党人，这是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新威胁和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局势表示关注的反应。1943 年 6 月，国共两党解决分歧的断断续续的谈判又陷入僵局。7 月 6 日，据美国驻重庆的使馆报告说，蒋介石委员长请求共产党人对他所提出的方案作出最后的答复，而这一方案是要求共产党人放弃其独立的政府、并把军队并入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去。另据美使馆报道，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指控国民政府向陕甘宁边区的国共前线又调遣了 7 个师。9 月，美使馆报道说，国民党中有一股重要的力量敦促在苏联重新赢得足够的力量以帮助共产党人之前，就应采取行动反共。这股力量在正在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致力于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压政府与共产党人摊牌。国共两党关系中的这些进展发生在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和 6 月苏联开始从新疆撤军和撤回顾问之后。国民党可能从苏联的行动中得到鼓励，从而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压力。这种被共产党人称为“第

三次反共高潮”[34]的紧张局势的加剧使美国官员大伤脑筋。因为它威胁到计划中的打通雷多公路以进入中国的北缅战役。根据1943年5月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决议，北缅战役将于本年11月进行。

而且，内战将使中苏关系极端复杂化，因而威胁到苏美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苏联第一次通过外交渠道和报刊明确地表达了它对中国内部紧张局势加剧的关注。在外交战线，苏联驻华代表亲临美国使馆，他们按照周恩来采取的方式，指控国民政府试图在武力威胁下将它的解决方案强加于共产党人。他们还努力探询美国在内战爆发的情况下将采取什么行动，特别在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问题上。另一方面，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苏联的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国民政府是加以批评的，尽管它们并没有公开批评蒋介石本人。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由原塔斯社驻华代表弗拉基米尔·罗果夫撰写的，它刊登在1943年8月8日莫斯科《战争与工人阶级》[35]上。罗果夫指控说，重庆的“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投降分子”正在竭尽全力地“策动告发、检举和驱赶共产党军队的勾当”，国民政府在“克服投降分子破坏民族统一和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活动中表现不坚定”。他赞扬中国共产党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组织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领导工作。

为了阻止国民政府诉诸武力，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政治顾问斯坦利·K·霍恩贝克于1943年8月受命对宋子文说明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意图有着官方的兴趣。霍恩贝克告诉中国外长，美国并不敦促中国政府采取反共行动，恰恰相反，它希望避免事端。根据传统的不干涉原则，他对宋说，“关于中国国内政治问题，我们谨慎地避免敦促中国政府采取任何特定的行动”。美国驻重庆使馆的乔治·艾奇逊还对一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说，美国“关切地注视着中国人民中间可能出现的一切不利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严重分歧”。

蒋介石委员长出于某种原因，作出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温和政策的新保证。在1943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上，蒋介石作了发言，制止极右翼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念头。他对他的党说：“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是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应以政治方式加以解决。这必须成为本次全会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原则。”国民党要人们的秘密会议完全服从了党魁的指示，无论如何，党魁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享有否决权，对党的代表大会本身的决议享有否决权。

从可得的材料中，我们无法确定蒋委员长在作出这一宣布时，美国的劝告占了多大的比重。我们也很想知道如果美国没有阐明它的立场，国民政府是否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情况似乎是：只要中日战争在继续，便不会爆发全面内战。在许多地方，日军使国民党军的主力与共产党的根据地分割开来。主要的例外是陕甘宁边区，尽管它仍然是共产党运动的政治中心，但是与华北和华东的其他共产党根据地相比，它正在迅速地失去军事上的重要性。即使向它发动一次成功的进攻也不会使国民党人得到太多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生死斗争中把一个国家完全一分为二，对国民党人来说在政治上是极为不利的。因而，美国的劝告可能使国民党人更加意识到全面内战的政治含义。然而蒋委员长忽视或回避美国劝告的习惯表明，他在这一时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决定性的因素不可能是美国的态度。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严重的武装冲突并未发生。即使是那一时期的半官方的共产党党史也仅仅记载了国民党军队对边界前哨的轰炸和袭击而已。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未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地区的动员工作、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势力和声望、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阴谋的及时地揭露。早期的一部半官方历史书中提及的唯一原因是“动员了国内外的公众舆论”；谴责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这一分析遵循了共产党的官方报刊《解放日报》1943年10月5日的一篇社论所制定的路线。

从表面上看，美国为缓和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似乎取得了预想的效果。确实，美国政府把蒋的党内指示变成国民党不可改变的政策，并在这些讲话和类似的声明的基础上，把和平统一中国的美国政策说成是蒋介石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美国官员满足于对中国的声明做表面的解释，满足于它们与美国政策需要的一致性，从而更加信任蒋介石。然而，“政治问题”和“以政治方式解决”对蒋委员长来说，事实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在实质上，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对他来说意味着诉诸军事压力，促使敌人接受他根据自己的军事实力而提出的要求。[36]无论如何，中国政治的性质除了军事力量的均势外，并没有为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任何其他的内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双方对他们各自的力量估计不同，当一方的要求不能为另一方所接受时，寻求政治解决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战的爆发。

高斯大使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前景不抱任何幻想。1943年10月，他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说，中国所有的政治因素都指向一种结论：“两大敌党之间的继续斗争——在未来一个未定日期爆发内战”。他评论说，不论内战“是在对日战争之前还是之后爆发，那个日期似乎都将主要取决于国民党对打内战的成功的可能性的估价。”中国共产党人也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机关报的一篇社论在分析蒋的言论时指出，国民党领导人可能“现在在拖延时间，以便将来与共产党人作战”。社论继续说，由于下列原因，他们被迫推迟内战：“内战意味着（对日）投降……中国人民支持抗日，反对内战……他们（国民党领导人）从未像现在这样面临着被孤立的严重危机，因为国民党脱离了群众，人民失去了对它的忠诚；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

另一方面，在1943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他们军队的规模极其迅速地扩大。这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华观察员转达给了华盛顿。这些报告尔后又为半官方的党史资料所证实。根据这些资料，1943年是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开始，扭转了前两年走下坡路的趋势。在1941年和1942年，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人的进攻。八路军从54万人减至30万人，解放区人口下降到不到5千万人。共产党干部的损失被报道为“重大”，财经状况“极为困难”。华北发生的严重饥谨使重灾区的士兵和群众不得不吃草根、树皮度日。与这一低潮相比，1943年至1945年的新阶段出现了共产党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边区人口和民兵有了巨大增长的局势。这一时期共产党的发展恰好与日本的“华东”攻势相重合，与美国制止国民党人企图镇压共产党人并使双方和解的加倍努力相重合。

（2）华莱士的使命

美国调解国共分歧的第二个行动——1944年6月华莱士使华的起因可见于指导整个战时的美国政策的整套考虑，即使中国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有

助于调和中美关系。第二个行动方案是在中缅印战区战争进行不利、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征兆之际制定的。1944年5月，当密支那机场失陷后，中美在北缅发动的打通雷多公路通道的攻势被拖延下来了，日本牵制着萨尔温江以西的中国攻势。在“华东”，日军于4月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以占领美国空军机场并打开从北平到广州和印度支那的安全的陆地运输线。到6月底华莱士抵华时，湖南省的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湖南省省会被占领。

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新疆省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发生了边界冲突。苏联政府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通过俄国的土耳其斯坦的陆道向中国的美国空军运送军需品的要求，也表示了它对国民政府的反感。作为蒋本人，他向美国抱怨说，共产党人正在准备向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大本营西安发动进攻。他表示，他确信共产党人由于与苏联达成了秘密的谅解而无法无天。与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形成对比，俄国于1944年3月与日本缔结了一项协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有关西伯利亚渔业和北萨哈林岛（库页岛——译者）的石油、煤矿特许权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行动使蒋更加焦急万分。在这一背景下，华莱士被指令尽一切可能使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和解并在苏联和中国之间恢复相互间的信任。华莱士的使华是意义重大的，这并不是因为使华产生了什么成果，而因为它为我们了解美国、苏联、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材料。在华莱士抵华前不久，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按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与苏联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问题，目的是在调处国共双方的分歧时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斯大林重申了他在德黑兰会议上表达过的看法，即认为蒋是中国现有的最好的领导人，应该对他加以支持。他对蒋的批评仅仅在于蒋未能利用共产党人与日本作战。他认为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与共产党争吵是愚蠢的。他把这个问题付诸一笑：“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人。不管怎样，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想打日本。”

华莱士到达重庆后，向蒋委员长转达了罗斯福总统希望国共两党调解分歧的愿望。至于美国敦促敌对的两党和解的动机，华莱士说得很清楚：“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战争的进行”。“不应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中国和苏联发生冲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说，罗斯福总统感到，鉴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中国人，因此他们从根本上说是朋友，“朋友之间没有不可更改的决定”。他告诉蒋，总统愿意作为“朋友”受到邀请，调处中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为了使蒋信服美国政策是明智的，华莱士向蒋提及哈里曼大使与斯大林的谈话。在一次单独的谈话中，陪同华莱士使华的约翰·卡特·文森特告诉了宋子文这次谈话的要点。

蒋为了答复华莱士提出的与共产党和解的建议，在以后的两次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以及美国的政策作了比较冗长的评价。他千方百计他说服华莱士和文森特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根据文森特的笔记，蒋说，“中国人民并不把共产党人视为中国人，而把他们看作服从第三国际命令的‘国际主义者’”，尽管（第三国际）这一组织已经解散。蒋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依附于苏联、说他们事实上只不过是“农业民主主义者”的说法是“巧妙的赤色宣传”。他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论说：“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要共产主义化。”蒋还努力说服华莱士，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在中国夺权。按照蒋的观点，共产党人现在确

信，日本的失败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希望在战争结束前看到国民党的垮台，这将使他们“夺取政权”。他们的宣传和颠覆行动挫伤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士气。然而蒋再次保证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他还表示，他愿意让罗斯福总统调解国共冲突。

蒋还努力向他的美国听众们描述了他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时所面临的国际纠纷。这一分析可以从如下几点作出说明：国民政府因为共产党人与第三国际的联系而不能公开批评共产党人，因为它害怕得罪苏联。但这一不利条件由于共产党人不能公开利用苏联的支持而得以抵销。不幸的是，共产党人成功地利用了美国和美国舆论来强迫国民党接受他们的要求，并赢得了优势。因为美国政府给国民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但对共产党人，他们却没有施加同样的压力。这种态度的起因是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对中国的局势产生了根本错误的理解、未能意识到“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府所构成的威胁”，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日本人中的实用性”。蒋建议美国对共产党人采取“冷却”态度，并发表声明要求共产党人与中国政府达成协定。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华莱士使华时，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统帅部或联合政府的想法在美国政策中仍未明确。华莱士在与蒋的谈话中仅仅强调了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必要性，但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华莱士和文森特都力陈采取措施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经济状况的重要性。文森特特别说明防止中国出现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土地改革。

华莱士离开重庆之后，于6月26日从昆明给罗斯福总统发了一份电报，建议他接受蒋的提议，任命一位私人代表与蒋共商军政大计，指挥在华的全部美军、全面协调美中的军事行动。他对罗斯福总统说，史迪威并没有得到蒋的信任，不能胜任工作。华莱士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建议任命陈纳德将军，这是由文森特提名的。然而，受陈纳德将军派遣护送华莱士的约瑟夫·艾尔索普指出，陆军部会反对任命陈纳德。此后，华莱士在他的电报中建议，选择蒋表示过钦佩的魏德迈。华莱士在7月10日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最后报告书建议，美国政策“不应仅仅限制于支持政府”，这个政府在实质上是“以蒋为首、得到地主和与地主关系最密切的军阀集团以及蒋的银行家集团支持的联盟”。相反，华莱士建议美国支持“一种新的联盟”，这一联盟由进步的金融商业界的首脑人物、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一大批人、“相当一部分既不对地主阿谀奉承，又不对农民感到心惊胆战的将军和其他军官组成”。他把后来到台湾任民国副总统和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张发奎以及白崇禧划为最后一组人。他设想把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作为帮助他建立这一新联盟的手段。至于蒋即将发挥的作用，华莱士说明：“如果他保持着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能力以发号施令……他就会摆向新联盟并领导它”。[37]在华莱士实行经济改革和使用美国援助帮助建立一个新的政治联盟的建议中，孕育着美国政府的一个纲领，如果这个纲领得以通过，并在寻求与共产党人达成协定的努力中被置于优先的地位，那么它可能会改变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组合，实现新的非共产党联盟，并以此抵销共产党人日益增长的力量。然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强调与共产党人达成协定。不久，由日本的“华东”攻势引发的严重军事危机使罗斯福总统和国务院积极寻求与共产党人进行军事合作，并为此目的说服蒋建立一个联合统帅部和联合政府。

事情似乎很清楚，蒋向华莱士作出保证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增强罗斯福总

统对国共两党可能达成协定的信念。华莱士回国后，罗斯福总统在给蒋的一份电文中认为，蒋的保证完全是中国方面有效地进行战争的序曲、象征着中、苏关系的改善、和在中国早日实行“民主纲领”。然而正如国共两党谈判所表明的那样，蒋希望强行实行政治解决，确保最终消灭共产党人。在华莱士使华后不久，高斯报告华盛顿说：“（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显然是中央政府在寻求通过政治手段完成对共产党人的消灭，而后者正以同样的手段为确保生存而斗争”。美国与国民党在共产党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使蒋对他愿意让美国作调停的表示变得毫无价值。只有当蒋说服美国支持他的政治纲领或者使美国接受他的政治纲领之后，他才会真诚地欢迎美国的调处。而这被证实是不可能的。马歇尔将军将会发现，在他试图按照美国的观念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时，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一样，应对他的努力的失败负有责任。

华莱士使华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缓和效果。正如蒋对华莱士所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的条件仍然是把共产党军队并入中央政府的军队，把当时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作为“中国在行政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新合并。作为回报，共产党人将被授予某些不确定的特权，成为合法的政党，并得到危如累卵的集会和讨论自由。1944年6月5日的一份政府建议表明，蒋愿意允许共产党人从47万正规军和共产党人声称拥有的200万“民兵”中保留下10个师的军队。其余的将在国民政府规定的一个具体日期被解散。更为重要的是，这10个共产党师“必须在某个指定的时间内集中服役”，他们“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国民政府还想有权任免共产党根据地的最高官员。共产党人既强烈反对关于在某个指定的时间内集中部队服役的规定，又强烈反对解散军队的规定。如果这些规定确实得以实施，“集中部队服役”很可能意味着曾由这些军队控制的地区会急剧减少，而这可能正是国民党人计划中所要取得的效果。这也就是说，政府要求共产党人所做的是走向自我毁灭的第一步，而这种自我毁灭被宪法保障和政府的机构完善等吸引人的法律公式乔装打扮起来。同时，华莱士使华并未限制共产党人强化他们的要求。相反，它导致美国派遣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由于“它对国民党所产生的政治影响”，毛对它表示欢迎。共产党提出的解决条件与蒋的解决条件有天壤之别。一方面，他们要求政府承认华北共产党控制的各级政府，要求政府向共产党军队提供物资援助和租借法案的军需品。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有机会作为一个享有言论、报刊、集会、结社自由的合法政党，发展他们在国民党中国的影响。在华莱士抵华之前，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这些要求。当然，华莱士使华并未使共产党人降低他们的要求。事实上，随着共产党力量的增长和政府影响的减退，共产党人逐渐提高了实现解决的要价。这在国民党谈判者递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一封信中生动地反映出来：

说明来函所提种种问题，早已一一奉答，其中一点，即中央提示案对于去岁林彪师长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见，已经“大部容纳”，确系绝对真实。但先生依然强调“距离太远”，可是距离远的原因，不外是中共的要求与时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较去年林彪师长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十二条又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来函又于十二条以外，加上所谓“口头八条”，要求既与时俱增，距离则不能不远。例如“陕北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问题，林师长所提为“陕北边区（着重号是作者所加——译注）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地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签字的文件，并未列入

“其他抗日根据地”；中共所提十二条中，则要求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抗日根据地（着重号是作者所加——译注）民选抗日政府”；先生来函则更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华北、华中、华南（同上——译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的承认而言，此种逐渐变化，逐渐扩大要求的情形下，倘商谈不能接近，其责任究在谁方？

此外，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无疑将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一切军队和政府的合法性。而这些军队和政府因此肯定会日益发展起来。他们根据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成就”和为反对共同敌人而建设军队的必要性为基础说明他们与日俱增的要求是合理的。毛冷嘲热讽地质问国民党人：为什么政府要解散打胜仗的军队（当然是指共产党军队）？为什么政府拒绝正式承认从日本手下解放了的地区（是指共产党根据地）？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以“抗日的必要性”的名义，要求政府承认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国民政府允许他们在仍然由政府控制的地区内发展势力。

国民政府对华莱士和文森特关于有必要进行土地改革的劝告不屑一顾。这时候，蒋还没有认识到为使政权稳定而进行土地改革的意义所在，因为他对导致共产党影响扩张的因素有着根本错误的估价。他在1944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产党的组织要素是（1）暴力（即压迫）与残酷屠杀；（2）特务（即控制和监视）与压制。它的训练目的是：（1）消灭民族主义精神，培养国际主义精神（摧毁民族历史和民族道德），（2）绝灭人性，培养兽性（任意把社会划分为阶级，制造成仇恨与斗争……

在这前两天的日记中，他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建立专政、控制社会、发展生产中取得了某些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他认为在日本封锁线后的地区，他们只能发展秘密组织，他们对人民的控制是不会长久的。这些评价强调了共产党的控制机构，而它只不过是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之一。日记没有指出共产党人得到的群众支持，而美国军队情报报告却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蒋显然认为，只要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被摧毁，他们就会被消灭。因而，他作出结论说：“只要我们的军队到达这些地区，人民就会欢迎我们来解放他们。”他甚至认为，只要有机会，许多共产党员和干部会站到他的一边。这样，当他声称寻求政治解决时，他的希望却完全寄托在成功的军事战役上。只是到1949年5月，共产党军队已经跨过长江，蒋才制定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这样，蒋直到时间耗尽才看到土改的急迫性。结果，国民党人既无法在政治竞争中获胜，也无法在战场上获胜。

（3）1944年“华东”危机期间的加倍努力

美国为在中国国内实现和平的第三轮努力，是美国应付由日本攻势所招致的日益加剧的“华东”军事危机的计划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攻势的第一阶段是日本于4月19日发动的，旨在消灭黄河以南京汉铁路线上的共产党人。第二阶段是5月27日的长沙事件。1944年6月28日，华莱士离开重庆四天之后，日军向“华东”的主要空军基地、桂林的门户和堡垒衡阳发动了进攻。当日本向桂林进军，对战时首都重庆和喜马拉雅驼峰终点站昆明似乎构成严重威胁时，军事危机加深了。这一危急局势使美国不断作出积极努力，为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撮合。

7月1日，马歇尔将军问史迪威，史迪威对把主要力量从缅甸转向“恢

复、实际上是指指挥中国本土的中国军队”有何想法。马歇尔所说的“中国军队”不仅指国民党军队，而且指共产党军队，史迪威也是这样理解的。在询问史迪威对这一建议有何想法时，马歇尔同意了陆军部总参谋部作战司6月30日的建议，即史迪威由中将提升为四星上将，并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这样，在史迪威统帅下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倡议是作战司通过马歇尔提出来的。

史迪威并不反对使用共产党军队的想法。曾经有两次当军事前景看上去暗淡时，他把这个想法作为解决困难的可能的途径。1942年4月，当看到没有希望再得到一个美国师以加强他在缅甸的力量时，史迪威随口对他的部下说，他要是在缅甸有些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好了，他敢肯定，他们会服从他的命令。另外一次是在1943年9月，日军在向长江流域施以重压时，史迪威将军向蒋委员长递交了一份阻止日本的进攻的详细计划，这一计划包括使用共产党军队，在华西北发动牵制性的进攻。为此目的，他建议共产党人应从国民政府所占有的武器弹药库中得到军需品。使用共产党军队的建议是在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达到高潮的时候提出来的，是在国民党中重要的一派敦促该党诉诸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人的时候提出来的。不用说，史迪威的建议遭到蒋委员长的反对。不知是否出于巧合，此后不久美国就开始严肃认真地进行召回史迪威的工作。

这时，在并没有史迪威及其同僚的怂恿的情况下，“华东”危机使作战司和马歇尔将军也同意了使用共产党军队的想法。史迪威在答复马歇尔的提议时，对他的上司说：

即使授与（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全部权力，由于（“华东”的）损失是如此巨大，我认为只有一个补救的机会。这就是从山西发动反攻，经过洛阳进攻郑州和汉口……共产党人也应在山西参加进来，但是如果蒋委员长不与他们签定协议的话，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两年以前，他们提出与我一同作战。他们现在也许还会听我的。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在一封日期为7月6日的致蒋委员长的电文中告诉蒋，由史迪威统帅所有的中国军队。这个建议意味着，一旦租借法案军需品成了史迪威统帅军队的一部分，它们就会分配到共产党军队中去。罗斯福总统在另一个电文中说，“敌人正在逼迫我们走向灾难，这时候拒绝任何抗击日本的人所提供的援助似乎都是不明智的。”

这样，在已经是困难重重的任务中，又增加了复杂因素——与蒋委员长谈判。蒋一开始公开宣称他在“原则上”同意罗斯福任命史迪威的要求，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表明，他不同意使用共产党军队。后来，他向高斯大使恳求说，美国不应该强调使用共产党军队击败日本的必要性，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受一个外国势力的影响。”他向高斯指出，他认为与共产党合作的问题不会因为为中国军队任命一位外国司令官而得到解决。[38]

尽管事实如此，有关任命史迪威的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使用共产党力量的建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第四章中曾试图表明这一点。加倍努力地推进利用共产党力量的计划的关键性后果毋宁说在于政治领域。因为这使允许共产党人进入中央政府的某些负责机关，并赋予他们以真正的权力的想法得到巨大的动力。显然，如果双方之间不达成某种政治协定，以使共产党人在有关战争问题的决策中有发言权，那么利用共产党力量是不可能的。史迪威认识到这一点，他对马歇尔说，除非蒋委员长与共产党人达成某种协定，

否则他们是不会参加解救“华东”紧张局势的反攻的。7月14日，在罗斯福总统建议利用共产党力量一周之后，他向蒋呼吁与共产党人达成一个“运转协定”。

罗斯福的劝告和蒋的爱好之间的巨大鸿沟在蒋8月的一篇日记中生动地展现出来：

只要我还活着，还健康，国家就有前途。尽管共产党有国际背景和阴谋诡计，总有一天它将会完蛋。过分焦虑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我能承受辱骂，等待时机。如果时机成熟而没有别的选择的话，那么应付局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快刀斩乱麻。这时候，一切牺牲都在所不惜，哪怕冒国破家亡的危险。[39]

8月30日，高斯大使在与蒋委员长的一次谈话中告诉这位国民党领袖，美国政府“对尽快解决中国国内问题很感兴趣，因为它看到中国军队之间相互对立，而不是共同对日作战”。他建议成立由各党派参加并承担责任的“某种形式的负责的战时参议会”，把它作为统一中国的第一步。国务卿赫尔在与罗斯福总统磋商后，对高斯大使的报告作出答复。他请大使告诉蒋委员长，总统和国务卿认为高斯先生关于成立联合参议会的建议“既是及时的，也是切合实际的，值得认真考虑”。根据这一指示，高斯于9月15日再次试图说服蒋委员长为联合作战成立一个“中国各党的联合参议会”。

这时候，共产党人随着势力的壮大和“华东”危机的加深，提高了他们达成协定的政治要价。194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政治事务领域内，他们仅要求“在《抗战建国纲领》中取得一个合法地位”，并要求实施“三民主义”。这个《纲领》是1938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战时的政策宣言。它仅仅规定“在孙中山先生革命原则的范围内，或根据法律规定”，允许人民有言论、报刊、集会的自由，同时把一切战时权力置于国民党和蒋介石将军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要求的仅仅是实施国民党向中国人民允诺的有限的、含糊其词的有关自由的保证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取得一个合法地位。与这一温和的要求形成对比，1944年6月6日，共产党人要求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保障言论、报刊、集会、结社、人身自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实行地方自治政府”。他们不仅增加了一系列重要的要求，而且把党的自由和合法地位以及其他要求理所当然地提出来了，他们再也不以国民党的《纲领》为基础了。这时，当美国向蒋提出扩大他的政府基础的劝告之后，共产党人又呼吁改组政府。我们无法肯定共产党人是否由于美国的立场而胆大包天，或者这种大胆达到了何等程度，但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无疑各自出于自己的原因，提出相当类似的具体纲领，以防止中国面临的危机。

在高斯第一次敦促蒋成立由各党代表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战时参议会”仅仅半个月之后，重庆主要的共产党代表之一林祖涵于9月15日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希望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统治，成立包括一切抗战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以后，毛和跟随他的党的历史学家针对林的发言追溯了共产党为建立联合政府而提出的正式要求的前前后后。[40]但是，先前共产党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的政策并不像毛和党的历史学家在对历史的解释中所表现的那样明确。那时延安一位“观察员”的评论和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并没有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他们仅仅要求就国家事务召开紧急会议，取消“国民党”的寡

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联合政府的口号似乎是驻重庆的共产党代表本身首先提出来的。他们身处舞台中心，与各小党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体察中国的感情和美国政策的发展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只是当林的讲话在各小党派之中引起积极的反响之后，在高斯 9 月 15 日劝告蒋成立“中国所有各党联合参议会”大约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在 10 月 10 日的一次讲话中呼吁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而这个政府有权重新组织最高统帅部，邀请所有的各大军队的代表参加，因而组成“联合最高统帅部”。10 月 13 日，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代表林祖涵在致国民党谈判者的一封信中正式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周的讲话、林的正式要求提出之际正值日本向主要的美国空军基地、“华东”的军事政治中心桂林迅速推进，中国的军事危机加深之时。这样，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在国共谈判中第一次作为一项议程正式出现了。

第六章美国对共产主义的印象和美国的政治传统

1. 赫尔利的乐观主义以及他所寻求的对国民党有利的政治解决纲领

召回史迪威意味着史迪威——马歇尔压力策略的失败。它没有改变美国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实际上，开始作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之后又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将军，有力地遵循了这一政策。在赫尔利的优先计划中，从政治上统一中国是从属于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一总目标的。用他自己的解释来说，美国政策应是：

(1) 防止国民政府瓦解；(2) 支持蒋介石作为共和国的主席和军队的大元帅；(3) 调和蒋委员长和美国司令官之间的关系；(4) 促进中国战争军需品的生产，防止经济崩溃；(5) 为击败日本而统一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

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对美国政策的这种理解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告诉赫尔利，赫提供的情况和评论使他对中国问题“有了远见卓识”。1945年2月，赫尔利向华盛顿报告说：“我坚信，我国政府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任何我认为是削弱了国民政府或蒋介石领导的原则及方法”。赫尔利的方案得到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支持。正如赫尔利于1943年11月对罗斯福所说，他的优先计划显然与这样的想法有关，“可以考虑中国的中央政府为实现击败日本这一更加直接的目标，为在国内维护它战后的统治地位而比较重视保存实力这一问题。”

为了维护蒋介石的领导权，赫尔利的计划包括两个实质性的因素。第一，只是当两党缔结协定之后，他才向共产党提供军需品，对此，蒋是会慷慨地同意的。1945年1月31日，他向国务卿报告说：“在我与共产党人进行的一切谈判中，我坚持美国不应向作为一个政党或作为反国民政府的暴动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军需品或援助。美国向共产党提供的任何援助必须经过中国国民政府。”1945年2月15日，他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他的观点：“我的政策是，我们不向中国战区的任何个人、运动或组织提供援助……我受命支持中央政府，我将不遗余力地履行这一命令。”

正是根据对美国政策的这种理解，赫尔利于1945年1月采取步骤抨击魏德迈参谋部制订的，由魏德迈批准的计划，计划的内容是在中国的领土上，由美国军官指挥4000至5000美国伞兵和技术人员的行动。[41]1945年8月，他还拒绝了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将军为使投降日本的伪军背弃日本支持的南京政府而提出的借贷款2000万美元的要求。赫尔利在拒绝共产党的计划时写道：

如果我们同意共产党的计划，或者准予朱德提出的租借法案援助和财政援助的话，那么美国支持蒋介石作为军队的大元帅和政府的主席，防止国民政府崩溃的既定政策就会失败。尽管朱将军所要求的财政援助最终可能会证实比从美国进口相等数量武器弹药用于反对日本更加节约，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这种帮助将等于向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提供武器，因而是个危险的先例。

赫尔利实行和平统一中国纲领中的第二个因素是避免给蒋委员长施加压力，不强迫他向共产党人提出更诱人的谈判条件，不在他不愿意的情况下，压他对他的政府和政策实行根本的改革。正如赫尔利在处理史迪威危机时所

表明的那样，他不赞成史迪威—马歇尔的压力策略。他在 1944 年 10 月 13 日给总统的电报中建议召回史迪威时指出：“史迪威的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他可以征服一个领导着一个革命中的国家的人、一个七年来指挥着营养不良、装备低劣、实际上是没有组织起来的军队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的人。”相反，他认为：“蒋委员长对符合逻辑的说理的反应是积极的，领导人和美国政府可以与他打交道。”他从一开始就乐观地认为，解决“所谓共产党问题”的方法是可以找到的。[42]

赫尔利认为，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从道义上和政治上加强国民政府。对赫尔利来说，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最初是这样的一个纲领，即国民政府将取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以此作为同意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政党的交换条件，共产党人在一个具有民主制度的政府下，将享有一切政治自由和公民权。这就是他于 1944 年 11 月制订的国共两党协议草案的五点建议的意义。它被共产党人所接受，但却遭到蒋的反对。之后最少有两次，赫尔利试图说服蒋委员长同意他的建议，并指出了它的价值所在。他争辩说，他的五点建议的纲领是共产党同意向国民政府交出军权的唯一纲领。但是他一无所成。

由于赫尔利将军的纲领并没有考虑到使用美国压力强迫蒋接受他的观点，或者向共产党人提出更好的谈判条件以求达成协议，因此，他逐步走向支持蒋委员长的计划以解决共产党问题。蒋委员长的计划一针见血地指出，它的目的实际上是使共产党军队合并，作为交换，他将建立“宪法”统治，但这实际上并不会改变国民党的权力地位，也不会改变国民政府下的政治生活状况。当时，许多在中国和在美国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都指出，共产党人是不会接受这个计划的。然而，赫尔利在放弃了自己的初步计划后，就集中全力地试图以蒋的条件，至少是以蒋愿意接受的那些条件，去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赫尔利的基本设想是，既然苏联支持美国扶植蒋的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最终不得不接受蒋的条件。这种乐观主义的设想出自三种信念。第一，至少直到 1946 年 1 月，他一直认为苏联将全心全意地追随美国的对华政策。第二，他一开始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中国两大党在民主结构内足以在基本的政府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调解分歧。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和真正的群众支持抱怀疑态度。他感到，如果共产党人知道苏联不会支持他们，如果美国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拒绝援助他们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就会满足于在统一和民主的政府内成为少数党。同时，他坚信，如果国民政府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忠告，那么它就会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自己的力量。[43]他对国民党长期控制联合政府的能力是乐观的。因此，他相信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将会有效地支持国民政府。在进行斡旋的第一阶段，他并没有意识到国民党如果不是因为不久后面临着失去控制的严峻危险的话，它是不可能接受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在他斡旋活动的最后阶段，他固执地抱着一个信念不放，即以国民党的条件达成政治解决是可能的。事态的发展与他的乐观主义恰恰相反，并最终使他的整个纲领破产。当他于 1945 年 11 月辞职时，两大敌党之间并未达成任何真正有效的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空前强大，俄国人阻止国民党人采取夺取满洲的行动，却在帮助那里的共产党人，而美国决定不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尽管赫尔利的政策

是支持国民政府，但是蒋的政权并未得到巩固，它既没有取得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改革。尽管蒋制定了和平统一中国的纲领，但是中国的内战迫在眉睫。尽管他成功地取得了苏联领导人的口头保证，但是俄国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他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察觉到这一变化。

（1）赫尔利对苏联的最终意图的信任

赫尔利对苏联的诚意的信任和对苏联的保证的过分依赖是于 1942 年 11 月形成的。那时，他带着罗斯福的介绍信访问了苏联，他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会议，并在苏方陪同下视察了斯大林格勒前线。1943 年 11 月，赫尔利当时是罗斯福驻中东的私人代表，他被总统派往重庆，试探蒋对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晤的态度。蒋对赫尔利说，他怀疑俄国有使中国共产主义化，并可能吞并一部分中国领土的意图，赫尔利则“向他回忆起斯大林所说的话：共产主义的根本方针是放弃世界性的征服”。赫尔利试图使蒋相信他的观点，“斯大林现在认为，共产主义可以在俄国一国取得胜利，而不必试图把它强加于世界的其他国家”。他告诉蒋，他认为“俄国再也不会支持和指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活动了。”他提出俄国本身对共产主义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抵销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刺激人的因素。”为证明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他指出最近签署的莫斯科四国宣言，指出四国同意为维护和平而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1944 年 8 月，赫尔利被任命为总统派给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他在赴华途中路经莫斯科，目的是取得苏联对华政策的解释，因而为他的对华政策奠定基础。在 8 月 11 日的会议中，莫洛托夫对赫尔利说，苏联很高兴看到美国“在中国事务中，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并帮助中国人统一祖国。莫洛托夫极为轻视中国共产党人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上的关联，他断言，中国有些人“把他们自己称为共产党人”，这仅仅是“他们对悲惨的经济状况表达不满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他接着说，苏联政府“不应与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发生联系。”他提示说，如果我们可以说服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和改善经济状况而工作，那么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就会忘记他们（与共产主义的）政治联系”。他表达放弃对中国事务的兴趣的方式意味着如果蒋委员长采取措施改善中苏关系，那么苏联可能会对中国表示出更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将对国民政府有利。莫洛托夫的保证与罗斯福战后同苏联合作的宏伟计划和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不谋而合。赫尔利接受了这些保证，并把它们当作他执行罗斯福政策的纲领基础。在到达重庆后不久，他就向蒋委员长传达了这条所谓至关重要的消息。的确，他认为他说服了蒋，使他从表面上接受了莫洛托夫的保证。赫尔利在 1944 年 12 月 23 日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表明了这一点：

当我抵达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工具。他现在相信，俄国政府根本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1）俄国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2）俄国并不想恢复，也不想看到中国发生纠纷和内战；（3）俄国希望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和谐。这些事实足以说服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苏联的代理人。他现在感到，他可以把共产党作为一个没有外国联系的中国政党，并与它达成协定。

鉴于蒋在这之前和从很早时起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所持有的深

刻信念，赫尔利关于蒋轻易转向他的观点的结论似乎是言过其实了，如果说不是完全错误的话。蒋可能把赫尔利与莫洛托夫谈话的要点当做苏联可以在劝阻之下，在国民政府的外交妥协之下，不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积极的支持。对苏联意图的这种看法似乎从中日战争爆发到德国侵苏期间在苏联的对华政策中找到了根据。

为了把日本拖在中国，苏联向国民政府提供了总数达 2 亿 5 千万美元的三笔贷款，以购买武器弹药，这些贷款全部落入中央政府一家手中。根据蒋的推算，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失去苏联的支持，它们的政治地位就会遭到严重削弱。因而，赫尔利的保证可能发挥了三重效力，即它们也许加强了蒋以外交上的妥协使苏联冷淡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它们也许说服了蒋使他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并寻求以政治手段消灭他们；它们也还可能使他更加倾向于拒绝向他的敌人提供更好的谈判条件，同时减少了他重振政府的急迫感。我们在后面将评价赫尔利对苏联的政策和意图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仅想指出莫洛托夫对中国共产党的描述明显地影响了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

（2）赫尔利错误理解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性质

在到达中国后不久，赫尔利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与国务院一些官员一样，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反复使用了“所谓的共产党人”这样的词句。这种最初的感觉由于他对中国舞台的表面印象和他对中国共产党使用民主口号和面向群众的声明的错误理解而进一步得到加强。1944 年 11 月，当他在延安与共产党人谈判时，他对俄国国家控制经济和中国共产党地区自由经济之间形成的对比深感兴趣。赫尔利对麦克阿瑟听证会的参议员说：

我了解俄国的共产主义。我要想买任何东西、去任何地方，只有通过苏联政府。现在到了中国的共产党地区……我看到商店开着门，股票市场开着门，最高的出价人得到财产，货币在交换，利润动机在生效。这时如果有人告诉我这就是共产主义，我知道他是错误的。

赫尔利对延安经济生活的评论并非是错误的，他得出的共产党地区的经济并不代表共产主义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本身也会在这一点上全心全意地同意他的看法。因为毛泽东在中日战争期间曾把中国社会解释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共产主义革命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革命的这一阶段，共产党人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所坚持的和为赫尔利所忽略的是中国革命属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至于“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词，毛泽东指的是“被无产阶级领导的或由无产阶级参与领导的”革命。[44]毛泽东的论断只不过是重申了旧式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它们的依据是列宁对革命内容和革命的阶级力量所作的区分。当革命内容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领导革命的阶级力量将是无产阶级，或者是把无产阶级作为重

要因素的阶级联盟。赫尔利以延安的经济性质来评价共产党的性质，说明他对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一无所知。

赫尔利对共产主义的无知显然是对共产党的理论和论战性的刊物，特别是那些为忠诚于党的人写的指示注意不够的原因和后果。他过分依赖对党外人民所作的宣传，特别是对外国访问者和记者所说的话。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坦率地在口头上表明赞成民主原则和国民党的创始人、第一任总理孙中山的原则。这些过渡性的口号和政策被赫尔利当作根本的目标和原则：

诸位应知道，然而——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原则，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般被称为中国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民权、民族、民生。共产党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以民主为基础的。这便导致了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原文如此）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原则恰恰是中国国民政府颁布的那些原则，他们也赞成国民政府的目标……然而，实际上，中国两党之间的分歧似乎并不在于期望达到的目标之中，因为双方都宣称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权力分散、遵循民主路线、采用民主程序的政府。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可以逐步解决的。

之后，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赫尔利解释说，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声明是因为他受罗斯福总统的建议的影响，总统建议他讲一些对共产党人有利的话，以便维护统一中国的基础。但他没有极力试图把他的辩解限于这种解释。相反，他欣然承认，“事情的确看起来是……我失去了洞察力，我并不十分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如果这就是参议员麦克马洪所要试图证实的事实，如果为了辩论起见，这将有利于参议员和我本人的友谊的后，那么我承认——我对他们会怎样讲毫不介意。”[45]此外，1945年初，在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赫尔利说，“共产党人实际上并不是共产党人，他们为民主原则而奋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赫尔利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是他的这一信念的反映。

赫尔利显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所讲的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仅仅是他革命的“第一阶段”的目标。[45]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宣告：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

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思想是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提法的一个发展，这个提法可见于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和1922年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这后一种战略思想是在1905年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同问世的。列宁明确地指出，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仅仅是临时性的，无产阶级应尽早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转化。列宁与毛泽东的观点一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后面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纲领。

在赫尔利任驻华大使期间，共产党领导人所发表的类似的讲话强调了这一点。毛泽东在他于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

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着重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问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在毛作报告后不久，当时在重庆的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王若飞将军坦率地对赫尔利说：“（共产）党现在支持民主原则，仅仅是把它们作为建立未来的共产党国家的跳板。”

公正地说，毛泽东确实否认过如果共产党掌权，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政府的意图。但即使是三十年代初期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和党的一体制结构本身也是很有疑问的，即“全部或部分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是否就已是共产党控制的专政。也许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实质在他的一些不那么著名，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文章中得到更加正确的描述，1941年，毛泽东说：

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他还说：“各根据地（即共产党地区）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由于共产党人对这些“根据地”实行无争议的控制，由于有活动能力的政权反对派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或“托洛茨基分子”而被消灭，毛的这些话无法使人消除疑虑。

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共产党人仅仅是出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理论而支持这一原则的。即使在这个时期，他们也仅仅支持他们自己的解释版本，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格外谨慎地维护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特性和纯洁性。毛一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另一方面，他又赶忙指出：

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

毛泽东自己指出，孙中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的纲领上、世界观上和革命的彻底性上也看法不同。他明确指出，他所谈的“三民主义”是共产党对孙中山主义的解释。他坚持说，当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达到高峰时，孙中山在1924年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新的”、“革命的”、“真的”“三民主义”与“旧的”、“反动的”“三民主义”的界限是前者包括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用毛泽东的话说：“只有这个‘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他还明确指出，“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在他的《论联合政府》（1945年）中，毛泽东更加有力和更加简明地重申了这些观点。这个解释与国民党政界

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背道而驰的，这种意见认为共产党采纳孙的所谓“三大政策”仅仅是一种政治花招，它并没有改变孙的思想方针。事实上孙中山自己并未使用“三大政策”或“三项政策”的字眼来概述过他亲俄、亲共的政策，即他在1924年至1925年期间采用的政策。“三大政策”这个字眼是共产党提出来的。

事实上，在赫尔利谈到两党在基本原则上的颇为相似的几年以前，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便随着政治和军事冲突日益加剧而逐步激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象征着为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为强调共产党的纲领和目标与其他集团的纲领和目标的不同，为恢复运动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理论的统一性，为在整顿共产党力量的过程中制定明确的党的路线而提供理论基础的一种尝试。这篇文章发表于1940年1月，共产党人把那时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时期，当时，据说国民党军队向共产党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就国民党人而言，他们试图通过提倡回到传统的价值观念上和恢复新儒教而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针对阶级斗争理论，国民党提出天下太平的理论。针对共产党人采纳的和提倡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具体纲领，国民党提出传统的行动准则——礼、义、廉、耻的“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八德”。针对共产党的迅速现代化的纲领，国民党指出在中国固有文明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共产党人传播的是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共产党的战略与策略方面的著作，而国民党则提倡研究中国古典著作。

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在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问世时达到了新高潮。这本书本来是为国民党官员和中国人民写的政治教科书。在这篇政治论文中，蒋谴责共产党呼吁“青年抛弃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蒋把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他评论道：

至于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这仅仅反映了英美理论与苏俄理论之对立。这些理论不仅不符合中国民族生活之必需，而且它们亦与中国本身的文明精神相对立。赞同这些理论的人们完全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完全失去了学习目标，而这个目标就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研究和运用学到的知识。

国民党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人未指名地加以谴责，说他们保留独立的军队和实行地区控制是“新形式的封建主义和新形式的军阀主义”。他主张，政府将试图本着“宽宏大量”的精神处理地方武装控制的问题，寻求“以合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共产党人不愿意放弃他们封建的和军阀式的方法，政府宽宏大量的政策将不生效。显然，蒋对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并不乐观。

蒋的《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激烈反攻，而他们曾对国民党大力批评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言不发。在1943年7月20日发表的一本题为《“中国之命运”的批判》的小册子中，一位重要的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谴责蒋的思想是“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或新独裁主义（尽管形式上仍然保持着三民主义的面孔）。”他暗示说，蒋的政治论文的出版是“向中国人民（即：中国共产党人）的宣战，是准备在思想领域和公众舆论中发动一场内战，以求在两年之内决定国民党的命运。”当时，高斯大使向华盛顿报告了蒋的《中国之命运》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攻的政治意义。如果赫尔

利略为注重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意识形态论战的话，那么，他就会轻而易举地发现双方之间不可能填补的鸿沟。

然而，我们不应忽略一点，即尽管赫尔利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但是他坚定支持国民党人，毫不动摇地拒绝武装共产党人，除非他们与政府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本身极为注意他的行动，而拒绝听从他的花言巧语。共产党的新华社在评论赫尔利 4 月 2 日的答记者问时说：“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他早期建议以共产党可以接受的条件成立联合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直率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现在真相大白，这个评论是毛本人写的。但是赫尔利的谈判纲领，特别是他的五点建议的草案表明，他对中共性质的错误看法使他不能正确地估价政治冲突加剧的趋势，过低估计中共取得整个政权的决心，并夸大了和解的可能性。

（3）赫尔利过低估价共产党的力量

就赫尔利本人的政策而言，他的三个信念中最重要的可能是他对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估计不足。这种估计使他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共在控制中国的斗争中无法成功地与国民党竞争，苏联的影响将主宰中共的政策，一旦俄国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保证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就会向后者妥协。对赫尔利和蒋来说，这似乎是与苏联达成协议，执行雅尔塔协议的决定性的原因。赫尔利于 1945 年 7 月初递交的一份报告非常明确、有力地阐述了这些观点，值得我们大段引证：

我们相信，苏联的影响将支配中国共产党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不相信斯大林曾赞同或将赞同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仍充分希望苏联支持它们抵抗国民政府。除非苏联公开表明态度，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

我相信，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如同去年九月我曾向总统所叙述，而且此后曾报告多次的……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仍相信苏联支持他们。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不会改变，除非苏联与中国签订条约，条约中，苏联应允支持国民政府。当中国共产党相信苏联不支持他们，而国民政府能充分正视现实，在政治上采取宽大的解决办法时，则他们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的谈判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以等候莫斯科会谈的结果。[47]共产党的领导是聪明的。当警告（指即将发生危险的征兆，出自圣经——译者）出现在墙上，他们自然会去读的。任何争辩不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而只有事物的坚定的发展将改变他们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武装的力量曾被夸大；共产党统治的领土区域曾被夸大；依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数目也曾被夸大。国务院的官吏们、军官们、新闻报纸与无线电宣传，大都接受共产党领袖们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声明。虽然中国共产党如有苏联支持，方可在中国发动内战。如无苏联支持，则中国共产党终将以一个政党的地位参加国民政府。[48]

这样，赫尔利将军对共产党力量的估价在他对苏联政策和意图的估价的支持下，导致他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和蒋与苏联达成协议的计划，即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用中国的外交妥协换取苏联支持的正式保证。

自然，赫尔利拒绝接受中共有关自己力量的表面上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他拒绝接受共产党的这些说法却并不是以认真估价中共的实际力量为基础的。根据公开发表的材料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赫尔利并未作出任何系统的努力，寻找必要的情报以达到尽可能精确的估计。与赫尔利形成对照的是那

些外交官，他们的确努力收集第一手材料，得出了同赫尔利截然相反的估计。他们不同意赫尔利依靠苏联，控制中共的国内政策。回顾历史，事实清楚他说明，尽管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外国的影响下产生的，早年完全受苏联代理人的支配，但是它通过在游击战争中掌握领导权，现已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在佃农耕作的中国土地上，它已牢牢地扎下根。中共可能会受苏联影响，但它不会受苏联“控制”，即使没有外援，它也仍然是个劲敌。共产党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在中国国内寻找，而不是在苏联寻找。

赫尔利过低估计共产党力量的原因是他对国民党政治前途的乐观主义。他取代高斯任驻华大使与国民政府的改组发生在同一时间，宋子文成了行政院的代院长，陈诚被任命为军政部长，俞鸿钧取代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这些变化给人以希望。此外，赫尔利满意地知道，蒋是美国在亚洲可支持的最好人选。用他以后的话说，蒋集“基督教徒和反共分子”于一身，“在中国几乎打了三十年内战，八年抗日，其中一半时间是我们的盟友。”直到日本投降时，美国还在训练和装备 39 个国民党师。美国联络组被安插在这些国民党师和所在地区支持这些师的中国军需品服务站中。太平洋的美军正在稳步向中国靠近。赫尔利满意地看到，国民政府将继续发展力量，而且美国在中国影响将与日俱增。这个信念与传统的干涉政策和他认为对蒋使用压力是徒劳无益的看法一道排除了美国为重建国民政府并使之成为广泛的反共阵线核心而采取干涉行动的可能性。这样，赫尔利满怀希望地着手进行以蒋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政策，他忽视了美国本应该采取的更加急迫和有利的措施。

日本投降后，中国的事态发展将表明，行政院的改组并未带来一个具备最起码的效率和诚实的政府，更不用说一个有能力履行接管一个被占领的中国和重建满目疮痍的国家这一巨大任务的政府。同时，美国联络组的撤退将使美国训练的国民党师和中国的军需品服务站失去必要的协助。美国对中国的改造和进步的希望将再次消失。

2. 戴维斯和谢伟思希望争取中国共产党人脱离莫斯科

（1）戴维斯和谢伟思对国共两党的相对实力作出现实主义的估计

缺乏可靠的原始材料使我们无法精确地判断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与军事实力。但重要的事实是赫尔利对国民政府和中共相对实力的估计与驻华的职业外交官的估计恰恰相反。这些外交官懂得中文，与中国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他们把报告基于个人的观察和经历之上。约翰·S·谢伟思于 1944 年 6 月 20 日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局势和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的备忘录中，对国民政府的弱点作了最系统和最详尽的分析。[49] 谢伟思对他的上司说，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地位比过去十年更加脆弱。政府权力的逐步瓦解是由于经济崩溃的威胁、军队丧失士气、官僚主义、知识分子和工薪阶层的不满、农民对滥用职权的种种现象的憎恶日益增长、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力重新开始活动、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还有政府僵化和压制性的政策。[50] 谢伟思强调说，国民党本身不仅没有能力避免灾难，而且它的政策在促使危机爆发。因为它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改革，怕伤害支持它的日益缩小的小集团的既得利益。相反，它加强了极权主义控制，以便维持统治。而且，这些自杀政策扎根于党的组织和性质之中。国民党是“一个主要兴趣在于维护个人权势，排斥外来者，力争地位而互相倾轧的保守的政治集团”。它的社会基

础由于战争而被腐蚀。它现在立足于“农村的地主绅士、军人、较上层的政治官僚阶层、与政治官僚主义者有密切联系的商业银行家这一狭隘的基地”。谢伟思警告说，政府瓦解的过程最终可能是崩溃。

与国民党政权不断衰退形成对比，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一大片领土上，发展和巩固了他们的势力。外交官对共产党人实力的估计也与赫尔利大使的观点相矛盾。早在1944年11月7日，约翰·P·戴维斯就向华盛顿报告说：

在长城和扬子江之间，中共已经强大得可以指望在战后至少能控制华北。中共不仅可能保持扬子江流域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若干部分，并且可能保持华中华南的新地区……

共产党已经历了十年的内战和七年的抗日战争。他们经历了不只是比中国中央政府军队所曾受的更大的压力，并且也经历了蒋的严密封锁。

他们生存下来，并且壮大了……他们还在继续壮大之中。

具有这种显著的生气和力量的原因，是简单而又基本的，即是群众的支持和群众的参加。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到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

国民党中国的逐步瓦解和共产党中国的政治活力之间的对比使戴维斯和谢伟思警觉地看到，如果国民党诉诸武力，共产党就会有在内战中获胜的可能性。戴维斯于1944年11月7日从延安报告说：

蒋委员长依靠他垂头丧气、拖沓呆滞的部队、腐朽不堪的官僚主义机构、枯燥无味的政治道德格言和他能纠集的使他心惊胆战的外国援助，可能仍然会使中国陷入内战。然而，他不会在日本人苦斗了七年多而失败的地方取得胜利的。对他来说，共产党人已经太强大了。

内战或许会以双方精疲力尽的僵局而告结束。中国至少会分为两个阵营，蒋退化到地方军阀的地位。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共产党人——当然如果得到外援——他们就可能迅速摆脱内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控制整个中国。

谢伟思还认为，共产党人是不会被武力所消灭的，因为他们享有群众支持，如果国民政府发动内战，“共产主义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

戴维斯和谢伟思都以这样的设想作为他们的预言的基础：即美国不会站在国民党一边积极干预，至少不会走到打破平衡的地步。戴维斯当时认为，蒋只有能够取得与日本侵华同等规模的外国军事干预的支持时，才能消灭共产党人。但他认为，“这种规模的外国干预似乎是不可能的。”在向调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关于国务院出现颠覆活动影响的指控的泰丁斯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谢伟思强调说，如果美国在内战中向国民政府提供军报，那么这就意味着一种重大的和难以预测的承诺，“它几乎无疑使大量的美军卷入——美国人民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示他们是否愿意承受这种牺牲。”他还认为，如果国民政府不进行充分的改革以重新获得人民的支持——谢伟思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偶然事件——那么美援将是无效的。

因而，对戴维斯和谢伟思来说，美国积极支持国民政府以武力镇压或遏制中共从来就不是可行的选择。相反，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使两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的政治解决。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与赫尔利一致。但是由于外交

官们和赫尔利从截然对立的角度出发估价国共两党的相对实力，他们在怎样建立联合政府问题上就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赫尔利认为一旦苏联与国民政府达成政治协议，中共就会接受蒋的条件，谋求和解。外交官们则坚信，只有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才能实现统一。他们敦促美国政府同共产党合作并援助他们，部分作为抗日战争的一个军事行动，部分作为使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解的一种措施。[51]

在相对实力的估计上的冲突、行动步骤上的意见分歧，在国共和解条件上的不同看法必然导致外交官们和赫尔利对可能出现的政治解决的结果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赫尔利认为建立联合政府将使国民党得到加强，而戴维斯和谢伟思却清楚地看到，这将意味着共产党作为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出现。[52]戴维斯于1944年12月9日报告说：“蒋委员长意识到，如果他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条件，他们早晚都会剥夺他和他的国民党的权力。”戴维斯在他对蒋的评价中显然是赞同这一点的。原因可见于他在1944年11月7日发送的信件，大段引证这封信是有价值的：

如果委员长接受（共产党的）这一妥协提议案，建立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那么可以预见，共产党人将继续对他们现在占据的地区实行有效的控制。他们还可能把他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因为他们是中国唯一具备了对人民产生积极的吸引力的纲领的集团。

如果委员长既不促使内战爆发，也不与共产党人达成谅解，那么他仍然面临失败……蒋的封建主义中国不可能与华北现代的、充满活力的人民政府并存。

共产党人将在中国扎根。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

谢伟思也这样认为。1950年5月，谢伟思本人对国务院忠诚安全委员会说：“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我们曾预计到，共产党作为占主导地位和最生气勃勃的力量将在实质上成为最强大的力量，（或者？）最终（原文如此）成为联合政府中最强大的力量……”后来的事态发展和蒋委员长的除非接受他的条件、否则便竭尽全力避免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的作法表明，戴维斯和谢伟思对国共两党相对实力的估价比赫尔利准确得多。

鉴于两党的实际和潜在的力量对比，向共产党提供租借法案物资、建立包括他们在内的联合政府无疑会有利于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全部政权。这一点戴维斯和谢伟思肯定是知道的。[53]显然，他们政策建议的根本设想是，中共将可以脱离莫斯科或至少受到鼓励实行一条独立的和民族主义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向共产党提供武器与建立联合政府一样是与共产党建立工作关系和使美国解脱它对腐朽政权的全部承诺的途径之一。谢伟思对共产党人在联合政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政府将比现政府更好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可能性是乐观的。他的乐观主义部分来自他对蒋政府的憎恶。1944年10月10日，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任何不同于目前反动统治的中国新政府都会（与美国）更好地合作，都能够更好地动员国家。”但正如他对忠诚安全委员会所说的那样，他的基本感觉是，以共产党人为最强大的力量而建立的联合政府“相当有可能”成为“我们能够与之合作的，不会完全倒向一边的政治。”

戴维斯同一时期的报告更加谨慎，更加具体地谈及他的建议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1944年11月15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

但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不可能无限度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产的政府。并且，要是俄国人将参加太平洋战争，我们必须坚决努力在政治上抓住中共，而不让他们固（我们）未努力而完全倾向俄国人。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充分了解，由于我们承认现在这样组织的蒋介石政府，我们已被牵扯进一个逐步腐朽的政权，并在和中共建立军事和政治的合作方面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我们所最希望的解决僵局的办法，是使共产党能在其中找到满意地位的一个联合政府。这将提供我们最大的保证，可以有一个强大、民主、独立和友好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基本的战略上的目标……

为决定我们应支持哪一派，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基本的考虑：中国的政权正在从蒋转移到共产党手中。

戴维斯以充分的现实主义态度认识到，如果俄国人进入华北和满洲，那么美国要完全把共产党人争取过来就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他的希望在于通过对军需品和战后援助的控制，美国能够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摆脱苏联控制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大多数驻华外交官都抱有与谢伟思和戴维斯同样的希望。这一点在乔治·艾奇逊于1945年2月26日发送的一份报告中反映了出来。艾奇逊在赫尔利返回美国期间负责使馆的工作。这个报告是在重庆使馆全体政治官员的同意和支持下起草的，由魏德迈的代理参谋长，当时的代理总指挥默文·E·格罗斯批准。除其他事项以外，这个富有争议性的电报建议通过向共产党人提供美援、通过敦促成立包括他们在内的“战时内阁”，美国“可以期望”使共产党人“站在我们一边，而不是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

（2）戴维斯认为共产党人是倒退派

回顾历史，事实是清楚的，谢伟思显然对由共产党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的政治方向过分乐观。我们不久就要审查这一错误的估价。戴维斯更加谨慎的估价是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性质的谨慎估价分不开的。考虑到当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了解的水平，从公开发表的文件记录来看，他的分析似乎在这一问题上是有见地的。[54]早在1943年6月24日，戴维斯就向他的上司报告，尽管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美国外交官对中共领导人是否仍然保留亲俄态度和容易受莫斯科指令的影响仍持普遍的怀疑态度。在1945年1月4日的一份报告中，他明确地表示，他对使赫尔利如此难以忘怀的俄国领导人的仁慈的话，持怀疑主义态度。他写道：

中国的现况必能使克里姆林官方面勉强表示满意……他们眼看着中共巩固华北，在蒋的军事溃败中向南扩张，现在并且准备要正式建立独立的政权……无论斯大林大元帅如何向美国的访问者描写中共，他也不得不看到这一事实，即共产党是比任何欧洲的地下组织或游击运动更为坚强和自立的力量。

然而，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是戴维斯也倾向于把共产党人针对中国国情所作的现实主义的调整与放弃他们的最终目标混为一谈，把策略上的行动与不停的变革混为一谈。在一份题为《中共赤化到何种程度》的备忘录中，戴维斯于1944年11月7日从延安报告说：

中共是倒退派……与另一位杰出的倒退分子拉姆赛·麦克唐纳（一次大战后英国工党领袖、英国首相——译者）一样，他们开始接受渐进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延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耶路撒冷。中日共产主义的圣人和先知们……热烈地追求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的陌生上帝，极为羞怯地崇拜着外国投资这一财神，渴望以世俗的标准受到人们尊重。所有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诡计多端的共产党机会主义。

他还认为群众中在他看来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可能会与领导人的亲俄态度发生冲突，因而导致党的分裂。现在似乎真相大白，戴维斯并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在出自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范围内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并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党中，特别是在像中共这样团结一致集团内，只有当这个集团面临极端棘手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比如要在确定无疑的失败和放弃根本原则（例如国际主义方针）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才会出现分裂。这意味着，在中国环境下，除非美国和它的中国盟友向中共施加极大的压力，否则是不会出现分裂的。

（3）谢伟思认为共产党是“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以及这一错误概念的根源

谢伟思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看法值得我们给予更加详尽的分析，因为它们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许多当事人的想法和当时的普遍舆论。虽然谢伟思从未把中共描述为“土地改革者”，也没有使用过普遍接受的字眼“所谓的共产党人”，[55]但是，他的报告，特别是那些在他到达延安后不久发出的报告表现出他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持有极为错误的观念。谢伟思在一份 1944 年 9 月 8 日发自延安的报告中写道：

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寻求按民主秩序长入社会主义的党，比如像在英国这样的国家里所试图做到的那样，它不是酝酿直接暴力革命的党。它变成一个并不寻求早日垄断政治权力的党，而致力于寻求它所认为的在中国的（原文如此）长期利益。

谢对中共性质所以持这种错误观念有几个原因。最明显的是他对运动的内在动力一无所知，事实是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性质存在于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之中，存在于它取得全部政权的愿望之中，存在于把这种权力作为对社会制度进行迅速和深刻改革而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中。[56]无知使他仅从表面现象来理解共产党地区的“民主”制度。在一篇最不慎重的声明中，谢伟思写道：“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民主的纲领，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纲领。从形式和实质上看，它更接近美国，而不是苏联。”[57]

对中共性质的这个估价还出自对民主的错误理解。在谢伟思看来，任何得到群众支持和推进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既然共产党享有群众支持并显然是在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它就是民主的，或者说，至少存在着民主倾向。关于民主和群众支持，谢伟思写道：“共产党人所享有的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当前的情况下，必须被认为是从实践上说明了中共的政策和方法具备了民主性质。”

关于民主和促进人民利益，谢伟思说：

因此，结论似乎证明，农民支持、参加共产党军队并与它并肩作战是因为他们坚信，共产党人是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因为共产党人通过为农民谋取一些切实的利益而使

产生了这种信念。

这些利益必须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的确切性质是什么，它必须是——从为人民利益服务这个词的最广义上说——走向民主的。[58]

事实很清楚，谢伟思没有看到一场极权主义运动或一个极权主义政府有时可以激起人民巨大的热情并可以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而竞选制度只不过是在群众中培养参予感的工具。现代的极权主义与传统的专制主义有所不同，它高度重视广泛的群众支持，而且也往往能够成功地得到它。[59]区分极权政府的群众支持和民主政府的群众支持的标准是建立政府的不同方式——一种方式是一党垄断对一切有效的权力工具的控制，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以上的权力中心通过宪法程序为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支持而展开竞争。

1944 年和 1945 年，在谢伟思写了大量的报告的时期，没人可以否认共产党人在边区和游击队根据地享有广泛的群众支持。正是这种群众支持使他们顶住了日本的进攻，并与国民政府的控制进行斗争。为了取得这种支持，他们有必要推行一些政策，切实促进人民的利益，确保他们对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忠诚。共产党承受的压力越大，他们就越加殷勤地讨好人民。因此，在延安这个相对安全的根据地上，政府的效率和对它的普遍评价比前线地区的政府要低就是事出有因的了。在 1941 年至 1942 年共产党面临中日战争中最严重的危机——日本“大扫荡”期间，后来为美国观察员所称道的共产党的许多政策问世了。这些政策能够得以有效地执行，并非出于偶然。

1941 年，共产党开始根据所谓的“三三制”在边区和游击队根据地认真地改组政府，在这个制度下，共产党人在政府机构和各级选举机构内所占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由“国民党”党员和其他政治人物平分。在 1941 年至 1942 年期间，共产党还比以往更加有效地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建立了统一的累进税征收制，减少了农民上缴粮食的数量，裁减了政府雇员，通过选举撤掉了无能的机关干部，普遍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共产党地区竞选的真实性质可见之于那一时期的党史：“游击队根据地的选举成了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群众运动。”党内的“整风”运动也是共产党对严重挑战所作出的回答的一部分。竞争和整风有两个不同的特征，乍一看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强调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和严格运用列宁主义关于党是高度集中和有高度纪律性的特权组织的概念。美国观察员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前一种特征上，共产党人自己在与外人谈话时也强调这一点。这些观察员对第二种特征是一无所知的。对毫无经验的人来说，它是隐蔽的。

到 1944 年，美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访问了共产党地区，谢伟思陪同他们进行了访问，那时改革已进行了两年，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而，共产党地区的朝气蓬勃、充满希望，自力更生和献身精神与国民党中国的黑暗、停滞、绝望、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观察员为延安的政治气氛所陶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共产党发展和巩固他们政权的特定环境和他们对一切权力机构实行的垄断主义控制对美国观察员来说似乎是相当自然的。在中日战争早期的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填补了在日本人手中遭到失败的国民党军队所留下的政治真空。在边区和游击队根据地，并不存在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只是在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名义上的国民党组织，在无可争议的共产党控制区，它实际上是与共产党入合作的。反共

的人在日本占领的城镇找到了庇护所。仍然留在或自愿返回共产党地区的人则愿意与共产党合作。

谢伟思自己在他写的题为《游击队根据地共产党政治控制的发展》的报告中生动地描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成就，这份报告至今读起来还是令人手不释卷。谢伟思认识到：“因此，实际情况是共产党人并没有碰到强大的反对派，他们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原文如此）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因素。”在这个报告和其他文件中，他指出，在抵抗日本进攻、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在为控制整个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中，群众支持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谢伟思写道：

共产党领导人强调如下措施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第一条，也是基本的一条，实行有限的减租减息，争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支持；第二条，实行民主自治政府，使各个阶级，特别是地主——商人积极参予政府，从而支持政府。在对共产党政策的现状和大有希望的未来所作的研究中，把民主作为一种工具，取得资产阶级集团的参予和支持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有趣的和意味深长的。他们确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希望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

但是谢伟思对西方的民主和作为取得群众支持的工具的“民主”之间的区别缺乏充分的理解，这就使他无法从正确的观察中得出恰当的结论。谢伟思对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也缺乏足够的强调，即现代民主制度的存在条件是有一个以上的政党，和有力量反对党得以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在他的报告中出现了如下的有些自相矛盾的话：“然而（共产党地区）这种政治民主机构并没有以明确的政党形式伴随着政治上的发展。”

（4）谢伟思相信共产党对美国友好的表白

甚至在谢伟思 1944 年夏伴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以前，他就相信中共对美国是友好的。在一份日期为 1944 年 4 月 21 日的报告中，他说：“从我们对共产党人少得可怜的知识中知道，他们对美国也是友好的。他们相信，中国的下一步必须是民主。他们认为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是加快战后复兴和发展的唯一希望。因此，如何抓住这种诚意和共同点是至关重要的。”这一信念通过他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首次接触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在抵达延安后不久，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政治上看，中共向苏联可能有过的倾斜似乎已成为历史。”他报告说，中共认为，是美国而不是苏联将成为唯一能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他进一步谈到，中共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俄国的支持？）更加重要。”他自己显然并没有怀疑他们的话是否真诚。

这些结论主要出自于中共领导人之口。他们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都强调了美国援助对中国重建的重要性和中国对美国的诚意。根据谢伟思采访博古、毛泽东、刘少奇时的摘要记录，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将不能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大规模经济援助，而美国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国家，“美国可以得到中国的全部诚意”，而且中国应该让外国资本对在华投资感兴趣。

这些对美国友好的表白和对苏联未来作用的贬低与中国早期倾向苏联的方针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对苏联的倾向性被谢伟思轻率地称为“历史”，但是实际上，中共领导人从未忘记指出他们的理想来自苏联。他们在国际事务上很少背离马列主义观点。早在 1926 年，毛泽东就赞同两个阵营的理论。

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他写道：“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革命力量团结在第三国际周围，反革命分子集合在国际联盟周围。或迟或早，中间阶级或者向左转，加入革命队伍，或者向右转，加入反革命队伍。“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哪个阵营一边。共产党在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在 1931 年冬中共颁发的一个宣言中再次得到证明。当时所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宣言的一部分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它对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无论如何是不满足的，相反，它的最终目标是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直至后者彻底崩溃。

两个阵营的理论在毛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得到有力的阐述。在这本现已很闻名的著作中，他宣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没有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就不能取得独立。他断言，“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他写道：“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60]在著名的“一边倒”的声明发表以前，他写道：

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英、美——作者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61]

在这篇德苏条约时期撰写的政治论文中，毛重申了他的两个阵营的理论，他甚至拒绝在中国与之作战的日本与中国向它索取，并继续期望索取财政、道义、外交支持的美国 and 英国之间划一条基本的界限。他使用“东方帝国主义”一词指日本，“西方帝国主义”一词指西方列强。他反对与英美建立联盟反对日本，理由是这种联盟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卷入与苏联的战争中。毛写道：

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即汪精卫）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62]

也许，比赞同两个阵营的理论和痛斥美国是帝国主义大国之一有着更加直接的重要性的事情是，中共被迫对苏联曲折的外交政策表示赞成。显而易见，他们认为有义务把他们的政策与苏联的政策统一起来，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中国的政治影响。显著的例子是他们认为，1939 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是正确的。德苏条约在中国是极为不得人心的，特别在有影响知识分子阶层中，因为他们曾希望民主国家与苏联结成世界性的联盟，反对德、日、意，德苏条约使他们大失所望。德苏条约还在中国激起俄日和解，从而在外交上孤立中国的恐惧感。1939 年 9 月 1 日，毛在接见一家共产党报社记者的采访时，对德苏条约表示了无条件的赞同。1939 年 9 月 26 日，毛泽东在埃德加·斯诺采访他时，就这个问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毛泽东把欧洲战争描述为

“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纯粹是一场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强盗战争”。的确，按他的说法，“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使用战争结束民主”，“它们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和反人民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他指出，不同国家的共产党的政策必须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加以变动。两天之后，他把苏联入侵波兰说成是收复“苏联自己的领土”、“解放小国”、“遏制德国侵略军东进并粉碎张伯伦阴谋”的行动。

这种对国际联盟的性质的看法完全与中共的立场背道而驰。早些时候，共产党机关报的社论把英、美、法、苏描述成中国的朋友，而德、意被说成是日本的支持者。在“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口号下，中共敦促（东欧——译者）民主国家迅速团结起来，狠狠打击法西斯。（东欧的）民主国家与苏联同时被称为是中国应该向其寻求物质援助和制裁日本的国家。

中共被迫对苏联政策表示赞同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他们对 1941 年 4 月的《苏日中立条约》和附在条约上的《前线宣言》的声明。这个宣言说：“苏联根据宣言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忧虑，人们担心苏联会中断对华的军需品运输。它带来恐惧感，人们害怕，日苏两国紧张关系的消除将使日本能够把它身经百战的满洲部队的一部分调往华东和华中。《前线宣言》似乎表明俄国愿意承认满洲国。这与 1924 年的中苏条约是相违背的，苏联政府在那个条约中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国民政府对《前线宣言》提出抗议，中国各大独立报纸说，协议是“令人遗憾的”。即使在苏联政府向中国保证中苏关系不会因条约出现而变化之后，中国的公众舆论对于满洲国和蒙古的这一宣言仍然感到不满意，尽管它从与苏贸易并不受干扰这一事实当中得到安慰。[63]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努力证实苏联政策中的这一新转变是正确的便成为衡量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对苏联俯首帖耳的一个标准。在苏日中立条约签字不久以后，中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在加强苏联的国际地位的过程中，条约“有利于世界爱好和平和受压迫的人们，而有利于反动集团。”在“有关满洲国和外蒙古的前线宣言”

中，他们评论说，为保证外蒙古的安全，条约“不仅对外蒙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它“还有利于整个中国的解放事业”。至于苏联“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性”的保证，他们的立场是“归还中国东北四省是我们自己的内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应像某些投机者那样，希望看到苏联对日本发动战争，而我们坐收渔翁之利。”

另一个意外的转折发生在两个月之后，即德国入侵苏联的时候。中共报刊响应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呼吁“为反对共同敌人而与英国、美国 and 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这样，与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人在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又回到党的“反法西斯国际阵线”的路线上来。不管中共的国内纲领具有何等的独到之处，毫无疑问，在国际事务中，他们的态度与其他共产党完全是如出一辙的。

紧跟曲折多变的苏联政策、赞成两个阵营的理论、坚持在整个世界上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美化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共与苏联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反映了它希望最终得到苏联的支持。这些事实对我们提示了，中共对美国友好的表面仅仅具有策略上的意义。那么，

谢伟思对它在国际事务中当前和未来的方针为什么如此乐观呢？因素之一显然是他相信共产党政权的民主性质和他赞同与美国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相等的寻求中国统一的纲领。另一个因素是他错误地估价了意识形态对共产党的行动所产生的作用。对谢伟思来说，中共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态度和一种对问题的看法”。他对中共外交方针所作的结论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这种对问题的看法不会使他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意图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对苏联寄予更多的信赖。另一个与此有关的设想是这种意识形态不会影响他们对国际事务中长远目标的选择。过低估计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使谢伟思和其他的美国观察家过低估计了中共国际方针中几个不可否认的因素的直接意义，这种直接意义与长远意义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在没有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生存和增长的能力，他们具有土生土长的政治基础，他们有一个并不依靠斯大林的支持而在党的委员会中享有权力的领导集团。

此外，就谢伟思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理解而言，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他被中共的整风运动引入歧途，这个运动除解决其他问题外，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必要性。因而，他报告说：“共产党人致力于使他们的思想和纲领成为现实主义的中国的思想和纲领，他们正在实行民主政策，并期望得到美国的赞同和富有同情心的支持。”他忽略了整风运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严格运用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以加强党的力量。谢伟思对一个方面的肯定和对另一个方面的忽略是与他的根本观点相一致的，他认为，对中共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是一种态度和对问题的一种看法，而不是含有具体内容的纲领。他认识到共产党人对美国“友好”后面隐藏着对权力和政治的考虑。但是他过低估计了延安各项具体政策中蕴藏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这导致他过分强调了中共的诚意。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共对美国的这种明显的强烈的倾向性也许与普遍的看法相违背——这种普遍的看法可能过分偏向于强调党的共产主义名字。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和最有能力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这种可以被称之为实际的考虑之外，中国不能再分裂下去的观点也成为共产党人在感情上的强烈愿望。我相信，中共当时对在美国支持的基础上寻求中国的统一是抱有诚意的。

谢伟思预见到，中共为经受住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所发动的进攻，将转向苏联寻求援助。在他到延安六个多月之后，他非常敏锐地发现，尽管共产党人否认这一点，但是中共和莫斯科通过党的渠道在进行接触，虽然这种接触不是在政府的级别上。但是这些观察似乎加强了他的看法，即美国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使中共脱离莫斯科。

回首往事，事情似乎很清楚，在 1944 年至 1945 年期间，共产党对美国作出友好的表白，是它根据当时和不远的未来的远东的力量一政治局势所做的策略性的调整。这一策略性的调整是恐惧和希望这一奇妙的混合体的产物。一方面，中共对美国可以对中国产生的巨大威力的印象十分深刻，另一方面，他们对苏联的意图和帮助他们的能力捉摸不透，这样的分析是合乎情理的。[64]他们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侵略者的看法可能会使他们认为美国的努力实际上是用以推进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在当时是与他们的政治策略相符合的，也最有可能帮助他们扩大影响。他们通过

对美国友好的表白，通过强调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外国投资的重要性，希望能促使美国不再站在国民党人一边进行积极干预，并鼓励它在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中采取有力的行动。[65]

显而易见，希望和恐惧之间的这种平衡从实质上说是不稳定的，共产党对美国“友好”的基础是不牢固的。美国所采取的任何加强国民政府的军事、政治地位的行动都会激起共产党人的怨恨。只有对美国的强大更加惧怕才能避免这种怨恨不会爆发成为公开的反美态度和行动。赫尔利支持蒋的纲领、欧洲战争的即将结束、苏联即将恢复它在远东的行动自由、毛在 1945 年的公开声明，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在向苏联作出轻微的、进一步的倾斜。在毛对第七次（党的——译者）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著名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他呼吁国民政府停止对苏联采取敌对的态度，呼吁改善中苏关系，同时警告美、英政府不要帮助“中国反动派阻止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在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战争援助表示感谢之后，他断言：“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但是毛仍然声称在外交事务中采取中间道路。为使他对苏联的颂扬得到平衡，他对美国表示了赞赏，对美国人民表示了友好的感情。[66]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根据谢伟思和戴维斯所建议的行动步骤，美国是不会长期确保得到共产党人的友谊的。只要美国的行动和政策有利于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共产党人就会保持他们的友好姿态。但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或感觉足以强大到能够泰然地蔑视美国的时候，显然出自于策略而考虑的对美国友好的表白就会大大地失去份量。同时，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考虑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联系将发挥更大的影响。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他们将采取一种日益亲苏的政策，特别是那时苏联能够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67]

中共似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对美国保持“友好”态度。第一，苏联和中共出现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并发展成为公开的决裂。要导致这样一场不和，美国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第二，中共继续采取表面上对美国友好的态度和一种相对独立的政策，而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面对着美国的巨大实力，而苏联又不能够向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这就是说，接受美国政策和与美国合作是避免彻底失败和毁灭的唯一选择。美国的巨大实力仅仅产生于以下的条件：（a）美国愿意并且能够大规模地干预中国的政治、军事斗争；（b）通过及早修正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而使太平洋战争在欧洲战争之前或在欧洲战争尾声时结束，这样苏联还没有能够来得及利用远东的动荡局势；（c）美国的力量被保持在具有压倒之势的规模上，以制止苏联向它挑战的任何尝试。

但谢伟思和戴维斯根据自己的观点所做的设想恰恰与使中共脱离苏联的这些先决条件背道而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设想是美国不能也不会能够在能够击败共产党人的规模上对中国内战进行军事干预，或把共产党人牵制在中国的某一部分。第二，与大多数其他美国官员一样，他们假设，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对美国有利。而一旦苏联的军事政治力量重新进入远东，俄国共产党人便能够向他们的中国同志提供很大的帮助。这样，戴维斯和谢伟思的观点便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在假设美国不能也不会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之后，把赌注押在取得中共友谊的机会上。然而，只有在美国一方面愿意并且能够最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军事干预，以实现它在中国

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时候，和只有在美国另一方面遵循一条不会直接危害共产党的生存的政策时，他们才会对美国保持“友好”。任何以拒绝军事干预中国内战为基础的政策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谢伟思和戴维斯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使他们看不到他们建议中的所有含义。这种错误判断归根结底是由于过低估计了意识形态在中共事务中的作用。

系统地探讨意识形态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将超越本书的研究范围。然而中共的国际方针与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似乎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广泛的结构，其他的政治力量，如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可在这个结构中反映出来。它可以决定这些和其他政治力量所采取的形式及发展方向。至于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意识形态通过对抽象概念的不同层次的设定而构成，它可以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各种不可预见的情况，而不失去它的活力。意识形态与基于力量对比的现实而作的策略性调整并不矛盾，甚至与显然违背了对意识形态的含义所作的原教旨主义的解释的那些权宜之计也是一致的，因为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在以后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当统治者面临难以对付的现实并在一个长时期内无法改变它，意识形态才会被腐蚀。对立于意识形态的意志和能力构成了政治现实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它或者被意识形态所同化，或者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

3. 对中共性质和意图的普遍错误理解的根源

为了正确地描述谢伟思和戴维斯的观点，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设想得到了其他美国官员和当事人的广泛赞同，特别是他们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错误理解纯粹是当时公众舆论的反映。这种广为流传的错误判断不可能是阴谋诡计的产物。它的根源必须在与错误判断一样无处不在的社会和政治事实中寻找。而这似乎就是美国的政治传统本身。当我们把对谢伟思和戴维斯的观点的分析扩大到检验其他官员、学者、作家和当事人的主要观点时，当我们看到这些人按照自由主义占支配地位的美国政治传统而承担在中国的任务时，我们便清楚地看到这种解释。

（1）美国的政治传统

美国政治过去是，可能现在仍然是具有独特性的政治，它具备天赋的高度的道德统一性。在这个社会中，基本的价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问题都将作为方法问题“在潜在的和绝对自由的信念中”得到解决。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的价值观念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自动地得到解释：这种解释是我们特有的某些地理和历史事实所赐予我们的。”[68]美国价值观念的“赐予”隐藏了在基本原则上达成协议的重要性，而美国制度令人惊异的活力正是出自这些基本原则。美国民主奇迹般的成就使人们注意到它的政府制度的具体细节和性能，而他们却对政治理论，特别是有关基本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设想的理论缺乏兴趣，这种理论对美国生活来说似乎是多余的。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道德统一性妨碍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长处和缺陷的认识的形成，阻止了自觉的国家目的的成熟。

这个总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为国家提供思想指导的学术研究的发展。许多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学术权威由于主张在事实与价值观念、科学与哲学之间划分界限，故而从二十世纪开始，便放弃了对现时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理论的含义作出解释这一传统角色。相反，他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以自然科学

的方式去耐心细致地证实事实的命题或解释科学理论。这种情形使普通的美国人在美国民主的含义和理论基础问题上得不到充分的指导。当然，由于政治问题与更加深刻的价值观念问题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即使是政治科学家也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民主的定义这一类的政治哲学问题进行思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用伯纳德·克里克的话来说：“相信美国思维的统一性和明确性的后果之一是学术思维与民众思维的极其接近。”

美国生活中的道德统一性和一致性着重强调了以自身的形象看待外界事物，以自己的设想判断外国生活这一自然倾向。[69]由于美国价值观念的“赐予”含义掩盖了人们普遍和无保留地接受自由主义这一信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美国人倾向于蔑视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其他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美国人对自己社会深刻的哲学问题缺乏兴趣可以与他们对国外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无知相媲美。因而，当美国对它的政治实力和影响充满信心时，它与革命运动及其政权的对抗并没有使美国人警觉，没有使他们对革命者目的上的严肃性和美国人自己在国家目的上的不充分的认识之间进行对照。相反，许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官员过低估计了在革命运动中个人和集团对意识形态的承诺，过低评价了在建立政府时所做的关于制度和社会的承诺。他们乐于捕捉细微的离经叛道的迹象，或对现实所作的策略调整，用它说明“倒退”或背教。此外，美国的政治影响往往来自经济实力，并以经济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个事实使美国领导人更加蔑视意识形态，而过高估计经济实力的功效，使他们更加相信，美国经济援助的具体形式可以改变革命集团的政治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导人容易受到外国领导人的口头表白和谋求私利的那些同胞们的著作的影响。因而，认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而是“倒退派”、“土改派”和美国类型的民主的提倡者的看法与其说是由于受到阴谋集团的影响，还不如说这些概念的根源出自美国的政治传统。至于美国政策和观点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别有用心的那些人的著作的影响，仍然是因为美国的政治传统使美国官员和学者易受影响。

（2）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无知

从这一观点出发，说赫尔利对共产主义的无知和戴维斯与谢伟思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过低估计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普遍的无知在1952年的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听证会上引人注目地表示出来。1942年至1943年作为重庆使馆参赞、1944年作为中国事务司司长、1945年至1947年作为远东事务司司长的约翰·卡特·文森特对麦卡伦委员会说，他从未读过毛泽东或其他中共领导人的任何著作。他也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国际的纲领和章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决议》。他从未听说过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关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70]他不知道共产国际的元老，一度是它的领袖的乔治·季米特洛夫是何许人，他以为这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可能是个“俄国官吏”。当然，根据他自己的证词，只是在1946年马歇尔使华的某个时候，他才得出明确的结论，即中共是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71]

（3）以美国观点理解中国的权力之争的倾向

美国官员和作家们面临一场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这场革命已经采取

了地区性的、有限的军事冲突的形式。但是美国官员和作家们作为一种政治传统的继承人，却并没有关于社会革命和长期深刻的社会分裂的自觉经验。如美国内战被视为“局部斗争”，“是在完善地建立起来的转运着的联邦系统内的斗争”。不管内战是否有着更加深刻的原因，然而它既没有使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断，也没有阻碍美国对组织机构及其制度的思想的连贯性。不管导致内战爆发的问题实质是什么，人们普遍把这场论战解释为所谓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的价值观念问题，而并不对这一点表示质疑。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话来说，美国抗议运动如美国进步党的主义一样，“远远不是一个社会阶级或几个阶级的联合反对另一个特定阶级或集团的运动，相反，它是社会的更大一部分人为取得某种并非十分具体的自我革新而作出的广泛的和异常温厚的努力。”这种缺乏自觉的社会革命经验和缺乏深刻的社会分裂的现象进一步掩盖了在基本原则达成的默契，而这些基本原则是构成美国民主的巨大成就的基础。它使这样一种想法流行起来：“妥协不仅是一种自满自足的政治理想，而且是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的显著而必不可少的特征。”它还使美国人忘记了，在不可调和的原则冲突和生死斗争中，只有在用武力解决了统治权问题之后，在暴力不再是双方同样可以使用的手段之后，符合宪法的政治生活才能够兴盛。

美国观察家和评论家就是带着这些倾向来看待中国的。而恰恰由于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漫长的历史，这个国家使西方人感到特别的费解。他们倾向于以美国的印象观察中国事物，以美国的标准判断中国事务，而所有西方国家的人们的这种自然倾向由于美国社会的一致性和道德标准的统一性而趋于加重。雷蒙德·格拉姆·斯温作为富有彻底的爱国精神的美国人，把自由主义和进步的标准运用于中国局势，他在1943年5月11日的一次广播中对他的听众说：

这些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者，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是农业激进分子，他们试图建立民主的实践，特别是拆散大庄园，这样农业工人就能有独立的地位和自己的财产。对这些农业激进分子，我还有一句话要说，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他们不应被称为共产党人。

另一个自由主义者马克斯韦尔·S·斯图尔特曾在中国生活了七年，这位《民族》周刊副主编认识到“人们可以发现它（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相似之处。”但重要的是，他指出：“人们还发现它与美国历史上出现的基层人民党主义运动有相似之处。”当《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和全国广播公司驻远东的代表哈里森·福尔曼于1944年访问了延安，并与毛泽东谈话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共产党人——并不是俄国定义上的共产党人……中共的共产主义并不比我们美国人多。”1944年3月13日，《新共和》杂志中的一篇社论说：“他们（中共）可以把自己更恰当地称为中国民主派……他们主要的政治目标是：结束地主统治、支助教育和工业化。”《纽约时报》在一篇评论召回史迪威的社论中说，中共“事实上是主张平均地权的农民。”这样，用美国的自由主义观点看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仅仅是美国人民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翻版，是为实现某种急需改革而做的温厚的努力。

基于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这种理解，大多数美国观察家和官员都易于相信

双方可以实现立宪统治。当然，许多观察家知道国共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分歧，但又认为他们的民主观念使通过建立联合政府和立宪统治而克服分歧成为可能。正如一位美国哲学家所提示的那样，难道民主不就是“通过立法排除集体冲突的过程吗？”难道中共不是正像雷蒙德·格拉姆·斯温所说的那样“对妥协这一民主技巧变得颇为精通”了吗？这种思想倾向包含了一种不言而喻的信念，即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得到所有的人民的赞同，在美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原则适用于世界的任何国家。

（4）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中国特点的错误理解

美国在传统上对中国怀着仁慈的感情，对它的进步寄予很高的希望，对美国精神的影响感到自豪。这种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使美国把美国人民自身的令人称道的品质加到中国头上。富有个性、温和、倾向民主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它将防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或者将改变共产主义的性质。据国务卿赫尔说，1941年3月14日，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大使野村海军上将说，“中国人民的构成与俄国人很不相同，他们有一种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他们稳定并指引他们前进的哲学。”他向日本大使保证，“中国（中国共产主义？）并不是俄国意义上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日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

后来成为杜鲁门—马歇尔政策的最雄辩的共和党评论家周以德于1942年9月这样写道：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赫伯特·胡佛、J.P.摩根、温斯顿·丘吉尔成为共产党人，就像说服一个祖祖辈辈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并拥有土地的中国农民一样，你只要许诺他将得到更好的东西，就能够说服他把唯一的有形财物放到公家的锅里。[72]

甚至在1950年，欧文·拉铁摩尔教授还对泰丁斯委员会说，他对“中国民主成功”的可能性并没有丧失信心。因为“尽管他们的国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但是中国人民有一种强烈和朴实的个性感和民主感”。1951年，魏德迈将军仍然认为可以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人是富有个性的人，他们“以一种哲学的态度抗拒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或思想。”直到1957年，曾是中国主要的传教士教育家、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学生所热爱和尊重的燕京大学校长约翰·司徒雷登博士仍然认为难以相信“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中国竟被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仍然坚信，中国大陆并不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73]

也许我们有必要指出，周（以德）和司徒（雷登）都在中国当过传教士，许多外交官和中国问题学者都有传教士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传教运动从基督教自由主义者的“坚定信念”中汲取力量，他们认为“以耶稣的伦理学说为基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大多数传教士“以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他们称之为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强有力的传统为背景看待中国，他们与伍德罗·威尔逊的追随者们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对中国采取了道德主义的态度，把它作为一个“应该受到鼓励，采取基督教价值观念、科学技术、普遍教育和宪法政体的国家。”这样，新教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传统相辅相成导致了对中国的错觉。

（5）一些专家著作中的不成熟的观点

对中国的性质和意图所持的普遍的错误概念并没有受到远东问题专家们

的反驳。实际上，这一领域内最有影响的一些学者还赞同并推进了许多这样的错误理解。T.A.比森和欧文·拉铁摩尔关于政策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是显著的例子。这两位有影响的作家是远东问题专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错误概念不能归咎于用美国的印象理解中国政治的倾向。[74]就他们而言，由于缺少得力的理性工具去对中国的总局势和美国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无知和幼稚就更加严重。的确，在专业领域内，他们对自己的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T.A.比森的《日本在中国》是一部精练的著作。拉铁摩尔在他的《中国境内的亚洲前线》一书中运用了一套十分有趣的概念，对丰富的经验性资料作了分析。但不幸的是，一旦涉及到中国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全局性问题时，他们的著作便难以胜任了。他们缺少坚定不移的思想方针，不能准确地把握外交政策的实质，使他们在半学术性的著作中，更多地受到当时政治潮流变动的影响，而并没有立志作出独立的判断。

在T.A.比森的《联合战争中中国的作用》这篇有争议的文章里，他轻率地否定“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这样的词，说它们“只不过是党的标记”。他断言：“最好这样描述：这个词（国民党中国）可以被称为封建中国；那个词可被称为民主中国。这些词都表达了两个中国在制度上的真正区别和他们今天存在的现实。”在描述了共产党地区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之后，他得出结论说：“人们无论有什么样的想像力也不能把它叫做共产主义；实际上，它的实质是主要适用于农村条件的资产阶级民主。”费正清教授在评论比森的“封建中国”和“民主中国”的概念时对麦卡伦委员会说：“现在回首往事，我并不支持他（比森）对‘民主’和‘封建’这些词的用法。这些都是陈词滥调。它们可能是在共产党对他的启发和鼓励下捡起来的。”

拉铁摩尔先生在关于中国当前的问题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著作中显示出同样令人困窘的缺乏理论洞察力的情况。虽然他从未把中共称作“土地改革派”，但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性质的探讨使人产生误解。他把一个组织严密的特权阶层利用战时的爱国主义和农民的不满与农民运动混为一谈。他写道：“在十年内战期间，与城市和城市工人隔绝的共产党人变成了农民党。”他把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持错误地理解为这些利益集团要与共产党分享权力。他的结论是：“他们从笃信一种理论的党倾向于成为联合政党。”他把共产党促使人民参加政府工作的措施与民主相提并论；他赞扬共产党限制政府各机构人员的“三三制”是“中国有史以来为摆脱专政、走向民主的党采取的最积极的步骤。”这种奉承话与他对民主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谴责“对外国要求民主地位的人采取一种狭隘观念的陋习。”对他来说，“促使人民行动起来，试图与这个党或这个国家，而不与那个党或那个国家站在一边的原因就是事实上它具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的民主的区分。”这也就是说，民主与一个党或一个国家所享有的群众支持是一致的[75]根据这种逻辑，中共可以成为民主制度的创始人，苏联可以被称为是民主国家。

由于某种原因，拉铁摩尔先生的著作显示出判断上的动摇性。在他于1944年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中，他显然仍认为国民党中国是“民主的”，因为“党（国民党）和政府（国民政府）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76]他赞扬国民党建立了“允许以国民党本身之外的其他渠道发表政治见解”的开端，并且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减少国民党“对政治行动和政治

见解的垄断”。然而，在他 1945 年发表的《亚洲的解决方法》中，他却对国共两党作了完全不同的评价。这时他说，国民党从“各种利益集团的联合”转变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垄断”，从“联合政党”转变成为“地主（阶级）的党”。他不再谈及国民党中国或中国，而说只有共产党才能“走向民主”。事实上，国民党的统治和僵化从 1939 年以后便逐步加剧，这是在拉铁摩尔发表他的《现代中国的形成》的五年以前。在 1944 年和 1945 年，国民党可能加强了控制，但是在这两年当中并没有出现政治趋势的转变以解释拉铁摩尔看法上的改变。

拉铁摩尔对“农民党”、“地主党”、“联合政党”这些字眼的使用反映了美国政治科学界的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强调把利益集团作为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来研究，把政府和政党作为主要是利益集团进行活动的机构来研究，把党纲和政府方针作为各种冲突或平行的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来分析。这种方法无论在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中具有何种长处，它却无法应用于现代中国。因为在中国只要“利益集团”存在，他们便把他们的政治组织和内聚力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政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而在传统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绅士们”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政治职能，农民变成了受政治集团和领袖个人利用与操纵的社会力量。因而，从根本上看，拉铁摩尔仍然在试图以美国的思想方法分析中国政治，尽管他声称他的意图是以当地人民的观点来理解他们国家的政治问题。

在当时有关中国政治的著作中，要想找到如下的观点是徒劳的：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由一群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所组成的，它的目标是一旦有可能便夺取政权，它的方法是利用一切方便的途径激发群众的不满情绪，并通过多种途径和以各种组织机构的形式实现这一目的。党的极权主义性质既来自它对全部权力的渴望，这对实现它激烈的制度改革这一极为雄心勃勃的纲领是非常必要的。又来自它的组织原则，这种原则使党成为完全超越于利益集团之外的一种力量，它操纵着这些利益集团，但又不为它们所控制。而这些在当时却并没有普遍地为人们所理解。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权力阶层在有才干的领袖的领导下，灵活运用各种口号和办法能够致力于夺取政权这一政治事实使在自由社会的自由、民主环境中接受教育和沉浸于这种环境中的美国专家不能对它进行充分的考虑。

（6）在基本格调上相似的一部分著作的影响

当学者未能履行提供思想领导这一职能时，当政治传统对政治的性质抱有错误的设想时，美国官员和实干家们就容易受到许多抱有不同企图的作家们的著作的影响。埃德加·斯诺、冈瑟·斯坦、劳伦斯·K. 罗辛格的报道和著作就是例子。关于斯诺，我们必须对他的早期报道和他在 1944 年至 1945 年期间发表的文章加以区别。他的《西行漫记》是访问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记者所写的第一本书，在书中，他对 1936 年底的苏维埃地区作了富有同情心，但是总的来说是准确的报道。他对当时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俄国并没有在有效的范围内直接参与这一运动的报道似乎是可信的。为使这些否定得到平衡，他强调了苏联在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它作为中共的“强大祖国”的作用以及中共把苏联作为他们事业的伟大盟国的希望。他是这样引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它愿意与国际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的忠实盟友。”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他准确地把中共的分配土地纲领描述为“只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也就是说，它仅仅是为了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中的真正的和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取得政权的一种策略。

1939年8月，苏德条约缔结之后，斯诺在一次采访毛泽东时向他提出了一些令人窘迫的问题。[77]直到1941年，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他还强调说，中共的目标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将使用一切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事实上，他嘲笑了已经在流行的看法，即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仅仅是农民改革党”。在他看来，这种看法出自许多试图调解矛盾的自由主义者的感情，他们愿意亲华、但反斯大林的态度为人所知。他预言说，希望中共“与众不同”，“仅仅是改革派”和希望他们为实现他们的纲领而抛弃革命方法的态度注定会导致最终的失望。他引证毛对他的书面问题所作的回答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派，我们从来就不是改良派。”

斯诺在对中共的描述中发生的变化可见于他在1944年6月10日发表的题为《六千万人失去了盟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美国与共产党没有官方联系，因而在抗日战争中不能利用他们和他们的基地而表示痛惜。他认为他提倡的利用中共军事潜力的计划是合理的，原因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写的如下的话与他自己在《西行漫记》中所说的话形成了对照：

对那些对中国背景知识了解甚少的美国人来说，“共产主义”这个词也许会把人引入歧途。事实是中国从未有过共产主义，甚至在共产党地区也是这样。在共产国际消亡很早以前，它就中止了与中共进行的过多的直接接触。它（中共）变成了纯粹的马克思主人在中国的产物，在实践上，它通过制定农业民主与最终的，无疑是相当遥远的社会主义目标相结合的纲领而主要在农民中间赢得了追随者。

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性质所产生的日益混乱的思想在斯诺于1945年5月12日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反映出来。在这篇文章里，斯诺在一页之间毅然地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把中国共产主义描述为“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样，他在解释党的中国名字时犯了错误，他把“共产党”解释成“共同生产的党”，而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共分财产的党”。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共的确“渴望最终取得全部权力”，他们不会“建立美国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同情心上他们非常接近苏联”。然而对斯诺来说，这些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却导致了一个同样实际的结论。既然中共只不过代表了温和的土地改革运动，那么美国便有可能与中共合作，使他们和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即使他

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并与苏联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们仍然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掌权的话，将会依靠美国取得经济援助。无论如何，帮助中共并不会倾向于推进共产主义事业，就像美国当前和未来对苏联的援助也不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样。

在关于中共的性质和意图问题上，冈瑟·斯坦和劳伦斯·K.罗辛格的著作尽管没有斯诺文章中那么引人注目的矛盾，却也表现出类似的格调。斯坦在他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断然声称，中共“现在是，并且打算继续作共产党人”。他甚至批评中共于1939年9月谴责欧洲战争为“帝国主义战争”。他认为，这个行动是“意识形态的宣传”而不是出自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他报道说，他曾向中共政治局委员博古提出这一批评，而后者“仅付之一笑”。然而斯坦贬低了共产主义的革命组成部分和反西方的组成部分。他接受并提倡共产党的说法：“成为共产党人只不过意味着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采取暴力革命行动的政治哲学就变成了思想分析的无害工具。他通过对“三三制民主代表权”、村会、新民主主义的描述，帮助共产党宣传它的论点：“自觉的共产党人”也是“自觉的民主派”。他主张“新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共产党人的头脑民主化。使他们较少用共产党旧的阶级含义考虑问题，而更多地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低估价使他片面强调把共产主义仅作为态度、思想和方针的民族主义倾向。

罗辛格对中共的分析与斯坦的格调几乎完全一致。他指出“他们（中共）在政治理论和观点上认为自己是共产党人”，“（共产党地区）的许多领导人和普通公民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但是他在描述共产党的纲领时，却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即共产党人愿意与其他分子分享权力，并为民主而奋斗。他的结论是，美国与“中国的民主力量”有着共同的利益，只有“进步的中国”可以为这个国家的利益服务。他使他的读者清楚地了解，这些赞扬的话指的是共产党人。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回想起当时的公众舆论的情况，必须指出，在以后的年代里，即使是那些最坚定的民族事业的拥护者也对中共产生了类似的错觉，至少一度是这样的。如果说当时在华的西方观察家中有人察觉到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弗雷达·厄特利。她曾是英共党员，与一个俄国人结了婚，在莫斯科生活了六年，在苏联政府的一个研究机构供过职，她对共产主义的幻想最终彻底破灭了。后来，她写了一本最有力和最系统的书以证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对国务院和欧文·拉铁摩尔的开战是正当的。然而在她1939年出版的《战争中的中国》一书中，她把中共描述成“一个社会改良派和爱国者的党”，把中国共产主义说成是“一场农民解放的运动”。按照她的说法，中共的目标“真正变成了沿着资本主义和民主路线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目标，他们变成了“十九世纪英格兰的激进派”。曾作为中国的传教医生和最有影响的国民政府的支持者、众议员周以德显然一度也有类似的错误概念。1945年3月15日，他在对众议院的一次演说中承认：“我一度也曾被他们仅仅是土改派的言谈所蒙蔽，以为他们仅仅是为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爱国者。”因而，正确认识中共的性质和意图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尽管在政治舞台上，许多人乐于事后发难。

[7]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人们普遍的实际考虑及倾向之间

的和谐

中国国民政府垮台以后，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处于混乱之中，有人试图搜索在美国和中国的美国阴谋家，据说他们为效忠外国主人而将美国引入歧途。事实证明，这是个最危险、最徒劳、最有害的努力。实际上，这种普遍为人民所接受的错误概念不会是一组阴谋家和特务的劳动成果，不管他们多么聪明。相反，对中共的性质和意图所持的错误概念的根源存在于普遍的看法和倾向之中。显而易见，认为中共是土改派和诚恳的民主派等等轻松自在的看法与那些年支配美国官员和舆论界领袖的思想和政治、军事考虑不谋而合：利用中共军事潜力的心情、避免在中国问题上卷入与俄国的纠纷的希望和建立统一与民主的中国作为远东的稳定势力的愿望等等。这些考虑与美国不愿在亚洲大陆与其他列强发生剧烈的政治、军事争夺是一致的。可见，愿望是思想之父。同样不难理解的是美国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印象和伴随而来的建立联合政府的纲领是扎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之中的，这一政治传统基于就基本的价值观念形成独特的一致意见，倾向于掩饰社会分裂，加强了凭自己的印象看待外国事物这种自然倾向。美国的政治传统还使人们对政治理论缺乏兴趣，对共产主义愚昧无知，这就导致了错误概念的传播。而对故后苏联的合作所抱有的乐观主义的期待、对中国共产主义性质的幼稚看法、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希望则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根据这些错误估价而采取的行动只能带来失败或者有损于美国利益的局势。

第七章雅尔塔协定与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

1. 雅尔塔协定和美国政策的结构

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是美国远东政策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它是对重申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则和为远东的战后权力结构制定出基本纲要的《开罗宣言》的补充。鉴于雅尔塔协定旨在保证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因而它是确保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一种反映。鉴于它的目的是取得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合作，因而它是推动美国和平统一中国政策所必不可少的途径。促使美国官员缔结和履行雅尔塔协定的直接和主要的考虑无疑是军事性的。然而他们更为深刻的思想集中在雅尔塔协定对中国国内局势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上。军事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估价都反映了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中，苏联在远东的强大地位，而美国没有苏联的合作就不能实行它的政策。雅尔塔协定就是为这种合作付出的代价。

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问题，雅尔塔协定损害了中国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再现了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格局。这是当门户开放政策出现了最新发展不久之后的新后退。这种最新发展是，门户开放政策最终导致了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和美国与英国放弃了它们在华的治外法权。而新后退的两个先例是：第一、1908年的罗脱—高平协定，对它的一种解释是美国慷慨地给予日本在满洲行动自由，而从日本那里得到它尊重菲律宾安全的保证；第二、1917年的兰辛—石井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特别是在它的财产所接近的那部分地方。但是后退和在后退之前的发展之间形成的对比在1945年无疑是较为鲜明的。最近一次后退发生在美国拒绝为与日本达成妥协而牺牲中国之后。发生在中国即将成为所谓四大国之一的时候。与罗脱—高平协定和兰辛—石井协定相比，雅尔塔协定没有以书面形式对中国主权和门户开放政策加以肯定的渲染，因此、除了把它解释为是损害原则的协定之外，不能有任何严格的、合法的解释或想像中的解释。

追溯历史，事情似乎很清楚，雅尔塔协定预兆着在远东权力平衡上即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发送门户开放照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远东的权力平衡是由各列强在政策和利益的冲突中转移平衡点来维持的。四年的战争标志着—个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日本作为远东最强大的国家而出现，它与英国结盟，又得到协约国其他国家的支持。即使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对推进它的远东政策也是一筹莫展。罗脱—高平协定和兰辛—石井协定是政治现实的反映。从华盛顿会议到二次大战中德国投降，远东的权力结构取决于美日对抗。在1941年之前的十年中，由于美国不愿意并且没有能力诉诸军事力量反对日本在华的行动，这一平衡逐渐被打破。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有效地使用海军和空军力量又逐步恢复了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预示了日本的失败。欧洲战争的结束使俄国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重新登上远东舞台。苏联和美国的冲突构成了新的两极国际体系，混乱不堪的中国变成了争夺的直接目标。这个新的权力结构对美国为保卫它在中国的利益能够做到的和应该做到的事情规定了比以前两种结构更加狭隘的范围。因为这时美国面临一个与中国享有共同边界的日益崛起的大陆列强，一个同时得到巨大的中国支持的成为革命运动中心的超级大国。雅尔塔协定中对苏联的让步就反映了这一正在出现的政治现实。

从这个角度出发，雅尔塔协定可以被解释为是阻止正在恢复的苏联与中共合作以打破力量平衡的一种尝试。哈里曼大使说，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雅尔塔协定“限制苏联的向东扩张，为国民政府争取苏联的支持。”同时，雅尔塔协定是美国为使苏联在这个关头参加太平洋战争，为拯救美国生命而付出的一种代价。许多人对苏联参战以确保已经战败的日本的投降是否有必要持怀疑态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有没有美国的同意，苏联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取得比雅尔塔所给予它的更多的利益。考虑到正在出现的权力结构，如果雅尔塔协定可以限制苏联的扩张，那么美国为取得苏联合作而付出的代价就并非如此高昂。

然而，出于两种原因，雅尔塔协定在遏制苏联野心方面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一，它旨在支持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在中国政治中是没有基础的。太平洋战争末期，中共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实力，这使苏联在 1945 年 8 月的中苏条约中支持国民政府的保证仅仅暂时削弱了中共的讨价还价地位，而他们并没有以国民党的条件实现和解。即使苏联想这样做，它也不能把这种和解强加于中共。正如美国认为有必要向国民政府提供有限援助但不能阻止它发动大规模内战一样，苏联仅在满洲助中共一臂之力，也不能阻止它的革命进程。一旦莫斯科对中共的军事和革命潜力作出新的估价，一旦美国寻求国共两党和解的纲领陷于彻底的失败，苏联将在外交上公开支持中共。雅尔塔协定的失败不仅是和平统一中国政策崩溃的原因，而且也是它的后果。

导致雅尔塔协定失败的第二个因素是美国不愿意也不能够诉诸它在华的地面部队，以建立和维护或许会使雅尔塔协定成功的权力结构。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美国政府反对中国指出的把执行雅尔塔协定的计划中的中苏条约变成四国条约的提议案，这样美国 and 英国将成为签字国。美国并没有向满洲注入它的军事力量。它在华北的主要港口和交通线上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事实证明是暂时的措施。斯大林违反中苏条约和协定的行为、蒋在没有坚定的美国军援的情况下占领满洲大部分地区的鲁莽尝试、中共在全面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 2 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使远东逐步达到新的权力平衡，其特征是亚洲大陆上中苏集团地面部队与以环形岛屿为基地的美国海军空军力量的对峙。

雅尔塔协定还象征着对中国的“背叛”、对共产主义的“绥靖”和不道德的秘密外交。根据中国主权这一抽象的美国原则和威尔逊公开作出的自由契约条款规则，雅尔塔协定显然是不堪一击的。然而谴责雅尔塔协定只能掩盖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面临的权力——政治问题。为了理解雅尔塔协定和评价美国的政策，我们必须首先看到苏联是怎样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在远东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美国的政策怎样帮助了这一发展，苏联领导人怎样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有利地位。

2. 苏联再度作为远东大国的出现

斯大林于 1925 年写道：

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不能袖手旁观。我们要采取行动，但是我们最后才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天平投掷一个决定性的法码，一个打破平衡的法码。

在欧洲，1941年希特勒的进攻使斯大林没有机会实现他自己的权利。但是远东给他提供了第二次机会，他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直到1944年10月，斯大林作为战争的中立国为维护和发展他的有利地位遵循了一条双重路线，他面临着逐步被削弱而决心维护帝制的日本和逐步走向胜利并紧抱强迫日本无条件投降公式不放的美国。在一方面，他镇静地抵制了一切使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尝试，避免采取任何会引起日本对他的意图产生怀疑的行动。另一方面，他和他的助手反复声明，苏联最终将对日作战。在1944年10月，当他同意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共同拟定作战计划之后，在1945年2月，又以书面形式保证对日作战，这时他对自己的强烈立场仍保持着绝对的秘密，这使日本无法知道他的真实意图。

珍珠港事件的几天之后，苏联官员在回答美国和中国的试探时清楚地指出，它当时并不准备参加太平洋战争。1943年1月，斯大林反对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将向沿海几省派遣一百架编组轰炸机的建议。但同时，他于1941年12月告诉蒋、于1942年8月告诉哈里曼、于1943年10月告诉赫尔说，苏联最终将参加太平洋战争。用赫尔的话来说，他对赫尔说话时是“直接了当的”。“他强调他的活，态度完全是主动的，他不要求任何报偿。”

无疑，与德国激战是苏联拒绝在远东采取行动的令人信服的原因。然而，斯大林根本不可能没有看到暂时避免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政治利益，以便选择在最佳的时机才进行干预。1943年8月，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在对局势的估计中这样写道：

俄国在某个阶段可能参加对日作战，但是要在排除了德国对它的威胁之后。然后，它将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决定，只有在它认为它会以较小的代价击败日本的时候才会干预。

在1943年11月至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继续遵循他的双重路线。在一方面，他回避美国提出的在沿海几省建立空军基地和为对日本发动空战而制订早期规划的要求。因为同意这些要求可能会向日本暴露他的意图，使在苏联过早卷入太平洋战争、破坏它对美国而言的讨价还价地位。另一方面，斯大林重申了他在击败德国之后便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在答复丘吉尔的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苏联对远东有某种政治上的要求。然而，在他的提议下，推迟就这些问题作出决议。在第一次提出政治要求时，他以无关痛痒的词藻对这些要求加以掩饰。他给罗斯福的印象是，他赞同使大连成为国际自由港，他对中国中东、南满铁路的要求充其量只不过是把俄国贸易迁移到这条尚未完税的往返于大连和满洲里之间的铁路线上的这一特权。会上并未提及使旅顺成为海军租借基地、承认外蒙古现状、铁路联合所有权、保障苏联对大连和满洲铁路的“首要利益”，但所有这些在后来的雅尔塔协定上却有所规定。

1944年以后，红军在欧洲的胜利使苏联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在同一年，盟军逐步放弃了把中国作为主要的作战基地的想法。虽然美国的主要力量可用于太平洋，但在中国大陆对付日军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944年7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一个进军日本本土的计划。计划初步规定于1945

年 10 月 1 日开始在九州登陆，对本州东京地区的进攻于 1945 年 12 月底发动。在 1944 年 9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进军日本的计划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日本投降的预定日期被订于欧洲战争结束的十八个月之后。那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计划并未考虑到俄国的参战，但是由于斯大林对所谓的美国不愿寻求苏联帮助表现出十分敏感，因而美国在所有后来的计划中都为苏联军队规定了特定的任务。

拥有军事实力的苏联对远东的计划在 1944 年 10 月向美国官员公开出来。斯大林在描述他在中国进行大规模陆战的计划时说：

如果我们在严肃地考虑击败日本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局限于满洲地区。我们要从满洲的各个方向发动直接的袭击。但为了取得实际的效果，我们必须进行侧翼包围——袭击张家口和北平……我认为，主要战役与其说在满洲，还不如说在南方进行，当日军撤离中国时，我们预计会在南方看到他们。

这样的一场陆战将使苏军进入中共军队正在战斗的华北。相比之下，美国并未计划在中国登陆作战，除一些占领机场的沿海登陆之外。哈里曼在答复斯大林的问题时对他讲，只有苏军可打入满洲。斯大林对美国计划表示同意，他评论说：“美国人将从南部岛屿截断日本驻军，俄国人将切断在中国的日本地面部队。”

斯大林占据着强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这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能力，而且由于他在决定参战的时间上有着自由的选择权。正如美国派往苏联的军事使团团团长约翰·R.迪恩将军所说：“时间和时间的选择是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为了在最大限度上支持美国进攻日本，俄国对满洲的进攻最晚应在进军九州的计划的三个月之前发动。如果美军在九州初步站住脚，而满洲的日军开始增援日本，此后，俄国人才发动进攻，那么他们将会取得最大限度的军事优势。就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罗斯福总统说：“尽可能早一天参战（参加太平洋战争），向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是必要的，它有能力参加进攻性的战役。”当麦克阿瑟将军得知俄国即将参战的消息后，1945 年 2 月，他对乔治·A.林肯准将说，他“认为至关重要是使最大多数的日军参加战斗并被牵制在亚洲大陆上，然后美军将袭击日本国土。”他还说：“从军事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在对日本下手之前不遗余力地使俄国参加对日战争，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承受日军的压力并遭受损失，而俄国人便会在适宜的时机进入排除了主要抵抗的地区。”

由于一份错误的美国情报估计，苏联的讨价还价地位在美国看来似乎比实际上更加有利。1944 年秋，陆军部情报处的全体工作人员估计日军的总力量是大约 500 万官兵。其中差不多有 200 万人据说在日本本土；另有 200 多万人在满洲、朝鲜、中国、福摩萨。日本在满洲的关东军大约有 100 多万人，据说是日军的精华，这种估计直到战争结束以前一直主宰着美国的计划。人们更愿意接受这种估计，而不愿接受另一种认为日本的第一线精锐部队的上限是 200 万人的估计。按照这种估计，在西南和中部太平洋的战役中被击败的日本士兵就是日军的精华，而关东军则仅仅是它的影子，在满洲作战将不会出现持久的困难局面。

红军即将发动的陆战将使斯大林在无论是否得到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可

以随意占有满洲的一切。很少有美国官员象麦克阿瑟将军那样强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据说他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俄国的目标……他们想得到满洲、朝鲜的一切，也许还有国民党中国的一部分。夺取领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美国必须坚持要求俄国为此付出代价，即在击败德国后尽早进军满洲。

此外，在中国的（苏联）红军将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他可以支持华北和满洲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这一最重要的部分建立独立国家或者地区统治。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指出的，戴维斯早在 1944 年 1 月就认识到华东和满洲变成独立国家——甚至俄国卫星国的可能性。1944 年 12 月 15 日，哈里曼对总统说，我们借用菲斯的话：“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政府没有达成协议，那么苏军将会支持华北的共产党人，并将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交给他们管理。”另一种选择是，斯大林将支持蒋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以换取美国、中国同意他的条件。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其他的可能性。

斯大林似乎是随和的。尽管他有能力取得他想得到的一切，然而他仅仅提出有限的要求。作为这种要求的交换，他保证参加太平洋战争，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回顾历史，在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斯大林似乎挑选了最缺乏奢望的一个，而这个选择最后对他最为有利。显然，他在二十年代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使他过低估计中共的革命潜力，过分夸大国民党的军事实力。他也许对美国的意图和能力也有疑问。无论如何，他可以坐观中国局势的发展，同时采取既不会引起美国的怀疑，又不会造成国民党的敌意的行动步骤。

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斯大林的要求似乎是合理的，[78]他的政策是适中的。罗斯福总统准备同意他的要求以保证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实现中苏友好，取得苏联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防止苏联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他还希望通过迅速推进实现中国统一，减少苏联支持中共的危险。

无疑，蒋敏锐地意识到苏联公开支持中共的危险。然而与中共达成和解却不是他解决因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而造成的复杂局面的方法，除非与中共的和解能以他自己的条件实现。1944 年 11 月，他拒绝了赫尔利拟定的与中共达成协议的草案。相反，他通过外交上的让步为自己取得苏联的支持，并使美国作为调停人，努力削弱中共的地位。1944 年 6 月，他向华莱士建议说，罗斯福可以成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仲裁人和中间人”。显然，他希望美国的调停将软化苏联的要求，美国的影响将抵消苏联的实力。为防止出现一切意外事件，他甚至在 1944 年春天以前就准备好当红军经过华北打击日本时，他将阻止俄军和中共军队进行接触。后来，他从罗斯福那里得到消息，暗示苏联不久将参战，他便请求斯大林接见宋外长。蒋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步骤，可能是从斯大林公开宣称支持他，认为他是中国有希望的最优秀分子的政策中受到鼓舞，从斯大林允许美国在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政策中受到鼓舞。他可能还记得苏联于 1937 年至 1941 年期间将一切援助送给他的政府并对中国内政采取了正确的官方态度。因而，蒋愿意向斯大林作出外交上的让步，以确保斯大林对哈里曼说的话以及莫洛托夫对赫尔利说的话能够作数。[79]

1944 年 12 月底，美国高级领导人相当肯定地说，一种新式武器——原

子弹将于 1945 年 8 月准备就绪。曼哈顿计划方案的指挥莱斯利·R. 格罗夫斯将军 12 月 30 日对马歇尔说，第一枚“枪式炸弹”将于 1945 年 8 月 1 日准备就绪，第二枚在年底就绪。第一枚的当量大约是一万吨的 TNT。格罗夫斯还报告说，在第二种原子弹，内向爆炸类型的炸弹成功地问世之前必须生产更多的原材料，而在 7 月下旬某个时候，制造第一枚内向爆炸类型的炸弹的原材料应该充足。他估计第一枚内向爆炸类型的炸弹爆炸力当量约等于五千吨 TNT。后来结果证明，无论是七月份在新墨西哥试验的第一枚内向爆炸类型的炸弹，还是投掷在广岛的第一枚枪式炸弹，爆炸力大约都相当于二万吨 TNT。得知有可能成功地制造原子弹的消息并未改变罗斯福和杜鲁门的观点，他们仍希望苏联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美国高级官员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依靠“苏联参战以扩大原子弹的影响”。或如路易斯·莫顿最后所表明的那样，阻止苏联干预远东战争的愿望并不决定原子弹的使用和使用它的时间选择。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击败敌人。如果这个目的由于某个官员的政治考虑而受到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只是遥远的、间接的，在公开发表的记录和报道中是不明显的。只有当美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美国习惯于为政治目的而诉诸武力时，美国官员才会把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看作要求苏联参战的代替物。

3. 雅尔塔协定

地缘政治上的因素决定了苏联在远东的任何推进都会牺牲中国的利益。考虑到国民政府的虚弱，苏联的要求与其说受到中国法律权利的限制，还不如说它只受美国权力的限制。由于有效的抵制只能来自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苏联为实现它的要求则更多地取决于美国的默许，而不是取决于中国的同意。为确保在中国取得牢固的地位，苏联必须避免继国务卿布菜恩的警告和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原则这些先例之后出现的危险状况，即美国将拒绝承认苏联与中国达成任何有损于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或与门户开放政策背道而驰的条约或协定。因而，斯大林的策略显然是在压中国接受它的要求之前先取得美国对这些要求的赞同。他给美国的“报酬”主要是苏联的参战；对中国的“报酬”是支持国民政府的保证。对美国和中国两者来说，他的保证比他的要求分量更重；他行善或作恶的能力似乎是令人可畏的。在谈判中，无论是美国还是国民党中国都发现他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拒绝他的要求。美国仅试图使他难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中国仅努力使他软化了自己的条件，并使他对自已的意图作出更坚定的保证。

1944 年 10 月，斯大林在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保证在击败德国两、三个月之后参战。但他第一次清楚地提出，在参战以前，他想使人们确切地了解他的政治要求。1944 年 12 月 14 日，哈里曼问斯大林，关于俄国参加反对日本的战争一事，有哪些政治问题应该澄清。斯大林说，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岛应归还俄国。他想租借旅顺、大连以及附近的地区，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他要求“承认外蒙古现状——把外蒙古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于 2 月 8 日与罗斯福会晤，他说他愿意讨论有关苏联参战所需的政治条件。然后他谈及他与哈里曼的谈话。罗斯福努力减少他的要求，指出他更愿意使大连成为国际自由港，并建议成立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两天之后，莫洛托夫向哈里曼递交了一份草案协定，

它体现了斯大林的建议而不是罗斯福在处理港口和铁路问题时的愿望。同日下午，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了妥协，旅顺将租借给苏联，大连在国际监督下将成为自由港，满洲铁路将由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在草案的最后文本中，苏联官员插入了两句话为俄国在大连港和铁路谋求特殊地位，即规定保障苏联在港口和铁路的“最高利益”。罗斯福在没有与斯大林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同意了这些改动。而这两句话却为斯大林向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提供了借口，超过了罗斯福认为他同意支持的那些要求。

在 1945 年 2 月 11 日的雅尔塔协定中，斯大林还成功地使罗斯福保证，他“将毫无疑问地满足”苏联的要求。这条规定使美国不得不使中国接受苏联的条件。罗斯福努力减轻这种义务，而他只能建议插入这样的话：“众所周知，上文所提的有关港口和铁路的协定需要取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斯大林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有必要取得蒋委员长的同意，并以此掩盖它对外蒙古的要求。作为回报，他使罗斯福作出“采取措施取得蒋的同意”的承诺。[80]

虽然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与蒋讨论过在战争结束时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可能性，但是他在对俄国人作出妥协的问题上却没有与蒋委员长进行磋商。罗斯福就此对斯大林作了解释，他颇为不当地指出：“他没有机会与蒋介石元帅（原文如此）谈话，他感到与中国人谈话的困难之一是你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公诸于整个世界。”斯大林对此欣然表示同意，并说，如果有可能解脱一部分在西方的苏联军队并往远东调遣二十五个师，那么便有可能与蒋介石谈这些问题。因而，雅尔塔协定直到六月才透露给中国人，那时斯大林认为时机成熟了。

雅尔塔协定周围笼罩着的浓厚的神秘气氛出自坚定的军事上的原因。1944 年 11 月，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指出，日本人若在俄国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切断西伯利亚铁路线、发动强大的攻势，可能会使俄国人心慌意乱并无疑会导致苏联远东军的严重挫败。由于美国的最高目标是迅速战胜日本，而不是战后的权力平衡，美国政府认为它在保守秘密方面与俄国承担同样大的风险，它甚至对中国政府否认它知道雅尔塔协定一事。结果，这种保密不仅造成了政治影响，也造成了军事影响。保密使斯大林能够把他的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以发动强大的攻势，从而影响远东的政局。它使日本无法确切了解苏联参战的意图。由于日本对苏联的意图缺乏具体的了解，它以为通过苏联的调解就可以与盟国达成和平解决的幻想便延续了下去。这种幻想阻止日本为寻求和平而直接与盟国接触。因而，不管斯大林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坚持保密的主要政治后果就是保存实力，影响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的时间选择，决定远东战后的政治结构。对美国来说，它既没有在雅尔塔协定缔结之前与中国磋商，又没有在协定缔结之后立即向中国通报，这将成为它与中国的关系上产生摩擦的根源。它将使评论家对政府提出道义上的指责。这种作法十分严重地背离了美国外交的格式，很少有美国官员敢于为雅尔塔协定的这个方面进行辩护。[81]

奇怪的是，罗斯福并未试图使斯大林作出在中国发生内部冲突时支持国民政府的明确承诺。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作的唯一承诺是“就苏联而言，它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实现把中国从日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目的，向中国以及它的军队提供援助。”这与其说是支持国民政府在中国维持它的政权，还不如说是提出了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建立

军事联盟的设想。[82]也许我们在罗斯福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中可以发现他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在这次有记录的、简短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关于中国状况的讨论中，罗斯福提到在共产党和重庆政府间实现和解的进展缓慢。他说过更多地归咎于国民党和重庆政府，而不是所谓的共产党人。斯大林表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为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该承担领导责任。我们还必须记住，雅尔塔会议是在召回史迪威四个月之后召开的，那时罗斯福总统本人对中国是个大国这一概念变得非常暧昧。

4. 对苏联意图的忧虑日益增长和对雅尔塔协定的审查

在雅尔塔协定之后的几个月内，苏联在东欧，特别是在波兰采取的行动使美国官员深为不安。一些美国官员开始对斯大林的意图提出严肃的疑问，并含蓄地对罗斯福与苏联进行合作的政策提出疑问。4月4日，哈里曼大使对华盛顿说：“苏联政府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出自于自身的私利”，“苏联的计划就是建立极权主义统治。”他最后说，除非美国和英国立即采取一条“独立的路线”，否则苏联将很有可能统治欧洲。两天之后，他报告说，美国继续采取的慷慨和体谅的态度仅仅被俄国视为软弱的表现。他敦促美国采取有效的报复行动，选择“一、两个他们（俄国人）所做的不可容忍的事例，使他们认识到不能继续采取当前的态度，除非他们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使与俄国继续合作的主要提倡者从舞台上消逝。

哈里曼的报告标志着重新估价苏联意图和美国政策的开端。从这时起，在决定美国的远东政策时，过去那种错误地估价苏联意图的观点其影响力已迅速减退。但是只要美国必须依靠苏联的帮助才能击败日本，只要它不打算在满洲和华北使用它的军队，那么它就有必要用苏联的诚意作赌注。如果在苏联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以前，美国还不能结束太平洋战争，那么它的地面部队就失去了优先进入满洲的能力，它就不可能阻止苏联政府随意选择参战的时间，并夺取它所要求的一切。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使美国在德国投降以前或至少在德国投降不久以后，及早摈弃它的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并结束太平洋战争。这样，对苏联意图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导致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尽管对苏联意图的怀疑日益增长是与斯大林声称支持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一复杂观点的具体化同时发生的，美国的远东政策仍出现了重大变化。对此所作的更准确的评价是与赫尔利大使在从华盛顿返回重庆任职途中于1945年4月访问莫斯科有关的。我们不妨对赫尔利的乐观主义观点作些评论。4月15日，赫尔利在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谈之后向华盛顿报告说，斯大林“直率地指出”，苏联政府将支持美国“拥护蒋领导的国民政府并赞同在中国建立统一、自由、民主政府的愿望”这一政策。据赫尔利说，斯大林又说他与美国合作实现中国军队的统一感到高兴。他希望美国政府了解，美国在“全面承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军队的直接行动中，将得到他的彻底支持。”赫尔利最后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的对华政策。”

赫尔利对斯大林希望中国实现军事和政治统一的判断似乎是正确的。正如查尔斯·B. 麦克莱恩所说，这一时期苏联的政策是“在战争后期敦促国共两党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并建议立即为战争一结束便建立联合政府作准备。”

莫斯科之所以采取这一政策是因为这样它在雅尔塔协定中得到的利益便不会因大规模内战的爆发而受到威胁。然而，被赫尔利所忽视的问题是苏联支持中国军事和政治的统一本身并不意味着能以国民党的条件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也没有认识到苏联与蒋合作的政策，在广泛和灵活的政策格局中仅仅是一个策略步骤，它可以随着局势的发展被修正或摈弃。

当时美国官员清楚地预见到这些可能性。4月19日，哈里曼大使在重访华盛顿时对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他感到赫尔利的报告尽管在事实上是准确的，但是它“对斯大林元帅的反应太乐观了”。他确信，如果俄国卷入远东的冲突并且一旦它确实这样做时，就会全面利用中共并支持它，如果届时国共分歧仍未解决，它甚至会在满洲或华北成立傀儡政府。他评论说，斯大林赞同美国在华行动的声明不必一定意味着俄国人将放弃他们希望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动步骤。

4月23日，美国驻莫斯科的代办乔治·坎南给哈里曼发了一份电报，评论赫尔利的报告。坎南指出，斯大林知道，统一军队“实际上只有在中共同意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他预见说，“在将来，苏联尊重中国意志的政策将是过去最近时期的政策的继续：这是一种灵活的和富有弹性的政策，是为了在苏联边境线之外的亚洲大陆的某些部分，以承担最少的责任获得最大的权力”。因而，在这个范围内，苏联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在华北的所有地区内取得充分的控制权，防止外来列强，包括美国 and 英国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他警告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我们因为急于取得苏联的支持，因为相信斯大林巧妙地运用被许多人奉若神明的词藻以及他谨慎的和蔼可亲的态度，而使我们在实现我们在华的长期目标中过份依赖苏联援助，甚至苏联的默许，那么这将是悲剧性的。”然而，这些对苏联意图所做的现实主义的估价并未给美国政策带来变化。它们仅仅使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敦促蒋委员长早日实现中国的军事政治统一，并以此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基础。4月23日，国务院给赫尔利发送了一份表达这样的意思的电报。

我们无须走得很远就会发现为什么重新估价苏联意图并未导致任何政策的改变，而仅仅使美国进退两难的困境更加恶化的原因。4月23日，白宫的一次会议讨论了苏联对东欧的意图以及美国作出适当反应的问题，沃尔特·米利斯把这次会议称为杜鲁门政府的第一次政策危机。据福雷斯特尔日记记载，杜鲁门说：“如果他们（俄国人）与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签订的协议的某个部分被破坏，那么他（杜鲁门）将认为整个雅尔塔协定对任何一方都失去了约束力。”但是马歇尔将军主张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他“希望苏联在这一对我们有利的时机参加反对日本的战争”，如果俄国人任意推延他们参加远东战争的时间，那时“我们已经干完了一切苦活”。这样，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由于需要苏联的帮助，便放慢了它在欧洲和远东对苏联制订一条新政策的进程。不久，一些美国官员开始怀疑俄国的合作对击败日本是否是必要的，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苏联是否需要美国的引诱才会参战。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提出了考虑到俄国军队很可能是首先进入满洲的军队，因而是否至少应该派遣象征性的部队到中国去的问题。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无法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以前，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还认为，苏联的参战如果说不是绝对必要的，那也是极为必需的。况且，美国无法将俄国排除在太平洋战争、满洲和华北的某些部分之外。这些考虑继续限制了修改美国政策的努力。

5月12日,助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向史汀生和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格鲁就中国政策提出如下的两个问题:

难道苏联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对美国利益是如此之重要,以致使美国政府不再试图为在远东达到某些必要的政治目标,而在苏联参战以前取得它对这些目标的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苏联在远东的政治需要的决定是否应该重新审查,以决定它应得到全面实施还是部分实施?

格鲁建议,苏联政府应同意对中共施加影响,帮助美国政府努力实现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下统一中国的目标,在美国认为是最理想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统一,应该在美国以雅尔塔协定为基准接近中国政府以前就取得苏联的同意。这时,格鲁开始对苏联的意图产生深刻的忧虑。

针对格鲁的问题,陆军部在5月21日的备忘录中作了回答,对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作了如下的估价:俄国参战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影响,可在实际上缩短战争的时间,从而拯救美国人的生命。苏联参战的决定和参战时间的选择将根据军事和政治考虑作出,至于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是无关紧要的。雅尔塔协定中对俄国的让步“一般是在俄国军事力量范围内可以取得的让步,而不管美国除战争以外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俄国在军事上有能力击败日本,占领桦太岛(库页岛的日本叫法——译者)、满洲、朝鲜和华北,尽管美国军队也可能事先占领这些地区。此外,如果俄国愿意,它可以等待时机,当美国实际上完成了摧毁日本军事力量的任务后,俄国可以在比早日参战承担较少牺牲的情况下实现它的目标。就远东而言,除非美国选择诉诸武力,否则它对俄国所能施加的军事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根据这种估价,陆军部得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一方面,它说明,军事上的考虑并不排除美国政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为在远东实现必要的政治目标而取得苏联同意的尝试。它与国务院寻求的取得苏联承诺的必要性和澄清这种承诺是不谋而合的。另一方面,它评论说,从军事观点出发,在远东问题上与苏联达成完全的谅解和一致意见是必要的。它表示相信,在这个时候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不会有多大好处。

在有一个问题上,陆军部是毫不含糊的。它明确地阐明它的观点说,除非国民政府与苏联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否则苏联的参战和(苏联——译者)红军与中共军队即将发生的接触会使美国在中国面临的已经十分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它建议,作为中苏和解的初步措施,“中共和蒋委员长之间达成某种谅解似乎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这个备忘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明确地把美国由于缺乏军事力量而无法阻止苏联影响中国局势与在中国寻求军事政治统一的政策联系起来。它表明,限制苏联在华影响的希望与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一样,取决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的成功。而这一政策是所有其他对华政策的关键。它的失败导致了美国整个政策结构的崩溃。

这时,我们可以察觉到在赫尔利的纲领、蒋的纲领和一些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美国官员的看法中存在着微妙然而重大的分歧。赫尔利的政策根据的设想是,由于苏联将支持国民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和解。在他看来,在执行雅尔塔协定的某个条约中具体规定,取得苏联政

府支持国民政府的公开保证是两个中国政党之间达成圆满解决的关键，是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的办法。蒋也极为重视苏联的支持。但当他认识到苏联最终的意图是敌对的，便寻求以美国的实力抵消苏联的力量。国务院和陆军部的美国官员日益认识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希望中国实现政治军事上的统一以遏制和抵消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影响。这三种态度赋予三种不同的因素以最高的优先权。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待这三种因素时，却没有对局势中最重要、也许是最富有决定性意义和使美国政策更有可能成功的因素加以明确的强调。这就是国民政府与美国必须相互合作，形成一种实力地位，使苏联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忽略中共，并与国民党打交道，这样，中共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较满意地接受少数党的地位，而避免承担直接发动内战的风险。

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朝着强化中美的实力地位这一最高的优先权的方向发展。蒋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未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他抵制美国忠告的作法都使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中美合作困难重重。赫尔利对中共力量的过低估计、对国民政府的生命力抱有的乐观主义和他不相信压力策略的态度都不利于这样一种政策，即压蒋实行必要的改革或建立一个由各政治力量组成的新的、排除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并把它作为中央政府的更加坚实的基础。1944年夏季之后，努力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便成了既定纲领。这时，华盛顿的军事计划设计者排除了在中国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的想法，否定了史迪威重新装备和重新训练60个，后来是90个中国师的建议。只要抗日战争在继续，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抵制苏联的行动就会受到限制。几乎没有任何美国官员认为美国向中国大陆调遣一切可能的军事力量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因而，美国没有别的选择，它只能依靠苏联的诚意并把取得远东政治稳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实现政治军事统一上。五月中旬重新审查美国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决定不再要求修正雅尔塔协定，但要求斯大林澄清他在中国对满洲的主权上的立场和他对美国实现统一中国的努力上的立场。哈里·霍普金斯在哈里曼大使的帮助下承担了这个任务。在霍普金斯赴莫斯科之前，杜鲁门向他强调了尽早使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必要性。5月28日，斯大林在与霍普金斯和哈里曼的谈话中重申了他将于8月初参战的保证，只要中国那时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斯大林明确声明，他将尽一切力量推动中国在蒋的领导下实现统一。他进一步表明，蒋的领导在战争结束后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没有任何人，具体讲没有任何共产党的领导人有能力统一中国。他说，他希望中国将把整个满洲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一部分加以统治，他尊重中国所有地区的主权，包括他的军队与日作战的那些地区，他将欢迎蒋委员长的代表与他的军队一道进入满洲，以便有利于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国政府。他还说，他希望在有关满洲和中国的作战区域问题上与盟国达成谅解。

鉴于军事局势的发展和苏联强大的讨价还价地位，斯大林的全面保证是美国希望取得的最好的结果。因而，霍普金斯在他给杜鲁门的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从关于远东问题的会议中受到极大的鼓舞。”杜鲁门因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颇为欣慰地得知斯大林重申了他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保证，因为据美国军事专家估计，即使在亚洲的日本军队被俄国人牵制在中国大陆上，入侵日本至少还会造成50万美国人的伤亡。据菲斯说，在五月中旬重新审查雅尔塔协定时，史汀生提出这样的想法，即美国与苏联政府就满

洲和中国问题进行的严肃讨论将在美国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并使整个世界知道之后再继续进行。在斯大林对霍普金斯作出保证之后，这个想法就被抛弃了。美国政府采取了执行雅尔塔协定的措施。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我们将讨论导致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由于整个这一时期的关键因素是苏联影响远东事态的能力，因而我们将试图表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是怎样自始至终使苏联能够对美国保持强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的。

5. 美国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和苏联操纵远东事态的能力

分析表明，美国对苏联意图产生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因缺乏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无法阻止斯大林取得他想取得的一切。除非太平洋战争在德国投降之前或不久之后结束，否则除了采取威胁对俄国作战或确实与俄作战这样激烈的、不可思议的步骤外，便没有任何除了依靠斯大林的诚意之外的可行选择了。然而，只要美国坚持日本无条件投降，特别是只要日本有理由认为无条件投降会导致帝国体系的毁灭，那么日本便不会自动投降。就美国公众和许多美国官员而言，他们错误地认为天皇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和采取对外侵略政策方面起了作用。这种普遍的错误概念限制了那些更了解情况的人们的行动自由。美国政府在认识到天皇在实现日本投降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这一点上是相当迟钝的。因此，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后，美国才澄清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表明它愿意允许日本保留帝国体制。那时苏联已向日本宣战；苏联军队已完全准备好进入满洲、华北和朝鲜，苏联政府已能够最大限度地地为自身利益而利用这一动荡的局势。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没有得到确实证明苏联有参战意图的情报。它为取得援助而接近苏联，起初它想使苏联帮助它继续进行战争，后来又想以除无条件投降之外的办法结束战争。对美国政府来说，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使它无法采取主动，与日本政府或罗伯特·J.C.巴托称为日本的“结束战争派”建立直接的联系和接触。部分由于美国的政策造成了日本对苏联的幻觉进一步增加，使得苏联强化了对美国的讨价还价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战争中以最小的牺牲获取了最大的利益，他的策略是成功的。如果在最后一刻没有对无条件投降的方案进行修改，如果美国没有掌握原子弹的话，那么俄国还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副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是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首先认识到天皇在日本投降的过程中可能起到作用的美国官员之一。但是也许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日本天皇和人们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的感情，他在建议公开澄清美国对帝制的立场，即把它作为使得日本投降的一个步骤上，行动是迟缓的。直到1945年5月1日，他的建议也只不过是把对日本天皇问题的决定推迟到美国实行军事占领之时。从1944年4月直到那时，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当时，海军情报所和联合作战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埃利斯·M.扎卡赖亚斯采取了主动，公开澄清无条件投降的政策。5月8日，德国正式投降，杜鲁门总统向新闻界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宣布：“只有当日本的军队和海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时，我们才会停止战斗”，但是“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灭绝或奴役日本人民”。声明只字不提天皇问题。

无条件投降方案中出现的第一个细小的，而且是过于模糊的缺口引来了

5月28日格鲁的一个建议，他提议，杜鲁门总统应作出公开的承诺，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当代的王朝，如果日本人民仍愿意保留它的话。史汀生、马歇尔、福雷斯特尔赞同这一建议的原则。但是他们担心，如果这时发表它，将会被日本认为是美国虚弱的表现，因为冲绳战役进展缓慢，而且伤亡严重。格鲁的建议被搁置一边了。

后来，格鲁在1947年2月给史汀生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杜鲁门总统像他所建议的那样对日本王朝问题发表明确的公开声明，那么日本投降就会更快地实现。他写道：“如果日本投降可以在苏维埃俄国参战和使用原子弹之前实现，在1945年5月，甚至6月或7月实现，那么世界将是胜利者。”格鲁的信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使是今天也难以回答。[83]无疑，修改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案是日本投降的必要条件。但真正的问题是两方面的。第一，即使美国于1945年5月对保留天皇作出明确的保证，它能否迅速改变日本的政策，能否急剧改变军国主义分子和“结束战争派”之间的权力平衡，并于6月或7月实现日本投降？第二，它作为导致日本投降的条件是否充分？难道早日结束战争的必要条件仅仅是对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的修改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在格鲁提出建议的十七个月之前，《开罗宣言》重申，日本将被剥夺它自1895年以来侵占的领土。宣言的内容和它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谴责严重地阻止了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日本人提出的一切积极方案。结果，主和派对德国投降时他们应怎么办只形成了初步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只要日本政府除与美国发生直接接触外还有别的选择，那么它就不会立即以盟国的条件同意投降，即使这些条件包括保留帝制这一为日本所欢迎的保证。这个选择就是寻求与苏联达成和解，这样日本或者可以更加成功地作战，或者通过苏联的斡旋争取更好的投降条件。[84]的确，1944年11月，斯大林公开谴责日本为侵略者。4月5日，莫斯科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在期满之后将不延期。但条约有效期仍有一年的时间。东乡茂德外相怀疑苏联也许已同美国和英国在击败日本后瓜分战利品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但是笼罩着雅尔塔协定的秘密色彩使他无法得到具体的证据以支持他的估计。

这样，为了继续打这场战争，而不向无条件投降屈服，日本向苏联求助。它5月中旬的外交目标就是阻止苏联参战，引诱苏联采取友好态度。它在6月初的军事计划就是在保卫国土的决定性战役中争取获胜。在整个5月和6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的政策就是为了继续这场战争而实现与苏联的和解。作为对苏联拒绝参战和援助日本的报偿，东乡愿意将俄国在1904年至1905年俄日战争中损失的一切归还俄国。如果苏联对日本的表示流露出任何明确的兴趣，日本政府可能会向苏联提供比东乡所计划的还要广泛得多的让步。在瑞士，两名日本官员于4月和5月分别同美国战略情报局建立了联系，他们仅对自己负责。两人都建议除保留帝制外，和平条件应包括日本保留朝鲜和福摩萨。两人都没有能够说服他们的东京上司支持他们的努力。只要取得苏联援助的希望还存在，日本政府就不愿意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接触。

由于日本为取得苏联的帮助以继续打这场战争的努力毫无结果，日本政府于6月22日决定与苏联接触，请苏联在媾和中进行斡旋。7月初，它提议派遣近卫公爵前往莫斯科，寻求以除无条件投降之外的方式结束战争。7月13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在东乡的指示下会见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洛蒙·阿勃拉莫维奇·洛佐夫斯基，请求苏联政府把携带天皇亲笔信的

近卫公爵作为天皇特使予以接待。7月12日的日本信件说：“只要美国和英国坚持无条件投降，我们的国家除了在为祖国的生存和荣誉而战的全面努力中坚持到底外，别无选择。”

苏联政府在这一时期前后与日本的谈判中，既没有断然拒绝日本的表示，也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理由是日本的建议还不够具体，因而无法回答。这样，在7月18日，洛佐夫斯基在一份照会里告诉佐藤，日本7月12日的信形式上是一般化的，它没有包含任何具体的建议，近卫的使命也不清楚，因而苏联政府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显而易见，莫斯科并不急于打破日本希望苏联斡旋的幻想；它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会导致日本与盟国发生直接接触的措施。它给日本政府提供的选择是，或者提出具体的让步，否则便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如果日本明确保证作出广泛的让步，那么苏联对美国和中国的评价地位便会进一步加强。

日本“结束战争派”的缓慢进展和日本政府为寻求苏联帮助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倾向于表明1945年5月底格鲁所建议的澄清会立即产生效果，即使早日实行格鲁的建议，在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和8月8日苏联宣战前不久便导致日本的投降，远东的政治局势也不会与当今的现实有太大的差异。因为重新部署红军实质上仍然可以完成，苏联仍然能够去做它事实上已经做了的事。

如果我们做如下的推测将是徒劳无益的：如果美国没有宣布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如果它拒绝发表“开罗宣言”，如果在1944年7月东乡内阁垮台时它修改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并与当时的日本“主和”派建立了秘密接触，那么日本、美国、苏联的关系能否会有根本的区别？因为1945年6月，美国仍然认为难以修改无条件投降方案。它继续寻求苏联的参战。6月18日，杜鲁门总统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与日作战中的战略问题。这是自1942年以来第一次有文职官员参加的会议。马歇尔将军报告说，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选择11月1日作为入侵九州的预定日期。至于亚洲大陆，马歇尔说，“我们的目的应是使俄国人对付满洲（如果必要的话，还有朝鲜）的日本鬼子，并使中国人进入战斗，他们在美国空军和一些军需品的援助下将能够扫荡（原文如此）他们自己的国家。”杜鲁门总统说，他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的目标之一就是使从俄国人那里取得一切可能的战争支持。[85]

在6月18日的这次会议上，史汀生和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提出了把入侵日本作为结束战争的办法之一的问题。莱希对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他担心这只能使日本人更加绝望，从而造成更大的美国伤亡。杜鲁门回答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上使议会允许他可以自由采取适当的行动。但他说，他感到这时他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改变公众舆论。在这个会议上，有人第一次提出建议，在美国投掷原子弹以前应该向日本发出警告。后来，麦克洛伊指出：“那时每个人都一心一意地想以军事手段打赢这场战争，政治上的考虑几乎是偶然性的。”

7月2日，史汀生在提交杜鲁门总统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中建议说，美国、英国、中国和那时如果成了参战国的俄国应发表一个声明，警告日本即将发生的事情，并给它一个明确的投降机会。史汀生建议，在这个警告中，如果“我们还说，我们并不排除在当今的王朝下建立君主立宪制，那么这将

在实质上增加了日本接受这一声明的可能性。”虽然史汀生没有提及原子弹，但是他和有关其他人都知道如果警告并未引起积极的反响，他们将投掷原子弹。史汀生认为，使用原子弹并不能消除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必要性。但他提议，如果苏联已经成为参战国，那么对日本的警告应在俄国的进攻“走得太远”之前发出。史汀生为各国首脑准备了一个宣言草案。其中有这样的声明，即日本未来的政府形式“可以包括在当今的王朝下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形式……。”7月3日，国务院表示同意史汀生的草案，在关于拘留天皇的关键句子中建议作了细小的改动。

同日，詹姆斯·贝尔纳斯宣布就任国务卿，取代斯退丁纽斯。二、三天之后，在他离美参加波茨坦会议以前，他向前国务卿赫尔谈起草案宣言的内容。赫尔反对有关天皇的声明，因为它“似乎对日本太姑息了”，“似乎它不仅保证继续保留天皇，而且还保留了天皇的统治阶层的封建特权”。他在7月16日通过国务院发给在波茨坦的贝尔纳斯的一封电报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警告说，如果这一声明未能导致日本的投降，那么这将“在美国引起可怕的政治反响”。7月17日，贝尔纳斯在给赫尔的电报中答复了他的问题：“我同意推迟发表这一声明，而它一旦发表便不应包括你所提及的那些承诺。”这样，当史汀生又会见贝尔纳斯时，他发现贝尔纳斯在一天之内又转而反对他保证在日本恢复帝制的建议了。

美国政府于7月24日向英国首相和蒋委员长发送了这份宣言草案以求得他们的批准，那时草案并未提及帝制问题。同日，史汀生再次向杜鲁门强调了保证日本继续保留王朝的重要性。他说，在警告中插入这样的保证“是重要的，可能它是使日本接受这一文件的关键”。他对杜鲁门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如果总统谨慎地观察（局势），如果我们发现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外交渠道给他们以口头保证。”这是美国官员有史以来第一次建议美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与日本政府接触，从而采取被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政策排除在外的行动。

当这些考虑正在形成的时候，斯大林告诉那些成功的叫牌人。他将支持失败者的建议。在波茨坦会议初期，他对丘吉尔谈了日本的表示和俄国的回答。显然，斯大林把日本的行动告诉英、美官员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尽管他对丘吉尔说，他不愿意把日本的表示直接告诉杜鲁门，然而他在一次私下会晤中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递交了佐藤大使6月18日的照会和7月12日的天皇来信。斯大林说，他也许有必要迷惑日本人，哄骗他们睡大觉，也许给日本以一般性的非具体的回答，指出日本建议的近卫之行的性质本身不明确。实际上，杜鲁门从截取和破译的日本信件中已经知道了日本的态度。[86]他回答说，这样的答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无论是日本的求和试探，还是斯大林的披露都没有使美国试图修改无条件投降方案或与日本建立直接联系。如果美国与日本建立了直接和秘密的联络渠道，如果华盛顿认为可以利用在瑞士的日本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那么美国便有可能打消日本对苏联的幻想，阻止他们寻求取得苏联的斡旋，并在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上澄清美国的立场。

由美国、中国、英国发布的波茨坦宣言并未提及天皇问题。它呼吁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军的无条件投降以避免迅速和彻底的覆灭。7月28日，日本首相宣布，“日本政府认为盟国宣言并不是至关重要的”，“除了全面忽视它，别无办法”。同时，东乡敦促佐藤大使立即会见莫洛托夫，努力查

明苏联对发表联合宣言的态度。同一天，斯大林在一次全会上对杜鲁门和艾德礼说，日本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个新的提议案。他说，日本将得到更加明确的回答，而这个回答是否定的。苏联在披露日本的新步骤时再次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翌日，莫洛托夫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建议说，盟国应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参战的要求。杜鲁门同意了 this 建议，为此，他向斯大林发送了一封由贝尔纳斯起草的信件，说明苏联的参战是以 1943 年 10 月的“莫斯科宣言”和当时尚未得到正式批准的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

在日本政府否决了波茨坦宣言之后，美国着手以全面诉诸武力支持它的最后通牒。8 月 6 日，原子弹在广岛爆炸，整个城市毁于一旦。这并没有导致日本请求投降的呼吁，然而它却迫使苏联采取了行动。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尽管那时中俄之间在执行雅尔塔协定方面尚未达成协议，而苏联官员曾反复声明这是苏联参战的先决条件。苏联的参战最终粉碎了日本取得苏联斡旋，以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的希望。这时，日本不得不直接与盟国打交道。在苏联对日宣战的那一天，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日本官员中各对立派别的激烈辩论此时形成了僵局，因而天皇在 8 月 9 日的皇室会议上表达了他的愿望，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对天皇问题持保留态度。8 月 10 日，日本政府向各盟国也发送了同样内容的照会，宣布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但日本理解，该宣言并不包括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任何要求。”8 月 11 日，盟军对日本作出答复，这份由贝尔纳斯起草的照会宣布：

从投降时刻起，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盟军最高统帅将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步骤实现投降条件……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按照波茨坦公告，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

照会意味着允许帝制继续存在，从而限制了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原则。贝尔纳斯的照会使日本领导人在从维护民族政体的角度上看是否可以接受这一照会的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他们再次要求天皇的个人干预，以决定接受这一照会。8 月 14 日，天皇颁发了结束战争的帝国法令。

这时，苏联已经宣战，并能够要求占有战利品。它的军队迅速向满洲进军，打垮了已经不堪一击的关东军，美国除了威胁对俄国发动原子战争外，当然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对苏联占领整个满洲束手无策。在波茨坦，美苏双方的参谋长就朝鲜和满洲两国的空战区边境线达成了协议。这条线从博尔菲纳角开始经长春、辽源、开鲁、赤峰、北平、大同，然后与内蒙的南部边界相接。美国空军将在此线以南，包括上述各地活动。苏联空军将在此线以北活动。对中国地面部队的活动区域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有人曾提出使美军在南满的大连登陆的建议。但经过认真审查后，这个建议被否决了。[87]这样，在华盛顿起草的，由天皇颁发的第一号通令命令在满洲的全部日军向俄国司令官投降，在满洲以外，在中国的日军向蒋委员长投降。斯大林得知这一安排后，对苏联在满洲的作用表示赞同，但他不失谨慎地指出“辽东半岛是满洲的一部分”。

这时，美国面临的根本困境再次出现。它在军事上已没有能力阻止苏联在中国的影响的扩张。它不得不完全依赖政治手段取得苏联的合作，维护它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这种政治措施之一就是制订一个执行雅尔塔协定以实现中苏和解的条约。为缔结这样一个条约，苏联政府和中国官员将于 7 月在莫

斯科开始谈判。我们现在就着手分析导致中苏条约缔结的整个过程。

6. 雅尔塔协定的执行

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外交与军事的发展为中苏执行雅尔塔协定的谈判提供了背景材料。我们还记得斯大林在 5 月 28 日与霍普金斯举行的会谈中，重申了他将于 8 月初参加太平洋战争的保证并就支持蒋作为中国的领袖，尊重中国，特别是满洲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作出了具体和坚定的保证。他重申了他在雅尔塔讲的话，即俄国人民必须有充分原因才会参加战争，而满足这些原因则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同意雅尔塔的建议。他对霍普金斯说，他想在最早不超过 7 月 1 日的时间内会晤中国外长宋子文，讨论这些建议。他希望美国政府同时也与蒋讨论这些建议。

6 月 9 日，杜鲁门总统亲自对宋谈了斯大林的保证和雅尔塔协定。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几天之后，赫尔利大使与蒋谈了同样的问题。杜鲁门明确地对蒋和宋说，罗斯福总统曾经同意只要俄国参加反对日本的战争，美国便支持它的要求，他也同意这一点。宋显然对苏联的意图几乎不抱任何幻想。他私下曾对总统的总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D. 莱希说，他的长远观点是，中国不能同意俄国在雅尔塔协定的可能范围内对满洲实行控制，中国宁可在以后的五百年中以军事行动解决争论，只要它能取得这种军事实力。宋和蒋都对雅尔塔协定中所使用的“最高利益”一词的含意表示关注。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斯大林对支持蒋和关于满洲的保证。他们还认识到，中国本身是不能对付苏联的，它需要以美国作为法码，需要美国成为中国利益的捍卫者。6 月 5 日，宋对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中国摆脱苏联轨道的唯一机会就是与美国建立强有力的联系。

因而，宋试图使格鲁对“最高利益”一词予以澄清并对雅尔塔协定进行解释。当赫尔利向蒋通报雅尔塔协定时，蒋建议美国 and 英国成为中国可能与苏联缔结的任何协议的签字国。他说，多方协议可以进一步保证苏联遵守协议的条款。他还建议把旅顺作为中、美、苏、英四大国的联合海军基地。这些建议遭到美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宋于 6 月 30 日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一开始就对宋清楚地说明，在苏联与中国政府缔结友好条约之前，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要事先得到解决，他后来又几次重申了这一点。谈判一开始，他就坚持要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根据苏联的看法，雅尔塔协定中“外蒙古现状”一词后面插入的带括号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句表明这个条款意味着外蒙古的独立。宋回答说，中国不同意割让领土，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并导致中国政府的垮台。他说如果政府割让外蒙古，中国共产党人将是最积极的批评者之一。斯大林对宋保证说，如果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站在一起，这是不必担心的。他建议就外蒙古独立达成秘密协定，也许在击败日本后再公诸于世。

斯大林向宋提出了远远超越雅尔塔协定的具体条款所规定的对满洲的权利和特权。雅尔塔协定根本没有提及在辽东半岛南部建立军事区一事。斯大林这时却要求按老沙皇租借地的基本边界线在旅顺和大连附近建立海军基地。他想得到在这一区域驻扎海军和空军的权利，管理整个地区的民事的权利，单独控制旅顺军事事务的权利，他希望中国政府放弃在海军基地一百公

里内设防岛屿的权利。斯大林把雅尔塔协定条款中关于“大连国际化”问题解释为是在没有其他国家参与下的中苏联合控制。具体说，他想使中苏联合管理大连，取得苏联警察实行安全检查的权利和平均分摊在那里征集的关税盈余。他还要求在大连一个内湾建立海军基地，专供中国和苏联海军使用。

雅尔塔协定规定共同管理中国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而斯大林这时不仅要求对铁路享有单独的所有权，而且要求对有关的企业（工厂、车间、土地、煤矿和林区）也有所有权，要求在铁路和企业的管理和操作中得到占统治地位的发言权，共同承担保护它们的责任，取得使用它们在战争与平时时期运输苏联军队的权利。

显然，罗斯福总统并没有打算使雅尔塔协定成为允许苏联向中国提出大量要求的协定。然而如果不是所有的要求，那么也是绝大多数要求可以轻而易举地归纳到“由于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而被剥夺的俄国原来的权利应该予以恢复”这一总条款之中，并证明它们是合法的。总条款的根本性质在7月13日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得到承认，并以美国的观点解释了雅尔塔协定。解释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认为它后面的一般条款或具体条款是具有约束力的。国务院的备忘录指出：“具体条款应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主要条款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对主要条款的修正或限制，这一点是不明确的。”甚至在有关大连和中国中东、南满铁路的具体条款中也有苏联的“最高利益”应该受到保护这种含糊其辞的话。此外，与美国的犹豫不决形成对比，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夺得了解释雅尔塔协定的权利。据一个中国消息来源报道，斯大林对宋说：“（雅尔塔）协定是苏联建议的，莫洛托夫起草的。他们（罗斯福和丘吉尔）仅仅是在协定上签了名。我可以在丘吉尔面前重复这句话。”[88]而雅尔塔协定的含糊其辞应该被认为是苏联官员起草这一文件的技巧的显示。因为文件松散的措词使罗斯福总统在苏联远东力量还未完全形成时易于接受这一协定，而当红军能够支持这一协定时，这种措词又使斯大林能够提出广泛的要求。

宋请求哈里曼大使向杜鲁门查明美国政府对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条款的看法。7月4日，杜鲁门指示国务卿贝尔纳斯转告哈里曼，当前美国不想就雅尔塔协定的任何一点进行解释。但是哈里曼受权非正式地告诉宋说，这一条款公认的含义是外蒙古当前的实际和法律状况将得到维护。然后杜鲁门对哈里曼谈了美国政府对外蒙古的看法，但仅供后者参考。美国政府认为外蒙古的现状是“中国仍然拥有对外蒙古法律上的主权，而事实上，这一主权并未得以实行”。

在第三次会晤中，宋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提出赋予外蒙古以最大的自治权。宋在答复斯大林的问题时解释说，外蒙古将在内政、外交、军事上独立，它可以与苏联达成协议，但中国仍保留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斯大林坚持外蒙古的彻底独立，并在结束会谈时说，除非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便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宋为取得指示致电重庆，他说，谈判陷入僵局。这时，蒋向宋发送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蒋明确地暴露了导致他寻求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决定性的考虑。蒋通过宋告诉斯大林，为了发展两国的共同的利益和持久的和平，中国在公民投票后将允许外蒙古独立，但苏联政府要对三个问题作出具体和坚定的回答。第一，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予维护。第二，苏联应恪守它早期的承诺，援助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的地区叛乱。蒋以

这样话陈述了第三点，也是他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

具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组织的中共使军事统帅和政治控制的完全统一成为不可能。
中国政府恳切地希望苏联政府将一切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提供给中央政府，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任何援助应限于对中央政府的援助。[89]

在7月11日的会议上，宋首先详述了中国对割让部分领土所承担的巨大牺牲。他说，如果中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便很难向全国讲明这次牺牲的意义。然后他便开始解释蒋的指示。斯大林接受了蒋对外蒙古的建议。他否认苏联过去支持过中共。他向宋保证，他将不支持新疆的反叛者和中共。他明确声明，他将仅仅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应受政府管辖。如果中国政府需要苏联援助，那么如过去所做的一样，援助应提供给以蒋委员长为领袖的中央政府。斯大林说，苏军将在击败日本的3个星期以内开始从满洲撤军，但他拒绝把这个保证写入关于苏军进入东部三省的协定提案中去。针对宋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他认为苏联撤军将在不超过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宋又问撤军是否真的能在3个月内完成。斯大林说，3个月时间是足以完成撤军的最高期限。[90]这也许是谈判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双方为制订后来的中苏条约、有关的协议和照会的交换在原则上达成了协定。这一时期一位中国驻苏联的外交官回忆说：“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进展迅速……会谈的气氛是愉快的和友好的。”

在这一时期的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是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宋勇敢地捍卫中国对外蒙古的合法权利使国务院的美中关系白皮书作出这样的评论：“宋博士在谈判中最关心的是取得苏联对中国外蒙古的主权的承认……宋博士显然愿意为取得外蒙古而做出其他重大的让步，他只是在哈里曼苦口婆心的说服下才同意接受问题的实质，而摒弃形式。”这样解释宋、蒋的外交本领实在欠妥。的确，放弃对一大块领土的合法权利无论对宋、对蒋、还是对任何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深感中国丧失领土和权利的民族耻辱的中国人来说，无疑都是令人不快的。然而中国人也是十分现实的人，他们充分认识到事实的不可避免性并试图从中取得最大的好处。自1921年以来，外蒙古实际上处于苏联政府的控制之下，当时红军进入这一地区，击败了由俄国白匪昂格恩·斯顿伯格不久前在那里成立的蒙古傀儡政权。1924年的中苏条约重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这并没有改变现实中苏联对外蒙古的实际控制。中国政府从未忘记它对外蒙古的法定所有权，中国人仍把外蒙古继续当作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而，1945年，为实现中苏和解，中国舆论表示出愿意放弃这一法律权利的迹象。1945年初，参加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温泉会议的两名中国代表在发表个人意见时说，他们认为，外蒙古作为独立的成员国参加未来的世界安全机构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只要那一地区的人民能够发展和自治”。在旧金山会议时期，重庆的主要报纸《大公报》在一篇社论中建议，外蒙古应得到最高程度的自治权，或作为独立国家得到承认，同时应在友好的基础上缔结中苏条约。后来，为了阐明中苏条约，蒋对国民党的最高国防参议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说：“事实上，早在1922年北京政府存在时，外蒙古的种族集团就宣布它独立于母国。这大约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

考虑到这些事实，宋勇敢捍卫中国的法律权利的行动似乎一方面是为了

减少中国的损失，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国的讨价还价地位，以便从中国的让步中取得最大的好处。蒋完全了解外蒙古对斯大林的重要性。当外蒙古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时，蒋指示他的儿子蒋经国私下会晤斯大林。在他们的非正式谈话中，斯大林强调了外蒙古在保卫西伯利亚中的战略上的重要性，表达了他对日本复活的担忧。他坚持外蒙古独立。不久之后，蒋委员长提出了他的妥协解决方案。显然，如果斯大林严格地实行了他的一切保证，那么蒋会从妥协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而失去较少的东西。

至于满洲的铁路和港口，宋和斯大林都作出一些让步，但他们的看法却有很大差距。关于铁路问题，斯大林同意它们的所有权应同属于中苏联合公司，铁路警戒应是中国人，除发生战争或爆发战争的威胁外，苏联政府无权在满洲调遣部队。但他要求在铁路的董事会中占绝大多数，而宋要求平等参与董事会和共同管理铁路。斯大林坚持俄国控制的军事区包括大连，而且在大连之内还应该有个海军基地。蒋提议把大连的南部地区作为军事区，而大连将成为中国政府的自由港。

宋向斯大林建议说，他要返回重庆与蒋委员长协商，他显然是在试探斯大林是否会放宽他的条件。斯大林敦促宋接受他的要求，说在他到波茨坦会议会见杜鲁门并按他的想法与杜鲁门确定苏联参战的日期之前，双方最好达成协议。宋对哈里曼说，他希望杜鲁门在与斯大林的会谈时能够使斯大林接受中国的观点，或者制订一种蒋可以接受的让步方案。双方为了加强自己讨价还价的地位，都努力取得美国的支持。谈判不得不中断。7月14日，宋离开莫斯科，离开之前他告诉斯大林他将准备在斯大林愿意的任何时间回到莫斯科来。

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在7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向杜鲁门陈述了他的问题，他抱怨说，中国人没有承认“苏联的最高利益”，并试图回避它。杜鲁门问及斯大林其在大连问题上的安排方案会对美国权利产生何种影响，斯大林回答说，大连将成为向一切国家开放的商业自由港。杜鲁门评论说，“因而，这个安排遵循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国务卿贝尔纳斯评论说，任何超越雅尔塔协定的安排都会带来困难。斯大林回答说，他的条件比“恢复俄国权利（1905年以前存在的权利）的雅尔塔协定条款更加慷慨”。斯大林继续说，“这个条款本来会使俄国人有权利驻扎军队并独占铁路使用权达八十年之久”，但是他并不要求得到原来的权利。他解释说：“他并不希望在雅尔塔协定中增加别的条款，也不想欺骗中国人。”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指出，美国的主要兴趣在自由港。在那天的晚餐会上，杜鲁门对史汀生说，他认为他把满洲“敞开着的门户”（与“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词——译者）牢牢地钉住了。

三天之后，蒋向杜鲁门求援。他给杜鲁门总统寄来了他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描述了他将做出的让步。他告诉杜鲁门，中国政府为履行雅尔塔协定已经逾越了常规，它在外蒙古问题上甚至走得更远，已经发展到中国的公众舆论可以容忍的边缘。他敦促杜鲁门提醒斯大林牢记美国举世皆知的合理立场，这样斯大林就不会在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固执己见。7月23日，杜鲁门对蒋作了如下的简单答复：

我曾请求您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我并没有让您作超越协定的让步。如果您和斯大林元帅在解释雅尔塔协定时发生分

歧，我希望您能安排宋返回莫斯科，继续您达成全面谅解的努力。

实际上，杜鲁门拒绝了蒋的要求。7月28日，贝尔纳斯通过赫尔利给宋发了电报，敦促他在7月30日或31日以前与斯大林联系，并要求得到重返莫斯科的机会，对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讨论。

哈里曼大使和国务院官员比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更加严肃地对待斯大林的要求和中苏的谈判。早在7月9日，哈里曼就建议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立即采取步骤为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准备一份美国解释雅尔塔协定的研究报告，特别是解释中国同意苏联政府的条件的问题。根据这一建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在“他们自己对苏联收复它在满洲的原来权利的主要条款中比较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具体小标题进行正常解释”的基础上提出对雅尔塔协定进行解释的研究报告。国务院针对斯大林的条件指出，同意和执行斯大林对铁路和大连问题的提议“是局势的倒退，是最有害的帝国主义行径的集中体现。”它提议美国政府作些努力影响苏联政府修改要求，使它比较有利于中国。许多美国人认为，斯大林在与宋谈判快结束时所作的微不足道的让步是不令人满意的。7月16日，史汀生敦促杜鲁门支持宋的立场，因为任何其他的行动都会造成放弃“门户开放”政策的后果。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中国事务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起草了六个有关中苏谈判的备忘录。由于他主张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联合政府，后来成为国会“中国帮”和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发难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些备忘录有着特别的意义。文森特充分认识到斯大林的建议和美国的传统政策之间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可以把他的推理、估价和建议作如下的归纳：俄国人要求在满洲取得特殊的地位，这将损害中国的主权和政治统一，尽管斯大林公开宣称事情将会恰恰相反。美国政府致力于尊重中国的主权和促进政治统一。但以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中国或中国的某些部分建立起来的外国势力，将危害美国的利益与安全。苏联的建议可能对美国的传统与当前的政策和目标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些政策与目标是，遵守“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外国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发展。因此以苏联的这些建议为基础的协定基本上是退步的，是权宜措施。为了中国的主权和统一，应尽快放弃这些建议。

文森特写道：

让我们面对事实。有人在雅尔塔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又在进行讨价还价。我们不应违背我们在雅尔塔所作的承诺。但我们应站稳立场，并帮助中国站稳立场反对任何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

他向美国政府提出具体建议，在满洲铁路、大连和旅顺海军基地的地区边界问题上支持宋的建议。如果有必要，成立由中国、俄国、英国、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的国际管理机构监督对大连的管理。他提议美国政府及早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商榷，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建议，便可邀请宋前来波茨坦参加讨论。

7月23日，文森特在他六个备忘录中的最后一个里面提议，美国试图与苏联和中国在门户开放原则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问题上达成书面协议，以防止由于中苏谈判而出现的可能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他评论说，美国的大部

分公众对中国和对保护美国在中国的地位深感兴趣。他预言，他们将对雅尔塔协定持批评态度，对逾越雅尔塔承诺的任何让步更是如此，他们希望在这些承诺面前对保护美国的利益有所保留。他认为美国在雅尔塔的承诺和使中国接受这些承诺的保证把美国完全置于承担责任的地位，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将这种责任转移给中国人，因为谈判是双边的，中国人应尽可能争取从俄国人那里得到更好的条件。他认识到，中国人根本无法讨价还价，而且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对他们来说是约束性的。他甚至争辩说：

如果得到我们支持的中国人采取了坚定立场反对作出超越于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因而未能达成协议，那么在最终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就会像现在一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可以设想，在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我们会比现在处于更加强有力的地位。

在文森特的备忘录和建议中，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精神实质和格局是一目了然的。传统政策要求向中国提供道义和外交上的支持。文森特的建议中提到了这一点。传统政策不主张诉诸武力以加强美国的地位。文森特的建议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传统政策要求拟订一个外交文件以保持美国的权利，保护美国的利益，并且在美国受环境所迫不得不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而撤离时，能够重申这一原则。文森特的建议中提到了这一点。传统政策是为了遏制列强以惯用的外交和军事压力侵犯中国而制订的。至于四十年代美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即怎样对付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它提出了不干预和促进中国统一的原则。文森特也提倡这一原则和目标。他对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统一的极大关注，使他拒绝考虑武装干预中国内战。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的提议也是与他反对俄国帝国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美国传统的对华态度的化身。如果说文森特的观点中有一种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多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政策建议，这就是美国的传统政策。文森特的长处和短处也就是这一政策的长处和短处。他从1944年至1947年期间作为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国务院供职绝非偶然。他前途无量的外交生涯后来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崩溃而毁于一旦。他个人的不幸代表了这一政策的不幸。

作为协助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谈判的人物，哈里曼大使得出与文森特一致的结论。他认为苏联的要求不符合罗斯福的意图。他强烈要求杜鲁门总统解释雅尔塔协定，特别是解释在大连港和铁路经营的安排上的分歧。与文森特一样，他建议，如果斯大林不同意使大连成为中国管理下的自由港这一宋的建议，那么美国政府将提议成立由中国、苏联、美国，也许还有英国的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以监督大连真正成为自由港。他强调，促使斯大林以书面的形式再次确认他支持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口头保证，是至关重要的。最后，7月31日，他请求国务卿贝尔纳斯授权他转告斯大林美国对大连的看法，并取得斯大林重申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形式。8月5日，贝尔纳斯同意了哈里曼的建议，授权他向斯大林提出这些问题。

宋返回莫斯科与斯大林重新开始谈判。在从8月7日持续到8月14日的重新对话中，宋的地位由于美国的支持而大大加强。哈里曼向斯大林抗议苏联提出的要求并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有关美国立场的书面的再次声明。根据贝尔纳斯的指示，他致函莫洛托夫，建议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国的反对派并

支持国民政府的提议的语言应十分明确，不会在未来引起误解。哈里曼向宋转达了华盛顿的观点，说如果宋所作的让步超越了美国对雅尔塔协定的解释，那么他这样做的原因应是使这些让步有利于取得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然而美国却无法采取军事措施以支持它的外交援助。哈里曼对斯大林在与宋打交道时表现的不妥协态度深为不安，他提议美国军队最起码应在关东半岛和朝鲜登陆，接受日军的投降。总统的负责战争赔款的代表埃德温·波利大使建议，美军“应该迅速占领尽可能多的朝鲜和满洲的工业区，从南端开始向北推进”。但这些建议却无人置理。

此外，事态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中国与苏联立即达成协议。在重新开始谈判的一天之前，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两天之后，苏联对日宣战，红军迅速进军满洲。8月10日，斯大林警告宋不要再拖延时间，他说，否则中共将进入满洲。从8月11日至14日，宋采取了几个步骤迅速达成了协议。他同意了斯大林沿原来沙皇的租借地边界线在关东半岛建立军事区的最早要求，换取了在和平时期使军事区的一部分——大连不受军事监督 and 控制的条款。在管理铁路的细节上他作出让步。在条约缔结前后，哈里曼努力争取使斯大林在满洲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口头保证成为书面的声明。但是9月份在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的情况下，他放弃了这个计划。

接着，一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在解释中国政府决定签署条约时说：

1945年8月14日，我们的政府决定签署条约，那时我们在东北（满洲）没有一兵一卒，而成千上万的苏联军队则已经进入这一地区。如果我们拒绝缔结条约，那么我们便无法收复东北，除非我们诉诸武力驱逐苏联军队并防止苏联和中共会师。

在另一个场台下，他指出，中国政府要诉诸武力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说，中国唯一可能采取的政策是依靠苏联的诚意，恪守它愿意作出的允诺。的确，正如宋对哈里曼所说的那样：“这终究还是个诚意的问题。”还有人希望，未来的行动和事态可以制造一种局势，把苏联的利益限制在条约的让步条款之中，可以说服斯大林恪守他的诺言。蒋委员长迅速采取措施，派遣他的军队到满洲和华北就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我们怎样评价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有关的协议、互换的照会、签发的官方会谈记录，我们无法指责斯大林没有做出慷慨的保证。而正是由于这些保证，中国政府才愿意接受协定，并认为它的确是令人满意的。文件中的两个条款对苏联为一方和国民政府及中共为另一方的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意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款规定，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以密切友好合作的精神共同工作并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与主权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互换与条约有关的照会时，苏联政府保证“向中国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军需品和其他物资、这种支持和援助将提供给国民政府这一中国的中央政府”。

至于中国政府重新占领满洲的问题，苏联作了如下的承诺。在前面提到的互换照会中，苏联政府“重申它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全部主权并承认东三省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另一条协议规定任命“一位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以及工作人员”负责收复日本侵占的领土。他的职责是“根据中国的法律，在驱除了敌人的领土上建立并领导一个政府”，“在收复的领土上使中国的正规军与非正规军与苏军建立合作关系”。协议进一步规定“一旦任何一块

解放的土地不再是直接军事行动的场所，中国国民政府将有管理其公共事务的全部权力……”。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还保证他将在日本投降的三周之内开始从满洲撤回苏联军队，完成撤军的最晚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这些保证对与中共打交道的国民党人和重新占领满洲是至关重要的，只要苏联遵守这些保证的精神和原则，付出的代价就值得的。

我们必须根据这种观点来理解中国官员的评论。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委员长对赫尔利大使说，他“对条约总的来说是满意的”。8月29日，蒋介石夫人在谒见杜鲁门总统时，就中苏对话的成果赞扬了总统，感谢他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外交上的支持。早些时候，哈里曼大使报告说，宋曾说他很受鼓舞，宋曾认为斯大林同意了他采取立场时所依据的基本原则。立法院院长孙科博士赞扬条约是“远东持久和平的保障”。他强调说，苏联支持国民政府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保证是对中国统一的最大贡献。

在美国，人们满怀热情地祝贺条约的签订。甚至那些后来恶毒谴责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也发表了好评。1945年9月10日的《生活》杂志社论说：

日本投降两天之后，莫斯科和重庆宣布缔结了协议。这

个胜利对具有常识的人们来说，其意义可与用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一样伟大。宋一斯大林条约对悲观主义者来说比过去二十年中任何外交事件的火药味都少……中国的现状说明美国近五十年来对亚洲的政策是正确的。

后来成为“中国帮”的活灵魂的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并不十分准确地写道，条约和协议是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顾问在波茨坦努力使俄国人大大减少他们最初对中国的要求而取得的确实的成效。“我们政府官员的成就值得大加赞赏。”

的确，如果苏联实现了条约以及有关文件的精神和原则，那么这些美国与中国的评论所表达的乐观主义就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哈里曼后来评论说，中苏协议“可以拯救中国国民政府……如果斯大林实行它的话”；国民党人没有能力维护他们的权力的部分原因是“斯大林没有履行中苏协议”。但是这些协议注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它们要为两个目的服务，而事实证明，这两个目的无法在同一个时间内实现。首先，缔结这些协议是为了执行雅尔塔协定，以实现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目的，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加快正在出现的远东权力平衡的转移。第二，缔结这些协议旨在推动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的和解，这一和解也将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铺平道路。曾有人希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将限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然而，由于红军进入满洲而导致的后果不久便超过了中苏条约对暂时削弱中共的讨价还价地位的作用。中共的力量在满洲得到迅速发展只在苏联的默许下才成为可能，它导致了那一地区1946年春的武装冲突。苏军撤退之后，中国两个政党为取得对满洲的控制而展开的斗争是造成马歇尔将军的政治解决失败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另一方面，远东最初失去权力平衡的局势由于美国军队的迅速的复员退伍，以及它不愿在大陆中国诉诸武力而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国内，国民党政府在接管从日本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时所表现的贪污腐化盛行和严重的无能加强了国内权力平衡点的转移。结果，苏联的实力使它能够利用中苏条约提供给它的利益和法律特权，而国民政府的腐败，加上美国战后军事上的虚弱更使苏联不遵守条约成为必然的事实。

第八章赫尔利纲领逐步走向失败

从召回史迪威到马歇尔使华期间，整个美国政策结构的支柱就是赫尔利以有利于国民政府的条件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纲领。在赫尔利看来，支撑这一结构的关键是苏联和国民政府实现合作，它将破坏中共取得苏联支持的希望，使双方和解。赫尔利纲领过分依赖斯大林的保证，错误地估价了中共的性质，对国共两党相对实力的估价也是值得怀疑的，这样他的纲领就注定是要失败的。由赫尔利解释和实行的美国政策的逐步失败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赫尔利未能在双方之间制订一个政治、军事的和解方案，以致在日本投降后，中国内战得以蔓延。第二，罗斯福总统不顾在华职业外交官的反对而支持赫尔利纲领，这时，华盛顿开始采取在为蒋介石提供美援时增加附带条件的政策。第三，苏联向满洲的中共提供微妙的然而却是有效的支持。

赫尔利纲领的逐步失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44年11月，那时中共接受了赫尔利的五点协议，使这个开端显然充满了希望。它于1945年8月结束，双方为在日本投降时重新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而展开了竞争。第二阶段的开端也是令人鼓舞的，那时，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人谈判。而它的结束却带来了内战和赫尔利的辞职。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区别在于它逐步说明如下的设想是错误的：苏联为保证它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将迫使中共同意它的条件，对苏联的外交让步应保证俄国对蒋委员长的支持并防止苏联援助中共。

1. 从召回史迪威到日本投降

（1）赫尔利成立联合政府的纲领的失败

在召回史迪威之后不久，赫尔利带着国共两党和解的积极纲领于1944年11月第一次访问延安。在那里，他向中共提交了他在重庆为双方拟订的五点协议草案。在两天两夜“最艰苦和最友好”讨论之后，赫尔利与毛制订了一个修正案。[91]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于1944年11月10日签署了这一题为《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协议》的文件。

赫尔利本着支持国民政府的最高目标，试图在他的五点协议草案中为蒋争取对共产党军队的控制。它的第一点是：“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复兴工作。”第四点指出“一切抗日武力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后来赫尔利为说服蒋委员长接受他的纲领对蒋解释说，他的五点协议草案是“共产党人签署的唯一表示向国民政府交出军队控制权的文件”。作为交换，他欣然对共产党人提出成立的联合政府、联合军事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西方认为是天经地义，赫尔利认为是“无害的”一切民权与政治权利。这就是协议草案的政治含意，赫尔利将军显然对此是充满热情的。伯克的林赛勋爵（迈克尔·林赛曾从1944年春至1945年11月与共产党人在延安共事）在1952年6月向麦卡伦委员会提交的宣誓书中说，“据中美两国的证人说，赫尔利将军在1944年11月10日签署了五点建议协议草案，并说尽管他不能使他的政府作出任何承诺，但是他对文件的签署表明，他个人完全赞同协议草案的条件，并保证支持它们。”

然而国务院的白皮书说，赫尔利是作为证人签字的。

中共对协议草案也十分欢欣鼓舞，因为它体现了过去几个月来他们提倡的政治纲领中最重要的事项，他们今后还将继续提倡这一政治纲领。[92]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赫尔利提出的讨价还价条件。考虑到中共的政治实力和他们享有的群众支持，如果赫尔利的纲领被国民政府所接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对共产党人的整体利益是有利的。如果被国民政府所拒绝，那么分裂和内战的责任将由国民党承担。

赫尔利显然并未意识到这些可能性。他满怀希望地把协议草案带回重庆，提交给国民政府。使赫尔利窘迫的是，政府坚定地否决了他的协议。宋对赫尔利说：“共产党人以噱头骗取了你的信任。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不会答应共产党的要求。”蒋委员长与赫尔利争辩说，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就是承认他的党在共产党人面前遭到彻底的失败，协议草案最终将导致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这些对赫尔利一毛的协议草案的评价后面隐藏着对中共意图的根本的不信任。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曾几次对赫尔利说，共产党人对民主原则表示支持“只不过是他们在共产党的一党统治下取得对政府的控制权的一着诡计”。而且，国民政府的决定不能不受中共日益增长的政治实力的影响。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1945年1月4日向罗斯福总统提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正确地对这一因素作出了评价。斯退了纽斯对罗斯福说：“蒋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与中共联合意味着结束保守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为更加强大和更得人心的共产党人扩大他们的影响打开大门，可能导致他们控制政府。而不能与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人达成和解又会招致最终推翻国民党的危险。”

只要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作出正确的评价，就可以看出蒋反对赫尔利纲领是有道理的，但这却无论如何不是他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使他的政府民主化的唯一原因。如果它是唯一的原因，那么我们便无法解释他对那些完全是民主的、不掌握独立的武装力量、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对他的控制构成威胁的政治小党派所采取的压制性政策。从根本上说，由于蒋顽固地抓住权力不放的鼠目寸光，和相应地拒绝与不肯盲目服从和追随他的政治领袖们分享权力，他的整个政治纲领只能是失败的。蒋的这一政策使反对他的权力垄断的共产党人和小党派的利益汇合，使许多反共和非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共产党的某些政策产生同情。在这些政治领导人看来，共产党人在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之前拒绝放弃他们的军队是符合情理的。毛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想法。他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写道：

这些人（即蒋及其同伙——作者）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

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东荪在对这段话发表评论时写道：“当蒋介石说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条件是向政府交出军队时，毛对他的诚意就失去了信任。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普遍认为毛的观点是很容易接受的。”

蒋对小党派所采取的压制性措施和后者因此而支持共产党说明这一时期美国政策上的一个根本的弱点。它的基础是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实质，其动机是期望在反对日本的战争中利用共产党的军队，美国的政策未能

区分使国民政府民主化以包括所有的非共产党的政治因素与同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之间的差别。结果，它不明智地要求国民党去做后一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没有迫使他们在前一个问题上让步。未能对这两个问题加以区分使蒋指出由于存在共产党的威胁，因而他拒绝放宽他的压制性的统治，并认为美国因受到共产党人的启示才对他的政府提出批评。蒋的政策使国民党孤立于其他非共产党的政治集团，而美国的政策又未能树立这些非共产党的政治因素的权力和影响，它们面向美国，但受到蒋的排挤而不能在政府中平等地分享权力。国民党和美国的政策都在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而两者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中美关系恶化。

赫尔利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服蒋委员长，使他相信他的纲领是明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恩来帮助赫尔利一道说服蒋接受草案协议，但赫尔利的努力却是徒劳无益的。可以推测，周的努力只能使蒋更加坚定他原来的信念。赫尔利敦促蒋使谈判继续下去。在赫尔利建议下，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即所谓的三点建议。这一反建议的显著特点是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观点。反建议要求共产党人向国民政府交出他们的军队。作为报答，国民政府将授予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含糊其辞地和有条件地保障共产党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并在全国军事委员会中给共产党一个席位。它保证“遵循推进政府的民主进程的前进和发展的政策”。

在缺乏民主的政治传统的国家中，前两个让步的价值取决于国民党的诚意。鉴于蒋身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可以单独做出一切重大的决策和大权独揽这一事实，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是无足轻重的。由于在过去的十六年中，国民政府公开宣称的政策一贯是结束一党监护和建立立宪政府，因此，国民党重申促进民主发展的保证似乎已成了老生常谈。1937年当共产党只有3个正规师时，国民党的建议对共产党来说也是无法接受的。那一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个决议草案中决定：

只有当政府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变成统一战线的全国政府时，共产党才能参加政府，即当前的国民党政府应（a）接受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一个施政纲领；（b）在实践上，开始表明它诚恳地希望并努力执行这一纲领，争取得到明确的效果；（c）允许共产党组织的合法存在，保障共产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自由。[93]

从那时起，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大大发展，据共产党声称，它的正规军增长为90万人。而国民政府由于在中日战争的头六个月中损失了它的精锐部队，由于1944年日本的“华东”攻势和因长期战争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而受到严重的削弱。美国政府采取主动极力主张蒋建立联合政府。共产党也正式提出以成立联合政府解决政治军事危机的建议。建立联合政府的观点在有政治意识的社会各阶层中广为传播。共产党这时正处于前进的时刻，而不是后退。

所以，当赫尔利试图说服共产党人接受政府的反建议时，他们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周返回了延安。12月初，周在给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呼吁发表五点建议，“以告示公众并使政府改变态度”。显然，共产党人正在进行谈判，尽一切可能以他们的条件实现和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也希望利用谈判宣传他们的观点，影响国内外的政治舆论。他们十分正确地坚信，他们的

政治纲领会得到大部分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应根据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共产党方针的改变的意义。1945年1月，毛拒绝了赫尔利提出的与三名国民党高级官员一起访问延安并重新开始谈判的建议。相反，他建议在重庆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代表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他意味深长地又说道，大会的程序应该公开，代表们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旅行的自由。

由于赫尔利的纲领是无条件地支持国民政府，所以他现在努力争取以国民党愿意提出的条件取得和解，尽管他仍然相信，他的五点草案协议是有益于国民政府的。他在私下的谈判中和记者招待会上不止一次地分别对共产党人和中美公众说，美国政府不会向中共提供给养，也不会援助他们，对他们的任何援助都必须经过国民政府。回过头来看，拒绝援助共产党人和实质上放弃了以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向蒋委员长提供无条件的援助和未能敦促国民党人采取早该实行的改革使他把自己投入到一个毫无希望的事业中去。

（2）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共产党和解纲领的广泛号召力，共产党迅速发展的势力和美国实现统一的急迫心情使国民党在谈判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实现统一毫无进展，使赫尔利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自共产党否决了国民政府的三点建议至日本投降之时，国共谈判和美国政策出现的三个变化是明显的。

第一，国民政府为形势所迫作了一系列的让步，但它总是无法接受成立联合政府的想法。1945年1月底，国民政府在原先的三点建议纲领上又提出采取某种措施。它提议在行政院建立一个七至九人的新决策机构，即类似“战争内阁”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将在这一机构得到代表席位。蒋委员长将任命一位国民党军官、一位共产党干部、一位美国军官在整编、装备中共军队并向它提供给养方面提出建议。他还将任命一位美国军官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中共军队的最高指挥官。2月3日，国民政府提出召开一次由各党代表和无党派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考虑采取措施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监护阶段，成立合法政府，制订一个未来可以遵循的共同政治纲领，并在合法政权就职前决定国民党外各政党成员参加政府的形式。尽管形式有所更改，政治内容有所不同，但绝大部分妥协后来都编进了国共两党在马歇尔使华期间缔结的协议中。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情况是谈判反复出现僵局，双方没有达成协议的共同基础。因为共产党人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政治纲领是深得人心的，他们军队的作战力在迅速增强，所以他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他们的和解条件。蒋由于认识到成立联合政府会极大地加强共产党人的政治势力，因而他决定反对这个要求。显然，他为了避免不得不同意共产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而做了为时过晚的尝试，刚才提到的他做出的妥协就是这种尝试的一部分。周恩来正确地把一月份提出的建议称为“仅仅是国民党的妥协”，而那个党仍然保留着控制政府的权力，它并没有满足共产党彻底整顿政府，使其成为各联合政党管理的政府这一要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一种缓兵之计，旨在以高谈阔论取代实际行动。这个建议本身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与毛早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要求不谋而合。共产党人希望，这样的会议可作为宣传他们的纲领的讲坛，为联合政府铺平道路，并成为一种新的合法性的根据。

蒋委员长为巩固他的地位而做了这些妥协之后，于1945年3月1日在一

次公开演讲中阐明了他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就是蒋在 1946 年底马歇尔使华失败之后最终实行的经过修改的纲领。其实质是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新成立的政府代替国民政府。同时，尽管国民党愿意根据 1 月的建议给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提供参政的席位，但它保留着“最后决策权和最终的责任”。

这一纲领的意义在于国民大会将完全受国民党控制。因为 1936 年选举国民大会代表的条件和规定保证了国民党党员及其忠实的支持者能够当选。因而，即将通过的宪法将体现国民党统治的无限延续，新政府的成立并不会改变蒋个人的统治地位这一现实。根据这一纲领，蒋仍然可以宣称他结束了国民党的监护，建立了一个合法政府。但是共产党人首先需要的是在联合政府中享有真正的权力，而不是合法统治的形式。他们立即谴责国民大会是“一党控制的、欺骗人的和分裂中国的”机构。他们十分准确地指出，国民大会是在人民没有自由，各政党和集团没有合法地位的时候当选的。他们不愿降低身份针对国民党的建议提出反建议。从那时起，成立联合政府和召开国民大会就成了中国政治斗争的焦点。[94]谈判彻底陷入僵局。直到 7 月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协商时，谈判才重新开始。

7 月初，共产党通过一批由六个小党和无党派领导人组成的访问延安的代表团提出了一套新建议，努力打破僵局。在这些新建议中，共产党人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国民大会，然后由国民党、中共、民主同盟和其他政党或组织各出三名代表召开一次政治会议。赫尔利将军把这个新建议解释为是共产党争取时间，等待宋在莫斯科谈判的结果的花招。

国共谈判毫无进展导致了这一时期的第三个变化：美国逐渐转向通过与共产党人达成政治解决而使向蒋提供的援助成为有条件的援助。开始，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反对赫尔利无条件援助蒋委员长的政策的尝试是不成功的。在蒋委员长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计划前不久，重庆使馆的职业官员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蒋委员长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得极为强硬起来，中国的局势并没有朝着两党之间的团结与和平的方向发展，而这却是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先决条件。在 2 月 26 日的一个备忘录中，他们建议美国越过蒋介石，采取直接的措施“与共产党和能够支援抗日战争的其他合适的组织合作并向他们提供军需品。”无疑，在他们看来，军事上的必要性是“至高无上的和直接的考虑”。但是他们也希望，这个措施将使美国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引导它与共产党人达成和解。而且，他们希望，这一建议性的政策将“使共产党人站到我们一边，而不会把他们送到苏联的怀抱”。这个电报在赫尔利回到华盛顿时也到达国务院。它导致赫尔利和国务院的远东司的官员之间发生了一场辩论，这些官员对驻华职业外交官员的观点一般是待同情态度的。结果，罗斯福总统维护了赫尔利的没有蒋的同意不得帮助共产党人的决定。在赫尔利的坚持下，重庆使馆的几位官员被调离，在华的总司令的政治顾问也被召回。

尽管赫尔利战胜了他的批评者，但是如果他的纲领不会带来政治和解，那么它必定会招致越来越多的非议，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继续主张以灵活和现实主义的政策对待各个党派，这与赫尔利无条件地和完全地支持蒋的政策形成对比。不久，国务院作出了与赫尔利纲领截然不同的新政策。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使用美国援助作为杠杆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继续把它作为对仍然得到普遍承认的中央政权的支持。施加压力的

目的是促进成立一个有坚定的群众支持和广泛的代表性的政府，实现国共和解。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特别是战后美国的对华军援将根据这些地区所取得的成绩成为有条件的援助。这种有条件援助的特点是它又回到了赫尔利曾经反对的史迪威的作法上去。这一政策后面的直接考虑是通过实现中国的军事统一有效地联合作战，这将使所有的中国军队得到装备。最终的考虑是保持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在国民政府的政权瓦解时，可以与中国的任何一位领导人合作。国务院于5月7日给赫尔利的指示就体现了这一新政策。5月28日，由三个部的高级代表组成的各部间委员会——联邦、战争、海军协调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报告，报告建议美国在“中国政府满足了某些必要的政治经济条件”之前，不要就援助中国政府建立并保持一支现代化的战后陆军和空军作出承诺。

在这一时期之末，魏德迈将军的观点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这之前，他在政治问题上一直毫不怀疑地跟随赫尔利的领导。7月10日，魏德迈对马歇尔说，彬彬有礼的号召不会实现中国的统一。为了避免武装冲突的扩大和加剧，他建议美国与苏联和英国合作，强迫国共两党作出妥协，成立联合政府。

赫尔利在中国的地位急剧恶化。共产党人公开向他提出批评。他们谴责他“违背了”1944年11月他在延安签署五点草案协议时所讲的话。他们认为蒋对他们的态度强硬是由于赫尔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警告说，赫尔利的政策正在把中国引向内战，援助并怂恿“中国的反人民势力”将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痛苦和烦恼。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中，毛指责美国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许多非共产党的中国领导人认为赫尔利幼稚，而且虚荣心强。[95]他在中国的声望急速下降，随之，他在美国的影响也削弱了。但赫尔利仍然是乐观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上，他认为这个协议将使共产党人屈服。但事实不久就使这个希望成为泡影。

2. 从日本投降到赫尔利辞职

从日本投降到赫尔利辞职之间的事态发展其意义是重大的。这是因为，第一，它们立即表明了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的可能性和局限性。第二，它们揭示了由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美国在华的军事行动的最低优先权和取消为国民党军队服务的美国联络组的作法，美国的势力受到的限制。第三，它们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设想失效。这最后一点意味着赫尔利纲领的全面破产。

（1）美国在华军事行动的性质、效果和自身的限制

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主力被禁锢在中国的西南角，远离华北和华中这一具有战略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的地区。的确，随着日军从他们在早期攻势中占领的前沿阵地上撤退下来，最糟糕的军事和政治危机已经渡过。打通雷多公路和北缅战役的结束使美式装备的军队被重新调回中国的主要战场。国军甚至能够对湖南和河南—湖北地区发动一次有限攻势。但是在中美开辟广州—香港地区港口的军事计划实行以前，在早已计划好的中国“西南总攻势”得以发动以前，战争就结束了。中国军队并不像期望的那样装备优良。战争的突然结束使美中两国政府对在整个中国重建国民政府的权力的任务毫无准备。

虽然中共对此也甚为吃惊，但他们比国民党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分利用日本投降这一机会。毛于1945年4月断言，他的军队扩大到

了 91 万人，民兵增长到 2m 多万人。然后，共产党声称，在战争结束时，他们便可以在华北、、华南、华中全部面积为 95 万 6 千平方公里的 18 个“解放区”内牢固地扎下根。他们活动和作战区域占国民政府失去的土地的 67 %。更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由中国沿海和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最富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组成。共产党军队在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广州、济南和洛阳这些主要城市的附近严阵以待。

很难评估共产党人对其实力的声明是否属实。他们为达到政治和宣传上的目的无疑夸大了军事实力，夸大的程度难以决定。然而事实是如果日本被击败或投降，他们就能轻易地迅速夺取仍然被日本占领的要害地区和地点，从而为控制中国而同国民党人进行成功的争斗，当时一些美国官员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带来了中共等待多时的时刻。早在 1938 年，毛就设想中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从日本战略进攻到中国的战略防御这个第一阶段起，战争将经历日本战略保守和中国的准备反攻这一相持阶段，最后阶段是中国收复失地的战略反攻。他进一步预见说，“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某一地区将比在另一个地区更加成功和更加有力。在最后一个阶段，中国的任务就是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8 月 9 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毛宣告，苏联的参战标志着战争最后阶段的来临。他号召共产党军队发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总攻势，反对日伪军并消灭他们，夺取他们的武器和财产，猛烈地扩大“解放区”。8 月 10 日，日本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这一天，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向他的军队颁布了一个指令，声称根据波茨坦宣言，他们有权要求并接受日伪军的投降。他告诉他的军队行使这一权利，消灭违抗的日伪军，夺取并管理一切敌人占领的城、镇和联络中心。翌日，“为配合进入中国的苏联红军的挺进和准备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朱总司令命令四支武装部队进军满洲。他命令他的两名最出色的将领从他们所在的绥远南部、察哈尔和热河省向北挺进，迎接南下的苏军。他要求主要铁路干线附近共产党军队控制这些交通线。林彪将军的共产党军队悄悄地沿着北平—沈阳铁路进入满洲。

朱的命令和军队行动的政治和军事含义可见于毛在 8 月 13 日的一次共产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立足于延安观测局势，他断言苏联的参战的必然结局是日本投降，新的任务是国内斗争。在这场最严峻的斗争中、问题在于“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他评论说，蒋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要抢去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在这些地方他们会占优势。华北、华中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是双方的必争之地。华北的大块乡村和那里不计其数的中小城市将落入共产党手中。内战可能暂时会像过去一样，其规模是有限的和局部性的。但是蒋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政策已经定了。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共产党人都要准备好。共产党的政策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显然，毛对他能从莫斯科得到多大的援助心里是没有底的。一方面，他赞扬红军进入满洲是“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它的不可估量的影响不会因两颗原子弹而被掩盖。原子弹不能决定战争，它们不能使日本投降。认为原子弹是全能的看法是错误的。”武器决定一切”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苏联参战是日本投降的决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毛主张他的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外援获得新的胜利。他断言：“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他预告说，美国总有一天会发现不可能再支持蒋。只要共产党人对全国性的内战有所准备，他们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毛发誓说：“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

国民政府立即谴责朱 8 月 10 日的声明是“一个出其不意的和非法的行动”。8 月 12 日，蒋委员长给这位共产党将领发了一个指令，要他命令他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告诫他“不要再采取独立行动”。共产党对蒋的第一个回答采取了来自延安的广播的形式。它谴责蒋是“法西斯首脑”、指责国民党领导人“认敌为友，认友为敌”，认为“日伪比他们自己的同胞还要亲，而自己的同胞比日伪还可恨”。广播向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国内外的舆论发出呼吁，它断言“在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抗日军队有权直接派他们的代表参加盟军的受降仪式、参加对日本的军管和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8 月 13 日，朱给蒋发了回电。朱认为蒋的指令是“不公平的”，“违背民族利益的”，“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他对蒋说：“你颁发了一个错误的指令，它的确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得不坚决反对它。”同一天，朱给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发了电报要求他命令日军向共产党投降。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的斗争开始了，共产党人占据着中国最关键的地区。

打破了平衡使之有利于国民政府并避免了即将出现的共产党胜利的因素是美国的紧急援助，它通过空路和海路把国民党军队输送到全国各战略要地，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以前，这些地方是日伪军反共的地区。美国原来的登陆计划也用来帮助蒋占领重要的港口，便利国军的行动。这些军事行动的最初计划在 7 月底期待日本投降时才制订出来。计划曾设想美军直接占领大陆的四个港口——长江流域的上海、山东半岛的烟台、华北紧靠满洲的秦皇岛。美国政府还采取主动，询问蒋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蒋请魏德迈立即制订计划，调遣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美国军队即将占领的地方以及其他关键地区。他要求美国军队尽一切可能避免与共军合作。蒋的这些要求在 8 月 10 日陆军部的一个指示中都得到了实现。给魏德迈将军的这个指示规定美军占领中国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迅速运送国军到关键地区，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但是，这个指示也命令魏德迈在内战中不支持国民政府。

这样，美国着手支援国民政府在日占区重建它的权力，而这样做就使它日益与共产党人为敌。当美国在中国行使它的权力时，面临着三个自身的限制。第一是赋予占领日本以优先权。由于战争仓促结束和军队的迅速复员的计划，这个决定使魏德迈无法去做他认为支持政府所必需要做的事情。共产党蔑视政府的指令使魏德迈充满了紧迫感，他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最高优先权的基础上尽快使美军登陆。参谋长们否决了他的要求并告诉他，他仅仅可以指望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最多得到两个美国师的兵力。魏德迈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表明，他曾经要求得到 7 个师的兵力，想把它们用于满洲以阻止苏联在华采取单方面行动。这一要求曾提给麦克阿瑟将军。由于麦克阿瑟摸不透日本对美国占领的态度，因此他拒绝向魏德迈提供这些兵力。

第二种自身限制是在日本投降后不到十天的时间内，中止了在美国监督

下的一切培训国民党军队的活动。这意味着摧毁魏德迈精心建立起来的联络组和行动组。采取这一行动部分与总复员计划有关，部分是为了调遣现有的美国人力协助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华北和华东。至于这一行动可能会对持久性地削弱国民政府的军事能力产生何种影响，是很少考虑的。

行使美国权力的第三个自身限制是避免在中国的内战中向国民政府直接提供援助的决定。随着国共两支军队为控制中国而不断扩大武装冲突，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和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魏德迈感到在全面援助国军的情况下，又不向与共产党人作战的政府军队提供直接的美国援助，这是个很难履行的使命。在不是公开违背他的指令原则的情况下，他都不遗余力地帮助国民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使用了一个花招。用他自己的话可以绝妙地形容出这个花招。魏德迈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说：

比如说，我并没有得到允许从 A 点纠集一支中国军队并把它调往 B 点，以利于中国国民党军队从共党手中收复某一地区；我也没有得到授权为此目的而使用我的飞机。然而在调遣军队的过程中，我恰恰是这样做了。我的指示中本来就说，我应该收复过去日本占领的地区，因而，我不得不把他们调遣到那些空闲的地区，这的确造成了与中共的某些磨擦……顺便提一句，先生，它也改善了国共两党的关系。

尽管有魏德迈的微妙外交，但在内战中不向国民党提供直接援助并避免美国的直接参与的决定，的确排除了那些有可能极大地帮助国民党的行动。例如，魏德迈认为有必要拒绝蒋把政府军队调往塘沽的要求。塘沽是通往天津的河口上的战略要点，位于北京—沈阳铁路线上。最显著的例子是 10 月份取消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特遣舰队在烟台登陆的计划。这个位于山东省北海岸的海港离大连只有 90 海哩，离营口和葫芦岛 250 海哩，而后三处是满洲的三个最大的港口。烟台是在山东的中共军队摆渡到满洲的地点之一。得知美国的计划后，朱司令向魏德迈递交了两份措词激烈的抗议书。第二份抗议书声明，如果美国军队登陆后麻烦接踵而来，那么美国要承担全部责任。当美国运输机在港口盘旋了几天之后，海军陆战队的计划被取消了。烟台事件为后来美国决定不使国军在满洲的港口葫芦岛和营口登陆制造了前例，在运送美国士兵的运输机抵达以前，苏军曾允许共军占领这两个港口。

尽管有这些自身的限制，美国行动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抗日战争胜利日，美国空军把 3 个国民党军空投到华东和华北的关键地点，其中包括上海、南京、北平这三个最重要的城市。在之后的几个月中，40 万至 50 万国军进入新阵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北平、天津、北方的煤矿和这一地区的铁路干线。

如果在国军和美军抵达之前，日伪军并没有在有争议的地区设防，那么巨大的国军的空运和海运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也就不会有效地重建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在美国得到日本驻华的军队的合作之后，它的外交援助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为日本投降做准备时，华盛顿起草了所谓的“总命令第一号”。根据投降条件它将由日本天皇来颁发。考虑到蒋对共产党试图促使日军投降十分担心，华盛顿在“总命令第一号”中规定，北纬 16 度以北的中国（不包括满洲）、福摩萨、法属印度支那的一切日本海、陆、空部队和日军指挥官将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一切投降只能对他或他的代表作出。此外，麦克阿瑟将军警告日本皇家司令部说，美国对日本驻华部队仅仅向国民政府投降是极为重视的。8 月 17 日，马歇尔将军向麦克阿瑟转达了国

务院的看法，责成麦克阿瑟必须对日本人说清楚，关于遣返日本军队的波茨坦条款仅仅适用于那些向蒋介石和他的下属做出人身和武器投降的人。社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是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联合决定，我批准了这个决定。”

就蒋委员长而言，他迅速采取了行动行使他独特的权力，即在中国战区受降。早在8月10日，日本投降的四天以前，他就告诉他的指挥官，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他命令他们警告在他们管辖的战区内的日军不要向没有经他批准的中国指挥官投降。8月15日，他正式命令冈村宁次将军停止所有日军的军事行动，但可暂时保留武器和装备，维持部队的现状，保护他们地区的秩序和联络，等待国民政府的指示。8月22日，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命令冈村宁次将军指示日军允许由特定的国民党指挥官派遣的中国军队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而进入占领区，但是要求他们拒绝让那些没有特定指挥官的必要命令的中国军队通过，要求他们阻止这些军队以武力占领城市。何将军还嘱咐他的指挥官确保日军从占领区的撤退与国军进入这些地区的行动配合起来，以防止“匪徒”钻空子。在华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全心全意地与国民政府合作。实际上，在冈村宁次将军接到蒋委员长的指示以前，他就命令他的军队不要向未经中央政府授权的中国军队缴械。

至于这些命令，蒋委员长在日本投降问题上致中国士兵和公民的一份电文中有一段话颇有一些政治上的意义。蒋对中国人民说：

每当我想起耶稣基督的教旨总是深深地为之感动，我们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热爱我们的敌人。我的同胞们知道“不念旧恶”和“对一切人行善”是我们自己的圣人教给我们的最高美德。我们一直讲日本残暴的军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而不是日本人民。尽管敌人的军队已被击败并必须严格遵守一切投降规定，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考虑复仇或肆意谩骂无辜的日本人民。

蒋委员长还迅速采取行动，争取到中国伪军的支持。8月10日，蒋委员长指示他在所有战区的指挥官煽动伪军转而向国民政府效忠，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利用他们控制日本人撤退后留下的要害地点和交通线。翌日，他发表了一个布告给伪军以改过自新的机会，要求他们服从他的命令，坚守岗位，维护地方秩序，拒绝非法编入其他军队。接受这一要求的伪军指挥官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新任命，并把他们置于各战区国民党指挥官的暂时领导之下。绝大多数伪军指挥官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更接近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有些人曾与共产党军队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有些人起初是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军事将领或军官，在战争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转而为南京的伪政权效忠。对最后一类人来说，改变效忠对象只不过是浪子回头，重续旧交。[96]

国民政府以这些非常的措施成功地阻止了共产党人占领重要城镇和交通线的行动，同时，它的军队由美国空军空投，占领了日伪军所在的这些地方。面对这些花招，共产党人撤回他们在长江流域的主力部队，把他们集中在华北的农村，并派遣部分军队通过烟台港口经海路到满洲。[97]这样，国民政府重建了它在华中和华南的政权，占领了华北一些最重要的城市和交通线。

（2）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政策的局限性

如果这一时期的事态表明了美国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的可能性，那么它们也表现出它的局限性。最明显的限制性因素之一就是中共的政治活力和军

事实力。虽然共产党并没有与国民党争夺华南和华中，但他们却坚定地致力于发展他们在华北的影响，并向满洲渗透。在华北，国民党控制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唐山和秦皇岛等大城市以及这些城市间的通道。此外，他们控制着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重新占领了济南、潍县和青岛等几个大城市。他们对山东省的一些地区也保持着无力的控制。而在这些地方以外，陇海铁路以北的华北则由共产党控制。在陇海铁路以南，共产党的军队占据着苏北地区，这样便控制着东端。在河南、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广西和海南岛，他们还保持了游击区。他们声称，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他们俘虏并接受了22万日伪军的投降，[98]还杀伤1万人，统治了有315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有18717000人口的197个城镇。

这样，共产党成功地把他们在晋东、冀南、几乎整个山东、部分安徽和苏北分散的“解放区”联成几个大区并加以控制。他们横跨华北平原，他们能够破坏中国唯一联结长江流域和华北的两条铁路的北部。他们使满洲脱离了国民党政权的中心。他们的力量还因为从日伪军那里缴获的一些武器弹药及军需品而得到加强。必须承认，国民政府在美国军事和外交的支援和日伪军的合作下成功地阻止了共产党在中国实现垄断。力量的平衡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转移也暂时停止了，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相对力量增长了。一位共产党理论家陈伯达愤怒地喊道：蒋介石“抢走了人民（即共产党）的胜利果实，日本匪徒成了他的受惠者”。但是，共产党人远远没有被击败。

美国政策的局限性还反映在另一个方面：国民政府政治上的无能是任何军事援助或外交支持都无法改变的。战胜日本，重占华中、华南，在华北建立了立脚点，都既给蒋委员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同时又是一个严重的挑战。由于日本投降，蒋作为抗日战争的民族领袖，恢复了一些他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失去的声誉。在收复区，他的代表和军队被人民当作解放者而得到欢迎。如果他的政府在接管这些地区的政权时能表现出哪怕最低限度的效率和诚实，那么这种政权也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他对自己的信徒少一些偏爱，使比较有能力的国民党领导人得到表现他们能力的公平机会的话，那么他的政府的整个影响就会扩大。然而蒋和他的政府却没有抓住机会，接受挑战，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

在收复区，许多国民党官员更加关心的是一味地为自己占取“日伪财产”一类的物资，而不关心建立正当的行政机构，恢复经济和计划重建。国民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汇率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定下来。后来汇率定为二百伪元比一元法币，这个汇率过高了。收复区的人民突然发现他们自己一贫如洗。《大公报》，这份由与国民党政学系关系密切的一些人拥有并控制的报纸，在它的一篇社论中说：

再收复区的人民守夜到黎明。当他们看到祖国的旗帜时，他们欣喜得发狂。但是他们睡了几夜之后发现，他们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家园和财产……几代人积累的财富瞬间就转移到掌握着美元和国民党法币的人们的手中。[99]

日本投降两个月之后，中国这家主要报纸向政府呼吁在收复失地时，不要失信于人民。几天之后，这个呼吁变得绝望了：“不要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后来，它哀叹道，“不计其数的人民曾经发狂般地欢庆战胜日本。但是现在我们甚至都不能活下去了，因为我们似乎陷入了更加深重的困境，在

炽热的火焰中磨难。”甚至到 1946 年 1 月末，再收复区的局势仍然是动荡的。不可驾驭的通货膨胀、广泛蔓延的失业、食品短缺、在许多地方有时还有饥荒。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的确有助于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重建国民政府的政权。但是突然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大片地区却恰恰显示出了国民政府在战争年代的衰败。振兴国民政府是不能用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来解决的问题。

即使蒋有效地动员了国民党内部的一切人才并争取到所有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那么在内战中为再收复区建立一个有效的政府也是个最大限度地考验国民政府的能力的任务。但蒋非但不这样做，反而实行了一条尽力扩大他的追随者的控制，阻止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平分权力和影响的政策，他就是这样对待严峻挑战的。在共产党的朱德将军命令其军队接受日本投降之后不久，两位最有能力的国民党将军，也曾是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向蒋委员长建议，应马上派遣离华北前线最近的国军收复那一地区。相反，蒋却仅仅安排中央军（即由蒋自己的黄埔系的将领统帅的军队）通过空投或海运从中国的西南进入遥远的华北。这一决定的执行造成相当严重的拖延，使共产党赢得额外的时间在没有反对力量的情况下扩大他们的控制。战争刚一结束，蒋便采取措施削弱省级领导人的势力，最显著的例子是解除龙云将军云南省主席的职务。蒋的歧视政策所引起的不满情绪有时造成各地地方军队的背叛。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第一个军事灾难就是一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于 10 月份带领他的军队投向共产党一边，背信弃义地消灭了另一位国民党将军的近 4 个师。[100]蒋对个人狭隘的权势利益的追求使他不能成为由非共产党派别参加的强有力的联合政府的民族领袖，他不得不为共产党所利用。因为毛的策略是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中间”势力包括控制某些地区或统帅军队的省级的权势人物。毛认识到，他们从根本上说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他也承认，“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他有限的希望是“在对顽固派斗争时（他们将）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显然，蒋的区别对待的政策使毛取得了比他所希望的要多的东西。

限制美国政策的有效实行的另一个因素是苏联军队进入满洲。8 月 8 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后，苏联红军从几个方向进入中国。罗吉昂·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苏军主力部队沿着中国的东北铁路从西北进入满洲。第二支苏军从北方入侵满洲。两支部队在哈尔滨方向会师，然后南下占领整个满洲。这时，蒙古人民共和国于 8 月 10 日对日宣战。一支苏联军队从外蒙插入并占领了热河省，在外蒙军队的支持下，另一支苏联军队进入察哈尔省，并向战略城市张家口推进。苏军的推进并没有在 8 月 14 日日本投降之时停止，它也没有在授权接受日本投降的满洲边境停止。[101]相反，苏军继续向察哈尔和河北省进军，袭击驻在那里的日军，而不管国民政府已经得到接受这些省份日军投降的权力，不管国民政府要求日军在国军未到之前原地驻守的命令。8 月 21 日，日军在苏联和蒙古军队的压力下从张家口撤出。[102]

直到 8 月 31 日，苏军仍在推进并在河北省的省界内占领了一个战略要点。苏军在察哈尔和河北省的军事行动的结果是它占领了一大片领土，使华北和内蒙中共的“解放区”与满洲联接起来了。这样，苏联就使它处于如果愿意便能够支持中共的地位。对实现这一可能性不利的是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并帮助它在满洲重建权力的中苏条约以及有关协议。

（3）赫尔利未能利用新的机会取得停战

以上所述的军事和政治事态——美国空军和海军以空投和海运的方式送国民党军队到占领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日伪军与国民政府的合作、苏军广泛渗透到中国的军事行动、中苏条约的缔结——为国共两党重新谈判提供了背景。后来的那些会谈和苏联的行动再次证实了赫尔利不可分割的、互相关联的设想所得出的结论：苏联支持国民政府的保证将使共产党妥协；苏联希望中国实现和解并支持和平统一的政策；苏联将支持国民政府，不援助共产党人并“无条件地”同意美国的中国政策。乍一看，在有限的程度上，在短时期内，事态发展似乎证明赫尔利是正确的。在蒋委员长发出三次邀请之后，毛泽东从他的延安窑洞中走下来了，他在赫尔利的陪同下，于8月28日首次飞往重庆，亲自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

毛在出发前两天为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党内通报，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并制订了党的方针。毛对共产党人说，蒋垄断了受降的权利，而且他通过收复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地方，重新开辟海路交通线、接收日军武装和把伪军编入他自己的军队而加强了他的地位。大城市和交通线暂时将不受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在今后的这个时期，共产党应该努力作战，继续进攻。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攻势之后，共产党便有可能控制长江下游和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山东、河北、山西和绥远所有的大部分地区，整个热河和察哈尔省以及辽宁省的一部分。

毛指出，在谈判中，国民党肯定会要求共产党急剧缩小“解放区”的面积，削弱“解放军”的力量。共产党愿意作出妥协。他解释说：

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同情……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

毛指出，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国民党有可能有条件地承认共产党的地位。和解将带来两党合作与和平的新阶段。如果情况是那样的话，共产党应努力掌握一切合法斗争的方式，在三个主要领域内加强白区工作，这三个领域是：城市、乡村和军队。如果在共产党人作出妥协之后，国民党仍然想发动内战，那么它将受到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指责，共产党为反对其进攻而展开一场自卫战争将成为合法的。

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多次流露出希望实现和解。他们同意秘密进行谈判。双方都不透露谈判的实质内容，每日谈判之后仅发表一个简短的公报。共产党人主动提出具体的建议并作出妥协，而国民党的谈判者却消极地表示反对或赞同共产党的建议，他们这样做反映了政府强有力的军事和外交地位。自1937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放宽了他们的要求，而没有抬高实现和解的价格。当谈判讨论到具体问题时，中共清楚地表明，他们愿意作出让步，并不再坚持他们于1944年12月和1945年1月提出的诸如建立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一类的条件。相反，他们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就国是交换意见，商讨有关国家和平重建的问题并召开国民大会”。我们必须在此指出，付诸讨论的问题与其说是成立联合政府，还不如说是召开国民大会。后来，在马歇尔使华期间，共产党再次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周认为有必要把当时的妥协解释为仅仅是推延了他们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不是放弃了这一要求。

不出所料，最棘手的长时期存在的问题是把共产党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和在中共统治的“解放区”实行政治控制的问题。毛和蒋都认识到中共的政治权力取决于他们所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因而共产党的谈判者在这两个问题上表明了立场，在作出某些让步之后，他们坚持了最低条件。在把共产党军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上，共产党坚持保留它对最少 20 个师的控制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某种总的协议，但用一位国民党谈判者的话来说，许多困难“还有待于真正的解决”。对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实行政治控制的问题，连口头协议也无法达成。共产党人一开始要求国民政府实际上对他们 18 个“解放区”的现状加以承认。当国民政府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他们要求单独控制华北和内蒙等五个省并对其他六个省和中国各部分的四大城市享有部分权力。然后，共产党人稍微降低了他们的要求，仅要求单独控制陕甘宁边区、华北的四个省和内蒙并在对其他两个省和三大城市的控制中享有部分权力。最后，共产党建议，所有“解放区”在普选省政府官员的宪法条款得到通过并付诸实施之前仍暂时保持现状。这个建议也遭到政府的反对。

放弃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和坚持对省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控制表明，共产党人的地位有所削弱，但他们满足于维护他们的地区性影响并暂时放弃了在不远的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的希望。地区性统治保证他们得到真正的权力，确保他们能够对完整地维护其政治和军事组织的重要地区加以控制，他们能够再次试图从这些地区出发，夺取中央政府的权力，对省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和保留一些共产党师显然被认为是符合“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它对让步的范围加以限制。

与控制地方政府和军队紧密相关的问题是解除日军武装和接管占领区这一充满矛盾的要求，这个问题正是国共两军发生日益频繁的武装冲突的直接原因。国民政府声称唯独它有权往占领区派遣军队并解除日军武装。共产党人声称他们有权在他们的军队积极活动的地区或已经包围了敌军的地方解除日军武装。由于找不到解决办法，因而共产党人在一切直接和即刻影响到它的权力地位的问题上，坚持了他们的一系列最低条件。这些条件最起码可以保留他们在八年抗战中取得的部分成果，并且当以后出现新机会时还可能使他们再前进一步。

至于毛的让步和他愿意亲赴重庆在多大程度上出自因苏联和国民政府的和解而产生的外交上的孤立感，便不得而知了。共产党拒绝作出超越一定范围的妥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苏联通过党的渠道作出的保证，苏联的默许或在苏军进入满洲时与共产党军队的合作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有趣的是必须指出，早在 9 月 4 日。国共谈判就面临困难，而几天以前据说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红军的援助。[103]中苏条约也许使共产党得到大规模的苏联援助的希望暂时破灭。但它显然并没有削弱他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能够在没有重大外援的情况下捍卫为自己创造的政治与军事地位。[104]事实上，当毛在重庆谈判时，他的军队就在发展和巩固他们对日本占领区的控制，袭击伪军，孤立日本驻军。

在整个谈判期间，赫尔利对局势的发展是了解的。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代表，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可能改变局势的平衡，使它有利于这一方或那一方。尽管他个人犯了错误，但赫尔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他的意见仍然是有分量的，国共两党都正式要求他继续留在重庆。但是赫尔利却错过了由于他的国家最近显示出的巨大的军事力量所赋予他的一次新的机

会。这也是他的特点之一，即使从避免内战和实现和平统一的政策来看，他对国共谈判的态度在政治上也是有缺陷的。在这个重要关口，双方都在严肃地就使他们分裂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一种暂时的谅解时，赫尔利却不去使用他的影响为解决急迫的具体问题而提供便利条件。相反，他在谈判中所做的仅仅是努力使双方和解，尽管谈判不断地出现僵局，他仍极力主张他们谈下去。他建议谈判者“在总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并根据这些原则制订有关“细节”的条款。

这恰恰是错误的办法。鉴于两党在原则和方针上的根本冲突，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和无法推迟的，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也只能是一种表示双方现存力量平衡和对任何一方的政治解决都不会造成威胁并易于付诸实施的暂时谅解。这样一种暂时谅解只有通过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或用赫尔利的话来说，通过双方以不计其数的武装冲突而制订的“细节”来实现。这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双方争夺解除日军武装的权利和由共产党统治的“解放区”的政治控制而引起的争论。这两个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在某种法律和行政的规定下把中国划为两个区，一个区由国民党统治，另一个由共产党管理，国民政府将行使某种松弛的全面控制，使中国貌似统一并在通讯、交通、货币、国内贸易等方面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这个想法实质上是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的领队伊凡·那顿上校对赫尔利谈过的想法。另一个不那么紧迫，但却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的问题是共产党军队的规模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的话，那么它也只能在维护国共两支军队的现存比率的基础上加以解决。

十分有趣的是共产党的建议提供了一个达成暂时和解的机会，虽然它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这些建议是在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相对力量出现暂时减弱，美国对国民党的军援使共产党及早取胜的前景变得阴暗和中苏条约的签订之时提出的。因此，这些条件相对来说是有节制的并为暂时和解提供了基础。无疑，根据共产党的建议所作的暂时和解会巩固共产党在华北的地位并使他们在新时机出现的时候能够发展自己的力量。但是在这种和解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不会受到威胁，因为即使是共产党人这时也不再坚持成立联合政府了。共产党在最大限度的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和解将比马歇尔后来制订的方案更加有利于国民党。它比后者更容易被国民党所接受。如果赫尔利曾像马歇尔后来那样积极地干预事态的发展，那么美国对国民党的压力便可能导致暂时和解。暂时和解还会给国民党提供一个它急需的喘息机会以便使它能够夺取中国的其余部分，包括满洲，恢复通讯联络并稳定经济的发展。既然美国认为这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是不明智的和切合实际的，那么促成这样的和解却是符合它的利益的。极为可能的是这种谅解不会持续很久。但是美国和国民政府将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实际上，赫尔利的消极态度意味着在谈判中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的观点；因为在整个谈判期间，美国军队通过空投和海运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占领区以解除日军的武装。蒋委员长在美国援助下显然对他的军队将在为控制中国而进行的竞争中获胜是充满信心的。他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重视，而对政治和经济上的虚弱却不以为意。从短期看，他战胜了共产党人。但从长期看，他不顾政治经济形势而发动内战的政策导致了他的失败，随之也导致了美国政策的失败。因而，赫尔利无条件支持蒋的政策是不利于他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最紧急的问题上——双方对解除日军武装的权利的要求和有关对“解放区”实行政治控制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为满足公众对和平的呼吁，双方同意发表一份谈判纪要，纪要强调了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之点，但没有提及未能在解除日军武装的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情况。[105]10月10日谈判暂停，毛于翌日离渝返回延安。

回到延安后，毛就重庆谈判在共产党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报告。毛指出，蒋希望维护他的专政，消灭共产党，但是许多客观上的困难阻碍他这样做。蒋的三大障碍据说是“解放区”的强大、国民党中国的人民对内战的反对和国际局势。因此，他不得不变得现实一些，邀请共产党人到重庆谈判。共产党人与他进行谈判也是现实主义的。谈判结果是国民党接受了和平和统一的总政策。但纸上的话并不等于现实。共产党人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使它们成为现实。

毛对他在谈判中所提出的放弃江苏南部、浙江、安徽中部和南部、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和广东八个“解放区”的建议作了两点解释。第一，国民党将不惜一切代价为这些地区而战，因为有一些根据地“在他的卧榻之旁，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显然，毛认识到保卫这些根据地的难处和放弃它们的好处，即可以集中兵力坚守华北。第二，毛认为，让出这些根据地使共产党能够彻底驳斥国民党说它仅仅想要地盘而不想做出妥协的指责。这样，共产党将赢得国内外大量的中间分子的同情。共产党出于同一种原因在军队问题上也做出妥协。他们要求在120万人军队中仅仅保留20个师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一比六的比率进行保留。然而，毛表明他的建议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将把枪交给国民党。共产党必须掌握枪杆子。

毛指出，解放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军队问题也没有真正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共产党作出让步之后，国民党仍将发动内战，那么它就会受到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指责，共产党就更有理由以自卫战争粉碎它的进攻。毛声明：“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毛对那些不久即将离开延安奔赴前线的共产党干部的指示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显然，毛作好了一切应急准备。他倾向于“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并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不要贪便宜。

谈判复会并未导致任何结果。国共两军加快了为控制中国而争斗的步伐。武装冲突的次数急剧增多。显然，中苏条约并未使共产党人妥协，开始充满希望的谈判未能带来和解。赫尔利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的政策中的主要设想之一被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4）苏联对满洲中苏行动的意图

赫尔利认为苏联和国民政府之间的条约将使中共妥协的想法与他另外的两个设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即苏联将支持和平统一的政策并将支持国民政府，它“无条件地”同意美国的政策。他利用缔结中苏条约以及有关协议的办法证实他的观点是正确的。1945年9月6日，赫尔利对国务院说，中苏条约及其协议的发表“最终表明苏联政府支持中国国民政府，而且在满洲问题上，两个政府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另一份报告中告诉华盛顿，蒋委员长“过去一贯怀疑苏联在与中共关系上的态度”，现在他对苏联的意图坚信不疑。

后来的事态发展和研究使我们能够回顾性地分析一下赫尔利对苏联政策和意图所做的判断。它们证实，自 1944 年秋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期间，就赫尔利对苏联的对华政策的看法而言，赫尔利相信苏联不希望发生内战并想在中国实现和解。查尔斯·B·麦克莱恩指出，在这一时期，特别是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的政策是“极力主张国共两党在战争后期更加紧密地合作并建议立即着手为战争一结束便成立联合政府而作准备”。这一政策的基础似乎是对国民党和中共的相对力量不能确定或者是过低估计了毛在与国民党的全面内战中成功的可能性。它似乎与苏联惧怕美国可能采取的反行动有关。1945 年夏，苏联在新疆镇压反国民政府的哈萨克起义中发挥的作用就表明了这一点。[106]苏联以它自己的方式支持美国的和平统一政策，这样雅尔塔协定中所体现的它在远东的直接目标便能够以它与国民政府缔结一个条约而得到进一步的确定，而且它不会因内战的爆发而受到威胁。

事实证明，甚至在战争刚一结束的日子里，斯大林就阻止中国共产党采取军事行动夺取政权并极力主张他们参加联合政府。1948 年，斯大林对铁托的一位主要助手爱德华·卡德尔说：

战争结束后，我们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了中国的局势。我们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动起义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同志应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这一点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意见，但当他们回到中国后却采取了相反的行动。他们纠集力量、组织军队。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在打击蒋介石的军队。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现在承认我们犯了错误。事实证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

麦克莱恩总结说，就斯大林在抗日战争胜利日之后不久对中国局势的估价而言，他所说的“这些话揭示的道理”可能是“真实的”。欧洲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据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放下了武器，参加了联合政府，这一事态的影响也是重大的。斯大林很可能在中国遵循同一政策。

1960 年，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将军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之际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能够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并击败他们的正确预见归功于毛一人。林指出：“一些国内外好心的朋友……颇为我们担心。”林说，但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敌我力量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这一论断“把一些人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惧怕心理和他们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一扫而光。”林所提的“一些国外的好心的朋友”可被认为是暗指斯大林。

如果上面的分析没有离题太远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在战争刚刚结束后难以确定的一个时期内，斯大林支持美国争取和睦、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努力。但是斯大林支持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并不意味着他将全心全意地支持国民党、拒绝援助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意味着他将协助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权并“无条件地”支持美国政策。当时苏联在满洲的行动不久便证实，赫尔利对俄国领导人的保证所作的解释太刻板了。它暗示坎南当时的分析更加接近事实。自 1945 年 10 月初至 1946 年 5 月 5 日，苏军全部撤出满洲，这时苏联政府采取的行动步骤使人们对赫尔利的中苏政府在满洲问题上意见一致的判断产生怀疑。

首先，苏联对国民党在满洲重建政权设置了障碍，从而有利于中共对满洲的渗透。苏联还允许中共得到缴获的日本的武器弹药。第二，苏联从满洲搬走了大量的工业设施并努力使国民政府作出进一步的经济妥协。第三，苏联在阻止国民党试图接管满洲之后曾三次设法拖延从满洲撤军的日期，前两次通过与国民政府的协议，最后一次通过单方面的行动。苏军的继续存在使中共赢得时间以扩大他们在满洲的影响，巩固他们新取得的地位。苏军的继续存在被用来支持苏联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的建议。它被用做压国民政府作出经济妥协的手段之一。在赫尔利于 11 月 27 日辞职以前，苏联已经完全暴露了它对国民党采取的设置障碍的策略和它对中共的偏爱，尽管苏联政策的全部影响只是在赫尔利辞职之后才为人们所感觉。到 1945 年的仲秋，苏联已确定它在满洲的收获，它在那里有足够的时间估价中共的力量，它似乎“对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中共的不同的对华政策感到颇为满意，而这些政策并不是以统一和联合为基础的”。当苏联最终全面撤军之后，由于它自 1945 年 10 月初至 1946 年 5 月在满洲和中国的行动与方针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在此将作一个简短的叙述和分析，尽管有一些事件从时间上说属于本书的第十章。

苏联阻止国民党接管满洲的尝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苏联在中苏条约以及有关协议和交换的照会中保证，它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不干涉中国事务、把国民政府作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并向它提供道义支援、军事援助以及其他物资、尊重中国对东三省（满洲）的全部主权、允许国民政府“在公共事务中享有全部权利……只要解放区的任何一部分不再是直接的军事行动的区域”。已签字的会谈记录表明，斯大林保证苏军将在日本投降后 3 个星期之内开始撤军，完成撤军的最长期限不超过 3 个月。粗读一下这些条款，人们的印象是苏联政府将支持国民政府在满洲重建政权。

鉴于中共宣布它打算往满洲派遣军队，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迅速地派遣它的军队到满洲，那么它便能够有效地占领这一重要地区。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有三条主要通道。由于华北的大部分地区由共产党控制，因此最短的通道就是从华南、华中到大连和南满的其他港口的海上通道。第二条和更长一些的通道是通往国民党控制下华北各港口的海路。把这些港口与满洲的大城市联接起来的漫长的地面通道要经过许多易守难攻的据点。这条通路可被敌人轻易切断或遭到敌人的骚扰。第三条通道是把部队空投到满洲有大机场的有限的几个大城市。空投的缺陷之一是难于在短时间内运送足够数量的军队到某个城市控制住混乱的局势。国民政府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最明显和最方便的通道。

早在 9 月 10 日，中国政府就要求美国向它提供从广州向大连运送它的军队的船只，它希望只要红军一开始撤退，他们便进入满洲。10 月 1 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它计划派遣军队到大连港。很快它便得到了令人不安的答复。10 月 6 日，苏联大使对中国代理外交部长说：“中苏条约规定，大连是个商业港口，它是运输货物的港口，而不是运输部队的港口。”他进一步指出，“无论任何国籍的军队在大连登陆都是对中苏条约的违反，都将受到苏联政府的反对。”苏联政府显然是在歪曲协议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协议中的条款不仅没有表明支持苏联的态度，而且苏联确定尊重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并承认东三省“领土与主权完整”的交换照会明确指出中国政府除协议特别规定的义务外，在行使它的主权时不受任何其他的限制，中国外长曾

对苏联大使指出这一点。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迅速的和有效的行动为中国军队提供船只，但它并没有为中国要求进入大连而提供外交上的支持，也没有对苏联的拒绝提出抗议。在由于接管满洲产生的问题上，美国对中共关系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并遵循了在内战中不直接支持国民党的政策。

10月中旬，由美国舰只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到达大连港外，而苏中政府在大连登陆问题上仍然未达成协议。[107]但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对蒋委员长的满洲司令部的主任熊式晖将军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国民党军队在满洲其他的三个港口——葫芦岛、营口和安东登陆。国民政府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决定在指定的港口之一登陆。10月25日，中国外交部长告诉苏联大使，中国军队将根据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与熊将军达成的协议于10月29日在葫芦岛和营口登陆。在到达葫芦岛港之后，国民党发现中共新四军的部分军队控制了这个地方。当他们得到苏联政府保证他们在营口登陆的许诺之后，这支乘坐美国舰只的国民党军队又驶向营口。但到达营口后，他们发现营口与葫芦岛一样已被中共占领。苏联政府这时对中国官员说，来路不明和不知效忠于谁的军队已在港口驻扎下来，苏联政府无法对中国军队登陆的安全负责。美国海军指挥官遵照烟台事件的先例并出于同样的考虑反对在营口登陆的任何尝试。苏联以这些花招使国民党无法利用最短的通道把它的军队派到满洲去，并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海上兜了两个大圈子，徒劳无益地试图在满洲港口登陆。由此造成的五个星期的拖延，在争夺满洲的斗争中使共产党人极大地受益，因为那时时间是以天计算的。

由于国民党无法从最短的通道进入满洲，因此他们被迫在最邻近满洲的华北的一个港口——秦皇岛登陆，并从陆地进军满洲。在他们沿着海边通道向满洲进军时遭到共产党武装部队的袭击，他们正在打一场反对国民党进军的阻滞战。苏联政府还拒绝给在南满陆地上进军的国民党军队提供援助，借口是那些地区的苏军已经撤出。国民党军队直到11月26日才占领满洲的第一个战略要点锦州。这发生在国民党军队到达大连并因遭到苏联拒绝而无法登陆的五个星期之后。

在同一时期，中国政府也曾希望把它的军队空投到满洲的各大城市。但是1945年11月13日，苏联大使通知它说，只有保安部队和宪兵可以用这种方式运送进来，军队只有在苏军撤出满洲的前3天或5天才能进入这些城市，而这个时间对空投足够的军队保卫他们自己和反击可能发生的中共的进攻是太短了。中国人要求得到一周这个最低限度的时间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否决。苏联当局还不允许国民政府以当地征召新兵的方式在满洲城市组织和平队。国民党当局在长春组织的一个团的和平队突然间遭到苏联红军的包围并被解除武装。

苏联当局一方面阻挠国民党接管满洲的尝试，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帮助中共扩大它对满洲的控制，以当地征召新兵的方式加强其军队和取得缴获的日本枪支弹药的行动步骤。据估计，10万名中共士兵通过内蒙和华北的陆道和恰恰是曾经拒绝国民党军队通过的满洲港口，包括烟台的海路进入满洲。他们是作为手无寸铁的“平民”而来的，而不久就被苏联红军缴获或日本交出的枪支弹药全部装备起来。[108]

1945年12月28日，毛向共产党的东北局颁发了一条指令，敦促它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牢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毛的指令接着说，根据地将不应建立在国民党占领着或即将占领的大城市中或主要交通线附近。它们应

建立在相对来说远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地区。毛指出 10 万人的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满洲，那里的共产党军队已扩大到 20 多万人并仍然在发展。他估计在一年之内将达到 40 万人。

这种不寻常的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苏联占领军所提供的行动上的自由和援助。苏联当局允许中共征召新兵。他们释放了几千名在押的原满洲国正规军的士兵，部分人参加了共产党军队。他们允许中共组织地方政府或者接管在苏联红军进入一个地区后不久组织起来的地方管理机构。中共军队还由于增加 3 万中国士兵而加强了力量。这些士兵在日本占领满洲之后到俄国边境寻求庇护，受到俄国人的训练并又随苏联红军进入满洲。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闻名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精明的人事政策也帮助他们在满洲迅速建立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刚一参战朱德便命令四支集团军中的三支进军满洲和热河，这些军队的部分人由在不同时期参加共产党军队的东北军官所指挥的满洲军队所组成。[109]此外，毛指示非东北干部“下决心成为东北人民的一分子”，并在东北人中训练了大批的积极分子和干部。

面对苏联当局设置障碍的策略和相当大规模的中共军队，蒋委员长命令他的部队在 1945 年 11 月 26 日夺取锦州之后停止前进，而不向辽宁省省府沈阳推进。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决定是“不再继续实行接管计划，但这却使俄国人处于违背条约，非法占领这一地区的境地，并观察他们将怎样解决决定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满洲问题。”[110]在这之前不久，他从满洲的政治中心长春撤回了他在满洲设立司令部的人员。根据 1945 年 8 月 14 日他与苏联签订的协议，他曾在 10 月初派遣这些人到满洲为在这一地区建立文官政府而进行准备工作。因为苏联政府允许中共军队进入城市并组织一个与国民党相敌对的地方政府。它的阵地越来越难以防守。

苏联从满洲撤军的三次推延——这时，苏联突然改变了策略。11 月 17 日，国民党军队开始从长春撤退，这时，苏联大使向中国外长发送了一个照会，否认苏联占领军援助过中国共产党人。照会争辩说，在苏联军队已经撤出的某些地区出现中共的势力是中国政府没有能力实行控制的结果。它建议，如果中国政府现在希望苏联军队推迟他们从满洲撤军的时间，那么，苏联政府可以安排推迟撤军 1 个月，如有必要则 2 个月。苏联照会之所以占优势地位是因为一旦苏军从南满的港口和战略据点撤退，中共军队将随时会占领它们。所以，两天之后，中国政府通知苏联政府，它将使苏联全部撤军的限期从 12 月 3 日延长到 1 月 3 日，延长到苏中两国政府就接管满洲的有效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之后。

为制订这样一个计划而换取中国所要求的苏联推迟撤军，蒋委员长派他在苏联受过教育的儿子蒋经国到长春与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谈判。这时，中苏两国政府已于 11 月 30 日达成协议把苏联撤军日期推迟一个月到 1 月 3 日，1945 年 12 月 5 日，马利诺夫斯基在与小蒋的谈话中欣然同意蒋的建议，允许空投一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到长春，由陆道运送两个师到沈阳并保证他们的安全。他还指出，苏联军队决心继续进行解除未得到政府承认的部队的武装的工作。就蒋而言，他于 12 月 9 日通知马利诺夫斯基，中国政府同意把苏联全部撤军的日期推迟到 1946 年 2 月 1 日，这个日期是苏联政府在 12 月 5 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提出来的。[111]这个协议显然使国民政府的前景变得光明起来。蒋委员长放弃了他原来的决定，这时他命令他的部队继续向满洲进军。1946 年 1 月 5 日，国民政府开始向长春空投部队。1 月 26 日，国民党军队大

批进入沈阳。国民党官员在苏联联络官员的陪同下，被空运到其他 10 个大城市并在那里成立起市政府。国民党几乎没有遭到中共的反抗。蒋经国和马利诺夫斯基达成的协议有一度对国民党来说实行得比较好。但是暂时的成功使蒋委员长增加了进军满洲的勇气。后来，它导致了国民党军队负担过重，最终损失了最优秀的国民党军队。蒋委员长从那时起就对他改变主意感到万分遗憾。[112]

综上所述，很清楚，国民党要求苏联红军推迟撤军的交换条件是苏联确实在国民党努力夺取满洲时向他们提供了有限的援助。苏联政府推迟从满洲撤军的愿望无疑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继续留在华北是有联系的。12 月份蒋经国在斯大林的邀请下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说，如果国民党允许哪怕是一个美国士兵留在中国，那么解决满洲问题将会变得困难重重。中苏在推迟苏联撤军问题上达成的谅解使莫洛托夫在美国、英国、俄国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宣称，“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红军从满洲撤军的时间将推迟到 2 月 1 日。这样，苏联政府在外交地位得到加强之后，便强有力地迫切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在 12 月 16 日的首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先生要求讨论在华北的美国军队问题。几天之后，他继续发动攻势，提出确定美、俄军队同时从中国撤军的日期。他坚持不懈地提出这一要求，并反复作出努力，寻找美国对中国可能怀有的隐藏着的或其他的目的。最后，1945 年 12 月 27 日发表的莫斯科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说：“两国外长一致同意苏、美军队尽早从中国撤军的必要性与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是相符合的。”

这对国务卿贝尔纳斯来说是个小小的外交上的失败。虽然公报并没有像莫洛托夫要求的那样为美、苏军队同时撤军确定日期，但是这段话把在华美军的地位放到与在满洲的苏军相等的水平上，中国政府热切地需要美军的存在，而苏军的撤退则取决于斯大林在 8 月份对中国政府所作的保证和中国代表与苏联政府最近达成的谅解。不久，当美军在中国继续存在的外交理由——如协助解除日军武装和使它撤退——消失之后，苏联政府将援引莫斯科公报对美军的存在加以谴责。

苏联政府不仅在玩弄一套有着无法估量的长远后果的精密的政治花招，而且它还尽一切可能努力榨取更多的直接的经济利益。苏联政府从 9 月初便开始实行一条搬走满洲最新、最宝贵和最好的工业设施的政策。据美国赔款专员埃德温·W·波利估计，它对满洲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达 8 亿 5 千 8 百万美元，为抵消搬动、破坏和因此全面退化的工业设施而进行更换的全部成本达 20 亿美元。苏联政府对搬走工业资产仍不满意，它采取措施取得了满洲剩余的重工业的部分控制。1945 年 11 月 24 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经济顾问斯拉德科夫斯基正式向蒋委员长的满洲司令部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张嘉璈递交了一份建议，主张中苏联合经营满洲百分之八十的重工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建议是在苏联政府表示愿意在国民政府试图接管满洲时向它提供一些帮助之后不久提出的。显然，除推迟撤军的时间外，苏联政府还想在经济领域里捞一把。

中国政府不愿意付出这一额外的代价。12 月 4 日，张先生对马利诺夫斯基说，关于满洲中苏经济合作的讨论只有在苏联全部撤军之后才能开始。以后，苏联政府为他们的建议又提出新的要求。12 月 7 日，斯拉德科夫斯基对张先生说，满洲所有的工业企业都应被认为是苏联的“战利品”。中国代表对此观点采取了严厉的态度。2 月 3 日，苏联全部撤军的期限越来越近，它

试图以威胁推延撤军作为砝码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月16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警告张先生说，在经济合作问题未得到解决之前，他无法预测苏联撤军的日期。1月21日，苏联大使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问题。

这时，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立场。2月7日，它分别向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发送了同样内容的照会。它向双方表达了美国对当前在满洲的工业企业建立专有的中苏控制权问题上的讨论是关注的。它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为此目的而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与“门户开放”政策相违背的。然而，对蒋委员长来说，苏联的要求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困境。一方面，他当然不愿意放弃重要的工业企业，把它们交给苏联。而且苏联的要求和苏联对满洲的掠夺在国民党中国激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这种自发的感情被右翼CC集团所利用，他们在许多大城市煽动反苏反共的情绪和挑动学生示威。如果蒋委员长屈服于苏联的要求，那么曾经暂时加强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使共产党为难的强烈的公众反应就会烟消云散。

另一方面，这时他对苏联军队尽快从满洲撤军感到焦急。就满洲而言，他的地位因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在马歇尔将军的主持下签署的停战协定而得到加强，协定规定国民政府有权派它的军队进入满洲。在建立这一地区的政权时，正在撤军的苏联是提供援助，还是设置障碍对他的成功和失败是举足轻重的。与满洲的苏联当局打交道的中国代表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如果中国政府同意苏联的要求，那么苏联政府将不允许中共在满洲发挥公开的作用，而允许他们作为纯粹的地方军活动。根据这种推理，张先生极力主张蒋委员长批准10至20个联合经营的企业名单，用张先生的哥哥的话来说，这样，“苏俄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便可以建立起来，并成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蒋委员长许多天来在同意还是拒绝苏联的要求问题上动摇不定。最后，在几次迅速地改变想法之后，他在最后一刻撤回了他早些时候要张先生与苏联当局签署协议的要求。

当中国政府在回避苏联的经济要求时，苏联政府则无视2月3日这一撤军截止期，并以天气、缺乏燃料等种种借口推延撤军的进行。撤军截止期日益逼近，中国政府多次询问关于撤军的情况。但是苏联政府直到3月20日才屈尊作了正式的答复。这一天，它通知中国政府说，撤军将在四月底完成。这样，撤军又一次被推延，这次是单方面的行动。这时，国民政府发现它试图取得苏联的合作，在满洲成立地方政府变得越来越困难。3月，苏联当局的态度变为公开地敌对性的。3月6日，以前根据苏联当局的命令而停止发行的一家中共报刊在长春再次发行，中共袭击并占领了过去国民党地方政府与苏联合作时所控制的许多城市和地区。当苏军开始撤退时，苏联当局拒绝向国民政府代表透露他们逐步开始撤退，以便使国民党军队作好必要准备的计划。当国民党军队不可能按时到达北满时，3月26日，一位高级苏联指挥官通知中国代表说：“我们（苏联）驻扎在长春以北的军队在撤退之前无法等待中国政府军队的到达，我们（苏联当局）只能把我们的职责转交给在那里存在的任何军队。”这样，中共得到允许占领长春以北的整个满洲。4月14日，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中共军队向那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并在四天的激战之后战胜了国民党驻军。长春战役重新点燃了内战的导火线，结束了停战并最终导致由马歇尔将军精心制订的整个方案的失败。5月3日，当苏军完成撤军之后，由于12月5日的协议而使国民党得到的大部分利益，如果不是全部利益的话，变得毫无价值。

苏联行动所揭示的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前面的叙述清楚地表明，苏联向中共提供了无法估价的宝贵援助，阻止了国民党接管满洲的努力。11月初，苏联的行动已经批驳了赫尔利关于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意图和苏联与中共关系上的乐观主义设想。赫尔利错误的根源是他未能掌握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未能对它的暂时现象与实质加以区别。苏联的对华政策反映了民族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利益的冲突，这一政策的根本是与国民党敌对，支持共产党。但是三个因素使苏联政策出现支持国民党和对中共漠不关心的假象。第一似乎是苏联对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生命力的过高估计和相应对中共力量的过低估计。苏联的这一估计排除了进攻性干预的政策和把中共作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精选工具的可能性。它使斯大林把他的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国民党仍将是统治党，国民政府将在不远的将来对满洲和中国实行有效的控制。他认为他对现实的让步是，他在中国的统一阵线中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并批准了把成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战术行动的想法，他认为，这种情况将最有效地为苏联的利益服务，并给中共扩大它的影响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与国民党敌对和支持共产党的根本政策体现在苏联对满洲的国民党的有意设置障碍和对中共的不引人注目、但仍然是有效的援助上。它还表现在斯大林建议蒋在满足中共要求方面作出更多的让步上。苏联对华的这种显然是充满矛盾并在当时使人困惑的行动象征着它为使基本政策适应于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调整，莫斯科是这样认为的。随着莫斯科逐步认识到中共的革命潜力和国民党的政治弱点，它在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仲秋这一段时期逐步从一种表面上模棱两可的政策走向公开地和坚定地支持中共的政策。

影响苏联政策的第二个因素是它愿意与现政府达成谅解或做一笔交易，因为这将有利于苏联的直接的民族利益，这样一笔外交上的交易不可避免地需要采取支持国民政府的措施并加强它反对中共的力量。但是苏联和国民党中国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使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持严格来讲成为暂时的现象。因为，从长远观点来看，作为扩张主义大国和国际共产主义中心的苏联有一个虚弱的中国当它的邻居是符合它的利益的。一方面，国民政府越虚弱，它就越加依赖苏联的支持，用一位中国外交官确切的话说，至少是对“（苏联）没有敌意”，它也就更容易在苏联面前作出外交上的让步。导致中苏条约缔结的形势、中国对苏军推迟撤退的默认、1949年有关中国在新疆作出妥协的谈判都揭示了中苏关系的这个方面。

另一方面，只要国民政府感到它已相当强大，那么它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夺回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利益。1942年中央政府对新疆的重新控制和1945年中苏条约刚刚缔结之后国民党就试图对中共展开决定性的战争都说明了这一点。

一旦支持国民党或与国民党做成的交易使苏联达到它的目的之后，苏联总是背离它的“友好”政策。1943年，当苏联在欧洲战争处于优势地位，它对日本进攻的忧虑日趋减少时，苏联政策中出现了明确无误的细微的转移迹象。那一年，苏联在华的外交官就“国民党即将向共产党发动进攻向美国官员表示了明确的关注。对比之下，《真理报》和《消息报》对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事件没有发表任何社论加以评述。在这个事件中，国民党军队消灭了共产党新四军司令部的部队，杀害了它的副军长，俘虏了军长。当苏联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从国民政府手中争取到重要的外交妥协之后不久，它便阻止国民党在满洲重建政权、援助那里的中国共产党人并加强了它与延安的接

触。

限制苏联支持共产党和与国民党敌对的第三个因素似乎是对美国采取反对行动的忧虑。斯大林在战时公开宣称，他愿意追随美国在中国的领导，他对国民政府所表示的支持，他不承认他对中共感兴趣，以及他在满洲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对中共的帮助——所有这些似乎都揭示了这一因素的存在。他不遗余力地推进他的政策，但是他总是避免激起美国站在国民党一边的积极干预。的确，莫洛托夫在 1945 年 12 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使美军从中国撤军与使苏军从满洲撤军联系起来的企图似乎表明，当时苏联的政策就是以提出苏联不干涉的可能性来防止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干涉。

要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复杂性，我们就要认识到这种复杂性来自它必须不断地使民族利益与意识形态利益相平衡、使直接的考虑与长期的考虑相平衡、使短期的权宜之计与根本的敌对相平衡、使策略目标与战略目标相平衡、使国民党的貌似强大与共产党的潜力相平衡，最后，使苏联的能力与无法确定美国的干涉意图相平衡。赫尔利的幼稚和乐观主义使他甚至无法着手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5）新政策的出现和赫尔利的辞职

1945 年 11 月，中国的事态发展完全驳斥了赫尔利纲领中三大设想中的两个：即苏联保证支持国民政府将使共产党人妥协和苏联将支持国民党并且不援助共产党。事态的发展对他的第三种设想也提出质疑，即苏联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和平统一中国的政策。这时，华盛顿正在对中国局势的不利发展重新审查它的政策，它对事态的这种发展完全是毫无准备的。战争的仓促结束使美国来不及对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制定出一个战后方案。空投和运输国民党军队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主要被认为是实现日本投降和结束战争的措施。美国政府到 9 月份才决定完成重新装备 39 个中国师的任务，并使国民政府征召了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帮助它训练军队。但是在战后中国作出更大的承诺的第一步却伴随着美国军队的复员而到来。在抗日战争胜利日，美国在华的军队大约有 6 万人。在 5 万人登陆之后，总数达到 12 万人。然而，在 9 月份，1 万 6 千名美军返回美国。10 月，美国作出了于 11 月 15 日撤回海军陆战队并撤销中国战区的试验性的计划。

政治和军事上的发展不久就使华盛顿的美国官员相信，突然中止美国在中国的军事活动是不切合实际的。魏德迈将军对中国局势所作的评价为寻求一条新政策提供了更多的动力。11 月 14 日，魏德迈对华盛顿说，如果蒋委员长试图扩大他控制下的地区，特别是向满洲推进的话，那么美国将需要海军陆战队无限期地占据现在由他们占领的华北的关键地区。他解释说，中共在为华北而努力奋战；国民政府在共产党的反对下对占领满洲完全是毫无准备的；苏联占领军正在推进扩大共产党的控制并防止国民政府在满洲建立政权。魏德迈将军报告说，他劝告蒋委员长巩固长城以南和长江以北的地区并且在试图接管满洲之前保证在华北建立陆地交通线。

在 11 月 20 日的另一份报告中，魏德迈将军谈到涉及中国局势中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这时，他对国民党接管日占区后对权力的滥用和不法行为以及由此在人民中引起的严重不满情绪极其清楚。他对国民党在中国各地区成功地建立政权的前景得出如下的结论。他认为，只要蒋委员长接受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诚实的和有能力的文职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那么他就能稳住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的局势。至于华北，他

表示相信除非与中共达成和解，而这对他来说似乎是遥远的事情，否则蒋在几个月，也许几年之内便无法重新建立他的政权。他认为以他的观点看避免卷入政治冲突和自相残杀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建议或者所有的美国军队从中国撤走，或者改变他的观点以证实美军的存在是正确的。至于满洲，他认为，如果苏联与中共之间无法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那么占领这一关键地区将是蒋委员长力所不能及的。因而，他建议，在国民政府可以对这一地区实行全面控制以前，美国、英国和俄国将对满洲进行托管。除了对名词作了改动以外，1947年他又一次提出了这一建议。在此后11月23日和26日的两份报告中，他对华盛顿说，在美军不卷入内战。在“不超越现有的和计划中的”美国军队和物资条件的情况下向中国提供援助，这对统一中国和满洲并支持国民党遣返日本军队来说是不可能的。

11月27日，内阁会议最终通过了一个新方案。它包括两个因素。第一，会议决定推迟美国海军陆战队从中国撤军的时间，并准备从海路运送更多的中国军队到北方支持他们。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联合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并于11月26日送交国务卿，准备召开内阁会议。备忘录恰好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为使日本从中国撤走而向国民党提供的军援最少将包括在内战中将向他们提供的少量援助。第二，美国政府将继续努力在中国实现政治和解并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以实现这一目标。

新方案的第二个因素标志着政策向有条件支持蒋的方向逐渐转移，并达到顶点。这与赫尔利以国民党的条件实现和解的政策逐渐瓦解是一致的。9月14日，杜鲁门总统对宋子文说，美国装备一支现代化军队的战后方案将取决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美国所提供的军事援助将不会被转移到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去，不会被用来支持不民主的政府”。10月22日，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委员会通过一个报告，规定如果中国军队“被用来支持一个不执行美国的总政策并参与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政府……”，那么美国将不再向它提供援助。魏德迈将军在与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后返回中国，他向蒋委员长汇报了杜鲁门总统给他的指示：“美国绝对不应参与中国的武装冲突，也不能向中央政府在土地上的采取反对反叛军人的行动提供任何便利。”他还对蒋说：

他们（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宣称，如果事实强迫美国政府相信，得到美援的中国军队正在用来支持那些美国无法接受的政府、用来进行内战或用来实现侵略性和强制性的目标，那么美国对华的军援将会立即停止。中国在一个统一的、完全代表人民的政府中取得的政治上的稳定和安全的程度将被认为是决定美国经济、军事和其他援助形式的根本条件。

这样，有条件援助的政策体现在为取得政治和解而向蒋施加压力的决定之中。实际上，这个决定意味着对赫尔利的观点的反驳和预见到不可能以蒋的条件实现和解的国务院职业外交官的胜利。11月27日，赫尔利宣布辞职，并发表了一个声明，把他的政策的失败归罪于职业外交官的反对和破坏，他说，这些人“与中国有武装的共产党站在一边”。赫尔利在离任时首次发表了存在一个造成中国崩溃的阴谋集团的正式声明，这个理论在麦卡锡时代发展成为一场全面的政治迫害。赫尔利对他的部下的不信任与尽管发生了满洲事件，而他仍然完全相信苏联领导人的意图形成了对比。

1945年12月6日，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提供的证词对苏联的信任作出了如下的响亮的声明：

请各位对他们（中共）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加以区别，因为他们是不同的。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人民）委员告诉我的这一切在我们饱经沧桑的整个时期中看，就我所知，他们对我是信守诺言的。正如我昨天所说——这是我自己的分析；并不是引证任何人——俄国根本就不承认中国武装的共产党是共产党。俄国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俄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俄国不希望中国分裂并建立起两个政府。俄国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和更加和睦的关系。

在与莫洛托夫先生和斯大林大元帅的对话之后，俄国与中国签订了中苏条约并交换了信件，使每一条协议都成为严肃的条款。我读到苏联违反了有关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原则的某些方面，但是直率地讲，没有任何事实能说服我，这是真实的。我相信，美国 and 俄国在中国政策问题上观点仍然是一致的。[113]

赫尔利的大使任内是在从珍珠港事件到朝鲜战争这一远东事务中最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苏联作为远东大国再次出现，中共迅速地发展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日本投降了，中国的权力之争发展成一场普遍的内战。当赫尔利初任美国驻华大使时，国民党也许为了抵消因史迪威危机而可能在美国产生的不利的反应，作出了某种改革的姿态，任命它的一些较好的人担任政府的高级职务。但是当赫尔利建议召回史迪威时，他也就是驳斥了压力策略，因而未能抓住这个不同寻常的机会压国民党实行根本的改革。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国民政府明显地表现出它没有能力有效地接管占领区并响应共产党的挑战。赫尔利通过制订一系列有利于共产党人的原则开始促使中国两个党达成和解。但是在共产党讨价还价的力量被削弱的关键时刻，他未能利用他的国家的影响，通过对美国在至关重要的“细节”问题上的立场的解释，达成暂时的政治、军事上的谅解。他对在控制政治行动的总原则上达成口头协议的威力的信任在中国使他一筹莫展，在那里，传统制度的破坏加深了公开宣称的原则与赤裸裸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他既没有准确地估价国民政府慈善的语言和它自取灭亡的行动之间的脱节，也没有估价共产党的宣传和实际政策之间的歧异。他在唯独向国民党提供军需品并拒绝向共产党提供军需品的做法上是正确的。但是援助国民党的效用却由于他未能在根本的改革中使美国援助成为有条件的援助而使其成为无效。日本投降后，他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和苏联意图的乐观主义观点并没有促进美国军事力量在中国的保留。在整个这个关键时期，他仅仅是被中国动荡的政治激流席卷而行，而并没有把他的国家的政治影响作为指导事态发展的有力因素加以利用。在他辞职的时候，中共的讨价还价的力量由于中国国内的发展和苏联政策中的明显变化而再次得到加强。因此，赫尔利遗留给马歇尔的排解中国纠纷的使命比他所经历的更加令人生畏。

第三部分有限援助政策的局限性

第九章 马歇尔的对华政策——设计的过程与决策

1. 国共之争与武装干涉

乔治·C·马歇尔将军在中国面临着一系列的抉择。即：1、武装干涉；2、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及作战咨询；3、支持国民党政府，但不采用武装干涉的手段，也不使军事援助升格到他认为武装干涉的程度；4、不介入国共两党间的军事政治冲突，但只向被承认的政府方面提供经济援助；以及5、全部从中国撤退。马歇尔没采用武装干涉中国的办法。他之所以作出否定的决定，是基于一种广泛的、共同的想法，即认为美国的在华利益不值得诉诸战争。对美国在华利益作如此估价，很自然地就加重了其他那些倾向于反对武装干涉的考虑的份量。反过来讲，反对武装干涉的决定，也就形成和控制了马歇尔对华政策的那些核心因素。例如：他努力使国共两党达成停战；他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他的限制美国军事顾问团活动范围的决定；他拒绝魏德迈将军提出的扩大军事援助的计划；以及他对司徒雷登大使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出面劝告最高统帅蒋介石退休的建议持否定态度。

将马歇尔的政策作为完整的统一体来考察，我们不难看出决定政策的各种不同的假设和考虑究竟孰轻孰重。这样，他的政策的各个方面的轻重得失也就条理分明了。这样一分析，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模棱两可的特点也就一目了然。紧接着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想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战时政策之后，出现了从1947年至1949年的美国从中国撤退。这一切可以被理解为美国在中国的前进和后退的循环的又一页。简言之，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只不过是美国传统政策的继续，他的命运跟他的前辈完全一样。

（1）马歇尔政策的手段和目的的构成

在1945年11月27日赫尔利大使突然辞职并公开发表他的辞职书。之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即任命马歇尔将军为他的大使级驻华特使。马歇尔将要执行的政策，曾在国务院由他与高级官员们透彻地讨论过。12月11日，杜鲁门总统、李海军上将、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又开会将这个政策重新审查过一次，并用一组文件将它写成方案，还附加一个口头解释。这一组文件包括一封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将军的指示信，以及三个附件：一个是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总统的一项公开声明，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致作战部的一份备忘录。[114]

在这些文件中写下的那些乍一看似乎很简单的方案和口头解释，实际上是一个包含着精心设计的目的和手段的组合。按照那上面的说法，美国的“长远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这是战时对华政策的继续。赫尔利将军已把这些词句弄得家喻户晓。而压倒一切的当前目标，是支持国民政府建立起它的统治。尤其是在满洲，只要它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给予的有限军事援助能够达到的话，就有必要建立起它的统治。[115]新闻报道对这一企图是这样披露的：美国承认“现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是“完成中国统一的最适当的工具”。在下列声明中，透露了要在尽可能广大的地区内建立国民政府权力的这一目标：

美国与联合王国在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去年7月的波茨坦宣言中与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与协定中，均保证要解放中国，包括把满洲归还

到中国的控制之下。

为了达到由条约规定而成为合理合法的中国统一的模式这一目的，也为了达到撤出尚留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目的，[116]美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但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切又被一条否定性的决定所牵制，即：“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不应发展成为影响中国内争进程的军事干涉，”[117]“要竭力避免由于美国援助，而带来的对持不同政治见解的中国人的影响。”[118]从积极的方面看，美国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军事援助。根据11月27日内阁会议的决定，暂时在中国保持美国的陆军和海军的力量；命令魏德迈将军“作出安排协助中国国民政府运送其军队，包括其后勤人员到满洲各港口”，并立即妥善地“安排将中国军队运送到华北”；而且还决定将在适当时机，成立一个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

这时，包括魏德迈将军在内，一般都认为：将国民政府的权力扩大到华北与满洲是不可能的，除非已与中共达成协议，再不然就要美国出兵进行军事干涉。于是，美国政府就采取步骤，以便达成国共的协议。马歇尔将军被授命“敦促中国政府召集各主要政治派别的全国代表会议，以便实现中国的统一。同时也就此达成一个停火协定”。在对美国政策的公开声明中，杜鲁门总统告诉中国的作战双方说，合众国政府认为下列各点至关重要：

1. 为使全中国回到中国人的有效控制之下，也为了立即撤出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国民政府军队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政见者的军队之间，必须达成停火协议。
2. 必须召开一个包括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内的全国性会议，以便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问题——这种解决办法将给中国带来统一。

在重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的方法问题上，美国与最高统帅蒋介石之间，有根本的意见分歧。美国政府的策略是：倡议建立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府，作为交换条件，政府能够控制共产党的军队，从而达到遏制共产党的影响的目的。杜鲁门总统在公开声明中宣称：

美国政府认识到，目前的中国国民政府乃是“一党政府”。美国相信：如果能将该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以容纳其他政治派别，将会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与民主改革事业。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之存在，与中国政治统一的要求不相符合；而且在实际上，也使政治统一成为不可能之事。成立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之后，像这样的自治性军队应被取消，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应有效地合成一支中国国民军。

由于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是长远目标；而且同时也是扩展和加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的手段：所以，它也就成为美国政策的当前目标。正像杜鲁门总统在指示信中告诫马歇尔那样：“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都急于用和平民主的方法来实现中国的统一，这一事业完成得越快越好。”

但相反的是，正如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蒋委员长的策略却是想要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或至少将共产党人从一些战略要地撵出去，并用武力把共产党消弱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按国民党领袖们的看法：消灭共产党乃是一项最最迫切的任务。后来据报道说，CC派首领陈立夫曾说过：中共好比是“一根坏了的阑尾。必须割除，才能保存生命。”美国政府很清楚，在解

决中国问题的手段上双方存在意见分歧。在谈到有必要扩大政府基础，以包括各主要政治派别时，国务卿贝尔纳斯告诉作战部说：

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圆滑和审慎、耐心和克制。中国人自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的影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因素，但能解决到何种程度，全取决于我方运用这种影响的能力。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这样地运用：即既鼓励中央政府作出让步，又要鼓励所谓的共产党人也作出让步，也要求其他方面人士作些让步。

这样，美国政府就采用了大规模援助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其条件是：要求停火并实现统一。杜鲁门总统指示马歇尔说：

在你与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首领们会谈时，我授权给你用最诚挚的态度谈话。你可以特别指出：中国方面在经济上想要求贷款和技术援助，外加要求军事援助，你要指出，但一个不统一的、被内争搞得疮痍满目的中国，用现实主义观点看来，不能被指望成为实现那些援助项目的合格的地区。

美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展望中的美国军事援助，加上国民党对美国武装干涉所抱的希望，将会鼓励国民党政府采取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杜鲁门总统的新闻稿特意地把美国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加以排除。在政策声明中，有关向国民党继续提供军事援助，使它能在已解放地区（包括满洲）重建政权的字样，及有关在华成立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同句，统统被删去。总统还曾告诫魏德迈将军。在等待马歇尔与中国首领们会谈的成果的期间，除非为便于将部队和给养运入满洲确有必要者外，进一步把中国军队运送到华北的工作应暂缓进行。同时，还指示他说：运送中国军队到华北的工作可以立即妥善安排，但不必通知中国政府。为了使美国在调解中国内争时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些小心提防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当时采取的方案，对中共也同样施展了压力。因为如果他们拒绝美国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面对美国站在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干预。可是事实表明：由于美国的和平统一方案正好符合中共在那时的要求，所以美国加给国民党政府的压力，要比对共产党的压力大得多。还有，由于美国不愿承担在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责任，这就把所能加到中共头上的压力约束到一个低的限度。

尽管如此，美国压倒一切的目标仍是支持国民党政府，并尽可能地使它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政权，对这一点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在最后决定采用这个方案的审慎考虑中，当时曾决定：如果最高统帅不能作出适当的让步以取得停火及政治解决时，美国仍要支持他，“为了能撤出日本人，授命他达到能把军队开进华北这样的程度。”对马歇尔方案中的这一条，大家都是同意的，但却没有写入官方文件。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曾由马歇尔将军用下列词句加以阐述（根据 12 月 11 日笔记）：

如果最高统帅……不能作出适当的让步从而使争取政治统一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如果美国因此而放弃对最高统帅的继续支持，将会带来使中国分裂的悲剧性后果，并可能出现俄国人重新控制满洲的局面。这一切的总后果是：我国从事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遭到失败。

马歇尔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蒋介石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得不非常丢脸并自食其言地放弃它的政策的很大部分”。但实际上，正是这个在力所能及的程度为竭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才是马歇尔将军在赴华使命的一开始就力求实现的基本决策。正如国务院的白皮书所说：正是这个政策主宰了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的行动。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仅仅是支持中国政府的手段，是一项庞大的政治方案的一部分。把这一手段当成美国政策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如像马歇尔的某些批评者们所说的那样，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

毋宁这样说更为恰当：马歇尔政策的根本和决定性的因素，就是排除使用武装干涉的决策，和随之而来的抑制一切凡能升格成为武装干涉中国的行为的决策。尽管1946年11月国共谈判完全失败，尽管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地位急速恶化，尽管在1948年2月间，马歇尔就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有很快被打败的可能性，但这个政策一直被严格地遵循着。1948年3月正式否定了建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设想；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间，共产党征服了满洲和华北；1949年1月，蒋委员长从总统职位上退休；1949年4月，共军跨越长江已迫在眉睫——所有这一切，都未能稍稍变更这个政策。

（2）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决策

在1945至1949年的复杂局势下，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决策，是与下列一些其他因素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迹象表明：国务院的某些高级官员在1945年后期，仍认为中共不是真心实意的共产主义者。在1945年12月9日贝尔纳斯的备忘录（附属于杜鲁门总统致马歇尔将军的指示信的三文件之一）中，使用了“所谓的共产党人”这一名词。但根据马歇尔自己的证词，至少在他赴华就任以后，他对中共是不抱什么幻想的。[119]同样，据1945年至1947年的远东事务司司长约翰·卡特·文森特本人的说法，由于马歇尔在与中共谈判中所遇到的困难，使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他们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俄国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在1949年初的几个内，某些美国官员可能有希望毛变成另一铁托的想法，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他的白皮书的报告信中，则将中共描述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政党，这表明他并不赞同以上的想法。在决定不采用武装干涉的政策时，关于中国式的铁托的想法是个微不足道的因素。

最初对中共意图的估计错误所带来的影响已逐渐减弱，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对美国劝告的抵制，对美国作出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心的影响，却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如果美国积极干预中国政治，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美国在改革国民党政权上能有何成果。事实是：自从1947年5月军火禁运解禁以来，除司徒雷登大使提过一些温和的建议，进行了一些个人活动之外，美国政府再也没有使用施加压力与积极干预中国政治的手段。其所以不积极干预，理由很明显，因为马歇尔将军认为没有任何别人能取代蒋介石的地位，美国除了在合理限度内尽力支持蒋以外，别无其他选择。但还可以看到另一个理由：

美国拒绝承担至少在部分中国土地上继续保持国民党政权的道义上的和政治上的责任。由于积极干预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就会引申出这样的责任，而那样一来，就违背了不在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最初决定，也不符合不给予国民党军队大规模军事援助与不在内战中提供作战咨询的有关决定。这样，排除武装干涉的决定，就阻碍了采取使国民党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行动。事后观察可以看到，该决定突出地成为控制 1945 至 1949 年间对华政策的根本决策。

不在中国使用武力进行干涉的决定，还来源于对中共意图的估计错误与感到国民党要失败以外的其他一些考虑。有以下事实足资佐证，即像一些批评马歇尔政策的共和党人，如参议员威廉·F·诺兰，欧文·布鲁斯特，众议员沃尔特·H·贾特，这些人都是中共的死对头和国民党政府的坚定的好朋友，他们在决定不使用美军地面部队在华作战这一点上，其观点也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些人至少没有公然提倡这种行动。因此，对不承担武装干涉的决策必须从它产生的现实的环境和条件来考察。

应该记住，正当美苏在有关欧洲命运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时，中国国内的两党之争正在向高潮发展。对欧洲的关注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美国的在中国不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美国在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生命攸关的利益，注定了她要把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首先使用到那些地区。在 1947 年的 15 个星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中，美国宣布了她的遏制政策，制定了援助希腊与土耳其的方案，并拟定了欧洲复兴方案的总的设想。由于苏联通过捷克政变与封锁柏林继续向前推进，美国的对策是组成北大西洋公约和进行空运。这些步骤的采用，正是在中国内战进入决定性阶段的时候。面对着在欧洲的历史性任务，也面对着在中国的毫无希望的局势，美国当局牢牢地坚持它的不进行武装干涉的政策，及与之相关连的不采取任何足以导向武装干涉的决定。虽然批评者们要求增加军事、经济援助，但他们中没有人公开提出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去。1945 至 1949 年间，在武装干涉中国大陆问题上，“国际派”与“孤立派”之间并无任何明显的分歧。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不存在意见分歧的现象，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探寻美国之所以采取不进行武装干涉决策的理由，因为正是这个决策构成了马歇尔政策中其他各个因素的基础。

（6）美国政策的基本假设

在国共之争中进行武装干涉，通常牵涉到动用一国资源这样的重大责任，牵涉到另一第三国进行对抗性干涉的危险，其后果如何将是无把握的。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力量均势的情况下，只有牵涉到保卫本国安全与生死攸关利益时，武装干涉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120]因为民族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国际秩序的奠基石，而不干涉别国内政是保持民族独立与维护结盟的灵活性的一项原则。但是、不干涉原则并不适用于对待欧洲以外的弱小民族。恰恰相反，强国对弱国的内政积极地加以干预，而把弱国变成附属国或殖民地的事是屡见不鲜的。

根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这一原则，及由此引伸出来的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原则，美国探寻着把不干涉原则运用到中国的途径。同时，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睦邻政策、大西洋宪章、四国莫斯科宣言与联合国宪章——这一切使不干涉原则自身就有着普遍性原则的外表，使它与最初发源于维持力量均势的多元体系，可以完全不相干。

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当多元力量均势被两极力量体系所代替时，不干涉

思潮在美国仍有很强影响。在新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各自成为一种特殊哲学与生活方式的核心。严格分成两个阵营与意识形态斗争的范围之广，损害了在多元体系下形成的不干涉原则的那些历史性的理由。因此，一方面是美国的长远传统继续约束着美国，而另一方面国际形势变化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却鼓励了那种作为争夺世界权力的干涉手段。比以往更甚的是，不干涉主义变成了抵制第三国的可能干涉的一种政策，特别是当同不干涉国家结盟的国民党力量在国共之争中更占上风的时候。

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国际体系下，只要进行干涉的国家事先已作出政治决定，断定其安全与生命攸关的利益、或至少是根本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冒军事和政治上的风险卷入武装干涉的举动，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所承担的责任也可以成功地被推卸掉。一般他讲，这样的决定应该依据反映地缘政治现实的长远考虑，这在该国历来的政策中是可以看出来的。一旦作出了肯定的决定，武装干涉的可行性、它的期限、范围及手段，都可以根据受威胁利益的大小，来衡量出应付的代价与成功的机会。

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对华政策包含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拥护门户开放的原则与拒绝为了中国而卷入战争。美国的声明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美国在华有重大利益受到威胁。但到 1941 年为止，它的具体行动基本上贯彻着一种一贯的对它在华利益的低估。接受日本的挑战，只说明暂时缓解了政策中的矛盾，而做了偏向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原则的倾斜。传统政策的自相矛盾，在战时的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政策中得到体现。这一道德高尚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使中国继续参战的政治手段。战后，美国打算通过这个政策使中国成为美国驻远东军事力量的代替物，而这就意味着政策中除了流行的观点外并无更多的内容，这个观点就是：只有中国能够成为强国，美国在华才能有重要的利益；否则她就没有。在史迪威危机之后，美国官员们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对中国能否很快成为强国，抱很大的疑虑。

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认为美国在华利益不值得为之一战的假设，继续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它表现在国务院不愿对必须用武力保卫美国在华利益的最低限度下定义一事上。1945 年 11 月 1 日，作战部长帕特逊送交国务卿贝尔纳斯一份备忘录，要求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给以指示：“我们是否能预见并接受卷入远东大陆事务的必然性？如果能够的话，请加以阐明。”他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复，以便制定军事计划，以对付不可容忍的在东方发生的侵略行为。他特别提议：“一旦在远东发生利益冲突时，哪些是美国再也不会后撤的最低限度利益，对这最好有个明确的说明，尤其是有关满洲、内蒙、华北及朝鲜。”国务院给了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表明它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缺乏明确的答案。答复如下：

关于你们要求对一旦在远东发生利益冲突时，美国再也不会后撤的最低限度利益的说明；你部（陆军部）可以预先拟制对在远东的可能侵略将采取的军事步骤。你部在拟制对武装部队的政治指导时，最好的办法是与各有关部门保持紧密的联系。[121]

有关美国在华利益的基本假设，对形成下列三种考虑，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考虑反过来又对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假设：即决不在中国大陆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第二个考虑是在某特定时期保持一定的兵

力。军事假设与保持兵力，均反映出对受威胁的在华利益的低调的、然而未公布的估计。美国公开宣称的目的，或是中国的领土完整，或是支持国民政府，但这些其实全部在美国的能力范围以外。第三个考虑是针对其他大国的政策与行动的，而这些国家十分重视它们的在华利益。对它们来讲，美国政策只不过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无能为力的反应，而它们是否采取行动，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却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后，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军事基础已被削弱，才引发美国对日本的战争。而苏联不直接支持中共一事被认为是个重要的理由，使美国排除了直接的军事干涉行动。当美国政策的全面失败已迫在眉睫时，到那时为止的美国的一系列行动仍被说成是正当的，因为只要指出中国的不重要性并强调美国能力有限就可以了。对美国能力的如此低估，部分地也取决于对美国在华赌注的低估。

（4）军事假设的影响

在 1946 至 1949 年间，制约美国政策与行动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决不在中国大陆上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执行战斗任务。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取会上作证时，谈到他在 1946 年的想法时说：“对在地面战场上卷入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我不仅抱怀疑态度，而且还感到惊讶。”相同的假设决定着他在 1947 年至 1948 年的政策。他在另一次作证时说：“问题的实质是：除非使我国政府在亚洲大陆上承担巨大的责任，否则就应付不了那种局势。”他特别指示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不得分配它的官兵到国民党的作战部队里去。魏德迈将军在 1947 年夏在华实地调查后的有名的报告中建议大大扩展美国对华的军事经济援助。可是连他也反对“美国人员积极参与作战行动”，并认为“那是违反现行的美国政策的”。魏德迈所设想的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监督，是准备在“作战区域以外”进行的。

马歇尔不愿在亚洲大陆使用地面部队执行战斗任务一事，反映了美国几乎是举国一致的看法。在制定 1948 年援华法令的审慎考虑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阿瑟·H·范登堡在向参议院作报告时说：对该议案的广义理解，“不应被解释成为包括在华使用美国武力以执行战斗任务。”即使那些最直率地批评马歇尔——社鲁门政策的人，也从未公然提倡在华使用美国地面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在制定 1948 年援华法令的辩论会上，众议员沃尔特·H·贾特在众议院声称：“没有一个人，哪怕只有一分钟，考虑过派遣一个士兵到……。所以，当我们提到军事援助时，关于这一点是要澄清的……。仅仅是提供军人供应，提供训练与咨询，决不再更进一步。”在意见听取会上，威廉·C·布立特作证说：“你不必派遣一个美国兵，除了以顾问的身份出现。我建议不把美国军队派往中国。”在回答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问题，即军援是否终于会导致美国的积极军事干预时，克莱尔·陈纳德将军说：“我认为有那种可能性，但我认为这种事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 1949 年 6 月的对华政策辩论会上，政府的坚定的拥护者，参议员汤姆·康纳利，曾责问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说：他或其他参议员们当时究竟能做些什么来挽救中国？难道能派遣一支军队到中国去不成？参议员布鲁斯特答道：“我从未提议要派一支军队到中国去。”在同一场合下，参议员威廉·F·诺兰在无异议的情况下答道：“批评我国远东政策的人们，从来没有提议过派军队去中国……。”[122]马歇尔将军作出的在没有美国直接武装干涉的情况下，国民党赢不了这场内战的估计是正确的。他的向国民党军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和作战咨询将导致全面干涉的估计，可能也是正确的。而马歇尔的批评

者们虽然大部拥护那种挽救中国以免沦为共产主义的狂妄目标，但出于各自的理由，都不提倡采用为达此目标所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不能正视这种必然性，即单单军事援助是不能帮助国民党打败他们的敌人的。

当中国局势急遽恶化时，这个基本的军事假设又有了一个新的理由来使它合理化，即：要阻止共产党的胜利必须花费巨大的力量为代价。在某种程度上，它变成一项能自我证实的原则。当 1948 年 12 月，中共在长江以北歼灭国民党军主力并作渡江准备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戴维·巴尔少将向陆军部报告说：他“竭力”反对无限制的军事援助，反对立即使用美国的武力，尽管只有使用武力才能使国民党政府在华南保持立足点。在否决参议员帕特里克·麦卡兰贷款 15 亿美元给中国的提案时，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于 1949 年 3 月 15 日写信给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说：

扭转当前的恶化局面、为使军事上的抵抗能有一些成功的希望而需要动用的军事手段，乃是一支无比庞大的、实地参战的美国武装部队；还需要一系列的战斗行动，这些行动意味着美国直接卷入中国的兄弟阋墙的战争。这一切不符合我国的传统对华政策，不符合我国的利益。

（5）现有兵力的因素

只有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复员的背景，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认为派地面部队去中国大陆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德国投降时，美国陆军约有 8,290,000 人。日本投降前，陆军部预计在 1946 年 7 月 1 日将兵力削减到 2,500,000 人，在太平洋方面为 900,000 人。迅速复员的计划与目前的陆军人员退役率，并不能让国会满意。马歇尔将军不得不在 1945 年 9 月向议员们保证，陆军部正在尽快地使最大数量的人退役，并保证“未来的陆军建军计划与当前的复员率完全没有关系。”1945 年末，当马歇尔将军出发执行他的倒霉的赴华使命时，陆军的全部兵力减到只剩 4,228,936 人。虽然美军一度曾在中国达到约 113,000 名士兵、水兵及陆战队的最高额，但作战部对 1946 年 7 月 1 日至太平洋地区的法定人数，预计要从 830,000 人减到不足它的半数。其中派定在中国的为 6,000 人，而魏德迈将军则担心由于退役将会减少到只剩 3,000 人。1946 年 6 月 30 日，当国共双方在满洲的零星战斗开始扩展到关内各地时，当苏联通讯社开始注意和赞扬中共的行动、并对其潜力表示信赖时，美国陆军的全部兵力下降到 1,889,690 人。这数字说明：在日本投降日之后的九个月内，总共裁减了 6,133,614 人。1946 年末，当马歇尔将军放弃了他帮助中国取得政治解决的努力之后，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着责任的美国只有一支 1,319,483 人的陆军，其中有 12,000 名士兵与陆战队驻在中国。[123]1947 年 6 月 30 日，在魏德迈将军执行其在华实地调查使命前不久，美国的全部兵力为 989,664 人，其中有战斗力者只有 925,163 人。按国务卿艾奇逊的事后观察：在 1948 年 2 月，当美国尚有在中国的內战中动用武力的最后机会时，陆军与空军的实有人数共 898,000 人，其中 140,000 人部署在远东。

马歇尔将军比任何别人更清楚军事上的弱点带给美国政策上的局限性。回忆起 1947 年 3、4 月间莫斯科外长会议，马歇尔将军于 1950 年 11 月对五角大楼的听众们说：

我记得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经常受到压力。尤其是在莫斯科时，一个无线电报接着一个，要我给俄国人一点颜色看看……。我回国后，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又受到同样的敦促。在那个时刻里，要给人家颜色看就必须有能耐。可是我是个军人，我知道给别人颜色看需要什么样的能耐——我们的能耐是，在美国本土只有 $1\frac{1}{3}$ 个师。你跟别人打交道，

人家有 260 个师而你只有 $1\frac{1}{3}$ 个，这岂不成问题？我们在阿拉斯加一点兵力也没有。我们

没有足够的兵力来保卫费尔班克斯空中走廊……。提及 1947 至 1948 年的中国局势，特别针对魏德迈将军 1947 年 9 月提出的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军援与经援的建议时，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取会上作证说：

在那里，作为国务卿，我心的问题是：政府能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得起直接卷入的极其沉重的责任，即关系到在中国本土作战的沉重负担……。

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付相当大的代价；而且在这样大的地区内，我们会卷进去继续付出可能更加巨大的代价。

那时我国本身的军事地位特别软弱。我想几天前我曾说过：我记得……我们美国本土只有 $1\frac{1}{3}$ 个师。

我记得魏德迈将军的预计是：必须有约 10,000 名军官及其他人员，来监督与指导各种军事任务。

考虑到总的世界形势，我国本身军事上的软弱，及这件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响，加上我本人短暂的在华经历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我们担当不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我不赞成承担那种责任；参谋长们……也不同意。

美国在常规兵力上的软弱，并未因拥有核垄断而得到充分的补偿。至少直到柏林封锁时为止，美国官员们尚不知如何将核垄断转化为外交上的讨价还价。w·菲利普斯·戴维逊曾有力地指出过这种失败，他说：“原子弹是美国仅有的真正的威力；但谁也不知道在何种情况下能使用它，也根本不知道是否能真的用上它。”即使美国官员们严肃认真地考虑了在政治上、军事上最大限度地利用原子弹的问题，但看起来这个最后武器对中国的国共之争仍无多大影响。因此，当时美国没有讨论过核垄断的含意；在讨论中国局势时也没有讨论过它；无论在已公布的有关美国战后政策的文件记录中，或在马歇尔的追溯记事中均未提及这个问题。319

（6）苏联的不干涉政策

在坚持不对华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曾受到了苏联的不干涉政策的影响，并为苏联可能的对抗性干涉的恐惧所左右。在美国人看来，美国方面的直接武装干涉只有在发生了苏联方面的直接的、公开的干涉，或至少是大规模援助中共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中共军队在苏联的准许下，掳获了大批满洲日军的军火武器，已被大大地加强。由于苏联当局的巧妙的、不显眼的协助，由于苏联人策略地阻碍了国民党人对这个地区的接收，中共终于把它的统治扩展到满洲绝大部分地区。在 1946 年春俄军撤退之际，蒋委员长不听美国的劝告，把他最精锐的部队深深地开进满洲。尔后的战斗不仅证明中共能经得起内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的攻势而生存下来，还能在内战后期发动越来越猛烈的反攻。苏联没有进行干涉的必要，

也没有大规模地用军需品援助他们的必要。苏联人坚持不干涉原则，对中共采取的是袖手旁观的政策，也是阻拦美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干涉的政策。苏联对中共有能力照料好自己很有信心。

由于缺乏苏联援助和干涉的证据，[124]美国不以武力进行干涉就又多了一层理由。美国官员们有一个最大的忧虑：即面对着苏联的不干涉政策，美国如果积极干涉的话，将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马歇尔将军在 1949 年 10 月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追溯他对中国局势的想法时说：

当谈到到底有无苏联援助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搞到这方面的证据……。比任何其它事情更令我担心的是：看起来很明显，苏联人……在他们的[对华]态度上……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我的理解是：他们正准备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在那里他们可以表现得洁白无瑕，而我们手上则沾满了泥污。他们的每一项宣传都一定会这样讲的。而我本人可能是他们特别要污蔑的对象——这使我非常忧虑。

马歇尔敏感的良心，在作出至关重要的结束中国战区和削减驻华陆战队人数的决定上起到了作用。1946 年 2 月，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说：

我们必须尽快撒手，以避免俄国人的谴责，正象他们今天谴责驻希腊的英军那样。我的意思是：必须结束“中国战区”并成立一个军事顾问团来代替它……。也为同一目的，除掉若干侦察、运输、留守及地方卫戍部队外，我们必须把全部陆战队撤出中国。

1948 年 2 月国务卿马歇尔在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解释中国与希腊的不同点时说：“根据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在希腊碰到的是一支由邻国支持着的军队。但在中国并无证据证明该军队是由外界共产党人支持的。”[125]

（7）对苏联的对抗性干涉的畏惧

苏联不干涉政策的成功，是现实政治的一个典型的范例。在使人畏惧它的对抗性干涉的同时，苏联对中共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对苏联可能要有行动的疑惧，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实力而进一步加强了，尽管美国方面拥有核垄断。当助理陆军部长约翰·J·麦克劳埃从中国返回，并在 1945 年 11 月 6 日与国务卿、陆军部长及海军部长会晤时，他以这样的词句来描述美国的窘境：“国民党必须有我国的支持才能应付局面。可是，如果俄国人决定积极支持中共，那我们可就真要乱套了。”

马歇尔将军徒劳无功地用来劝阻蒋委员长不要试图用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的主要论据之一就是，中共“可能被迫去寻求和依赖外国，例如俄国的援助。”而内战的扩大会提供一个理想的机会，“使苏联能支持中共，或公开支持，或暗中支持。”作为一个军人，马歇尔将军对苏联的战略位置的认识非常清醒。他曾提醒最高统帅说：如果苏联给中共提供援助，他们的运输线比美国的要短得多，也安全保险得多。

害怕苏联干涉中国还另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由于美国拒绝让苏联参加管制日本，那么，苏联人可能搞乱中国的局势，作为对美国在日政策的回击。美国对中国的武装干涉，甚至只要是美军在中国出现，都被认为可能增加苏联干涉的危险。

一方面，不在中国大陆使用地面部队的决定与一度强大的美军的迅速复

员，乃是作茧自缚；而另一方面，苏联进行对抗性干涉的可能性加上中共的政治军事力量，则从外部束缚着美国的能力和政策。如能清醒认识受到威胁的利益，解决美国对华政策问题的办法，乃是寻求一个战略上的解决。但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不久，有意识地同苏联寻求战略上的解决办法，在思想界并不占据支配地位。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先决条件都要求有个早已考虑好的政治决定——即美国在华有某个最低限度利益，它重要到必须用武力来保卫的程度。也就是说，必须在中国的某地划上一条线，来保卫这些利益。在中国采取积极行动的这一前提，正好是在美国政策背后牵线的基本假设的对立面。从已公布的记录中来看，从来就没有过一项如何保住中国、或部分地保住中国的、总体的战略方案。在麦克阿瑟的意见听取会上，在国务卿艾奇逊已准备就绪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构划出美国在 1945 年至 1946 年时的三种可能的抉择。即：1. “或者从中国撤退”；2. “或者将无限的资源与一切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以便打败共产党人，驱除日本人，并从满洲驱除俄国人”；最后 3. “或者提供各种形式的重要援助给中国政府，用各种方式保持中国的和平，并[在国共两党之间]达成协议。”然而，在这三条中就是少了一个方案：即以明确的、公开的，或以含蓄的、打着松散的联邦旗号的方式，在美国、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划出一条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来。该线将能充分保护美国安全的最低限度的利益，同时也反映了有关双方的相对的军事政治力量。

（8）不干涉政策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

马歇尔将军的建立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与把各党派的军队合编成一支国民军的方案是美国战时政策的继续，也正是克拉伦斯·E·高斯大使和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试图要做但未能做到的事。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正式协议来解决中国的内战问题，它设想用民主、宪法的框框来约束双方的冲突。但马歇尔的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政治解决的战后方案，是紧密地、明确地与不使用美军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联系着的。它建立在正确的军事估计之上，即：没有美国大规模的、直接的军事干涉，国民党用武力镇压共产党的企图“可能导致政府的垮台”，并“可能导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这正是马歇尔将军在 1946 年一再警告蒋委员长的话。或者用国务卿艾奇逊的简单扼要的说法：“中国没有可用的力量能够以武力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只好采取谈判的办法。”

某些美国官员曾希望马歇尔将军倡议的政治军事协定能够抑制共产党的日益强大。正如关于中国的白皮书强调的那样，在马歇尔使华的头三个月中，国共两党签署的政治军事协定，“承认了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优势地位。”在制定政策上起过重大作用的约翰·卡特·文森特在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听证会上解释他在 1945 至 1946 年的想法：“我的观点是，共产党人将以少数派资格进入政府。而……通过支持蒋介石政府……[并]在我国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巩固中国政府，使它足以清除共产党。”换言之，他们的策略是：“让共产党人作为少数派进入政府之后，再用多种方法使他们受骗上当。”[126]那时，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正以少数派资格参加政府，可是他们后来都被成功地驱逐掉了。在那时，负责的美国官员们可能受到法意形势的影响。当然有些人在指出这种类似情况时，力图把马歇尔的使命说成是合理的。例如杜鲁门总统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关心人民的基本要求，就没有理由不能象欧洲的其他非共产党政府一样，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

但这个表面看来颇有吸引力的方案却有个严重的缺陷。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的弱点和共产党人所享有的公众的支持，马歇尔所赞同的国共两党问的政治军事解决方案完全有可能变得对中共有利，而不利国民党。如有有关民选省主席的条款及中央政府与“自治政府的最大单位”的省之间要“合理地分权，”必然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上控制华北、满洲和内蒙的若干重要省份。在这一方面，省和地方官员的民选，将给中共带来比他们自己在1945年夏提出的控制若干省的要求还要更大的利益。从通过选举所掌握到的省份出发，利用参加过渡时期联合政府的有利条件，利用根据拟议中的宪法精神得到的宣传和组织活动的自由权利，中共可以伸展出去夺取中央政权。共产党人对控制地方政权、参加联合政府及总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用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他们会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惜因意见分歧而导致停火最终失败。共产党人将要获得的利益，未必能用国民党人听从马歇尔的劝告而达成的军事协议所得到的利益来抵销。

在述及他的使命的后期情况时，马歇尔将军自己也认识到了这种可能性。1949年10月，在分析他所说的共产党人的急于逐条研究政治协定的心情时，马歇尔说：

他们[中共]无疑地认为：他们将在政治上获胜。因此只要能避免军事上的冲突，他们的政治地位就会更加改善；因为他们有纪律、有主义，还有一个团结一致对党。反之，他们觉得国民党只不过是一层薄冰，那下面的群众基础几乎等于零……。所以，如果他们在政治领域年遂了心愿，他们将会胜利……。共产党人想要控制政府将不会很困难，毋宁说是很容易办到的。

根据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说法，在1946年7月马歇尔将军自己也承认过：他促成的作为先行条件的1946年1月的停火“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

2. 美国与国民党中国里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

被某些美国官员们用来抑制共产党人的政治军事解决方案，可能反而会加强他们，除非国民党改变其不得人心的经济政治政策并使国民党获得新生，或者出现了新生的政治力量。考虑到共产党人的民众基础，考虑到国民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弱点，中共甚至能战胜新生的国民党和自由主义势力，除非美国用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来支援后者，包括使用直接武装干涉的手段在内。当然，新的政治力量毕竟能够更有效地使用美援，并有希望使美国能在中国用直接武装干涉办法保住一条防线。

要产生这些政治变化，就必须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可能的最大压力。如果直接的压力不能迫使其进行改革，那么就有必要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抑制或摧毁国民党内掌实权的若干派系，并扶植起另一些派系的权力。马歇尔将军无疑地认识到：迫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策和人员组成。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作证时，马歇尔将军说：

根据我的理解，我们的希望是，其他政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等等——能与无党派人士联合。希望他们能联合成一个集团，而最高统帅能支持他们。这个集团，我希望[原文如此]能从国共两党当中吸收成员并壮大自己。这些人士一方面包括那些被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所激怒了的下层国民党官员们，另一方面是那些参加了共产党，但并不是共

产主义者的人们……。这些人全都强烈反对现行的国民党政府体制。看起来从这两个方面能集合足够多的人，加上一些少数的中间人士，就能在国共两党间维持一个力量均势。尽管这样，我和我的同僚们仍很明确，国民党政府是完全不能用武力镇压共产党的。

与他的特殊方案不同，马歇尔上述的评论的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使国民党中国的各种政治成份的力量均势发生变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考虑到国民党政权的迅速瓦解，考虑到国民党为了生存而对美国的依赖性，如果美国对华有一个积极方案，它的官员们在政治活动的技巧上更为干练的话，美国使这个政府在政策上和组成上发生急剧变化，并不是不能办到的。

（1）美国与第三势力

不幸的是：马歇尔将军采用的特殊方案，在概念上和实施上有严重的缺陷。他的希望——使小党派及无党派势力增长的希望，要靠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才能实现。在有协议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集团将成为势力均衡的维持者。但当时蒋委员长坚持要镇压共产党的打算，却有意无意地给马歇尔的加强小党派及无党派力量的计划以致命的一击。

更糟糕的是，就在马歇尔将军认识到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改变政策的重要性的时候，美国的影响和力量——在马歇尔使华的大部分时间里——却在寻求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如果付诸实施会有利于共产党人的那些条款的情形下日益暗淡了。有关提高小党派及其他政治集团的地位和削弱反动集团的专制权力的事，美国什么也没有做。马歇尔极其小心谨慎避免偏向任何一个集团。正是在他执行使命期间，民主同盟的两位最杰出的领袖被暗杀，而其他自由主义者的领导人被迫到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避难。只是在他的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的使命失败之后，马歇尔将军才企图劝说各小党派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爱国者的组织”。他也曾试图运用他与政府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与1947年1月7日的公开声明（该声明在他离华后才发表）的影响，来提高这些政治集团的政治地位。

但那时各小党派组织已四分五裂。他们分裂成两个集团：一个是拒绝参加国民党占压倒优势的政府的集团；一个是准备参加政府，分享名义上的权力和声望的集团。前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制和迫害，已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共产党的影响。而后者，一般地讲，是由一些不太能干、威望较低的人组成，根本不能扮演马歇尔所设想的角色。如果从马歇尔使命的一开始就全力以赴的话，则建立第三势力的方案也许有更大的成功希望。

（2）美国与国民党内各派别

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国民党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它被分裂成若干尖锐对立的派系，这些派系的阵容是经常地在变化着的。最高统帅本人用建立服从其个人的军事政治权威的办法，夺取并保住对党的控制权。他以黄埔系为个人的军事工具，用来挖潜在的竞争对手如李宗仁将军，白崇禧将军及傅作义将军的墙脚，但这样做，就涣散了国民党用来对付共产党的总力量。在政治界领域内，极右翼的CC派是他的主要的力量支柱。国民党其他各派系，如政学系、“元老”派、孙科派都以不同程度的忠诚和热情来供奉最高统帅。各派系之间经常争权夺利、钻营高位，但最高统帅对这种情况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喜欢，因为即使在他的个人的追随者中间，他也经常操纵一派保持对另一派的势力均衡，以达到控制全局的目的。

由于黄埔系和 CC 派是分别操纵军队和党的两个派系，他们是马歇尔将军所认为的国民党必需进行政府和政策改革的最强烈的反对者。唯一例外的是，美国的武器装备主要落到了黄埔系将军们所指挥的军队手里。这样，无意中反而更加强了他们与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军事领袖们相颉颃的地位。尽管有较好的装备，但蒋的嫡系军队无论在抗战中或在内战中，除掉在两次战争的初期一度有过较好的表现外，大都表现得并不出色。相反的是，地方系军队尽管装备不良，但因环境恶劣，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反而表现得更好些。CC 派在政治领域内与中共的斗争，表现得同样无力。虽然很少有中国人像 CC 派首领们那样疯狂地反共，但他们的狭窄的心胸及独占政权的决心，使他们遵循着一种独裁和镇压的政策，这种政策把自由主义者与知识分子驱入共产党人的怀抱。CC 派一方面与共产党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全神贯注于抑制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权力。他们的策略正好对中共有利。[127]这样，cc 派与黄埔系，就成为美国推行对华政策的主要障碍。马歇尔将军的改变中国政府的组成与政策的方案能否成功，全靠是否能压抑这两个派系的权力；全靠在可能的条件下，能否将它们改造成广义的反共联合阵线中的有用成分；全靠在必要时，能否撤掉它们的最反动的首领。马歇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在离华之前不久，他与若干高级政府官员们会谈时就强调指出：“有必要从政府机构中驱逐出那些占压倒优势的军事集团和反动分子”，并为“中国的那些更优良的分子提升到最高级职位，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 1946 年末到 1947 年初，美国的行动发挥了作用。它迫使国民党政府压抑了反动派别，尤其是 cc 派的作用，加强了其他派系的力量。在 1947 年 1 月 7 日宣告其使命失败的声明中，马歇尔将军痛斥了国民党内的“占支配地位的反动集团，”其严厉的程度不亚于他斥责共产党人。在无数的文电中，司徒雷登大使表明：他很清楚地了解 CC 派的破坏性影响。在有武器军火禁运为先例的背景下，1947 年初马歇尔将军采取的“等着瞧”的政策，发挥了抑制反动集团，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自由主义集团的影响。但基于种种理由，在这个方向上的美国的行动和政策又是过于犹豫不决的，这使它们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而且有时它们的作用甚至会互相抵销。反动集团长期操纵国民党政府，足以使它的政权垮台，而其他派系则无法很快取得足够权力，使他们能与国民党外的自由主义者集团联合成一个新的有效的政治势力。

（3）美国企图把西方的制度引进中国

美国官员们在企图把西方制度引进中国的时候，没有认识到：1. 西方制度对中国一点也不适用，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适用；2. 进行体制改革的努力，可能被灵巧的政治手腕及其他因素轻易地抵销；以及 3. 进行体制改革，即使制度本身是很理想的，也很可能起到削弱那些美国原想要帮助的集团的作用。第一点的一个例证是：马歇尔将军曾想建立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或至少对日趋严重的军人干政现象加以限制。他倡议在江南建立一个基本军事训练的体制，并制定了一个方案，他希望这个方案“应这样地进行，[以]使军人干政现象不能复兴。”尽管最高统帅及其他国民党人急切地希望能得到基本军事训练体制，来加强对他们自己的军队的控制，但采纳马歇尔将军的倡议，如果不算是破坏的话，也将严重削弱他们的权力的基础。在中国，可供美国选择的现实主义抉择。不是一头是文官统辖军队，另一头是军人干预政治，毋宁认为真正的抉择是由哪个军人集团继续掌权。一组军人集团，

包括最高统帅在内，表现为不能与美国政府有效地合作；而另一组军人集团大概能更好地与美国合作，更乐于跟自由主义者们、知识分子及文职官员们共同工作。这样，马歇尔将军的计划当然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用灵巧的手腕来抵销体制改革的预期效果的事，有以下例证可以说明。1946年6月，中国开始了军事上的大改组。部分地作为一种姿态以表明政府有诚意进行行政上的改革，部分地是为了表示愿意实现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马歇尔将军来华不久即举行的，并得到过他的同意的一个会议——的决议。倡议改革者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建立文官统辖军队的原则，并使其他政党都能通过行政当局来控制黄埔系。军事改组包括废除独立于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之外的国民军军事委员会，并成立一个隶属行政院之下的国防部来代替它。新建部的组织细则，严格地遵循美国的统一指挥的观点和美国陆军部的组织法。表面上看，这是听从了美国的劝告，美国官员们对此表示赞许。[128]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它却偏离了美国的经验：即参谋总长可以有权不理睬、甚至抵制国防部长的命令。为了表示遵从美国的意见，素负盛名的中国最优秀的战略家、桂系集团的主将白崇禧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但黄埔系的高级将领陈诚将军却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一方面参谋总长可以直接晋谒总统——蒋委员长本人，而另一方面新任命的国防部长必须通过行政院才能晋见。因此，建立文职官员控制军队和提高白将军威望的做法基本上失败了。

有时美国官员们提议的体制改革，反而会起到未曾想到的加强那些本想要压抑的反动集团的作用。在国共两党政治解决方案失败后，马歇尔将军曾以极大的努力，劝说国民党结束它的一党统治并创立一个宪政体制。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公开地、直接地从国库中提取经费。控制着党的机构的极右翼CC派集团，它的成员对经济工作一般并无多大才能，故而在政府经营的垄断性和半垄断性的经济事业中只占一个较小的份额。预期的结束训政一实现，就提出了对异常庞大的党的机构及其无数支部如何提供经费的严峻问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CC派控制某些经济活动，并大胆进入贸易财经领域，一开头可以由国库替它投资，或由它低价购进若干国营企业。

CC派集团的影响扩大到财政经济领域，更倾向于在削弱政学系的基础上加强它的地位，但政学系却正是美国企图要扶植的。正如司徒雷登在1947年4月5日致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谈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时所说的那样：

陈氏兄弟[CC派头子]正在努力渗入经济领域……。陈立夫想要当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学系]在巩固它对经济事务的控制上遭到挫败，因为CC派成功地攫取了中央托拉斯的领导权……。翁文灏[政学系首领之一]说，如陈立夫真的出任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话，他、可能还有他周围的同事们，将无法再在委员会内呆下去……。总起来说，看来占据政府要职的自由主义者的主要兴趣是在经济界，而CC派主要是控制党组织，控制军队的要害部分，并正企图渗入经济领域。看来两派之间的斗争还要继续下去。

司徒雷登大使的结论是：“在派系斗争中……看来CC派的地位在挫败其他派系的情况下变得更坚固了。”CC派扩展到财经领域一事有深远的后果，因为它减弱了商界和银行界对政府的信任，[129]而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如果要生存下去，没有他们的积极支持是不行的。形势的这一发展使国民党人完成了对国家的经济生活的垄断与半垄断性的控制。这就有利于共产党

人大肆渲染地攻击说，中国是处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无情的剥削之下。另一个新体制的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例证是：随着行宪有关的选举，CC 派更加强了。CC 派是国民党内最有纪律的一个集团。由于它控制了基层行政单位县长一级的人选，由于它支配着比县还要更基层的党组织，CC 派是整个国民党中国唯一能掌握选票和操纵选举机器的派系，特别是它能一直控制到农村。因此，在 1947 年 4 月 5 日，司徒雷登大使作出下列报告也就并非偶然了：“CC 派的主要力量，正用来筹备预定将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宪法生效前的选举。”在论及蒋委员长对 CC 派的依赖时，美国大使指出：

自相矛盾的事是：尽管他自己还意识不到他已被迫利用 CC 派所供给他的一切条件，但这个派正在利用其优势地位来更牢固地控制党和国家。随着时间的流逝，最高统帅因此也就越来越离不开他们，也不能限制其活动；而正是他们的活动，也使社会状况更加恶劣。这一切正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力量的根源。

据白皮书的记载，当选举日来临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于 1947 年 9 月 22 日报告说：这里的 CC 派正在扩充它的力量并支配着国民党的选举筹备工作，以确保在未来的选举中它的候选人都是“优秀”的党的拥护者，而很少有仅仅是为装饰门面的权术所需的政治乞丐。

在总结选举的结果时，对华白皮书是这样说的：“最后看来，新选出的国民大会和立法院内的最大势力，很显然是国民党的极右翼 CC 派。”就这样，在积极引进一系列的、想当然的西方体制到中国来的声浪中，美国官员们分散了他们本应用到建立新政治力量和压抑反动集团势力的这一主要任务上的精力和影响。在首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时，美国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说：“国民党的头头们把建立宪政政府看成是操纵政治机器的一场演习。”1948 年 4 月 26 日，司徒雷登大使电告华盛顿说：

最高统帅和党的机关对国大和新的[立法]院的选举的干预，对国大的宪法修正案的审议的干预，和对副总统的选举的明目张胆的干预，彻底说服了那些盼望有效宪政的人们，即最高统帅只不过是利用一下新宪法作为一种工具，继续进行他与 CC 派操纵的党的机关和黄埔系操纵的最高统帅部密切合作的个人统治，正如他过去的统治一样。

最后，由于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和一般人都对政府的政策不满，掀起了一阵对当权派系普遍的憎恶情绪，其程度是这样地强烈，使蒋委员长及其追随者们也无法阻止桂系军队首领李宗仁将军当选为副总统，无法阻止那些要求改革的人们被选为候选人。从外表上看，似乎宪法是进行政治改革的工具。但实质上，中国的政治现实并未发生有效的变革，正如新上任的副总统的软弱无能与孤立无助所明显地表示的那样。

（4）对蒋委员长的幻想

在战后的年月里，正如在太平洋战争时期一样，蒋总是设法让美国人陷入一种困境，要么就依他的条件给予他经济军事援助，要么就甘冒失去中国的危险。对蒋委员长的幻想使美国的官员们深受其苦。蒋通常总不是彻底、干脆地拒绝美国的劝告。他可以接受美国的提议，只要这些提议能够被修改成为在实践中能让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保持其权力地位不受影响就行。在国共谈判破裂后，最高统帅运用他的影响促成了宪法的制定，符合了政治协商会

议决议的精神——这一切正是马歇尔将军竭力劝告国民党领袖们采取的一个步骤。在这样做时，表面上看来，似乎蒋在竭力表现他领导这一工作的个人的坚强决心，并努力与各派系及社会名流和谐合作来反对极右翼。从各方面来讲，宪法都是一个极好的文献，[130]它的制定颁布曾被马歇尔将军誉为最高统帅的一次伟大的、道义上的胜利，这一胜利“如果不是增加的话，也是恢复了他的威望。”于是，马歇尔就劝告蒋委员长，“他应该用间接领导的办法，来哺育一个少数派别的联合，使他们联合成一个大型的自由主义者政党。”并且说：“将各小党派组成一个大的自由主义者集团，将对他大有帮助。他就可以成为一国之父，而不是只当一个一党政府的国民党领袖。”他提出这个劝告，乃是遵循他的“在最高统帅之下建立自由主义者团体，同时排除反动派影响”的计划。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宣布训政结束，并在改组政府中，容纳了两位小党的成员。在改组中，政学系担任了许多政府要职。这些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官员们感到满意。正如司徒雷登大使在1947年4月19日的报告中所说：“从行政院的组成上看，国民党员与非党人士的比例，在这种情形下，就算是最好的了。”1947年6月18日，美国大使向国务院报告说：

他[蒋委员长]在抛弃先人为主的偏见方面及采纳新思想方面已如此地进步，我相信能推动他更加进步。除了作出一些表面姿态外，蒋在实质性的行动上可能要慢一点，可能还不能令人满意，但确有此种可能性，而且也许是相形之下最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

然而很不幸，这些表面变化并未从实质上改变CC派对党机关的控制，也未改变黄埔系对军队主力的控制。它并未改变蒋对这两个集团的依赖和信任。值得注意的是，桂系集团的成员及其他地方系首领如傅作义将军等人都是能够取代黄埔系的现成的替换者，但他们却在改组中没有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确实，政学系的人当上了行政院长及其他若干重要部的部长，但这一良好趋势却被CC派势力扩展渗入到财政经济领域这一事实所抵销了。在这种情况下，改组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从这个时期的外交官员，使领馆人员发回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官员们并不是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但这时他们仍为蒋委员长的空洞的姿态所迷惑，依然相信可以在他的领导下形成新的政治力量。这种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形成新政治力量的政策，立足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蒋可以经历一次精神上的改造，可以放弃他终生信奉的政治信条，可以割断与他的追随者之间的联系（正是依靠这些追随者，他才取得并保持对中国的统治的）——这一切都可以办到，无需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注定了要纠正这种看法。司徒雷登大使在1948年2月6日报告说：“最高统帅尤其更应该下定这个决心。但他仍然摆脱不了已往的习惯，他不能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当蒋委员长解除桂系白崇禧将军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并拒绝采纳他的组织地方民团的建议时，美国大使在1948年6月24日向国务院报告说：“看来他[蒋委员长]是在疑心桂系在搞阴谋反对他。这样他就疏远了、或至少是丧失了那些人的有效的合作。而这些人都是久经考验既忠于他、又忠于国事的。”1948年8月10日，司徒雷登大使报告说：

[长]期与他[蒋]相处的经验说明：他再也不可能改变、改造或抛弃那些颀颀无能的

同伙，并起用一些更有才干的人来代替他们；……。它[国民党政府]不采纳有效的军事建议，不能抓住呈现出来的有利战机，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及军事指挥的继续恶化。这是因为最高统帅不是根据军事才能而是根据这个人是否忠实可靠作为任用的基础的。

在 1948 年 10 月的政策调查会上，国务卿马歇尔本人也对大使说过：按照已往的对最高统帅施加压力使他撤换无能者的经验来看，这种做法往往是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的。

（5）蒋是不能撇开的人

在马歇尔使命失败后，国共两党不可能在一个立宪政体中共事这一点已很明显了。如果此时美国没有那种离不开蒋的幻觉，如果它认为它在中国的利益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它下定决心要阻止共产党人扩展其控制到全中国，那么，合乎逻辑的进程应该是：它应运用它的巨大影响来使政府的领导集团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使另一些首领们来取代蒋。在蒋的军队的攻势未能达到目的时，或在他的军队转入劣势时，或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到使中国政府非得依赖美国的直接支援才能生存时，在这些时刻都可以采取上述步骤。

显然，蒋委员长本人担心的事是：1947 年夏季的美国政策是撤换他。当中国危机的加深导致马歇尔将军派出魏德迈将军为首的实地调查使团时，蒋委员长于 1947 年 8 月 25 日在他的住所召见了司徒雷登大使的华裔私人秘书菲利普·傅，并向这位美国大使的亲信探问，派遣魏德迈是否意味着美国想要强使他退休或撤换他。一年多以后，美国大使劝蒋退休的机会确实是来临了，那时美国大使对蒋的幻想才算是彻底破灭了。事实是，即使没有美国的强大压力与积极劝告，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演变，蒋委员长也在 1949 年 1 月被迫退休了。但是，他还运用剩下的权力，成功地阻碍他的继任人，使其不能有效地控制中国的事务。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压力和手腕能否成为取代蒋的运动的催化剂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反蒋的那些政治力量，是否能在美国的扶植下很快得到发展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蒋能否被很快地取代，快到来得及进行一场抢救中国的战争的问题。[131]

但一直到最后，对于在中国形成没有蒋委员长的新政治力量的抉择，从未得到认真的研究，更未被认真地执行。在魏德迈使华期间，对蒋委员长能领导新政治势力的幻想，还没有烟消云散。当对蒋的幻想破灭时，美国官员们的苦恼是：蒋是别人不能取代的、撇不开的人。1948 年 4 月 23 日，司徒雷登大使告诉国务卿马歇尔说：

我不认为：他[蒋]是通常意义上的自高自大或迷恋权力的人。但他却是危险地自以为是和十分自信。他认为比其他任何别人更了解情况，也更富有经验。他作这样的论断基本上是对的，也确实没有别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这就使这种情况更加可悲可叹。

晚至 1948 年 8 月 10 日，美国大使曾简单扼要地说出了美国官员们所认为的美国政府正面临的困境：

大家都批评最高统帅的领导不力，可是大家都提不出可以取代他的人。只有他才是那能把这个广袤的国家捏在一块的人物。如果没有他就必然要分崩离析。……但除非他能动用一切力量来扭转目前的形势，否则他将不可避免地被踢下历史舞台。[132]

马歇尔将军从未找到这个中心难题的答案。在 1949 年 10 月国务院召集的对华政策会议上，他说：“经常有压力要求甩掉蒋介石，但谁也提不出可以取代他的人；或至少谁也没有向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能够应付局势的人，使我多少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用这样的固定眼光来看待中国局势，马歇尔将军认为中国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美国面临的这一困境无疑地是真实的。但这也大部分是由于蒋委员长的政治手腕，加上美国在无意中帮了他的忙而造成的。一方面对共产党作战；另一方面，他也在挖那些不肯无条件服从他的国民党首领们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墙脚。他的政策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不能统治，宁可灭亡。在他支配国民党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他建立起一支强大的追随者队伍，这些人对他个人的忠诚是高于一切的。1948 年初，李宗仁将军违背蒋的意旨参加副总统竞选、并有可能对蒋的统治权进行挑战时，最高统帅曾宣称自己要退出总统的竞选。但几乎即刻间 CC 派就表示：它拒绝与任何不是以蒋为首的政府合作；而黄埔系则威胁说：如果要他们在舍蒋以外的总统的指令下服务，他们宁可去投奔共产党。在这种情形下，他当然看起来是唯一能把中国捏到一块的人物了。

美国的消极政策也帮了他的忙。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的生存全靠大规模的美援的时候，蒋委员长从来不准许美国对美援附加上有效的政治条件。当 1947 年 11 月国务院在考虑一项高达 3 亿美元的美援时，[133]国民党政府曾提交给司徒雷登大使一项备忘录，特别提出：“美国的援华计划，不得附带除掉象援欧计划中可能附带的条款之外的任何政治条件。”它还照会美国政府，当中国在财政、货币、及其他行政改革的计划中自愿雇用美籍人员协助工作时，“为了避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行政权力的完整，对雇用这些人员无论如何也不应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国际间的条约义务。”当议会在辩论援华法案时，据报导说，孙科博士曾在 1948 年 3 月 13 日称，他担心美援将会侵犯中国的主权。孙还说：“中国应坚持有拒绝美国劝告的权利，如果这种劝告是不能接受的话。”结果，1948 年的援华法案没有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虽然其中有些条款限定经援的使用范围，那也只是保证中国人民能得到一些直接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看到美援有望，就更加加强了蒋委员长抓住权力不放的决心，尽管局势在日益恶化。在论及蒋从政府退休以便使内战能取得一个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时，美国大使馆于 1948 年 3 月 18 日向国务院报告说：“我们认为：只要他认为他有希望获得足够大和多的军援，足以支持他赢得一次军事决战；或者足以使内战延长到形势发生变化，以致能迫使我国站在他那一边进行决定性的干预的话；他就一定不肯那样做[指退休]。”此时，议会正在审议援华法案。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军事援助的流入，更加强了他的地位，使他更能对付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地方系国民党首领。1948 年 8 月 24 日，美国大使馆向国务院报告说：

持不同意见者不愿[与蒋]公开决裂，很可能是因为现任政府对他们仍起着一些必不可少的作用。现时，最主要的是：

南京方面起着分配美援给各省的作用。我们已非常明确地表示要支持南京政府。我们也已表明，在经援的分派上将同南京政府磋商，而且人人皆知军援如何安排将全由南京

方面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离不开美援的、潜在的意见不同者就与南京非常牢固地维系在一起。

（6）干涉和承担责任的问题

美国扶植新政治势力的企图失败，也是由于美国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使用了权力和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这种责任就会跟之而来。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负起这些责任：即或者是美国对华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或者在必要时美国肯用武力进行干涉，以便至少在一部分中国土地上保存亲美的政权。既然马歇尔将军把他的政策立足于绝对不应在中国大陆使用美国军队的原则上，既然他不计划在他的使命失败后给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因此，美国政府不倾向于采用任何能决定性地改变中国政治条件的行动。

1948年7月17日，司徒雷登大使谒见蒋介石，敦促他与其他国民党首领们调和分歧，并团结起来拯救中国，以免沦于共产主义。在报告他与蒋委员长的会晤后，美国大使告诉国务卿马歇尔说，除能提出劝告来影响中国政局的发展外，他无法更进一步。他解释说：“任何较已做的更进一步的敦促他的努力，或者就意味着提供较可能提供的还要更多的美援，再不就是要变成强行说服，使他放弃他自己的看法。”1948年10月，满洲的重要城市长春失陷，政府的权威很快地开始土崩瓦解。司徒雷登大使曾就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问题请求指示。其中之一是：

我国是否劝告最高统帅退休，使李宗仁或其他政治领袖来代替他，以便组成一个更有希望的非共产党的共和政府，以便能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反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

对这个问题，国务卿马歇尔答复说：

美国政府不宜持这样一种立场，似乎是它在劝最高统帅退休，或由它指派其他人担任中国政府首脑。如果提出这样的劝告，就等于是承担由于对方接受这个劝告而产生的责任。并由此推论美国政府还必须不顾美国的利益，承担支持继任政府的责任。

（7）蒋威胁要单干，并寻求苏联的援助

在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蒋委员长是依据这样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行事的：即美国离不开中国，而中国则离不开他。在要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战时政策和门户开放的原则下，美国采取消极政策及拒绝为中国的事务承担责任一事，并未能使蒋清醒，使他认识到美国有让中国听天由命的可能性。于是，在与共产党人作战的过程中，他满有把握地认为：当他企图对美国施压力时，他可以用单干和与苏联取得谅解来进行威胁。这样，当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经济、政治地位急遽恶化时，美国就面对着一个非常滑稽的局势。一方面，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及反共首领们，对美援作为挽救这个政府的手段表示几乎是完全依赖的姿态；另一方面，最高统帅却频频宣布他决心不依赖美援。1947年3月3日，司徒雷登大使报告说：

最高统帅并非没有希望：美国会在适当的时刻用某种方式给政府以某种程度的支援。无疑使他越来越关心财政恶化的速度，关心共产党人持续作战及制造骚乱的能力。但他坚持告诉每个来访的中国人说：中国必须自立，并在无美援的条件下面对未来。

在魏德迈使华的末期，在无条件的美援显然不会马上就来时，蒋委员长于 1947 年 9 月 9 日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中国今后将不再依赖美援。

威胁要单于是蒋的策略的又一侧面。在试图对美国施加压力时，国民党官员们玩弄了与他们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同样的花招。当他们乞求大规模美援时，他们利用了美国害怕出现苏联控制下的中国的心理，正如他们曾利用过美国害怕中国的抗战全面崩溃的心理一样。当美援不能马上被批准时，他们威胁要与苏联改善邦交，正如他们曾利用美国害怕中国单独与日媾和一样。因此，正当魏德迈受命派赴中国的前夕，国民党官员们强调指出了苏联对中共的物质援助，强调指出了俄国人在中国边界地区的侵略性姿态，强调指出了可能出现俄国人控制下的中国——除非美国很快就向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

但是，当魏德迈将军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引起了他们的憎恨，当很明显不会马上有大规模的对华援助时，国民党官员们马上就忘掉了他们关于苏联的侵略野心及援助中共的声明，而代之以企图与苏联改善邦交。1947 年 9 月 9 日蒋委员长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说：中国的对日政策与苏联一致，在保持与美国的传统友谊的同时，中国也盼望加强与苏联的联系。最高统帅提及苏联时的和善语气，“由政府的高级官员们用几乎毫不掩饰的提议来加以发挥。显然，这是为了说服[美国]大使馆，如果不能很快地提供美援的话，中国就有必要寻求苏联的援助。”司徒雷登大使进一步报告说：“他们甚至曾向大使暗示，可能请求苏联驻华大使……调停内战，而他会乐意接受这一邀请的。”美国大使的结论认为：此类谈话主要是为了“要对美国发生影响”。

国民党官员们的公开声明有着不祥的音调，显然针对魏德迈使命，据报导说，CC 派首领陈立夫先生曾在 1947 年 9 月 2 日说：“人们需要物质援助，但如这种援助损伤了他的自尊心，那他宁可不要物质援助。一个人如果有自尊，他总能得到帮助。如从这一来源得不到，还可从另一来源得到。”孙科博士则宣称：魏德迈使命的后果是，“将告诉中国究竟是站在美国一边好，还是站在俄国一边好”。他解释说：“中国在强国的争衡中，应该从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善自斟酌。跟谁结盟不能从感情出发。每一方都要考虑它的民族利益。”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获得的成功不同，蒋和他的高级官员们的威胁并未达到他们的主要目标，即将美国拉进中国的内战或至少从美国获得大规模的经济、军事援助。相反的是，这种策略正好起到了反面的作用，它使美国官员们更加不愿对华采取积极的政策。

（8）蒋的不能统治宁可灭亡的政策

蒋的不能统治宁可灭亡的政策，是他不能抵御毛的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发展“进步力量”的策略的重要原因。用狭隘的眼光看问题，并决心不顾后果地垄断一切权力，这使最高统帅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无法在大陆上生存。而他的政治的和外交的手腕，又同样地使其他政治领袖无法取代他的地位。以这种顽固的精神和手腕，他在美国官员们的心目中种下了深深的失望的种子。马歇尔将军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中国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据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特称，马歇尔曾在 1947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国务卿、陆军部长及海军部长的会议上说：美国面临“由中央政府的无能、无效率和顽固精神所造成的困境——它的这些品质使别人很难帮助它。”在解释美国对希腊与对华政策的差异时，马歇尔将军说：在希腊，美

国通过经济、军事援助“对希腊政府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在中国，美国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当在太平洋战争时的等价交换政策的主要鼓吹者之一马歇尔在 1947 至 1948 年终于抛弃这个政策时，他同时也接近于把中国当成蚀本生意而将它一笔勾销。对国务卿艾奇逊来说，可供选择的现实主义的唯一政策就是：“站在一个失去自己的军队和人民的信任的政府一边，进行全面干涉。”这正是蒋的政治外交手腕所要提供给美国的抉择。论及这一形势时，司徒雷登大使在电文中写道：

人们不止一次地说：他[蒋]乃是共产党人的宝贵财产。因此这就很滑稽，他不肯象别人一再地劝告他那样，交出直接的指挥权，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就等同于使共产党人占领全中国。因此，照美国许多人的明显的看法，他在思想上一切都是混乱不堪的。似乎美国给他军援，乃是可以避免共产党占领全中国的唯一的抉择。[支持一个失去自己的人民的支持的人]必然激起更多的人同情[共产党的]事业，并激起强烈的反美感情。

蒋委员长抓住政权不放，也破坏了那些最强烈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的事业。在整个 1946 至 1949 年间，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运用美援，不能全心全意地跟美国合作，不接受美国的劝告，并拒绝进行必要的改革。即使在 1949 年 1 月由于满洲和华北的溃败迫使蒋委员长从总统职位上退休、而李宗仁将军正式接替了他的职务之后，忠于蒋的军队仍然拒绝服从李将军的命令。而蒋自己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企图在幕后操纵政治局势。其后果就是：使李将军无法再保卫住中国的任何一部分土地。[134]只有美国长期地、有意识地干涉国民党的政治，也许能迫使最高统帅早日退休，才能为成功的武装干涉创造必要的条件，才能有效地运用军援，才能有效地实行美国的劝告。然而蒋的事业的支持者们，正如马歇尔一样，全都认为无人能取代蒋的地位，并做出正好相反的结论。[135]这样，美国就只能按最高统帅定下的调门来进行对华政策的讨论。

3. 检查一下基本假设

当中国的崩溃正在酝酿中的时候，很显然美国是根据下列的假设行事的，即：美国的在华利益不是根本性的，中国是她的盟国的负担。再有，她不可能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在 1948 年 2 月，国务卿马歇尔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内部会议上说：

中国自身没有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变成第一流军事强国所必需的原料和工业资源。这个国家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和政治的革命。除非完成这场革命——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还看不到建立充分的稳定和秩序，使中国早日发展成为强国的前景。

在 1948 到 1949 年间，专家们的看法绝大多数都与马歇尔一致。中国在八年抗战和巨大的破坏性的内战之后能够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样的事，看起来是不可理解的。重建残破的国家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即使中共有一个比较有效率和诚实的政府，并能给国家带来某种稳定，中国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和众多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是：重建国民经济，保证人民有象样的生活，及从生产中提出剩余来支持政府的问题。在估价新政权解决这些“最低要求”

的能力时，美国大使馆于 1948 年 11 月 8 日向国务院报告说：“我们蛮可以提出质问：新政府有没有这样的能力？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回答似乎是否定的。”[136]即使新政府能经得起争取生存的这一基本考验，一个贫穷而没有工业基础的中国，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这样的国家大概会成为它的盟国的负担。1949 年 4 月 24 日，詹姆士·雷士顿报告说：“按政府当局的眼光：中国不是‘战略跳板’，而只是‘战略泥坑’……。它是一个幅员辽阔、交通不便、组织松弛的大陆。其居民是营养不足、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民。”[137]

如果不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模式来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一直以一家一户的农业为核心的文化模式，中国的迅速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认为：这个基本模式在近百年来受西方影响，已经进入瓦解的过程。但是，许多传统的习惯仍然存在。而建立新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体系的要求，总是跟不上世界的发展。考虑到折磨国民党政府并妨碍美国的援华努力收效的困难条件，人们非常容易地得出结论：中共也不能克服这种文化上的障碍，并迅速走向工业化。[138]加上中共解决工业化任务的办法，用的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由于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剧烈的矛盾，很自然人们就要得出结论说：这种意识形态的包袱，将成为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障碍。[139]

与美国、苏联和西欧不同，人们认为：中国高水平的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天然资源是贫乏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穷困到了极点，人们认为：它无力积累起任何快速工业化的纲领所必须的庞大的、创始阶段的投资。人们认为：苏联无力向中国提供必须的经济、技术援助。[140]中国迅速工业化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因此无需对中国感到惊恐不安。[141]从这一对中国和苏联的经济能力的分析出发，人们就夸张地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必须依赖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共将依赖对美贸易来实现其迅速工业化的纲领；并认为这种对美贸易的依赖加上美国传统的对华友谊，可以成为两国之间妥协的基础。

上述这些分析都有一个正确的内核。尽管共产党人的工业化纲领取得了惊人的初步成就，由中国的贫穷根子及外援不足所造成的沉重负担和紧张状况，开始显现出来。人民公社制度，一部分是根据中国的实情，一部分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理由，连续三年引起了农业危机。大跃进变成了大撤退。即使对一个有勤俭艰苦传统的人民，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但这一切分析均未充分估计到新的政治因素：即，一个运用各种控制社会的工具的极权主义政党，在操纵群众态度、组织社会生活、与利用剩余劳动作为资金来源，为压倒一切的迅速工业化的目标服务的能力。（至少直到 1959 年为止，是以此为目标的）这是一种崭新的尺度，它是一直沉浸在自由社会的自由、民主气氛中的美国专家们和官员们所无法掌握的一种尺度。到那时为止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向，虽然也强调社会力量在政治行动中的决定性影响，但仍然同样缺乏正确估价这种情况的思想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能深思熟虑地和井井有条地试图操纵社会环境。西方社会科学这种决定性的偏差，显示了一种知识脱离实践的倾向，它马上就引导西方过高估计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困难，并过低估计自由世界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这正是它的自满情绪的基本根源之一，也是它在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不能采取积极纲领的根源之一。

对中共面临的困难作如此分析，还不仅是由于缺乏深刻的危机感。由于

美国对华有传统的友谊，及它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支持，许多美国人都低估了中共对美国的敌对情绪。更有人过高估计了中国民族主义和亲美感情对中共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制约作用。于是他们就不能恰当地估计决定中共国际行为的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他们有意无意地期望中共与苏联之间会以中国民族主义对抗苏联控制的形式爆发冲突。正如 1949 年 2 月 C.L. 苏斯贝格在报告说的那样：“很明显，美国决定政策的人们指望中国的民族主义会在毛泽东政权下反对苏联，正如其在蒋介石政权下反对美国一样强烈。”加之 1948 年不仅标志着国民党的决定性的军事溃败，同时还表现为铁托与斯大林之间的突然决裂。看来似乎是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阵营的意外的分裂，鼓励了很多美国人，使他们期待发展中国式的铁托主义，发展这种主义的一切条件看来是全部具备的。正如詹姆士·雷士顿的报告所说：“我们有些官员相信，只要他们能控制局势，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袖可能会表现出‘铁托主义’的迹象，”虽然“最高级的官方人员并不鼓励这种想法。”[142]从那以后，苏联和中共间确实出现了争论。裂痕的扩大采取了在对付西方的革命战略上的分歧的形式。北京主张采取一种对美更富有战斗性的政策。

当马歇尔关于中国并不重要的基本假设被北京干涉朝鲜战争等一系列事件所推翻时，把美国政策失败的责任推到他或其他政府官员身上，乃是一种党派偏见。他的方案是立足于对美国能力的实际限度的估计之上，立足于他对美国人民愿意为中国做哪些事的判断之上。有各种理由相信：他对美国的行为的两个界限的判断是正确的。武装部队的迅速复员、美国人民不愿送子弟去中国为一个腐败政府作战的心理、在没有是非分明的道义上的争端与美国的生存未受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不肯用兵的心理，乃是一些马歇尔完全不能控制的条件。在马歇尔看来，共和党人提出的大规模军援的方案是超出美国现有力量之外的，而且冒着使美国卷入武装干涉的严重危险。武装干涉或任何足以导向武装干涉的严重危险，只有在另一些情况下才是可行的抉择。即：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已遵循了另一条外交路线，并作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假设和考虑。即使真的有了这样一种思想上的革命性的变化，仍然无人能决定性地证明：对中国政局的武装干涉和积极干预，能达到在一部分中国大陆上保住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目的。无人能保证这种做法能更对国家有利，甚至可以说是追求着更惨重的失败。历史可能仍要证明：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实在还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

假定在客观上限制在中国使用武力的因素不变，马歇尔的从中国撤退，以便集中力量到欧洲的政策，乃是唯一可行的政策。紧接着作出以上贬低中国的重要性的声明之后，马歇尔又说：

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我们负担不起，无论在经济上或在军事上，把现任中国政府的不断失败接替过来的责任，以致分散我国在更要害地区的力量。在那些地方，我们更有希望来成功地应付或挫败共产党人的威胁。也就是说，那些有自由政体传统的西欧的极端重要的工业区。

马歇尔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方案，乃是一个避免军事卷入的办法。它将使美国体面地从中国脱身，虽然它并不是为此目的被设计出来的。在马歇尔赞同的解决办法下，中共或迟或早会夺取对中国的控制一事，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用费正清教授的话来说：“看来相当明显，内战较联合政府使

共产党人更快地获得对中国的支配权。”马歇尔犯的可以避免的错误乃是：在中国局势的发展证明联合政府为不可能、他的调解努力落空以后，他既未能使限制美国对华承担的政策得到美国国内两党一致的坚定支持，又未能在得不到支持之后，公布一切有关情报，并尽早使公众辩论他的政策。在 1947 至 1948 年，他的政策和观点，不管它们有哪些内在的优点，很有可能会被美国人民批准的。但不幸得很，他压下了魏德迈 1947 年 9 月的报告，压了几乎两年，又未能在适当时期向美国公众公布实情。他未如此做结果导致了两党分裂，并使政府的批评者们把中国失败的责任全部加到政府的头上。不论一个人如何评价马歇尔的政策和他的自作主张的行动，马歇尔决定不承担武装干涉及相应地不向国民党中国提供大规模军援及作战咨询的决策，乃是构成他的政策的核心因素，并对其政策的其他成份发生着显著的影响。对这一切都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人们不能证明武装干涉或大规模军援能阻止共产党人的全面胜利，他至少可以得出结论：缺乏那种立即可用于干涉的兵力，乃是不能支援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马歇尔是力求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缺乏兵力的程度，是日本投降后迅速复员的产物；它也是由于美国人民不能预料中国的战后形势并保持足以左右它的必须的兵力所致。美国个别官员能预料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的程度，也就是与之相应的缺乏兵力的程度。这种缺乏兵力，正说明一个国家不愿意有目的地扩大军队与使用军队，以求达到其在中国的目标。人们可以辩论说：即使美国愿意在华使用军队，但美国主要是海空军强国，它对苏联和中共的地面部队不能作出任何有效的行动。换言之，还不仅是现存的兵力问题，也牵涉到美国军事潜力的绝对界限问题。或至少可以用白皮书的说法，是美国能力的“合宜的限度”的问题。那是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的美国政策的不可避免的条件。从这个观点出发，目前的远东势力均衡，以大陆上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地面部队为一方，美国的海空力量以环形岛屿为一方互相对峙，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同样，这样地辩论问题，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否定。但是，使人们感到惊异的是：如此估价美国的军事潜力，其本身就说明了美国不愿意用武装力量达到其在华的政治目的。如果人们不光是只研究战后的美国远东政策，而一直研究到发出海约翰的通牒的时期，人们就会发现它的一贯的、决定性的特征：并不是美国的军事潜力的绝对界限，而是美国不愿意，有时是不能够有意识地发展和运用它的军事力量，来达成它誓欲达到的政治目标。一句话，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中，美国曾发展了它的巨大的海军潜力来支持它的门户开放政策，来防范日本岛屿帝国的侵犯。在太平洋战争中，由于军事目标是要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所以它帮助形成政治上的政策，而未帮助形成指导战略的政治目标。这种一贯的、不能有目的地运用军事力量实现政治目标的特征，看起来不可能在战后就会突然消失。从这个观点出发，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可以被解释为美国政策的一贯特征，在不同情况下的新表现。它可以被解释成为导致目前远东力量均势的新添的环节。这种趋向在 1944 年提出不在中国大陆进行任何大规模战斗的思想时，早就预示出来了。

第十章马歇尔使命

为了说明马歇尔支持中国的目标的失败，在上一章分析马歇尔的对华政策时，我们是按逻辑顺序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来展开的。在本章及下两章中，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及艾奇逊对这个政策的继续，是按它们的自然的历史背景来叙述的。希望这样做能说明，美国为什么在马歇尔的调解努力垮台之后，未能迅速地、彻底地从中国解脱出来。对本质是同一主题的这样处理，先用逻辑顺序后用历史顺序，就使一定程度的重复成为必要。但这样能更便于分析一些有关的复杂问题，也能更充分地阐明：为什么美国一方面拒绝武装干涉和大规模军援，另一方面却没有迅速、完全地撤出。

1. 美国的政策与注定要失败的在华和解方案

（1）美国政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马歇尔带着上一章一开头就说到的、精心设计的方案于 1945 年 12 月 20 日到达中国。要理解马歇尔方案的影响，有必要扼要说明一下国共两党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的各自的政策。这时，国民党政府在武装力量方面与共产党相比，以五比一占有优势。有美军帮助空运并输送国民党军队到日本占领区，国民党能够重新建立起它在大城市里的统治，并进入一种能重新打通通向华北的重要交通线的地位。同时，由于共产党人将统治扩大到华北农村，尤其由于获得日本在东北的军火，他们的地位也加强了。但国民党仍在军事上占优势。因此，蒋委员长在军事上向前挺进，以便将共产党人从要害地区驱逐出去；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与他们谈判，部分地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和平的要求，部分地是希望共产党人能在军事重压下接受他提的条件。在共产党方面，他们的对策是隔断国民党的交通线。同时他们要求无条件停火，要求停止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华北。国民党政府只肯在这样的条件下停火，即必须恢复各重要据点的交通运输，共产党人必须撤出各铁路沿线。

在政治领域内，国民党政府坚持要求“军令统一”，即将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国民军乃是它停止军事攻击的先决条件，并要求在实施宪政、建立民主政体之前，就先实现军队的统一。由于中共的生存全靠自己有军队，如接受国民党的要求就意味着政治自杀，因此，共产党人争论说将共军编入国民军的问题，只有在宪法实施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才能实现。由于国民党的群众基础非常狭窄，而共产党则享有广泛的群众性支持，建立真正民主的政体，将使国民党在不久的将来注定要在政治上失败。因此，国民党提议：只能按它提的程序和条件来结束训政并开始实行宪政，以保证不会发生任何重要的变革。

要做到这一点，它采取的步骤是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是在 1936 年当国民党为唯一合法政党时期选举产生的。这个立宪机构将通过一项由国民政府所草拟的宪法，规定有全权的总统，软弱的立法分支机构，及高度集中、统一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只有极少一点权力。这一切将保证国民党继续控制一切。而相反地，共产党人却主张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来讨论并准备实行宪政。这一代表会议将结束国民党的一党政治，并成为新的法统的根源。由于共产党人认识到他们没有希望立即掌握行政机构，他们就要求建立强有力的立法机构，以便能约束国民党内阁的权力。由于他们认识到不能立即掌握

中央政府，他们也就要求各省有较大的权力，主张民选省主席，民选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他们认为：他们在基层的支持者，将使他们控制若干重要地区。

为了装出它的建立宪政的纲领有群众基础的样子，国民党人并不坚决拒绝召开各党派会议——只要这个会议能批准国民党召集旧国大的计划，批准其通过一项能使他们永占支配地位的宪法。当1945年10—11月间，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愈演愈烈的时候，政府要求早日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相反地，共产党人此时却拒绝提出其政协代表名单，以避免在军事压力下进行谈判。他们用拒绝提出名单来支持他们的无条件停火的要求。这样就陷入全面的僵局。这种僵持说明双方都没有原则，也展现出双方基本利益冲突的所在。僵持表明了，一方面有可能在划分控制区问题上，在建立联合政府或宪政体制上，达成暂时的妥协，作为一种争取时间的安排办法；而另一方面，任何企图在宪法的框框内达成永久性的和解方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但恰恰是这种永久性的和解方案，是马歇尔出发时想要做到的。

马歇尔执行使命的头3个月内的形势发展，造成一种可喜的幻觉：似乎美国的巨大力量，加上马歇尔个人的崇高威望，将有可能冲破僵局。在宣布马歇尔将军使命后不久，中共驻重庆代表王炳南于12月3日照会美国大使馆说：延安决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采取这种更肯合作的态度，说明他们非常关心美国政策的前景。王告诉大使馆人员说：中国未来的局势发展固然依赖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但更依赖美国的政策；共产党人急切地盼望马歇尔将军的来临，盼望美国立场的明朗化。在此次谈话中，中共代表也强调指出：中共是独立于莫斯科的。12月17日，延安中共中央的一个官方发言人发表一项声明：对杜鲁门的12月15日声明表示欢迎，并对美国的争取停止敌对行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国民党训政、和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的政策表示支持。他表示：中共赞成把共军改编成“民主政府的武装力量的一部分”的建议。他也预料到“反民主”势力的“持久的顽抗、曲解和破坏”。国民党政府也表示欢迎杜鲁门声明，但同共产党人一样，他们是用他们的方式来理解美国的政策的。1945年12月31日，政府宣布：最高统帅决定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但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国共之争紧张化的暗流。在一个重要的元旦政治广播词中，蒋委员长重申了他召开国大的决心。他只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在杜鲁门总统的敦促立即停火及扩大中国政府基础的12月15日声明以后，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会在与1945年10—11月间形势迥异的情况下召开。蒋介石故意不提政治协商会议和提出召集国大的计划，招致延安方面中共机关报的猛烈抨击。同时政府方面却宣布它正在完成对热河省的接收准备工作，当时该省一半被苏联军队控制，一半被中共军队控制。国民党已部署好准备进攻。中共方面声称要进行抗击，并敦促停止对热河省的进犯。

（2）1~2月间的军事政治调解工作

a. 马歇尔与1月10日停火协定——不顾一切困难，马歇尔将军成功地帮助中国订立了一系列为结束国共之争而精心设计的协定。这个大建筑物包括三组互有关联的成份，即：1946年1月10日的停火协定；1月10日至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决议；与2月25日的军队整编协定。

在导致停火的正式和非正式谈判中，马歇尔将军在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发挥了影响。在第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他决定性地支持了国民党的立场。1

月4日，即魏德迈将军宣布美国将增运国民党军队到满洲的次日，马歇尔将军告诉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说：美国承担着将国民党军运往满洲的责任。随后，周即表示同意在拟议中的停火命令中，附上这一例外条款，准许国民党军队进入这个重要地区。在第二个较不重要的问题上，马歇尔将军支持了共产党人的立场。1月9日，国民党政府出人意料地要求国民党军占领赤峰与多伦，它们各为热河省及察哈尔省的战略要地，并以此作为颁发停火令的先决条件。共产党人坚决拒绝接受这一要求，并争论说：自从日本投降以来，这两个地方早就在他们所控制的腹地以内。马歇尔站在共产党人方面进行了调停。[143]

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宣布无条件立即停火，并附有一条同时恢复交通的条款。[144]关于满洲的问题，在联合声明公布的会谈细节中规定：有关停止敌对行为命令的有关条款，“不得妨碍国民政府军队进入满洲，或在满洲地区内的调动，以利恢复国家主权。”协定也规定，立即设立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调处执行总部：一方代表国民政府，一方代表中国共产党，一方代表美国，由美国方面担任主席。所有决议必须三方一致同意。其任务为执行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具体工作将由若干个监督停战的小组来做。这些小组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成员，将被派往有冲突的地区，或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去制止与防范可能发生的敌对行为。小组的决议必须经三方一致同意。在调解停火的同时，由马歇尔将军、一名国民党代表及一名共产党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即后来人们常说的那个三人委员会。

b. 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国未来的力量均势——宣布停火就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提供了有利的背景。这个会议从1月10日开到31日。会议由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民主同盟9人、青年党5人、无党派人士9人共38人组成。它是在群众广泛地要求结束时断时续的内战的声浪中召开的。在紧接着八年抗战之后的这种内战，给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在杜鲁门总统的号召扩大政府基础的声明之后不久召开的这次会议，是美国寻求政治解决中国问题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随便哪个政党如果采取坚决不让步、不妥协的立场，将承担阻碍中国问题的和平解决的责任，并冒得罪中国人民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危险。

在此情况下，会议通过了一项对国民党不利的政治纲领。关于制定新宪法的程序问题，政协决议提出：首先要彻底改组政府，并听候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现存的、实质上软弱无能的国民党政府下的行政院应改组成多党体制，使之成为“政府处理国事的最高机关。”它将拥有最高立法权与行政权。它将由40人组成，其中半数为国民党人，半数为其他党派人士及社会贤达。这些人将由各有关党派提名。任何一项牵涉到改变“行政政策”的决议必须有出席行政院会议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生效。这样，任何一个党加上它的盟友拥有14票时，就能否决任何修改政协决议的提案。据消息说，国民党当局曾向中共及民盟口头保证：他们可以在行政院占有足够的席位，以便拥有否决权。

在等待实施宪政期间，应对国民议会下属的行政院进行改组。有着新的国民议会的联合政府与改组过的行政院，将统治中国直到建立宪法政体。国民代表大会将在5月5日召开以制定宪法。而由新宪法规定的选举在通过宪法后的6个月内进行。关于拟议中的国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与召集程序问题，政协决议实际上保证了中共及其朋友拥有否决权，能否决任何不符合政协决

议的、有关未来宪法的提案，以及任何国民党设计的、使它永久保持权力的提案。

政协规定的有关修正政府起草的宪法草案的原则，包含着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的要素。根据国共两党的性质及中国各党派的力量对比，在这些宪法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很可能使共产党获得坚强的地位。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进而控制政府。这些原则规定政府内阁的形式为向立法院负责的行政院，这样就否定了国民党要求有强有力的总统与软弱无力的立法机构的观念。在拟议中的宪法方案里，省是地方政府的最大单元，并有省宪法。省与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按照“适当分权”的原则加以划分。省主席由一省人民选出。

和平建国纲领的决议里的各项条款，更进一步肯定了以上那些原则。这些条款是改组后和宪政实施前的政府的行动指南。一项条款规定：应积极推进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的工作，并从基层逐渐扩展普选直到最大单元。全国应早日成立省、县及市的议会，县长应该民选。决议中另一条款是有关一个双方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 1945 年夏季蒋毛谈判后内战扩展的近因。这个条款说，凡地方政权有争议的收复区应维持现状，并交由按地方政府普选、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的原则进行改组后的政府处理。由于共产党拥有人民的广泛支持，这些条款不仅使他们对广大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控制合法化，同时还有利于向其他地区扩展他们的控制。

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中强调说，他未曾参与政协的政治纲领的拟制工作。他否认自己曾向国民党政府提议建立联合政府。但在高斯大使 1944 年的“中国各党派联合议会”的提议之后，在赫尔利将军赞同的联合政府五点协议草案之后，又在杜鲁门总统的 12 月 15 日官方声明之后，马歇尔的赴华使命给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当政协开会的时候，蒋委员长曾请求马歇尔将军劝说共产党人接受政府的条件。马歇尔的反建议是向蒋提出一项纲领草案，该草案——用杜鲁门总统的话说——将“使中央政府从国民党的一个机关（它在法律上是那么回事），变成联合政府。它的存在将建立在全中国主权的基础之上。”[145]马歇尔赞成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是毫无疑问的。在 1947 年 1 月 7 日他离华后发表的一项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有远见的宪章，它给中国提供了和平、重建的基础。”如果说在达成这些协议时，与会的中国各方代表一只眼睛瞅着他们各自的利益，另一只眼睛在瞧着马歇尔将军——这样说是一点也不夸大的。不管怎么说，当 7 月间调解工作垮下来的时候，马歇尔直接进入了双方的政治讨论，以便尽力解决在贯彻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的分歧。

c. 马歇尔的将共军改编成国军的方案——1 月 10 日的停火协定及政协通过的政治纲领是国共两党间和解方案的两个主要部份。而第三个部份就是 2 月 25 日的军队整编及将共军编入国军的协定。马歇尔将军积极参与了达成这个协定的谈判工作，并以“顾问”的身份签了名。

该协定规定将军队统编成 60 个师，国民党军编成 50 个师，共军编成 10 个师。协定以外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该复员。这个协定使国民党比共产党获得了五比一的优势。在这些师的部署上规定在满洲为国民党军占 14 比 1 的优势，在西北全部为国民党军，而在华中则为 5 比 1 的优势。而华北则成为共军最最密集的地方，在那里国民党的优势为 11 比 7。拟议中这一部署，将有

效地隔断苏联与中共军队的任何直接联系。在华北的共军，将被占压倒优势的国民党军从三面加以包围。这个军事方案对国民党极其有利，而它将与扩大政府基础及建立宪政体制的进程同时生效。政治军事协定的同时生效，是国民党提出的将共军改编入国民军的要求，与共方早就提出的首先进行行政体民主化的要求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它是由周恩来在 1945 年 12 月 18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首先提出的折衷办法。据他说，共产党一直就在劝说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一方案。

中国人民高度热情地欢迎这项政治、军事解决方案。共产党人更兴高采烈。右翼国民党人则公开指责它。马歇尔将军显然对他的努力有了成效感到满意。2 月 25 日，杜鲁门总统指示国务卿与国民党政府，着手进行关于成立一个最多为 1,000 官兵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的必要的谈判。3 月 11 日，马歇尔离华返美，安排从进出口银行贷款 5 亿美元给中国，并安排运送和出卖剩余物资等其他援助办法。[146]在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他很快在这些工作上赢得了各部门的支持。4 月间，他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报告了他的赴华使命。他的印象是：他是得到委员会的“支持”的，虽然没有正式表示过意见。同时，在中国，魏德迈将军按马歇尔将军的指示，在总统的战时权力下，成立了一个军事使团。魏德迈还采取步骤，撤出在华美军。4 月 2 日，他宣布解散美国的中国战区，并将陆战队拨交给海军部管辖。

在 4 月 18 日马歇尔将军返回中国以后，他所提出的政策在美国获得了积极的支持。6 月间，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上介绍了提供军事咨询与军事援助的法案，以便使军事使团获得法定的基础。在 6 月 19 日的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明确了批准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目的之一，乃是帮助中国实现合编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方案。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委员会说：马歇尔将军答应了共产党人的一项要求，即在把共军与其他军队合编时，“事先进行短期的美国训练，并提供最低限度数量的武器装备。”6 月 27 日，委员会用赞成的口吻汇报了这个提案。然而第 79 届议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美国军事使团的存在，仍然凭靠总统的战时权力。但中国的局势却迅速向另一方向发展，并将美国的政策远远地撇在后面。甚至就在马歇尔在美国时，军事政治解决方案已经在迅速地土崩瓦解。

2. 和解方案的垮台

（1）国民党与中共的谈判、停火及战争

在马歇尔返华后，他的和解方案及其谈判的垮台过程，构成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史上的最错综复杂的一章。国务卿艾奇逊说：

它们[指谈判]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复杂，复杂到了大概只有中国式的谈判才能有的程度。一方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方说他们可以接受这些提议之一，但对其他提议则有四条附加条件。然后提议的一方又倒回去，表示愿意接受某些附加条件，但又对附加条件提出了附加条件。于是，不久之后，就变得谈不下去了。

用不着详细叙述那些谈判的经过。但如果人们牢牢掌握住双方冲突的本质上的不可调和性，与双方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政策，你就能扼要地了解双方的策略和战术。正是这一切，使和解方案的垮台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你也可

以列举出那些关键性的问题，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无论马歇尔如何用尽平生之力，也找不到新的解决办法。探讨这个问题，不仅说明在两个不可调和的势力之间的谈判的一般性特点；它还说明：用一项精心设计的，要求双方公开承担让步与合作的详细条款的正式协议来解决这些矛盾，是徒劳的举动。

在事后观察这些问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至少可以这样说，双方对是否能达成一项持久解决方案的可能性，都有重要的保留。1—2月间在马歇尔将军帮助下达成的协议，乃是欺骗性的假象。在假象的背后，双方都在耍手腕争取更有利的政治、军事地位，并把各自的策略和战术掩盖起来。在赴华使命終了时，马歇尔将军才确信，用1949年美国白皮书上的话来说：“最高统帅肯定是在遵循一条依靠藏在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外衣下面的武力政策。”“过去，[马歇尔将军]总是感到：国民党政府需要美国的调解，作为它的军事行动的盾牌。”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蒋委员长在1—2月间不是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但后来的事态说明，用温和一点的语气来说，他从来没有否定以进一步使用武力来作为另一条出路。从现有的材料中尚不能断定蒋的目的究竟是要用全面内战的办法彻底消灭共产党，还是只限于把他们从重要地区驱逐出去，并迫使他们接受他的条件。但即使他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实际上所用的提高要求，并在每一次暂时性胜利之后紧接着使军事攻击不断升级的做法，都使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并最后导向全面内战。

在共产党方面，他们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在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以便占领新的地区，扩展军队和扩大影响。就在他们喧嚷争取和平的同时，他们也是如此行动的，他们认为有理由要这样做，是为了防备谈判破裂与和解垮台。在一篇纪念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朱德将军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明确。按他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在1945至1946年间，一方面面对着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和平愿望；另一方面，面对着有美国支持的最高统帅可能发动一场内战的企图。朱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定地高举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并用最大努力领导中国人民寻求一条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的道路；另一方面则动员全党及解放区的所有军民，和全国人民在一道，作好准备，以便在蒋介石断然破坏和平时，能打败蒋介石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军事进攻。

凭借提倡“和平、民主、团结”，共产党企图避免一场可能会输的内战，并求得一个有利于他们迅速扩大影响的和解方案。用倡议一个温和的政治纲领的办法，他们企图孤立蒋委员长，使他在坚持要用武力手段镇压或打败他们时，更进一步地失去人民的支持。[147]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采取行动，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并在准备对付内战的重新爆发。他们的两手策略，使和平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事。

在整个马歇尔使命期间，共产党坚持执行了这种两手政策。在一月间确立了停火以后，中共中央一再告诫各地区的共产党干部们，应以练兵、生产和土地改革三項工作为中心任务。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一項指示，把它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这项指示意味着共产党抛弃了自1937年以来的为了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使新政策成为与国共第一次内战时期的政策稍许不同的翻版。在土地政策上的这一改

变显然是一项措施，用来动员农民参加虽有停战令、但仍在各地进行的局部战斗，参加可能爆发的全面战争。正如毛泽东在几个月后指出的，在7月间停火垮台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新土地政策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

在双方都对持久和解的可能性有很大的保留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的、精心设计的协定的垮台，乃是不可避免的。在达成协议后不久，双方都耍手腕争取较协议更有利的地位。由于这些手腕的作用，政治军事形势经常变化；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双方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展开新的谈判。由于政治协定妨碍了国民党的利益，国民党人采取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使人们严重怀疑他们是否有遵守这些协定的诚意。由于2月协定中含编共军成国军的条款对中国共产党不利，共产党人并不采取实现这些条款的步骤。尽管有了停战令，但双方一方面在谈判未决的问题或新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都在战场上采取行动。每一方都希望某些重要城市或地区落入它的手里，以便能在成立联合政府、建立宪政时有更强的地位；或者如果和解破裂，可以占取更有利的军事地位。国民党人在政治领域内的行动，被当成共产党人在军事上采取行动的理由。反过来讲，共产党人的行动又成为国民党政府被迫采取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强迫共产党在军事压力下接受其条件的理由。在采取对付共产党的军事行动中，国民党依仗它直接的军事优势寻求速胜。共产党拒绝在军事压力下接受国民党的一系列新条件时，则依靠它的避免决战、持久抵抗并在后来转入反攻的能力。这样战斗的规模就日益扩大，直到演变成一场全面内战。

（2）政治纲领的流产

和解垮台的过程及企图达成新的协议的无用的谈判过程，共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它的中心议题，每个阶段又都留下未决的问题给下一阶段。在每个阶段中，蒋委员长总是背离1—2月的和解方案精神，而向他自己的如何对付共产党的观念迈进一步。同样地，共产党人在态度上变得越来越不肯妥协。在第一阶段中，政协规定的政治纲领流产了。而在政协休会和军事协定达成之后，是否能成功地履行协议的问题，也变得令人怀疑。有迹象表明：国民党内有股有势力的集团强烈反对政协决议；还有一伙有势力的国民党将领反对军队的改编，因为这威胁到他们的利益。重庆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人们惴惴不安，担心国民党内的不肯妥协的分子，可能会破坏政协制定的纲领。[148]

就在中国政局的这一关键性的时刻里，美国国内对日本在太平洋的前属各岛屿的处置问题的议论，导致了莫斯科发表一项广播声明。他们要求按照雅尔塔的一项秘密协定，占领千岛群岛及南萨哈林岛。[149]2月12日，美国、苏联及英国同时公布了雅尔塔协定。此时公布这一协定，对中国局势有不利的影响。它加强了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和解的人们的地位，因为他们更可以指责美国用签订雅尔塔协定和赞助最近与中共达成和解的办法，来牺牲中国的利益，并姑息苏联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由于苏联要求分享对满洲工业的控制，并推迟约定的从满洲撤出红军的2月3日最后期限，结果就造成对苏关系的紧张化。这种关系紧张化，进一步加强了那些人们的论据。2月末，在中国各大城市爆发了由右翼CC派首领陈立夫策动的学生反苏示威。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日至17日开会，讨论批准政协决议的问题。在会上，CC派分子猛烈攻击那些负责在满洲进行中苏

交涉的人们。对政协决议中有关宪法草案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许多人发言强烈主张实行总统制，并反对各省有高度的自治权。[150]这一切及其他举动的目的，是要使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退位或丧失信用。而正是这些人主张在满洲与苏联达成经济上的协议；也正是他们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与中共达成和解。虽然在最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批准”了全部政协协议；但看起来已很明显，国民党内的有势力首领在企图修改政协决议的宪法草案，使之与“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的观念相吻合。而这些观念只有国民党自己才是权威性的解释者。

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对策是：任何修正的提案必须得到各党派的同意，并要求国民党承担实行政协的宪法修正案的责任。同时，他们还拒绝提交准备参加改组后的政府的人员名单。中国共产党推迟了它原定在3月31日为批准政协决议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也拒绝提交按2月25日协定规定的全部武装部队的清单。在将近4月底时，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完全陷入僵局。同时，也正是在此时期内，满洲的战斗进入了高潮。满洲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使得一切政治问题的解决都不再可能，这样，政协关于建立过渡性的联合政府，准备宪法修正案，及为通过新宪法在5月5日召开国大的计划，就流产了。[151]

（3）满洲的危机

和解垮台的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重迭，它的主要问题是满洲的危机。1946年1月10日的停火协定准许国民党政府有将军队开入满洲，以便在苏军撤出后接管中国主权的权利。按美方的解释，有一条单独的停止敌对行动的条款适用于满洲地区，正如其适用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此基础上，马歇尔将军敦促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同意派遣三人调处小组去满洲监督停火，并防止进一步的冲突。共产党人同意马歇尔的提议，但政府方面坚决反对。按白皮书的说法，“在这一阶段，看来国民党政府决心要在满洲无限制地自由行动；看来他们坚持一项在军事上全部占领这个地区，如遇共产党就将其全部消灭的政策。”[152]3月11日，也是他启程赴华盛顿之日，马歇尔将军终于说服蒋委员长，同意让各调处小组进入满洲。但准许给他们的权力，并没有大到能制止敌对行动的程度。国民党军的刁难，也阻碍了他们的活动。就这样，在满洲的战斗，一直没有有效地制止过。

本来已很混乱的局势由于4月6日的苏军开始撤出满洲而更加复杂化。他们的撤退使满洲有一个双方要想填入的真空地带。国民党军向前推进，不仅从苏军手中接管城市和交通线，而且还在共产党人占据的农村建立军事控制。在中共方面，他们也迅速扩展了对满洲的控制，因为苏军用方便他们接管撤出地区的方式在撤退。4月18日，共军占领了已被国民党军占据了几个月的长春。这一形势使共产党人增添了新的信心。证据就是他们提出了要求修改原先规定的在满洲地区共军1个师对国民党军14个师的比例，改成共军5个师对国民党军14个师。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要求共同控制满洲。他们宣称在满洲有300,000军队。

共产党人占领长春，[153]使蒋委员长要在满洲全面进攻以打败共军，有了必需的理由。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后，以美国训练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为先锋的国民党军打败了共军，并于5月19日占领战略要地四平街。侧翼受到威胁又兼寡不敌众，共产党人突然从长春撤出。[154]在胜利的激励下，国民党军不顾一切禁忌，又向吉林与哈尔滨挺进。

4月18日，马歇尔将军从美国一回到中国，就勇敢地出面制止满洲的战斗。那天正好是共产党占领长春之日。他竭力敦促共产党人自动撤出长春，并劝告蒋委员长停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他的计划包括派一个调处执行总部的先遣小组到这个城市去制止战斗，并使双方能进入新的谈判。这个城市应在最长为六个月的时间内移交给国民党。国民党军占领四平街后，蒋委员长表示同意马歇尔的意见，同意国民党军不在此时用武力进占长春。他通知马歇尔说他担心他在满洲的军事指挥官已在向长春推进，并说他将去沈阳以便控制局势。就在他离开重庆之日，他的军队进了长春。尽管他向马歇尔作过声明及马歇尔用无线电发出呼吁，但蒋并不制止他的军队进一步向哈尔滨进军的行动。[155]恰恰相反，正好在攻占长春之日他来到沈阳，加上他在沈阳发表的言论，使他的沈阳之行看起来与一个预定的军事胜利相吻合。他飞往满洲乘的是马歇尔的公务飞机，这使人们得出马歇尔与此行密切有关的印象。

更糟的是，回到了重庆并把蒋的许诺当了真的马歇尔，正好在同一时间内成功地劝说周恩来同意在满洲停战，同意自动撤出长春，作为国民党军不再向前推进的交换条件。论及这一系列事件时，白皮书总结说：

正当看起来快要达成协议时，最高统帅却不在场，而在沈阳和北平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另一方面，他的军队却正在扩展其在长春以南的战果。自从马歇尔将军提出共产党军队撤出长春，而国民党军队则停止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建议，而且这一建议被共产党人接受了以来，以上这些行动，使人们大大地怀疑起蒋的诚意，尤其怀疑马歇尔将军的不偏不倚的态度。

此时，共产党人展开了猛烈的宣传攻势，即所谓马歇尔将军在作战中支持了国民党人等等。当马歇尔将军终于成功地劝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6月6日发出一项要求双方军队在15天的时间内停止推进、攻击与追击的命令时，满洲的危机暂时有所好转。这个停战令，后来更延长到6月30日。[156]

（4）最终垮台的过程

a.6月谈判中的僵局——在和解垮台的第三阶段中，全国都爆发了战斗，中国在走向全面内战。与此同时，由马歇尔将军担任调停人的谈判，却陷入一个又一个僵局。第三阶段开始于满洲停战后的6月7日至30日。在这一不易达成的停战中，蒋委员长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项带有一系列苛刻条件的解决办法，其中有许多要求，附有10天到75天不等的限期。这些条件是在国民党军5月间在满洲大获全胜的背景下，向共方提出来的。满洲的停战是有限期的；而原来的1月10日停火协定的有效性，是很值得怀疑的。零星的然而而是剧烈的战斗，各地都有爆发，特别在华北更甚。某些国民党领袖们随便就公开表白对武力政策的偏爱，表白他们对速胜的信心。这一切有力地告诉共产党人，蒋介石有强求达到他的要求而发动全面进攻的可能性。

一般地讲，在这一时期的谈判中，共产党人特别着重达到停止敌对行动并延长在满洲的停火的目的，因为眼前的军事优势是在国民党军队方面。他们对停止零星的战斗并挡住国民党军队压力的要求，压倒了对美国人的动机的怀疑。他们改变了原先的立场，并同意国民党提出的在调处小组及调处执行总部处理有关停火程序问题时，把决定性的一票给予美方的要求。[157]他们要求在展开进一步谈判其他问题之前，颁发一个新命令制止在满洲及关

内的敌对行动。他们提出了增强调处小组权力的建议。他们同意在最高统帅延长满洲的停战到六月底以后，正式讨论华北及华中的军队的重新部署问题。

在具体问题上，他们最初提议：在中国关内根据1月10日的停战令恢复到1月13日的现状，在满洲则恢复到6月7日各自的原先位置。至少在中国关内来讲，这一提议将对他们有利，因为自从第一个停战令以来，他们在军事行动上没有国民党军队那样成功。后来，面对着国民党军队就要发起的新的进攻，他们同意在某些条件下从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地区撤出，并同意在另一些地区内削减兵力。但他们坚持国民党军不得占领他们按协议撤出的地区，不得占领在军队改编期间他们准备撤出的地区。他们还要求继续保持撤出地区的现存的共产党地方政府。在谈判中，他们始终关注着当他们在军事方面让步时，政府方面在尔后的政治问题上将采取何种姿态。

为了打破僵局，马歇尔将军准备了一份建议草案。由于马歇尔急于防止大规模战斗的恢复，他正确地预见到这种恢复会导致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所以，他草拟的建议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但在细节方面照顾了国民党的利益。这一文件规定在中国关内恢复1月13日的现状，而在满洲则恢复到6月7日的现状，除某些特殊地区以外。它要求共产党人在某些特定地区集中部队，但要求国民党军队不开入共产党人撤出的地区。对共产党人，则要求他们不在蒋委员长要求撤退的地区内驻军。[158]撤出地区内的现有的地方政府仍予以保留。

最高统帅对马歇尔建议草案中的若干点吹毛求疵。他特别要求要改变苏北的地方行政机构。共产党人比较肯听马歇尔的敦劝。在与马歇尔作某些讨论后，周恩来说他可以考虑任何一种解决办法，但不能接受包含改变苏北民政机构的提议。

b. 马歇尔未能劝阻蒋采用武力政策——这样，关于地方政府的地位问题，尤其是苏北的地方政府，乃是唯一遗留下来的、足以形成僵局的重大问题。与他在1—2月间促成一系列协议的惊人成就相反，在6—7月间，马歇尔将军无法找到一个能为双方接受的析衷方案。马歇尔作为调停人在效率上为何有这样大的变化，其中的原由是不难解释的。此时，马歇尔的话对蒋委员长已经没有什么份量。他的劝告经常被拒绝。因为国民党人现在想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已不需要依赖他的帮忙了。自1—2月的协定达成后，美国已将相当大量的国民党军队运入满洲和华北。[159]提供这一援助是遵循为了在尽可能广大的区域内，尤其是在满洲，重建政府的权力的政策。但一旦国民党军首领们感到他们的满洲和华北的兵力已足够强大，可以打败共产党人时，他们就越越来越不肯听马歇尔的劝告。他们对迅速战胜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如果他们曾有过对战争持久和失败的担心，这些担心也被一个明显的信念抵销掉了。用马歇尔的话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信念：“在他们使用武力时，可以把美国拖进去。”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政策看来似乎是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的。当马歇尔将军向蒋委员长表示他反对后者的计划时，美国政府却依据1946年6月28日的新军援协定条款，扩展租借法案给中国。在给其他国家的租借法案于6月30日中止以后，美国却向中国提供了51,700,000美元的租借“补给线”贷款。

很显然，蒋委员长在暮春或初夏就决心不顾马歇尔将军的反对，采取武力政策对付中共。在最高统帅的回忆录中，关于他在此时的心情有生动的描

写。他解释说：他已拒绝5月6日“斯大林第二次邀请”他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他决心“不遵循俄国共产党的一贯对华战略，即使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并完全依赖俄国。”[160]接着这个解释之后，他写道：

一个国际间的暗流已在向中美关系冲击，中国已经受到了孤立。再也不可能使中美两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一项联合对付苏联的政策。其后果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乃是：

不顾西方国家可能对我们或不对我们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我们要作好准备，按自己的独立政策，在必要时我们就单独干，跟苏联的侵略拼到底。[161]

白皮书各章节所零零碎碎提供的消息，毫无疑义地表明：在6月底，蒋委员长已下了决心用武力将中共从关内各战略要地驱逐出去，并用军事压力强使他们接受他的新条件。10月4日，马歇尔将军向蒋委员长提交的一份意见书表明，马歇尔在6月底反对“7、8两月的整个程序；”并说蒋曾向马歇尔保证“在关内只有局部战斗，在满洲不会有什么战斗。”国民党总裁满怀自信地对美国将军说：“只要时间允许，熟苹果就会落到我们怀里。”此时，国民党军事首领们发表观点说，江苏省将在两个月内肃清共产党，“从军事观点来看，可以在三个月内迫使共产党接受谈判条件。”6月30日，马歇尔将军向最高统帅指出，国民党军事首领们的谈话表明，“政府正在抛弃所有民主程序，并正在追随一条依靠武力的独裁政策。”马歇尔提醒蒋介石这样下去有在军事上彻底撕破脸大打的可能性；因为“政府方面的军事首领们强烈要求用武力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已准备齐全，而且共产党人也已知道得一清二楚。”7月上旬，蒋委员长对马歇尔说：“必须先严厉手段对付共产党人；然后，在两、三个月后，再采取宽厚的姿态。”他还说：“如果马歇尔将军有耐性，共产党人就会求和，就会愿意作出和解所必须的妥协。”

马歇尔将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的努力，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的阻挠。共产党人向美国表示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他们继续依赖马歇尔的调停，以便得到眼前的停火机会和改善国民党所提的要求，也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条件。这些任务由善于说服人、温文有礼的周恩来干练地完成了。他总是给别人一种肯和解、不走极端、非常讲理的印象。他经常对马歇尔表示信任。直到10月10日，他还对马歇尔说：“对马歇尔将军在整个调解期间的行动，都是没有意见的。”另一方面，其他领袖们的声明及共产党的报纸，却越来越猛烈地抨击美国的政策，企图以此来阻止美国对国民党的进一步援助。6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一项声明，攻击国会在国务院提议下通过的一项建立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法令。该团原是为了训练合编后的中国军队及向中国提供装备与军需而成立的。按副国务卿艾奇逊的证词的说法：这些装备与军需的一部分，也是准备给共产党的。但毛泽东声明：中共坚决反对派遣顾问团到中国。他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对华的“所谓军援”，并从中国撤出一切美国军队。[163]

有趣的是，毛泽东的声明正好与苏联报纸突然对中国局势发生浓厚兴趣相呼应。此时，苏联对美国干涉中国的抨击比前几个月更尖锐了。苏联作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力，表示出自1920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强大信心。7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它“对中国内政

的武装干涉”，并停止“挑起中国内战”。7月中旬，7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被中共劫持并扣押了许多天。7月20日，一支从天津到北京的陆战队护送队，被共产党人有预谋地加以伏击。满怀敌意的共产党宣传及对陆战队的攻击，向马歇尔将军表明：共产党现在对美国采取了一种新政策。

c. 禁运和马歇尔的新努力——7月间，蒋委员长就着手实现他的计划，在关内很多地方都爆发了战斗。调处执行总部及调处小组企图制止战斗的努力完全无效。国民党政府在7月4日宣布将于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此事未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协商。这样就破坏了国民党与他们之间的谅解。这个行动表明国民党意图背离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程序。程序规定在国大召开之前，国民党政府应先改组成多党政府。因此共产党发言人宣布共产党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即那些未决的政治问题得到满意解决的条件下，才参加国大。在停战迅速垮台的这一时刻里，蒋委员长于7月14日离开南京，去远离首都的消暑胜地牯岭。据《纽约时报》报导，消息灵通的美国和中国观察家们说，最高统帅离开南京，是为了躲避在南京的要求和平解决的压力，好让他的将军们有机会来实行其有限的军事目标。外交界及其他有资格人士私下承认，美国促成中国和平的持久不懈的努力已告失败。

在他们那一方面，毛泽东在7月20日的党内指示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攻势。”毛泽东对他的同志们说：他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应该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分析说：虽然蒋有美援，但他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要取得最后胜利，共产党人必须作长期打算，放弃暂时无法防守的城市，并进行运动战。他们应该用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发动群众，要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毛总结说：“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

为了找人帮他应付迅速恶化的局势，马歇尔将军曾想选拔魏德迈将军出任大使。但在共产党人表示反对之后，马歇尔设法使北平市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为驻华大使。7月下旬，马歇尔将军采取了一个不为当时人们注意的重大步骤。7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美联社发自华盛顿的报导，总共登了七行，说美国高级官员们正在考虑“停止向中国政府运送军火武器，希望这一行动能帮助美国促成中国和平的努力。”美国对输出军人武器到中国的禁令在7月29日生效，并在8月中对太平洋地区生效。在解释这一举动时，白皮书说：

关于美国军援方案问题，马歇尔将军被置于一个不能成立的调停人的立场上。一方面他要对中国的双方进行调解；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继续向双方中的一方，即国民政府方面，提供军火武器。

后来，马歇尔将军的批评者们攻击说，这10个月的禁运与解禁后对运华军需品的耽误，导致小武器军火的短缺。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党中国在军事上崩溃的决定性因素。[164]

这个步骤对蒋委员长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影响，他继续拒绝下达停战令。为了要绕过死胡同，马歇尔将军及司徒大使提议组成一个为达到改组行政院的协议而设的五人委员会，包括国共双方的代表，并由司徒雷登担任主席。他们希望如果政治讨论有进展，会促使最高统帅同意停火。[165]但是在战场

上的成功已明显地使最高统帅胆子更大。8月6日，他要求共产党方面在一个月或六周以内实现五项条件，作为谈判政治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要求共军从满洲、华北及华东的要害地区和交通线撤退。正如白皮书评论说，“这些条件比6月底形成僵局时的要求还要更苛刻。”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敏捷地指出，蒋的提议对要求撤出地区的地方政府的未来地位却只字未提。共产党人继续坚持有争议地区的现有地方政府必须保留的立场。他们还提出了同时讨论政治军事问题的要求。

为了打破这一新僵局，美国政府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马歇尔将军及司徒雷登大使在8月10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把谈判的僵局告知中国公众。它指出：某些未决问题之一乃是军队部署问题，而最困难、最根本的问题乃是关于因军队重新部署而撤出的地区内的地方政府的性质问题。这一举动显然是要在中国引起舆论的注意，以便向双方施加压力，以取得妥协。第二个步骤是8月10日由杜鲁门总统致书蒋委员长。在信上，总统警告最高统帅，除非中国能向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向真正地迈进，否则总统将有必要向美国人民重新规定和说明美国的立场。在与最高统帅这一时期的会谈中，马歇尔告诉中国领袖说：国民政府的政策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中国。不管这些警告是否能对蒋委员长产生影响，但它们的作用已被美国政府的其他行为削弱了。8月30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定了一项协定，将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出售给中国。[166]此时，两国间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谈判正进入最后阶段。它于1946年11月4日签字。正如国务院强调的那样：这个条约确实不是要加强对中共展开内战的国民党政府，它在政治上并无多大意义。但是在这转折关头，这些谈判及条约的签订，却具有不幸的后果。

最高统帅对马歇尔和杜鲁门的警告的反应是两重性的。8月13日，他发表一项公开声明，要共产党对谈判破裂负全部责任，要求共产党人从“威胁和平与阻碍交通的”地区撤出，并要求共产党人保证并证实他们愿意履行各项已达成的协定的诚意。8月28日，蒋介石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回信。针对总统对和平解决的要求，他争辩说：在中国维系和平的最低限度要求，是要求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以武力夺取政权、推翻政府并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政策，正如东欧现已陷入的那种状态一样”。同时，国民党政府继续在苏北展开攻势，将共产党从胶济线逐出，并于8月29日攻占热河省省会承德。

在他们那一方面，中共抓住了马歇尔——司徒雷登8月10日声明的机会批评美国的政策，并攻击美国的动机。8月11日，共产党的官方通讯社报导说，延安消息灵通人士认为：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的调解努力失败的根源，是美国“支持蒋介石独裁政府”的错误政策。两天后，共产党的官方报纸登了一篇有趣的评论马歇尔—司徒雷登声明的文章。该文断定美国有两套政策：“一套是支持蒋打内战，这是根本性的；另一套是劝蒋停止内战，那是附属性的和装饰门面的。”它说蒋知道美国政策的两重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收下了美国的大炮，并躲开了和平鸽。”它提议说：在美国面前有两个抉择。一个是停止它的“单方面援蒋”，并从中国撤出它的军队。另一个就是继续搞它的“欺骗”政策，即“一方面调解，另一方面却援蒋反共反人民”。次日，莫斯科的一则广播比延安的社论还要更进一步，它将马歇尔—司徒雷登声明谴责为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第二阶段的序幕。

在8月间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毛泽东指责说“美国反动派”正在帮蒋打内战。他说，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十分强大。中国“反动

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最终，“美国反动派”正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将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毛泽东论证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毛泽东断言：“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就在8月30日签订美国与中国政府关于出售剩余物资的协定后不久，中共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了这项买卖，并将各种各样的罪恶目的加到它的头上。同时，共产党人在8月初在陇海线发动攻势，并包围了大同。8月1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后不久，中共下令进行总动员。

在7、8、9月的战斗中，国民党部队成功地攻占了最高统帅要求共方撤出的大部分地区和铁路线。国民党攻占这些地区后，随即就建立国民党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就这样，用军事进攻的办法，最高统帅把他提出的五项要求变成了既成事实。于是，当马歇尔与蒋会见时，马歇尔得出的印象是：蒋坚持继续用军事占领的办法，并认为在国民党军新占领的地区内，马歇尔提议中所包括的一切要点都可自动解决。这些地区内的地方政府问题，已不再成为什么重要问题。最高统帅现在表示同意，可以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改组后的行政院。

在把有关军队重新部署的五项要求变成既成事实之后，最高统帅在9月间开始注意政治问题。他的政策是用军事压力强迫共产党人接受他在政治问题上的条件，再不然就制造既成事实来对付他们。他的政治方案包括及早召开国民大会，在改组后的行政院里不给共产党及其盟友以否决权，并推迟行政院的改组。不顾马歇尔的一再劝告，他拒绝在各项争端达成协议之前就下达停战令。他坦率地告诉马歇尔，拒绝发出停火令乃是“他最后的一张王牌，来迫使共产党人提出他们的国大代表名单。”很显然，在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及全部由国民党政府做筹备工作的背景下，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并开创一种宪政体制，这是完全有利于使一党统治永久化的。

在国民党人继续推进的时候，共产党人越来越坚持要立即停火。在那些未决的政治问题上，共产党人与最高统帅的立场截然相反。他们坚持在国民参政会上为自己及盟友要求14个席位，以便拥有三分之一的票数能否决任何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修正案。他们坚持在国大召开前要首先改组行政院。他们坚决拒绝提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除非下达停火令并解决这些政治问题。这样，在任何一个争端上都不可能达成协议。

当周恩来在南京坚持要求停火时，毛泽东在延安于9月16日发出一项党内指示，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方法授给共产党的干部们。毛泽东指出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它的目的是要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毛泽东分析说：全歼国民党军队，不但是共产党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通过使国民党军队投降，也是共产党兵员的重要来源。为证明其战略上的灵活性，毛泽东告诉共产党人说：在抗日时期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但在现在的内战时期，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在9月29日和A.T.斯蒂尔的谈话中，毛泽东抨击美国政策是“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

d. 国民党军队进犯张家口、召开国大及美国调解的收场——最高统帅继续他的军事进攻政策，以强求达到他的要求。为了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

进犯，为了使他们的最低限度要求被接受，共产党人打出了他们的最后一张牌——公开威胁要打一场持久战。当9月30日国民党宣布开始向中共在内蒙古的权力中心张家口展开军事行动时，谈判就进入了关键性的阶段。同一天，周恩来通知马歇尔将军，如果国民党政府不停止向张家口的进攻，共产党人认为这就等于政府公开表示“全面决裂”，并抛弃和平解决方案。国民党向张家口的进攻使马歇尔将军相信，用白皮书的话来说：“在政府推行其‘局部战斗’已达三个月的形势下，美国政府再也无法继续充当第三者；”并说“发动张家口战役，只有在武力政策的基础上，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于是，马歇尔将军在10月1日向蒋委员长递交一份备忘录，警告他说：“除非找到立即停战的协议的基本条件，并不被什么建议和反建议所进一步拖延，否则我将向总统提议把我召回，并提议美国政府结束其调解的努力。”在与蒋进一步谈话之后，正如他告诉最高统帅的，他确信“一场使用武力的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谈判可以被说成是进行战争的掩饰。”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已被放到这样一种位置上，它的行为的一致性可以被一驳就倒，因此我必须向杜鲁门总统建议将我召回。”[167]

从司徒雷登大使处探悉马歇尔将军已向华盛顿传信建议将他召回后，蒋委员长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实行几天有条件的休战。而马歇尔将军撤回了他要求召回的提议。但这一来之不易的休战，却被共产党人拒绝了。其理由是停战不应有期限，他们决不在军事压力下进行谈判。周恩来告诉马歇尔说：只有持久停战，才能表明政府不希望“全面决裂。”作为反建议，他要求在关内的军队恢复到1月13日的位置，在满洲的军队恢复到6月7日的位置。他还对马歇尔说：他不能在有限议程和最后限期的限定下进行谈判。但相反地，他却提出了一项详细目录，作为谈判的基础。这就清楚地表明：共产党坚决要求实现政协决议。谈判进入了一个共产党人采取坚决不再让步的立场的阶段。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

周的强硬立场，反映出毛在10月1日发出的党内指示中对军事形势的估计。在7、8、9三个月的战斗之后，毛泽东对一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较7月初有了更大的信心。他指出：蒋的战线太广与兵力不足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将成为共产党人胜利和蒋军失败的直接原因。毛泽东解释说：在蒋的190几个旅中，半数必须担任守备。当他的野战军的兵力进入共产党的区域后，其中一部甚至大部要改任守备。他的有生力量会越打越少。在已往三个月中，共军共歼灭了国民党军25个旅。他预计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国民党军25个旅，共军即能停止蒋的进攻，收复若干失地，夺取战略上的主动，并从守势转入攻势。

共产党人的不妥协态度，促使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在10月8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谈到了谈判的实况及最近的僵局。这也是对共产党拒绝张家口休战提议的含蓄的批评。由于没有达成停战协议，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张家口进攻。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不仅占领了张家口，而且还占领了共产党在热河省的最后一个要塞——赤峰。他们也继续在苏北挺进。次日，国民党宣布将按预定日程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一组停止敌对行动的八项条件，也提给了共产党人。

尽管在这一系列事件与中共威胁“全国全面决裂”之后，谈判甚至还在进行着。由此也可以想知中国式政治的微妙与复杂程度。在谈判的最后一月里，共产党人的主要目标是要影响那些小党派，其具体目标是要建立抵制国

民大会的统一战线。[168]

同时，国民党军队没有遇到共军多大的抵抗在向前推进着。10月16日，国民党军队向安东及烟台进攻。他们占领了胶济线上最后一个主要车站，并在冀南沿平汉线北上。10月底，蒋委员长向马歇尔将军表示：现在到了应该停战的时候了。11月8日。他颁发命令，命令全部国民党军队停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单方面宣布停火，“进一步证明政府方面实现持久和平与政治稳定的真诚愿望。”在一系列的势如破竹的推进之后，这一切给人一种胜利的感觉，同时还给人一种仁慈宽厚的印象。与此同时，正如白皮书指出：它表明蒋“在事实上仍然掌握着力强求达到政治定局的重新开战的威胁力量。”[169]此时离预定的召开国大的日子只剩三天了。

面对蒋委员长在政治领域及有争议地区内制造既成事实的情况，共产党人仍然坚定不移。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政府违背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大的行动，意味着在中国的明确的“决裂”。因此，共产党告诉政府：它将不参加国大。随后召开的国大，还引起了各小党派分裂的危机。国民党政府加紧催促他们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并延迟三天召开国大以便给他们时间提交名单。与此同时，共产党人却劝告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其后果是，小党派队伍明确地分裂了。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人一道抵制国大，而青年党和四分五裂的民主社会党决定跟政府合作。一个变革中的社会，完成了它政治上的两极分化过程。

国大于11月15日正式召开。11月19日，周恩来动身去延安，从而结束了1946年1月以来的长期谈判。周启程前，马歇尔将军请共产党的谈判人从共产党领袖们那里给予一个正式的答复——他们是否希望马歇尔继续担任调停人。[170]12月4日，周从延安传信给马歇尔，并提出希望转给最高统帅的要再开谈判之门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期望政府接受的。它们是：（1）解散国民大会；（2）按第一次停火协定，恢复到1月13日军队的位置。还有，周的信不回答马歇尔所提的明确答复是否要求他继续调停的问题。实际上共产党拒绝了美国的调停。

e. 蒋打错了算盘——考察一下从6月到11月的事件，各种迹象都说明：蒋委员长的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如果他对政府的军事、经济及政治能力的估价都是正确的话，他的政策会对他的统治有利。他在12月1日告诉马歇尔将军说：将在八到十个月内肃清共产党，而且在长时期内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危险。看来他也过高估计了美国乐意帮助他的程度。就在谈判破裂的时刻里，他的两名主要侍从副官，曾向马歇尔将军请求经济援助。后来当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变成惨败的时候，也就越来越执着地请求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非常不幸，他对这两个重要问题的估计判断，都距离靶心太遥远了。

正如马歇尔将军在8月间向最高统帅坦率地说的那样：

政府在这个时期的敌对行动中损失的东西太多，而能得到的东西是太少了；其后果也许是政府和国家的经济都垮台。最高统帅必须记住：运输线太长及地形复杂，全都对共产党人运用游击战术有利……他[马歇尔将军]反对最高统帅和他的身边的幕僚们的政策，因为他认为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将导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跟之而来的混乱局面不但会削弱国民党，还会向共产党人提供一个绝好的推翻政府的机会。

在7月间与一位高级国民党官员讨论问题时，马歇尔也强调指出：美国

是不会给中国的内战保险的。此后三年的事态，正是按马歇尔预料的方向发展的。他也果然坚持拒绝在中国的斗争中进行军事干涉的政策。

但蒋委员长显然认为只要他控制着中国政府，尽管他不能与马歇尔将军合作来改革他的政体，美国或迟或早总是要帮他的忙的。这是因为蒋对他的操纵国际局势，以适应自己的目标的本领有无限的信心。每当他占上风的时候，利用每个暂时的有利形势的本领，都能很好地为他服务。但当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量及自己对盟友的重要性时，这种本领就倾向于使他立足不稳了。因为他从未能成功地使他的统治有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也从未能成功地组成一个牢固结盟的、与共产党对垒的反共统一战线。他可以掌握个别的政界人物，但中共却驾驭着一个群众拥护的运动。他完全依靠他的军队来镇压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正如马歇尔将军此时所预料的那样，他这样做只会失败。

在美国调解结束后，马歇尔将军曾敦劝国民党领袖们通过一部与政协决议精神相一致的宪法。他仍然希望如果通过这样一部宪法，也改组了参政会和行政院，就有可能吸引共产党人参加国大。他的采用一部向前看的宪法的提议，被蒋委员长采纳了。12月1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一项声明，再一次肯定他在1945年12月15日发布的新闻稿中所规定的政策。他指出美国继续希望中国的内部问题能得到和平解决，并保证美国不干涉中国事务，不卷入国共之争。1月6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召回马歇尔。若干月以前，杜鲁门曾向马歇尔表示将委任他为国务卿。马歇尔离华后不久，国务院公布了马歇尔关于他的使命的个人声明。他把他的失败归咎于“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彻底的、压倒一切的互相猜疑。”他指责说，这种相互间的敌意，一方面是由于“占支配地位的反动集团，他们反对我所做的几乎每一个促成组织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努力”；而另一方面，是那些“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为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任何激烈手段。”仔细阅读马歇尔声明后，可以看出他把首先破坏和解的主要责任加在国民党的身上。马歇尔的意见是：“国民党内的不妥协集团，他们醉心于用封建手段统治中国，显然是没有诚意”履行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达成的协议。而与此相反，共产党人“在去年2月里”并不是“表现为不肯妥协的。”可是，按马歇尔的观点，在最后阶段，共产党人也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因为他们那时“不愿作出适当的妥协”。马歇尔将军所能看到的唯一希望是：“自由主义者们在政府里和少数党派中间担当起领导责任。这是一些极好的人，但没有政治权力以发挥其有控制力的影响”。他表示相信：“在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领导下，他们能成功地……通过一个好政府而团结起来。”就这样，一项真诚地想为中国带来和平统一的努力终究成为泡影。

政治解决的流产，停战的土崩瓦解，局部战斗发展成全国规模的内战，与马歇尔放弃其追求和平的努力，被周恩来在1月10日的讲话中，公然说成是一个暴露美国政策的真正性质的过程。甚至马歇尔的1月7日声明，也被引用为美国政府帮助蒋进一步扩大内战的证据。中共对美国的强烈的敌意，他们对苏联力量的信念，及他们对美国经济政治力量的藐视，在延安的机关报上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文章中，被明显地加以强调。陆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帝国主义”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他认为：“美帝国主义”与“日本法西斯”对待中国的唯一不同点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手段，阴险毒辣，”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反民

主势力”必然要进攻“民主势力”。但“民主势力”必然会胜利。对苏联的“资本主义包围”，再也不存在了。全世界反动势力外强中干。他们日益走向孤立。美国的经济危机，“在今年或明年”将要到来。他断言：“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比现时大不相同。”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不承认1946年1月10日以后国民党政府缔结的一切外国贷款、条约、协定和谅解。这一声明是针对1946年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1946年7月14日的租借法“补给线”协定，1946年8月30日的剩余物资协定，及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

周、陆及中共中央的声明，并不象白皮书所说标志着共产党完全改变了它的政策。它们标志着一个过程达到了顶点，这是一个由1944年共产党人承认与美国的友谊，到转变成直截了当的敌意的过程。这种敌意是由共产党人的根深蒂固的猜疑与模棱两可的美国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而1944年以后远东力量均势的改变，则是这个过程的催化剂。中共在1947年肯定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美国能够决定性地影响他们前途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美国已经完成它帮助国民党政府撤出日本人及运送国民党军队至华中、华北及满洲的任务。它已经结束了中国战区，并已将它的驻华部队从113,000人的最高峰，削减到只剩12,000人。1月29日，国务院宣布从调处执行总部撤出美国人员。这一行动就为从华北撤出全部陆战队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苏联为中共反对可能的美国武装干涉而按兵不动。再次承认友谊没有任何政治意义。公然的敌意，正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倾向。这表明他们对其所相信的、美国在调解中对国民党的偏袒的憎恨。这就使他们与苏联的政策及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步调完全一致。

中共领袖们对中国军事政治形势发展的前景，是同样地乐观。毛泽东在2月1日的党内指示中为即将来临的中国革命新高潮而欢呼。他认为中国的形势将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他指出：在蒋继续进攻的同时，他的攻势变得衰弱得多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损失和预备队的短缺，蒋已不再能从后方抽调大量有战斗力的援兵来进攻共产党的各根据地。按毛的看法，政治形势的发展也同样有利。他指出，蒋的召开国大的举动不是孤立了共产党，反而是孤立了国民党。他总结说：“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毛的越来越强的信心，正好与马歇尔的悲观预测——全面内战很可能导致国民党政府垮台——相互呼应。美国该怎样评价中国的形势，并打算采取什么政策呢？

第十一章局部撤退、有限援助及放弃中国的决定（1947—1948 年）

1. 几种假设的选择和中间道路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达成政治解决的努力失败之后，马歇尔返回美国担任国务卿。1947 年 1 月 8 日，在离华以前，他向司徒雷登大使征求他对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司徒雷登大使用他惯常的空洞而又拘谨的态度，提出了三个可能的途径：第一、积极援助国民党政府，但以要求国民党改革作为援助的条件；第二、不制定任何有力的方案，就这样随波逐流；第三、全部撤退，不干预中国事务。他进一步说，他全力支持第一个选择，但宁可要第三个选择也绝不要第二个选择。他认识到，如果美国按第二个途径办事，它将得罪中国一切方面的舆论。“政府领袖要责备我们抛弃他们；共产党责备我们偏袒；替无能为力的群众讲话的那些知识分子要责备我们在进行帝国主义侵略。”美国的行为只不过是延长了内战的过程，而无法阻止共产党人的胜利。中国人民对美国的大量的良好愿望将被损害，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在支持一个“腐败的政府”。反美情绪会发展和加深。司徒雷登认识到：“一事成功，事事遂心；一事不成，事事拂意。”

司徒雷登告诉马歇尔的意见的基本原则是：要么使美国的努力足以阻止中国的共产主义浪潮，要么就什么也别干。事后观察；看来司徒雷登对美国军援和技术指导在改变中国力量均势的有效性方面的估计，还是过分乐观了。但原则本身倒是健全的。说真的，凡是对美国对华政策该怎么办持各种不同见解的人们，都采纳了这一原则。在 1945 年部分时间和 1946 年内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代办，后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对中共采强硬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的沃尔特·罗伯逊，在 1948 年 3 月 4 日对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

我认为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件事：我们作为美国人究竟是愿意担当起那些应做的对华的工作呢，还是不愿意担当……。我倒宁愿什么也不干，因为我认为你们很可能失去你们已做的一切。

正是在同一原则的基础上，纳撒尼尔·佩菲教授反对在 1947 年冬至 1948 年间向中国增加援助的各种提议。在 1948 年 1 月 25 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佩菲表示了这样的见解：美国真正的抉择是，或者派遣一支 150,000 人的远征军到中国去，或者一切听其自然。在他看来，蒋委员长的美国朋友们援助国民党的提议，除了把共产党人驱入俄国人的怀抱，并不能帮助政府打败他们。马歇尔将军在谈及欧洲复兴方案时，也明显地采用这种观点。据报导：他在 1948 年 1 月间在请求国会为这个方案的头 15 个月拨款 68 亿美元时，曾说过：“一个经费不足的方案，只能取得无成效的后果；结果反而浪费了我们的资源……。要么我们就满足这个方案的需要，要么就什么也别干。”

不论马歇尔将军的基本观点和其他官员们私下里的希望是什么，在 1947、1948 两年中，美国的政策漂泊不定地移到两种现实主义抉择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无法认定这两种抉择中的任何一种。美国从 1947 年初开始采用局部撤出方案；到 1947 年 10 月却采取有限援助政策；最后，终于形成 1948 年 4 月的援华法令。按后来艾奇逊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的说法：这个

有限援助方案是在这样的时刻采用的，当时政府和国会都拒绝把美国的无限武力资源投入到中国的斗争中去——而如果美国愿意的话，那将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于是有限援助政策就在这较日本投降以来的任何时刻都更少成功希望的关头达到了顶点。而它在中国所起的唯一政治效果乃是进一步证明，美国跟一个公认为没有希望的事业牵扯在一起。

援华法令中包含的有限援助方案刚刚执行完毕，国民党就在 9、10、11 月的三个决定性战役中遭到惨败。1948 年底，马歇尔从实用主义的目的出发，已经把中国大陆和福摩萨一笔勾销。但在援华法令下的经济援助一直未停，同一法令规定的由中国政府支配的 1.25 亿美元专款的军人运送，也一直未停。美国仍继续被纠缠在中国。她陷入漩涡的中心，不仅剥夺了她的行动自由，而且还揽上了责任；或者采取积极干涉的政策，或者就要迅速撤退。美国的政策使共产党人对美国的歪曲看法变得确实可信；而另一方面，却又无法使他们对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留下印象。它抛弃了国民党人，而另一方面却大大地惹起共产党人的敌意。美国企图用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方法避免战争，但美国继续纠缠在中国一事，却增强了共产党人的仇恨。这样就为福摩萨海峡中立化及美国越过三八线以后的军事对垒打下了基础。

2. 马歇尔寻找一项政策

在 1946 年 7 月，当中国的政治军事和解迅速垮台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对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特说：如果维持和解的谈判破裂了，他将建议有一个撤退阶段，以便美国能有两三个月时间来重新估价她的对华政策。1 月 21 日，在他从中国返回并担任国务卿之后不久，撤退政策就被付诸实施。1 月 29 日，美国政府宣布结束与三人委员会及调处执行总部的联系。这一决定就使撤出负有保护交通线任务的驻北平、天津、塘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成为可能。[171]同时，一支警卫队分遣队仍留驻青岛，那里有美国海军训练团在负责训练中国海军人员，并在那里静静地注视俄国在旅顺大连的动静。[172]在 1947 年的头五个月中，禁运令继续生效。

美国未能与国民党中国合作找出一项共同政策，并因而使马歇尔的调解计划彻底破产；随后来临的暂时撤退政策是正确的。但事后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撤退阶段才有最大利益可图。其一、美国的撤退应该是完全的而不是局部的，这样就能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势不可挡的压力，促使它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它有资格接受恢复了的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其二、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将有可能在两个同样不愉快的抉择中挑选一个，视国民党的反应如何而定。如果由于美国撤退的压力导致国民党政府因改变基本政策或领导人选而获得新生，就会产生有效使用大规模美援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同时，必要时动用美国武装干涉来部分地保住中国的政策，也就有相当大的成功的希望。如果国民党政府不能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稳定和用美援保持权力的能力，那么，美国政府就可以迅速摆脱它与一个垂死政权的关系，并保持它剩下的行动自由。

不幸的是，这两个难以实行的步骤，一个也没有被采用。撤退是局部的而不是完全的。按某种尺度来衡量，这是过去的模棱两可的政策与行动的趋势所形成的后果。在 1947 年上半年，国民党的经济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数达 235,108,000 美元的供应的最后一批装运而得到支持，也由于从 1946

年8月的剩余物资协定中得到的物资而得到支持。美国陆军顾问团及海军顾问团，仍留驻在中国。前者被准许在组织装备国民党军队方面提供咨询。[173]4月间，总统指示海军部长将某些船舰及干浮船坞移交给中国政府。3月间，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的一次会上，国务卿马歇尔强有力地支持国民党，反对苏联把有关调解中国内战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要求。[174]

马歇尔在寻找新政策时，无论是在局部撤退期间或在以后，都未能采用两种现实主义抉择中的一种。恰恰相反，他显出不能作出这一为难的抉择的迹象。从他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下列证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1947年初的心情：

回国以后，我在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长久之计上陷入了困境。这是因为国民党机构腐败不堪，而共产党集团则有决心、有组织、有纪律，毫无疑问还要加上从苏联政府方面来的咨询与将来可能会给的支援。

一年以后，在1948年2月1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马歇尔念了两个文件，其中心思想是认为中国问题“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当国民党政府在灾难的边缘上摇摇欲坠的时候，马歇尔的迷惘就变成了绝望。据报导，他曾在1948年8月13日说：“我撒手不管那个问题了。那是一个我完全不能理解也无法作出判断的问题。”

马歇尔的日益迷惑不解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1947至1948年的事变使他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困难更大了。国民党自1947年夏天以来在战场上的失利，以日益尖锐的方式提出对华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及最后动用美军的问题。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日益加剧的经济、政治困难要求美国直接援助，但同时那些一直使得美援失效的因素却成倍地增长了。马歇尔的困境也由于在中国以外发生的两件事而变得更尖锐。第一件事是共和党领袖们日益猛烈地批评他的政策。第二件事是美苏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关系及美国政策上的革命性的变化。具体地说，就是1947年3月12日的杜鲁门主义及马歇尔的欧洲复兴方案。对希腊、土耳其的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使某些共和党领袖们有更多的理由加紧要求对华采取积极政策。看来，共和党方面对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也要求政府方面向共和党领袖们的对华政策观点作出让步。缺乏两党一致的政策，对国民党领袖们是有利的。他们很快使美国政府的结算变得对他们有利。他们能通过议会内的共和党领袖们所施加的压力，来影响美国的政策。

政府缺乏旗帜鲜明的政策，在日益增强的议会压力下采取有限援助政策，与国民党对美国内部意见分歧的利用，这一切构成了1947至1948年美国政策发展的主要特征。用美国面临的现实主义抉择的观点来看问题，日益发展的两党僵持与有限援助政策都是荒谬的。但是，美国传统政策的两个自相矛盾的成分是：希望保持美国的影响；却又不能使用武力。作为这一矛盾的产物来看，它们又是可以理解的。

3. 日益增强的共和党的批评风暴

为了按历史顺序叙述1947年共和党掀起的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有必要回忆一下在马歇尔使命期间美国国内对他的政策的普遍支持。在1945年12月

27 日的市广播会议上，众议员沃尔特·贾特曾为杜鲁门总统的 1945 年 12 月 15 日声明祝福。正是这个声明才是构成马歇尔在中国搞联合政府的努力的基础。马歇尔完全相信：“蒋的争取统一、民主和永久和平的中国的愿望的诚意”；并表示了这样的见解，即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使共产党人支持政治统一与民主的说法的虚伪性暴露无遗。4 月间，当马歇尔向对外关系委员会亲自作报告时，他得到的印象是大家普遍接受并赞同他的政策，虽然没有正式表示过意见。5 月间，60 名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美国人发表了一个名为《满洲问题宣言》的声明，尖锐抨击苏联在满洲的行动是明目张胆地破坏中苏条约及雅尔塔协定。它呼吁美国政府支持“中国人民彻底修改雅尔塔协定的要求”。但它却没有直接攻击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及其行动。7 月间，据引证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欧文·布鲁斯特的话说：“在中国局势问题上，共和党将附和与马歇尔将军。”

当 7 月 26 日众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在《国会记录》中插入一封 38 名美国人的联名信的时候，才首次由共和党表示了不同意见。是因为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一项声明的报导，才促使人们写那封信。这个声明提到作为马歇尔整编共军及国民党军方案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准备在共军编入国民军之前装备和训练他们。这封信敦促再也不要援助和支持给予共产党人。它批评杜鲁门的 12 月 15 日声明是“向共产党人发出请帖，请他们敲诈勒索中央政府”。在中国的武装冲突开始蔓延以后，《生活》杂志于 9 月 2 日刊登了一篇社论，要求美国将“持续的、全心全意的、大量的援助”给予国民党，并同时请国民党人“把自己家里整顿好”。

在中共停止了与国民党的谈判并拒绝美国调停后不久，在 1946 年的期中选举中，共和党人大获全胜，并建立起一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杜鲁门政府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当时存在着普遍的期望，期望共和党人在 1948 年的总统选举中再一次获胜，由于两党分别控制了总统职位和国会，使这两个政治机构争夺指导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利的斗争更加激烈。由于共和党很可能会在 1948 年夺得总统位置，这就削弱了人们对杜鲁门政府能否形成稳定的美国政策的信心。共和党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在 1947 年 1 月下旬的一次讲话中宣布（这篇讲话事先得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及挂名的共和党首领托马斯·杜威的认可）：

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可以提议，但是共和党的国会可以撤销。外国外交家们知道这一点，他们正在疑虑——这一点我们也晓得——从现在起的两年以后，一个共和党人将走进白宫。所以这些外国政府都不很认真看待美国的提议——那些只有民主党人支持的提议。

关于共和党人提倡不同的对华政策的迹象是层出不穷的。1 月 11 日，参议员范登堡在一次讲话中敦促美国对华政策来一个重点转移，转移到鼓励国民党人实施宪政体制。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 1 月 31 日发表声明。他在主张对俄国采取强硬政策时说：美国不能容忍把中国推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它必须向一个刚刚采用民主宪法的国家保证对它的支援。在 2 月 10 日的讲话中，杜勒斯先生号召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持续的援助。

3 月 12 日杜鲁门主义的宣布，及总统提出要求对希腊和土耳其提供 4 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很自然地引起国会内某些共和党领袖们对政府的对华

政策提出批评。同一天，在众议院辩论总统的来信时，众议员贾特抓住这个机会批评了马歇尔的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努力。他责问原先的多数党领袖众议员约翰·W·麦考马克说：

难道这位先生也感到，当我们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时，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庄严的责任感添上一点后悔的色彩？我们难道不后悔我们曾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少数派来推翻政府？这个政府尽管有它的一切弱点，但它坚决拒绝向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屈服，正如同样的压力也威胁希腊和土耳其一样。

次日，参议员布鲁斯特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宣称：美国的举动是反常的，一方面帮助乔治国王打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却叫蒋介石跟他们拥抱。

3月22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问题的意见听取会上，贾特还请代理国务卿艾奇逊解释美国政策中的这一“矛盾”。艾奇逊答复说：在1947年1月6日马歇尔声明中表白的当前美国政策，并不以“把共产党人拉进政府为目标，而使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能更有效率为目标。”他随即解释说：

中国政府目前的处境与希腊政府不同。中国政府并没有走向崩溃。它没有受到被共产党人打败的威胁。近二十年来，对共产党人的战争一直在持续不断。

几个月后，艾奇逊受到严厉的批评，因为在他把中国与希腊的形势作对比时，对中国的问题轻描淡写。但在那时看来，艾奇逊对两国形势的估计是合理的。林肯·麦克威大使在2月20日向国务院报告说：希腊在经济上、心理上和军事上，有完全崩溃的危险，乃是几周内指日可待之事。当时，从希腊传来的令人惊讶的消息达到高潮。与之相反，那时国民党军队仍在对共产党的各据点发动大规模攻势。从外表上看，攻势还是得手的，尽管在2月底已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共产党人已在满洲展开有限攻势。3月14日，国民党开始对红都延安发起攻击，并于3月19日占领延安。国民党参谋总长公开声称，共产党人将在三个月内被击败。8月底或9月初，蒋委员长对司徒雷登大使说，共产党人如不被歼灭也会被赶到边远地带。

国民党人的这些话及攻占延安的意义，被美国大使馆打了折扣。它在这个时期的报告谈到国民党军不能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和军队士气的日益低落。但还没有国民党人大大失利的报告。当这个时期以来的一次极严重的经济危机在2月初爆发，物价在数天内涨了一倍，黑市汇率在三星期内涨到三倍的时候，政府还能用重新实施战时工资物价管制及禁止一切罢工的办法来稳住局面。有迹象表明：此时的美国官员们期待打一场消耗战，或打成僵持状态。消息灵通人士如刚从中国考察国务院的《文化关系方案》后返美的纳撒尼尔·佩菲期望在六个月或一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僵持局面。他不相信共产党人能征服全中国。事后看来，显然美国官员和观察家们都大大地低估了共产党的军事能力，而且尽管他们批评国民党的失败，却仍然过高估计了政府的军事力量和政治上的生命力。看来这一判断失误及随之而来的缺乏紧迫感，乃是1947年头三个月中不能采取旗帜鲜明的政策的辩解之一。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应该指出，这时，甚至一年多以后，共产党人自己都在期待一场长期的战争。

4. 政府在左右为难

4—5 月间，中国的局势急遽恶化。4 月下旬，爆发了新经济危机。尽管有物价管制，数星期内物价上涨了 50% 到 100%，黑市汇率猛升。共产党人在 4 月下旬在山东展开反攻，并在 5 月中旬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进攻。在满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发动了强有力的夏季攻势，并在数周内使吉林、长春和四平街的国民党军队陷于孤立。5 月 30 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警告说，有突然崩溃并使全部满洲落入共军手里的可能性。共产党人的这些成就，使国民党人速胜的希望彻底破灭。

经济上的混乱及军事上的缺乏成就，导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安定。5 月 5 日，上海学生示威，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尽管国民党在 5 月 18 日下令禁止一切示威和罢工，但它还是很快扩展到其他各大城市。政府的残酷镇压措施，成功地避免了号召在 6 月 2 日举行的全国范围罢工。但这些措施，却激起了甚至是政府的支持者们的对警察暴行的抗议。[175]5 月间，立法院的 20 名立委提出一项决议，呼吁恢复与共产党的谈判。5 月 25 日，国民参政会（1938 年成立的使非国民党的各党派能在政府中有某种程度代表权的咨询机关）以大多数票通过一项邀请共产党代表回南京谈判以结束内战的方法和措施的决议。很可能这一切纯粹是一种政治手腕，以便将继续内战的全部责任加到共产党人的头上。但即使如此，国民党感到有必要采取这些举动的事实本身，就说明反内战的情绪在全国已高涨到何种程度。

杜鲁门主义的宣布及 4—5 月间中国事态的急转直下，提供了一系列中国要求美援的背景。显然，杜鲁门主义增加了国民党政府取得大规模援助的希望。为了国民党的得救，形势变化使国民党比以往更依赖美国重新恢复援助。从 5 月到 6 月，它提了三次不同的希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请求。为了使最后一次请求能有压力，国民党领袖们在几次声明中警告说：有共产党人控制中国的危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在 6 月 23 日的日记中写道：在华盛顿的中国官员们，“显然是要在首都再一次发起谋求对国民党政府的进一步援助的运动。他们特别爱用共产主义的危险作为主要论据”。

这些请求使国务院官员们在拟定对华政策时遇到复杂的新情况；因为必须根据政府的全球纲领及共和党人希望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要求来权衡国民党的请求。早在 3 月 5 日，美国官员们就开始认真考虑对西欧的大规模经济援助问题。5 月 8 日，在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的一次讲话中，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事先曾得到杜鲁门的认可，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即准备每年用 50 亿美元持续若干年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为了确保这个方案的通过，政府必须谋取可能争取到的最广泛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向共和党的对华政策的批评让步。因为对欧洲方案的最严重阻碍，并非来自那些鼓吹改变对华政策的人，而是那些一心想节约的议员们和重新崛起的孤立派两相结合的力量。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已根据马萨诸塞州议长约瑟夫·马丁的呼吁开始开会，他们要求全面削减 20% 的所得税，因此必须充分削减政府的支出，以保证前一削减得以实现。因此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们正在谈论将总统的 375 亿美元的预算减掉 60 亿。虽然对希腊和土耳其的 4 亿美元援助的法令在国会比较顺利地通过，但政府在请求不要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后的一笔 3.5 亿美元的救济金作 1.5 亿元的削减时，是费了一番周折的。

面对一心想节约的国会，面对专心致志地考虑拟定一项昂受的欧洲复兴方案的历史任务，美国官员们认为任何对华的大规模援助的大部分，是会被浪费掉的。他们害怕因此而减少欧洲所能得到的基金。于是，政府拒绝了中国人的请求。但为了向共和党人的对华政策的批评止步，以换取他们对欧洲方案的支持，政府必须采取某些帮助国民党人的举动。这种举动应该巧妙到足以避免公开干涉中国内战的姿态，又很节省不足以使它吸干美国的资源。当美国陆战队在 1947 年 4 月到 9 月间从华北撤退时，他们“丢弃”了 6,500 吨弹药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给国民党。[176]1947 年 5 月 26 日，武器禁运令在实行了十个月以后被解除了。这一措施结束了局部撤退阶段。6 月间，美国又将 130,000,000 发剩余的步枪子弹以原收购价的 10% 售给国民党政府。[177]9 月 15 日，沃尔顿·巴特沃思继约翰·卡特·文森特之后，被任命为远东事务司司长。如同解除军火禁运令一样，文森特被从这个重要位置上撤换下来去担任驻瑞士公使，乃是对共和党人的一个让步。还有第三个让步，是 7 月 11 日宣布派魏德迈将军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178]这一措施是共和党人贾特向马歇尔将军提议的，并成为一件司徒大使绝对料想不到的事。

5. 魏德迈使团

据魏德迈后来叙述，他担任赴华使命乃是为了完成一项“双重任务”：“既说服中国人拿出证据来表明美援不会被浪费掉，又说服华盛顿必须提供这种援助。”他一方面力图给国民党政府这样一个印象：除非它进行某些基本改革，否则就不能得到声援。另一方面，他企图表明：美国的安全和利益，只能用批准长期的、大规模的援助给一个“现在是腐败的、反动的和无效率的中国国民政府”的方法来保护。这是引用他后来的报告中的说法。他期待国民党有新生的迹象。他着重指出了国民党进行改革的绝对必要性。而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权，将有助于他劝说美国政府采取对华大规模援助的方案。

魏德迈将军及其使团的成员于 1947 年 6 月 23 日抵南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访问中国各大城市，接见了一些中外人士，并接受书面的意见交流。魏德迈严格地按照指示办事，也可能是着眼于施加压力以促成改革。他把这一点表示得很明确：即他不能允诺什么援助，也不能暗示他将建议一些什么。在他旅行完毕返回南京后，蒋委员长请他向高级文武官员们讲话，并向他们坦率地说出他考察得到的情况、印象和意见。由于司徒大使的敦促，他接受了邀请，并乘此机会严厉批评政府，并强调进行各种改革的迫切需要。他把军事上的失利归咎于政府在政治上的愚蠢。他申斥政府的腐败、无效率、无能、裙带风、对政治犯的粗暴行为，以及不能动员那些外国的和本国的豪门权贵的资产等。[179]他断言不能用武力打败共产党，因为今天“中国是受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侵略，而不是外来的强大军事力量的侵略。”他警告说：政府只能用立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施改革的办法，来赢得人民的支持。政权是否能站住脚，全靠能否及时地、有效地进行这些改革。他的讲话很不受欢迎，他的骂倒一切的批评，显然得罪了最高统帅。[180]为了敦促政府赶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魏德迈在 8 月 24 日离华时的一项公开声明中，重申了他的观点。在声明中，他批评了各个角落里的那种麻木不仁、死气沉沉、自

暴自弃的失败主义情绪。这种情绪表现在以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花在谴责外来之影响与觅取外来之援助上。他用以下的告诫作结束语：

为重获并保持人民之信仰计，中央政府须立即实施大刀阔斧而范围广泛之政治及经济改革。单靠诺言无济于事，亟须付诸实行！

如果魏德迈将军认为以给或不给援助的权力为后盾的口头上的规劝，能在这个转折关头使国民党领袖们改变主意，并进行必要的改革——有迹象表明他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全弄错了。在他离华前，中国政府给魏德迈将军一份备忘录，在其中国国民党政府声明说：它已大部分实现了美国建议的内政改革。行政院长张群在9月2日接见合众社记者时，阐明了国民党对魏德迈8月24日声明的反应。张先生指责说，魏德迈将军不了解中国的情况，而且他的消息不是没有偏向的。这位中国官员直截了当地宣称：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不会因为魏德迈使命而有什么变化。

中国人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的理理由之一，就是因为魏德迈将军未能用暗示将会积极建议大规模援助的到来为他的批评裹上一层糖衣，而他在那时已决心如此建议。但一个更基本的理由是：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对统治集团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利，并很可能摧毁它的权力基础。中国的基本情况是：除非变动最高层领导人，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改革。只有在军事失利和美军撤退所施加的压力足以动摇最高层领袖们对自己掌权的信心之后，才可能出现一个新群体或几个群体的组合，来代替他们。但这正是魏德迈将军所不欲采取的抉择。因为他担心“这样一种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求最高统帅与中共取得妥协”，这样就会在政府内给中共以支配地位。再不然，那漫长的土崩瓦解的过程，也会以共产党人作为支配集团的情形出现而告终。因此，他拒不采用他称之为对华“不给援助”的政策，及“等着瞧”的政策。再有，魏德迈将军如马歇尔将军一样，不能设想中国可以没有蒋委员长。所以，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统治集团进行必要的改革上面。国民党政府对他的批评的敌意反应，使他大为惊讶，并使他严重关切。

在他离华后不久，魏德迈将军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在两个互相依存的目的上，其中一个已经失败了。这就是说服国民党政府除非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不能取得美援。但是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执拗态度，他仍在其报告中提议给中国长期大规模经济军事援助。他显然相信：对使用美援的严格监督，在军事和财政部门出现美国顾问，及持续的美援作为施加压力的工具仍会带来必要的改革，并使国民党政府获得新生。[181]他事后对使命的叙述还表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批评及他着重为美援提出要以改革作条件，也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之用的。正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中国命运所倚的美国。当我无论如何也要提议对它进行援助时，我希望用忠实报导在中国所发现的一切错误的方法，来证实我的诚意。

这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是至关重要的，俄国和中共的威胁是非常紧迫的。他是愿意比政府承担更大的风险的。

在1947年9月19日的报告中，魏德迈将军指出：美国对远东的传统政策的目标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正受到“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十年里的

那些同样凶恶的势力”的危害。因为苏联正以积极扩张它的控制地区和势力范围为其目标。在远东推行这一目标时，它受到中共的积极协助。“考虑到中共公开流露的敌意，和积极反对美国人认为对世界和平生命攸关的那些原则等情况，中共支配下的中国将敌视美国的利益。”在战时，不友好的中国将拒绝向美国提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而将基地交给美国的敌人，这会使美国在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遭受近距离空袭的威胁。统一而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则不仅会提供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并且从它的幅员和人力观点来看，将会是一个重要盟国。

魏德迈倡议：“在各军事部门的美国顾问的监督下，将充足的迅速的军事援助”给予国民党政府。在这个方案下，美国将与中国作出安排，从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军用物资及军火弹药。美国对国民党的军事上的顾问和监督应扩展到野战部队、训练中心，特别是包括后勤部门。魏德迈拒绝让“美国人员积极参战”，因为这不符当前的美国政策。为避免以任何方式卷入对中共的真正战斗，避免被批评为进行武装干涉，美国顾问的咨询活动应在战场以外的地区进行。然而美国人员却要“间接地向战术部队提供咨询”。按他的估计，大约需要一万名军官及退役军官，给国民党的野战军提供咨询和监督，直到团的一级。[182]陆军顾问团将继续向参谋总部提供咨询。美国顾问将安置到国防部。

魏德迈也倡议向中国进行“至少为期五年的”经济援助方案。这个计划以中国的表现和不断的进步为条件，将保证中国经济建设所必须的一些项目的早日动工，其终极目的是为了稳定它的货币制度。魏德迈没有建议特定数额的财政援助。他让国会根据各有关部门的建议来决定这一数额。为了准备美国的经援方案，他提议由国民党政府成立一个“高水平的设计和审查部门”，由美国顾问和合格的专家组成，来拟制一份全面的优先建设的项目表。美国顾问也要进入财政部工作，特别要在预算及税收领域内。魏德迈方案准备让美国为中国的经济军事事务承担庞大的责任。魏德迈将军认识到满洲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但是他也知道国民党政府无力在短期内打败共产党，并在这个地区消除苏联的影响。他担心共产党人也许不要多久就会在军事上控制满洲，宣布成立一个分离主义的政府。并且“苏联可能按外蒙古的方式与共产党的满洲政权签订一项互助协定”。他在他的报告中重申他在1945年11月初次提出的一项建议。这就是在联合国之下，建立在满洲的五大国的“监护制”，由中、苏、美、英、法担任监护。如苏联拒绝参加这项计划，中国可以要求联合国大会在满洲建立“托管制”。他认为：为满洲建立“监护制”或“托管制”，将在苏联与更南部的地区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带，这样就可以遏制苏联的影响。这一推荐方案，后来被他说成是他报告中的“最重要成份”。魏德迈向美国政府建议的方案，同他说服国民党政府进行改革的努力相比，其命运并不更佳。国务卿马歇尔口头上表扬了魏德迈报告，但不采取任何行动。魏德迈被告诉不可以将他的报告的内容透露给任何人。国务院的官员们并不跟他讨论他的报告。不久情况就明朗了：他推荐的方案被拒绝了。马歇尔有一大堆复杂的理由来拒绝魏德迈方案。考虑到美国常规部队的劣势和全球形势，马歇尔和参谋长们都感到美国不能承担派一万名军官及退役军官到中国的任务。在1947年6月，陆军的实际兵力为925,163人。其后果是，马歇尔不知疲倦地重申在美国本土只有 $1\frac{1}{3}$ 个师。马歇尔还担心魏德迈

方案将导致美国越来越重的负担。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魏德迈自己也承认，根据形势的变化，美国人员将不得不“直接进入作战地区，并在战术上帮助这些中国人”。马歇尔下决心不采取任何将导致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措施。加之当魏德迈交上他的报告时已很清楚：国民党政府拒绝了他的批评，它也不愿进行那些必要的改革。采用魏德迈方案只会使美国承担巨大责任，而美国从国民党政府方面却得不到相对应的承诺。这些及其他理由都反映在白皮书的一项声明中，这个声明提纲挈领地写出 1947 年 10 月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考虑：

大家都承认，解决中国问题，总的说来，大部分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美国援华计划不应该使美国处于负起进行中国内战或中国经济之直接责任的地位。美国政府不能在实际上接管中国政府和处理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事务。任何这种情形，都会使美国卷入持续不断的责任中，都会使美国无法解脱。同样必须考虑到的，是美国在其他地方所担当的援外重责，以及美国资源在她和平时期的经济体制之下所能担当的援外的限度。

国务卿马歇尔还找到了反对全文公布魏德迈报告的重大理由。马歇尔派新任远东事务司司长巴特沃思先生去请魏德迈删去他报告中有关在满洲建立监护制或托管制的那些部分。魏德迈将军不肯照办，于是他的报告就被马歇尔本人亲自压下了。[183]据说压下的理由是魏德迈推荐的在满洲实行监护制或托管制的方案是不现实的。而且“如在当时公布这一类举荐方案，将会被看成侵犯中国主权，并把中国政府说成无能管理中国领土，因而会大大冒犯中国人的敏感心理”。[184]

压下魏德迈报告是政府的最不必要的同时也是最不幸的行为之一。如果公布了这个报告，爆发出来的公开辩论将澄清许多根本问题。如果公众表示不愿负担对华积极政策所需的代价，不愿冒最终使美国参加中国内战的危险，那么政府也就得到了对它的消极政策的批准。如果政府在辩论中输了，那么，那时就开创对华的新政策尚为时未晚。在任何情况下，政府就不那么容易受到攻击，说它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了重要情况。加之，压下这份报告的基本理由并不是美国面临的中心问题。真正的中心问题是，美国应否给中国以大规模的长期援助。暴露魏德迈推荐的有关满洲的方案并不会使中美关系的紧张化超过雅尔塔协定或马歇尔 1947 年 1 月 7 日声明所引起的程度。由于突然过度顾虑国民党政府的敏感心情，政府犯了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185]魏德迈使命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后果。宣布派遣魏德迈到中国一事，曾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期望，以为大规模的美援不久就要来到。希望最后变成失望，这就加强了右翼 CC 集团，并削弱了温和的政学系。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四中全会在 1947 年 9 月开会时，CC 派巩固了它的地位。由于它的坚持，虽然面对着政府内相当多的人的反对，民主同盟被宣布为非法。这一行动对共产党人有利，因为它把那些非共产主义的反对派驱赶上与共产党积极合作的道路。[186]魏德迈在临别声明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公开批评，为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提供了食料。魏德迈使命未能带来大规模美援一事，促使国民党人多次暗示和威胁要与苏联改善邦交。在报告被压下以后，魏德迈将军开始感到，他“可能是为减轻国会和全国的怀疑而被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继续那陈旧的、灾难性的对华政策提供必需的理由”。如果魏德迈对马歇尔动机的判断是正确的，显然国务卿的手腕反而损伤了自己。共和党的批评者

们抓住他压下魏德迈报告一事，作为鼓吹更大量地援华的新争论点。

主张大规模援华的人，可以用 1947 年 10 月 13 日的《生活》杂志上威廉·布立特先生的有名的特约稿《报导中国》作为被压下的文件的代替品。布立特刚从远东的旅行返回。他提出了一个拯救中国的三年计划，共需代价 13.5 亿美元，包括军事和经济援助。他敦促美国立即提供一定数量的军火贮备给中国，特别要给满洲；安置美国顾问为国民党军队担任训练和作战任务；由美国管理中国对满洲的后勤供应工作；新成立 30 个中国师；并将麦克阿瑟将军以总统本人的代表身份派往中国。跟魏德迈一样，布立特也不认为美国应当在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可是他愿意在为国民党提供咨询及控制军务方面接受更大的责任。跟他遥相呼应，正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于 10 月 11 日拜访了蒋委员长。国民党领袖重申了他对更大量美援的要求，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最后被打败，那并不是苏联或中共有能耐，而是由于美国不能“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提供许诺过的援助”。

6. 有限援助政策

面对共和党的日益强烈的要求，政府觉得有必要为中国准备一个方案，一方面可以挡住日益强烈的要求大规模援助的压力，另一方面则严格限制中国的责任。政府所以被迫这样做是因为有必要谋取共和党的合作，来迎接日益加剧的欧洲经济危机。为了拟定出全面的欧洲复兴方案，政府准备在 11 月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来通过一项紧急援欧的立法。9 月 30 日，杜鲁门总统请参议员范登堡开始举行对政府批准给法、意、奥的临时援助提案的听证会。10 月中下旬，国务院开始制定援华方案，也即白皮书中所说的“重新规定美国的政策”。政府准备把一个对华经济援助提案提交国会。10 月 27 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个 2 千 7 百万美元的对华经济援助协定。国会在上一年春季曾指定其用途是作为联总之后的救济金，同一月内，国务院同意陆军顾问团参加台湾的一个训练中心的训练工作。11 月，戴维·G·巴尔少将奉派赴华任陆军顾问团团团长，并被授权用非正式的参与机密的方式向蒋委员长提供作战咨询，但不负中国的战略谋划及作战行动的责任。在 5 月间撤销了军火禁运令，又经过五个月的犹豫不决之后，接着就展开了有限援助政策。

给中国有限援助的政策，对保证国会接受政府的欧洲方案，是完全必要的。但它并不代表一个对华的现实主义方案。1947 年下半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发动攻势。在 7、8、9 三个月，共军三个纵队渡过黄河向南推进。在 1947 年的后四个月内，他们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直至海边的广大地区内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共军的这一大胆进军，是在国民党军队主力在山东和陕北向共军进攻，中原地区守备部队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在 1947 年末，共军在从华北到满洲的铁路沿线布署兵力，并经常切断这些线路的交通。

毛很清楚他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在 12 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他宣称中国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他宣称要让全世界都来深思那些指导共军走向胜利，并将继续指导他们的军事原则。他确信国民党既不能采用他们的战略，也不能找出有效的对付方法。他确信单靠美国顾问和军事援助，是不能挽救政府军

的失败的。他指出：他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广泛的群众拥护的政治基础上的，这种拥护是他享有而蒋委员长却失掉的。他解释说：

[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据报导，毛还说过，国民党政府除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弱点外，还受下列五个基本矛盾，或者说军事上的弱点之害。这些矛盾和弱点，决定了它的军事努力只能遭到失败的命运。这些矛盾是：（1）战略目标是要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但与兵力及预备队不足发生矛盾；（2）上述战略目标与战术上必须集中兵力以争取主动发生矛盾；（3）蒋的嫡系部队与其他将领的部队之间的磨擦；（4）少数国民党军官的好战与广大官兵的厌战的矛盾；（5）战术上的许多弱点，如指挥不统一，不能有效地使用美援等。正如不久之后表明的那样，马歇尔在三个月后也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必须面对国民党政权很快垮台的可能性。

7. 对中国的临时援助及在中国问题上的激烈争论

11月10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与众议院联合开会听取关于政府批准给法意奥临时援助提案的意见。在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议长约瑟夫·马丁再一次强调了共和党在援华问题上的立场。马丁敦促拟议中的援欧方案应扩展成在世界各国对共产主义作战，而不是只限于欧洲。他说国会也许愿意像援助西欧那样援助中国。在开幕词中，国务卿马歇尔要求提供5.97亿美元作为对法兰西、意大利和奥地利的临时援助。他还对委员会说，陆军部不久将要提出大约5亿美元的追加援助给当年的法西斯的占领区，其中3亿美元将提供给西德。对于全面的欧洲复兴方案，马歇尔为1948年财政年度的最后三个月提出的估计数额约为15亿美元，而为以1949年6月30日为截止期的财政年度则估计为60亿美元。

在提出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欧洲的巨大花费时，国务院发现有必要对共和党的援华要求作出某些肯定的答复。因此在开幕词中，他还对委员说国务院正准备及早提出一个明确的对华经援计划。[187]在回答参议员范登堡的问题时，马歇尔说政府请求3亿美元的对华经济援助，其期限为15个月，从1948年4月算起。这个数字是以每月2千万美元为基数推算出来的，与布立特估计中国每年需要经援2.5亿美元的数字很接近。此时，政府不打算提供可以由国民党政府用来购买军需品的美国基金。再有，政府的方案是短期性的，并将与欧洲复兴方案同时开始。提出这一经济上的援华方案显然是政府为保证顺利通过临时的及全面的援欧方案而愿意付出的代价。

从共和党领袖们对政府以临时援欧的要求作为整个马歇尔计划的序幕的最初反应上来看，政府采取提防措施是有理由的。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就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他那时的观点反映了孤立主义者及共和党内一心想节约的领袖们的看法。11月10日，塔夫脱声称：必须考虑进一步的援华条款。次日，马歇尔在国会各委员会说完了他的证词之后，塔夫脱说他“绝对反对”

为追加的援外而扩展到 26.57 亿美元。据马歇尔说：这个数额是为 1948 年财政年度的剩余时间内用的。在他看来，批准援欧只会进一步给共产党人提供论据，来攻击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后来，当参议院考虑马歇尔计划时，塔夫脱曾不成功地试图从这个方案中削减 10 亿多美元。他只是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开会前不久，才被说服支持批准欧洲复兴方案。

临时援助方案的听证会，导致众议员贾特系统地申述他的观点。其中有许多正是那些亲蒋的批评政府的中国政策的人们——一群被威斯特菲尔德称为“中国帮”的人们——所广泛共有的观点。贾特在原则上支持政府的欧洲方案，但他的支持要求以政府对华也采取类似方案为条件。他对同僚们说：美国的援助和行动有助于扭转希腊、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共产主义浪潮。然而，在他看来，欧洲的全面复兴要依靠恢复战前的欧亚贸易方式。他声称：“[我们]在亚洲必须要赢，否则最后我们在欧洲也要输。我自己就不会投票支持花费 200 亿美元只守住一条战线，而忽略另一条对我们同样生死攸关的战线”。在贾特看来，中国是亚洲的关键。他问道：“如果中国被共产党人拿去，”那么“印度、马来西亚、东印度群岛，甚至还有菲律宾，又能对这个压力抵抗多久呢？”贾特不把亚洲的重要性放在欧洲之上，但他相信如没有非共产主义的中国，那么非共产主义的西欧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

贾特报告说，中共在国内正在迅速地摧毁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自 1944 年以来在国外为共产主义张目的宣传已顺利地使国民党政府信誉扫地。贾特指责说在美国参加这场宣传攻势的，“主要约有二三十个作家、演说家和评论家，还有在我们国务院里担任远东问题顾问的一些人们”，包括“大家轰传的国务院的‘红色细胞’远东司”。这些人一贯追随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系的党派的路线。这样一来，远东问题专家们对蒋的弱点的精确分析，他们对援助一个腐败的暴虐政权的道义上的反感，以及他们对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低估，都被带上了党派色彩。这一党派性的攻击，使制定政策的工作更加复杂化。它使基于现实主义立场，主张迅速完全撤退的提议变成一种冒险，因为共产党及其同路人从他们自身的理由出发，也要求美国撤退。

贾特以美国传统政策为基础来谴责政府的方案。贾特谴责起来是很方便的，这是由于传统政策的模棱两可，也由于该政策缺乏公认的共同理解。按照他对历史的解释，“一小撮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加上一些误入歧途的自由主义者”，制造了“历史上最惊人的大倒退之一”，即正当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奏效的时候，却抛弃了它。据贾特的定义：这个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政府，反对其他强国的侵犯，即使那个政府是完全不民主的，无效率的和腐败的。当杜鲁门总统 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新闻稿宣布了马歇尔使命，宣布美国的援助要求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为条件时，就发生了这种倒退。按贾特的说法：就是这个由某个不知名的官员写下的一句话，告诉了中国共产党，他们能用阻碍和平统一的办法，割断美国对中国的援助。

贾特申述道：“我们不能帮助中国，因为它的政府被描写成不值得给予支持。这不仅使我们成了歪曲宣传的牺牲品，而且还忽视了我们自身的历史和自身的利益”。没有点出麦克阿瑟将军的名字，贾特报告说：

在远东那边的一位伟大的美国人对我说：“这是第一次在我国与亚洲的关系上，由于把美国利益与中国内部的净化混淆在一起，因而我们危害了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利益。它也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误。”

这时，魏德迈使命的后果已经表明，国民党人不会进行什么大刀阔斧的改革。贾特用回避改革的需要而强调美国对华的历史性的利害关系的方法，企图证明他的援华方案的合理性。四个月后，麦克阿瑟亲自打电报给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陈述他自己的意见时说：

不幸得很，中国问题的国际意义被要求进行内部改革弄得模糊不清了。这种改革也许是需要，但它的重要性对吞噬那片土地的内部争斗来讲，却是第二位的。这两件事不可能同时解决，正如一幢房子正在着火的时候，你不可能改建那幢房子一样。

贾特敦促回到“我们百年来的基本政策上来”，即“站到支持中国的独立自主与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上来”。他提出一个能使国民党在长城以南肃清共产党，或至少保住他们在满洲的现有阵地的军事经济援助方案。他提议的军援包括把“剩余军火免费或廉价”送给中国，及“扩大化的训练和给国民党各级部队提供咨询的方案”。但无论在那时或在以后，他都没有提议使用美军到中国执行作战任务。

杜威州长追随了一条类似的路线。在 11 月 24 日的一篇据说曾与国会内共和党领导人物协商后写出来的讲话中，杜威声称：如果丢掉了中国，整个亚洲也就要不保。他把自由世界比喻成一个病人，病人的两只腿——欧洲和亚洲——都得了坏疽；他断言光治一只腿上的坏疽是救不了病人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有势力的众议员约翰·M·沃立斯所采取的立场特别有趣，他是由战前的孤立主义者转变成援华的热烈鼓吹者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为他政府对欧洲的欧洲方案的支持提出了条件，就是政府必须对他的中国问题的观点让步。1939 年，沃立斯曾对罗斯福政府倡议的中立法修正法案提出修正，他修正的办法就是加上一条对“军火武器”的禁运，这就等于挖掉了这个法案的心脏。现在他在委员会内申述，中国应该为了那些“适用于欧洲的一切理由”而也包括在紧急援助提案之内。在评论对欧洲复兴的长期计划时，他警告说：“我们不仅必须提防做得太少太慢，还要提防在世界的一个有限部份内做得太多太快。那样会在世界范围的长跑中，把我们自己变成跛子。”他骄傲地提到他在 1939 年的立场，即那时他认为美国在亚洲的中日斗争中尚未决定应采取何种行动之前，就决定要在欧洲的未来战争中的行动，乃是一大错误。[188]这样，沃立斯在外交政策上的倾向就有些介乎塔夫脱与贾特之间。

三个月以后，麦克阿瑟对他在美国与欧亚两洲关系上的观点，作出了下列响亮的声明：

美国的过去与大西洋彼岸根深蒂固地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持同过去一样的发展，美国未来几代人的希望与太平洋彼岸的事态演变同样地紧密相连。在我们充分利用向东方发展的潜力时，我们还必须站在西方的地平线上，既抓住尚未开发的在亚洲进行商业和贸易的机会，以此寻找更美好的生活的希望，又要注意着[对]我国现在的生活的可能威胁。

在太平洋战争中，麦克阿瑟曾宣布：

欧洲是一个垂死的体系。它已经筋疲力尽、元气大伤；它将变成苏俄的经济上和工业上称霸的场所。……在太平洋沿岸的土地及其几十亿居民，将在未来的一万年中决定历

史的进程。

麦克阿瑟的观点，感染了中国帮的许多行动。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对欧洲抱“孤立主义”态度，对亚洲则像塔夫脱一样抱“干涉主义”态度。

即使是参议员范登堡——在国会内能否顺利通过马歇尔计划全靠他是否帮忙——也把自己与政府的中国政策完全区分开来。当他在 11 月 24 日向参议院提交临时援助法意奥的提案时，他对没有包括对中国的临时援助表示了遗憾，并对马歇尔保证将在尔后的计划中包括中国表示欢迎。正如他在 1947 年 4 月曾明确表示过的那样，他再一次明确表示：没有人跟他“详细具体地”商谈过“亚洲政策问题”。在 12 月 15 日的一次辩论中，他宣布他曾“一度跟官方的对华姿态很不一致”，并曾“一再敦促改变姿态”。这样，一群有势力的共和党领袖们就联合起来要求援华。这种联合使国务院有必要提出一个援华方案，使它至少能让范登堡满意并安抚中国帮。因为面对政府的以马歇尔计划为关键的全球政策的最大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会内以众议院的贾特、沃利斯和参议院的布里奇斯为其领袖的中国帮，不如说是来自那些想节省的集团与尚未重建的孤立主义者两相结合的力量，其中众议院的约翰·泰波尔和参议院的塔夫脱为其代言人。后来的事实表明，对中国帮作有限让步，使政府顺利地避免了来自那个集团的对欧洲方案的反对。说真的，沃利斯、贾特和布里奇斯一方面继续推进他们的中国方案，但另一方面都准备在国会内支持马歇尔计划。在最后批准的临时援助议案内，中国也与法、意、奥并列被提名为总数为 5.97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的受援国。但对中国或其他各国都没有确定的分配数字。在决定临时援助拨款时，国会采纳了范登堡的提议，根据联总以后的救济法令，拨款 18 万美元给中国。给中国的数额是很小的，但却是表示美国正走向更大量地援助中国的信号。

8. 援华法令与传统的难题

在临时援助的听证会及当时的公开辩论会上，大家都关注马歇尔未来的援华方案。辩论会表明，国务院是采取守势的。正如上文已提到的，对政府的批评的一个主题是它把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跟中国内部的净化问题搞混淆了。与批评者相反，政府政策的前提是国民党中国如不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美援会被浪费掉，而且还挽救不了中国。正如马歇尔所说：“只有中国的政府和人民能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而且政府已在寻找援助中国的措施上陷入了困境，因为政府想使援助的使用有效率“达到大约 70%”。杜威州长反驳这个论点说：“我不知道[援华]是否能收效达 50% 或 80%。这个问题恐怕任何人也说不清。但有一点很明确，有援助总比没有更为有效。”

政府未来方案的纯经济性质成为共和党人另一个批评的目标。马歇尔透露国务院正在拟定一个经济援华方案，将使“他们[中国人]的恶化的货币形势得到制止……”。贾特指出，当军事形势正每况愈下的时候，经济和财政措施是不能制止进一步的恶化的。他以此来斥责了马歇尔的说法。当马歇尔清楚地表示，他的方案不包括应付军事形势的任何措施时，贾特责问道：“我们不做治本的打算，光把纳税人的钱拿来治标，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贾特最后提出的问题点出了美国面临的真正难题。因为像布立特所提的那些军事经济援助方案，除治标之外再无其他内容。这一类方案，尤其是美国咨询和监督国民党的后勤部门之类，也许是必须要走的第一步。但光靠这

一步是不足以稳定危局的。正如马歇尔在三个月后所指出，政府的弱点和军事机构的恶化，没有一点点由于外援而有所好转的迹象，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共产党人的努力，极有可能蜕变成美国的直接的义务和责任，包括无限期地动用相当大量的军队和资源”。美国面对两个现实主义抉择：一是准备动用军队进行干涉，如果不能指望军援和监督国民党的作战与后勤部队来扭转局势的话；二是尽快从中国全部撤退。从一开始政府就不能考虑第一个抉择，即使最积极鼓吹援华的人也不提议美国进行武装干预。于是只剩下第二个抉择。可以用以下的理由证明其合理性：可以避免进一步与一个公认的垂死的政府纠缠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美国的失败；可以阻止共产党人煽动反美情绪；尤其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日后与中共发生战争的机会。但政府没有选择这条道路，或是不敢公开提倡它。恰恰相反，马歇尔一再向国会担保：“我们一直在探寻……几乎全体一致地探寻某种帮助[中国]的办法。”政府的中国政策的坚定的支持者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发现有必要否认“政府有任何……对中国关门的倾向”。只要承认这一基本论点，要抵抗共和党和中国人的要求援华的压力，就没有了有力的论据。中国政府狡狴地利用国会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时机提出了大规模援助的请求。1947年12月22日，它要求一项15亿美元的四年援助方案。在此数字内，5亿用于经援，而在第一年则要求另加1亿美元的军需供应。

当政府准备提出它的建议时，它被迫提出比1947年11月原先所拟几乎高两倍的经济援华方案。它仅仅坚持了避免有任何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努力担保票的含意。2月18日，杜鲁门总统请求国会批准给中国为期15个月的5.7亿美元援助。请求的数字稍大于布立特的一年供国民党购买民用及军用供应品之用的4.5亿美元。虽然政府的新方案不包含任何军援条款，但它并不忽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需要。增加的2.7亿美元正好与中国1948年1月1日的黄金外汇储备额2.74亿美元几乎相等。正如马歇尔在证词中说的那样，这就腾出了中国自己的资财来“购买军用物品，如果他们想买的话”。因此，姑且不谈方案的期限问题，政府方案与布立特建议及魏德迈建议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前者没有任何美国承担监督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和后勤部门的条款。

杜鲁门总统2月17日的信，及马歇尔在公开的听证会上的证词，都告诉国会说：所提出的方案是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的。它最多只能“减慢”当前的经济恶化形势，并给中国政府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宣读的一项声明中，马歇尔坦率地承认：“有可能现在的中国政府，将不能成功地抵抗住共军而生存下来。”他辩论说，为了使国民党政府能将共产党削弱成微不足道的力量，美国“必须做好实际上接管中国政府，并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事务的准备”。这一抉择由于第九章述及的一切理由被摒弃了。这样，马歇尔就放弃了艾奇逊后来所说的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最后机会。根据艾奇逊的说法：“这问题提到了国会面前”，“国会对这一点非常明白”，并“稳妥地断定不选择武装干涉的办法”。此时，陆空军的实际兵力只有898,000人，其中部署在远东的兵力为140,000人。[189]

马歇尔认识到他的方案是不足以阻挡中国共产主义向前推进的。但不给援助与完全撤退是同样地不可能。正如马歇尔所解释的：“一贯的友好交往和人民的普遍情绪，要求我们继续尽我们所能来减轻中国的苦难，并给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其问题的可能性。”被共产主义对美国的

威胁感所加强了的美中传统感情，现在找到了批评政府的共和党人做它的最积极的代言人。政府必须向这种传统的感情与目标，于是也就是向中国帮，作某些让步。

为制定一项重新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方案而展开的活动，正好与官方埋葬在中国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政策的声明在时间上相巧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关于外援方案的听证会上，众议员富尔顿指责说，从来没有宣布过美国主张在华建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失败，这仍然是官方的政策。3月10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务卿马歇尔被问到是否如此。马歇尔回答说：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15日劝告中国政府扩大基础的声明，仍然是美国的政策。然后记者又特别问道：扩大中国政府基础是否意味着包括中国共产党人。马歇尔回答说：共产党人已公开叛乱反对政府；是否包括中国共产党人这个问题要由中国政府决定，而不是由美国政府下命令。据此，报界对他的答复解释说：杜鲁门的1945年声明仍然是官方的政策。马歇尔用他那有些矛盾的评语对第一个答复的澄清被忽视了。次日，杜鲁门总统企图纠正这个印象，表示他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加入政府，并同时声明：“只要能办得到，我们不主张任何共产党人加入中国的或任何其他地方的政府。”这些话标志着埋葬了联合政府的政策。但在总统说到1945年12月15日声明仍然有效时，并无助于政府观点的澄清。

具体体现有限援助方案的1948年4月的援华法令，及随后在6月间的拨款，比政府在2月里所提的建议，更不足以应付中国的动乱的时局。在参议员范登堡及其委员会的协助下，政府击败了众议院企图强使对华进行类似在希腊的那种军援方案。据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意味深长的报告说：在希腊，美国军事人员自1947年12月起，就向希军提供战略战术咨询直到师的一级。[190]一方面作为众议院与中国帮间的折衷方案，另一方面又作为参议院与政府间的折衷方案，国会特地拨出一笔1.25亿美元的特别基金，“由中国政府可以任意用到军事目标上及购买迫切需要的军需品上。”泰波尔主席给拨款法令加上一项条款，规定特别基金的管理必须“与总目标相符合，与援希土法令中规定的监督条件相符合”。这项条款在众议院通过了，但在委员会的讨论会上未能通过。由于泰波尔想削减政府请求的基金的30%，最后拨下的4亿美元（包括1.25亿美元特别基金）期限为12个月，意味着有13%的削减。正如序言中所说，援华法令的崇高目标是：鼓励中国及其人民“保证中国的真正独立与主权完整，维护并加强中国的人身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这再一次表明了口头上承认的一些辉煌的原则与无能力使用武力在一个调和折衷的方案中并行不悖。而这种方案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

总之，援华法令代表了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之间的折衷，它反映了传统政策的自相矛盾的因素。马歇尔正好体现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不值得为美国在华的利益而战；而他的共和党的批评者则坚持美国对华传统目标的概念。马歇尔依靠不干涉的原则；而共和党的批评者则呼吁坚持维护中国主权完整、反对强国侵犯的原则。正像西奥多·罗斯福和埃利胡·鲁特一样，马歇尔非常清楚美国力量的限度和中国的不能自助。他的批评者们，紧跟威廉·塔夫脱、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及亨利·史汀生之后，坚持希望用某种不动用美军的方式来推进美国的利益与目标。传统政策的自相矛盾与模棱两可的性质，就这样以缺乏两党一致的政策的方式表露出来。同时，1939年以前的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远东政策——作为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欧洲政

策的对照，在共和党人要求把中国纳入政府的遏制与经济援助政策之内的呼声中得到共鸣——而这种遏制与经济援助政策尚是首次被运用于欧洲。中国帮要求向他们的观点让步，作为它支持马歇尔欧洲政策的条件。这些要求使这个国家在重新拟定其政策的基本方向和担任领导世界的责任的过程中深感痛苦。

但是，在马歇尔的批评者中，没有一个人倡议要在华使用武力；同时也没有现成的、可用于此目的的军队。他们的方案只是对华提供长期的大规模军事经济援助，并将美国顾问派注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人如麦克阿瑟，不认为在中美合作打败共产党人的方案中，国民党的改革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其他人如魏德迈及布立特，希望以中国的改革作为美援的条件，来提高国民党政府的效率。然而，马歇尔确信没有足够的人员来执行这种方案。他担心大规模的军援和咨询，将导致军事上的卷入。他认识到：为了有效地使用美援，中国的改革是先决条件。同时，他倾向于相信，美国的压力与敦促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效果，相信在蒋的统治下改革是不可能的。但由于没有其他领袖可以取代最高统帅，马歇尔和他的批评者都不提倡积极干预国民党的政治，以便掉换最高层领导人。

这样，在批评者的目标与马歇尔的可行的措施之间，就有了一道鸿沟。批评者敦促在中国作更大努力，而马歇尔更倾向于放弃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目标。由于马歇尔需要中国帮支持他的欧洲复兴方案，由于中国帮无法把它的观点强加给政府，这样就只好产生出有限援助的折衷方案。在这一官方方案中，手段与目的的脱节比任何政策更严重——无论是政府还是其批评者们韵政策，如果能各行其是的话，都不会像它那样严重地脱节，它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最不顺利的时期内采用的，它推迟了但并没有取消中国帮的维持国民党政府与从中国撤退两者之间的必要选择。第一个抉择包括在中国动用美国军队；第二个抉择意味着放弃传统目标。就这样，美国政策的长远传统既摒弃了迅速完全撤退的政策，又摒弃了武装干涉的政策。

9. 援华法令的影响

（1）军事形势的发展与中国的反美运动

援华法令的通过标志着逐渐恢复有限援助政策达到了顶点。为了保证通过全面的欧洲复兴方案，这种恢复也许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在为美国全盘的国家利益服务。但是，它并不能促进美国在华的事业。因为在 1948 年上半年，中国的军事形势急遽恶化，这个方案甚至连推迟内战的结局都不能做到。它只是成功地煽起空前未有的最广泛的一次反美运动。

当美国尚在辩论政府的援华方案时，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7 年 12 月中旬到 1948 年 3 月中旬，在满洲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次攻势。这一周密策划的攻势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孤立于三个要塞——长春、沈阳和锦州。当蒋正努力补给他在满洲的部队时，西北的共军又在 2 月下旬及 3 月上旬打了他们的第一个大胜仗。3 月间，共产党将北起平绥线、南至陇海线、西起同蒲线、东达津浦线的地区置于一个单一的政府和军事指挥之下。他们在 1949 年就考虑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4 月 29 日，共军在山东的一次战役中以压倒的优势夺取了战略城市潍县，这一战役后来成为国会会议上引起争论的问题。政府的批评者以此为主要例证，证明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弹药，而这些弹药美国本来是可以供给他们的。但按官方代言人的说法，它只不过是证明向中央政府提供军需是于事无补的。共军在河南省占领了中原的两个重镇——3 月占领洛阳，6 月占领开封。共产党的这些胜利是 1948 年上半年最值得注意的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它第一次证明了共产党人能够攻破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据点，证明了他们已掌握了运用炮兵和爆破的技术，及他们除掉会打游击战和运动战之外，还会打阵地战。在美国的一片抨击声浪中——说什么国民党军被打败主要是由于缺乏弹药，共军宣布从 1947 年 7 月到 1948 年 6 月的 12 个月内共缴获 8200 万发子弹。这个数字跟日本在 1945 年投降时在中国本土及台湾的日军所有的 1.1 亿发之数相差无几。总结自 1946 年 7 月 1 日算起的两年来内战的战果，共产党人在 1948 年 7 月 30 日宣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为期不远”，虽然他们仍然期待经过“三年或四年的艰苦斗争”，才能最后统一中国。

增强美国与越来越不得人心的、显然是垂死的蒋介石政府之间的纽带的援华法令，激起了一次最广泛、最直言不讳的空前的反美运动。这种反美情绪来源于一般人大都具有的信念：即蒋正把中国领上一条毁灭的道路，而没有美国的支持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部分中国舆论把援华法令谴责为延长内战和加强一个令人憎恶的政府的因素。由于政府禁止反政府及反战的宣传，这些反美团体挑选了一个乍看与中国内政无关的主题来攻击美国，就是所谓美国重新武装和建设日本的政策问题。正如大使馆在报告中所说：“学生团体及其他人物对美援的谴责，已经升华并改换成攻击我国的对日本的政策。”5—6 月间，反美运动横扫全国各地。司徒大使向国务院深表忧虑：许多通常是亲美的人都爱听反美宣传了。

（2）在华美国官员为时已晚地采取新措施

正当 1948 年下半年中国内战进入决战阶段时，美国官员们开始执行援华法令。开头是华盛顿重申避免进一步的军事承诺的政策。6 月 4 日，在国务卿马歇尔、陆军部长肯尼恩·C·罗亚尔、陆军参谋长奥马·N·布拉德利将军及计划作战局局长魏德迈将军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再一次决定美国不应把

美国顾问派到作战地区的中国军队里去。

国会曾表示 1.25 亿美元的特别用款可以由国民党政府随意支用。但在中国，美国官员们在特别基金的动用上开创了更积极、更有作为的政策。1948 年夏，西太平洋海军司令海军上将奥斯卡·C·贝吉、司徒大使及新任经济合作管理使团团团长罗杰·D·拉凡姆，到当时在傅作义将军指挥下的华北参观。[191]傅是在多次对日本及对共产党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的一位将军。他很受人民和部下的爱戴。但他不是黄埔系人物，故而蒋委员长歧视非嫡系军事指挥官的政策使他得不到足够的武器装备。他共指挥十一个军，其中四个军没有装备，还有三个军则装备恶劣。7 月间，贝吉海军上将提出一份傅将军迫切需要的军需品清单，估价总数为 1600 万美元，并提议优先运送这批军需品给傅。几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一俟物品齐备即将这批军需送到。司徒雷登大使也推动了这个供应傅将军军需品的提议。8 月 30 日，在司徒雷登住宅内的有司徒雷登本人、巴尔将军及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参加的一次会上议定：在特别用款项下从美国运来的全部装备的 60% 送到上海，供华东的防务之用；30% 送到傅将军指挥下的华北的天津；10% 送到青岛，供山东半岛的防务之用，这是第一次越过最高统帅，把部分美国军需直接交给在战争中表现杰出的国民党指挥官。

但是，在 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名义下的装运军火武器到中国的计划，不得不在美中两国的官僚主义烦琐手续的迷宫中，在美中两国官员们的互相矛盾的意图中，缓慢地进行。中国政府在 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下的运送军火的新请求，直到 7 月 23 日才首次提出。第一次申请要求优先运送小武器及弹药。但另一次申请主要是要中国军火工业所需的原料之类。可是，这类东西要到 1949 年秋季才能交货，而且对战局没有直接影响。在接到中国第一次申请后，陆军部开始研究其可行性，并算出应由中国政府支付的价格。美国官员们的可行性研究及价格计算，和中国官员们企图讨便宜的讨价还价，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192]9 月 20 日，中国大使又提出一个修改过的清单，来代替以前的清单，这就更进一步地制造了混乱。也许是这反映了中国的急剧恶化的军事形势，这一清单主要只包括军火武器。这就使陆军部的工作前功尽弃。必须进行新的可行性研究及价格计算，并要求中国政府按次序排列出哪些是最优先需要。部分地为了答复这一要求，中国政府在 10 月 4 日交给陆军部一个清单，按照 8 月 30 日司徒雷登大使与何将军达成的谅解的精神，还分别列出运送军需品的目的地，及分送中国各地的大概的百分比。陆军部收到这份清单后，即于 10 月 5 日采取措施，执行贝吉海军上将 7 月间的支援华北的傅将军，并第一优先将军需品送交他的提议。它将中国要求的全部清单转给麦克阿瑟将军，并于 10 月 27 日命令这位远东司令将中国清单上的一切可得的项目运送到华北。这批军需品，总数约达 1,200 吨的小武器和弹药，总值稍许超过 200 万美元，于 11 月 16 日运到天津。在贝吉海军上将提议的四个月以后运到目的地的这批军需品，只占他敦促第一优先要运送的军需总数的八分之一。通过陆军部取得的、在 1948 年剩余时间内送往中国大陆的唯一的一次大批小武器弹药，是一批价值 1600 万美元的送货。这批货于 1948 年 12 月 1 日抵达上海。尔后的装运由于蒋委员长的要求被改送到台湾。在 1.25 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中，6090 万美元于 1948 年内支付，5500 万美元于 1949 年内支付，在 1950 年 1 月 1 日尚结余 900 万美元，在 1951 年 2 月尚结余 100 万美元。这些花费一次也不能在中国大陆的保卫战中起什么引人注目的作

用。

我们现有的材料说明：在华的美国官员们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政治目的上有矛盾。可能这是在援华法令下装运军火到中国发生迟滞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时期内，司徒雷登大使企图用美援为工具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促使他任用适当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并执行改革的方案。最高统帅的手腕比司徒雷登大使更高明，他呼吁美国国会内支持他的力量对政府施加足以迫使它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压力，迫使它提出对蒋的经济援助方案。正如司徒雷登在5月10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封公文中所灰心地论述的：“当国会通过了1948年的援华法令之后，一切能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有力地位和回旋余地，全都消失了。”但司徒雷登大使在执行这个法令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希望对蒋施以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按法令条文，美国经济援助的使用应按两国政府签定的协定进行管理。因此，司徒雷登在同一公文中对马歇尔说：美国应利用双边谈判援助协定的时机，压迫中国政府采取某些自助的和改革的措施。司徒雷登建议说，美国政府在谈判时不要急于求成，至少先要知道他们委派哪些人在直接有关援助方案的各部委任职，并使谈判期限延长，以便运用美国的压力。

看来司徒雷登大使在蒋动用特别用款时也可能用了同样的施压战术来影响蒋委员长。这从上述的8月30日在司徒雷登住宅内与国民党官员的会谈时他首先拟出的在华北与华中分配美国军需品的计划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国民党把8月间显然已协商好的分配办法直挨到10月4日才提交给陆军部。这大概是国民党人抗拒他的建议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征兆。司徒雷登大使固然能运用外交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却有合法性做后盾。因为援华法令的立法过程表明特别基金是归中国政府随意支用的。按执行该法令的指示规定，只能由中国政府提出特别申请的程序来支用这笔钱。贝吉海军上将可与司徒雷登大使可以敦劝、可以建议，甚至可以运用他们的相当大的政治影响来推行他们的主张，但对在援华法令下使用特别基金，却不能由他们作出最后决定。贝吉海军上将7月份的举荐，只不过是一个美国军官向他的上级所提的建议，而不是中国政府按执行指示规定的程序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的官方申请。美中官员们在目标上的这一分歧，是有助于加快执行的速度的。

但即使军火的装运能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仍不可能避免自6月开始执行援华方案以后的7个月内国民党军吃的四个大败仗。并不是由于缺乏武器弹药，才使国民党打输了头三个战役——济南战役、满洲战役及淮海战役。这三个战役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国民党在9月23日由于一个整师的叛变而帮助共产党在要害部位突破防线之后，才丢掉了坚固设防的城市济南。这种彻头彻尾的叛变和其他部队的缴械投降及不肯挺身战斗有着根本性的政治原由。据青岛的总领事报告说：“一般他讲，国民党军队及山东人认为再也不值得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满洲的国民党军队及派去的增援部队在10月间全部被歼，因为他们只习惯于防守固定的据点，不善于用全部兵力协同进攻，这就使毛能集中兵力将其各个歼灭。国民党在11—12月的淮海战役中的失败，突出地暴露了另一个军事崩溃的因素。蒋决定在已经暴露的徐州突出地带迎战50万共军的倾巢来犯，而拒绝桂系首领副总统李宗仁及白崇禧将军的一再劝告，即去防守更易于布防的淮河一线。在这一关键的战役中，他越过白将军任用两个无能者当指挥官。淮海战役完全是由黄埔系的将军们策划和指挥的，由他们去进攻和输掉的。就这

样，蒋的对权力的酷爱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在所有这三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都比共产党军队拥有更优的装备和补给，于是大量军用品就被共军掳获。已尔将军在 1948 年 11 月 16 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国民党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有可能也像贝吉海军上将说的那样，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后备军用品而妨碍了国民党人制定攻势作战的计划。但即使这是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理由之一，对于世界上最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之一来说，也是个相对次要的因素。当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魏德迈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当它的政权的政治基础已被侵蚀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又怎么能有战斗意志呢？

军需品的早日运到，可能会帮助华北的傅将军。但在头三次败仗以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已被优势的兵力从三方面包围。傅将军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可能坚持多长时间。正如迪安·艾奇逊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所说的：

在 1948 年末，已经以国民党军队的全部崩溃而在实际上结束了华北的斗争。在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我国供给国民党政府的军用品的 80% 已全部丧失，估计其中有 75% 已被共产党人掳获。

傅将军于 1 月 22 日在与共产党人谈判之后，交出了北平。

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被歼，使防守长江成为不可能的事。巴尔将军在 12 月 28 日报告说：

由于国民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它是否能取得必要的人民的支持，以动员这一地区（华南）的充分人力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之事。国军的完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3）美国的经济援助和中国的币制改革

与特别用款的交付工作办得很糟相反，援华法令的经济方案却被有效地实行着。基于联总对华基金使用不当的教训，美国政府坚持在 7 月 3 日签字的经济援助协定中包括联合监督在华分配美援物品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下，中国政府同意一切美援物品应按两国政府协议的条文、情况和价格加以处理和分配。中国政府还承担尽可能用配给及物价管制的办法，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对美援食物及同类商品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从一开始，驻华经济合作管理署使团就严密控制援助方案。它一开始就帮助中国人民及其经济活动，进口四种迫切需要的商品——食物、棉花、石油及肥料。在联合监督下的这一商品进口计划是减轻中国主要城市动乱不安的重要因素，并成功地把食物及其他商品交给意欲使其受益的人民手里。

但援华法令的经济方案不论如何有效地执行着，它对中国经济只能起到边际效用，因为它并不是设计来解决经济上的最紧迫的问题的，那就是失控的通货膨胀问题。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由两个与内战直接有关的因素造成的：一是政府的预算赤字，二是公众对政府的生命力的丧失信心。预算赤字以每

月 0.5 亿美元的速率上升着，而对华经援总数每月只有约 0.2 亿美元。再有，由于军事上打败仗造成公众对政府丧失信心，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通货的价值。因此，任何纯经济性的方案都是不能制止通货膨胀的。加之，在全面估价援华法令的经济方案时，我们必须考虑司徒雷登的下列分析。一辈子当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写道：

当它（2.75 亿美元经济合作管理署用款）带来了某些人道主义的救济时，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看问题，又必须估计到它所增强的政治上的恶感……。也许可以得出某种愤世嫉俗的寓意，即将慈善事业与政治结合是无济于事的。[193]

中国政府自己主动在 8 月 19 日宣布改革市制，并进行物价工资管制，企图制止通货膨胀，并由最高统帅的儿子蒋经国在上海用严厉的经济警察措施加以贯彻。但这一方案并不能改变中国的两个基本事实：越来越惨重的军事败绩及不断上升的预算赤字。早在 10 月，甚至在上海人们就开始竞相抛出新市，而物价管制则造成了食物及其他商品的短缺。10 月 31 日的取消物价工资管制及 10 月 1 日蒋经国的辞职，意味着管制方案的全部失败。这一命运不佳的尝试的全部效果就是：使中等阶级离心离德。这是因为在币制改革下政府用严厉处罚的条例来要挟中等阶级，将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交给政府兑成新币，即金圆券。政府规定 4 元金圆券值 1 美元。但金圆券的价值跌落得如此地迅速，到 1949 年 4 月末 5 月初时，1 美元的价值已达到 5,000,000—10,000,000 元金圆券。中等阶级实际上是遭到了剥夺。他们问道：“难道共产党人还能比国民党更坏吗？”

10. 中国大陆和台湾被一笔勾销

在通过援华法令过程中及以后的中国军事、经济和政治的灾难性的发展，带来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反应。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加强了从美国得到更大援助的努力，不仅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用白皮书上的说法，“还要通过宣传”的办法。另一方面，国务院比以前更不愿意再花冤枉钱了。它采取了“不插手”和“等着瞧”的政策。这一点表现在国务卿马歇尔拒绝司徒大使在 8 月及 10 月提出的要求更积极的对华政策的三个不同的建议方案上。

国民党军队 8 月间的军事败绩及各大城市的经济混乱，已经在政府的内外形成要求通过与共产党谈判结束内战的强烈公众情绪。根据这一情况，司徒雷登大使在 8 月 10 日提出三个具体的建议方案。第一、他建议美国政府应继续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作为防止成立包括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的最好方法。第二、如果无法阻止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妥协，他提议：

应该运用[美国的]影响来安排一种松懈的联邦形式的停战。在领土划分上应尽可能留下更大领土给无共产党人参加的一个或一两个政府。第三、在恢复地方主义的情况下，美国的经济援助可以用来加强各地方主义政府。

司徒雷登的建议表明：美国官员们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追求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真正的联合政府的主张的荒谬性。他们已经为时过晚地开始认识到，在划定疆界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妥协对于打内战来讲是唯一的现实主义

的抉择；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干预，国民党是要输掉这场内战的。他们最后也终于明白：各地方主义首领是在蒋介石的垂死的中央政府之外可以提供的另一抉择。司徒雷登的建议跟他分送美国军需品给地方主义指挥官的企图。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早在二、三年前就采取像司徒雷登设想的政策，也许可以想象能保存一部分中国处于非共产主义者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 1948 年 8 月，它能成功的机会是微小的。因此，国务卿马歇尔摒弃了这一建议。他不想采取任何足以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隐含地加给美国的步骤。在 8 月 12 日给司徒雷登的指示中，马歇尔放弃了“公开或暗中反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妥协的做法。因为即使暗中表示反对，也会泄露出来的。”同时，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是，他又告诉大使：“不应该忽视利用适当时机。强调指出东欧的联合政府所造成的被共产党吞并的结果。”他驳回第二个建议并告诉大使说：“美国政府无意再度把它的优秀军官派到中国担任调解人。”次日，国务卿告诉大使说：

客观形势使得我们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机就制订出关于我国未来对华政策的任何死板的计划。中国的发展显然正在进入一个变动极大和极其混乱的时代。在这一期间，不可能很早就确有把握地、清楚地预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期间，美国政府显然必须保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

于是这时就采取“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迪安·艾奇逊后来曾为此受到严厉的批评。

10 月下旬，济南、锦州和长春的军事败绩在国务院导致了一次内容广泛的政策审议，并做出一系列的决定。这是 1947 至 1948 年间美国政策的最值得瞩目的三次事变之一。这次审议在重要性上仅仅稍次于摒弃魏德迈建议及 1948 年初决定放弃最后一次干涉中国内战的机会。政策审议似乎是被司徒雷登大使一系列请示美国政策是否有改变的电报促成的。看来他是提议对华采取更积极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下，美国政府将迫使蒋撤换不称职的首领们；进一步援华；并在事先与蒋达成接受并执行美国方面的咨询意见的协议后，扩大陆军顾问团的作用和权力。在摒弃这些建议时，国务卿马歇尔可以引用司徒雷登的无数函电，来证明美国的咨询意见过去如何一贯地被忽视，以及为什么向蒋提供有条件的援助的政策是行不通的。马歇尔再一次有力地提醒司徒雷登说：“直接地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是不符合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的。”国务卿马歇尔再一次通知大使说：

要在最近的将来削弱中国共产党，使之成为中国的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因素。要达成这一目的，美国就必须实际上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事宜。但是，中国人对于中国主权的遭受侵犯有着强烈的敏感，在一切中国人中间存在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意识。美国也无法供应大量的合格人员，因而就有充分的理由来辩明不宜于策划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

司徒雷登仍然企图敦促马歇尔采取积极政策。10 月 23 日他在问过其他问题之后询问国务院，美国政府是否“可以劝说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并且更有效地进行反对共产党叛逆的战争。”这里又出现了一

个抉择、一个可能办到的事，如果美国政府早就有一段时间巧妙地推行它的话。但现在已为时过晚，国务卿马歇尔不想提任何劝告，因为提劝告包含着承担支持继任政权的责任。

也是在这一时刻，国务院排除了使用美军保卫福摩萨的做法。这一决定是与马歇尔的不用武力干涉中国内部斗争的政策一致的。它再一次暴露美国不愿使用武力保卫它的在华利益。它设想，防止福摩萨落入敌方强国之手虽然对美国在战略上是有利的，但美国占领台湾或将台湾用作基地并无多大益处。它还立足于这样一种想法：美国现有武力的状况，排除了用美国武力承担保卫福摩萨的责任的任何可能性。美国的政策是：试图用外交和经济手段，保持福摩萨不落入敌手。按艾奇逊后来的证词的说法：这一政策是“有关各部门全体一致向总统提出的，并得到了总统的认可”。显然，国务院政策审议的结论是：美国不应该使用武力来阻止中国的任何一部分落入共产党之手。

司徒雷登大使对他的建议被拒绝肯定很失望，但也许并不感到意外。国民党并不奢望杜鲁门政府会急剧地改变政策。当美国政府希望援华法令能给国民党以喘息的余地，使之能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和自助措施时，中国政府却除了看到它是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以及新的共和党政府下的扩大了的美援的前奏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东西。美国政局的发展中有很多迹象证明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在被共和党内的压倒多数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不久，社威州长在 6 月 25 日声明：他如能当选，他的政府主要原则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在其疆土内对共产主义势力作战；美国将提供中国所需的军事顾问及军用品和大得多的财政援助。他后来提到中国时，说法并不具体，但他一再保证结束那种“悲剧性地忽视”中国的状态。这当然给国民党政府以怀抱新希望的理由。在杜威的竞选活动的高潮中，以及在普遍对共和党大获全胜的期待声中，行政院副院长兼极右翼的 CC 派首领陈立夫先生带了蒋介石的介绍信拜访了杜威。据报导，在他回中国后，他曾说过如果杜威州长当选，他将在给中国军援的问题上采取特殊措施。在大选前两天，蒋委员长在 10 月 31 日对一个有名的美国记者的提问作答时，发表了一份长篇声明。声明在结束时评论说：“拯救亚洲之努力又须以中国为重心，此实为人类历史上空前之伟大事业，余愿美国人民及其政治家引为己任。”

但不可预测的美国选民却打乱了甚至是最狡猾的政治家的算盘。杜鲁门总统就在国民党人失掉沈阳的同一天，出其不意地在选举的大胜中再一次当选。杜鲁门在选举上的胜利迫使中国政府再一次向民主党求援。11 月 6 日，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博士将中国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交给国务卿马歇尔。这封信询问指派美国陆军军官在顾问的名义下实际指挥中国军队的可能性，以及指派一名高级军官率领特别使团驻华的问题。国务卿马歇尔拒绝了这个转弯抹角的请求。他向中国政府强调指出了新指派的外国军官在有关作战过程的问题上向中国政府提供咨询的内在困难。可能心里有他自己的和史迪威的经验，他说这将是“派遣一名军官去承担一件肯定要失败的任务。那对美国来讲是件非常难堪的事。”紧接蒋博士的主动邀请之后，蒋委员长又写信给杜鲁门总统，提出同样的请求。此外，中国首脑还请求美国发表坚决支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声明。杜鲁门总统在回答中提请蒋委员长注意国务卿马歇尔新近对中国外交部长的答复。关于蒋提议的美国政策声明，杜鲁门总统说：他在 1948 年 3 月 11 日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不愿共产

党参加中国政府与援助中国的援华法令，已将政府的立场表示得很清楚。

与国民党的要求增加援助相呼应，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兼外援监守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谴责政府的对华政策，并敦促杜鲁门总统召集第八十届国会特别全会，以考虑进一步的援华问题。刚从选民那里得到一次新委任状的政府，对这一要求无任何肯定的反应。不久，参议员布里奇斯的两位顾问访问中国后返美，并提出了他们的报告。这些报告清楚地表明：美国如要拯救国民党，就必须承担巨大的责任和代价。以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顾问身份赴华的前民主党参议员D·沃斯·克拉克先生在11月20日的报告中说：一个遏制共产党的方案必须包括：立即运送大量军火武器；在战略级和战术级都给予咨询；美国必须负担国民党政府预算的主要部份；至少贷款2亿美元来稳定通货，并由美国严格监督其支出。克拉克断言：比这更少的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而且会被浪费掉。外国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问题的顾问威廉·C·布立特先生强调需要“美国的指挥和控制，由一个最优秀的作战将领来贯彻执行，并有一个由干练的军官们组成的参谋部”。据他判断：“现在美国政府还没有这样一位将军。他必须有军事素养和指挥艺术，才能解决和迎战200万人以上的共军的进攻有关的全面的后勤补给问题。”

国民党要求进一步美援的活动以12月1日蒋夫人的抵达华盛顿而进入高潮。[194]次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拒绝评论对华新的美援问题。但当问到关于美国正在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赴华的谣传时，他用直率的回答否定了它。[195]在蒋夫人对美援的请求中，她要求为期三年的30亿美元之数。此外，她再一次提出已被拒绝了派高级军官为首的军事使团赴华问题及一个明确的美国决心制止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声明问题。

12月，柏林封锁进入第六个月。西方国家正忙于用昂贵的空运来供应这个城市。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美国官员们亲切而又殷勤地接待了蒋夫人，但牢牢地坚持他们的政策。12月16日，政府发表一项声明，反复扼要地重述美国到目前为止给予中国的援助总数达38.84亿美元以上。不仅不派高级军官去中国，政府不久即命令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撤出中国。[196]在采取这些步骤时，国务卿马歇尔还没有走到像某些国务院官员们建议的那样远。在12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马歇尔宣读了国务院拟议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主张向美国公众阐明蒋介石政府的不健全性。在总统的支持下，马歇尔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这样一种公开声明对国民党政府将成为慈悲的然而又是致命的一击。

随着杜鲁门的第二次当选，迪安·艾奇逊接替马歇尔担任了国务卿。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悲剧的一个阶段的尾声。从一开始执行他的赴华使命到他担任国务卿的期间，马歇尔牢固地坚持一个设想——美国不应用武力干涉中国内战。他对国共两党的相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现实主义估计，使他得出没有美国参战中国政府将不能赢得内战的准确结论。不愿意放弃他的基本假设，在他的通过成立联合政府来寻求政治解决的尝试失败之后，他对中国问题就看不出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实际上，他放弃了中国，以便集中美国资源和力量到欧洲去。但他肯定不能、也许是不愿遵循迅速全部撤退的政策。为了向共和党和他的中国政策的反对者让步，也为了保证能全部批准他的欧洲复兴方案，他在局部退让了一个时期之后又回到了有限援华政策。援华法令中包含的经济军事援助在给国民党以喘息余地的作用方面是太少、太迟了。可是它却大到足以引起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广泛的反美运动的程度。美

国追随的这条行动路线，只不过是美国政策的传统样式的新表现。既然国家不能用必要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又不能根据手段的可行性来制定它的目的，它的政策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两党的争论只是使手段与目的的矛盾戏剧化，其结果形成的折衷办法导致政策上的反覆无常。基本的航线并未改变，直到事态的发展迫使美国在放弃中国与使用武力之间作出抉择。

第十二章 摆脱和遏制（1949 年 1 月—1950 年 6 月）

1. 道义上的问题与现实的考虑

马歇尔将军把摆脱出中国这一既不讨好而又麻烦的任务，移交给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上任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艾奇逊自 1945 年 8 月到 1947 年 6 月一直担任副国务卿，最初是在贝尔纳斯之下、后来是在马歇尔之下。他是马歇尔赴华前所携指示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马歇尔赴华使命期间，通过杜鲁门与马歇尔的事先安排，他曾担任马歇尔的代理人，或用马歇尔的话说，是他在华盛顿的“第二梯队”。为了承担那担风险的摆脱任务，艾奇逊献出了他对马歇尔政策的正确性的坚定信仰，他本人的勇气及他的外交手腕。但让国家承认它的政策失败，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当这个政策被一大堆神话围绕着，并始终是一大群吵嚷的政客们的感情寄托时，承认失败就更困难了。而当过去许多做过的和未做过的事，可以为党派的目的而任意加以歪曲时，这种困难还要成倍增加。由于这个政策的内在矛盾，国家在 50 年来一直在遵循着注定要失败的政策——这一点是不容易看清楚，但要把错误的责任加到个别官员身上却很容易做到。事情就是这样。要那些批评政府的人们承认在一定时期内他们跟那些官员们一样都把事情判断错了，那是令人尴尬的，而人类的意志薄弱的本性总使人争着向别人掷石块。公开鼓吹在中国使用美国武力是危险的，但责备别人无所作为则是安全的。艾奇逊特别容易受到派性的攻击，因为他缺乏独立的政治基础，并且几乎完全仰仗总统的支持。他过去在有关中国政策的拟议中所起的作用及他的忠诚的部属都把他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切失误的代表人物。另外，他在官方人物中间的卓越才能，最终也使他成为以全盘否定为特点的攻击的目标。被派性的、蛊惑性的攻击所包围，他从来没有必要的行动自由来实现从中国的迅速摆脱，这使他的政策保留了某些传统政策的模棱两可的特色。

正如上一章所说，国务院在 1948 年 10 月实际上已把中国包括福摩萨全都一笔勾销了。从那时到 1 月 21 日，当艾奇逊上任时，中共已全部征服满洲，在淮海战役中又打了辉煌的胜仗，并在实际上打赢了华北的战役。美国面临的抉择是：或者用美军防守长江，或者从中国撤退。长江是缺乏海空军、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的共军向前推进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按魏德迈将军的说法，国民党“用扫帚柄子都能守住它，如果他们有决心的话”。[197]事实表明：共军在渡江前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重新组织和训练军队。

但采用美军防守长江的抉择意味着正当马歇尔政策的前提条件被中国国内外的事变所显现出来的时候，反而急剧地改变了马歇尔政策。随着冷战的加剧与柏林危机的悬而未决，在中国使用武力比任何时候更显得轻举妄动。在杜鲁门总统 1948 年 3 月 17 日发出重新武装的号召之后，却并没有多少行动。政府提出的普遍军训的建议不能为国会所采纳。当国会最后重新颁布征兵役制时，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计从现在仅有的 41.1 万人可以扩大到 179.5 万人。杜鲁门总统把每年国防支出的上限固定为 150 亿美元。据说那就是美国经济所能负担的数字。美国的军事战略主要是依靠对原子弹的垄断。

美国后来参加朝鲜战争一事说明：当旗帜鲜明的道义上的问题与对无所作为的严重后果的感觉相结合，当一种震惊的感觉克服了不愿使用武力的思想的时候，美国政策的突然改变是有可能的。然而在 1949 年的中国问题上，

道义上的问题似乎是模棱两可的。正如 1949 年 3 月，美国驻天津总领事的报告所说：在华北那个城市里的美国人感到，“我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政策，不应该迫使我们支持一个失去人民支持的、不可救药地无效率和腐败的政府”。认识到中国共产主义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增加了美国的窘困。正如费正清教授所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中共利用了这场革命，并取得了革命的领导权。”同样，认识到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也解决不了道义上的问题。再引费正清的话：“总的说来，恐怕要把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看成是中国自身的决定，而不是什么国外的侵略。”再有，共产主义控制的中国，看来不像是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正如在第九章中提到：马歇尔不相信中国能很快变成强国。引用国家计划协会国际委员会批准的一个报告中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中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跟美国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而不是互相对抗的”。构成门户开放政策基础的这一传统概念，顶住了中共对“美帝国主义”的猛烈抨击而继续存活下来。在 1949 年初的几个月中，部分官员们对中国式的铁托主义的期待，增强了美国人的洋洋自得心理。盖洛普民意测验在几次调查中发现，只有少数人主张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采取强硬措施。

如果政府提议实行强硬的中国政策，公众的支持也可能跟之而来，虽然看来不像有那么回事。但在马歇尔使命垮台之后，美国官员们感到：在中国得不到有效地使用美援和有效地进行中美合作的必要条件。现在条件具备了吗？乍一看，似乎蒋在 1949 年 1 月 21 日的“引退”及李宗仁将军升任代理总统，已经搬掉了妨碍美国对华实行积极政策的主要绊脚石。但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中国政局发展，表明并不是那么回事。

在蒋宣布退休以前，他已把政府的黄金白银及外汇从南京运往福摩萨。[198]在 1948 年 12 月以后，他已请求美国政府把 1.25 亿美元特别用款名义下的一切剩余军需品装运到福摩萨。他已强化了他对这个岛屿的政治控制。在“引退”后，他仍以总裁的资格控制着国民党的机构。他仍用幕后操纵其追随者的办法干涉政府的工作和政策。他实际上仍控制着大陆上的海空军及两个主力兵团，而如要成功地防守长江是少不了这些军队的积极合作与有效使用的。

蒋与李对军事行动各有不同的计划。李希望防守长江，如这一点做不到，也希望守住作为他的权力基础的西南各省。蒋显然只想在大陆上打阻滞战，以便争取时间防备共军进攻他牢固控制的福摩萨。蒋当总统的时候容易受到桂系首领们的政治手腕的损害，而现在李将军当了代总统后，就成了蒋的一切政治阴谋捉弄的对象。李连军饱都无钱支付，更不用说打一个胜仗所必要的财源了。他得不到美国的军需供应，它们被改送到福摩萨去了。他下达给蒋的嫡系部队的命令不被执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切。防守长江是件无指望的事。美国的消极政策及有限援助方案，帮助蒋保持权力那么长久，以致破坏了其他政治领袖可能有的拯救部分中国的任何机会。

2. 麻烦的撤退任务

如果在最后一分钟才武装干涉是个不现实的抉择，合乎逻辑的方针就应该是迅速的完全的撤退。但由于迫使马歇尔在部分撤退的阶段之后又回复到有限援助政策上来，这使迅速撤退成为难办的事。此外，由于对继续纠缠将

增加最终与中共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也妨碍了迅速撤退。对从华撤退缺乏紧迫感。植根于马歇尔的拒绝承担武装干涉的基本假设之中，即中国不可能很快地成为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

毫无疑问，国务院官员们正在主张并执行撤退政策。1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结束参加训练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并召回巴尔将军。次日，宣布撤消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应暂停装运1.25亿美元特别用款的余额0.6亿美元的军需品。[199]美国官员们担心，这些军需品会直接落入中共之手。在2月5日未记录的一次会上，参议员范登堡根据道义上和感情上的立场，强烈反对这一提议。按他的看法，采取这一行动就等于证实了人家的攻击，说“我们正是那些向可怜的中国落井下石的人”。他敦促“我们的手上决不能沾上这种血迹”。杜鲁门总统及阿尔宾·W·巴克利副总统支持了范登堡，继续向福摩萨装运军火。甚至直到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月5日声明“从福摩萨撒手”的政策以后，1.25亿美元特别用款余额的军火装运工作始终没有中断。

道义和感情只是使执行撤退政策为难的因素之一。还有人要求重新审议政府的政策及叫嚷要求积极的援华方案。2月7日，51名共和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杜鲁门要求指派一个委员会，立即重新审议中国形势。2月24日，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未记录的会上对30名签名者解释说：他“在尘埃落定以前”，尚不能看清中国的结局。[200]这样，他就回避了他们的要求。

次日，内华达州反政府的民主党参议员帕特·麦卡伦提议通过一项贷款15亿美元给国民党政府的法案，并授权给美国军官在战场上指挥国民党军队。3月10日，50名参议员（其中24人是民主党人）给康纳利主席一封公开信，请求他的委员会给予麦卡伦提案充分的考虑并听取意见。[201]在50个签名者中，只有两名是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一般他讲，参议院的这一委员会是同情国务院从中国撤退的愿望的。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参议员麦克马洪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声明：在3月间彻底重新审议了中国形势后，委员会完全同意“我国最好尽快从中国撤退”，而“唯一略有分歧之处是撤退的速度问题”。3月15日，在共军实际上未经抵抗即渡过长江以前约五个星期，艾奇逊干脆拒绝了麦卡伦提议。1948年的大选及中国形势的发展，使政府的腰更硬了。与在1947年及1948年获得成功相反，中国帮无力迫使政府采取追加对华援助的方案。

然而在拒绝麦卡伦提议时，艾奇逊觉得有必要向中国帮作出一些让步的姿态。加之范登堡反对暂停对福摩萨的军火装运一事清楚地表明：政府不可能搁下对华经济援助而不遭到共和党领袖们的激烈反对。艾奇逊于是表示：愿意让1948年援华法令下的非必需的拨款在4月2日期满以后可以有限地延期支用。同一天，政府送交国会的一项法案反映了这一变更。在法案中，政府要求对尚未支出的基金0.54亿美元有充分的处理权。它同时还把拟议中的为中国的立法与扩展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区别开来。这两个措施都是中国帮所反对的。4月14日，国会最后表决时，扩展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实际上包括了参议员诺兰提出的修正案，规定给予总统在援华法令下的拨款余额处理权，只限其用于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地区。这样，美国就用经援方案和运送军火继续与国民党捆绑在一起。

这一点点结果很难满足中国帮。由于不能迫使政府采纳自己的观点，它就更猛烈地攻击国务院的官员们，显然希望这样就能限制政府的撤退计划，

或通过人事更动来改变政策。这些对抗性的压力构成迅速摆脱中国的又一障碍。就在国会通过提供 0.54 亿美元的对华基金余额的法案的同一天，公布了艾奇逊 3 月 15 日写给参议员康纳利的评论麦卡伦提案的信。次日，参议员布里奇斯呼吁：“国会应穿上大礼服盛装调查国务院的对华立场。”他斥责艾奇逊：“可以说是破坏了中国国民党的至少保存部分自由中国的英勇尝试。”麦卡伦和诺兰强烈支持他的攻击。就在共产党人渡过长江的 4 月 21 日，诺兰提出一份联合决议，要求由 5 名参议员及 5 名众议员组成两党联合委员会调查美国的远东外交政策。这样一个班子将使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内的亲蒋议员在调查中享有发言权。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把诺兰的决议搁置了起来。

3. 共产党人以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

对华政策的分歧及政府的无所作为的立场制造了一种怪现象：只有共产党人的胜利可以替政府撑腰来对付批评者们，并推行其政策。其后果是：美国只能刚好在共军推进之前先一步撤走。这样就加强了那种认为政府无能或缺乏预见的印象。4 月 21 日，共军以惊人的摧枯拉朽之势渡过长江，证实了官方的中国局势不可挽救的观点。政府继续推行其摆脱方案。在 4 月 24 日共军占领了南京以后，司徒大使加上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各国使节，甚至仍留驻在南京。苏联是把大使派往国民党中国的新首都广州的唯一大国。在整个 5 月里，俄国人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着眼于签订与新疆的贸易协定。作为证明政府政策的合理性和割断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的一个步骤，艾奇逊再一次提出他曾在 1948 年 11 月间提过，但被马歇尔和杜鲁门拒绝了的一项建议。这一次他取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出版了一本后来被称为对华白皮书的文件。春季里，大批官员们正忙于这项工作，并由远东事务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思负责。6 月间，在年初成功地交涉柏林封锁问题的菲利普·耶塞普被指派研究远东问题。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编辑下属官员们搜集和写成的资料。

共军在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及在 4 月 28 日与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举行的私人会谈，对布里奇斯及惠里两参议员有短暂的清醒作用。关于中国政策的辩论有个短暂的沉寂。只有顽强不屈的诺兰以始终不懈的劲头仍在继续鼓吹追加对华援助。在他的提议下，陈纳德将军在 5 月 3 日被召回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陈纳德提出每年用 7 亿美元援助中国西南及西北边缘地带地方和省的政权的方案。

第二天，这一提议就被艾奇逊用美国政策保持不变的声明直截了当地加以摒弃。5 月间，国务院公布了它为执行北大西洋公约而批准给欧洲的军援的试行方案。5 月 17 日，诺兰在参议院的议席上通知说：他将提出一项对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军队提供援助的修正案。

4. 在批准巴特沃思问题上的分歧

过去的种种失败一再反过来困扰政府。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有分歧的事后分析法，哪怕这些问题跟美国的现行政策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6 月间，在委派巴特沃思担任新设立的远东事务及助理国务卿的批准问题上，

两党分歧又以新的冲突反映出来。这场辩论暴露了两党在路线上的越来越大的裂痕。

人们发现甚至连范登堡参议员也公开地、严厉地批评国务院。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尽管委员会全体一致地赞成批准，范登堡却投了“有异议”票。6月24日，他解释说：按他的看法，任命新助理国务卿，不是“在任命之际带来新观点”，而“只是继续那种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跟我国远东政策的可悲失败连结在一起的体制”，乃是“大错误”。然而由于存在手段与目的的脱节，而且只限在传统政策样式的范围内活动，除掉那失败的政策外，显然是不能有什么其他抉择的。于是，范登堡也审慎地承认：“要表明自己与某个政策无关是轻而易举的；要断定另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抉择就不容易了。我得承认：批评别人要比做得正确容易得多”。

中国帮的攻击及政府发言人的辩护词，暴露出同样的窘境。布里奇斯把巴特沃思形容成为：“我国对华关系上的失败和悲剧的象征。”布鲁斯特则把这件事扩展成对政府政策的总攻击。参议员康纳利反诘道：“参议院里有没有任何人主张派美国军队去解决中国的党派纷争呢……？”9月26、27日又爆发了激烈争辩，在其中参议员诺兰扮演了显要的角色。参议员富尔布赖特替巴特沃思辩解时指出：如果要责备什么人，肯定必须责备马歇尔将军或国务院，而不是去责备一个较小的官员。9月27日，巴特沃思的任命被有着鲜明派性的投票所批准。是否批准巴特沃思的辩论，并不能使执行撤退政策的下级官员们的任务更轻松。这标志着一个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导致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命沃尔特·罗伯逊为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据传那是国会内中国帮的首脑人物看中的人。

在6月24日参议院的辩论之后约一个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陈之迈博士打电报给蒋委员长，特别提议如何运用适当方法来影响美国政策的问题。陈举荐说：

关于我国的在美活动问题，看来似乎是：我们不仅应在政府内活动，还要在立法机构内活动。我们尤其应该与后者建立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的活动严格遵循美国法律，那是根本没有危险的。但胡适博士[前任驻美大使]反对与立法机构保持接触。他的意见是不对头的。

5. 毛的一边倒政策和艾奇逊寻求遏制的办法

当国务院官员们正在完成政府对华政策的辩护文章的汇编时，当参议员们正在讨论巴特沃思的任命时，毛泽东在1949年7月1日作了历史性的外交政策声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宣布中国必须“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为了毫不含糊他说明他的立场，并估计到可能会有人反对加入一个阵营反对另一阵营的做法，他写道：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

幻想。不仅在中国，即是在全世界也绝无例外，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中立是伪装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是故意地要刺激人。因为一方面，他认为刺激与否在革命派和“反动派”的关系上没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一个旗帜鲜明和刺激性的立场声明，才适合他的划清革命派和“反动派”的界限，与“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的目的。接着他就阐明他的一边倒政策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方面：

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一方面，毛不相信美英政府会援助“人民的国家”。假设他们肯同中国做生意并借钱给中国，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而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声明进一步澄清了4月3日中共及中国各小党派领袖们的一项宣言中所突现出来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宣言中他们抨击了北大西洋公约，并强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跟“我们的盟邦苏联”并肩前进的意愿。意识形态上的信仰同对美敌意相结合促使毛跟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政策彻底决裂。

毛的声明并不能使国务院在执行撤退方案时更加轻快。在载有陈纳德一篇鼓吹以援助保存部分中国的方案的文章中，《生活》杂志编辑在正文前加上一条按语说，毛的文章“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美国人的幻想——幻想中国共产党是‘不一样’的”。

毛的声明显然对官方的想法有清醒的作用。与1949年头四个月不同，很少有报导说国务院官员们期待在中国的早期会出现铁托主义。[202]7月18日，艾奇逊给菲利普·耶塞普先生一份绝密备忘录，其中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并指示耶塞普草拟为达此目的的可能行动方案。艾奇逊告诉耶塞普，他要“绝对弄清：我们尚未失去力所能及的、达到在亚洲遏制极权共产主义扩张的目的的机会”。8月，国务卿艾奇逊聘请科尔盖特大学校长埃弗雷特·凯斯先生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前任会长雷蒙德·福斯迪克先生任国务卿顾问，并与耶塞普一道工作以寻求具体的行动方案。

一个被摒弃的抉择就是成立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的太平洋公约。艾奇逊憎恶被拉进东南亚国家自身间的争端和他们与欧洲列强间的争端里去。他对美国资源和能力的限度心中有数。再有。从潜力上讲，作为南亚最大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也憎恶参加任何集团，它的政府认为一切关于太平洋公约的讨论都不成熟。日本处于被占领状态。其他亚洲国家对共同事业所能作的贡献甚微。在亚洲最积极鼓吹反共同盟的不是别人，正好是蒋委员长。对他，美国正在寻求摆脱的办法。7月5日，蒋委员长在接见一个美国记者时说：“不论我是否担任政治职务，我不能放弃领导革命的责任。”在他的提示下，国民党在7月份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蒋任主席，李代总统为两个副主席之一。这一新机构使具有国民党领袖资格的蒋氏又多了一个控制军政事务的工具。甚至事先不通知李代总统，蒋委员长于7月10日飞往菲律宾拜访季里诺总统。这两位亚洲领导人宣告了他们发请柬、邀请参加讨论反共同盟会议的意图。回广州后，蒋告诉美国大使说：他不得不首先发起组织反共同盟，因为美国拒绝在远东事务上担任积极的领导工作。8月间，蒋访问

南韩；8月8日，蒋与李承晚总统敦促季里诺总统采取步骤召开这一会议。此时，美国军队已完成从南韩的撤退有一个多月了。而在此前的3月间，麦克阿瑟将军接见记者时划了一道将南韩遗留在外的美国防线。

6. 白皮书

当蒋委员长正飞往南韩推行他的洋洋大观的反共同盟计划的时候，国务院在8月5日发布了对华白皮书，将对付共产党革命的战略上的失败，归咎于蒋政权的基本弱点。公布该文件是相信——正如艾奇逊后来所说：“灾难已经压垮了国民党政府。”白皮书代表了一个企图，即企图在美国舆论面前证明自珍珠港事变以来政府政策的合理性。[203]艾奇逊传送的信清楚地暴露出美国政策的传统样式已将美国引入何种困境。艾奇逊不得不承认：通过大规模武装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回顾起来，似乎是令人神往的”；但是这“在事实上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同意在1945年或以后让我国军队承担如此沉重的责任”。艾奇逊的信也承认：帮助中国人民抗拒外国统治的传统政策未能达到它的目的。艾奇逊解释说：“这一次，这种外国统治却被巨大的社会运动的假面具笼罩着。这一运动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显然是完全土生土长的和本民族的。”美国唯一的抉择就是：“站在一个失去自己军队和自己人民的信任的政府一边，进行全面的干涉。”但干涉“将被中国广大人民所憎恨，并截然相反地改变我国历来的政策，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斥责”。艾奇逊作结论说：

中国内战的不祥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

艾奇逊认识到不可能发展中国式的铁托主义。似乎是回答毛所高谈阔论地宣告其“一边倒”政策，艾奇逊声称：“中共领袖们早已强调过继承中国传统，但他们又公开地宣布他们对一个外国强国俄罗斯的屈从。俄罗斯在近50年来、不论是在沙皇或是共产党人的统治下，一直在楔而不舍地努力扩展其对远东的统治。”与他7月18日给耶塞普的备忘录中陈述的遏制政策相呼应，艾奇逊警告说：“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屈从苏俄帝国主义的目标，并企图对中国的邻国进行侵略，我国及联合国其他各国将面临一种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与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形势”。至于对遥远的将来，艾奇逊寄希望于相信：“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艾奇逊提出，美国应当“鼓励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

如果艾奇逊指望白皮书能使他的批评者们缄口不言并赢得公众的舆论，他很快就失望了。就在它发表之日，参议员诺兰及众议员贾特都在国会的议席上作简短发言，断言白皮书及书中转载的文件证实了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批评。两天后，赫尔利将军发表一项声明，将白皮书称为“国务院内亲共派人物的圆滑的托词；这些人策划了推翻我国盟友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的事变，并协助共产党人征服中国”。8月19日，贾特攻击说，国务院遗漏了十六个文件和事实，这些文件和事实能进一步地支持批评者的指责。参议员布里奇

斯、诺兰、麦卡伦及惠里发表一份长篇备忘录，猛烈攻击白皮书是“对一厢情愿的、无所作为的政策的 1054 页的遮掩粉饰。这种政策的唯一成就是使亚洲陷入被苏联征服的危险之中”；这时攻击达到了最高潮，攻击是如此地猛烈，国务卿艾奇逊不得不发表一项声明，来回答贾特特别指责的十六项遗漏问题。

那些反对中国帮寻求积极政策的人也批评白皮书，但却从截然相反的理由出发。沃尔特·李普曼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拒绝接受“艾奇逊的我国对华政策基本正确及结局超出我国的控制的能力的说法。”他要求知道“蒋反对美国政策的原因及补救办法。”他要求调查这一惨败，他希望这种调查能够“用制定政策的政治家的风度来进行，而不要用律师为他的当事人寻求判决的方式来进行。”按他的看法，白皮书“甚至没有把根本问题提出来，更不用说回答那些问题了”。

在中国，白皮书成了共产党的宣传机器的可资利用的材料。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 8 月 18 日抨击说，白皮书提供了赫尔利将军用支持蒋介石的办法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性的证据，暴露了马歇尔将军在调解中对国民党的偏袒，及揭穿了司徒大使企图在国民党内外建立亲美分子势力的政治阴谋。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五篇文章中，毛利用白皮书来强化他对美国政府的攻击，来发动一场破除中国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的“幻想”的运动，并把他们争取到他的事业那边来。毛把白皮书的特点概括成一本反革命的书，它公开证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断言，如果是老奸巨滑的英帝国主义，是不会发表这类文件的，但是，

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那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在暴露许多用过的“法宝”中，白皮书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按毛的说法，艾奇逊把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所抱有的、对美国的仁义道德的幻想一扫而空。毛宣称：“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至于对美国未来的政策，毛认真对待艾奇逊的虔诚的宣言：“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大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他认为：那表示寄希望于“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的美国，还是要捣乱的。他宣称：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

与此相反，“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被说成是人民的逻辑。毛嘱咐“先进的人们”有责任去阻止中间阶层和动摇犹豫的人们被帝国主义拉过去，告诉那些被蒙骗的人们丢掉对美国的幻想。当这些人被争取过来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毛说让“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中国共产党

十年八年，那时“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即使现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还是被打败了。毛断言：“是我们正在向他们进攻，而不是他们进攻我们。他们不久就要完蛋了。”

7.对“中国一般地区”的军事援助

中国帮催促对中国实行军援并未因白皮书的发表而停止。它再一次企图用政府的欧洲方案作楔子，以便插入其中国方案。在国会审议实施北大西洋公约与援助希腊、土耳其、伊朗、南韩及菲律宾的总军援法案时，在参众两院的国民党政府的友人们提议通过修正案以便批准给中国军援。与马歇尔在1947至1948年肯向中国帮让步相反，政府在国会内的支持者对中国帮的要求作出了初步的强烈有效的抗拒。在众议院内，批准给中国军援的两项修正案及一项单独提案均未能通过。在参议院内，诺兰提出一项批准给予1.25亿美元军援及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顾问团的修正案。但对外关系及武装部队两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却通过了康纳利提的修正案，它在表决时按党派路线俨然分成两派。这个修正案批准给0.75亿美元作为总统应付紧急意外事变的基金，可以用或不用到中国及远东的任何地区，无需向国会报告其详细开支情况。

即使迟缓到现在这种地步，中国帮仍然表示出它可以而且能够危及政府的欧洲方案，除非它得到在援华问题上的某种让步。在众议院内，它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败使它的某些成员有了更多的动机来支持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人詹姆斯·P·理查兹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将把政府要求的对北约国家的军援11亿美元减掉一半，其目的是促使他们在国防上也做出一体化的安排。由于沃立斯和贾特的强烈支持，理查兹修正案以209票对151票在众议院得到通过。在参议院，中国帮的某些成员用支持委员会联席会议内的佐治亚洲参议员沃尔特·F·乔治提出的从要求的欧洲军援基金中减掉3亿美元的修正案的办法，来发泄他们不快。乔治的提案以10票对13票的微弱差额未获通过。

再一次有必要跟中国帮妥协。参议院通过了范登堡提出的建议，使0.75亿美元可以用于“中国一般地区”。在委员会的讨论会上，众议院对给北约国家的批准数的减半被恢复原数，参议院提出的向“中国一般地区”提供0.75亿美元援助的条款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内，沃立斯和贾特都改变了他们原先的立场并支持批准政府要求的数额。这个法案于9月28日在国会通过。四星期后，几乎全数都可以拨款。于是，在国外看来，美国似乎是被一项新军援方案跟国民党捆绑在一起了。但实际上，中国帮只不过得到空有其表的胜利。12月底，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政府的观点，并拒绝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在1948年的1.25亿美元拨款之外，追加给福摩萨某些军援的建议。0.75亿美元的对“中国一般地区”的军援完全被用于福摩萨以外的其他地区。采取这个方案并不能增加美国的威望，它不能阻止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进军。

8.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按一般人的逻辑，人们期望在国务院摆脱国民党政府的方案的后面，会

跟上承认中共是中国的统治权威的政策。举一个例子，耶塞普就认为：一般的原则是，不承认政策是与事无补的。然而，跟 1949 年秋冬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政府的高级官员们还没有决定早日承认共产主义中国。这是衡量美国面临的困境的一个尺度：当她的官员们正急于要割断跟国民党政府的残余纽带时，他们也认为：尽早寻求与中共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行不通的和不明智的。它看起来行不通，主要是由于国内的政治理由；看起来不明智，按文件记录及官员们后来强调的说法，是为了从美国的威望及当前利益的观点出发。

在 4 月 24 日中共占领南京后的几天内，就提出了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司徒雷登大使留在南京以便给共产党人以“讨论跟美国的关系问题的机会”，他也受到曾在马歇尔使华期间活跃在三人调处执行总部的一位共方官员黄华的非正式访问。在非正式谈话中，黄不久就提出了关于承认的问题。司徒回答：只有在产生了被中国人民接受的并能按照国际准则保持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新政府后，才能考虑这个问题。在华盛顿，国务院期待在 10 月 10 日成立共产党的中央政府。5 月 6 日，它采取步骤来说服在远东有利益关系的、非共产主义的、主要的大国政府：“（1）开创任何导向承认的行动及由官员们发表声明表露对中共探求承认的欢迎，都会有种种不利；（2）有关西方各大国对此问题采取共同立场是有必要的。”达成的非正式协议说，各非共产主义大国在采取行动前将事先互相磋商并互相通知。但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其观点说，一旦成立了共产党的中央政府，应该在尽早的时刻给予承认。印度政府正在考虑承认事实上的“在华北成立的共产党政府”。

.445.

国务院企图阻拦其他大国及早给予承认的举动，必须根据下列事实来理解，即：4 月 14 日国会刚刚在关于欧洲复兴方案的法案中加上一项条款，把尚未动用的给国民党政府的 0.54 亿美元的经援基金的期满之日延长到 1950 年 2 月。国务院如有任何表示愿意早日承认共产党中国的迹象，将显然会蔑视国会的意旨。当共产党人在 6 月 15 日召集各反国民党的党派会议，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准备成立共产党人控制下的“联合”政府时，关于承认的事就此停顿下来。

6 月 24 日，在范登堡参议员与康纳利参议员为批准巴特沃思的任职问题而爆发的争论中，范登堡参议员表示，希望在未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初步的彻底的接触与探讨之前，不要考虑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就在同一天，诺兰参议员发表了一封由 16 名共和党及 6 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给杜鲁门总统的信，要求总统明确表示：现在不考虑承认共产主义势力。国务卿艾奇逊注意到国会的情绪，就在 7 月 1 日致函康纳利参议员，保证当轮到决定这个问题时，会跟对外关系委员会进行磋商。

8 月 2 日，即公布白皮书的前三天，司徒雷登大使离开南京返美，把在广州的大使馆留交公使级参赞刘易斯·克拉克负责。8 月 14 日宣布：美国意欲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在外交战线上，国务院继续与各国政府交换意见。在华盛顿召开的美英法外长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于 9 月 13 日再一次跟贝文先生会谈，敦促他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再一次表示承认共产党中国是不明智的。贝文向艾奇逊表示，英国政府不能拖延对共产党政权的承认。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表示要求承认。第二天，苏联就给予承认。苏联的各卫星国很快都跟上苏联。10 月 3 日，国务院的发言

人声明：美国政府未与国会磋商前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他指出：中国要求承认的通告中未包括该政权准备履行其国际义务的保证。

在 10 月 6、7、8 日的颇不平常的圆桌会议上，承认共产党政府的问题，构成了最重要的讨论题目。这个会议由国务院召集，有 24 名对中国感兴趣的著名学者和企业家参加。据引用一个无偏见的参加者的话：有“非常普遍的认识，即需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而且要相当快地承认它。”哈罗德·斯塔森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他要求至少要延迟两年，他确信共产党人没有能力巩固他们的控制。一个参加者作出下列值得注意的评语，这种评语也许能部分他说明国务院犹豫不决的原因：

坐在这间屋里争论着和倾听着，我认为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了有一种将要承认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的心情。但近几天来，马歇尔将军却在我耳边窃窃私语说：我们现在谈论的许多东西，都是不能马上使美国公众接受的，也是国会所不能接受的……。我认为步骤将是瞧着和等着。

在这种背景下，国务卿艾奇逊在 10 月 12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适用于承认新政府的三项主要条件：（1）它控制它自称控制的那个国家；（2）它承认它的国际义务；和（3）它的统治得到被统治的人民的默许。如果说能指望共产党政府很快满足第 1、3 两项条件；可是却没有证据证明，它能在短期内符合第 2 项标准。早在 1947 年 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宣布过：它认为国民党政府在内战期间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定和外债统统无效。1947 年 10 月 10 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重申了这一点。废除这些条约和协定是毛的跟国民党政府和平解决的八项条件之一。国务卿艾奇逊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加之，毛采取了“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政策。在 1949 年 3 月，他向干部们指示说：在进入大城市以后，他们首先采取的步骤是不承认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控制对外贸易和改革海关制度。他对西方的仇恨和怀疑及对国际事务的不了解，引导他对承认问题抱一种离奇的观点。他甚至认为，在完全战胜国民党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该也不需要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他分析说：“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而且“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贯彻毛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用各种方式折磨美国人。7 月间，副领事威廉·B·奥利夫在上海被警察逮捕并殴打。8 月 17 日，美国政府宣布，正在撤出受到逼近的共军威胁的广州市的大使馆、领事馆全体人员。10 月 24 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安格斯·沃德及全体领事人员被软禁了将近一年以后，沃德及四名人员又被监禁了一个月。最后这一行为被美国政府看成是“完全违背公认的关于对待领事人员的国际礼节和国际行为的准则。”沃德被释放后和全体人员被驱逐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显然是要用对待美国官员和公民的办法，作为一种证明他们有能力向美国势力挑战并打击美国威望的手段。共和党参议员们在共产党人的行为中，找到了攻击政府对华政策的额外论点。美国对共产党政府的承认，不得不等待中共在国际行为上有所改变，等待国内有比较宁静的气氛。

在 11、12 两月，美英政府交换了好几次意见。美国的立场是继续认为：在考虑承认以前，共产党人必须在国际行为上达到某种标准，非共产主义国家应该有个共同立场。但大不列颠在中国的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及香港的易受伤害性、促使英国政府倾向于及早承认。更重要的是，印度急于跟她的共产主义邻邦建立友好关系，这也逼使英国政府采取这个立场。12 月 16 日，贝文先生告诉国务卿艾奇逊说，内阁决定在 1 月上旬给予承认。在回答中，艾奇逊对英国的决定表示遗憾，并说他对他前已表示过的意见，没有新的补充。康纳利参议员追随国务院的观点，在 12 月 29 日宣布：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未能绝对尊重国际法、包括保护好外侨以前，他反对承认它。这样，就没有理由攻击国务院，说它实际上告诉英国政府只管前去承认共产党中国，并给英国一个印象，似乎美国也会很快跟上去。12 月 30 日，印度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正式承认。巴基斯坦于 1 月 5 日采取了同样行动。1950 年 1 月 5 日，英国政府撤回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次日就给予共产党政权以法律上的承认。在 1 月 6 日到 1 月 18 日，挪威、锡兰、丹麦、以色列、阿富汗、芬兰、瑞典、瑞士很快地相继承认北京。1 月 10 日，国务卿艾奇逊通知正在开内部会议的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关于国务院与其他各国政府交换意见及磋商时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他没有表示美国政府快要承认共产党中国。

1 月 14 日，中国共产党政权夺占了美国政府在北京的财产。这项产业系按 1943 年中美条约的规定由陆战队用的军营改成的领事馆院落。在抗议中，国务院履行其先前的警告，立即从共产主义中国召回全部美国官员，并关闭一切美国官方机构。1 月 14 日，诺兰参议员宣称，共产党夺占美国在北京的财产一事，突出他说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并提议“对此政策负责的人向总统提出辞呈”。布里奇斯参议员断言：“如果我们的负责官员不改换我们的政策，那就到了改换我们的官员的时候了。”报纸把这些及其他声明解释成要求国务卿艾奇逊辞职。国会的意见是，现在可以认为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承认是办不到的事。国务卿艾奇逊在 1 月 18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夺占领事馆财产一事，使人们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不要美国承认。美国政府实际上是远离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而不是更接近它。

从以上所述中可以看出，只要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仍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经济援助，政府承认共产党政权就是个行不通的步骤。当国务院企图按国内政治条件许可的速度尽快摆脱国民党政府时，它也试图劝阻其他各国政府不要给予承认，以便使美国不致陷入孤立，以便能保持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再有，国务院似乎真在关心中共对其国际义务的态度，并关心他们如何一律对待外侨、外交人员及公民。考虑到这一切，国务院的立场就非常好理解，就不像乍一看来那样奇特了。[204]

国务院除掉尽可能避免进一步卷入内战，并对中国局势发展听其自然以外，只剩下极少的事可做。中共军队的迅速向前推进似乎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崩溃已指日可待。8 月 4 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将军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叛变倒向共产党，并交出了湘北地区。蒋委员长与李代总统之间的继续不和，使制定保卫广东省的计划成为不可能的事。10 月 13 日，国民党政府撤出广州并迁都重庆。次日，共军即进入广州。三天后，共产党的部队攻占福摩萨海峡对岸的港口厦门。11 月 20 日，李代总统，一个被彻底打败了的人，飞往香港，接着不久去美国就医。12 月 8 日，国民党政府将首都迁往福摩萨的台北市。重庆于 12 月 30 日丢失，到年底时，实际上全部大陆都落入

共产党人之手。只有中国西南部分地区加西藏尚未被征服。3月1日，蒋委员长在福摩萨恢复总统职务。

9. 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控告苏联

在为生存的誓死斗争中，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走了一步棋，这步棋给国务院带来了新问题。这就是1949年9月28日，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对苏联提出控告，控告苏联违背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国民党政府是在离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1日之前只有三天时，作出这一行动的。显然，这是为了诬蔑新政权是苏联干涉的不合法产物而采取的步骤，并因此而掀起不利于各国和联合国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舆论。[205]蒋廷黻博士在1949年11月25日联合国大会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上作长篇发言后，作结论表示其希望说：（1）联合国大会要发表声明，判定苏联阻挠了国民党政府在满洲建立政权的努力，并给予中共以军事经济援助；（2）联合国大会承认中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事业是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3）联合国大会劝告所有成员国停止和制止进一步给予中共以军事经济援助的行为；（4）任何成员国都不跟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

随后，中国代表团就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把这些希望写成文字，略加润色，作为联合国大会的裁决和建议。蒋博士解释说，在中国的决议草案中的四项有法律效力的词句中，建议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一款乃是“最重要的”。

同时，共产主义集团也没有闲着。11月18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莱伊收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一则电报，要求“为了遵照中国人民的意愿”，立即剥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联合国继续代表中国人民的一切权利”。中共的这一要求给苏联代表团提供了反驳国民党控告的依据。11月15日，维辛斯基先生在政治与安全委员会上宣称：国民党的控诉“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是被前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而“他的代表团将不参加对该问题的考虑”。他的立场得到乌克兰、波兰、白俄罗斯及捷克的代表的支持。在裁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程序要点时，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莱斯特·B·皮尔逊先生维护了国民党代表团代表中国的权利，直到它被联合国大会的有关机构及大会本身成功地反对掉为止。

中国决议草案给联合国的若干成员国带来难题。这些国家大都并不同情苏联的举动。但采取中国的建议将限制他们承认共产党政府的行动自由，并进而阻断了一般被认为是使远东形势正常化的必要步骤。[206]美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巴基斯坦及菲律宾倡议的，由菲利普·耶塞普提出的一项联合决议草案，使他们有了一条从困境解脱的出路。这一联合决议草案删掉了任何有关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删掉了抨击苏联的问题。它只是号召一切国家在与中国的交往中遵守一定的总的原则，例如，尊重她的政治独立，尊重现存的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制止在中国领土内寻求势力范围或外国控制的地区。几乎无疑的是，面对中国决议草案与五国提案两个抉择，大部分国家会愿意支持后者。面临着失败，蒋博士在12月2日圆滑地请求把表决日期推迟到12月5日。

12月5日，古巴、厄瓜多尔和秘鲁用提出一项新联合决议的办法拯救了

蒋，该决议把国民党的控诉提交联大临时委员会。这就使蒋能够声明：如果采用了三国提案，就不需要表决中国决议草案。该草案将自动地被交给临时委员会。实际上，他撤回了他的决议草案，只准备在临时委员会再重新提出。三国提案，其中包括一项乌拉圭代表团提出的为了加强它的修正案，以 23 票对 19 票在政治与安全委员会通过，其中美国投了反对票。由于三国提案在性质上是程序性的，它跟美国提出的五国提案没有什么不一致，所以后者以 47 票对 5 票、另 5 票弃权也被通过了。委员会的这些决议在 12 月 8 日被联大批准。在辩论中，美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菲利普·那塞普对苏联帝国主义的攻击是毫不留情的，但却抑制住不抨击中国共产党。无疑地，美国对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在态度上的差别，最初是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是苏联而不是中共才是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正式指控的一方。但看来似乎是，国务院此时已企图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之间打入楔子，用以煽起中国人反对苏联帝国主义威胁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一企图也反映在 1950 年 1 月的几个美国官方声明中。1950 年 2 月 7 日，临时委员会着手处理中国的控诉问题，但未采取任何行动。

10.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美国承认北京的问题紧密相连。国务院对这个问题采取的行动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共产党人 1 月 14 日夺取美国财产及 2 月 14 日宣布缔结中苏同盟以后，它对共产党政权采取了强硬起来的姿态。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在 1 月 8 日发给联合国及在安理会有代表的几国政府一则电报，宣布“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残余”的代表在安理会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并要求开除他时，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就成熟冒头了。两天后，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先生要求驱逐中国代表蒋廷黻博士。

此时，美国并不是不妥协地反对接纳中国共产党政权。在讨论中，美国代表欧内斯特·格劳斯先生声言：美国政府将投票反对马立克提出的决议草案。但他在以后的发言中阐明：美国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他反对苏联的动议不能被看成是行使否决权。他声明：“当这个问题得到七个理事国的赞成票时，”他的政府将“接受安理会的决定”。法国代表团也持同样立场。1 月 13 日，苏联决议草案以 6 票对 3 票被否决，联合国及挪威弃权。于是，马立克声明：只要“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未被逐出安理会，苏联代表团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他并用宣布“不承认安理会在国民党集团的参与下通过的一切决议的合法性，并不受这类决议的约束”的办法，来作他的声明的后盾。他的退出开创了苏联对联合国的抵制，这种抵制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以后。

苏联从安理会驱逐国民党代表的这一不成熟的和拙劣的企图，或者是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或是就是使共产主义中国孤立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一种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此时安理会的 11 个理事国中，有 5 个已经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大不列颠和挪威。一般期待法国和埃及很快就要给予承认。如果苏联代表团再稍等一些时候，如果中国共产党随后未采取引起法国反感的行动，和未加剧已受伤害的美国的感情，共产主义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事是会被推迟的。[207]相反，许多观察家们都感到，苏联政府似乎是故意企求失败。[208]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一系列减少他

们被接纳机会的行动。前已述及，1月14日他们夺取了美国在北京的领事馆院落。1月19日，北京广播电台宣布：中国共党政权决定给予胡志明的越盟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在这件事上，北京甚至走在莫斯科的前头。这一行动对法国政策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正如乔治·皮杜尔总理跟特里格夫·莱伊后来所说的：“法国已准备承认新政权，但当毛和苏联承认了胡志明时，我方的承认就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同样地，外交部长罗伯·舒曼也向莱伊透露：“如果不是因为北京对印支的共产党人的支持，法国早就会投票使中共得到席位。”

苏联的抵制制造了联合国从未面临过的最严重的危机。莱伊秘书长担心苏联的行动可能是成立一个由苏联集团组成的对抗性组织的第一步。他还感到，已从大陆驱逐出去的国民党政府，再也不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因此，他采取步骤以打破僵局。在1月21日跟国务卿艾奇逊的晤谈中，莱伊询问艾奇逊，美国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事是否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加以考虑。艾奇逊的答复表示了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态度的强硬化。他说，北京政权几乎全然不知道，它在作些什么或它的行动有哪些国际反响。回忆起最近的夺占美国财产一事，艾奇逊坚定地宣布：美国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会承认北京，并反对在联合国给共党政权以席位。

在此次跟艾奇逊的晤谈后，莱伊决定在安理会内劝说另外两个理事国投北京的票，以便获得必需的七票多数。但是，莱伊的计划又遇到障碍。在1月13日马立克的退出，和1月14日北京夺占美国、法国、和荷兰的财产，及毛在1月19日承认越盟政府以后，趋向承认中国共党政权的浪潮发生突然的停顿。自从在年底缅甸和印度对北京给予外交上的承认以来，这个浪潮曾愈涨愈高。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法国、埃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及墨西哥——本来可以期待所有这些国家不久就要给予承认——都抑制了他们的行动。在1月17日瑞士给予承认以后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荷兰与印度尼西亚是承认北京的仅有的两国。趋向承认的浪潮的突然中断，意味着北京不会很快被接纳入联合国，意味着苏联的抵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除非各国政府在政策上对在先加承认的基础上投赞成北京的票所要求的条件有所改变。于是，联合国内的僵局，只有用割断个别政府的承认问题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两者间的联系的办法，才能打破。

在莱伊秘书长的要求下，秘书处法律科在2月上旬准备了一份关于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学方面的备忘录。根据联合国和国际联盟的事实、实践和裁判的先例，备忘录作结论说：

由于对一个政府或国家的承认问题是个别的行为，而承认成员国资格或在组织[即联合国]内的代表权的接纳问题则是集体的行为；为后者定下条件，即在集体接纳之前必须先有个别的承认，在法学上看来似乎是不能成立的。

它断言，各成员国已用不断的实践明确表示：“成员国能合乎体统地投票，赞成接纳一个它未承认的或跟它没有外交关系的政府的代表，”而且“投这样的票并不意味着承认，不意味着准备建立外交关系。”正如莱伊秘书长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明确地表示的：他希望在这一推理的基础上，法国、埃及、厄瓜多尔和古巴——未承认中国共党政权的安理会的理事国——当仍在不予承认的时候，可以投赞成北京政府在安理会有代表权的票。但莱伊的计

划又被另一形势发展打乱了。2月14日，宣布缔结中苏同盟条约。国务院现在对拉丁美洲的一个国家施加压力，这个国家根据莱伊备忘录的精神，本来打算支持中共在安理会的席位的。而法国和埃及则都没有准备改变他们的立场的迹象。

在新闻界知道了莱伊的机密备忘录后，莱伊在3月8日公布了它。在它被公布后，欧内斯特·格劳斯先生宣布：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原先的立场，即反对接纳北京，但将接受多数决定。与1月间的形势迥异，现在国务院充分认识到暂时不会有赞成接纳北京的多数，并真的采取步骤来保证不会有多数。足以使人诧异的是，持有最心平气和的观点的人乃是美国的知名人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担任国务卿时，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了不妥协的政策。在4月18日出版的一本书中，杜勒斯写道：“如果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能力在没有严重的国内反抗下治理中国，那么，它也应该被接纳入联合国。”他赞成普遍性的原则，并建议来个一揽子买卖，把成员国资格给予被苏联否决掉的五国及被西方国家反对的三个卫星国。他写道：“我们应该愿意所有国家都成为成员国，不要试图严格地区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这在实质上是与特里格夫·莱伊持同样立场。

莱伊的备忘录及国务院公布的立场，大大地惊动了国会内的蒋的支持者们。不能领会国务院行动的微妙性的参议员诺兰在3月10日参议院的一次讲话中警告国务院说：参议员们对接纳北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都深感关注，并要求美国否定特里格夫·莱伊的活动。5月2日，35名参议员写信给杜鲁门总统，敦促他明确表示美国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政权，并将积极反对苏联企图剥夺国民党代表席位和给予中共代表以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行动。对这一要求，杜鲁门总统给了一个友好的、但不承担责任的答复。美国立场保持不变，正如国务卿艾奇逊在5月31日国会听取他欧洲之行的报告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上所宣布的那样。

11. 关于福摩萨的问题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这个时期的决定性问题是是否用武力手段保卫福摩萨。如果失掉福摩萨，关于承认共产党政权及批准给它联合国成员国资格的问题，就自动失去了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用她自己的武力或用军援承担保卫国民党的最后据点的责任，她就不能承认北京或让它无阻挡地进入联合国，除非跟中共在远东有全面的政治解决。正如上一章中所提到，国务院在1948年10月摒弃了使用美国武力保卫福摩萨的办法。1949年8月4日，国务卿艾奇逊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执行秘书送去一份备忘录，声明福摩萨的失陷看来是非常可能的，是不能只靠政治经济手段来防止的。8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重申了他们先前的观点，即阻止福摩萨落入共军手中的“公开的”美国军事行动是不适宜的。在8月26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计划与作战副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向公众事务助理国务卿乔治·V·阿伦提议，请后者考虑采取“报导措施”，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福摩萨失陷对倾向西方的国家、特别是那些远东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不良影响”。9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劝告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说：按他们的见解、美国甚至不应该派军事使团为查证事实的目的而去福摩萨。据约翰逊追溯记载，他感到联席参谋长

们的建议是在政治压力下作出，并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的。

但很快就出现了共和党人的采取强硬措施以保卫福摩萨的要求。10月下旬，新泽西州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从远东返回。11月4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艾奇逊，吁请美国应该“绝不允许”福摩萨落入中共之手。为达此目的，史密斯提出下列建议：如果美国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福摩萨在技术上仍是日本的一部分，美国可以在通知联合国将它变成托管地的情况下，以日本的占领国的资格占领福摩萨。这位共和党参议员断言：“如果这样做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如果进攻福摩萨，他们将面临进攻美国的责任。”史密斯在11月29日向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报告中，最积极地陈述了这些观点。在12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了他的论点，并暗示说，麦克阿瑟将军支持他的立场。

12月8日，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到福摩萨。同一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福摩萨局势。据报导说，美国政府排除了任何改变不用美国武力保卫福摩萨的政策的可能性。然而，国防部长约翰逊提请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要考虑政治问题，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拟出一项建议来。参谋长联席会议转变了在派调查使团赴福摩萨的问题上的原先立场，并提议派出使团。他们还提议在1948年的1.25亿美元拨款之外，应追加某些军援给国民党。12月15日，约翰逊给杜鲁门的一份备忘录就包括这个提议。但国务院坚持其原先的立场，并争论说，简直可以认为美国武力的插手也拯救不了该岛，而派出实地调查使团只能进一步损坏美国的威望及美国在远东的地位。[209]12月27日，约翰逊从与杜鲁门总统的谈话中得悉——引用他自己的话：“我在福摩萨的战斗中已经打输了……。人们告诉我……他不准备跟我争论那些军事上的考虑，但基于政治理由，他要跟国务院决定此事。”12月23日，国务院根据魏德迈8月26日的提议，向国外各使团及美国之音和其他机关发出一份关于福摩萨的“报导政策文件。”文件提议，一般都预料福摩萨要失陷，应采取步骤来极度贬低福摩萨的重要性，并因而尽量减少美国威望的损失。12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认可国务院的观点。

当国务院的提议被政府采用时，共和党人圈子里的要求积极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2月27日，史密斯参议员再一次给艾奇逊写信，敦促政府立即跟福摩萨的新任省主席吴国桢先生会谈，目的是为了安排美国对该岛的占领。12月30日，诺兰参议员跟史密斯参议员一样，也新近从远东返回，并呼吁派遣军事使团赴福摩萨。同一天，塔夫脱参议员接见一家报纸的记者时提议：即使有必要派美国海军去那边，也应保持福摩萨不落入中共之手。1月2日，诺兰参议员公布了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在12月31日为答复他要求发表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而写给他的一封信。胡佛提议：美国应该在必要时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海军的保护，保护其对福摩萨及佩斯卡多尔列岛（即澎湖列岛）的占有，可能还加上海南岛。塔夫脱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对使用美国海军阻止共产党攻占福摩萨的要求。这表明他赞同胡佛的提议。

但是共和党人对采取这一严峻步骤的可取性问题，在态度上一点也不一致。范登堡参议员拒不评论胡佛——塔夫脱建议。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参议员严重怀疑沿福摩萨海峡划一道防线来对付共产主义扩张的办法的明智性。即使贾特也不愿意走那么远：他只要求派美国军事顾问团到福摩萨。然而，一件碰巧发生的事件却给诺兰参议员撑了腰。在公开胡佛的信的第二天，国务院在福摩萨问题上的新闻报导的指导文件被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的司令

部泄露给报界。诺兰迅速地抓住这个机会，抨击国务院的极度贬低福摩萨在战略上的重要性的行为。H·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立即支持诺兰对披露这一秘密文件的要求。使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外交事务委员会内的少数派首席众议员查尔斯·伊顿挺身支持美国占领福摩萨的军事行动。

1月4日，艾奇逊采取主动跟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约定在1月10日开会，来解释中国局势和政府的政策。但胡佛—塔夫脱建议已经引起各种猜测。中国共产党人攻击说：美国跟国民党已达成一项占领福摩萨的谅解。在美国人民的强烈的厌战心理的背景下，塔夫脱和胡佛用军事行动保卫福摩萨的提议及诺兰在处理胡佛的信中所起的作用，使中国帮在政治上处于易受伤害的地位。政府决定在未与国会磋商前就澄清它的政策。[210]杜鲁门总统来不及等候艾奇逊跟对外关系委员会预约的开会日期，就在1月5日在白宫发表一项声明，宣布：

美国政府现在无意在福摩萨谋取特殊权利或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武力来影响目前的形势。美国不打算采取一条导向卷入中国内部斗争的路线。同样，美国政府不打算向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和咨询。

杜鲁门的声明强调这一事实，即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规定把福摩萨归还中国，美国及其他盟国自日本投降后都接受中国在该岛履行职权的事实。就这样，政府用明确的语言不仅拒绝了胡佛—塔夫脱的提议、史密斯参议员的意见，而且还明确表示：它无意动用国会按范登堡参议员的折衷方案于1949年9月批准给“中国一般地区”的0.75亿美元军援，向福摩萨提供军火。可是，1.25亿美元特别基金的未动用余额900万美元仍可由国民党用来购买军需品，这没有被砍掉。总统声明意味着在1.25亿美元之外，不会再给进一步的援助。总统声明中的“现在”一词，确实留下改变对福摩萨政策的漏洞。艾奇逊1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在我国军队在远东也许遭到攻击的未必可能的不愉快事变中，美国必须保持为它自身的安全在任何地区采取任何行动的完全自由。”

杜鲁门的声明立即成为共和党人依据不同理由一致攻击的目标。1月5日，诺兰在参议院席位上发起攻击，集中火力批评不给福摩萨进一步提供军援的政策。他呼吁在国务院的远东司来个人事大改组，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协调人”，并援助福摩萨。他也呼吁动用国会拨给的0.75亿美元装运军火给福摩萨，而将援华法令下的1.06亿美元的未动用基金用于经济援助。[211]塔夫脱断言：“拒绝动用我们的武力阻止共产主义在这次讨论中的地区[即福摩萨]前进的任何想法，跟我们同意在欧洲制止共产主义的做法大相径庭。”麦卡锡参议员把约翰·S·谢伟思形容成这样一个人，他“作为国务院的代表，竟说亚洲唯一的希望是共产主义”，这一来他也加入了中国政策的辩论。范登堡参议员向报界发出一项声明，对政府在“与国会的有关委员会进行认真的商讨之前，就对福摩萨问题”宣布“结论”，表示了遗憾。参议员H·亚历山大·史密斯攻击政府不守信用，破坏了一般认为的政府与国会的谅解，即未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磋商之前，在福摩萨问题上不采取行动的谅解。

但共和党人对总统声明的猛烈抨击却掩盖不了那非常真实的可能性，即任何使中共不能得到福摩萨的企图都将承担严重的战争风险。胡佛、塔夫脱

和史密斯提出的抉择，在公众中得不到什么支持。因此，在四天以后即 1 月 9 日的参议院的辩论会上，当政府发言人发起反攻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都被迫采取守势。在一份长篇发言中，史密斯参议员强调他的提议的性质的“主流是和平性的和建设性的”。他把他提议的占领福摩萨的主张，跟使美国承担责任“无限期地用军事方式支持国民党的事业”的政策划清界限。他解释说：他用“占领”一词并不意味着“派美国军队到福摩萨，而只是在那里建立由我们加国民党跟福摩萨人民之间的联合的政治权威和职权”。他干脆断言：“我不认为有必要派一个兵到那里去。”

最后这句话成为康纳利参议员在反驳中取笑的资料。康纳利问道：

如果我们不派一支军队到那里，我们怎么去占领它[福摩萨]？……我们总不能以到那边去的两三个参议员来占领它，这些人听到第一声枪响就会钻进某处的一个散兵坑。（笑声）

康纳利使共和党参议员们清醒地面临两种抉择：或者接受政府的撒手政策，或者甘冒战争的风险。他责问道：

参议院里有人愿意派军队到福摩萨去吗？胡佛先生要派海军到那里去。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塔夫脱先生]……要派海军到那里去。但他们在这个团体的席上竟没有一个代言人敢站出来告诉参议院和国家说：“我赞成派军队去福摩萨。”

他们要军队到那里去干什么？他们要占领它，他们要接管福摩萨。他们会说，“根据我的公式，归根到底是我们干预那个内战；我们甘冒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甘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就为了福摩萨。”

至于对“联合占领”的概念，康纳利评论说：“我们跟蒋介石搞联合占领是不会走多远的。要不就是由他来经管全班人马，要不他就 .461. 不干。就是这么一回事。”康纳利现在能把共和党对政府在华记录的批评，跟共和党建议采取极端措施一事联系起来。他宣称：

我要知道这些参议员们是谁，我会不时地反复提出这个问题：究竟谁想借着福摩萨，特别是潜着恶毒攻击美国总统和国务院，把国家——虽然不是直接地而是有可能地——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康纳利的攻击如此地奏效，使诺兰感到有必要跟史密斯的占领福摩萨的建议明确地划分界限，也跟胡佛的提议含蓄地切断联系。[212]但塔夫脱参议员坚持了他的立场。在 1 月 11 日在参议院的讲话中，塔夫脱指出：美国海军已经部署在福摩萨海峡，而如果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不准许共产党人占据福摩萨，就不会有共产党入侵的企图。塔夫脱解释说，这种行动方针无需使美国承担为支持国民党政府而承担同中共进行持久战争的责任。他预见到成立福摩萨共和国的可能性，并确信美国能迫使国民党接受这种解决办法。

当关于福摩萨的辩论在美国日益热烈的时候，毛泽东于 12 月 16 日抵达莫斯科，随后不久就跟斯大林进入秘密谈判。这两件事为国务卿艾奇逊所作的，在他一生中最有光辉、也是最能引起争论的讲话之一提供了背景。他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在国家报刊俱乐部作了题为“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

的检讨”的演讲。艾奇逊特意地为美国在亚洲基本政策总框框下的、美国对华的短期性和长期性政策下了定义。他指出：民族主义既作为摆脱外国控制的自由的象征，又作为摆脱贫困的自由的象征，乃是亚洲的最强大的力量。艾奇逊断言：美国的利益跟亚洲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从历史上看，美国一直反对外国控制中国，并赞助一切亚洲国家的独立。另一方面，亚洲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有基本的对抗。因为“共产主义是苏联外交政策所能设想的最微妙的工具，而它的确是俄国帝国主义的长矛的矛头……。”艾奇逊显然在注视着莫斯科的谈判，他攻击说：

苏联正在把中国北方各省从中国肢解出去，并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个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它在满洲也快接近于完成。而我确信在内蒙和新疆，一定有所谓非常可喜的报告从苏联的代理人那里发出来。

很明显，俄国帝国主义与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的对比，向艾奇逊提供了政府决定不干涉中国内战及不保卫福摩萨的基本论据。它也导致艾奇逊把美国的长期性政策，立足于打中国民族主义这张牌来对付苏联和中共。

艾奇逊写道：

我们绝不可使那一定会发展的、中国人民的正直的憎恶、忿怒和仇恨，从俄国人那里转移到我们头上来。让它转移到我们头上，那才是愚蠢！我们必须采取我国一贯采取的立场——即任何人，只要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他就是中国的敌人，并且违犯了我国的利益。

他断言：苏联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后果，是把最最严重的责任强加到中共头上。最近的事态证实了中共与苏联之间有尖锐矛盾的预言。但它采取的形式跟艾奇逊预料的非常不同。它最初来源于对付西方的革命战略与策略上的基本分歧，中共主张一种更有战斗性的方案，更着重于依靠武力，较之苏联更乐意采取好战行动。这个论争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进行的，而不是用民族利益的语言。毗邻省区没有成为值得注目的问题。中国民族主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美国，而不是苏联。

为了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的军事威胁——按艾奇逊的意见，它“不是最直接的”威胁，艾奇逊在西太平洋划了一个美国必须防守和将要防守的环形防线。这个环形线沿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和琉球群岛直到菲律宾群岛。[213]福摩萨被划在防线之外。还遗漏了南韩。后来认为这鼓励了北朝鲜人在6月25日发动进攻。所以这样划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南韩将是战略负担而不是战略财富。显然，很少想到这个地区的局部侵略和有限战争的可能性。未能包括东南亚一事表明美国对其防务尚无坚定的政策。此时，耶塞普大使肩负使命赴远东及东南亚，以寻求一项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具体方案。他在1月5日到东京跟麦克阿瑟将军会谈。他打算在月中与蒋委员长会晤，而在2月到泰国的曼谷参加该地区的美国外交官会议。谈到该地区在军事上的安全问题，艾奇逊有这样一些评说：

必须弄清，任何人也不能保证该地区不受军事攻击。但也同样必须弄清，在实际关系的范围内，这一种保证几乎是不合适的和不必要的。如果发生这种攻击——谁也说不准

这种武装攻击将在何处发生，首先必须依靠被攻击的民族来抵抗它，然后就要依靠整个文明世界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承担的责任。迄今为止，尚不能证明联合国乃是一切决心反对外来侵略以保卫自己的独立的民族所无法依靠的一根脆弱的芦苇。

跟着康纳利在攻击胡佛、塔夫脱和史密斯建议中对战争风险的强调之后，艾奇逊对美国亚洲政策的积极面的有力说明，使政府得到相当的好处。因为看来那个政策避免了任何直接的战争风险，划了一条易守的防线来保护美国的生死攸关的利益。其中还包括一项对亚洲的长期性方案，该方案可以用和平的手段贯彻执行。共和党的对政府的批评者们，显然对自己的牌估计过高。正如阿瑟·克劳克观察到的那样：“塔夫脱、胡佛、史密斯和诺兰用他们在福摩萨问题上的建议，危害了他们党的批评政府中国政策记录的运动。”再有，“由于对共和党的福摩萨问题上的意外收获，艾奇逊英勇地、喜洋洋地把一个影响很大的事变，寄托在政府对那边的政策上。”但是，艾奇逊的敌手们很快在新动向中找到了新的进攻弹药。当共产党人夺取美国在北京领事馆财产的消息披露后，诺兰和布里奇斯间接提出要艾奇逊辞职的要求。在公众越来越厌恶在中国进行冒险的背景下，共和党想叫艾奇逊辞职的新要求使民主党阵营更团结一致。1月17日，民主党参议员们召开党的会议。据报导说，他们“在表示对杜鲁门总统从福摩萨撤手政策的支持上，实际上完全一致。”报界解释说：会议意味着“多数党对共和党攻击中国政策破产和要求撤掉艾奇逊的行动的集中火力的反攻。”

在这关头，众议院的一群共和党人在众议员沃立斯的领导下，紧紧盯住了这件事。为了表示他们对政府政策的总的方面的不满，尤其针对它在福摩萨问题上的决定，他们起劲地反对政府倡议的、在1950年财政年度的剩余月份内给南韩的一项0.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法案。在议会的辩论中，沃立斯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即在缺乏一项健全的、对远东的全面方案的情况下，对韩国的经援等于把钱扔进“老鼠洞”。伊利诺斯州共和党人罗伯特·切波菲尔争论说，丢掉中国使南韩无法防守。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众议员唐纳德·L·杰克逊问道：“这是一种什么远东政策，要把经援给跟我国国防不相干的韩国，而同时却拒绝援助福摩萨的要求？”[214]对援韩法案的攻击是如此地炽烈，使中国帮内的比较负责与冷静沉着的成员之一的贾特众议员感到有必要向国会内的同仁们呼吁：即使福摩萨对美国是“生命攸关的”而南韩不是，即使政府对中国和福摩萨的政策是“错误”的，但这也并不能证明反对援韩有理。在一心想节约的和主张不干涉主义的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的参与下，沃立斯及其支持者仅以一票之差击败了这一法案。在共和党人中反对它的人数为六比一；而在民主党人中则4人中只有3人支持它。这是战后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第一次严重的挫折。中国帮的某些成员们再一次表明，他们有能力在其他地区内损坏政府的方案。最糟的是：这场辩论把美国的立场公开披露了，即认为南韩是无法防守的，而且对美国是没有战略价值的。艾奇逊在1957年写到这事时表示相信：众议院的这一举动促使苏联错误估计美国对北朝鲜发起攻击的可能反应。于是，一个折衷方案再次出现了。国会最后通过的法案给援韩法案附加上一项条款，即把援华法令下1.04亿美元的剩余基金的支用最后期限，从1950年2月15日延长到6月30日。但一般认为，在延长了的期限内，实际上只有不足0.1亿美元可以用到福摩萨，而且全部用到继续农村重建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上。

在众议院内援韩法案的初次受挫，使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为保证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方案的顺利通过，它至少必须继续在经济上援助福摩萨。于是，在参众两院通过的对 1951 财政年度的总的对外经援的法案中，有了一项条款进一步把援华法令下的剩余基金（在 1950 年 6 月时估计为 0.94 亿美元）的支用期限，从 1950 年 6 月 30 日延长到 1951 年 6 月 30 日。国会在 5 月通过的最后法案规定剩余基金的用途为，用到“总统相信不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任何地方及中国一般地区。”它规定：“只要总统认为可行，可以得到不少于 0.4 亿美元的这种基金，为援助中国的地区之用（包括福摩萨）。”[215] 中国帮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正在衰弱下去，但它仍强大到足以制止迅速的、完全的撤退。

12. 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中国政策

在发现美国政策被困在福摩萨问题上的那一年里，人们看到麦卡锡主义的兴起。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阴险攻击。由于美国社会道德上的一致性，对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气质的疯狂攻击，当然会带有否定一切的性质——攻击那些公认的价值、制度和政策，但对社会的迫切问题却并不做出正面的答复。由于许多传统的自由主义观点在美国对华政策上表露得最充分，于是这一政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麦卡锡猛攻的主要目标。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判断错误，低估了意识形态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并因而低估了共产主义有生命力的影响，未能察觉社会上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过分依赖折衷方法的功效，相应地无法看到必需使用武力，把不干涉主义上升为过于自信的原则，及倾向于用美国的语言来理解外国事物——所有这一切对中国的政策都产生着可以觉察到的影响。由此也就不难看出：这个政策是易于遭到麦卡锡的蛊惑性宣传的伤害的。麦卡锡对中国政策的攻击，使他第一次得到有势力的和受尊重的共和党领袖们的支持——这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赫尔利在 1945 年、贾特在 1947 年都已提出过存在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美国在华政策失败的一种辩解。谋求大规模援华方案的努力被挫败后，特别是自从 1949 年以来，许多共和党领袖们都加强了对国务院的攻击，要求调查，并要求进行人事改组。许多美国人不能认识到美国政策的失败植根于他们自己也同样有的假设和态度，因此他们用接受麦卡锡的有阴谋分子的观点，作为对他们受伤害的自尊心的一帖止痛药。用欢呼并默许他在国务院内搜索不存在的共产党人，来追寻可行政策的代替物，来表示出他们对远东事务的焦虑。[216]

麦卡锡参议员是在准备 1952 年连任竞选中用的论题时，非常偶然地发现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这一问题的。2 月 9 日，他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的一次讲话中，没有立即集中火力攻击与中国政策有关的官员们和专家们，虽然他的确指名攻击了约翰·S·谢伟思，说他“以前曾竭力主张：共产主义是中国最好的希望。”[217] 2 月 20 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回答要求解释他的指控时，发表了长篇演说。在讲话中，他向参议院提出 81 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并把他们编成号。他的第 2 号案件是约翰·卡特·文森特。他被麦卡锡定罪为国务院的特务圈的“三巨头”之一。麦卡锡强烈主张：他应该“不仅被解雇，而且还要立即被起诉。”对文森特的攻击与间谍活动有关，但与远东政策无关。按罗维尔的说法：约翰·S·谢伟思也是那些

编号的案件之一。[218]但是，当麦卡锡断言：“情报研究机关、美国之音及远东事务司看来似乎是[共产党的渗透的]三个主要目标”时，他确实迈出更接近于中国政策问题的一步。

麦卡锡对共产党渗透的指责，不可避免地要跟中国政策的尸体解剖很快挂上钩。在参议院由米勒德·E·泰丁斯任组长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小组会所主持的听证会上，麦卡锡指控九个人有共产主义倾向。他已经把其中的四人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跟美国的中国政策挂起钩来。几乎是随便地，他指控菲利普·C·杰塞普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有非一般性的共鸣。”他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希、国际关系学院的总监欧文·拉铁摩尔形容成“危害安全的极危险分子”。“他对远东事务的广泛的知识及他对苏联在该地区的事业的共鸣，可能已经对国家产生了无数的、不可补救的危害。”据他说：拉铁摩尔“曾是我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并且“为国务院”担任“数不清的职务。”他把当时驻印度加尔各答的总领事约翰·S·谢伟思抬高成“整个国务院内制定远东政策的十来个最高决策人之一”。他宣称：“谢伟思跟共产党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他把谢伟思描写成“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的有名的同伙和合作者。……跟被认为是特务的人们打成一片。”麦卡锡指控的主要根据是《美亚》案件。谢伟思在该案件中被控告将秘密情报材料交给专载远东问题的杂志《美亚》的编辑菲利普·贾夫，并曾于1945年6月被捕过。那时，大陪审团对谢伟思案件一致地投了“无罪”票。在麦卡锡提出指控以前，国务院官员们在查看了他的忠诚档案后，曾替他洗雪过三次。[219]另一个被指名的人是第四点方案的技术合作设计人员主任霍尔多·汉森。汉森被麦卡锡指责成早在1938年就“有亲共倾向”。他被描写成“一个负有使命的人——使世界共产主义化的使命……。”指控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他担任美联社记者时，他于1938年曾经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呆过4个月，并且写了一本书。书中有一些对共产党的赞扬，同时也有对国民党的赞扬。

在开头的四次会议上，麦卡锡并没有进一步以材料来证实他的指控，以说服小组会或公众。人们看出：他没有任何新证据，来支持他在2月20日在参议院对81人的指控。而相反地，从巴基斯坦飞回来驳斥麦卡锡的指控的杰赛普大使，在泰丁斯小组会上所作的长篇声明结束后，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杰赛普强调指出麦卡锡的不负责任的指控对国家外交政策的不利影响。为了从绝境中脱身，麦卡锡孤注一掷。第二天，他向小组会宣称：在欧文·拉铁摩尔的案件中，他要就不站起来，要不就倒下去。8天前，麦卡锡把拉铁摩尔仅仅说成是“危害安全的极危险分子”。现在他把拉铁摩尔形容成“大间谍”，“俄国的大特务”，并且是“希斯加入在内的整个组织的头子”。这一指控使全国感到震惊，几乎所有的重要报纸都用第一版来报导它。

然而，严格地讲，拉铁摩尔从来没有成为国务院的雇员，虽然在他担任《太平洋事务》编辑、担任多产作家、担任蒋委员长的美籍顾问、担任负责太平洋战区的作战情报局副局长等职务期间，他对官方的政策无疑地有一些影响，而且影响到何种程度尚难于确定。把他攻击成大间谍头头是完全无根据的。第一个在官方的听证会上充分地论述拉铁摩尔在其著作中追随共产党路线这一观点的人——弗丽达·厄特莱被迫说道：

我认为麦卡锡参议员在他先前的所谓欧文·拉铁摩尔是苏联政府在美国的大间谍头

子的说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参议员低估了拉铁摩尔。拉铁摩尔先生是如此著名的学者、如此优秀的作家，因而他教导美国人民应该停止反对伟大的、善良的和进步的苏联政府是合适的；我们不可能相信莫斯科会把他当成是可以使用的工具，如同那些间谍一样。谁设想说拉铁摩尔先生的伟大才干被用来搞间谍活动，在我看来，正如设想说葛罗米柯先生或莫洛托夫先生，在成功湖或在国际会议上，利用他们的闲暇时间来偷文件一样地荒诞不经。

麦卡锡参议员在 3 月 30 日只好自己承认：“恐怕在拉铁摩尔案件问题上，我也许过多地强调了他究竟是不是个间谍的问题。”

但不管问题的真实性如何，麦卡锡把拉铁摩尔说成大间谍头子一事，把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一切争论点全都抖出来了，麦卡锡在国会内外无保留地跟中国帮结盟在一起。他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的攻击找到了一个焦点。在 2 月间不祥地开头以后，到 3 月末它正受到支持。塔夫脱对麦卡锡的指控的早期反应是：“这完全是轻举妄动。”但在 3 月 22 日，就在麦卡锡在泰丁斯小组会上指控拉铁摩尔是大间谍头子的同一天之后，参议院的共和党人的政策委员会趋向于赞同麦卡锡。在共和党政策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后，塔夫脱宣布说：麦卡锡的指控“不是一件有党派性的政策问题”，但共和党参议员们正在帮他“作斗争”，而“整个看来，反应似乎是相当好的。”据报导，塔夫脱说过：“如果一件案子办不下去，可以试试另一件。”3 月 25 日，布里奇斯参议员告诉记者说：有一群共和党人要用一系列的指责来“追究”艾奇逊。两天后，他在参议院内演讲，强烈指责艾奇逊。他攻击说：泰丁斯小组会正在开“一片美容院，以粉饰一个时髦的外交界老前辈的失败”。他宣称：我国在欧亚两洲的外交和军事努力的毁坏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斯大林正从我们的队伍内部得到了助力。”他要求泰丁斯小组会从艾奇逊那里搞清楚，是谁决定放弃中国的。

3 月 30 日，麦卡锡在国会里作长篇发言，重申他对政府中有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现在他集中火力只攻击拉铁摩尔、杰赛普、谢伟思、汉森、太平洋关系学会及美国的中国政策。他采用了厄特莱的观点，即拉铁摩尔用宣传该党路线的办法为共产主义的利益服务。关于拉铁摩尔，他写道：

考虑到他作为我国远东政策的“设计师”在国务院内有巨大影响的身份，他的案件的更重要的一面是：他的目标是什么？他鼓吹一些什么？他的目标究竟是不是美国的目标？抑或这些目标是否正好与苏俄的目标相吻合？

他指责说：拉铁摩尔的观点被国务院所遵循，而且“艾奇逊同样地接受其作为远东事务顾问们的见解——即拉铁摩尔、杰赛普和谢伟思的见解。”他在结束讲话时断言：

并不是毛领导下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征服了中国，像艾奇逊、拉铁摩尔、杰赛普和汉森所竭力主张的那样。是苏俄征服了中国，而征服者的一支重要的同盟军就是国务院内的这一小撮左翼分子。

赫尔利将军首创的有阴谋分子的观点进入全盛时期。[220]麦卡锡不仅能吸收阿尔弗雷德·柯尔堡（美国中国政策协会的创建人）及弗丽达·厄特莱夫人的观点，而且还从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反共作家们的日益扩大的团体中

吸取观点。更重要的是，在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集中火力攻击与中国政策有关的官员们和学者们的时候，他的臭名昭著的讨伐运动的食物，还依靠泰丁斯小组会称之为“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上台及国民党政府倒台的一种模糊的不安的感觉。”

诺兰参议员也跟上了这一时代精神。直到3月2日，他只不过攻击拉铁摩尔鼓吹“一种绥靖政策。”可是到4月5日，诺兰参议员在参议院内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把拉铁摩尔的著作跟共产国际1928年12月通过的第六次世界大会决议的论题作对比；跟中国共产党1945年7月通过的党章作对比；跟美国共产党的一个先锋组织在1949年1月发布的中国政策声明作对比；并跟4月4日美联社关于《真理报》的一篇文章的报导作对比。诺兰问道：拉铁摩尔的建议跟那些共产党的文件提出的目标、方针、政策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诺兰拒绝被麦卡锡拉进对拉铁摩尔动机的讨论中去，但他确实强调了这两组观点之间的“奇异的巧合”。6月1日，诺兰用要求重审《美亚》案件的办法，进一步支持了麦卡锡。这一持续的全面攻击使政府1月间在关于福摩萨问题的争论上所得到的好处化为乌有。它使从蒋那里摆脱的任务比以前更加困难。

此时，受到麦卡锡攻击的官员们和学者们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发动有力的反攻。拉铁摩尔在泰丁斯小组会内出面时，公开向麦卡锡提出挑战，就中国问题进行辩论。他能拿出170名著名学者和专家的证词，证明他本人的人格完整和忠诚。当他宣布他有责任反驳麦卡锡的指控、并确立美国学者们的自由地、无顾虑地表达他们的意见的权利不受进一步的非难时，听众为他热烈地鼓掌。泰丁斯小组会在7月20日发布一个报告，完全驳斥了麦卡锡对国务院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影响的指控。它反驳了麦卡锡对拉铁摩尔、杰赛普、谢伟思、汉森和文森特的全部控告。[221]泰丁斯的报告及美国对朝鲜战争所引起的国家危机的关注，使麦卡锡一时黯然失色。

13. 美国政策的崩溃和传统的困境

在1949年和1950年内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陆取得了胜利、毛宣布了他的一边倒政策和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等事件。美国估计福摩萨很快就要失陷，它的半个世纪的政策正趋向于崩溃。

美国在中国前进和后退的循环的最后重复——马歇尔—艾奇逊的逐渐摆脱政策，可以跟西奥多·罗斯福对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的默许，跟1915年3月13日国务卿布赖恩致日本照会，跟兰辛—石井协定，跟在满洲危机后胡佛的无所作为，最后跟雅尔塔协定相提并论。在这些后退之前，往往都有一个前进，这种后退是美国政策的手段与目的脱节的产物。贯穿在这五十年中，传统的排除有目的的使用武力的美国方式，迟早是要跟它誓欲达到的维护门户开放和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目标相脱节的。外交上的支持、道义上的鼓励及有限援助被证明为是无效的。当美国面临在使用武力与接受对方实际地或潜在地使用武力造成的形势之间作抉择时，接着就是撤退。

相反地，美国在中国的主要的几次前进，都是在美国参加了一场战争之后，或者在不与中国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上采取了强硬措施之后。如紧接着美西战争之后就发出了海约翰的照会和通告。紧接在日军驻华问题上拒绝与日本取得妥协之后，就施行了石油的完全禁运——这一措施倒不只是为了

保卫中国，而是为了阻碍日本截断英国的商路，阻碍日本攫取东南亚的丰富资源。使中国成为强国的政策紧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美国陆战队的登陆及派遣马歇尔使华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之后。当美国显示出她实有的和潜在的军事力量时，或当中心在别处的危机克服了她那种不愿为中国使用武力的心理时，这些前进就能够实现。

但这些前进一次也没有带来持久的效果。随着时间的进展，美国必须面对以和平手段或有限援助政策所不能控制的局势。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传统的政策注定要接二连三地遭受挫败，那么，当多头力量均势转变为两极力量体制时，传统政策更是命中注定要最后失败。在两极体制下的典型事件中，为了成功地实行遏制政策及解脱政策，都需要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美国却没有那种肯在中国使用武力的甘心情愿的心情。当 1947 年 3 月采取遏制政策时，它并没有被运用到中国，这决不是偶然的。直到国务卿艾奇逊开始执行从中国摆脱的任务时，才指示杰赛普拟议一项将共产党人遏制在中国疆界以内的方案。再有，两极体制使支持现存政府的目标与不干涉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化。因为两极体制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助长了作为攻势战略和守势战略的组成部分的干涉政策。而相反，传统的不干涉原则却禁锢了美国的行动。艾奇逊所传送的信，包含着对传统政策不足以对付从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群众运动的承认。

.473.

当马歇尔和艾奇逊摒弃武装干涉的办法时，他们并没有采取和实现迅速从中国撤退的政策自由，即使他们想那样做的话。在面临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感觉下，传统的跟中国的纽带现在更加强了。这种纽带通过中国帮要求在华积极行动而体现出来。1950 年上半年，政府和蒋的友人们在中国政策上陷入僵持局面。这一党派间的僵局是美国政策的两个内在因素互相矛盾的反映，现在被事变突现了出来。这两个因素是：支持中国的目标和不愿使用武力。在胡佛和塔夫脱的提议中，首次提出使用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战。后来的事变证明：塔夫脱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不敢在福摩萨海峡向美国海军挑战是对的。但这些提议碰上了美国人民的厌战心理。中国大陆已经丢掉，福摩萨被认为不致于重要到值得进行武装干涉的程度。胡佛和塔夫脱的建议只不过使中国帮在政治地位上易受伤害。其结果是，共和党人还是不能迫使政府在福摩萨承担武装干涉的责任。

另一方面，政府不能拒绝继续给福摩萨装运军火和提供经援，否则它在其他地方的外交政策方案就要受到危害。坚持不懈地以支持国民党为目标的政府的批评者们，证明他们有捣乱的能力。在 1.25 亿美元特别基金的未动用余额下的经济援助和军火装运并不明显地承担战争风险。在此情况下，美国就继续纠缠在中国，美国政策被夹在中间动弹不了。她不能采取任何主动，因为她既不愿使用武力，又不愿放弃其目标。当美国在自我矛盾着的时候，其他大国的举动可以使她的政策的不稳定的天秤，不是翘这一头就是翘那一头。如果出现了这种状况，毛在计划中的对福摩萨的攻击就会使美国从蒋那里解脱出来。但是，事态的发展是：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导致了用武力保卫福摩萨的决定。

同时，美国传统政策的另一个持续性的特点以新的形式重新展现出来。正如在过去一样，不承认作为一种政策是在国家不愿放弃一个目标，又不能有目的地使用武力来实现它的矛盾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国民党的友人们热烈

地主张不承认。政府不大有信心地采用了它作为临时措施，部分地是为了回答共和党的压力，部分地是为了回答毛的故意刺激西方列强的政策。毛的刺激性的行动和声明基本上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但是，美国维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加强了他对美国的歪曲看法；而有限援助政策不能使他得出美国有力量和有决心的印象。这样，毛对白皮书的反应，是充分发挥其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的命题，是对美国力量表示极度的藐视——这决不是偶然的。政府对中共政权的承认被他们的刺激性行动妨碍到什么程度，也正是政府在摒弃使用武力的同时又企图维持国民党政府的做法的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它不得不咽下不能迅速从华撤退的苦果。

在阻止迅速完全撤退上，党派间的僵局尽管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还有另一有关因素，它很不显眼，但却相当重要。当为了今天的利益仔细回忆美国政策的演变时，就会发现一个容易遗忘的事实。即在美国官员们非常清楚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的同时，却没有相当的警觉，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关于共产党人的胜利会给他们打下与美国对抗的基础，而美国继续在中国纠缠就会增加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的机会的可能性。对可能的中美冲突的严重性没有认识，那非常真实而又经常存在的、在迅速摆脱政策中包含着的困难就不能被克服。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迅速完全撤退意味着跟一个长期受美国支持的政府突然割断纽带，即断绝军火装运、经济援助和政治上的牵连；意味着必须放弃可以用有限援助方案以某种方式不让中共占领部分中国的幻想，意味着放弃阻滞共产党全部征服中国也许会带来的任何利益。它将不得不抛弃一个国家——一个美国在感情上跟它联结在一起达一个世纪以上的国家。它将成为面对共产党人的公开的敌意、轻蔑的挑战和蓄意的侮辱之下所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 475 .

阻碍迅速撤退的这些情感上的困难和实际上的考虑，在国民党的美国朋友们的观点和建议中表现出来，在他们对政府的政策和政府官员们的攻击中表现出来。这些困难不会轻易地、完全地被继续纠缠的不利因素的份量所压倒。这些不利因素当时就能看出来，并被用来作为主张撤退的论据。共产党人缴获美国提供的军火武器，包括容易补充的军用品，看来是件小事。已拨出的但尚未动用的经援总数是少量的，而且对美国的资源不构成严重的消耗。美国威望的进一步损失是个严重的考虑，但由于美国长期跟国民党合为一体，它也变得不太重要了。反美主义的兴起使美国官员们焦虑，但不管怎样官员们仍然依赖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友谊。关于继续纠缠将驱使中共投入苏联怀抱的论点，及撤退将鼓励中国的铁托主义的论点很快都默默无闻了，嗣后更被中国的声明和行动摧毁了。

如果只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干好事或干坏事的潜力，并正确评价中共外交政策上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人们就会认识到继续纠缠的一切弊病，正象它们后来发展得那样地严重。直到后来美国才能感觉到：美国威望的损失、中国对美国的日益增强的敌意、中共领袖们跟苏联之间的纽带、及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一场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将需要美国方面作出大量的军事努力。反过来讲，对所冒的危险的正确估计，可能会增加迅速撤退方案的成功的机会。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提议撤退的美国官员们和学者们，一般地讲，正是那些不认为中国是对美国的严重威胁的

人；再不然就是不认为意识形态在未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中是举足轻重的因素的人。那些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是可怕的敌人的政界人物，正是那些主张继续援助国民党、妄图消灭共产党人或用有限手段阻滞其前进的人。当政府在1949年与1950年有力地 and 成功地反对任何新援华方案时，它并没有带着紧迫感来主张并执行迅速彻底摆脱的方案。缺乏紧迫感来源于与马歇尔拒绝承担武装干涉的理由相同的根本假设——即中国不可能很快地变成强国，不会轻易地变成对美国的严重威胁。这也来源于这样一个判断，即中国传统的对俄帝国主义的疑惧及历史性的中美友谊，不久就会战胜那种把中国跟苏联联结在一起、并酿成对美国的敌意的意识形态的偏向。

对中共在外事方面的软弱无能和温和稳健的期待，被证明为空想。但它只不过是中国的许多无根无据的期待中的最后一个。它跟在这样一个愿望后面，即愿望中国在国民党手下能变成大强国；跟在这样一个评价后面，即把中共评价为不是真心实意的共产党人；还跟在这样一个希望后面，即希望能成立联合政府。这些过份乐观的期待的兴起、乃是为了满足由美国的中国政策样式所造成的心理上的需要。美国的目标与贫乏的手段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一个美国不能有真正影响力的远东形势。可是她不得不希望事态会以某种方式能圆满地发展。如果必须勾销日本在亚洲的重要影响力，如果美国又不打算在中国保持驻军，远东的稳定的唯一希望，在于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友好的国家的可能性。如果被内部斗争搞得疮痍满目的中国不能变成大强国，而国民党不能带来政治上的进步，唯一的希望在于有“所谓的”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如果联合政府不能成立，第三种势力不能形成，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共的软弱无能和温和稳健上。这些希望避免了做困难的抉择的必要性，或避免了接受那似乎即将来临的灾难的必要性。这些幻想中有许多都植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

直到1950年6月，美国政策确实得到了一个消极性的后果——即避免了武装干涉中国内战，因而避免了跟中共在大陆上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北朝鲜对南韩的进攻却突然地扭转了不用武力保卫福摩萨的政策。该政策在不到6个月以前，曾由杜鲁门及艾奇逊戏剧性地一再加以肯定。尽管政府用一切办法避免这一意外事变，它还是发现有必要在军事上干涉中国内战。再一次，美国由于另一处发生的事变的压力的结果，在中国又作出了一次新的前进。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或迟或早可能会导致跟中共的武装冲突，除非中立化能导致在福摩萨问题上跟北京的政治解决。越过三八线及北京对朝鲜战争的干涉，比任何人的期待更快地导致这场冲突。1947与1948年的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党派争论及1949与1950年的僵局、及不能实现迅速摆脱等，都给这一武装对峙打下基础。反过来讲，以上这些又正是美国政策的内在矛盾的表现。简言之，传统政策的自相矛盾使美国在处理有关中国的问题上，既不能达到她的目的，又不能避免使用她的武力。随着中美在朝鲜发生武装冲突，美国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显露无遗了。

第四部分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第十三章朝鲜战争及共产主义中国以强国姿态出现

1. 苏联走的一着棋和美国的反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北朝鲜的进攻是由苏联支持和策划的。这种策划似乎主要为了破坏美国跟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并用显示共产党人的力量和美国人的软弱的办法来威吓日本，使她离开美国。按苏联的打算，即使达不到主要目的，征服南朝鲜将改善共产主义阵营对付日后的美日联盟的攻守阵地。苏联的计划显然基于这种假设，即美国不会用她的武力来保卫南朝鲜。自1948年以来美国关于朝鲜的行动和声明都支持这种假设。

美国对朝鲜所承担的责任，来自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过的行动。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宣布：“朝鲜将以适当的方式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1945年6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再一次肯定了开罗宣言——苏联坚持波茨坦宣言作为她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至于在朝鲜获得独立以前，罗斯福总统早在1943年3月就预想建立一个国际托管制。这个过渡阶段安排的建议，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均为斯大林所接受。1944年5月，在与哈里·霍普金斯的会谈中，斯大林同意朝鲜应置于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组成的托管制之下。日本投降时，美国 and 苏联同意以三八线作为接受在朝鲜的日军投降的分界线。以后两年，美国 and 苏联关于对统一的朝鲜建立四国托管制的谈判未能获得成果。在双边谈判破裂以后，美国在1947年9月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此时美国抛弃了四国托管制的计划，而她公开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然而在同月内，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是得出结论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看问题，美国在朝鲜保持军队和基地没有多大利益；在那里的两个美国师满可以转移到别处去。不久以前，魏德迈将军在他的现在已很闻名的报告中建议当苏军从北朝鲜撤退时，美军也同时撤出。

换言之，美国是用表面上强调野心勃勃的统一朝鲜的长远目标的办法，用把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的办法，来想方设法地为实际上减少对南朝鲜的军事责任找到借口——南朝鲜对美国的安全是没有多大重要性的。作为武力的代替物，美国企图祈求联合国的支持，来维持她在南朝鲜的阵地。由公开宣称的目标、实际上的目的、规定的手段和基本假设等构成的结构，跟传统的对华政策非常近似。它将要得到的后果，相当类似1941年的门户开放政策造成的后果，即等于邀请敌方强国来进攻，随后美国不得不用她自己的武力与之抗衡。在美国准备采用强硬措施之后不久，口头上的政策就变成一项要用武力来实现的方案。它将使美国面对这样的困境——或者放弃一个她的威望所系的目标；或者在朝鲜动用比她认为明智的限度还要更多的人力和资源。

在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政府正式成立后，美军于9月15日开始撤退，这在上一章中已经提到。麦克阿瑟将军于1949年3月上旬接见记者时，划了一道把南朝鲜遗漏在外的美国防线。6月底，全部美军撤离朝鲜。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的一次演说中，划了一道不包含南朝鲜的西太平洋环形防线。这一切举动和声明明显地向俄国人示意，美国不会保卫南朝鲜以抵御北朝鲜政权的进攻。但北朝鲜军队的精心策划的、大规模的、越过既定边界的进攻，突然使美国面对一个鲜明的道义上的问题，即维持集体安全制度及保卫一个弱国反对武装侵略的道义问题。它造成一个危机，这个危机给

美国官员们以极深刻印象，即对无所作为的可能的灾难性后果的极深刻印象。

舆论认为，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对美国抵抗共产党军队的公开武装进攻的决心的试验。假定美国不能抵抗，其他的局部侵略就会很快跟上，并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杜鲁门总统把北朝鲜人的进攻看成好比是日本进攻满洲，墨索里尼征服埃塞俄比亚，及希特勒在三十年代的侵略。对国务卿艾奇逊来讲，如果北朝鲜的进攻不被击退，整个集体安全体系将会瓦解；而集体安全体系乃是美国安全的基石之一。对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来讲，北朝鲜的成功将使日本处于“俄国熊的上下颚之间”。杜鲁门也感到：如果美国不能保护一个在美国监护下成立的国家，那些邻近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不仅有亚洲的、还有欧洲的、中东的及其他地方的——将受到极坏的影响。

这一对美国在朝鲜的安全的利益的新估价，由于旗帜鲜明的道义问题而更甚，导致美国突然转变了她在远东的战略。6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被授权使用美国海空军，防止仁川——金浦——汉城地区落入敌手。6月30日，杜鲁门采纳了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美国陆军的建议。在建议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时，麦克阿瑟预期“按照他从南朝鲜清除北朝鲜军队的使命，有个先声夺人的攻势作战”。承担在朝鲜大规模使用美国地面部队的责任，不仅构成了以1949年的撤退驻南朝鲜美军为标志的战略计划的截然相反的改变，它还代表对马歇尔将军强烈主张的观点之一，即美国地面部队不应该被用于亚洲大陆的观点的背离——正是这个观点促使他拒绝干涉中国内战的。

2. 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

在北朝鲜进攻之后的最初决定之一，就是派遣第七舰队使福摩萨海峡中立化。尽管据国防部长约翰逊证词中的不同的说法，[222]是在北朝鲜进攻之后的第一天，就根据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合提议作出这项决定的。根据国务卿艾奇逊的证词，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共同拟制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派遣第七舰队到福摩萨海峡。在总统的要求下，由艾奇逊亲自在6月25日在布莱尔大厦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说：艾奇逊提议作出一项声明，即第七舰队将击退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和不得有来自福摩萨的对大陆的任何进攻。这些建议被杜鲁门总统接受了。次日傍晚，在布莱尔大厦的第二次会议上，总统指示国防部长约翰逊在有关第七舰队问题上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指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杜鲁门认可了国务院的使用海空军支援南朝鲜军队的建议。按约翰逊的说法，这是“军方既不提议也不反对”的一着棋。杜鲁门也认可了加强驻菲律宾美军的提议，和增加对印度支那的法国人的援助的提议。杜鲁门总统在6月27日的公开声明中宣布了这些决定。

从已刊出的资料中不能确定，究竟是国务院的官员们还是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在准备联合提议的会议上首先提出派遣第七舰队到福摩萨海峡的意见的。[223]毫无疑问，即使在朝鲜的进攻以前，对政府就曾有过持续不断的压力，要求改变对福摩萨的政策。当国防部长约翰逊及布拉德雷将军刚巧在北朝鲜进攻之前在远东巡视十日后返回时，他们带来了一份麦克阿瑟准备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强调了不让共产党人占有福摩萨的做法对美国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224]尚不能断定：麦克阿瑟的建议在6月25日的审

慎考虑中究竟有多大份量。

然而有理由相信：在北朝鲜入侵后，国务卿艾奇逊非常乐意截然相反地改变他对福摩萨的政策。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美国在南朝鲜的举动，乃是要在其他地方拦阻共产党的行动的一个步骤，使冲突局部化，并用显示美国的力量和决心的办法迫使共产党人撤出朝鲜。于是，杜鲁门总统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的声明中宣布：“向朝鲜的进攻毫无疑问地使事情变得很清楚，共产主义已经从用颠覆手段过渡到征服独立国家的办法，和现在要用武装入侵和战争的办法……”。在此情况下，共军占有福摩萨将成为对太平洋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总统同时宣布了加快印度支那和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的方案。再有，国内的政治及赢得共和党人对国务院在朝鲜的政策的全心全意的支持的必要性，使政府感到非常需要在对福摩萨的立场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派遣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进攻时，政府至少作为暂时措施采用了塔夫脱参议员和胡佛先生鼓吹的那种政策。它采取了一个步骤——一个暂时符合 H·亚历山大·史密斯参议员提出的美国 and 国民党联合占领福摩萨的建议的步骤，也是一个超出诺兰和贾特的向福摩萨派遣军事使团和提供军援的提议的步骤。[225]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暂时导致在远东事务上的两党合作。

事实再一次表明，一个中心在别处的危机克服了美国不愿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心理。世界局势的压力迫使美国停止她的撤退，在最后的时刻里干预中国内战，并至少是暂时地在中国作新的前进。然而，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党了；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主人，与苏联有着强固的联盟。

对杜鲁门总统的 6 月 27 日声明，北京比莫斯科的反应更强烈。因为美国政府不仅突然挫败了中共及早进攻福摩萨的计划，而且还重新提出了整个福摩萨问题。杜鲁门总统特地宣布：“确定福摩萨的未来地位问题必须等待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等待跟日本的和平条约的缔结，或等待联合国的考虑。”这一声明跟他在 1950 年 1 月 5 日宣布“撒手”政策的声明大不相同。1950 年的声明强调了 1943 年 12 月 1 日的开罗宣言，在宣言中罗斯福总统、邱吉尔首相和蒋介石最高统帅声明福摩萨将归还给中华民国。

毛泽东的立即反应就是断言：现在美国总统亲自证明了“他[在 1 月 5 日]的声明是虚伪的。”用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多棱镜看问题，毛把美国为应付新形势的政策变化解释成为“美国公开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面目”。外交部长周恩来在 6 月 28 日的正式声明中宣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将永远不会改变。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还被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及日本投降后的现存情况所确定。”他抨击说：杜鲁门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和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他挑衅性地宣布：“中国人民……在赶走美国侵略者及收复台湾的斗争中，一定会胜利。”从他的声明中明显地看出，北京将不会准许在跟日本媾和的会议上来决定福摩萨问题；而日本是在美国的占领下，或者说是在联合国的占领下；而在联合国内共产主义国家只是少数。6 月 29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直到 6 月 23 日，艾奇逊还宣布说杜鲁门的 1 月 5 日声明仍然有效。它辩论说，朝鲜的形势并不能证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是有理的。看起来很可能中国共产党曾指望美国坚持撒手政策，并从美国的每一声明中找到相应的保证，即这些声明可以被解释成为再一次确认这个政策。美国政策的突然转向，进一步增

加了他们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及对美国声明的可靠性的怀疑。

对美国的增强了的敌意和不信任感，显然使北京更倾向于推进它的革命利益，及倾向于反对美国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政策。毛和周都不是只限于抨击美国对福摩萨的政策转向。他们根据亚洲事务的广泛内容来观察美国的行动。毛抓住杜鲁门的声明来指责美国不仅干涉中国的“内政”，而且还包括“朝鲜、菲律宾、越南及其他各国。”毛以亚洲事务的领导者的身份宣称：“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各国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该由美国来管。”他断言：“美国在亚洲的侵略只会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广泛的和坚决的抵抗。”他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并做好“充分的准备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行为”，而美帝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周也抨击说：“李承晚朝鲜傀儡政权对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进攻是美国预先策划的举动，其目的是为美国制造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及菲律宾的借口。”于是，从一开始中共就不把美国在福摩萨海峡的行动，单纯地看成美国干涉中国内战；而是用“美帝国主义”对亚洲人民的“新的、有预谋的侵略”的广泛的概念来看问题。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仅是要拿下福摩萨；而是要团结“热爱和平、正义和自由的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东方的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起来制止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行为”。他们把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看成他们对美国的歪曲看法的新证明。革命的狂热、意识形态的观点及对美国精神的印象，构成了毛的非正式谈话和周的正式声明的特色；它们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共政权对它的利益和责任的观念，影响着它对外界威胁的估计，影响着对美国意图的判断。这些判断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北京对朝鲜的干涉行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毛和周的声明的内容和语调，再一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 1948 至 1949 年制定的“联合”其他各国的“革命派”的政策。依次讲来，这个政策部分地又来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放手大干的路线，这个路线鼓励诉诸武力行动。这个新路线开创于 1947 年末，是由 A·A·日丹诺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提出。1949 年夏，俄国领袖们开始强调中国例子对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并准许中共承担领导责任，来协调或指导他们。洋溢着革命激情和在极不利条件下取得对国民党的巨大胜利之后的自豪感，使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承担起领导亚洲事务的责任。

1949 年 11 月 16 日，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国家的工会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在打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道路，正是各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应当走的道路。”共产主义中国是在 1 月 18 日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226]期待苏联会在 1 月 30 日采取类似行动。在 1950 年，在越南、菲律宾及缅甸的共产党的纲领中，能清楚地看出毛主义战略的影响。

那时，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被认为是在面临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暂时措施。它显示了福摩萨的未来地位问题。但是，正如业已提到的那样，周宣布了北京赶走“美国侵略者”及收复台湾的信心。于是，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制造了一项新争端，并使北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矛盾形式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现在用她的武力直接反对中国的民族利益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利益，这就不可估量地增加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北京与莫斯科之间在那时可能会有的任何争执都变得无足轻

重了。它甚至使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在远东的任何利益冲突都相形见绌。它使艾奇逊驱使中国民族主义转向反对苏联的企图注定了要失败。

3. 在对中国政策上重新开始争论

在美国国内，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只不过使蒋委员长的美国朋友们暂时平静下来。它争取到他们对政府在朝鲜的行动的支持，但并不能在中国政策上得到一致。它并不能使国务卿艾奇逊免受进一步的责难。即使在暂时恢复政治上的一致时刻里，塔夫脱参议员把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解释成为总统扭转了艾奇逊政策的方向，把朝鲜战争的起因归咎于艾奇逊对福摩萨的撒手政策，并要求国务卿辞职。派遣第七舰队只不过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美国变得再一次越来越深地卷入中国内战，中国帮到此时为止一直在衰弱下去的影响被复活和加强了，而朝鲜战争的局势使关于中国政策的争论尖锐化了。

在中国政策上的这种争执，通过政府与麦克阿瑟将军在三个问题上的龃龉，最有力地表现出来：即美国对蒋承担责任的程度，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地位，及该岛的未来这三个问题。政府意欲限制它跟蒋的关系以便保持它的行动自由，而麦克阿瑟要求全面地承担责任。政府相信：在美国与蒋之间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因为人们担心，在蒋想用福摩萨作为重回大陆的垫脚石的热烈狂想中，他可能会把美国拉入一场对中共的战争。政府感到，对蒋和福摩萨采取错误态度可能会破坏联合国的统一。相反，麦克阿瑟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任何一个愿与共产主义作战的人，认为蒋的抵抗共产党控制的决心跟美国人民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并认为政府的政策和国务院的敌视态度正在挖蒋的墙脚。

政府使用第七舰队来阻止国民党对大陆的作战行动，同时也阻止共产党人筹划的对福摩萨的进犯。麦克阿瑟从一开始就感到，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使中共为进攻福摩萨而集结兵力时，“完全免受”对方的反措施的“危害”。他提议，如果中共继续沿福摩萨海峡建设空中走廊或构筑工事，总统就撤销对攻击大陆机场的禁令。

从已出版的资料中可以断定：政府对福摩萨的未来没有旗帜鲜明的稳定政策。它似乎想用“通过联合国的中介……建立一个独立政府”的办法来阻止福摩萨落入敌手。它可能在设想一个自治的独立福摩萨国。相反地，麦克阿瑟将军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福摩萨人有独立的要求。他把比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得多的战略重要性归诸福摩萨。按他的看法，在敌国手中的福摩萨可以用来突破并抵销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体系。丧失这一环形防线，“将使未来的任何战区东移 5000 哩，达到美洲大陆的海岸——我们自己的家”。麦克阿瑟后来甚至更强调这一点，当他在解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道：“从我国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我们放弃或失掉福摩萨，我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太平洋。”那时，他甚至把他的公开观点暗示给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说：“我们将使用它[福摩萨]作为基地，从这一基地出发，我们可以攻击亚洲的目标，等等。”而相反地，政府只是要使福摩萨不落入敌手，并无使用它进行攻势作战的意图。用布拉德雷将军的话来说，它不相信福摩萨陷入敌手“会危害我国的阵地，到达使我们失去在太平洋上一切其他阵地的程度”。

政策上的争执在两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显露出来。7月31日，麦克阿瑟在事先取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赞同下访问了福摩萨，但未取得国务院的同意，国务院显然试图劝阻他在此时去。这个访问发生在苏联驻安理会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宣布打算回安理会来的六天之前，这样就结束了苏联的七个月的抵制行为。（它指麦克阿瑟的访台——译者）增加了同盟国和中文国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焦虑。它对马立克的和平攻势有利。在成功湖，它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胜利”。当杜鲁门通过他的密使艾弗莱尔·哈里曼，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支持他的政策的军人的保证之后，事情才算收场。

第二个事件是麦克阿瑟给国外战争退伍军人的祝词，在其中麦克阿瑟陈述了他对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的观点。祝词的全文于8月26日登载在美国一家周刊上。发出它时，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约翰逊国防部长及联席参谋长们都事先不知道。当时沃伦·奥斯汀大使写给秘书长莱伊一封长信，重申美国强烈赞同联合国考虑福摩萨问题，并保证支持联合国作充分的调查。在这事之后只有一天就向全世界披露了祝词全文。奥斯汀的信是对付北京于8月24日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一项巧妙的反措施。它代表了通过联合国争取同盟国及中立国，支持美国在福摩萨问题上的立场的努力。如能成功地加以贯彻，就将使美国在这一有分歧的问题上，从她的孤立的和易受伤害的地位上解救出来。

麦克阿瑟的祝词跟奥斯汀的信是互相矛盾的，并使北京更加相信对美国侵略台湾的指控。8月29日，北京电台宣称：麦克阿瑟的声明构成了“正式公开的承认，承认福摩萨是美国的太平洋防线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9月1日，苏联电台宣布：麦克阿瑟撕掉了美国的真正意图的外衣；她的真正意图是要为美国夺取福摩萨。国务院不仅为麦克阿瑟的祝词给予共产党人的宣传优势所困扰；它还顾虑对友好的和中立的国家来讲，美国似乎在用两种腔调说话。在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下，宣布正式撤回麦克阿瑟的祝词。但由于它在杂志上刊登的结果，它的全文已为世界知晓。中国共产党人对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撤回他的祝词一事，并无多深印象。他们引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戴维·劳伦斯的话说，麦克阿瑟的祝词跟国务院的政策并不抵触，而仅仅是它发表得不是时候。

跟政府与麦克阿瑟之间日益增长的争执并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暂时恢复了两党团结一致很快就土崩瓦解了。8月1日，共和党主席盖伊·加百列逊宣布：他的党将在11月的选举运动中支持美国在朝鲜的政策，但将批评杜鲁门政府。8月7日，共和党议员领袖、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S·惠里宣布：他将搞清楚谁应该对认识不到共产党人侵略南朝鲜的危险的失误负责，并要求撤掉国务卿艾奇逊。几天后，塔夫脱参议员又一次指责说，政府在亚洲的政策鼓励了北朝鲜人的进攻。在8月13日披露的一项声明中，对外关系委员会内的5名共和党成员中就有4人攻击杜鲁门和艾奇逊邀请共产党人攻击朝鲜。委员会内的首席共和党成员和外交政策上的两党关系的象征范登堡参议员病了，但他看到了原文，并“大体上同意它”。次日，惠里参议员再一次要求艾奇逊辞职，并且为了“驱除政府中的那些异己的激进分子和道义上的堕落分子”而访问了杜鲁门总统。两天后，他也跟上了对艾奇逊的攻击，他声明：“在朝鲜的我国子弟们流血的责任要落在他的肩上，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路易斯·约翰逊在9月12日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和任命马歇尔将军接替一

事，招致共和党人的又一阵痛斥。9月15日，在参议院为授权给杜鲁门总统任命马歇尔将军的法案的辩论中，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威廉·E·詹纳用他对马歇尔的斥责震骇了那个可敬的团体。他将马歇尔斥责成“叛徒的头面人物”、一个“活骗子”，而且“要么是个轻信的听差，要么就是政府的执行部门发放出来的一批空前的最大逆不道的政治凶手们的真正的同谋犯阴谋家”。[227]他痛斥说：马歇尔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乃是为了那“恶毒地出卖了不仅仅是蒋，不仅仅是福摩萨……而且还出卖了美国士兵们，为这个恶毒出卖装出一副可敬的门面，来达到吓人的目的。那些士兵们甚至在目前还正在战斗和死去，全因为这一件背叛阴谋”。授权法案于9月15日在两院通过，而马歇尔的任命于9月20日被参议院批准，投票表决时几乎准确地显现了不同党派的路线。在外交政策上的两党关系达到了新的低点。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还像以往一样易受伤害。他避免提出可能被看成为对共产党人的绥靖行为的任何提议。但是，他对朝鲜和福摩萨的政策，并不能防止共和党人对他和政府的攻击。只有一个对共产主义集团的巨大胜利能恢复政府的威望，使它有光明的政治前景，并增加它在寻求福摩萨问题的外交解决上的自由。

4. 越过三八线

随着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美国第七舰队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互相对峙。美国海空军力量的优势有效地阻挡了共产党人对福摩萨的进攻。不久以后，北京将大约3万人的部队从福摩萨对岸调到山东。计划中的对福摩萨的入侵被推迟了。然而，回顾起来很明显：有了北京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有了她要最后占领福摩萨的决心，又有了她要在亚洲担任革命的领导等条件，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一场冲突，是或迟或早都很可能要发生的。如果不是发生在福摩萨；那么就会发生在地形、补给线及其他政治地理因素等使北京有更好的机会向美国成功地挑战的其他地方。使这一冲突比任何人所期待的还要更快地来临的，乃是越过三八线的举动。而使北京打了一个划时代的奇袭的胜仗的，乃是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轻率的进军。决定越过三八线的根源，乃是美国的中国政策的盘算方式的特点。麦克阿瑟越过朝鲜半岛的狭颈部挺进的根源，乃是跟越过三八线时的同样的判断错误，加上麦克阿瑟对他的军事力量的自豪感，及政府对他的军事行动的无能约束，尽管联席参谋长们和国务院曾有种种疑虑。

在朝鲜战争的初期，美国的政治目标只是要恢复战前的现状。然而有迹象表明：早在8月初，重要官员们头脑里就有了越过三八线的主意。麦克阿瑟将军似乎是带头鼓吹这一主张的。在8月6日、8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在战争的第一周内就设计了仁川登陆计划的麦克阿瑟告诉总统的密友说：在李承晚政府重新在汉城建立后的两个月内，就可以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选举；而当北朝鲜人确信没有俄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干涉时，他们就会选出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政府。他继续说，没有必要去改变《大韩民国宪法》，它为北方提供了100个席位。这位将军显然是在考虑在李承晚政府之下统一朝鲜，而军事占领北朝鲜则是统一的前提。很有趣的是，麦克阿瑟关于朝鲜的论调并未引起哈里曼的任何反对意见。哈里曼向杜鲁门的汇报，却毫不犹豫地批评了将军的其他观点。

在安理会8月17日的辩论中，奥斯汀大使宣称：联合国大会在通过

1947、1948、1949 年的对朝鲜的决议时，曾寻求由朝鲜人民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独立的国家，及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全朝鲜举行自由选举。现在联合国将不改变这些目标。如果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都支持这些目标，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奥斯汀用下面的话结束他的发言说：“机会就在这里。地方就在这里。时间就在近旁。就是缺少言论和行动。我们在等待着。当我们等着的时候，联合国的力量增长了。它的决议既不会萎谢，又不会衰退。”按照《纽约时报》上托马斯·J·汉密尔顿的说法，奥斯汀的这一发言表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持有这种想法，即联大决议与安理会 6 月 25 日的决议，构成对麦克阿瑟将军继续推进到苏联的边界的授权。9 月 7 日，国务卿艾奇逊宣布，粉碎北朝鲜的侵略决不是联合国的任务的终了。两天后，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概括美国远东政策时声称：“联合国必须有机会实现它长期坚持的政策，即赞助按过去三年的联大决议的路线，成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朝鲜的政策。”同时，莱伊秘书长断言：只是使北朝鲜人撤退到三八线是“不够的”，而“联合国的目标是，也必须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朝鲜，在那里朝鲜的各族人民能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选中的政府”。

麦克阿瑟的言论、哈里曼的沉默及奥斯汀、艾奇逊、腊斯克的声明，乃是美国政策的自然发展趋向。总之，自 1947 年以来，美国的长远的政治目标是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选举，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朝鲜。这一目标被苏联的阻碍行为挫败了，不诉诸武力是无法排除这种阻力的。但现在使用美国武力来对付北朝鲜的进攻，却开辟了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可能性。所以，在间隔了一个短时期后，在未经公开辩论及官方人士显然没有足够的审慎考虑的情况下，美国官员们及公众开始从统一朝鲜出发来考虑朝鲜战争，即使这一目标在美国的目的规划中意义很小。一个口头的政策正在被加工改造成用武力贯彻的方案，正如门户开放政策曾在 1941 年时那样。这一发展趋势来得那么自然，以致美国官员们和公众绝少想到其中所包含的风险和代价。

在 8 月下旬与陆军参谋长 J·劳顿·柯林斯将军及谢尔曼海军上将的会谈中，麦克阿瑟将军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同意在仁川登陆。此时，他也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即为了达到摧毁北朝鲜军队的目的，必须越过三八线。在 9 月 11 日，杜鲁门总统认可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提议。该提议说：“麦克阿瑟将军打算延伸他的作战范围到三八线以北，并计划占领北朝鲜，如果苏联或中共的武力因素没有进入的迹象或进入的威胁的话。”这就是越过三八线的最高级的正式决定。在仁川登陆前一日，9 月 15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发给麦克阿瑟将军一项指示。就这样，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并不妨碍实行解放政策，这种解放政策正是共和党人后来曾经大吹大擂地宣布过的，但是从来也没有执行过。

此时，在美国的非共产主义的圈子里，有占压倒优势的要求越过三八线的情绪，不仅右翼有，左翼也有。9 月 24 日，争取民主行动的美国人协会的主席，前任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敦促继续作战“到底”，直到成立一个统一的朝鲜。[228]美国官员们在推荐类似行动上几乎全体一致。美国的盟国及朋友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只是随后才披露：乔治·坎南反对越过三八线，理由是它会引起共产党人的反措施。

麦克阿瑟将军在仁川的光辉的两栖攻势及北朝鲜军队的全线崩溃，开辟了立即越过三八线的可能性。一个默许联合国军进入北朝鲜的八国决议案被提交给联合国大会。9 月 30 日，奥斯汀大使宣称：“不应当准许侵略者的军

队在一条假想的界线后面避难”，而“把朝鲜分成北朝鲜和南韩的这道人造的障碍物，无论在法律上或是在理性上，都没有可以存在的根据”。

这些军事政治局势的发展引起来自北京的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越来越具体的警告。9月22日，她重申对平壤的支持，暗示还要进一步地给予援助。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对印度大使K·M·潘尼加说，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并让美军到达他们的边界。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宣告：

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更不会苟且偷安地忍看其邻邦被野蛮地侵略。任何人若把将近5亿人民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任何人忽视并损害四分之一的人类的利益并徒然妄想专断地解决与中国直接有关的远东问题，肯定要碰得头破血流。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曾按第八军的命令突入北朝鲜7哩。同一天，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平壤投降。次日，北京以戏剧性的方式充分地、明确地表示了开战的借口，这样做可能是为了传达她的紧迫感。周在半夜召见潘尼加会谈，并向印度大使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得不干涉。

华盛顿对周的半夜警告不予考虑，认为只不过是影响联大对八国决议案的即将来临的表决的一种策略。它不相信北京会干涉。10月7日，联大通过了八国决议案。次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不到两个月后，他们钻进了中共军队精心布置的巨大口袋，那些军队在10月中旬就开始了跨越鸭绿江的行动。

政府对北京的意图的错误估计，不像是来源于艾奇逊的信念，即认为中共深陷于跟苏联的争执中，因而既不会又不能干涉朝鲜。毫无疑问，艾奇逊的长远政策是利用中国民族主义跟苏联帝国主义之间的所谓争执。但是，他的行动，诸如福摩萨海峡中立化及企图通过联合国对该岛的未来地位寻求一个解决办法，都是受到遏制战略的指导和，并且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北京跟莫斯科是坚固的同盟者，至少暂时在行动上还是一致的。他的各种各样的打中苏争端这张牌的声明，是被设计来激发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反对莫斯科的，来使俄国怂恿中共参加朝鲜战争的工作更难做一些，并劝阻北京不要向苏联的压力和敦促让步。也许它们也是为了说服联合国内的中立国家，说北京不会干涉，联合国赞同越过三八线并无多大危险。必须挖出其他更深刻的根源才能找到政府估计错误的理由。

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国务卿艾奇逊举了两个关于政府低估了中国干涉的可能性的例子。第一例是关于政府对北京的意图的估计。艾奇逊宣称：政府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有干涉朝鲜战争的军事能力。但政府认为——而且是十分正确地认为、干涉将需要北京在军事上作最大的努力，而且要在国内承担严重的政治风险。总之，政府确信干涉将在国际范围内削弱而不是加强北京，而且对这个政权不能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

艾奇逊举的第二例是关于政府对中国干涉的可能后果的估计。在仁川登陆前，美国观察家们相信：中国有军事能力来使胜利的天平翘向北朝鲜人这一边，甚至有能力和美军从整个半岛上推出去。在仁川的光辉成就及跟之而来的巨大胜利，彻底改变了对中共军队对抗联合国军队的军事效力的估计。据报导，10月2日华盛顿的一位高级官员曾说过：“我相信中国是不愿被碎剝细割的。”詹姆士·雷士顿在描写华盛顿对印度政府转达的警告的反应时，

写道：“尽管共和党确信中共总是按克里姆林宫的吩咐行事，但叫毛泽东自杀总是要犹豫一番的。”对美军能对付北京的干涉的信心，反映在参谋长联席会议 10 月 9 日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个指示中。其中一部分这样说：“今后万一在朝鲜任何地方，未经事先宣告就公开地或隐蔽地出现大股的中共部队，只要依你的判断用你控制下的兵力的战斗行动，能提供成功的合理希望时，你就应当继续这个战斗行动。”华盛顿的估计后来被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所确证。在 10 月 15 日威克岛的会议上，麦克阿瑟将军告诉杜鲁门总统及他的高级顾问们说：“如果他们[中共]在第一、二两个月内干涉，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现在不怕他们干涉。我们再也不是卑躬屈节地站在那里……。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在朝鲜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想要达到平壤，那就会有最大的杀伤。”既然美国官员们相信北京不自讨苦吃才是明智的，他们当然认为中国的干涉可能性很小。于是，北京对美国的打算和政策的越来越具体的警告的影响，就被华盛顿对美国的军事力量的高度确信，特别是对空军对付中国军队的有效性的确信所抵销掉了。虽然政府错误估计了北京的意图，但它为它的错误辩解的某些理由，在某种程度上讲，倒是真实的。根据我们从各种已刊出的材料中所能得出的看法，中共也考虑到了这些理由。在 1956 年 12 月与北京政权决裂并逃往香港的民主同盟副秘书长周鯨文先生报告说，在 9 月 30 日周发出他的警告之后若干天，高级官员们在北京讨论中国应否参加朝鲜战争的问题。反对中国干涉的人争论说，新建立的政权为了建设需要和平，尤其是它的敌人是第一流的强国。甚至人民解放军的某些将领们也都有这种观点。当时有证据证实周鯨文的说法。1950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曾指出有必要先陈述然后反驳那些反对中国进行干涉的人们的观点。

从周鯨文的报告中暴露：中共曾仔细地权衡了中国介入朝鲜战争所带来的严重风险。中国在朝鲜被打败的可能性也估计到了。还估计到美国入侵中国大陆的可能性。按周鯨文的说法，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一群官员们说：“必要时我们可以从中国沿海撤退到内地，依靠西北和西南作为进行持久战争的基地。”北京也考虑到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可以回顾到 9 月 25 日聂将军向潘尼加大使第一次指出北京意欲进入朝鲜战争一事。在那一次。印度大使企图使共产党的副总参谋长得到一个印象，即美国有用空中轰炸和海军炮击的办法摧毁中国的工业和城市的能力。聂回答说：“这些我们全估计到了。他们[美国人]甚至可能向我国扔原子弹。又能怎样呢？他们可能杀死几百万老百姓……。中国毕竟是以农立国。原子弹对农村能起什么作用？”在 11 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印发了至少有三篇广泛流传的文章，其中含有轻视原子弹效力的论述，特别对原子弹扔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其中之一引用了毛泽东在 1946 年 8 月说过的话：“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11 月上旬，中共采取了特别小心谨慎的措施，防备报复性的空袭。从南满工业地区迁走了关键性的机械设备，包括轧钢厂在内。北京甚至向华中南地区的机关部门发出准备迁移国营工业的命令。

使中共愿意承担这样严重的风险并因而打乱了政府的盘算的原因，似乎是他们对美国在北朝鲜的胜利所加给他们的安全的威胁的估计。在作出这一估计时，他们不仅受到朝鲜对中国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的影响，还加上他们对美国是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印象。这一点可以从 11 月上旬发表的几个声明中很容易地看出来。在 11 月 4 日发出的参加北京政权的各党派联合声明

断言：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无限制的；在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美帝国主义者肯定不会只限于摧毁北朝鲜政府的目标，而是要侵略中国，扩展其对亚洲的统治，并征服全世界。11月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拿杜鲁门总统6月27日的声明作为证据，证明美国决定从三个方向进攻中国——即朝鲜、福摩萨和印度支那。社论断言：在这三个前线中朝鲜是最重要的一个。“美国在完成了对朝鲜的侵略以后，那时她就能把匕首戳进中国的胸膛。”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一个宣传大纲指出：根据麦克阿瑟的公开承认，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目标对准中国和苏联的基地网。杜鲁门总统指示麦克阿瑟撤回其声明的行动，被解释成为一个试图掩盖美国的真正意图的行为。据说美国的侵略计划来源于她力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迅速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所造成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一种尝试。

根据这样一种对美国意图的冷酷的、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中共把美国在朝鲜的行动，看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败之前五十年的侵略过程的重演。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看问题方法，不允许他们把作为扩张主义国家的昨天的日本，跟作为现实强国的今天的美国区别清楚。按他们的看法，美国继承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并正遵循着田中的征服中国和世界的计划。今天的美国跟昨天的日本之间的唯一的区别就是：美国无需像日本那样在企图入侵满洲之前，花费这样长的时间停下来巩固她在朝鲜的收获。于是，中共就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安全跟北朝鲜政权的存在紧密关联，救自己的邻人就是救自己，为了保卫祖国就必须援助朝鲜人民。正是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才驱使中国共产党人采取“志愿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行动”。这种立即有危险的感觉可能由于麦克阿瑟的声明和行动而更增强了，而“中国领袖们的越来越大的焦虑，全集中在他们所看到的挑衅性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形象中了。”

但中国共产党人参加朝鲜战争，并不是不抱有军事胜利和政治收益的期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一个突出因素，是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对最后胜利的巨大信心两者的荒谬的结合。这种结合部分地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并被他们的革命经验加以发展丰富。他们的不安全感来源于对阶级敌人的炽烈的仇恨和恐惧。他们对最后胜利的信心，表现为他们对敌人的藐视和轻蔑，来源于他们对“科学的”历史规律的信仰。恐惧跟信心的这种结合，是他们的谨慎和耐心的支柱。这些构成了他们在革命战争中获胜的重要因素。现在，严重的危急感和有伟大收获的可能性把它们都提到前面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具有特色的宣传中，告诉中国人民要仇视、鄙视和藐视美国。中国人民必须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他们的死敌。当国务卿艾奇逊在讲美国的传统友谊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则教育他们同胞说，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美国一直在坚持侵略中国的政策，最后以在内战中支持蒋介石及目前对朝鲜和台湾的侵略而达到顶点。中国人民被嘱咐要鄙视美国，因为她是一个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没落的反动阵营的大本营。他们应当藐视美国，因为她是一只纸老虎并且“必然”能被打败。

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的战略思想依赖使用原子弹和空军，而忽视地面部队。陆军是美国军事力量的“最薄弱的环节”，而“致命的弱点”是缺乏足够数量的军队。美国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于是，在11月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民的志愿行动[即中国“志愿军”的行动]将给朝鲜人民带来无限的鼓舞和信心，可能会帮助他们扭转整个军事形

势，歼灭或击退尚未立稳足跟的美军，并迫使侵略者接受一个对朝鲜问题的公正的、和平的解决办法。”据报导，毛泽东在事后解释他的干涉朝鲜的决定时，说过下面的话：“胜利会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到一个新高度；落后的中国跟第一流强国打成僵局就是中国的胜利；打败了也只不过是重演一下中国的抗日战争。”毛的言论意味着：除了为防守鸭绿江国界线以对付想象中的美国“侵略”的威胁之外，北京的参战是为了提高它的国际威望，尤其是在亚洲的威望。

如果按准确性的某种标准，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论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如果上述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事实；那么，可以得出结论说，政府对中共意图的错误估计是依据对中共形成其政策的意识形态力量的低估。它没有正确判断他们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的严重程度。它不能估量出他们甘冒算计好的风险以争取政治收获、另一方面却避开严重危险的心理——这是由意识形态所培植、由革命经验所加强了一种性格，一种深深地埋藏在他们头脑里的性格。除此之外，当辉煌的仁川登陆战扭转了朝鲜战局的形势以后，就产生了那种不能慎重地对待中国的思想。显然，美国官员们拒绝相信：百年来一直是“亚洲病夫”的中国，竟敢反抗并能成功地向第一流强国的得胜的军队挑战。不能充分地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及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潜力的低估，是杜鲁门和联合参谋长们对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表示同意的基础，而且是艾奇逊的犹犹豫豫的随声附和的基础。这些错误判断解释了为什么在面对北京的警告时，这一决定也没有缓和一下。美国官员们仍不能从下面两个基本的错误估计下完全解放出来。第一个错误估计在约翰·S·谢伟思和约翰·P·戴维斯的建议中，最有力地表现出来。美国对国民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表现的幻想破灭所造成的第二个错误估计，构成马歇尔将军决定不使用美军干涉中国内战的基本理由。如果说在福摩萨海峡中立化以后，国务卿艾奇逊仍有机会成功地贯彻他的使中国民族主义转向反对俄国人的长远政策；那么，这种机会却被政府越过三八线的决定毁掉了。

看来，美国官员们对福摩萨海峡中立化所造成的北京—莫斯科—华盛顿间的关系的变化的格局，似乎也没有充分地认识。艾奇逊及其他官员们曾依靠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及指出俄国人在过去对中国边疆的多次入侵，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打中国这张牌来对付苏联。但是，从发展中的模式看来，北京对“美国占领福摩萨”的焦虑，大大地超过了她对苏联在她的边疆的影响的可能有的关心。越过三八线及随后的中美军队的冲突，只是把这种变化着的模式进一步强化，对这种模式的意义美国官员们在认识上是迟钝的。

5. 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进军

最初，麦克阿瑟将军在北朝鲜的作战行动是根据9月27日的一项指令行事的。根据这一指令，麦克阿瑟的军事目标是“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但又告诉他说：“由于政策上的需要，一切非朝鲜的地面部队均不得用于毗邻苏联的各省，或用于沿满洲边界的地区。”遵照这一指示，麦克阿瑟在次日上报的作战计划中，预期非韩国部队停止在清州—永院—兴南一线。这条线穿过朝鲜半岛的狭颈部距满洲边界在各个不同点大约为50到100英里不等。然而，当美军抵达这条约束线时，该线已不再存在了。因为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10月15日参加的威克岛会议的成果之一，就是将军修改了、然后

取消了这条约束线。10月17日，麦克阿瑟发出新的命令，把约束美军的线移向一根通过青山涧水—熙川—平原—德泗里—丰山—松津的横向线，这条线在某些地方超过原线以北多达60英里。这个新命令仍然符合9月27日的含糊指令，华盛顿没有作出反对的反应。然而，事后回顾，修改约束线是军事上意义重大的行动。由于这个命令，麦克阿瑟将军放弃了三八线以北的可能最短防线。正是主要在新旧两线之间的地区内，美军在11月下旬在朝鲜的战役中打了决定性的败仗。

10月24日，麦克阿瑟干脆取消了约束线。他敦劝他的野战指挥官们说，原先的约束是基于“敌人投降的可能性”。他现在授权给他们“在必要时动用其指挥下的任何的或所有的地面部队，以便全部占领北朝鲜。”麦克阿瑟将军发出10月24日的命令时，事先并未告之联合参谋长们。10月25日，联合参谋长们告诉麦克阿瑟将军说，他的命令不符合9月27日指令的精神。他们进一步说，一方面他们理解麦克阿瑟有充分的理由发出他的新命令，另一方面他们很需要被告知这些理由。后来，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柯林斯将军举出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作为违反联合参谋长们的指令的案例，或至少是违反了指令中规定的政策。麦克阿瑟立即回答说：取消约束是“一个军事上的必需，因为大韩民国的部队力量不够，并且不能被很好地领导来应付局势。”他解释说，他在9月30日从国防部长马歇尔发来的一则电文中，被授给必需的横向线，以便修改9月27日的指令。该电文说：“我们要求你在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时，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不要受到牵制。”麦克阿瑟作结论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指令的基本目的和意图，所以在前提里提出了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然而，这一挫败之所以会酿成，甚至也许是战术上的风险的原因，乃是由于我的指令以外的其他行动。整个问题我在威克岛会谈中都谈到了。”杜鲁门总统再一次感到很诧异，正如其他人全都感到诧异一样。迟至10月26日，他还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按他的理解”只有南韩部队将进入北方各省。如果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的目的是跟他的野战指挥官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来确保麦克阿瑟忠实执行华盛顿的政策，并阻拦将军采取挑衅性的行动，那么，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

在10月末11月初，中共军队向联合国军发动了两次反击作战。同时，中共政权在中国发动了一个突出“仇视、鄙视、藐视”美国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参加这个政权的一切党派在11月4日发表一项联合声明，发誓支持“在志愿的基础上的”抗美援朝运动。这表示各党派赞同干涉朝鲜，这种干涉已经成为既成事实。1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轻蔑地驳斥任何美军也许会在中朝边界停下来的想法。它提出，当美军接近三八线时，美国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美军会在那条线停下来。后来，美国制造了一种印象，似乎美军将在离中国与苏联的边界的一定的距离之外停下来。但是，社论指责说，事态表明这些声明都是谎话。现在，美军正在向鸭绿江推进，而美国发言人又再一次用口头上保证麦克阿瑟的军队不会越出朝鲜边界的办法来施放烟幕。社论问道：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这些声明难道不正是美国侵略者要越出朝鲜边界推进的信号吗？

11月7日，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突然摆脱了与联合国军队的接触。这个战术上的脱离接触使朝鲜战场上出现了沉寂。中国干涉已经成为事实。但仍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干涉的目的和范围是什么？华盛顿和麦克阿瑟都不知道。但政府对与中共军队发生冲突一事比麦克阿瑟还要更关心，它于是想

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干涉的问题。在另一方面，政府交给麦克阿瑟的军事任务仍继续保持不变。它试图用 11 月 15 日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六国决议案、次日并用总统亲自出面的办法，向北京保证：华盛顿意欲尊重满洲的边界。它探寻沿鸭绿江建立一个缓冲地带的可能性。它准备尊重中国在邻近边界地带的合法权利，并准许北京使用朝鲜的水电力。作为实现朝鲜统一的手段，外交措施现在被摆到军事作战的前头。在对麦克阿瑟的指示不变的情况下来探求谈判的可能性的政策，依据于两个假设。其一，中共会乐意就建立缓冲地带及从北朝鲜取得电力供应的问题进行谈判。其二，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作战行动将会获得成功。结果是：两个假设都是不真实的。

麦克阿瑟激烈地反对任何与中共进行谈判的企图，反对作出和解的姿态。他不认为水电设备在北京的盘算里有重要性。他根据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理由反对缓冲地带的想法。他电告华盛顿：“把北朝鲜的一部分放弃给中共的侵略，将是自由世界在现代的最大失败。向这样一个邪恶的家伙屈服将使我国的领导和在亚洲的影响破产，并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两方面的阵地都守不住。”他不相信北京会用全力进行干涉。他确信：“在这些国家承担它们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无法撤退的责任以前”，迅速占领全部朝鲜就会制止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的侵略计划。如果中共军队确实用全力干涉，他确信他的空军将消灭他们。[229] 麦克阿瑟那样地确信他指挥下的军队的压倒力量，于是在 11 月 24 日发动了为赢得战争胜利的最后一次攻势，并告诉部队说他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他把军队分成两路，各有一个单独的指挥官，中间留着一个 20 到 35 英里的空隙。

三天后，中共及北朝鲜的军队用全面反击来迎接麦克阿瑟的总攻击。这一击“闪电般地、出乎意外地、令人震惊地”落在中段的大韩民国第二兵团的头上。南韩部队的崩溃暴露了第八军的右翼。第八军知道这一情况后在处于数量上占优势的中共军队的压力下，于 11 月 27 日开始后撤。中共军队在全线击溃了联合国军。这证明敌人集结了比原先估计的数字大得多的兵力。11 月 25 日，第八军的情报部门把前线的敌军兵力判断为 149000 人，比前一天的估计增加 95000 人。三天后，在朝的中共军队的兵力被估成 200,000 人，实际上则有 300000 中国军队。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特别公报中，麦克阿瑟将军宣称：“我们面临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新战争以 S·L·A·马歇尔称之为“本世纪的主要决定性战役之一”开始，“接着是美国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230]

北京以在成功湖的外交攻势来伴随它在朝鲜的反击战。11 月 24 日，北京政权派往安理会的首席代表伍修权将军到达纽约，参加安理会讨论北京对“武装侵略台湾”的控诉的会议。在 11 月 28 日的一份长篇发言中，伍排除了任何解决福摩萨问题的折衷方案。他宣称：

不管联合国大会可能对所谓的台湾地位问题采取什么决议，不管是否把该岛交给美国以便它能公开统治它，[或]是在“托管”的幌子下，或是搞“中立化”，或是用“调查”来进行拖延，因而保持目前的实际上的美国占领状态；这在实际上是窃取中国的合法领土，并支持美国对台湾的侵略，以反对中国人民。任何这类行为一点也动摇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更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动。

伍要求安理会“采取具体步骤，对美国的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

干涉朝鲜的罪恶行径实行严厉的制裁”，并要求“安理会采取有效步骤，使美国军队从台湾和朝鲜全部撤退”。伍攻击美国的势头之猛与在朝的中共军队向美军猛攻的势头不相上下。

后来在 11 月 11 日，周恩来拒绝了印度希望中国军队停于三八线的呼吁。他对潘尼加大使说，他的和解条件包括美军撤出台湾，中国进入联合国，及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12 月 16 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只有进一步在战场上的较量，才能带来和平的恢复。

6. 朝鲜战争和政府中国政策的崩毁

随着北京的干涉及尔后的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失去了它的暂时性特征。这些形势的变化意味着政府的摆脱政策的彻底失败。这一失败植根于美国的两党分歧。中国帮要求有个积极援助国民党的方案一事及它对中国在感情上的牵连，使得有必要在 1947 年采取有限援助的政策。在 1948 年 10 月，马歇尔从一切实用的目的出发，把中国大陆跟福摩萨全都一笔勾销之后，他们使美国的中国政策有一年半时间处于不能动弹的状态。这种动弹不得及在中国的继续纠缠，给苏联提供了充裕的时间，来准备在中国与朝鲜采取新行动，以对付美国的扶植日本的政策。且不论苏联在北京发动对福摩萨的预定进攻之前就安排攻击南朝鲜时作了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在朝鲜的入侵导致了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这就进一步激起了北京对美国的敌意。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北京干涉了。在北朝鲜的奇袭得胜后，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一样拒绝把进军停止于三八线。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对中共决定进入朝鲜战争的确切的影响；或对它后来拒绝停兵三八线的确切的影响。很可能是：美军越过三八线一事，就足以构成使北京作出那些决定和行动的条件。但人们也必须记住：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也是北京干涉以前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不能不影响北京的决定。它不能不使莫斯科的劝说北京干涉，与劝说北京把美军逐出朝鲜的工作更轻松些，如果需要劝说的话。总之，在福摩萨海峡中立化之后，紧接着发生越过三八线与中国干涉一事，这种干涉又反过来从基本上改变了中美关系。

就这样，在 1950 年末，政府对华政策的整个大厦变成了瓦砾堆。政府曾采取行动使美国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来，但形势迫使它用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在最后时刻里进行干涉。它曾企图劝阻北京不要干涉朝鲜；但是，联合参谋长们所同意的、艾奇逊犹豫地也同意的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的挺进却把北京拉入了战争。它曾竭力避免美国与共产主义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但是，向北朝鲜进军的决定铺平了美国有现代化技术的军队最终被装备恶劣的中国士兵打败的道路——而且是在对后者来说有着比中国大陆更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它曾企图限制美国对国民党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在 1950 年 11 月以后的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却导致对福摩萨的迅猛地增加军援。它曾寻求通过联合国在福摩萨问题上取得妥协；但是，北京用越过三八线在朝鲜逼进的办法，强调了她对任何这类方案的拒绝。它显然曾希望最后跟北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却发觉自己越来越反对承认共党政权，越来越反对接纳它进入联合国。[231]它曾把它的长期性政策寄托在使中国民族主义转向反对俄国，从而分裂中苏同盟的希望上面；但是，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和中国对朝鲜的干涉，大大地增加了北京对莫斯科的依赖性，而且在以后

的几年内，使这两个为首的共产主义伙伴更牢固地团结在一起。

如果政府曾采取步骤制止麦克阿瑟向鸭绿江的进军，那么，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不一定就导致美军的丢人败绩。杜鲁门总统或联合参谋长们可以坚持美军在朝鲜狭颈部的约束线。他或他们可以撤销麦克阿瑟 10 月 17 日的命令，这个命令在某些点将约束线北移 60 英里。联合国军在狭颈部的可能的最短防线上，可以有更好的挡住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的希望。再不然，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可以撤消 10 月 24 日麦克阿瑟的干脆取消约束线的命令——这个命令违反了联席参谋长们 9 月 27 日的指令，或至少违反了指令中规定的政策。这样的步骤也许能防止美军的某些先头部队深深陷入中国人的埋伏中。当政府对北京的主动外交表示遭到断然拒绝后，政府也许可以在 11 月里改变它对麦克阿瑟的指示。这些步骤一个也没有采取，因为政治目标仍然是野心勃勃的统一朝鲜，而军事上的风险显然未被认为像它们终于证明的那样严重。总之，中国——不管它是国民党的或是共产主义的——在美国人的盘算中，不是一个严重的因素。美国对中国的感情上的牵连，并不伴随着对中国力量的尊重。加之，政府在约束麦克阿瑟时，在政治上处于软弱的地位，因为它的中国政策已经被猛烈攻击了若干年，而麦克阿瑟是对远东事务的新态度的象征。就这样，美国在北朝鲜的失败的根源是它的对华政策。

也许，共产主义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北京的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成分及对伟大目标的追求——这种追求总是深深地埋藏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这种追求在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被恢复了的力量和统一的感觉所复活了。但是，未能在 1947 与 1950 年间迅速从华撤退，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越过三八线的决定等等，却把潜在的可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这样，它就剥夺了美国为适应新的远东力量对比的机动的余地和调整的余地。即使不发生朝鲜战争，在一段时间以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产生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了的中国的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跟美国的遏制政策有尖锐的矛盾，跟美国扶植亚洲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有尖锐的矛盾。但朝鲜战争促使这个国际力量对比突然出现，并给力量均衡增添了新的政治上的和感情上的因素，不然的话，这些因素是不会存在的。

从朝鲜战争中演化出来的新的力量对比，包含两个主要的成分。其一是中国在远东以强国姿态出现，其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新的斗争模式。北朝鲜战役是中国军队对一个大国作战所赢得的第一次伟大胜利；自从鸦片战争揭开了现代中国的序幕以来，这一胜利对于一场国际战争的结局，具有持久性的影响。[232]它标志着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的要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获得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部分的实现。自从朝鲜战争以来，远东的力量均衡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在亚洲大陆上的陆军，跟基于岛屿环形线上的美国海空军的互相对峙。朝鲜半岛和东南亚成为两个阵营政治军事斗争的目标。

第二，福摩萨海峡的中立化及中国的干涉，促使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一种新的斗争模式。悬而未决的福摩萨问题把共产主义中国给迷住了。结果，在北京与华盛顿之间在福摩萨的利益冲突，倾向于使苏美之间的冲突相形见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二等伙伴跟自由世界的为首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变得比预期的两个对立阵营里的最强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要更尖锐。莫斯科和北京在中苏同盟中的各自的地位，也已经基本

上改变。莫斯科在推行其对亚洲的外交政策上对北京的依赖性，被北京靠莫斯科的支持来实现她的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消灭对手的政权并实现全国统一——的依赖性遮蔽得黯然失色。北京在外交上孤立于美国的状态几乎是彻底了，可是，莫斯科机动灵活的自由却被大大地提高了。这一变化，使艾奇逊的打中国这张牌来反对苏联的政策注定了要失败。它把美国放置在一种以北京、而不是以莫斯科作主要对手的地位上，而对于北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北京的进行奇袭的惊人成就及随后的持久僵持，被北京看成是证实了毛关于美国是纸老虎的观念。这被看成是证明他的公式——“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正确的；这个公式经常是毛的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在1957年11月，却只能用这些话简要地加以论述。对这些思想的正确性的强烈信仰，导致毛过高估计了苏联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的重要性；他把战略优势归之于共产主义阵营方面；并且宣布东风压倒西风。战略评价上的这一错误，并不能用北京在战术上的小心谨慎加以充分弥补。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机会，北京总是鼓吹对美国采取好战的政策。

在美国方面，初次的失败及随后的挫折激起了对中共政权的深刻的恐惧和敌意，恐惧和敌意由于从前的对中国在感情上的牵连只有更加强烈。从此之后，恐惧和敌意就代替了传统友谊，成为美国对华姿态上的占支配地位的模式。美国就这样酬答了北京对华盛顿的恐惧和仇恨。感情上的姿态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互相推波助澜，使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僵硬化；这种敌对通过日常的斗争，使美苏对世界领导权的长期竞争也相形见绌。

艾森豪威尔政府采取的行动过程，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的垮台中，自然而然地被引导出来。对许多人来讲，失败了的政策的唯一替换物，在逻辑上讲，就是它的对立面。最大限度地孤立北京，代替了寻求妥协。重新扶植国民党政府作为在远东的头等同盟者的政策，代替了限制美国承担责任的政策。至少到1958年末为止，中共政权不是持久现象的假设，代替了它已经生根立足的假设。为阻止北京的新行动而采取的战争边缘政策，代替了一再向中国保证美国现在的意图，和提醒她关于传统友谊的做法。向中苏集团施加最大压力作为分裂该同盟的措施，代替了想使俄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的希望。同时，北京已自己担当起共产主义阵营中的美国的最不调和的敌人的角色。

于是，在半个世纪以后，发生了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互相对峙而告终一事。对峙的一边是竹幕，另一边则是全面的商业禁运。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以两个中国政权的现实而告终。对中国事务的不干涉，进入一个美国强制实行的事实上的内战停战状态。对远东的倒霉鬼的传统的同情心，被对亚洲的觉醒了的巨人的恐惧心所代替。对美国在中国道义上的领导作用的自豪感，被对中国意识形态在亚洲的影响的担心所代替。宗教和慈善活动被政治宣传战所代替。邻邻的对话被互相责骂所代替。历史的友谊发展到顶点，变成互相间的敌视。地平线上永远笼罩着战争机会的阴影。恐怕谁也很难找出一个更能发人深省的例子了：一个有良好愿望和高尚理想的政策，却收到了悲剧性的后果。这个政策就是缺乏与自身利益相关连的估计作基础，就是没有得到能跟高尚目标相称的军事力量的支持。

注 释

[1] “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是借用亨利·L·史汀生解释在中国所有的贸易国享受平等的经济权利的原则和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时说的话。为简便起见，也使用“门户开放政策”的说法。“门户开放政策”或“门户开放”仅仅用于指经济权利平等的原则。

[2]在海约翰一个早期的传记中，威廉·R·塞耶是这样解释发送‘门户开放’政策的：“现代外交最灵活巧妙的一举是海（约翰）使世界把‘门户开放’政策当作适用于中国的唯一贴切的政策而采用它。没有一个有关政府愿意同意它；每个政府都在利用它已经得到的东西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并加入争夺更大的利益的行列，但在海（约翰）宣布了‘门户开放’政策之后，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公开反对这个原则。这好像在一次会议上，他请所有相信真理的人站起来；这样，那些说谎的人就再也坐不住了。”

十八年之后，一位第一流的时事评论员对这种美国道义上的优势和列强的凶恶之间的鲜明对比的评价又不断地进行了润色和补充（见马克·沙利文：《我们的时代：两个世纪的交替之时》）。

一位美国著名外交历史学家在分析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时，敏锐地指出：“围绕‘门户开放’政策产生出一堆打不破的神话。”其中包括所有列强都对海约翰最初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都尊重美国的原则以及美国拯救了中国的错误想法。国务卿史汀生本人把海（约翰）照会的有效性归功于这一阐述。

[3]他写道：“考虑到中国在军事上处于绝对无法自救的境地，与中国结盟当然并不意味着会增加我们的力量，相反会成为我们必须履行的额外的义务。”

[4]萨姆纳·韦尔斯写道：“总统充分地注意到纳粹德国直接或间接地统治欧洲对美国未来构成的威胁。但是我希望明确无误地指出，在1937年，他对日本构成的威胁远为更加忧心忡忡。只是在这一年的初夏，他才第一次对我谈到，如果日本仍坚持它征服亚洲其他部分的政策，那么是否可能设立一个海军防线，后来又被称为‘隔离区’。”

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对柏林说：“隔离区主要是针对来自日本的威胁。”

[5]这个推测性的问题曾在一批有能力的作家和严肃的思想家的著作中提出并进行了探讨，在共产党征服大陆和北京干预朝鲜战争后发生的全国性的自我批评运动中，这些人对美国传统的远东政策是否明智表示出极大的怀疑。

[6]国务院用下列词句规定其对华政策：“美国政府的主要的和直接的目标是保持中国对日作战，并动员中国的全部军事、经济力量进行强有力的作战行动。

“美国政府对华的长远政策是基于这种信念，即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是使中国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的稳定因素。”

[7]要求一切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这一军事目标，与战后的世界上一切国家均需按国际和平的准则行事的设想是一致的；它与中国将成为大强国的设想也是一致的。但这种一致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官员们自觉地采取了要求一切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来贯彻其对战后世界的理想主义纲领。

[8]国务卿赫尔告诉中国外长宋子文说，他相信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将会

活着看到在中国的人们努力从事的各个重要领域内，都会发生一个伟大的复兴，正如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曾象破云而出的阳光掠过欧洲那样。”

[9]关于不同的解释法参看陀·卡斯：《密苏里之行》，第56页：“谈判令人绝望地纠缠不清。说也奇怪，至少在1941年7月到10月的关键时刻内，无论是外交部或驻华盛顿的大使馆都不能认清真正的问题之所在。他们相信，我国驻华军队的撤出问题构成了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分歧点。这就是为什么东条能够用拒绝考虑这种撤出的方法，来颠覆近卫内阁。正如我在别处业已指出的那样，关键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我国与德国的联盟问题及我国遵循扩张主义政策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心目中的唯一的问题。由于我国政府未能抓住这一点，谈判当然不能取得成果，并在数月内造成了许多无法补救的损害。”

[10]美国的军事文献上及史书上所用的“华东”一词指的是中国人认为的华西南。本书因袭了这一用法，但加上了引号以避免混淆。

[11]毛认识到日军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占领，也就创造了他的党的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12]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问蒋中国是否想要琉球群岛。蒋回答说，中国同意中美联合占领琉球群岛，最终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托管下由两国共同管理它。1944年1月，罗斯福对太平洋战争委员会说，斯大林完全同意琉球群岛归属中国，并应该交还给它。

[13]丘吉尔首相从军事和政治原因出发对史迪威的缅甸战役计划表示极端的厌恶和强烈反对。丘吉尔后来对此作了极好的总结：

“我们当然赞成使中国继续抗战，并从中国境内进行空军活动，但此事需要统筹兼顾，并研究其他方面的情况。我十分反对将来在缅甸北部进行大规模战役。这是对日作战的一个最不利的地点。从利多建造一条通往中国的公路，也是一个巨大而艰苦的任务。而且等到建成的时候，也许就用不着了。即使能及时建成，用以接济仍在作战的中国军队，那也不会对它们的战斗力有多少增进。据我看来，加强美方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的需要也会日渐减少，因为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以及从澳大利亚向前推进，我们会获得更接近日本本土的机场，因此、根据这两个理由，我们争辩说，大量耗费人力物力是得不偿失的……

“我们当然想收复缅甸，但我们不愿被迫采用通过薄弱的交通线。穿过对作战有难以想象的障碍地区的陆上进军，来达到这个目的。缅甸的南部以及南部港口仰光，比北部更有价值。但是整个缅甸，不论南北，都离日本太远。如果使我军踏上这条岔道，陷在那里不能自拔，那么，我们在远东的胜利中将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14]据陈纳德将军所说，1945年7月，史迪威将军建议说，他在冲绳指挥的第十军的一部分或整个军队将在上海以北的沿海登陆，而且他将装备二十万或三十万共产党军队，向南夺取上海。但是无论是罗曼纳斯与森德兰，还是菲斯在他们所进行的认真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及这一事件，而它的基础是政府档案与参加者个人的文件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设，文件并没有证明陈纳德的说是真实的。实际上，事实似乎是这样的：7月底，魏德迈与蒋商讨了美国可以支持蒋收复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的方法，蒋清楚地表明，如果来自太平洋的美国军队在中国登陆，他们绝不是由史迪威指挥。这与陈纳德所说是截然不同的。

[15]8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魏德迈说，中国沿海的占领行动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取得对关键港口和联络点的控制，在不引发大规模陆地战役的情况下，只要可行便向在中国战区的军队提供这种援助。

[16]中国的将军和政治家们认识到，蒋对新的竞争对手的担忧是史迪威军队改革计划的主要障碍。例如，见约翰·小戴维斯写的回忆录，它记载了在华盛顿与中国空军参赞所作的一次谈话。

[17]在“三巨头会议”之前，史迪威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在计划中的喜马拉雅驼峰的四千吨空运物资中调拨一千吨给陈纳德。由于这一时期喜马拉雅驼峰空运的实际吨位低于计划中的数字，因而，陈纳德实际上一个月仅仅得到六百至八百吨空运物资。

[18]在波茨坦会议上，马歇尔于7月24日声明美国计划在8月15日以前装备并训练十五个中国师。

[19]莱希海军上将感到，史迪威把蒋委员长描述成“花生米”一事，对于作为下级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

[20]蒋的这一段日记被他的儿子蒋经国在一系列歌颂他的政治家风度和性格的文章中所引用。这一系列文章显然是从一本名叫《我的父亲》的书中摘录出来的，这本书是特意为庆祝蒋委员长的七十寿辰而写的，以作为给他的献礼。该书只在内部发行，但人们都知道有这本书。

[21]据报导，斯大林曾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拥有多数的时候，当右派肯听我们的话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右派赶跑呢？……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的时候，我们会赶走他们的。目前，我们需要右派……。所以，他们[右派]应该被利用到底，就像柠檬一样被榨干汁水，然后才扔掉。”

[22]这一句话显然指的是美国，虽然没有点名。

[23]当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把中国的要求告诉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时，李维诺夫曾不止一次地评论说：“这简直就是敲诈。”他劝摩根索尽可能地拖延谈判时间。

[24]赫尔利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说，史迪威提议说他要“考查李宗仁将军的条件”，目的是为了断定他领导战时中国的能力，以便可能取代蒋介石。

[25]为了答复蒋的要求，罗斯福总统在8月间委派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作为他的个人代表驻华。赫尔利被指示增进蒋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能指挥拨交到他麾下的中国军队。

[26]张卡森报导了一个蒋与各小党派代表及无党派领袖们的会议，在会上蒋谈到了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分歧。但没有写明这个会议的开会日期。

[27]在1945年春，未被授权的日本方面的试探者在瑞士成功地与以艾伦·杜勒斯为首的战略情报局取得了接触，美国高级官员们对他们的表示几乎未加重视。

[28]史迪威在他的1944年10月4日的日记中，用下列词句来概括刚从华盛顿到来的弗兰克·梅里尔少将所带来的消息：“总起来说，没有新消息。在打垮德国以后的18个月内把日本打垮。”

[29]在导致召回史迪威的危机期间，各小党派代表及无党派领袖们曾劝说蒋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要头脑冷静。民社党领袖张君勱在评论美国人提议让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时写道：“如果遵循了这样一种行动路线，也许形势会大不相同，因为那样一来，美国政府就要对处理中国局势负起更直接

的责任。”

[30]这种提法是毛对他长期所持有的想法的进一步阐述。早在 1937 年 11 月，他对一批党的积极分子说：“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无疑，国民党了解这一报告的实质。1942 年国民党发表的一个小册子引用了一系列共产党对其干部颁发的指令中的话，这些引证与毛的话极为相似。

[31]1951 年 6 月 9 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因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一事而召开的远东军事局势听证会上，对参议院军队和外交关系委员会宣读了这一电报的全文。

[32]在上述电报公开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在给威廉·F·诺兰参议员的电文中，把由电报得出的任何推论都称为“苍白无力和缺乏色彩事实根据的搪塞”，否认“他在牺牲自由力量的情况下提出了有利于共产党力量的妥协和使势不两立、针锋相对的力量实行政治联合。”他的电文试图从两个方面为他 12 月 7 日的建议辩解：（1）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主要的敌对力量”这几个字的用意是表明中国存在许多种离心力量，并不一定包括共产党人，他这时给他们以各种名称；仅仅是“当时的模糊不清的威胁”或“少数派”。（2）强调在实现统一中国的进程中，需要从政治上加强蒋的力量。第一个解释不可能说服任何当时对中国事务略有所知的人。第二个解释因它的目的性而无法成立，把使用美国援助作为达成妥协的手段只能导致对国民党的压力，任何可以争取到的“妥协”都不可避免地使国民党处于不利的地位。

魏德迈将军还说，1945 年 12 月 7 日的电报中所使用的语言并没有公正地反映他在这时期之前或之后一贯坚持的观点。他似乎忘记了他于 1945 年 7 月 9 日发给马歇尔将军的电报，也忘记了他于 1945 年 11 月 20 日发给作战部的另一份冗长的电报。然而，在询问时，他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不是“当时中国的两大集团”这一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还承认，电报使用的语言的确向普通读者建议，他赞成成立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

[33]在这种情况下引证拉铁摩尔教授的观点不应被认为是意味着他对当时国务院的政策施加了直接的影响，或一小批阴谋家引导美国的对华政策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并造成这一结果。如果说拉铁摩尔教授“明确无疑地遵循斯大林的思想”，或者说他是“提倡斯大林思想的主要代理人”，那么这是牵强附会的，远东问题领域中的两位著名教授在调查太平洋关系学会的麦卡伦小组委员会上曾有这样的说法。不仅没有证据说明这样一种阴谋的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制定政策的分散进程排除了一小撮人代表外国利益颠覆它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这一点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这几页所表达的看法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崩溃是由美国相当多的领导人的一系列的假设、态度和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共产党的政策与宣传精明地利用了这些美国所特有的态度，导致了非现实主义的政策实行。他们还错误地执行了本来是毫无希望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失败的后果。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从根本上重新确定美国在远东政策上的思想方向是必要的。

[34]前两次“反共高潮”是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发生的。根据共产党人的说法，国民党军队在 1939 年冬与 1940 年春对共产党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至于“第二次反共高潮”，共产党人指的是 1941 年 1 月的“皖南事变”，在这场事变中，共产党新四军

的司令部分队被国民党的突然袭击所消灭，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被俘虏，副军长被杀害。

在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不久，国民党的中央新闻社于 6 月 6 日发表了一条消息报道说，一个文化团体给毛发了电报，要求他借机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毛对这个消息非常认真。

[35] 路易斯·布登兹，这位前共产党人曾是《每日工人》报的总编辑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莫斯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美国共产党，作为它要求得到对华政策的指示的答复。这篇文章曾全文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再版，见第 128—130 页。但是麦克莱恩最终表明这篇文章并不代表与重庆敌对这一明确的政策开端。

[36] 1949 年 9 月，蒋委员长担心云南省省长卢汉将军会改变立场，使共产党军队迅速推进。他阻止哗变的计划的根据是，蒋的儿子曾引用他的话说：“解决云南问题的原则应该主要靠政治，并避免流血。”他的儿子蒋经国解释说，委员长希望避免军事解决，以防止进一步削弱对共产党军队的防卫。蒋经国还指出，卢将军突然改变了主意，同意到重庆向委员长汇报，因为云南这时被蒋的军队包围起来了，通过访问，卢将军希望缓和他所承受的军事压力。

[37] 史迪威将军也认为白崇禧是蒋的可能继承人之一。

[38] 在总结高斯大使与蒋委员长的会谈的报告时，菲斯声称，蒋曾向高斯指出：“如果为了与日本作战，而使中国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虽然菲斯引证的话并不恰好与《美中关系》中解释高斯报告的文本里的话相吻合，但是后一种评论在蒋的所有论据中无疑都是不言自明的。

[39] 这里的中文译文“快刀斩乱麻”最常见的用法是表示动作迅猛，意思与“解开戈黛安之结”（希腊神话：菲利治亚的戈迪亚斯国王系的结。传说宣称，只有注定要征服亚洲的人才能解开它。亚历山大一世用他的剑斩断这个结[公元前 334 年]并向亚洲进军——译者）相似。

[40] 在这一事件之后撰写的那一时期的共产党党史表明，林伯渠（林祖涵）于 1944 年 9 月国民参政会的会议上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另一种共产党党支也说，在 194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呼吁“改组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并成立联合政府。”

[41] 在中国的战略情报局也在计划的背后起了作用。在魏德迈总部不知道的憎况下，该组织的威利斯·H·包瑞德中校与延安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谈判。一天下午，他与共产党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美国将派遣特种作战人员到各并产党部队，并为 2 万 5 千名共产党的游击队提供全套武器装备。赫尔利认为这个计划鼓励了共产党人采取不妥协的立场，并造成国共谈判的破裂。

[42] 在赫尔利 1945 年 7 月的一项报告中，有一项声明表明他在某个时期确实赞同强使蒋向共产党人提供比他所愿意自动地提供的更为优厚的条件。赫尔利写道：“在雅尔塔会议前，我曾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个计划，来强使国民政府做出更慷慨的政治让步，以便有可能与共产党人达成协议。总统不赞成这一提议。”这一提议差不多肯定是赫尔利的一闪念的思想的反映，而不是他的固定的政策。只有赫尔利于 1945 年 1 月 14 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的一句话，接近于提议向蒋施压力，这句话是：“我仍然赞成我国从国民政府那里取得各种让步，以便能让共产党人参加该政府。”

[43] 在赫尔利于 1945 年 1 月 14 日致罗斯福的电报中，他告诉总统关于

蒋打算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计划，并评论说：“他[蒋]意欲用组成战时内阁的方法，甚至在召开国民大会与通过宪法以前，就开始政府的自由主义化与廉洁化。我认为这是趋向在中国组织稳定、统一和民主政府的一项切实的步骤。”

[44]在《毛泽东选集》内，词句有重要的变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被描述成“被无产阶级领导的”，而削弱共产党人对独占领导权的要求的词语被删去了。

[45]赫尔利也曾说过：“大多数共产党人仅仅是改革者，意欲成为执政党的在野党，在中国共产党人与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没有武装。”

[46]在这个中文本中，毛在另一段行文中说：“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一句在布兰特、施瓦茨与费尔班克所引用的版本中是这样：“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用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选集》中，这一句是这样写的：“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引用的中国版本较另两个版本更切合共产党人对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而最新版本的词句明确说出联合专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这一说法也许能更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在那时的真正意图。

[47]这是指宋子文与斯大林及莫洛托夫之间的谈判，目的是达成一个履行雅尔塔条款的协定。他们在6月30日开始谈判，并终于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48]在1945年春，魏德迈将军相信用较少的援助国民政府的方法，就可以打败中国共产党人。

[49]这是约翰·S·谢伟思写的最长也最佳的报导之一，这篇报导曾登载在政府记录中。它显示出他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能力。他的具体建议特别有趣，这些建议提倡美国对中国事务进行积极的但很策略的干预，以便能带来民主改革，并扶植“中国的自由主义的进步势力”。不幸的是，他本来是正确的那些分析却被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意图的过分乐观所污染了。他的明显的言外之意是说，美国也应该支持中共反对现政权。“我们应当与国民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各小党派及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我们应当继续表示对中共感到兴趣。这包括与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们保持接触，公开两党间的矛盾和内部情况……。”但是，如果用适当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电讯，人们应该记得，美国政府一直在遵循拦阻国民党不要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政策，而罗斯福总统不久就劝告蒋委员长准许使用共产党的军队来反对日本。

在这一报导中，赫伯特·菲斯注意到：“有两个理由使人们相信，1944年6月20日的备忘录中所包含的观点乃是大家广泛共有的观点：（1）在1944年夏季的美国政策遵循了建议的路线，（2）特别注意并赞扬了这个备忘录。在高思的公文中，他赞同了它并把它一同发送给国务院。中国事务司认为它是一个及时的、有价值的讨论题。国务院专门写了一封表扬信给谢伟思，赞扬他的“及时的、精辟的分析”与“建设性的建议。”

[50]张君勱在评论谢伟思报导中的这一段时写道：“我认为蒋介石的最热狂的支持者们也不会反对这一对病态的中国战时政治局面的精辟分析。”

[51]在题为“我国远东政策的军事上的弱点〔原文如此〕”的1945年2月14日的备忘录中，谢伟思与卢登建议由总统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美国意欲使用共军来对日作战。他们断言，这种声明将产生深刻的内部影响，以致使“委员长被迫让出权力并准许成立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在1945年2月26日的电报中，乔治·艾奇逊在大使馆的全体政治官员们的赞同下，也表露了这种思想，即美国对共产党的援助将加强中国内部的要求团结的力量，并因而能“迫使蒋介石作出为团结所必需的让步，并促使他整顿好自己的家务”。

[52]看来谢伟思到延安以后工作有了调动。在1944年6月，他相信“几乎可以肯定，委员长和国民党会继续在这样一个〔多党联合阵线〕的政府中占主导地位”。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报导的摘录，如《美中关系》上所载，对无法接触国务院档案的研究工作者来说，有点会使人感到困惑不解。四段中有两段录自谢伟思的报告，即“中国局势及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但它们出现的次序是颠倒了的。在报导中无法找到脚注中的引语，如在《国务院雇员的忠诚调查》，第2035-2046页上青。然而，谢伟思的报导目录却表明，在1944年6月20日谢伟思只发出一则报导。

[53]在1944年9月28日的一则报导中，谢伟思写道：“用增进共军战斗力的方法，它〔美国对共军的军事援助〕将在战争胜利的取得上增加共产党所要求的份额。这两个因素都将提高共产党的威望，并最终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

[54]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意图的唯一正确的官方估计，也许就是题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份军事情报报告。

[55]按国务院忠诚安全局的要求仔细检查了谢伟思的全部报告之后，国务院顾问乔治·坎南在笔记中写道：“应该注意，中国事务司在国务院内评论谢伟思在报告中一贯把共产党一词加上引号，暗示其不同于苏联牌的共产党。在谢伟思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这种姿态的证据。”

[56]在检查了谢伟思写的一切报告以后，乔治·坎南作出以下结论：“在谢伟思的报告中及有些地方，对苏联，对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活动但尚未表面化的势力，尤其是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抱有某种天真的想法……。在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全部相信：使这一运动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越来越专制、越来越迷恋于独占权力、越来越不能容忍相反意见的那些因素，是老早就种下了根。实际上是早在1904与1905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的时候就种下的，而那个时期列宁采取的组织党和工作方法的原则，正是某种有逻辑地强迫实行越来越大规模的权力集中。该政权在对待其敌人的态度上则趋向于越来越过分，趋向于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形势。现在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其适用的程度说明那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意识形态上确实是来源于莫斯科；换言之，他们也受到了那些同样事物的传染。但在从延安发出的这些早钥报告中，却看不出谢伟思对那种可能性有什么认识。”

要注意戴维斯和谢伟思是被培养成中国语言和历史的专家的，而他们在被训练成外交官员时并未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

[57]他还写道：“共产党人用民主的方法施加他们的影响，来推进民主的目的。”“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民主的，在那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不民主的东西。”

[58]重点号为作者所加。关于民主和选举问题，谢伟思于1950年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时仍然认为“他们[共产党人]在乡村确实进行了各种形式的选举，这一事实显示了到那时为止中国还尚未有过的民主的发展程度。”

[59]由于谢伟思不懂得现代极权主义的这一特点，他就不能解释共产党人要享有群众的支持，只有承认自己有民主的方向。“我们尚不能有把握他说，共产党人声明要搞民主政治乃是真的，但这些声明至少部分是真的，这是对共产党军队表现出对群众的吸引力的唯一的合理解释。”

[60]重点号为作者所加。在《选集》内，这一段以这样的方式来降低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的声调：“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

[61]重点号为作者所加。在《选集》内，这个关键的一句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删去了特别提到的英国与美国的字样。

[62]在《选集》中，“他妈的”字样被删掉了。这两个汉字是下层人民的骂人话。他们是翻译不出来的。

[63]用国民党人的观点写的几篇著作认为，从苏联运送来的军需品由于苏日条约的结果而中断或减少了。另一方面，贝洛夫指出：尔后的贸易关系过程证实了苏联人的保证，即苏联的对华政策不变。只是在纳粹进攻俄国后，苏联对中国的送货才中止。

[64]谢伟思报告说，中国共产党人“埋怨说，在关于苏联将做些什么的问题上，他们比任何人知道得更少。”

乔治·坎南在安全忠诚局作证时说：“贯穿这个时期的大大部分时间内，我非常相信苏联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不能给予很大的注意的。相信它并不给他们以任何援助。恰恰相反，如果它要给中国任何援助的话，肯定它主要是援助中国的中央政府。而它只是全神贯注于它自己的努力作战的沉重负担，贯注于抵抗住德军的进攻，以致根本无暇为那些家伙们操心。我认为这完全是可能的……即共产党人事事全靠自己，而且他们自己也弄不清在战争结束后他们与苏联政府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在此情况下，我认为在这些年内，他们十分可能远远地离开了附属于苏联政府的那种典型的第三国际的观点，而他们也在这一时期内对日本作战。而在远东，相当数量的战斗威胁着他们在中国与中国中央政府对抗[原文如此]的势力。因此，我认为：他们给人以一种贯穿这些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中通常所没有的那种诚挚和全心全意的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65]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早在1942年11月与美国外交官员们的谈话中，就敦促美国政府运用它的巨大的影响来约束国民党，来取消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并承认共产党的军队是“民主阵线反抗法西斯战争的参与青之一”。

[66]毛写道：“我们也感谢英国和美国，尤其是后君——为他们对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共同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帮助而感谢他们。”在提到已故的罗斯福所作的一项声明时，他说：“对于中国人民曾经感觉是住在十分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现在感觉成了近邻了。中国人民将和美、英、苏、法各大国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建设一个‘巩固的与持久的’世界和平”。在1950年1月出版的中文本著作中，保留有这两段大字。在1953年出版的中文本及1956年出版的英文本

本中，它们都被删掉了。在 1950 年的中文本中，有一段对雅尔塔会议的详细探讨，在 1953 年的中文本及 1956 年的英文本中都被删除了。

[67]这一分析暗示官排除了广泛承认的观点，即如果美国不帮助国民政府来反对共产党，当后者在中国掌权后、将会对美国保持友好态度。

铁托元帅在掌权以后和在与莫斯科破裂以前的外交政策，似乎支持这里所说的分析判断。

[68]对美国政治传统的这一流行的解释法，最近曾在哈里·M·贾法对林肯一道格拉斯争辩的研究中所含蓄地加以反对。贾法辩论说：在政治价值、原则和哲学上的基本分歧，不仅牵涉到那些导致南北战争的争论点，而且还被争辩的双方自己明确地加以阐述。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无必要去确定南北战争中的两种观点，也就是说，无必要去确定对美国政治传统的两种解释究竟谁是正确的。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即在二十世纪中，学者们通常相信或假设基本上有一个作为美国政体的特点与价值的自发的一致看法，这也就足够了。无论这一看法是真实的或是假设的，这种在美国史研究中立即表现出来并被强调的道义上的一致性，它本身就是美国当代政治和政策的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它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内，在林肯与道格拉斯之间的理论分歧已被人们所极度轻视或忽视。向这一流行解释法提出质疑，并强调在南北战争前的道义上的分歧，贾法开辟了一条新路。

[69]路易斯·哈茨写道：“我们以己度人是特别容易的，因为特别自从杰克逊动乱以来，我们都是那样地相似。”

[70]代理国务卿迪安·G·艾奇逊在 1947 年 4 月 18 日通知沃尔特·乔治参议员说：“文森特劝告我说，他从未读过提及的两个文件[即（1）共产国际的纲领及宪章，（2）1928 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决议]。我从未亲自读过它们。”

[71]关于远东问题的有名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教授究竟是否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拉铁摩尔告诉麦卡伦委员会说：“我不是一个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那怕是中国共产主义也罢。”按他的妻子的说法，他“直到 1937 年日本侵华时，还是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不感兴趣的，即使在那时以后，他还是对共产主义可悲地一无所知。”有几个评论家表示不相信拉铁摩尔所承认的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摆脱对他的所谓“亲共”活动与思想的指控的手段。另一作家指出：作为《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拉铁摩尔以前曾给自己规定了温习六本关于苏联与共产主义的书的任务，按他自己的证词，他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他在 1934—36 年间温习的二十一本书，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与苏联、苏联在远东的政策或共产主义有关。在叙述与活动中，有一段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支持《新领导者》的上述社论中所提出的判断。“然后他[泰丁斯委员会的辩护人]提出了希肯卢珀[参议员]的最得意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很容易使我被打扮成比我实际上要更专门的俄国问题专家。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当然就会使我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日套是这样地明显，我当然拒绝钻进去。”

人们能较有把握他说的唯一的事实是：拉铁摩尔对苏联的天真态度，有时把他引向对苏联的生活抱不适当的颂扬的看法，并使他容忍亲共观点。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对共产主义是无知的。对共产主义抱容忍、放纵或同情的观点的大杂烩，以及对共产主义现实的极端无知。用乔治·坎南的词语，叫做“时代的危险”，它在西方世界的左翼非共产主义组织中有特别强烈的表

现。有时，它一方面导致外交政策上的失败主义，并在另一方面导致对共产主义威胁的低估。这个总的政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和姿态，似乎更能解释那一群关心中国事务的人们的思想和活动，而不是像弗蕾达·厄特利在《中国的故事》一书中最强力宣扬的什么有阴谋的理論的说法。

[72]为了从正确的历史角度对待罗斯福总统与周以德博士的谈话，我们必须指出，罗斯福是在努力驳斥日本认为它在中国的行动动机是希望阻止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散的论调，周以德是在努力表明，美国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不会导致战后出现一个共产主义中国。但是从当时的舆论判断，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话也反映了他们的真实信仰。

[73]与这种思想方法形成对比的是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他在 1946 年 9 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政治传统是独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性质并不会阻碍它在中国的胜利。在这篇文章问世之前，卡尔·A·威特福格尔在他的小册子《对中国社会的新见解》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这种观点后来又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许多作者强调指出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中共取得政权的因素。美国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政治科学家面临着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十分有趣的理论问题。

[74]拉铁摩尔先生对他从其他国家的特殊条件与从那里的人民的观点出发理解这些国家的审慎的努力感到自豪。他在泰丁斯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当我处理、分析并讨论有关中国与蒙古的政治问题时，我往往试图从基线出发，从这个国家和这些人民是什么样的国家和人民出发；第二，这个国家中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第三，在这个国家中，是倾向 A 还是倾向 B 更强烈。”

在他的《现代中国之形成》中，他写道：“当我们想打定主意是否应该把另一个国家称为‘民主的’国家时、我们十分自然地开始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民主国家作一番比较。它是否有与我们自己国家一样的社会制度？它是否有执行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同样的程序，是否有捍卫少数人权利的同样的保障？如果它没有，那么我们且不忙称它为民主国家。

“这种看问题的方法经常导致误解。”

[75]对拉铁摩尔先生的民主概念的解释为《现代中国之形成》中的一段话所证实：“从党和政府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这个意义出发，中国是个民主国家。”

[76]弗蕾达·厄特利断言，这本书是 1942 年写成，1943 年初发表的。出版日期对她证实拉铁摩尔在国民党问题上遵循了党的路线是至关重要的，这条路线据说在 1943 年夏发生了变化。她也许有其他证据支持她的论点，但是在核对了国会图书馆目录后，事实表明第一版的日期是 1944 年。

[77]有一次，斯诺问毛：“如果说德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与英法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苏联参加了德国的帝国主义冒险行动，甚至使德国可以得到俄国巨大的小麦、石油与其他战争物资的储备？随便提一句，为什么俄国继续把萨哈林的石油区租借给日本，或者给日本捕鱼权？后者对日本有着极大的价值，这使它能够大量出口鱼类，从而得到外国贷款购买军火进行反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78]1951 年 3 月，太平洋战争中的高级海军将领奥斯卡·C·巴杰尔中将在国立战争学院发表演讲时对他的听众说：“在战争时期，许多人都试图预告苏联在战争结束时将为它的参战而索取的代价。一般来说，这些预告无

非有三种，它们都提到为苏联的国际贸易而取得不冻港。我认为，普遍一致的意见是斯大林可能会提出所有这三种要求，但是如果情况并非如此，它们的重要性应按如下的顺序排列：

“第一，由苏联控制延伸到波斯湾的地带。

“第二，由苏联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及其通道并对邻近的领土享有明确的权利。

“第三，苏联对旅顺港与大连港享有商业与军事权利，并对这些港口以及附近的领土，包括满洲铁路享有占优势地位的控制权。”对许多人来说，苏联的要求仅仅针对第三点或满洲因素是相当令人吃惊的。另一方面，我认为，在西方列强中，这一要求使人们大为宽慰，认为它是三害中的较小者。”

在 1943 年底的德黑兰会议上，在 1944 年 10 月与丘吉尔的谈话中，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都提出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但他并没有坚持己见。然而，1945 年 6 月，莫斯科坚持它对土耳其问题的要求。

[79]1945 年 2 月 4 日，赫尔利报告说，中国政府在考虑把宋派往莫斯科的问题，并说“中国人极力想弄清苏联的态度是否如去年 9 月莫洛托夫所描述的那样”。

[80]雅尔塔协议的题目为“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议”，最后的措词如下：

“苏联、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三大国的领袖达成协议，在德国投降后的二至三个月内与在欧洲的战争结束后，苏联将在盟国一边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1. 维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

“2. 恢复 1904 年由于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侵犯的俄国原来的权利：即

“（a）萨哈林岛南部以及附近的所有岛屿将归还苏联；

“（b）使大连商业港国际化，苏联在这一海港的最高利益得到保障，恢复把旅顺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

“（c）在苏联的最高利益得到保障与中国对满洲保留全部主权的情况下，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将由一个苏中联合公司共同经营；

“（3）千岛群岛将交还苏联。

“众所周知，前面提到的有关外蒙古、港口与铁路的协议需要得到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总统将采取措施以便在斯大林元帅的劝告下取得他的同意。

“三大国的首脑一致认为在击败日本之后，将无疑满足苏联的这些要求。

“苏联就其本身而言，表示愿意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为使中国摆脱日本的奴役，它向中国军队提供援助。”

[81]查尔斯·E·波伦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作证，证词如下：“我认为，一般来说，在一个国家的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使它卷入纠纷，婉转他说是令人厌恶的；但是那时的主要考虑是保密与安全。”还有一次。波伦说：“[雅尔塔协定]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是背着中国人干的，我认为，没有人会从政治上为这一点辩护。我当时的理解是其原因是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82]使用的语言使苏联政府声称，它履行了雅尔塔协定。1952 年，苏联驻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 Y·马立克先生说：“的确，正是为了遵守雅尔塔协定，苏联才同意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后，在盟国一边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国

政府缔结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占领中解放出来。当然，如果说苏联曾保证帮助中国国民政府进行它当时反对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话，这是不真实的，因为苏联一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日宣战。它在关东向最精锐的日军发动了进攻。日本投降后，苏联军队继续与没有投降的日军作战。这样，苏联一直战斗到胜利并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援助。当时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都欢迎苏联参战。因此，如果说苏联没有履行雅尔塔协定或 1945 年 8 月 14 日的友好同盟条约的义务的话，这是错误的。”从法律观点出发，马立克断言苏联履行了雅尔塔协定的义务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作同一种断言是错误的。

[83]在史汀生的回忆录中，他同意了格鲁对日本可能早日投降的回顾性的估计。罗伯特·J·C·布托在透彻地研究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后采取了同样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是其他的权威人士无论如何无法赞同的。赫伯特·菲斯在他对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的美国政策的详尽的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美国政府（于五月）公开宣称它将不坚持废除天皇，那么日本的第一个反应仅仅是谈判其他条件的开场白”；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认为，原子弹在使日本投降中发挥了作用。

[84]“即使美国较早地明确规定了它（在天皇问题上）的妥协政策，在苏俄参战以前，战争还是会延长下去的，因为日本正在追逐更优厚的条件，只要幻想中的莫斯科渠道仍然畅通无阻。”

[85]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入侵东京平原的预定日期是 1946 年 3 月 1 日。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有很多理由使我去被茨坦，但我心目中的最紧迫的理由是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他对俄国参加对日作战的亲口保证。这是我们军事首脑们最最急于要确定的一个问题。”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86]杜鲁门在 1956 年 1 月对国务院的史学家们说，在斯大林向他提出以前，他就熟知日本第一次和平试探的内容。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把这些消息记入他 7 月 13 日、15 日与 27 日的日记。

[87]在波茨坦会议上，马歇尔将军与海军上将金向哈里曼提出一个建议。让美军在朝鲜和大连登陆，如果日军肯在苏军未占领这些地方以前就投降的话。后来，哈里曼敦促进行这些登陆，以便至少可以在关东半岛和朝鲜接受日军的投降。杜鲁门的赔偿代表埃德温·W·波利也做过同样的建议。

[88]斯大林的声明是非常骗人的。莫洛托夫确实曾拟制了雅尔塔协定的初稿和最后草案。邱吉尔在远东协议中的作用很小这也是事实。但是罗斯福的确试图修改斯大林的条款，并且他无疑对雅尔塔协议有自己的解释。

[89]蒋把给斯大林的电报交给杜鲁门，他实质上提出了同样的看法。

[90]早些时候，斯大林同意在苏联军队进入满洲时，国民政府的代表应帮助红军组织满洲民政机构。

[91]从作者所能得到的材料中尚不能确定，最后的协议草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赫尔利从重庆带来的草案。赫尔利的报告给人们的印象是变动很小。迈克尔·林赛在提交给麦卡伦委员会的一份宣过誓的声明中暗示说，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草案，而赫尔利就加上了一些对共产党人有利的新条款。

[92]毛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

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93]这一决议草案曾得到毛的支持，但在那时大概受到某些党的领导人的反对。

[94]必须牢牢地掌握住这一点，才能看清共产党人后来在 1945 年暮夏的重庆谈判中所作的提议。在他们那方面是表示出一个让步，而在 1946 年 1、2 月的马歇尔使华期间所达成的政治解决，对他们来讲则代表了一个胜利。

[95]张君勱在评论赫尔利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的分析时写道：“这位将军在那些中国的最敏锐的观察者所认为的复杂问题上的天真而又直率的处理方法，确实有一股新鲜气息。人们给赫尔利的绰号为‘大风’，不是没有理由的。”

[96]最有名的是孙殿英将军、孙良诚将军及门致中将军的案件。在 350,000 伪军中，国民党政府成功地收编了 240,000 人。

[97]日本投降时，在陈毅将军指挥下的新四军正在长江流域一带作战。在 10 月底时，该军的一支分遣队控制了满洲的葫芦岛，他们不准许美国海军运送国民党军在该地登陆。

[98]被共产党军队俘虏或向他们投降的军队绝大部分是伪军。显然，220,000 这个数字包括在伪政府及伪警察等部门服务的杂牌军队在内。依据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官方报告，有 3 个师的正规伪军投向共产党，另 3 个师被他们缴械，再有 3 个师被红军缴械。无疑地，共军也成功地解除掉或争取到一小部分日军的武装。

[99]一位强烈反共的美国记者报导上海的局势如下：“要描写上海的光复确实要耗尽英语的词汇。有句传统的中国谚语叫做‘五子登科’（五个儿子都考中了科举）。有些辛辣的讽刺家用此来指五个接收上海的官员们：一个偷金子、一个抢房子、一个下馆子、一个钻位子、一个嫖婬子。当重庆和昆明的外地政客们蜂涌进入上海，在东方最大的豪华城市内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时候，这是对已发生的事态的相当准确的描写。当然，那里大量储藏的日本的和敌国的财产，保守一点估计，也要值 50 亿美元。”

[100]刘的叙述是根据梁盛君：《蒋李斗争内幕》，梁是李将军的亲信，写此书时显然得到后者的赞许。

倒戈的国民党指挥官高树勋将军在接见共产党的新华社记者时说，他的变节是由于蒋的消灭非嫡系国民党军的政策，在军需供应上备受歧视。

[101]美国政府默认苏联占领热河省，并让红军接受那里的日军的投降，尽管蒋抗议说热河省不应该包括在第一号一般命令中所说的满洲这一地理名称之内。

[102]按菲斯的说法，“斯大林在 8 月 27 日告诉哈里曼说，蒋介石害怕红军挺进到张家口和北平，并与该地区的中共军队汇合。但他解释说，他已向蒋介石担保，他不想也不会进占这些地区。”此时红军已开进张家口有数天了。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要不就是消息不灵通，要不就是企图制造假象。

[103]9 月 8 日，一些中共军队已出现在满洲的沈阳。1945 年 10 月 3 日，伦敦《泰晤士报》报导说中共军队正在渗透到满洲并与沈阳的苏军合作。1945 年 10 月 30 日，《纽约时报》报导说俄国人准许中共军队以“平民”身份进入满洲。

中国政府所获得的关于苏联与中共合作的确凿情报中的一切案例，都发

生在 9 月 6 日以后，只有一项次要的事例除外。真实情况是，早在 8 月 11 日比中共军队的高级指挥部就命令 4 个军团开往满洲。但是不能断定共产党在重庆的谈判人那时就知道苏联肯给予共军的合作能大到和快到何种程度。

[104]在中苏条约缔结后不久，美国驻延安的陆军观察组告诫华盛顿说：虽然对中苏条约感到失望，共产党人将为控制中国而继续战斗，而宁可不接受国民党政府允诺的条件。后来的事变证明了这一预测的正确性。

[105]周恩来在与美国大使馆人员的谈话中说，唯一的主要分歧是解放区的政权问题。实际上，在解除日军武装方面缺乏协议则是一个更急迫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未达成协议，在随后的武装冲突的扩展上甚至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未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此时由通常消息灵通的《大公报》加以强调。周恩来本人后来也承认，在解除日军武装的权利问题上缺乏协议，是谈判休会后发生武装冲突的根源。周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不强调这一问题，可能是因为美国早先支持国民党政府接受驻华日军投降的权利。

[106]还要指出：斯大林曾向来保证他将不支持起义者。

[107]苏联拒绝让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的一个次要理由可能是苏联当局计划利用该港装运“战利品”到俄国。乔治·穆扛德报导说，在 11 月 12 日在大连开始装运，到 12 月 5 日完成。

[108]按中共刊物上转载的苏联资料所说，红军共缴获：

飞机 925 架
坦克 369 辆
骡马 17,497 匹
军械军需库 742 个
野战炮 1,226 门
迫击炮 1,340 门
机关枪 4,836 挺
步枪 300,000 支
无线电 133 台
装甲车 35 辆
摩托车 2,300 辆
拖拉机 125 台

共有 594,000 名日军官兵及 148 名将官向红军投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 493 页）。据国民党的资料，日本关东军在投降时共有：野战炮 1,436 门，机关枪 8,989 挺，手榴弹 11,052 枚，卡车 3,078 辆，马 104,777 匹，补给车 21,084 辆，专用车 815 辆，指挥车 287 辆。估计这些军火武器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都落入中共军队之手。

在国民党方面从驻华日军手中接收到下列军用品：步枪 685,897 支，机关枪 30,961 挺，炮（包括迫击炮）12,446 门，坦克 305 辆，装甲车 14,964 辆，其他车 18,384 辆，飞机 1,068 架。这些数字表明，落入共军手中的日本军火武器本身并不能使共军在军事上强过国民党军，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原因。

[109]指挥官之一是张作霖大帅的儿子张学诗，张作霖在 1928 年被日本杀害以前曾统治满洲达十多年。

[110]蒋对他的决心的事后追述被他在 11 月 3 日致华盛顿的一则电报所证实，即他意欲推迟到他在华北建立统治以后才进入满洲。

[111]广泛流传的叙述只是说苏联应国民党的请求，推迟了红军的撤退。一方面在技术上讲，这样说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却没有说明国民党提出请求的缘故。它也没有说清：苏联官员们几乎同国民党一样急于把红军留在满洲；没有说清苏联官员们为了换得国民党人的请求推延，愿意特别准许帮助国民党人。

[112]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应该全部停止接收工作。然后我们就可以集中兵力于平津地区，占据山海关，并以锦州为前进基地。同时，我们可以把满洲问题提交给联合国作决议，并呼吁世界舆论责成苏俄对一切后果要负全部责任。这样，我政府就会在长城以内有足够的兵力来镇压共产党人的叛乱，控制全部华北，并利用国际舆论来揭露苏俄在满洲的意图，以及她向东推进至太平洋的打算。

“由于国内和国外的干涉，我们未能坚持原先的政策。我们倒反而与苏俄进行直接的交涉。同时我们犯了把最优秀的政府军派往满洲的错误，以致只能被困在那里……。”

[113]至少直到1946年1月，赫尔利仍抱这个观点。那时他对杜鲁门总统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说，“贝尔纳斯无理由为中苏关系而感到激动，因为这些关系都在中国人和俄国人在去年7月或8月签订的协定中被规定下来”，还有“斯大林说话是算数的。”

[114]在写给马歇尔的指示信及制定这一阶段的对华政策中，马歇尔将军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的问题，曾一度引起争论。在1950年9月19日马歇尔将军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听证会上，他对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说：“当我在这里接受珍珠港事件调查的询问时，国务院就制定了美国的政策；当我越过海洋到那边去时，该政策就颁布下来了。”在1951年5月10日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马歇尔对指示信的写成讲得略为详细一点。那个讲法同样也缩小了他自己的作用，并以这样的声明结尾：“我的中国之行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在进行珍珠港调查的这个房间内办成的。”在同一听证会上，国务卿艾奇逊关于指示信的写成有不同说法，该说法表明马歇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项工作。艾奇逊的说法被费斯对这段经历的详细叙述所证实。

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攻击马歇尔将军时，充分利用了马歇尔的错误证词。

[115]国务卿艾奇逊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时说：美国的政策是“向中国政府提供各种类型的重要援助，用各种方式协助在中国维持和平，并设法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将帮助中国政府不仅在它以前统辖过的地区建立统治，还要扩大到从未统辖过的那些地区。

[116]在马歇尔到任时，在总数约三百万的日本军民中，只有约二十万人被遣送回日本。

[117]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总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

[118]同上。该声明向公众披露时，其中有若干重要删节。

[119]马歇尔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说：“……当……我出发来到中国，从一开始了解该国的环境时……，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当我的面是如此讲的，并且当我的面坚持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120]十九世纪初期的政治家兼作家勃劳汉勋爵在论及标准的力量均势原则时写道：“无论何时，只要一国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而又突然的变化，

并对它的一切邻邦都带来高度危险时，这些邻邦有权试图用敌对性的干涉行动来恢复一种能给它们安全的秩序，或至少可以用积极的侵略行动，来对抗那突然涌现的新生力量。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资格使用该权利，例如，法国在 1790 年的突然的和极大的扩张；它对邻邦安全的威胁是如此明显。致使对危险发源地情况的考虑显得无足轻重了。”

[121]早在 1946 年，某些美国官员在提及中国情景时说，中国不能成为一个对付苏联的强大盟国。在 1946 年暮春芝加哥大学举行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专家会议上，不久前刚卸职的国务卿特别助理约瑟夫·C·巴伦汀对一个怀疑中国的盟国价值的与会者说：“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企图是使中国成为对俄国的缓冲国，我们将不仅明显地损害我国与俄国的关系，而且还明显地损害中国。我国不仅将引起俄国的猜疑，而且还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意图。我认为：国务院里没有人在计划对华军援时抱这样的企图。”

严格地按照传统政策的模式，美国官员在向公众的声明中、强调了美国在华的生死攸关的利益。但在提到关键性的名词“生死攸关的利益”的上下文里，却把它变得毫无意义。1945 年 12 月 15 日的杜鲁门总统声明中说：“中国人民不应忽视用和平调解的方式，来尽快解决他们的内部分歧的机会。这也正是美国 and 一切联合国家的最生死攸关的利益之所在。”在 1946 年 3 月的一项声明中，马歇尔提到：中国有个“稳定”的政权，乃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事。正如经常援引门户开放原则那样，这种式样的声明夸大了它的目标的重要性。根据官方的想法而制定的政策，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目标的。其唯一的作用，乃是加大了因官方政策失败而带给公众的失望情绪，和夸张了美国失败的政治后果。

[122]对这一概括的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魏特迈将军。在通过 1948 年的援华法令的听证会上，魏特迈作过以下的隐晦的声明：“先生，我相信现在无必要搞军事参与。在公开会议上，我不能向你详细分析这个问题。”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他在另一段声明中说：“当人们谈论花钱完成国际性目标时，除掉想到花费钱时之外，还必须想到要花费血的代价。”重点号为作者所加。

学术界曾有人提倡直接的武装干涉。大卫·罗教授早在 1947 年就曾提议过。

[123]1946 年来的驻华美军陆战队及士兵人数是 1946 年 7 月的预计留驻人数 6,000 人的一倍。这是图需要动用美国陆战队及士兵来监督停火并保证交通线的畅通所致。

[124]在 1949 年 10 月国务院召集的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马歇尔将军在一次非正式评论中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确：“在整个华北、长江流域及满洲，我有相当多的手下人。我总是认为我得到的情报要比最高统帅的正确得多。他一再地受到蒙骗，因为如果他的部下被不光彩地击退，那个家伙总要替自己辩解。他总是说跟多少俄国兵和坦克打了一场大仗。除了没有说俄国伞兵外，差不多什么都有了。而我的人报告说，只不过是一场巡逻遭遇。这类事是常有的。我总是企图寻找关于练联影响或援助的一些真凭实据。除掉我们称之为精神上的影响或类似者外，我未能找到任何真凭实据。”（美国对华政策圆桌会议抄本，转引自《太平洋关系学会》，第 1551—1682 页。以上引语在第 1653 页。）

[125]在解释美国对希腊的积极政策时，马歇尔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说：“参议员先生，我认为希腊的形势跟中国形势稍有不同。公开支持那个战争的卫星国就在邻近。我们知道几乎全部武器装备都来自卫星国。卫星国用准许越界撤退到他们那里的办法，来庇护共产党的军队和游击队，然后武装他们、再装备他们，好让他们再投入战斗。”

[126]文森特作证说，“用多种方法使共产党人上当受骗”的主意，早在他在重庆担任美国大使馆参赞时，在 1942 年写成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过了。

[127]举个特殊的例子：CC 派在 1947 年 5 月组织了一系列的学生示威和罢课，对政府表示不信任。这些示威和罢课，部分地由于美国的压力，在名义上是由政学系领导的。CC 派企图用动乱来证实，或用政变、用在秋季选举中获胜的方法来证实“强有力的右翼政府”的合理性。但 CC 派组织骚乱的领导权很快落入民主同盟与共产党人之手。在报告该事件时，司徒大使评论说：“这一发展[指学生动乱]对 CC—CC 派[原文如此]并不是不受欢迎的。它现在可以宣布：

社会秩序不好对敌人有利。共产党人究竟现在对动乱掌握到何种程度，不妨可以展开争论；但必须承认其中有共产党人。如果他们还不是已经很活跃，但在必要和需要时，他们已准备利用这种形势。

[128]在执行其在华使命时，魏特迈将军曾在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会议上说：“必须有一个直线型的组织结构，并对政府各部委的职责有清楚明确的分工。在一年前的 4 月间，我发现国民军事委员会有 60 个部门机构和人事重迭。各部门之间很少配合与协同。事实上，在军委会内，一些部门的工作与国防事业毫不相干。今天，我们在国防部内，将 60 个部门分别隶属到 6 个厅局下面，并将人员减掉了大约 50%。”

[129]司徒大使于 1947 年 3 月 12 日报告说：“CC 派扩展势力到财经领域，将不会增加银行界和商界对政府的信任……。”

[130]该宪法的最有趣的特征是关于共和国总统、行政院长、立法院院长之间关系的条款。这种安排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两者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与第五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约略相仿。

[131]评论这一问题时，乔治·E·泰勒教授写道：“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机，即用更有目的性的干预的办法，我们有可能建立起一个中国知识阶层与国民党方面的、有新思想的军人之间的同盟。这种办法将意味着面对一个实际上是甩掉蒋介石的策划。今天我们找不到一个社会组织可以与之合作。把美援交给随便哪个能使用它的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汉森·鲍得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应对南京政府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改造”，不然，就要用一个或几个与陈旧的政治、军事手腕相对无缘的政府，来取代现在的政府。他认为：美国应支持个别的省主席和军事指挥官。后来，他更写道：“我们有权力坚持要求蒋委员长的政府进行改造，否则，我们就支持个别的省主席和军阀。前此所给的援助，也可以按我们的条件处理。我们只要观察一下最近的事变，就能明白这一点。”

[132]再早些，美国大使馆曾于 1948 年 6 月 12 日向国务院报告：“最高统帅支配局势那样久了，以致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我们认为：很难相信可以把最高统帅排除在时局之外，除非以国家的统一为代价……。如果他离开政界、培植地方系当权，共产党人的任务就会更容易完成。”

[133]这个数字后来在国务院的提议中被提高到 5.7 亿美元。议会在 1948 年的援华法令中实际拨款 4 亿美元。

[134]蒋统帅恰好在退休前把政府的黄金与白银库存运到福摩萨,当时该省是在他的得力下属的控制下。按美援方案运往中国的军火武器。也从原目的地上海改运福摩萨。

[135]某些主张大规模援蒋的人公开宣称:不要把有效使用美援提出来作为先决条件;中国在打败共产党人以前,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

[136]詹姆士·雷士顿在 1949 年 4 月报导:官方的消息说,共产党“没有能有效地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行政管理人员。国务院认为:共产党赢得战争是容易办到的,但治理国家就要困难得多……。”

[137]C·L·苏斯贝格在报导华盛顿的观点时说:“不是占领了一个资源充实的地区,苏联是对一个穷苦的泥坑大感兴趣,在那个泥坑里,闹饥荒是年年皆有的事。”

[138]介绍一段对该问题的最有趣的讨论。请参看玛丽恩·J·小利维:“我国对华政策问题”,利维的分析是特别明智的。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中共扫荡这些障碍的效率之高。

[139]美国大使馆在 1948 年 11 月 8 日报告说:新政权的根本问题“包括用新的经济社会哲学来组织经济生活。这种哲学完全是进口货,在中国是没有真正的根基的”。“如果不对共产党人的基本教条作一番猛烈变革,是难以发生深刻的、有生机的变化的。”

C·L·苏斯贝格在 2 月间报导:华盛顿分析家们推理说,共产党的使中国革命化的纲领,是“一个这样广泛和触动根基的纲领,[以致]它不容许有任何妥协。国民党……也曾有过一个革命纲领,但一碰到中国现实的暗礁就搁浅。”

[140]计划政策局局长乔治·坎南在 1949 年 10 月的讨论对华政策的圆桌会议上说:“我一直认为:俄国人也许是最不能与中国人结合,来开发中国的资源,并产生能成为对我国的有形危险的任何结果的……。中国是苏联的西伯利亚在物产上的竞争者——我曾听到斯大林表示过同样的思想,我完全真诚地这样想。”

[141]C·L·苏斯贝格于 1949 年 2 月报导:“国务院的看法——我们的主要政策——是:即使苏联与毛先生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苏联也不可能向中国提供必须的干部和支援,来解决她的根本问题。共产党人将在穷困的泥潭中搞得筋疲力尽,正如蒋委员长一样。”

[142]在国务卿艾奇逊的对华白皮书中的送交信中,他明白地表示不相信这种看法。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是“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143]此时美国报纸上刊载的各种电讯,都证实了作者的论述。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歇尔曾劝说“蒋介石发出一个不提及热河及察哈尔的命令。”

麦卡锡参议员主要依据弗丽达·厄特莱的说法,把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夸大了离奇的程度。他把它列举出来,作为美国将军马歇尔在干涉中偏向共产党人的利益的四件行为之一。麦卡锡未提及马歇尔对国民党在满洲问题的立场的支持。《美中关系》未提及赤峰事件。

[144]根据另一命令,停火至迟应在 1 月 10 日宣布停火今后三天内执行。停战协定于 1 月 13 日生效。

[145]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作证，提及这一事件时说：“我国政府在建立两党政府中代表了[原文如此]它的利益，我一点也没有超过这一点，除掉曾推心置腹地向最高统帅提供我国的人权法案的榜样及设立一个可能的过渡机构——在他们能建立正式的政体以前。我想那是费尔蔡尔德博士拟制的，我想他是那鲁大学出身，那时他在那边。但是在这件事上，那却没有进入他们的政治调整范围。”重点号是加上的。如果杜鲁门的叙述是确切的，那么这个“可能的过渡机构”就采取了联合政府的形式。这个含糊用语的意义被马歇尔的提问者诺兰参议员忽略过去了。

讨论中的草案是由马歇尔请现在在考耐尔大学的奈特·比格史塔夫教授拟议的，它符合马歇尔的基本观点。马歇尔本人是拟议提交给蒋之前的草案最后修正案的积极参与者。

[146]沃尔特·米利斯提示说，马歇尔希望以美国之行向中国的争论双方施加压力。

[147]朱将军兴奋地写道：“于是，当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感到已准备好他们的大规模的、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内战时，他们在政治上就陷于孤立，并失去了全国人民的支持。”朱还说过，中国共产党通过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揭露了蒋的打内战的阴谋，并帮助中国人民通过切身经验，消除了对蒋的幻想。

有趣的是，在毛的《选集》中，关于1945年12月15日到1946年7月20日之间的国内形势却没有论及。关于谈判、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军队改编协定、在满洲的战斗及停战的垮台等，毛没有写任何指示、讲话或评论。现有的材料甚至连准许我们推测一下这种省略的理由都办不到。

[148]最值得注意的事例是：“一般认为是国民党的便衣，在重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的群众集会上行凶打人。”马歇尔将军在1947年1月7日发出的个人声明中，评论这些事件说：“他们[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的领袖们，并似乎确信政府的每一个提议都是旨在粉碎中国共产党。我必须要说，去年二、三月间的显然有人授意的群众运动，其中有一些离我当时忙于完成谈判工作的地点只隔几条马路，这些运动给共产党人抱有这些怀疑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149]在关于美国获得的太平洋基地的托管问题的公开辩论之后，一个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副国务卿艾奇逊询问，关于让苏联占领千岛群岛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问题。艾奇逊先生回答说，雅尔塔关于该问题的决定是让苏联占领千岛群岛，而不是最后的领土决定。艾奇逊的解释受到莫斯科广播的质疑。在1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卿贝纳斯披露：雅尔塔协定曾提及大连、旅顺、千岛群岛及南萨哈林岛。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告诉记者们说：如果苏联和英国不反对的话，他将公布雅尔培协定。

[150]对于给省以高度自治权的反对主张，要求“省不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像政协决议规定的那样，还说“联邦主义应被摒弃。”

[151]按各小党派的说法，有关各方于4月24日同意延期召开国大，新的日期将由各党派讨论决走。

[152]马歇尔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时说，满洲危机“主要是被国民党部队指挥官起诉这一案件的方式造成的。”他在另一场合说道：“他[国民党在满洲的指挥官]不必要地使他的指挥处于危险境地。他深入腹地进行作战，那意味着要彻底肃清在该地区的全部共产党人。他们当然就进行了报复，而

且是非常有效地进行报复。”

[153]马歇尔将军认为：对长春国民党军的攻击，部分地是为了报复国民党对满洲的进攻。

[154]从现有材料中不能断定周恩来接受马歇尔的撤出长春的建议一事，在共产党人有计划地从该城的撤退中是否起了作用。

[155]蒋在回忆录中写道：“5月23日，杜将军[国民党部队指挥官]由四平街进抵长春。命令政府部队沿中长铁路推进，以哈尔滨为目标……。”蒋委员长到沈阳后显然改变了主意，并企图乘胜前进到哈尔滨。他从前线得到的报告一致认为：共产党人在新近的失败后，已不能作战了。

[156]马歇尔取得停战协定的成就，被麦卡锡参议员当成马歇尔在干涉中偏向共产党人的四件行为中的第二件。

蒋委员长也认为这次停战有很大重要性。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政府军在满洲的挫败的开始。如果那时政府在双城（该城距哈尔滨只有100公里）的追击部队继续向中长铁路线上这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城市进逼，在北满的共军残余就会被肃清，整个满洲的战局就会趋于稳定。如果中共被从北满的立足点逐出，苏俄将无法向他们提供更多的供应品，满洲问题的基本解决就会到来。1948年冬，政府军后来在满洲的失败主要是因为第二次停火”。

罗伯特·R·李格中校把停战称为“不仅是满洲战役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内战的转折点。”

[157]执行总部的美国方面第一次提出给战地小组中的美国成员决定性的投票权的建议。5月间，政府把这一建议提给共产党方面，作为要求接受的条件之一。

[158]马歇尔提议草案的一个附录规定，共军将不在下列各地区内驻防或集中：安徽省全部；江苏省淮安的纬度以南（在尚未确定的时间后）及陇海线以南（在尚未确定的时间后）；山东省的某些特定地点；察哈尔省张家口的纬度以南；热河省承德及承德的纬度以南；湖南省、湖北省；及除掉满洲北部五省外的满洲其他各省。

[159]5月间，马歇尔将军向周恩来解释说：“当美国按它所承担的运送任务完成运送7个国民政府军入满洲时，用美国设备运送的政府部队总数将达228,000人。”

[160]在美国政府公布的记录中，找不到支持蒋的报导的说法，即斯大林邀请他访问莫斯科。

[161]当蒋写道“抗击苏联的侵略”时，他显然指的是现在许多人称为苏联利用中共作工具的“间接的侵略”。当他谈到“联合对付苏俄的政策”时，他是在思考一项联合对付苏俄和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共，他认为只不过是苏俄的代理人。此时，苏军已完成从满洲的撤退，从字面上讲，不存在“苏联的侵略”问题。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联合对付苏俄的政策”上的分歧，并没有在联合对付中共的政策上的分歧那么大。

[162]引语引自白皮书转载的马歇尔与蒋之间的会谈的意译。马歇尔将军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作证时说：“国民政府用武力摧毁共产党体制的力量的总攻，是在[1946年]6月开始的。”

[163]马歇尔将军当然很清楚共产党的这一战术。他对一个共方代表抱怨“共产党人的宣传性攻击，攻击他本人的诚意和真正的目的，与此同时，却

又私下请求他继续进行调解。 ”

[164]麦卡锡参议员把禁运列为马歇尔将军在干涉中偏向共产党人的四件行为中第三件。

[165]它是解决两方之间的鸿沟的一个措施 ,不管马歇尔和司徒作了多大努力 ,五人委员会从来没开成会。因为双方以某些问题是否取得协议来作为召开该委员会的先决条件。

[166]剩余物资的价值估计为 9 亿美元。美国在最后成交时售价为 1.75 亿美元。

[167]马歇尔将军建议将他召回一事 ,被麦卡锡参议员说成是在干涉中偏向共产党的四件行为中的最后一件。

[168]显然此时共产党人不期望通过谈判和美国调解来获得停火。他们裁减在北平执行总部的人员 ,以致井方代表实际上已不起作用。除掉四个点之外 ,他们从政府在中国的占领区的各战地小组撤出人员。共产党的人员逐渐从南京、上海、重庆及其他城市撤出。

[169]蒋拒绝了马歇尔将军准备的一个声明草稿 ,该声明用这样一种方式宣布停火 ,即表示愿与共产党达成立即无条件停止敌对行为的协定 ,并同意已正式召开的国民大会休会 ,以便敞开进一步谈判之门。

[170]它表明了马歇尔将军的窘困 ,他至少有两次对共产党人说 ,如果他们怀疑他作为调停人的不偏不倚 ,那么 ,他可以撤出。

[171]在 1946 年 12 月 ,在华的美国士兵、水兵及陆战队总数不足 12 ,000 人。

[172]在 1948 年 2 月 ,该警卫队分遣队由 2 ,600 人组成。

[173]成立军事顾问团的计划是在日本投降后不久 ,按魏特迈将军的指示拟定的。该计划预计在第一年左右有从陆军和海军来的 1 ,000 名军官和 2 ,600 名士兵。

在 1947 年 3 月 31 日 ,国务卿马歇尔在照会中同英国和俄国的外交部长说 ,在美军完成从中国的撤退后 ,将留下约 6 ,180 名与顾问团有关的美国武装部队人员。

在 1948 年春 ,在中国有总计为 572 名军官及 921 名士兵在陆军顾问团内服役。参看范登堡参议员在 1948 年 3 月 30 日对参议院的陈述。

[174]新近从中国旅行返回的蒙大拿州众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 ,在 2 月 3 日众议院议席上的发言中提议 :美国发起召集感兴趣的国家的会议 ,来寻求一个解决中国内战的办法。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得不列国务院的积极反应。看来很清楚 ,国务卿马歇尔已摒弃了国际调停的抉择。

[175]立法院内的一群开明的立法委员们对警察的行为提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博士也表示不赞成政府的高压措施。

[176]政府的批评者们强调说 ,丢弃的弹药只能供国民党军的 30 时口径的武器 6 天之用。

[177]美国陆军军械部队军官兼政府政策的批评者 L·B·穆迪上校在 1947 年 12 月计算出国民党军队所拥有的弹药总数按正常的使用速度 ,只够供 7.92 毫米的武器作 22 天之用 ,供 30 时口径的美国步枪作 36 天之用。这一计算的正确性要依据赋予 “ 正常的使用速度 ” 一词的意义而定。

[178]按魏德迈的说法 ,马歇尔在劝他去中国时 ,向他承认 :“ 来自国会及其他来源的压力 (来自众议员沃尔特·贾德、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

及其他人），指控政府在华遵循一种消极政策，这迫使对美国政策重新作出评价。”

[179]魏德迈向国民党领袖们指出：中国从他们的私人海外投资中，至少可以筹集 10 亿美元。

[180]可是魏德迈在回忆录中叙述道，在讲话结束后，最高统帅及蒋夫人和其他几位官员们跟他热烈握手并向他道谢。

[181]例如，他在报告中写道：“有条件的美国对华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推进她的军队的改编；使公众重新对军队建立起信心……。这种援助能成为促进形成一个沿着使美国满意的路线发展的政权的条件……。”

[182]在希腊，美国的咨询及监督直到营一级水平。

[183]马歇尔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时，于 1950 年 9 月 19 日对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说：“没有什么人与我一起压下该报告，是我亲自压下了它。我派魏德迈将军去那里，作为探寻我们还能做些什么的最后一着棋。而当他的报告送来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发生着的许多事情，尤其是在苏联人支配下的那一部分世界里发生的事情，未被考虑在内。”

[184]马歇尔说，这就是压下该报告的“主要的和真正唯一的理由。”

马歇尔把魏德迈报告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范登堡参议员。他被说服道，如果公布它，将给中美关系以严重的打击。

[185]很可能是：政府压下该报告，因为——正如它的某些批评者们指责的那样——因为政府不愿为诸如沃尔特·贾德一类的共和党领袖们撑腰。但即使接受政府解释的表面意义，压下该报告看起来仍然是个错误。

[186]按共产党人的说法，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一事，标志着一切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企图的结束，并给予组成“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极大的推动力。

[187]国务院在杜鲁门请求范登堡参议员于 9 月 30 日召开对临时对欧援助的听证会后，在 10 月间开始拟议一项进一步的援华方案一事，也许并不是无意义的。

[188]当众议院辩论 1948 年的援华法令的延期问题时，沃立斯于 1949 年 4 月 4 日在众议院的议席上的讲话中，把他自己在 1939 年的观点及在四十年代以后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也加以论述。

[189]从已公布的记录中，人们找不到官方对为稳定中国局势所必须的军事努力的大小的估计。但纳撒尼尔·佩菲教授在 1948 年 1 月为《纽约时报》撰文时断言：只有用一支 15 万人的庞大的美国派遣军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在欧洲复兴方案和对华援助法案的听证会上，魏德迈表示的观点与艾奇逊的事后判断正好相反，前者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刻里”进行军事参与。但约瑟夫·C·哈士奇在 1958 年 10 月报导说，政府曾拒绝过魏德迈于 1948 年的某个时候提的派遣 10 个美国师防守沿黄河一线的建议。斯蒂芬·T·波松尼教授估计：为了平定和重组中国，将需要派 7 个美国师到满洲，15 个师到中国其他地方。

[190]后来美国顾问被派到营一级水平。

[191]对这一有趣的和高度重要的事件的叙述，是根据贝吉海军上将和巴尔将军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的证词。贝吉海军上将的证词在日期和细节上是含糊的，并显然与事实有出入。巴尔将军的证词与贝吉海军上将的证词在许多不同点上都有矛盾。但可以用仔细阅读他们的叙述并参照白皮书中所载

的文件、表格及报告的方法，重新确立一个综合的景象。

[192]政府发言人企图把迟缓问题的责任，全加在中国人头上。例如，可以看已尔将军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上的证词。T·S·廷伯曼准将于1949年6月21日向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交的声明书，也倾向于给人这种印象。

而另一方面，政府的批评者们，或者责怪迟缓是来源于某种神秘的、不明的原因，或者责怪美国方面的官僚主义的拙劣作风。双方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偏颇。

[193]司徒也注意到4亿美元没有做成什么事，最好不如不花这笔钱。

[194]准许蒋夫人来的可取性曾在11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讨论过。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杜鲁门总统赞成让她来。

[195]据报导说：麦克阿瑟将军不认为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横扫。

[196]美国联合军事顾问团只在两个月前，即是在1948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系由合并陆军顾问团、海军顾问团及其他美国单位后组成。

[197]美国驻华武官及海军武官相信：如果国民党的陆海空军能在统一指挥下协同动作，如果用银元给士兵发饷，可以防守该江几个月。

[198]蒋把金银库存运送到福摩萨并拒绝把它们移交给李代总统一事，后来成为康纳利参议员与诺兰参议员之间在1949年9月的热烈争辩的主题，当时争论联系到诺兰提出的一项给予国民党政府1.5亿美元的、互助防御援助立法的修正案。

9月7日，康纳利参议员在反对诺兰的修正案时宣称：“我认为参议员[诺兰]在讨论群众消费的参议院议席上做这些演讲是不公正的。他竭力煽动起那班残破人马，要把20亿或30亿美元扔进中国的老鼠洞，目的是为了唤醒和复活蒋介石。而他已背弃了他的人民，并把不属于他的1.38亿美元的黄金装进腰包，带到了福摩萨。钱是属于政府的，但他带着它潜逃了。在他们访问我国要求再一次解囊施舍之前，他们为什么不先用掉那1.38亿美元呢？”

两天后，诺兰参议员表示他将在参议院的议席上对康纳利有所评论，并希望康纳利在场。在一篇关于中国政策的长篇讲话的末尾。诺兰反对康纳利的关于蒋携带1.38亿美元“潜逃”的说法。

诺兰的讲话一结束，康纳利立即回答说：“我要道歉。我在我的讲话中犯了一个错误……。我曾说蒋介石拿走了1.38亿美元的黄金。我完全弄错了。他拿走了3亿美元的黄金到福摩萨。我并没有说他是拿去给他自己用的。我说过它属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他已辞去了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职务。他被假设为一个普通公民。然而他却拿走了属于国民党政府国库的黄金。”

[199]已刊出的资料不能表明，这一建议究竟是来源于国务院，还是来源于国防部。范登堡参议员在日记中记下这一事件，但对这个问题却默不作声。威斯特菲尔德称，建议采取的行动“很可能来源于国务院”，并且“肯定地由艾奇逊同意过的”。

[200]1949年2月25日的《纽约时报》第1页报导了这次会议。国务卿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解释说：这一词句并不是用来代表政府的政策，而只是说明“我本人在此情况下不能看得很远”。

[201]这是佛蒙特州共和党人乔治·D·艾肯参议员的理解，即那封信只要求委员会考虑麦卡伦法案。他在信上签名时，并不欲要求对华援助。

康纳利参议员解释该信时认为，签名者只不过要求他的委员会“注意中

国的局势”。他断言：“我们过去是那样做的，今后还要继续那样做。”

[202]2月14日，C·S·苏斯贝格报导说，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毛先生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也可能是个‘铁托式的’异教徒。”按詹姆士·雷士顿的说法，某些美国官员们相信：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领袖们，一旦在占有统治地位后，就会很快地表露出铁托主义的象征。

[203]艾奇逊在麦克阿瑟的听证会上作证时说：“此时，当它[即白皮书]最后编成的时候，我觉得似乎我们是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不得不让美国人民了解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

[204]在1951年10月任命杰赛普为美国驻联大代表的听证会上，杰赛普曾受到某些共和党参议员们的围困，因为据传国务院已作出于1949年秋冬及早承认共产党政权的决定，及据说杰赛普在该项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杰赛普能够列举各种不同的证据，并拿出美英政府间交换的备忘录来反驳这些指责。杰赛普用以下的话来概括国务院的立场：“我认为在我作的声明中有案可查，并被你们都看到的文件证实了的基本事实是：国务院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得出这种结论，即承认问题已近在咫尺了——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他们从未得出这种结论：即如果英国、印度及其他政府承认了，那么，我们也需要跟上去。”

国务院和杰赛普先生的批评者们对国务院的立场，即只有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能经得起上面提到过的三项考验才能考虑承认问题，甚至也吹毛求疵。这一态度导致了两个民主党参议员揶揄共和党人的下列一段对话：

“富尔布赖特参议员：如果你说‘决不’，你恰恰是弄错了；而且没有人期望你说‘决不’呀。

“斯帕克曼参议员：如果你说了‘决不’，你就成了个笨伯。

“富尔布赖特参议员：而如果你不说‘决不’，没人会满意你。”

[205]尽管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蒋廷黻博士的否认说：控诉“不是我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问题，而是我国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问题”；但就是那么回事。

[206]在后来的辩论中，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及联合王国代表团反对中国的决议草案，理由是：除其他各种理由外，成员国不应该无限期地束缚自己，而无法承认一个新政权。

[207]美国一般认为：如果苏联代表团没有过早地提出该问题，一个剥夺国民党代表团席位的提议案“肯定会在几个星期以内被接受”。

[208]按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莱伊的说法，英国驻安理会代表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曾怀疑“苏联的态度是根据一项算计好的政策来阻挠而不是鼓励美国或法国来承认中国的新政府。这样就能更有效地使中国孤立于西方，并落入苏联的支配之下。”当莱伊先生跟亚历山大爵士讨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时，亚历山大爵士向他表露了这些观点。

[209]汉森·鲍得温在1949年12月18日写道：“为保证福摩萨的安全，既防备可能的外来攻击，又防备内部的颠覆活动，这就可能需要10个师以上，而美国现在在全世界也就只有10个师。”此时，据报导说国民党人在福摩萨有20万到30万人的作战部队，500辆坦克及装甲车，200架作战飞机及一支15万吨的小规模海军。共产党人大约有100架由于飞行员变节而落入其手中的飞机。香港的外国观察家认为：需要动用50万到75万部队，才能成功地进攻福摩萨。共产党正在忙于修复变节投共的干重庆号”巡洋舰，该舰

已被国民党空军严重击伤。该巡洋舰拥有比国民党海军的任何舰船更重的大炮。

[210]1月5日，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总统希望澄清局势……。澄清思想比继续进行下去更重要；比获得一切可能事物中之最迫切需要的[国会中两党成员之间的]磋商更重要。”

[211]中共军队的迅速推进及国民党控制下的领土的迅速缩小，使在1948年援华法令下的拨款，按经济合作管理署拟定的计划的支用成为不可能的事。在1949年春，一般认为尚有0.54亿美元未支用。1949年秋，基金余额增大到0.94亿美元。到1950年1月，该数字是1.06亿美元。此时，国民党政府表示，如果能向他们提供美国的经济援助和军需品供应的话，他们有信心能守住福摩萨。

[212]诺兰抗议说：“加利福尼亚的这位年轻的参议员并没有主张派美军去占领福摩萨。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同意那些其他的观点。”他继续说，他主张给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给予希腊相类似的援助。

[213]在1月10日艾奇逊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会谈中，他把这个防御环形线通知了参议员们，并由康纳利主席把它告诉了报界。

[214]杰克逊还评述道：“南朝鲜是一个没有考雷基多岛的八打雁半岛，是一个没有船队的敦刻尔克，是一条没有退路的死胡同。”而相反，“福摩萨基本上是一条防线上的一点。这条防线包括日本、菲律宾和冲绳，这些对美国国防全都是必不可少的和性命攸关的。福摩萨是个可守的阵地，一个很好防守的阵地。如果我国打算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时间执行任何政策，它当然还是一个必须加强的阵地。”

[215]4月间，海南岛失陷于共产党。因此在最后的法案中没有提海南岛。

[216]在麦卡锡向参议院提出的81个危害安全的危险分子或更坏的罪名的案件中，其实国务院只有一个雇员瓦尔·洛温先生曾被控告发过伪誓，否认他曾当过共产党员。1954年5月，司法部由于缺乏证据而中止了这一指控。理查德·H·罗维尔报导说：此时麦卡锡指出政府机关中的一个前共产党人，此人曾隐瞒了他的前党员身份。但不久麦卡锡就中断了该案。按罗维尔的说法，这大概就已经是麦卡锡“最接近”于揭露出政府中的真共产党员了。在罗维尔把案件提请该机关的官员注意后，那个政府雇员就辞去了他在政府中的职务。

按洽蒂与迪克特的说法：在麦卡锡提出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之前，除掉多次争论未决的阿尔杰·希斯的案件外，国务院内曾有过3个共产党人。但他们不是被解雇了，就是离开了国务院，他们是：卡尔·奥尔多·马赞尼，1946年辞职；朱利安·韦德莱，1946年辞职；及乔治·肖·惠勒，1947年辞职。

[217]再也找不到麦卡锡在惠灵讲话的全文了。麦卡锡没有留下副本。可是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宣读了声称他在惠灵的讲话全文。

[218]谢伟思似乎是第46号。对他的指控集中于《美亚》案件问题。

[219]不能断定贾夫是不是个共产党员。在谢伟思把他从中国发送给国务院的若干份报告转交给贾夫后，他曾问过安德鲁·罗斯中尉贾夫是不是个共产党员[是罗斯把他介绍给贾夫的]。罗斯回答说：贾夫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个“左翼分子并抱非常同情的态度”。哈罗德·艾萨克斯告诉谢伟思说：贾

夫是个“坏买卖”或是一贴“坏药”。记录清楚地表明：在谢伟思将报告交给贾夫后不久，他就开始怀疑起贾夫在政治上的忠实性。谢伟思把报告交给贾夫，至少是极端地不谨慎，而在发现了贾夫的亲共同情心之后，继续跟贾夫交往，甚至就更不谨慎了。参看“忠诚审查局对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案件的看法”。

T·A·比森作证说：贾夫可能是自动地和有意地与共产党员们合作或配合，以推进共产党的目标。比森陈述说：贾夫“与厄尔·白劳德有联系和往来”。

关于麦卡锡据以指控的材料来源，有菲利普·霍顿的如下报导：“2月间，在麦卡锡首次发难后，科尔堡先生第一次会见了这位参议员。他们彼此互相需要……。饭后，科尔堡先生阐明了他的主题，即太平洋关系学会乃是共产党向国务院进行渗透的工具。参议员被赠送一集科尔堡的得意文章和新闻稿，其中包括伊曼纽尔·S·拉森所作‘国务院的间谍案’……。”

[220]赫尔利曾指责说：一群在中国的和在华盛顿的有野心的官员们“对美国的政策不忠实”。

在1945年11月26日的辞职信中，赫尔利说：“职业的外交工作人员袒护武装了的中国共产党，袒护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这个国家集团的政策，就是要使中国保持其自身的分裂状态。”

[221]退一步说，谢伟思在与贾夫的交往中也是“极端地不谨慎”的。

[222]约翰逊的事后回顾可以概括如下：正是他在6月25日傍晚把福摩萨问题加进首次布莱尔官会议的审议项目中的。他坚持说：“福摩萨较之朝鲜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相对地更大。”约翰逊与国务卿艾奇逊之间有一场简短的、但“真正激烈的”辩论。然后杜鲁门表示福摩萨问题将在以后讨论。次日就作出了派遣第七舰队的决定。

[223]古德里奇观察道：“很可能福摩萨的中立化，乃是联席参谋长们同意国务院的用武力援助大韩民国的提议的条件。”

[224]这一备忘录是由布拉德利应国防部长约翰逊的要求，于6月25日在布莱尔官的会议上宣读的，从1949年2月至1950年9月任远东司令部战区情报局局长的L·约瑟夫·福蒂尔准将，于1950年5月底6月初应蒋统帅的邀请飞赴福摩萨。他在福摩萨停留了3天，并居住在“一间邻近最高统帅的舒适的、小型别墅中”。他的使命是获得对福摩萨形势的第一手估计材料。那时，美国政府在该岛驻有一个总领事及陆海空军武官们。

从已公布的记录资料中不能确定：福蒂尔将军之行是否是导向制定麦克阿瑟将军关于福摩萨问题备忘录的步骤之一。按从1945年12月至1948年2月任第七舰队司令的查尔斯·M·库克海军上将的证词的说法，武官们及外交人士在1950年5月间相信：福摩萨将在7月15日以前失陷，并对全体美国人发出新警告，让他们撤离福摩萨。作为国际新闻服务社的代表驻在福摩萨的库克上将，反对这一对军事形势的看法。后来，库克海军上将在福摩萨担任国际对华商务的协调人。国际对华商务是一个美国公司，其中保留有一群退役军官、预备役军官及前军官，以便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技术服务。福蒂尔将军之行及麦克阿瑟将军的备忘录，显然是起源于福摩萨所面临的不确定的形势。在北朝鲜入侵前两周，在福摩萨对岸的中共军队由大约40,000人增加到约156,000人。

[225]詹姆士·雷士顿报导说：“当杜鲁门总统于6月27日命令美国第

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时，他心里有好几件事情。他想要用使福摩萨中立化的办法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他还想用使塔夫脱、诺兰、新泽西州的史密斯等参议员及其他那些斥责他的‘对福摩萨撒手’政策的人们中立的办法，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朝鲜战争的政治上的反对意见。”

[226]1950年1月1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宣布：他的政权愿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次日，北越政权的外长打电报给周恩来提出同一要求。周在1月18日给予肯定的回答。

[227]在《国会记录》上转载的詹纳对马歇尔的描写的最后部分如下：“一个跑腿的僮仆、一个头面人物、一个听差的，或者就是现任政府的一伙疯子凶手们及与共产党同路的绥靖份子们的大杂烩的同谋犯阴谋家。”

[228]他还敦促美国撤回对蒋政权的承认，但承认它是福摩萨的事实上的政府。只有在北京政权具体保证不干涉朝鲜与不进攻福摩萨的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它。

[229]在评论这些事件中，人们总是怀着诧异的心情，去猜度政府与麦克阿瑟之间在阻止中国的全面干涉的方法上的分歧究竟能大到何种程度。这一分歧正如其他许多分歧一样，全都来源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存在着的基本的观点差异。正如10月间《纽约时报》的安东尼·利维罗指出：麦克阿瑟在若干重要方面不同意政府的远东政策，他主张以武力为后盾的强硬行动，而政府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共产主义，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武力征服的。

[230]惠特尼将军断言：麦克阿瑟曾命令他的参谋人员拟制一个万一碰到中国的全面干涉时执行的详细的脱离接触及撤退的方案。如果真有这样一个计划的话，那么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披露它。S·L·A·马歇尔关于第八军撤退的详尽叙述，就没有提及此事。而恰恰相反，他揭露说：直到11月29日，首先遭到中国人攻击的第二师师长劳伦斯·B·基撒少将才间接地、十分偶然地得悉第八军司令部的撤退计划。即使在那时，“他也未接到直接的撤退命令，也未指定该师的撤出路线”。在东线，直到11月30日，阿尔蒙德将军才指示他的师长制定一个从长津湖地区以东把美军解脱出去的计划与时间表。

[231]按詹姆士·雷士顿的说法：艾奇逊反对英国在1950年12月提出的企图在三八线上谈判停火的建议。他告诉英国人说：即使中共被接纳进联合国，被美国承认为中国的政府，并把福摩萨交给了他们；他们可能在以后还会对法属印度支那提出要求，并要求在日本的和平解决问题上有发言权。

[232]在1938年初，李宗仁将军在台儿庄打败过日军。但中国在一场大战中的胜利，只是暂时迟滞了一下日军的进攻，它并不能构成战争的转折。

